

列寧工作室 ■ 精選文庫

現代世界體系

(第一卷)

16 世紀的資本主義農業
與歐洲世界經濟體的起源

[美] 伊曼紐爾 · 沃勒斯坦 著



К. МАРКС ЭНГЕЛЬС.
РЕВОЛЮЦИЯ ВКР... ИЙ НАЗАД
ВСЕХ ЕМ... ЦИХСЯ



十六世纪的
资本主义农业
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著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V.1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现代世界体系

第0卷

现代世界体系

第一卷

16 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 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著
尤来寅 路爱国 朱青浦
郑如涛 王加丰 冯 棠 译
赵自勇 牛 可 杨辰起
黄席群 宋蜀碧 初校
罗荣渠 审校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图字:01-1995-340号

COPYRIGHT©1974, BY ACADEMIC PRESS, INC.

中文版©1997,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本书根据学术出版公司1974年版译出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 System V. 1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 -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世界体系 第一卷/[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罗荣渠等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000重印)

ISBN 7-04-006089-2

I. 现… II. ①沃… ②罗… III. 经济-概况-世界 IV. F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20427号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55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64054588 传 真 010-6401404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版 次 1998年4月第1版

印 张 17.625

印 次 2000年11月第3次印刷

字 数 450 000

定 价 32.10元


凡购买高等教育出版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
质量问题,请在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中译本第一、二卷序	鹿卓恒(1)
中文版序言	[美]伊·沃勒斯坦(1)
导 言:论社会变迁之研究	(1)
第一章:序幕在中世纪拉开.....	(12)
第二章:欧洲的新劳动分工:大约 1450—1640 年.....	(79)
第三章:绝对王权与国家统制主义	(173)
第四章:从塞维利亚到阿姆斯特丹:帝国的失败.....	(215)
第五章:强盛的中心国家:阶级的形成与国际商业.....	(296)
第六章:欧洲世界经济体:边缘与外部领域.....	(399)
第七章:理论的反思	(460)

导言 论社会变迁之研究

变是永恒的。不存在不变的事物。这两句古语“千真万确”。社会结构是人类关系的珊瑚礁，人类关系在相对长的时期内是稳定的。但社会结构也有其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

除非我们把社会变迁的研究用作社会科学总体的同义语，社会变迁的意义就应限于研究最具持久性的社会现象，而持久性本身的定义当然是随历史的时间和地点而变更的。

世界社会科学的重要论断之一是认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巨大的分水岭。所谓新石器时代或农业革命就被公认为是这样的—一个分水岭，尽管只有少数社会科学家对此做过研究。另一巨大的分水岭就是现代世界的形成。

后者目前正居于当代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核心地位，而且，它的确也曾是 19 世纪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要对“现代”的性质和特征下定义，肯定会引起很大争论。而要探寻这一变迁过程的原动力，认识上的分歧就更大了。然而，社会科学家们看来普遍认为，在以往几百年里，社会结构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今天的世界与往日的世界存在着质的不同。甚至那些拒不同意确认进步的进化论假说的人们，也承认社会结构上的这种差异。

如果要描述这种“差别”，并探讨发生差别的原因，应取什么作为研究的单位才合适呢？我们时代的许多有关重大理论的争论，在某种意义上可归结为选择研究单位的争论。这是当代社会科学的重大探索。因此，在着手对现代世界社会变迁过程进行分析时，以探讨概念上的含义作为先导是恰当的。

我曾饶有兴趣地以研究我所处的社会的政治冲突的社会基础为发端，开始了这一探索。我以为，通过对冲突形式的理解，作为理性的人，我或许会对探索该社会的形成有所贡献。这导致我参加了两场理论大论战。一场是关于“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史”这一论断的适用程度的争论。这论战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阶级是在社会政治领域发挥作用的唯一重要单位吗？或者如韦伯所言：阶级只是阶级、有身份的群体和政党这三位一体中的一个单位，这三者的存在，而且其间的相互影响可以解释政治过程吗？尽管对这一问题我有自己的看法，我发现，像我的前人一样，我对这些术语既难下定义，也很不易讲清这些术语相互之间的关系。我越来越感到，这不是一个实证性问题，而实在是一个概念问题，为了回答这一争论，我不得不把问题放到一个更大的学术网络中去研究，至少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

第二场大论战同第一场论战相联系，是关于在某一个社会中，在何种程度上可能存在着或的确存在着一致的价值观，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着这种一致性，它的存在与否又在多大程度上实际构成了人们行动的主要决定力量。这一论战与第一场论战之间有联系，因为只要你否认市民社会中社会斗争的原始性质，问题就会被提出来。

价值观当然是难以观察和捉摸的，而我却要对它作大量的理论研究，因而很感到惴惴不安，我仿佛经常要在缺少严密实证基础的条件下，就对普通常识提出诘难。不过，有一点倒是清楚的，那就是，人们和群体的确是根据意识形态来判断其行动是否正当。再者，这似乎也是明确的，即群体变得日趋一致，从而在政治上更有成效，以致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识，这意味着他们发展了共同的语言和世界观。

我把实证性研究的范围从我自身所处的社会转向非洲社会，希望或者能发现一些我在非洲的见闻所证实的理论，或者通过亲眼目睹遥远国度的风俗民情，能把我的注意力引向以往因疏漏而

一直未觉察的那些问题，从而使我的感觉更加敏锐。我指望会发生前一种情况，不料产生的却是后者。

我第一次去非洲是在殖民时代，我目睹“非殖民化”过程及其后一连串主权国家的独立。作为一个白人，我当时受到长期生活在非洲具有浓厚殖民主义思想的欧洲人的猛烈攻击。作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同情者，我曾与非洲解放运动年轻的勇士们同仇敌忾，共享欢乐。没过多久我就认识到，这不仅是两个群体在政治问题上的争执，而且他们是以完全不同的概念构架来对待和处理当前的形势。

一般说来，在一场深刻的冲突中，对被蹂躏和被压制的一方来说，他们对眼前的现实的观察非常敏锐，因为要揭露统治者的伪善就要有正确的辨别力。这是他们的关心之所在。对意识形态上的偏差，他们则不大留意。在非洲也是如此。民族主义者们看到生活在“殖民状况”下的现实，即生活在这种条件下的人们，无论是他们自身的社会行动，还是他们身旁的欧洲人的社会行动（这些欧洲人是行政官员、传教士、教员和商人）都受到单一法律社会实体的约束。民族主义者们进一步看出，政治机器是以世袭阶级制度为基础的，地位的高低和报酬的多寡，则是按种族的贵贱而定。

非洲民族主义者们决意要改变他们置身其中的政治结构。我曾其他地方论述过这一问题，这与我在本书所要论述的问题关系不大。同本书有关的是，我从这里注意到，社会作为一个抽象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作为经验性的现实存在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局限。以诸如“部落”这样的单位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来探寻和分析其作用，却不考虑殖民状况这一事实将是荒谬的。在殖民状况下，“部落”的管理统治制度谈不上有什么“主权”，它受到更大的社会实体在法律上的严格限制，它仅仅是殖民地这个更大的社会实体的不可分的部分。的确，这一认识使我得出一个总的看法：总的来讲，社会组织的研究是有缺陷的，因为这种研究对法律和政

治构架普遍缺乏考虑，而各个社会组织及其成员却正是在这一构架内发挥作用的。

我力求发现殖民状况的一般特征并按我的看法描绘它的“自然史”。我很快就明白至少必须抓住世界体系恒量中的某些因素。所以我把自己的分析限制在殖民体系在这些国家中如何运行这一点上。这些国家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处于欧洲列强的控制之下，并且是这些列强的“海外属地”。确定这些常量之后，我觉得我就能说出可以普遍适用于下列问题的看法：殖民当局强加于居民的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抵制殖民当局的种种动机和形式，殖民大国赖以扎根和使其权力合法化的这种机制能在殖民构架内起作用的各种力量之矛盾的性质，人们有领导有组织地向殖民统治发起挑战的原因，以及反殖民运动的扩展和最终在政治上取得胜利的各种组成成分。在所有这些看法中，分析的单位都是由行政当局依法规定的殖民地。

对于独立后的那些“新国家”所发生的一切，我同样感兴趣。由于对殖民领地的研究似乎集中于探寻现存政治秩序崩溃的原因，因而对独立之后的时期，就要集中研究相反方面的问题：合法的权威是如何建立的，民族归属感在公民中是如何传播的。

然而，对后者的研究颇为不易。首先，研究亚非国家独立后的政治似乎是一个寻访头条新闻的过程。历史深度必然相对地不够，此外还有拉丁美洲复杂而微妙的问题。那里的情况在许多方面大同小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这三大洲看作是“第三世界”。然而拉美国家政治上的独立已经有 150 年之久。他们的文化同欧洲的传统联系比同非洲或亚洲的联系更为密切。拉美的整个事业似乎一直在很不稳固的基础上摇摆着。

为了寻求一个合适的分析单位，我转向那些“已经获得正式独立，但尚未达到可称为民族整合的国家”。采用这个定义可囊括拉美国家的多数或全部，并可包括它们迄今为止的整个时期或将近整个时期。但很明显，这一定义也可包括其他区域的国家，例

如,至少可把内战前的美国包括在内。肯定也包括至少到 20 世纪以前和可能直到现在的西欧。甚至还包括较早时期的西欧和南欧。

根据这一逻辑的推论,我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早期现代欧洲。这把我首先引向探索这一过程的起点。由于缺少更合适的概念工具,我姑且把这个过程构想为现代化过程。此外,不仅要考虑起点问题,如果把 20 世纪的英国或德国也作为相似的社会过程的实例包括在的话,还要考虑现代化的终点。既然表面上似乎没有把握,就不得不再推敲。

在这一点上,显然我被卷入了有关发展图式和若干发展阶段的一些含义不明的概念之中。这反过来引出两个问题:确定阶段的标准是什么?跨历史时期的一些单位是否具有可比性?

人类社会经历了多少阶段?究竟会有多少阶段?工业化本身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转折点抑或是政治转折点的后果?诸如“革命”(例如法国革命或俄国革命)这样的术语应如何从经验意义上理解?这些阶段是直线发展的吗?是否也可能“倒退”?看来我已经陷入了一个很大的概念泥淖之中。

由于缺少合理的比较和测定手段,要摆脱概念泥淖是非常困难的。何以有人说 17 世纪的法国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 20 世纪的印度?门外汉可能认为这种说法是荒谬可笑的。那些人果真如此错误吗?回到教科书的科学抽象的公式中,一切都很好,但要进行比较,实际上就困难重重了。

在比较两个不相关的单位时,防止谬误的办法之一是认可反面意见的合法性,并加入另外一个变量——一定时代的世界脉络,或者正如沃尔弗拉姆·艾伯哈德所说的,加入“世界时间”。这意味着,在考虑 17 世纪的法国可能已经具备 20 世纪印度的某些结构特征时,二者都已被人们从世界脉络的向度看作是大不相同的。这在概念上是清晰的,但在加以比较和测定时,就格外复杂了。

最后，似乎还存在着另一种困难。假如某些社会经历了各个“阶段”，就是说，已经有了它们的“自然历史”，那么世界体系本身又是什么呢？它具有一些“阶段”或至少有自己的“自然历史”吗？若是这样的话，我们岂不是在进化论圈子中研究进化论吗？而且，果真如此，理论岂不变成头重脚轻打转转了吗？它岂不是求助于某种简单化的推力来运转的吗？

我以为确实如此。到这时，我才完全放弃采用主权国家或国家社会(national society)这个模糊概念，作为分析单位的想法。我断定以上两者都不是社会系统，而人们仅能谈论诸社会系统中的社会变迁。在这一框架中唯一的社会系统是世界体系。

这当然是把问题极大地简化了。我找到了一种典型的单位，而不是各种单位中的单位。我能够把主权国家的变迁作为世界体系演进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加以解释。但这也是极其复杂的。很可能只有一个现时代的实例单位。假如我的分析不错的话，假如这个正确的分析单位就是世界体系，诸主权国家应看成是这单一社会系统之内诸多结构中的一种有组织结构，那么，我除了写它的历史，还能做些别的什么呢？

我对写世界体系的历史并无兴趣，也不具备进行这一工作的必要经验知识（就其性质而言，几乎从来没有人能承担这项工作）。但是，独一无二的东西是否有规律可言？从严格意义上讲，当然不会有。确定因果关系或概率是以一系列相似现象或相似事例来表述的。即使有人曾把未来很可能甚至或许可能发生的事都包括在这一系列现象之中，我们在此处能建议的是不要把未来或许可能发生的一系列事例加入现在和过去的事例的网络中。那将是把未来或许可能发生的一系列事例加到一个单一的过去—现在的网络中。

历史上只存在一个“现代世界”。或许有一天会发现在别的行星上存在可类比的现象，或在我们这个行星上发现另外的现代世界体系。但此时此地的现实是明白无误的——只有一个现代世界

体系。在这里我受到用天文学逻辑类推的启示。天文学旨在解释宇宙运行的各种规律,尽管就我所知,迄今只有一个宇宙。

天文学家们在做什么呢?据我理解,他们的论据的逻辑包含两个互不相联的操作。他们运用来自较小的有形实体的各种规律——物理学规律,然后通过类推法论证这些规律适用于整体系统(也许有个别特定的例外)。其次,他们由果溯因地推论,若整体系统在Y时处于某一状态,则在X时可能处于另一状态。

两种方法都复杂而微妙,正由于这个原因,在宇宙学领域里,对于整体系统功能的研究,著名的天文学家们所持的假设常大相径庭。对现代世界体系的解释也是如此。这种状态很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还会保持下去。实际上就掌握经验证据的总量来说,研究世界体系运行的学者们要比研究宇宙运行容易一些。

无论如何,我从T.洛赫尔(T.J.G.Locher)的警句中受到了鼓舞:“人们不应当把整体同完整相混淆。整体既大于各组成部分之合,但肯定也小于各组成部分之和。”¹

我注重在某种抽象的层面上研究世界体系,即描述整个体系结构的演进。我对特殊的事件,尤其是那些有助于理解体系机制的典型事例颇为关注。这些事件由于是重大制度变革的关键转折点,往往对理解世界体系颇有帮助。

研究这类课题时,只要掌握了大量的经验材料,而且这些材料至少部分地表现为对立而有争议形式,这样的研究课题都可以进行,幸好迄今大量的现代史题材的材料看来都是这样的。

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主要投入,是努力使研究成果加以量化。利用历史研究中的大量繁琐的叙述看来不可能提供这类量化研究成果。那么,什么是这种资料的可靠性呢?人们怎样才能从诸如上述反映体系运行的材料中妥善地引出结论呢?当代社会科学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均面临这种困境并已经认输。这是20世纪社会科学的一大悲剧。对这些社会科学家来说,历史资料似乎既模糊不清而又粗糙原始,因此是不可靠的。面对那些资料,他们

束手无策，只好避而不用。不用资料的最好办法就是设法使各种问题公式化，因为公式化的研究是无须注明引用了什么资料的。

如此看来，似乎资料的可量化性决定研究课题的选择。而这一选择又决定概念工具。人们运用这些概念工具来界定和处理经验资料。显然，这是科学过程的逆向运转。概念的形成应该决定研究手段，而不应当相反，至少在多数情况下应当如此。量化程度仅仅反映在一定时点研究的一定问题和采用的一定方法所能取得的最大限度的精确性。量化的程度当然总是宁多勿少，但仅以概念运用中所引出的问题为限。在分析世界体系的现阶段，所能达到和可以立即实现的量化程度是有限的。我们只能尽力而为，然后继续前进。

最后，还有一个客观性和责任感的问题。我不认为存在什么不具有责任感的社会科学。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不可能是客观的。这首先是要清楚地确定我们所用术语的定义。在19世纪，为了反对以前许多历史著作中神话故事的腔调，我们把如实呈现出过去的事视为历史著作的上乘之作。但社会的现实是短暂的，它只存在于现在，转瞬即逝，往事只能是按照现在而不可能是按照过去的真实性加以叙说。因为叙说往事是当前人们的社会行动，并且影响着当前的社会体系。

“真理”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在任一时点，无一事物是前后相继的；一切事物，甚至既往的事物，都具有同时代性。眼下，我们大家都无可补救地是我们的背景、我们所接受的训练、我们个人自身的能力和社会角色，以及我们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结构的压力的产物。这并不是说就没有选择。恰恰相反。社会体系及构成这一体系的所有建制，包括现代世界的主权国家，是包罗广泛的各种社会集团在相互交往，共同谋划，尤其是彼此冲突中的场所。既然我们都分属于多种群体，我们常常不得不按照忠于群体的要求作出优先选择。学者和科学家们也同样如此，并不幸免。这样的要求并不限于学者和科学家们在社会体系中扮演非学

术性的、直接的政治角色。

作为学者或科学家，肯定要在社会体系中扮演特殊的角色。这种角色同作为任一个别集团中的辩护士大不相同。我并非贬低辩护士的角色。辩护士总是不可缺少而又令人尊敬的。但他们的作用同学者和科学家的作用不一样。后者要在他所承担责任的范围内，明辨其所研究的对象的现有真实性，即以这研究中推导出一般的原理，并将这些原理最终加以特别的应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一个研究领域是无“紧要”的。对现今的社会动态的正确了解要求具有理论上的概括力，要达到这种理解，只能以研究范围最广泛的现象(包括全部历史的时间和空间)为基础。

当我谈及现象的“现有真实性”时，我并不主张为了强化政府的政治要求，学者和科学家可以说违心的话，例如，一位考古学家把他发现的伪造的文物说成是某一团伙所为，虽然他相信这一赝品出自另一团伙之手。我这里是指作为整体的考古事业从一开始，——在这门学科活动中的社会投资，研究方向和概念工具的确定，研究成果的获得和交流的方式——都表现当前社会的各种功能。而别的想法至多不过是自欺欺人。学术的客观性就是在这构架范围内的忠诚老实。

客观性是整个社会体系的一种功能。就体系而言是有倾向性的。由于某类研究活动集中在某些特定团体的手中，其研究结果将会“偏向于”对这些团体有利。客观性乃是社会投资分布于这类研究活动的矢量，而这些研究活动则由植根于世界体系的所有主要集团的人们以一种平衡的方式进行。即使这样定义，我们今天还没有一门客观的社会科学。但另一方面，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客观性并非不能实现。

我已经说过，由于不能发现可资比较的诸多事例，研究世界体系是特别复杂的。其特别微妙之处，还因为关于世界体系的诸多论述的社会影响对政治舞台上所有主要人物来说都是清楚而了然的。因而学者和科学家们在这一领域所承受的社会压力特别

巨大，那就是对他们的活动的社会控制相对地严格。在这一领域从事研究的勉为其难的学者们面临在方法论上的困境，在这里可以进一步得到说明。

然而，这也反过来表明世界体系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人类对明智地参与自身系统的进化的能力，取决于他对整体的洞察能力。我们愈是承认任务的困难，任务本身愈是显得紧迫，我们就愈应刻不容缓地开始工作。当然并非为了所有集团的利益而研究世界体系。这里就产生了我们的责任感。它取决于我们对美好社会的憧憬。既然我们要求有一个较平等较自由的世界，我们必须理解达到这一境界的各种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求对迄今为止现代世界体系的性质和演变有个明晰的揭示，同时对它现在和未来在各方面或许可能取得的发展的幅度也须加以说明。这方面的知识将会成为一种力量。就我的承诺范围而言，这种力量对那些代表世界上大多数深受压迫的人们的利益的集团应该是极其有用的。

基于这样的一些考虑，我着手分析现代世界体系的各种决定因素。要完成这个任务，得写好几卷书，即使是初步的勾画也须如此。

我把这部著作分成四个主要部分，以便对应于我设想的现代世界体系迄今为止的四个主要时代，至少初步是这样设想的。第一卷将研究世界体系的起源和早期状态，尽管实际上仅限于考察欧洲世界体系，这一时期大致是从 1450 年至 1640 年。第二卷将研究世界体系的巩固，大致从 1640 年至 1815 年。第三卷研究世界经济体转变为全球性事业。由于现代工业主义的技术上的转型，这一转变成为可能。这一发展如此突然和宏伟，以致世界体系实际上必须重新组建。这一时期大约是 1815 年至 1917 年。第四卷研究从 1917 年到目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巩固以及这种巩固引发的特殊“革命”的紧张局势。

当代社会科学中的许多研究，如果不是乔装打扮的社会心理

学的话,都变成了对各种集团和组织的研究。然而,本书并非研究集团,而是研究社会体系。当人们研究社会体系时,社会科学内部的经典式分科是毫无意义的。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的分科是以某种自由派的国家观及其对社会秩序中功能和地缘两方面的关系来确定的。如果某人的研究只集中在各种组织,其意义是有限的,如果研究集中在社会体系,其研究将一无所获。我不采用多学科的方法(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来研究社会体系,而采用一体化学科的研究方法(unidisciplinary approach)。我希望本书的实质性内容会使读者明了我这一用语的含义,同时也希望人们理解我是多么认真对待这一用语的。

注释

1 *Die Überwindung des europäozentrischen Geschichtsbildes* (1954), p. 15, 由 G. 巴勒克拉夫(G. Barraclough)所引 H. P. R. 芬贝格(H. P. R. Finberg)编 *Approaches to History: A Symposium* (Univ. of Toronto Press, 1962) p. 94。

第一章 序幕在中世纪拉开

15世纪末16世纪初，一个我们所说的欧洲世界经济体产生了。它不是一个帝国，尽管它像一个大帝国那样幅员辽阔，并带有其某些特征。它却是不同的，又是崭新的。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种社会体系，而且这正是现代世界体系与众不同的特点。它有异于帝国、城邦和民族国家，因为它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一个经济实体。事实上，它的范围（很难说是边界）囊括了帝国、城邦和正在出现的“民族国家”。它是一个“世界”体系，并非由于它囊括了整个世界，而是由于它大于任何从法律上定义的政治单位。它还是一个“世界经济体”，因为这个体系各部分之间的基本联系是经济的，尽管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文化联系而加强的，并且最终（我们将会见到）由政治安排甚至联盟结构而加强的。

对照之下，帝国却是一个政治单位。例如，什缪尔·艾森施塔特对它作过如下定义：

“‘帝国’一词通常用来指明一种政治体系，它包含广阔而又相对高度集中的领土。在这个体系中，以帝王个人和中央政治机构为体现的中心形成一个自治实体。此外，尽管帝国一般建立在传统的合法性上，它还常常包含某些更广泛、更普遍的政治文化方向，这是它的任何组成部分所不具有的。”¹

在这个意义上，帝国是五千年来世界舞台的恒久特征。在任一时点上，世界各地总是不断产生几个这类的帝国。帝国的政治集权化是它的力量所在，同时也是其弱点所在。其力量在于，它能凭借暴力（贡品和赋税）和贸易中的垄断优势来保证

经济从边缘向中心流动。其弱点在于，这种政治结构所必需的官僚制度吸取了过多的利润，尤其当压迫和剥削引起反抗从而扩大了军事开支的时候。² 政治帝国是经济统治的原始手段。是现代世界的社会成就（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发明了技术，消除了过于累赘（烦琐）的政治上层建筑的“浪费”，从而增加了剩余的东西从低阶层向高阶层，从边缘到中心，从多数人向少数人的流量。

我曾谈到世界经济体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发明。不尽如此。以前也存在过世界经济体。但它们总是转化成帝国，例如中国、波斯、罗马。现代世界经济体本来也可能发展到同一方向——的确，它也曾偶尔似乎显示出要如此发展的样子。但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技巧和现代科学技术（据我们所知，这两者之间有某种联系），使这个世界经济体得以繁荣、增殖和扩展，而没有出现一个统一的政治结构。³

资本主义所做的是提供另一种更加有利可图的攫取剩余的来源（至少从长远来看是如此）。帝国是一个征集贡品的机制，在弗雷德里克·莱恩的丰富想象中，它“意味着：征集款项为的是提供保护，而所征集的却超过提供保护的费用。”⁴ 而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中，政治力量被用来保证垄断权利（或尽可能如此）。国家减弱了作为中央的经济机构的作用，而更多地变成在其他经济交易中保证一定的进出口交换比率的手段。这样，市场的运行（不是自由运行，但毕竟是市场运行）刺激了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现代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后果。世界经济体就是这些过程发生的舞台。

世界经济体似乎在规模上受到限制。费迪南德·弗里德指出：

“把各种因素考虑在内，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古罗马的‘世界’经济体相当于使用最好的交通工具在 40 至 60 天所能到达的地方。……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1939 年），如果利

用正常的货运航道，也需要 40 至 60 天才能穿过现代世界经济体的空间”。⁵

费尔南·布罗代尔补充说，这可以认为是估量 16 世纪地中海世界大小的一段时间。⁶

16 世纪的这个 60 天行程的欧洲世界经济体⁷的产生和运行，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但必须记住，欧洲不是当时唯一的世界经济体。还存在其他世界经济体。⁸但只有欧洲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从而使它能超过其他的世界经济体。这是如何和为何发生的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在 1450 年之前的 3 个世纪中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在 12 世纪，东半球拥有众多的帝国和小世界，它们中有许多在边界上互相联结。当时，地中海是一个贸易中心，拜占庭、意大利城邦以及某种程度上北非的某些部分都在这里相遇。印度洋—红海混合区形成另一个这样的中心。中国地区是第三个。从蒙古到俄国的中亚大片陆地是第四个。波罗的海地区正在形成第五个。从经济意义上说，当时西北欧还是一个非常边缘的地区。那里的基本社会形态或社会组织后来被称为封建制度。

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地认识封建制度不是什么。它不是“自然经济”，即自给自足的经济。西欧封建制度是从一个帝国的解体中产生出来的，而这个帝国的解体事实上或甚至在法律上都从来没有全面完成过。⁹罗马帝国的神话在这个地区的一定文化和法律方面仍在发挥着使其凝聚一致的作用。基督教是影响社会行为发生的一组参数。封建的欧洲是一种“文明”，而不是个世界体系。

如果认为封建主义存在的地区有两种经济，即城市市场经济和农村庄园的自给自足经济并存，这种看法是没有道理的。在 20 世纪关于所谓欠发达世界的问题上，这种观点以“二元经济”理论的面目出现。然而，正如丹尼尔·索纳指出的：

“如果认为农民经济完全定向于他们本身的自给自足，而把任何定向于市场的经济都称作‘资本主义的’，我们便欺骗了自己。从一开始，更合理的倒是毋宁假定，在许多世纪

中,农民经济同时具有这两种定向。”¹⁰

许多世纪?究竟是多少世纪? B.H. 斯利彻·范巴思在他关于欧洲农业史的重要著作中指出,转折点大致在公元 1150 年。他认为,即使在这之前西欧进行的也不是自给自足的耕作。从公元 500 年到大约公元 1150 年,在他称为“直接农业消费”,即大多数人生产他们自己的食物而部分地自给自足的体系中,人们也还拿食物同非农业人口进行物物交换。从公元 1150 年以后,他认为西欧达到了“间接农业消费”阶段,而我们今天仍处在这个阶段。¹¹

谈到西欧的封建制度,我们要面对的是一系列细小的经济组合,其人口和生产力在缓慢增长,其合法机制保证了大量剩余流入那些具有贵族身份并控制着司法机器的地主手中。由于许多这类剩余都是实物,除非能够卖出去,否则没有多少收益。城市的发展,支持着那些购买剩余物资和用他们的产品与之交换的手工业者。商人阶级产生于两个来源:一方面,来自地主的代理人,他们有时会变成独立的、中等规模的农民,在上缴地主后还有足够的剩余产品运到市场上出售;¹²另一方面,来自远距离商人的驻地代理人(经常驻留在北部意大利城邦以及后来在汉萨同盟诸城市),他们利用交通不便以致各地区之间物价大相悬殊,而乘机牟利,特别是在某些地区遭受自然灾害时,尤其如此。¹³当然,随着城市的发展,他们向农民提供了可能的落脚地如就业场所,开始改变了庄园关系的某些条件。¹⁴

封建制度作为一个体系,不应被看作是贸易的对立物。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封建制度和贸易发展是携手并进的。克劳德·卡恩认为,如果学者们经常在西欧以外的地区观察到这种现象,¹⁵那么他们未能在西方封建制度中看到同样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戴上了思想意识方面的有色眼镜。“因此,注意到封建制度的发展和商业发展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存在着汇合的可能性,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对西方本身的历史必须重新思考”。¹⁶

然而,相对于地方性贸易,封建制度只能支持有限的长距离

贸易。这是由于，长距离贸易是奢侈品而非大宗商品的贸易。这是一种从价格差额中获利，并依赖富翁们的政治特惠和经济可能性的贸易。只有随着现代世界经济体构架内的生产发展，长距离贸易才能部分地转向大宗商品贸易，而这反过来又将促进生产发展的过程。正如欧文·拉铁摩尔指出的，在那时之前，它还不真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贸易：

“(至少)迟至马可·波罗时代，在本地之外进行冒险的商人所做的贸易还脆弱地依靠着统治者的怪想……长距离冒险所关心的更多地是好奇、罕见之物和奢侈品而不是出售大宗商品……商人寻求能予以照顾和提供保护的人……如果运气不佳，他可能会遭到抢劫或被苛捐杂税弄到破产的地步。但是，如果他运气不错，还会获得比他的货物的经济价格高得多的慷慨赏赐……丝绸贸易和其他许多贸易的结构多为一种纳贡结构而不是贸易结构。”¹⁷

因此，商业活动的水平是有限的。主要经济活动停留在小经济区域内的食物和手工业品的交换。但是，这种经济活动的规模在慢慢扩大。各个经济中心也在扩展。新边疆的土地被开垦出来。人口在增长。十字军远征带回来一些殖民掠夺的战利品。随后，在14世纪某时，这个扩张停止了。耕种面积缩减，人口下降。在整个封建欧洲以及在它之外，似乎出现了一个以战争、疾病和经济困难为标志的“危机”。这一“危机”从何而来，它的结果又是什呢？

首先，是什么意义上的危机？对此看法不一，主要着重在解释其原因，而不是描述其过程。爱德华·佩鲁瓦认为问题首先在于扩展过程达到了一个最优点，在于人口的饱和，即“在农业和手工业技术仍然处于原始状态下的巨大人口密度。”¹⁸由于缺少更好的犁具和肥料，这种局面殊难改善。这导致食物短缺进而又引发时疫。在货币供应稳定的情况下，价格有所上升，这损害了靠投资和租金收入者的利益。局势的缓慢恶化又由于1337—1453百年

战争⁽¹⁾的开始而变得更加尖锐。百年战争把西欧的国家体系变成了战时经济，其特别结果是增加税收。在原已沉重的封建贡赋上再行征税，对生产者来说确实负担过重，于是引起流动资产的危机，这又导致退回到对间接税和实物的征收。从而开始了一个向下的循环：财政负担引起消费缩减，从而导致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缩减，又进一步使资产难以变卖，导致王室举债，并逐渐使有限的王室金库无力还债，由此引发信用危机，又导向黄金囤积，进而破坏了国际贸易的格局。物价猛涨，(民生日蹙)。这就开始使人口减少。土地所有者失去了买主和佃户。手工业者失去了顾客。耕地开始变为牧场，因为后者只需较少的人力。却出现了谁来购买羊毛的问题。工资的提高特别加重了中小土地所有者的负担，他们要求国家保护，准予反对提高工资。“1350年以后日趋严重的庄园生产的分解，证明通常的停滞状况……继续在走下坡路。”¹⁹

表面上看，停滞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后果。人们本来会指望出现下面的景象：人口减少致使工资较高，工资较高加上地租相对地缺少弹性，需求结构势必发生变化，而使一部分剩余从地主转到农民手中，因此囤积的剩余部分保证可以变小。此外，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中，人口的减少本应引起需求与供给的相应减少。但是，一般典型的情况是，生产者通常会放弃肥力较低的田地来减少生产，因此，生产率本应提高，进而使价格降低。这两种情况本来都应该能够鼓励而不是阻碍贸易。然而，事实上贸易却是“停滞”不前。

估计方面的错误是对需求的弹性的设想含混不明。诺思和托马斯提醒我们，根据已知的技术情况和国际贸易量，交易成本非常高昂，一旦贸易量稍有减少(由于人口减少)，随即就会引起一个成本上涨的过程，从而导致贸易的进一步缩减。他们这样描述这一过程：

{1}英法百年战争开始于1337年，至1453年结束，实际上历时117年。本书原文为1337—1345年，显系印刷错误，故改译如上。——译者

“(从前)，商人把代理商派驻到远方城市来获取关于价格和贸易机会的信息，他们发现以此来降低交易成本是有利可图的。但当贸易量缩减时，就不再得手了。信息的来源枯竭，贸易量更加下降。无怪乎经济史学家发现，即使在世界的中心部分也出现衰退（对他们来说意味着经济活动总量的减少），随着那儿有利于农民和工人的实际工资的相对提高，据认为人均收入也会较高。²⁰

R.H. 希尔顿同意佩鲁瓦对事件的描述。²¹但他反对分析的形式，因为他把危机作为可与发达的资本主义体系经常多次发生的危机相比的东西，因而夸大了金融货币问题对封建制度发生影响的程度。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封建制度下的现金流通因素比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人们相互作用的影响小得多。²²此外，他指出，佩鲁瓦完全没有讨论从他所描述的事件中产生出来的另外一种现象，而这在希尔顿看来是中心问题，即社会冲突达到异乎寻常的程度，“地方性的不满气氛”，以及以“反对社会制度本身的起义”²³的形式出现的农民暴动。在希尔顿看来，这并不仅仅是一种结合环节上的危机，亦即周期趋势上升下降中的一点，而是一千年来的发展达到了顶峰，是一个体系的决定性危机。“在罗马帝国最后的几个世纪，正如在中世纪一样，社会和政治上层建筑不断增加其支出，而社会生产资源又没有相应的增加作为补偿，社会因而陷于瘫痪”。²⁴希尔顿同意佩鲁瓦的看法，认为这一困境的直接原因是技术的限制，肥料的缺乏，以及无力增加牲畜数量来扩大肥料的供应，因为气候限制了牲畜越冬饲料的数量。但是，“应该强调的是，当时没有把大量利润重新投入农业而使生产力得到显著提高。”²⁵这是由于封建社会组织的报酬制度的固有限制。

希尔顿强调封建制度的总危机而非佩鲁瓦所讲的结合环节上的危机的意义，就足以说明这些日积月累的进展所引起的社会转化。因为，如果一个体系内的最优生产力发展限度已被超过，加上经济压榨导致封建领主和农民之间阶级战争以及封建主阶级

内部的自相残杀战争成为普遍现象，那么，使西欧免于毁灭和停滞的唯一出路是扩大可供分享的经济利益。这条出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要求扩张土地面积和可供剥削的人口基数。这正是15和16世纪实际发生的情况。

从13世纪到15世纪，农民起义遍及西欧各地，似乎毫无疑问。希尔顿发现的下述事实是对英国情况的直接解释：“在13世纪，多数大土地所有者，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扩大了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上的生产，以便向市场出售农产品……[结果]，劳役增加了，甚至成倍地增加。”²⁶ 科斯明斯基也称这一时期是“对英国农民最加紧进行剥削”的时期。²⁷ 在欧洲大陆出现了一连串农民起义：14世纪末的意大利北部及后来的佛兰德斯沿海地区；1340年的丹麦；1351年的马略卡^[1]，1358年法国的扎克雷；1525年德国农民大战争之前的零星暴动。农民起义遍及12和13世纪的佛里西亚和13世纪的瑞士。B.H. 斯利彻·范巴思认为，“农民起义与经济衰退一起发展”。²⁸ 多布提出，出现衰退时，并不使工人最低层感到格外困难，因为这一阶层的日子大约从未好到哪里去，但却令“富裕农民的上层”感到特别困难，“他们曾开垦新土地并进行改良，因此也便往往成为起义矛头的对象”。²⁹

繁荣骤然下降不仅仅引起农民的不满。伴随而来的人口减少——不管是由于战争、灾荒还是流行病，都引起弃地（Wüstungen），居民退出边缘垦殖地，有时甚至整个村落人去屋空，遗弃村落不应被看作完全是衰退的标志。至少还有另外两个主要原因导致遗弃村落。第一个是持续存在的原因，每当战火蔓延到一地时，人们就要寻求人身安全。³⁰ 第二个是结构性的而非“偶然发生”的原因，那就是由于农业社会结构的变化，亦即“圈地”或“占地”^[2]运动。好象很清楚，这一过程在中世纪末依旧方兴未艾。³¹ 但是，要把这三

[1] Majorca 是西班牙的一个岛。——译者

[2] engrossing of land 即以垄断方式大量或全部收买土地。——译者

个原因解释清楚,就我们现阶段的知识水平而言,还有些困难。

至于森林中开垦地的停止和退出垦殖地的问题,至少有两点似乎是清楚的。正如卡尔·赫莱纳指出的,这是一个“农业经营规模的选择过程。中世纪晚期被遗弃的小块土地^[1]的百分比显然高于大规模农场。”³²这同时也根据地区而有所不同。弃地行为似乎不仅在德意志和中欧,³³而且在英国也很广泛。³⁴但在法国却相当有限。³⁵无疑,这一点可由下述事实略加解释:由于历史原因和土壤原因,在法国比在欧洲其他地区定居的人口更稠密,林中地也开垦得较早。

在这个对农产品的需求减缩时期,城市工资以及工业品价格都在上涨,原因是人口下降引起劳动力短缺。这反过来,又在地租降低的同时(在地租固定而名义价格上涨的情况下),提高了农业劳动力的成本。这导致马克·布洛赫所称的“封建领主阶级的暂时贫困化。”³⁶不仅利润减少,而且管理成本增加,每逢困难时期情况总会是这样的。³⁷这使业主们考虑摆脱直接管理。经济紧缩导致对农民勒索盘剥的加强,而这在此时恰恰是反生产的,后果是农民纷纷外逃。³⁸恢复贵族收入的一个办法,正是对最富有阶层常行之有效的办法,这就是与王孙公子一道投身于报偿丰厚的新职业中。³⁹但这仍不足以抵销衰退的影响和阻止领地的衰落。⁴⁰并且,这可能由于封建主离开居住地而助长了对管理的漠不关心。

那么,大庄园怎样了呢?庄园主为了换钱便把它卖给或租给,乐意而又能进行这一交易的主要集团,这些人是富裕农民,他们正处于可以获取优惠条件的地位。⁴¹

我们必须记住农业生产的社会组织并非到处完全一样。西欧的领地最大,部分原因是较稠密的人口要求较大单位的相应的效率。在中欧,经济衰落的结果也导致遗弃边缘地,但对这些弃地行为的分析由于其兼有一部分圈地和弃地,所以情况不免复杂。⁴²再

[1] Small holdings 是租给佃农供其自用的小块土地。——译者

往东，在勃兰登堡和波兰（我们下文还要谈到），人口密度更稀，那些从前拥有土地的总面积还少于农民土地的封建主，眼见他们的庄园正在得到由于人口骤减而被抛荒的大片土地。”⁴³这在16世纪会对他们多么有利，这将多么深刻地改变东欧的社会结构，这对西欧的发展将会多么重要，——所有这一切，无疑超过了14世纪和15世纪人们的认知范围。但在西欧的非边缘可耕地上，过大的领地由较小的地块所取代。因此，同时在西欧可耕地上出现了中等规模的农民，在西欧不大适宜耕种的土地上（这将是扩大畜牧业的基础）开始有了圈地运动，而在东欧，财产在向大庄园集中（将发挥作为谷物出口地区的新功能）。

这一经济“崩溃”或“停滞”时期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发展是好还是坏呢？这取决于人们观察这一问题时眼光的长短。迈克尔·波斯坦把15世纪看作是14世纪发展的倒退，“是后来准会被克服的挫折。尤金·科斯明斯基把这看作消灭封建制度的一部分，因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然的一步。”⁴⁵事实相同，而理论观点却不一样。

在以上讨论中，我们很少提到政治领域的发展情况，特别是集权国家官僚体制的缓慢兴起。西方封建制度最兴盛的时期，国家最为软弱，而地主、庄园封建主则称雄一时。在较后的时期，不管国家机器在多大程度上可能被贵族利用来增进他们自己的利益，国王和皇帝的软弱无力却无疑地仍对他们更为有利。他们不仅自己很少被控制和被征税，而且更可以随意控制农民和向农民征税。在这类社会里，中央政权及其法令与群众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暴力的影响便是双重的，正如布洛赫指出的，“通过习惯的运用，滥施暴力总有可能突变为先例，然后先例则成为权利”。⁴⁶

庄园封建主如果不是处于被削弱的地位以致他们感到更难以抵抗中央政权的要求和更乐于从强加的秩序中得到好处的话，他们是永远不会欢迎加强中央机器的。这种状况是由14世纪和15世纪的经济困难和庄园收入的下降所造成的。

随同经济困境一起出现的是战争艺术的技术转变，从长弓到大炮到手枪，从骑兵战到需要更多训练和纪律的步兵冲锋战。这一切表明，战争费用势必增加，需要的人数也随之增加，常备军较之按特定需要组编军队更为可取，这一点已越来越清楚。在新要求下，无论封建主个人还是城邦都不能真正负担得起这笔费用，也难于征募人力，特别是在人口下降的年代。⁴⁷实际上，就是领土国家也很难维持秩序，正如频繁发生的农民暴动所表明的一样。⁴⁸

但是，15世纪西欧也涌现了一批恢复内部秩序的伟大人物，诸如法国的路易十一，英国的亨利七世，西班牙的阿拉贡的费迪南和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正像那些不太成功的前辈们一样，他们能够支配而赖以完成这一任务的主要机制是财政方面的：使苦心建立起来的文武官僚体制强大到足以征税的地步，从而以财政手段维持一个更强大的官僚结构。这一过程在12世纪和13世纪早已开始。随着那些早先把诸侯们搞得心事重重、筋疲力竭的外敌入侵活动的停止，随着人口的增长，贸易的恢复以及大量的货币因此更加流通，于是形成了稳定的税收基础，足以支付官吏和军队的薪金。⁴⁹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同时也出现在德意志的各个公国。

税收确实是关键问题。要开始一个向上的循环也非易事。⁵⁰中世纪末期对于建立有效税收体制的障碍现在看来是很大的。实践中，税只能在净产量上征收，而净产量很低，货币量及其流通量也低。由于人手不足，同时也由于数量记录水平低下，要核实税额极其困难。难怪统治者要不断另辟税收以外的途径作为收入来源：诸如没收财产、举债、出售国家官职、贬低硬币成色。但是，这类途径尽管可能缓解一时的经济困境，但其中每一个办法都对国王的政治—经济实力有长远的不利影响。⁵¹然而，只强调困难的一面是不对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巨大的成就。许多折衷的办法可看作是通向成功之路的必要步骤。包税业⁵²和出售官职⁵³正可看作这类有用的折衷办法的两个形式。此外，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向

国王，不仅由于强化了国家而且也由于削弱了贵族本身的收入来源而损害了贵族的利益，特别是在14世纪和15世纪经济紧缩的情况下，而对那些与新官僚体制没有关系的贵族尤其如此。正如达比所说：“农民从土地上获得的很大一部分收入仍流入封建主手中，但税收制度的不断改进显然扩大了国家代理人所得的份额。”⁵⁴

随着国家的日益强大，操纵货币变得更加有利可图。在14世纪和15世纪，当战争引起的财政危机与有税可征的农村中利润减少的两种情况交织在一起时，国家不得不另辟收入来源，尤其因为人口减少而使诸侯们向愿在荒芜地区重新殖民的人们实行免税。在这种情况下，操纵货币便有多种优势。利奥波德·热尼科指出，对这一时期的频繁贬值有三种可能的解释：国债的减少（尽管贬值也从而减少国库的固定收入，这一宗收入占来自王室领地上收入的大部分）；在贸易的增长超过白银储备时，以及当社会动荡助长黄金囤积时，缺乏支付手段；或者故意采取降低汇率以抑制通货膨胀、打击囤积分子、促进出口从而振兴商业的经济政策。无论对贬值作何种解释，贬值总是“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并且“减少国库固定收入的实际价值。”⁵⁵固定收入的主要接受人是封建主阶级，同国家相比，他们就被削弱了。

国家？什么是国家？在当时，国家就是君主，他的声誉被歌颂，他的王权被维护，他逐渐脱离了臣民。⁵⁶此时出现的是官僚体制，一个具有特殊性格和特殊兴趣的独特的社会集团，它是君主的主要同盟者，⁵⁷但同时，我们将看到，它又是一个有矛盾心理的同盟者。正是君主创造各种国会机构，作为协助其通过立法程序来征税的机制。这些机构的成员主要是贵族，国王试图利用它们来反对贵族，而贵族则利用它们反对国王。⁵⁸

国家是一大造物，在西欧，国家的形成不是始于16世纪而是始于13世纪。伊维斯·雷诺阿德追溯了决定现在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国境的分界线是如何在1212至1214年之间的一系列战争

中基本上得到最后解决的来龙去脉。⁵⁹后来民族情绪的形成就是建立在这些分界线的基础上,而与其它界线无关(例如,地中海奥克西坦尼亚国,包括普罗旺斯和加泰罗尼亚;或大西洋国,包括作为英国一部分的安茹伯爵的西部法国)。首先是分界线,而后才是感情,对早期的现代欧洲是这样,对20世纪的非洲也是这样。正是在这个时期不仅决定了边界线,而且更重要的是,决定了从那以后将有的边界线。这就是爱德华·佩罗依所说的西欧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变化”。⁶⁰按他的观点,从12世纪中期至14世纪早期之间,或者简而言之,在中世纪商业和农业的鼎盛时期,欧洲的转变就开始了。

为什么是民族国家而不是帝国?这里,我们必须谨慎对待我们的术语。也许我们应该把13世纪和14世纪的法国看作民族国家,把15世纪和16世纪的法国看作帝国,而把17世纪的法国重新看作民族国家。这像是费尔南·布罗代尔的看法。⁶¹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交替的现象?布罗代尔提出,“随着15世纪和16世纪的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绝对有利于大国,甚至极庞大的国家,或‘臃肿国家’的局势。……事实上,历史对大的政治结构总是时而有利,时而不利。”⁶²弗里茨·哈通和罗兰·莫斯尼尔认为,需要确定一个能建立起君主专制国的最小限度的(和最大限度的?)规模,亦即在小国未能成功的一种形式。“无疑,小国不能形成大到足以维持一个君主国专制的军事和经济单位。”⁶³这些看法只是解答在理论上很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的线索。V.G. 基尔南对概念的澄清可能对我们最有裨益:

“没有任何朝代最初要打算建立一个民族国家;每个朝代的目标都是无限制的扩张,……它越是繁荣,其结果便越是变成一个包罗万象的,不成功的帝国。它必须大到足以维持生存,必须对邻国利爪相向,同时又必须小到足以由一个中心进行组织,而且仍然感觉自己是一个整体。在欧洲封闭的西部边缘,领土的过大扩张受到竞争和地理界限的制约。”⁶⁴当然,除

非它们把帝国扩展到海外。

这些不成功的帝国将会从帝国中发挥出不同的存在的理由，不同的意识形态。一个民族国家是一个领土单位，其统治者寻求（有时寻求，时常寻求，但肯定不总是寻求）从中造出一个民族社会（其道理我们后面还要讨论）。但当我们回忆起下述事实时，这个问题甚至更显得含混不清：从16世纪往后，西欧一些民族国家曾试图在各个帝国的中心创造若干相对同族的民族社会，借助于帝国的冒险行动（这种行动也许是不可缺少的）然后去创造一个民族社会。

我们已经讨论了西方封建制度在14和15世纪的危机。它是16世纪以后欧洲扩张及其经济转变的背景和序幕。至此，讨论和解释基本上是从社会结构（生产组织，国家机器，各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方面进行的。但不少人会感到14世纪的“危机”和16世纪的“扩张”大部分可能是物质环境因素引起的，例如气候、流行病、土壤状况。这些看法不能简单地排除，对这些因素应该加以分析，对它们在形成社会变化中的作用给予相应的重视。

最为强调气候因素的是古斯塔夫·厄特斯特罗姆。他的观点可概括如下：

“由于工业化，由于技术进步，我们时代的人不必像上一个世纪那样受大自然的任意摆布。但我们可曾考虑过另一个因素，即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气候异常温和的时代，尤其是在北欧？在最近1000年中……虽有一些重要例外，总的来说，人类繁荣时期出现在大冰川期之间的气候温暖时期。正是在这些时期，经济生活和人口数量都得到最大的进展。”⁶⁵

为了加强他的论据，厄特斯特罗姆又提醒我们，气候变化对欧洲转变的早期阶段可能具有特殊意义。“中世纪的原始农业必定比有高技术标准的现代农业更依赖于有利的天气条件。”⁶⁶

厄特斯特罗姆举出14世纪和15世纪早期的严冬作为例证：从1460年到16世纪中叶温暖的冬季，17世纪下半叶的严冬，⁶⁷ 这

些都与经济的衰退、扩张,衰退大致相对应。

“认为人口压力是决定因素的观点没能提供对经济发展的满意解释。人口如此增长的事实提出了一个迄今未被涉及的问题:为什么人口会增长?……人口的急剧增长……在整个欧洲都是普遍现象。在北欧和中欧,人口增长出现在气候异常温暖时期。这不可能只是巧合;其中一定有因果联系。”⁶⁸

此外,厄特斯特罗姆还把流行病因素作为影响变量。他解释说,黑死病的产生是由于炎热的夏季引起黑鼠的大量繁殖,而黑鼠则是黑死病的两种携带者之一——黑蚤的宿主。⁶⁹

乔治斯·达比声称,必须认真对待这一假定。14世纪的一些弃耕现象(冰岛的谷物,格陵兰的斯堪的那维亚垦殖地,苏台德森林面积的减少,果园业在英国的结束和在德意志的退步)都可以由气候变化得到貌似有理的说明。但是,不同的似乎有理的解释也是存在的。最重要的,达比提醒我们,“农业衰退,正像人口猛减一样,始于14世纪之初以前,”⁷⁰因此,是在所谓气候变化之前。达比却认为气候因素和后来的流行病是不断积累的灾难,而在14世纪则“给予已经脆弱的人口结构一记毁灭性打击。”⁷¹赫莱纳,⁷²斯利彻·范巴思⁷³和伊曼纽尔·勒鲁瓦·拉杜里⁷⁴对于把气候变化作为最重要因素来解释上升下降变化的观点也表示类似的怀疑。

很明显,从一定程度上说,气候变化到一定程度,就会相应地影响社会体系的运行。同样明显的是,它对不同的体系有不同的影响。很可能,历史上出现过的冰川作用曾扩及整个北半球,但亚洲和北美的社会发展却明显地不同于欧洲。因此,有必要去分析社会组织的封建体系中资源紧张的长期因素,或有少数人在总的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情况下过度地消费。诺曼·庞兹提醒我们,“中世纪农民的安全系数是如此之小,甚至在可算作正常或一般的状况下也是如此。……”⁷⁵斯利彻·范巴思倾向于认为这个长期营养不良的假定是正确的,因为他观察到蛋白质产地的人对黑死病的抵抗力最强。⁷⁶

但是，如果第一次经济衰退是由于长期的过度剥削，而结果引起上文已经讨论的多次暴动，后来气候因素又加上食物匮乏和黑死病，那么便容易了解，社会—物质因素结合起来可以造成大规模的“危机”。而且反过来由于黑死病扩散后变成流行病，这就使危机更加严重。⁷⁷此外，尽管较少的人口本应意味着较多的食物，因为土地面积仍然相同，但也意味着农田转化为牧场从而减少了卡路里的产量。人口的减少因此也变成了地方性和流行性的现象。⁷⁸皮埃尔·肖尼补充说，“地租的锐减，利润的减少以及封建庄园主负担的加重”，再加上资本不再投入土地可能已使情况进一步恶化⁷⁹。多布也提出，结果出现的转变现象可能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而不是像通常设想的那样减轻了负担，因此更加陷入困境。⁸⁰由此可见，加进这些物质环境的变量并没有推翻我们原来的分析，反而丰富了我们的分析，因为它又加上一个因素，有助于解释这个对未来的世界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局势。这是又一事例，表明长期的稳定和百年一次的缓慢变化能形成一些局势，而这些局势有力量改变从短期观点来看属于中间阶段的社会结构。

以上的分析可大致概括如下：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存在着一个基督教“文明”，但是既没有一个世界帝国，也没有一个世界经济体。欧洲的大部分是封建的，亦即由许多相对自给自足的小经济组合构成，这些组合基于一种剥削形式，而剥削则包含庄园经济中所生产的少量剩余农产品被一个狭小的贵族阶级相应的直接占用。在欧洲以内至少有两个小的世界经济体，其中，中等规模的一个是基于北部意大利诸城邦，较小的一个基于佛兰德和北部德意志诸城邦。欧洲的大部分没有直接参与这两个系统。

从1150年左右到1300年之间，在欧洲封建生产方式构架内出现了一次扩张，这同时是地理的、商业的和人口的扩张。从1300年左右到1450年之间，那已有的扩张又在地理、商业和人口三方面收缩。

扩张之后的收缩引起一场“危机”，这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领域都显而易见（两个主要表现是，贵族自相残杀战争和农民起义）。在文化方面同样是明显的。中世纪基督教遭到各种形式的多方面攻击，这后来被称为“现代”西方思潮的第一次震荡。

对危机有三种主要解释。第一种认为它主要是周期性经济动向的产物。一定技术下的扩张达到其最高峰之后，收缩便接踵而来。第二种认为它主要是长期趋势的产物。封建方式的剩余产品占用进行了一千年之后，达到了收益的递减点。在由于没有技术进步的结构动力而使生产力保持稳定时（由于地力枯竭，生产力甚至也可能下降），由于统治阶级开支规模扩大和开支水平提高，以至剩余品生产者的负担不断加重。可供压榨的油水已经告罄。第三种解释是气候方面的。欧洲气象条件变化到可以降低土壤生产力的地步，同时又使流行病增多。

第一和第三两种解释在下述事实上遇到问题：相似的周期和气候变化也出现在其它一些地方和时间，结果却没有发生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作为其解决问题的办法。用长期趋势来解释危机很可能是正确的，但其内在的困难在于难以提供一种严格的统计分析来证明它对社会转变是一种充分的解释。我认为最似有理的解释是下述假定：“封建制度的危机”是一种定期趋势一个直接的周期性危机和气候条件恶化引起的衰退汇合在一起形成的危机局势。

正是这局势的巨大压力使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变化成为可能。现在，欧洲发展和维护的是占用剩余品的一种新形式，是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它不是建立在对剩余农产品的直接占用上，不是以贡品的形式（如在世界帝国的情况下），也不是以封建地租的形式（如在欧洲封建制度下）。现在发展的是另一种攫取剩余品的形式，它建立在更有效更扩大的生产力基础上（先在农业方面，然后在工业方面），运用世界市场机制，并有国家机器的“人为的”协助（即非市场的），以上二者都未能控制整个的世界市场。

本书提出的论点是，以下三个因素对建立这样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具有决定意义：一是我们所研究的这个世界在地理规模上的扩张；二是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的不同产品的劳动力管理方法多样化的发展变化；三是在后来成为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诸中心国家中相对强大的国家机器的建立。

其中，第二和第三两点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第一点的成功。因而，从理论上说，欧洲的领土扩张是解决“封建制度危机”的关键前提。倘若没有这一点，欧洲的局面很可能早已分崩成相对的无政府状态，然后进一步收缩。欧洲是如何抓住这个拯救了它的另一条出路呢？答案是，不是欧洲而是葡萄牙这样做了，或者，至少是葡萄牙带头做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葡萄牙的社会情况下，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它恰好在“危机”中间开始冲向海外探险。要理解这一现象，必须首先记住，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欧洲的地理扩张开始于更早的时期。阿奇博尔德·刘易斯指出，“从11世纪到13世纪中叶，西欧几乎完全沿袭古典式的边疆发展的道路”。⁸¹他指的是西班牙逐渐从摩尔人手中光复了它的领土，基督教欧洲收复了巴利阿里克群岛、撒丁岛和科西嘉岛，诺曼人征服了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此外还有，十字军先向塞浦路斯、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而后又向克里特岛和爱琴群岛进行远征。在西北欧，英国扩张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在东欧，德意志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侵入及征服波罗的海人和斯拉夫人的土地，并使他们皈依基督教。“[但是]，最重要的边疆是森林、各种沼泽、荒野的腹地。在1000年到1250年之间，欧洲农民在这些荒原上定居下来，还耕种了大部分土地。⁸²后来，正如我们已经了解的，这种扩张和繁荣由于“危机”——同时也是收缩——而宣告结束。在政治方面，这涉及摩尔人在格拉纳达的重新集结，十字军被从立范特(Levant)^[1]驱逐出来，

[1] Levant 指地中海东部及爱琴海沿岸的国家和岛屿(自希腊至埃及，其中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及巴勒斯坦)。——译者

拜占庭 1261 年重新收复君士坦丁堡，蒙古人征服俄罗斯平原。在欧洲内部出现了弃地运动。

因此，大探险，即大西洋探险，并不是欧洲扩张的第一个高潮，而是第二个高潮。由于其势头更强大，社会和技术基础更牢固，动机更强烈，因而获得成功。为什么这次高潮的发起中心却是葡萄牙？在 1250 年或甚至到 1350 年，很少有人能想到葡萄牙会担当这个角色的候选人。从 20 世纪回头去看，这与我们脑中的或然性相冲突，我们对小国葡萄牙不仅在现代抱有偏见，而且的确在整个历史上都是这样。

我们将尝试从动机和能力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动机是属于整个欧洲的，尽管其中有些在葡萄牙表现得更强烈。这些探险者寻求的是什么呢？小学生教科书告诉我们，寻求的是贵金属和香料。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是正确的。

在中世纪，基督教欧洲和阿拉伯世界在金银方面是一种共生关系。用安德鲁·沃森的话来说，“在货币问题上……两个地区应被看作一个整体。”⁸³ 前者铸银币，后者铸金币。由于价格的长期不平衡（其起源很复杂，无需在此讨论），白银东流，结果使阿拉伯世界银量富足。白银出口不再引起黄金进口。1252 年佛罗伦萨和热那亚因而铸造出新金币。其动机早已存在。使之变为可能的一个事实是 13 世纪横贯撒哈拉的黄金贸易的扩展。⁸⁴ 因此，沃森认为，关于 1250 年和 1500 年之间西欧存在黄金短缺的说法是难以置信的，因为这时正是供应量增加的时期。当时，贵金属仍在不断地通过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从欧洲流向印度和中国，尽管不平衡的状况在改善。沃森曾颇带神秘色彩地谈到“印度和中国从世界各地吸引贵金属的强大力量。”⁸⁵ 对黄金的需求因而一直很高。在 1350 年至 1450 年间，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银矿开始开采⁸⁶ 并成为重要来源，直到 15 世纪土耳其人侵把它们从西欧截断时为止。同样，从 1460 年中欧开始突然出现开采银矿的活动，这是由于技

术进步才能够开采此前尚属极限矿^[1]的矿藏。佩鲁瓦估计, 1460年至1530年间白银产量在中欧增加了四倍。⁸⁷但仍供不应求, 因此, 须从海路寻求黄金(因此, 为取得苏丹的黄金而绕过北非的间隔地带)无疑成为早期葡萄牙航海家们考虑的一个办法。⁸⁸于是, 当美洲的发现比从苏丹能给欧洲带来更多的黄金来源, 特别是比中欧能带来更多的白银时, 其经济结果是巨大的。⁸⁹

寻求黄金为的是向欧洲以内的流通提供货币基础, 更为了向东方出口。为什么? 同样, 每个小学生都知道, 是为了获得香料和珠宝。为了谁? 为富人, 他们使用这些东西作为其挥霍性消费的标志。香料被制成春药, 好像贵族们舍此便不能作爱似的。这个时代的欧亚关系可概括为贵重物品的交换关系。黄金东流去装潢庙宇、宫殿和亚洲贵族阶级的服装, 珠宝和香料则流向西方。文化史上的偶然事件(可能只不过是物质上的缺乏)决定了这类互补的偏好。亨利·皮雷尼以及后来保罗·斯威齐把这种奢侈品的需求置于欧洲商业扩张的荣誉地位上。⁹⁰但我怀疑这种贵重物品的交换, 无论在欧洲上层阶级的自我意识中显得多么重要, 竟能支撑像大西洋世界的扩张这么巨大的事业, 更不必说创建欧洲的世界经济体了。

从长远来看, 大宗商品比奢侈品在人类经济奋进中的作用更大。西欧在14世纪和15世纪需要的是食物(更多的卡路里和分配到更好的食物价值)和燃料。扩张到地中海和大西洋岛屿, 可扩张到北非和西非并穿过大西洋, 以及扩张到东欧和俄罗斯大草原, 最后又扩张到中亚, ——所有这些扩张得到了食物和燃料。因此扩大了欧洲消费的领土基地, 其途径是建立起一种政治经济使西欧能够不按比例地、不平等地消费这一资源基地。这还不是唯一的途径。还有扩大了农业产量的技术革新, 这个技术革新早在13世纪就开始于佛兰德斯, 直到16世纪才传播到英国。⁹¹但是, 这种技

[1] marginal mines 可译为“边缘矿”或“极限矿”。——译者

术革新最有可能只出现在那些人口稠密和工业增长的地方,例如中世纪的佛兰德,正是在那里,土地被改用于生产商品性农作物、饲养家畜和发展园艺而更有利可图。其结果是“要求进口大量玉米(小麦)。只有在这时,农业和工业错综交织的复杂体系才会发挥最大优势。”⁹² 因此,农业革新过程哺育了而不是妨碍了扩张的需要。

小麦是15世纪和16世纪新的生产和新的商品的焦点。用费尔南·布罗代尔富有洞察力的话来说,欧洲最初在北部森林和地中海平原发现了它的“内部美洲。”⁹³ 但内部美洲还不够。又向边缘地区扩张,首先是扩张到一些岛屿。维托累诺·马加尔哈斯·戈丁浩提出这样一个操作假设:农业是葡萄牙人向大西洋岛屿殖民的主要动因。乔尔·塞拉奥研究了 this 假设,他注意到这些岛屿的发展加快了,而在“谷物、糖、染料和葡萄酒这四种产品方面……总有一种单一经营的倾向,四种产品之一总是得到特别青睐”。⁹⁴ 种植新小麦开始传入整个欧洲大陆;14世纪初开始从波罗的海地区传到低地国家⁹⁵,至15世纪远到葡萄牙,⁹⁶在14世纪和15世纪又从地中海传到英国和低地国家。⁹⁷

按照每1000卡路里的成本计算,食品可被放在一个等级的体系中。M.K. 贝内特发现这个等级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相当稳定。碾磨谷类产品、淀粉根类和块茎类作物在他划分的八级体系中处于最低一级,也就是说,是最便宜、最基本的大宗商品。⁹⁸ 但只靠谷物不是好的饮食结构。欧洲饮食中最重要的补充成分之一是糖,可用作卡路里来源和脂肪代用品。此外,它还可用来制造含酒精的饮料(特别是朗姆酒)。后来,它被用来制作巧克力,这种用法是西班牙人从阿兹台克人那里学来的,到17世纪,至少在西班牙成为很受欢迎的饮料。⁹⁹

糖也是向岛屿扩张的一个主要动因。并且,由于它的生产方式,与糖类生产同时发展的是奴隶制。这个过程在12世纪开始于东地中海地区,然后逐步西移。¹⁰⁰ 大西洋扩张只不过是它逻辑上的继续。E.E. 里奇把葡萄牙开始获得非洲奴隶的时间追溯到公

元 1000 年,奴隶是同伊斯兰教的入侵者做生意时买来的¹⁰¹。糖是非常赚钱而又急需的产品,它把小麦排挤掉了¹⁰²,但随后又耗尽了地力,以致不断要求新的土地(更不必说因为种植栽培而耗尽人力)。

鱼和肉在贝内特项目表上的位置较高。因为要把它们作为蛋白质的来源。戈丁浩说扩大捕鱼区域是早期葡萄牙探险的主要动机之一¹⁰³。肉类无疑不像谷类那么重要,其重要性在 1400 年到 1750 年期间显著地稳步下降。¹⁰⁴这就证明我们将要讨论的一点,亦即欧洲工人为欧洲的经济发展付出的那部分代价。¹⁰⁵但是,吃肉的欲望是香料贸易的动因之一,不是为富人制造春药的亚洲香料,而是西非的天堂谷 (*Amomum melegueta*), 用作胡椒的代用品,同时也用来制造以西波克列斯 (*hippocras*)⁽¹⁾ 而知名的一种加香料的葡萄酒¹⁰⁶。这些香料“仅能造出颇受欢迎的稀糊糊”¹⁰⁷。

如果说食物的需要支配了欧洲的地理扩张,食物的好处到头来都比预期的大得多。世界生态被改变了,而且,由于必然发生的欧洲世界经济体这种社会组织,生态改变将主要对欧洲有利¹⁰⁸。除食物外,另一个基本需要是木材——作燃料的木材和造船(以及建造房屋)的木材。中世纪的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势必设想到的原始的林业技术,致使西欧、意大利、西班牙和地中海诸岛的森林面积缓慢而稳步地减少。栎树变得特别稀缺¹⁰⁹。到 16 世纪,波罗的海地区开始向荷兰、英国和伊比利亚半岛大量输出木材。

还应提到另一种生活必需品,即衣服的需求。当然,曾经有过奢侈品(即丝绸)贸易,这在古代史上与珠宝和香料的需求相联系。但是,纺织工业(欧洲工业发展中第一个主要的工业)的发展,却不仅仅是奢侈品贸易,它需要加工用的各种材料:棉布和毛纺织品的染料,以及末道工序中使丝绸挺括的树胶。¹¹⁰

黄金作为贵重品,是欧洲的消费,更是与亚洲的贸易所渴求的,但同时也是欧洲经济扩张必不可少的。我们要问一问自己这

[1] 一种香料药酒,是加肉桂等浓烈香料的葡萄酒,中古时代的欧洲人用作一种兴奋剂或滋补饮料。——译者

是为什么？毕竟，只要得到人的承认，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可以由任何材料制成。今天，我们几乎毫无例外地使用非金属物质作为支付手段。而且，随着“记帐货币”（有时被误称为“想象货币”）的发展，欧洲在中世纪晚期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但是，金属货币接近作为象征性货币的地步却经过了几个世纪之久。¹¹¹而即使在今天它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一步。结果，欧洲受到因降低成色造成货币价值经常变动的困扰，这种变动是如此经常，以致马克·布洛赫称之为“贯穿货币历史的总线索”。¹¹²但那时却没有人认真建议取消黄金。

这有多种原因。向政府提供咨询的人在这一体系中维护自身利益。¹¹³我们不可忘记，在中世纪末期造币还仍然是服务于私人利益的商业活动。¹¹⁴但比维护自身利益更重要的，是一种集体性的恐惧心理；这种心理则基于一个接合得薄弱的经济体系的结构性的现实。记帐货币随时都可能崩溃。它确实不在任何人的掌握之中，无论多么富有的个人，都既不能单独地也不能与别人联合起来把它控制住。的确，谁知道整个货币经济不会再次崩溃呢？它以前曾经崩溃过。黄金是最后保障物。只要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这两种用途不分离得太远，支付货币总可以作为一种商品来使用。¹¹⁵对此，黄金的用途是最基本的。没有它，欧洲对发展一个资本主义体系原本会缺乏集体信心，因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利润的多寡基于已实现的价值不同的延期限度。这对一个非帝国的世界经济体（由于其他原因）更加真实。这种集体心理现象是当时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对一个繁荣的世界经济体来说，黄金必须被看作一种主要收获。

探险的动机不仅表现在欧洲企图获得物产，而且表现在欧洲各个集团需要寻找工作。正如H.V. 利弗莫尔提醒我们：当时和不久以后伊比利亚的编年史家们最先指出：“将近二十五年间有些人出没于边疆一带靠劫掠为生，因为急需给他们找到有益的工作，所以有人建议再次征服北非。”¹¹⁶

我们必须回忆 14 世纪和 15 世纪庄园收入下降这一重要问题。据 M.M. 波斯坦称：英国贵族由此产生的行为是“强盗行径”，使用非法暴力去恢复丧失了的收入水平。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瑞典、丹麦和德意志。这类暴力形式之一自然是扩张。¹¹⁷其一般原则似乎是：如果贵族从自己土地上得到的收入较少，他们便会积极寻找更多的土地来获取收入，从而把实际收入恢复到社会期望的水平。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是葡萄牙而不是其他欧洲国家向海外扩张？简单的回答是，其他国家的贵族运气好些。他们可以进行更容易的扩张，离家较近，只需用马而不用船。葡萄牙因为地理位置关系，别无选择。

毫无疑问，海外扩张按照惯例与商人利益相联系，一旦贸易扩张，他们可以从其中得利；同时，也与君主有关，他们藉此为王位谋求荣耀和收入。但伊比利亚探险的最初动机很可能主要来自贵族的利益，特别是那些臭名昭著缺少土地的“幼子们”，只有在贸易网开始发挥作用时，比较谨慎的商人们（常常是有丧失社会地位危险的贵族多于企业家）才变得热衷起来。¹¹⁸

扩张的原因是人口过剩吗？这是混淆视听的问题之一。布罗代尔告诉我们，地中海西部地区当然存在人口过剩现象，他援引各国多次驱逐犹太人和后来又驱逐摩里斯科人的例子作为证明。¹¹⁹但 E.E. 里奇却相信，作为 15 世纪和 16 世纪扩张的动机，“过剩人口的外流可以略而不计。……其或然性（因为不可能更肯定）只是，增加的人口流向战争或流入城市。”¹²⁰可能如此。但那些流入城市（或流向战争）的人的食——衣、住，等等问题怎么办？欧洲还有容纳人口甚至正在增加的人口的余地。这却正是导致扩张的问题的一部分。所谓余地是农民与贵族力量对比的一个因素，因而也是封建制度危机中庄园主收入下降的一个因素。欧洲社会可以对此作出各种反应。反应之一，是把欧洲社会说成人口过剩（至少含混地），因而需要更大的土地基础。¹²¹事实上，贵族（和资产阶级）所需要并想得到的是更驯服的劳动力。人口多少并不是问

题所在。是社会关系支配了上层与下层阶级的相互作用。

最后一个问题：海外扩张可以用“十字军精神”，亦即传教的需要来解释吗？这样发问，又把问题弄模糊了。无疑，基督教在伊比利亚半岛采取特别军事化的形式，那里的民族战争一直是用宗教术语加以解释的。无疑，这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在东南欧（直到维也纳的大门前）打败基督教的时代。大西洋方面的扩张很可能反映出对这些事件的心理反应，也就是正如肖尼所说的，“是一种补偿现象，一种向前进的溃逃”。¹²²基督教热情无疑能解释葡萄牙和西班牙作出的许多特别决定，也许能解释其责任感或过分责任感的一部分强度。但是，把这种宗教热情看作合理化似乎颇有道理，它无疑已被许多付诸行动的人加以内在化⁽¹⁾，又从而予以加强和支持——并在经济上加以扭曲。然而，历史上由热情转向玩世不恭的现象委实太常见了，因此，使人们不能不怀疑这种信仰体系能够作为主要因素来解释大规模社会行动的起源和持续存在。

我们已经谈论的所有这些动机还没有最后的解答“为什么是葡萄牙人”的问题。诚然，我们曾谈到欧洲的物质需要，谈到封建庄园主收入的总危机。我们也引证了葡萄牙对通过向大西洋探险来解决问题特别感兴趣。但这还不足以服人。我们因此必须从动机问题转向能力问题。为什么在欧洲所有的政治实体中葡萄牙最有能力最先发动？明显的答案可以在任何地图上找到。葡萄牙位于大西洋之滨，紧靠非洲。在向大西洋诸海岛殖民和向非洲西海岸探险方面，葡萄牙显然距离最近。此外，特别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海流情况对于从葡萄牙港口（西班牙西南部港口也相同）出发是最容易的。¹²³

还有，葡萄牙已有从事远距离贸易的丰富经验。在这方面，如果葡萄牙人不能与威尼斯人或热那亚人匹敌，那么，最新的研究

[1] 即使之成为个人品行的一部分。——译者

表明,他们经验丰富,很可能与北欧诸城市旗鼓相当。¹²⁴

第三个因素是不愁没资本。作为威尼斯人主要对手的热那亚人早就决定投资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商业,并鼓励他们向海外扩张。¹²⁵到15世纪末,热那亚人却宁肯选择西班牙人而不是葡萄牙人,但这主要是因为后者在那时已有承受脱离热那亚赞助、保护和利润减少的能力。弗灵登称呼意大利是“中世纪唯一真正进行殖民的民族。”¹²⁶12世纪热那亚人和比萨人首先出现于加泰罗尼亚,¹²⁷13世纪他们首先抵达葡萄牙,¹²⁸这是意大利把伊比利亚人拉入当时国际贸易的一部分努力。一旦到达那儿,意大利人便在伊比利亚殖民活动中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因为到达得早,“他们可以占据伊比利亚半岛本身的要害位置。”¹²⁹据弗吉尼亚·劳的说法,1317年,“里斯本的城市和港口成为热那亚贸易的大中心……”¹³⁰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葡萄牙商人的确开始抱怨“(意大利人)对该区域内零售贸易的过度干预,这威胁到本国商人在这部门贸易中的支配地位。”¹³¹解决办法简单明了,在某种程度上是古典式的。在葡萄牙和马德拉群岛,意大利人被联姻同化了,变成有地产的贵族。

例如,与法国和英国相比,商业经济的另一方面助长了葡萄牙的冒险精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成为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这一地区,被同化的程度最小,而在相当程度上却与伊斯兰地中海地区连结在一起。结果是,它的经济相对地更加货币化,人口也相对地更加都市化。¹³²

但是,无论地理位置还是商业实力,都不是能单独形成葡萄牙优势的原因,还有其国家机器的力量。在这一方面,葡萄牙在15世纪与其他西欧国家大不相同。其他国家内战方殷时,它却太平无事。¹³³国家的稳定是重要的,不仅因为它创造了可使事业家繁荣发展的气候,还因为它鼓励贵族去另外寻找使用其精力的出路,而不是徒然将精力消耗于打内战或者打欧洲内战。国家的稳定有决定性意义,还因为在许多方面国家本身就是首要的企业家。¹³⁴国

家稳定时，它能把力量用于有利可图的商业冒险。正像我们已经知道的，对葡萄牙而言，它的地理历史逻辑支配它把向大西洋扩张作为国家最合理的商业冒险。

为什么是葡萄牙？因为在欧洲国家中唯独它使自己的意志和可能性都达到了最大限度。欧洲需要一个更广阔的土地基础来支持其经济的扩张，这样的土地基础可以补偿封建庄园收入的急剧下降，可以缩短封建制度危机所暗示的、处于萌芽状态而且可能极其猛烈的阶级战争。欧洲需要多种东西：黄金，大宗商品，蛋白质，保存蛋白质的手段，粮食、木材、加工纺织品的材料。欧洲也需要更驯服的劳动力。

但“欧洲”决不能被抽象化。那里没有按照这些长期目标进行工作的中央机构。作出真正的决定的是一些只顾眼前利益行事的集团。至于葡萄牙，“发现事业”似乎对不少集团都有利：即对国家，对贵族，对商业资产阶级（本地的和外国的），甚至对城镇中的半无产阶级无不有利。

国家，尤其对一个小国家来说，利益更为明显。扩张是扩大收入和积累荣耀的最可行的路线。而且葡萄牙几乎是当时欧洲唯一没有因为内部冲突而分散注意力的国家。它达到中等程度政治稳定的时间至少比西班牙、法国和英国要早一个世纪。

正是这种稳定对贵族产生了鼓舞。像欧洲各地的贵族一样，葡萄牙贵族面临同样的财政困难，他们失去了可以从自相残杀的战斗（如果打赢的话）中得到安眠药和财政的潜力。他们也不能指望通过国内殖民来恢复其财政地位。葡萄牙缺少土地。所以他们同情向海上扩张的思想，并献出其“幼子们”充当探险所必需的领导者。

资产阶级的利益在这一次没有同贵族利益相冲突。由远距离贸易的长期训练和在欧洲货币化程度最高地区之一的生活经验（因为曾与伊斯兰地中海世界的经济往来）而对现代资本主义有所准备的资产阶级也在寻求摆脱狭小的葡萄牙市场的限制。他们

缺乏资本，但是发现可以立即从热那亚人手中按照需要的程度如数得到资本。原因是热那亚人要和他的竞争对手打交道，对付其竞争对手威尼斯人，故乐于资助葡萄牙人。而本地资产阶级与外国资产阶级之间的潜在冲突，由于热那亚人愿意逐渐同化于葡萄牙文化遂随之减弱。

最后，探险和随之而来的贸易潮流为城市半无产阶级提供了工作出路。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因为庄园危机引起剥削加重而逃到城市的。潜在的内部骚乱则因向外的扩张而又一次减少到最低程度。

假如，意志与可能性结合的这些作用还不够，那么，葡萄牙还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便于其向海外扩张的事业，因为它不仅向大西洋和朝南方突出，而且有利的海流恰巧汇合于此。今天回顾起来，葡萄牙之敢于冒险尝试，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在我们进入本书主要部分之前，还必须正视最后一个问题。截至现在，我们所关心的是解释欧洲究竟是被什么引向接近创立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边缘。由于我们的着重点在于讨论资本主义怎么只是在世界经济体构架内而不是在世界帝国构架内才行得通的，我们必须简短地探讨一下为什么会如此。可对欧洲和中国作适当的比较：从13世纪到16世纪，两处的总人口大致相同¹³⁵。皮埃尔·肖尼用漂亮的文笔写道：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不是中国人是一件值得……略加思考的事情。毕竟在15世纪末，在历史文献容许我们理解的限度内，远东作为一个可与地中海相比的实体，至少表面上决不亚于欧亚大陆的泰西”。¹³⁶

决不亚于？这要对科学技术作传统的比较，在一点上，学者们意见分歧。照小林恩·怀特的说法，欧洲在16世纪之所以扩张是因为欧洲早在公元9世纪就已经在农业技术方面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

“从6世纪前半叶至9世纪末，北欧创造了或者说接受一系列的发明，并且把它们迅速结合进一套全新的农业体

系。就单个农民劳动力而言,这是世界上生产力最高的。(怀特指的是重型,三圃轮作制,牛群自由觅食,现代马具和马掌)……随着新体系各种因素的完善和推广,就有了更多的粮食,人口增长了……每一个北欧农民新的生产力使他们当中更多人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投身于工商业。”¹³⁷

怀特还认为,北欧8世纪时的军事技术,11世纪时的工业生产都走在前面。如果有人问为什么会如此,怀特则归因于蛮族入侵引起的大动荡,据说,西方对此有一种汤因比所说的创造性的反应。¹³⁸

但其他学者不同意这种实际的估量。拿军事技术来说。卡洛·奇波拉认为:

“直到15世纪初期,中国的枪如果不是更好的话,至少与西方的枪一样好。但欧洲技术在15世纪已有显著进步……欧洲大炮的威力比亚洲所曾制造的任何大炮都无可比拟地强得多,并且,不难发现,在[16世纪的]文献中反映人们对欧洲兵器的出现夹杂着恐惧与惊讶的情绪。”¹³⁹

同样地,仍在继续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巨著的李约瑟^[1]认为欧洲在技术和工业方面超过中国的时间是公元1450年。¹⁴⁰欧洲迅猛前进的原因何在?李约瑟说,不是一个因素,而是“一个有机整体,一系列的变化。”

“事实是在中国社会本身自发的发展中,完全没有像西方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那样急剧的变化。我经常愿意把中国的演进描述成一条相对缓慢上升的曲线,在公元2世纪至15世纪之间,这条线的走向显然比欧洲的水平高得多。然而,在西方,随着伽利略革命和可称为科学发现本身的基本技巧的发现而开始出现科学复兴之后,欧洲的科学技术曲线开始急剧地、几乎以指数方式崛起,超过亚洲社会的水平……这

[1] 李约瑟博士于1995年3月逝世。——译者

个剧烈的动荡现在正开始矫正自己。”¹⁴¹

一些学者坚持认为，15世纪欧洲船舵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¹⁴²李约瑟却认为，中国在公元1世纪左右以后就有了船舵，这项发明可能是公元12世纪从中国传播到欧洲的。¹⁴³

如果李约瑟关于中国的技术能力和直到西方突然崛起之前优于西方的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下述事实甚至更加惊人：中国和葡萄牙的海外探险几乎是同时开始的，但在仅仅28年之后，中国人便缩回到大陆壳中，停止所有进一步的尝试。这也不是因为毫无成功。太监护帅郑和在1405年至1433年间7次航海下西洋都大告成功。在7次航海中，他经过了从爪哇到锡兰而直抵东非的印度洋的整个洋面，向中国朝廷带回备受赞赏的贡品和舶来品。1434年郑和去世⁽¹⁾后航海活动即告停止。此外，在1479年，汪直⁽²⁾（也是太监）有意向安南发动军事探险，他申请查阅档案以便参考郑和关于安南的记录时，却遭到拒绝。这些文件均被查禁，像是要完全抹杀掉对郑和的怀念。¹⁴⁴

探险的开始与停止的原因一样是不清楚的。这些探险似乎不断遭到儒家官僚阶层的反对。¹⁴⁵问题是为什么？相反，探险活动却似乎得到皇帝的支持。不然，它们如何能够发动起来？张天泽（Tien-Tse Chang，音译）发现了进一步的证据：在15世纪初，自公元8世纪以来就作为一个国家机构和商船局的职能从征收关税（现在变成省一级的职能）转为传送贡品，这在郑和时代无疑是相当重要的。张氏对关税征收的分权化（据信此举可在一些地区减少关卡障碍）提出问题：“（皇帝）难道不想鼓励对外贸易吗？——外贸对中国的重要性是再清楚不过了。”¹⁴⁶

再清楚不过了，但很快就停止了鼓励。为什么？在威廉·威利茨看来，这与中国人的世界观有关。他们缺乏一种殖民使命感，这是因为，他们傲慢地认为他们已经是整个世界。¹⁴⁷此外，威利茨还

[1] 郑和，1371年生，1435年卒。——译者

[2] Wang Chin 当指汪直，1479年属其专权期间。——译者

提出两个使探险停止的更直接的解释：一则“儒家官僚憎恨太监的生理缺陷”，¹⁴⁸ 一则“装备海外探险引起国库枯竭。”¹⁴⁹ 后者似乎是一个奇怪的原因，因为国库枯竭一般认为可以由殖民事业得到的收入来补偿。至少对同一时代的欧洲国库似乎如此。

另外一些解释强调政治注意力集中在另外的各种问题上，因而转移了原先对印度洋探险的兴趣。例如，G.F. 赫德森认为，蒙古游牧蛮族的威胁日益增加，首都遂于 1421 年从南京迁到北京，这可能转移了皇帝的注意力。¹⁵⁰ 博克瑟认为，来自东方的威胁，即倭寇（日本海盗）在中国沿海的骚扰，分散了朝廷的注意力。¹⁵¹ M.A. 迈林克-罗洛夫兹的意见是，穆斯林商人在印度洋上排挤的压力可能促成中国撤出。¹⁵²

即使所有这些都是真的，似乎也还不够。为什么没有内在动力能把这些外部困难作为挫折而不看作最后的障碍呢？是不是像一些作者指出的，中国只不过不想扩张而已？¹⁵³ 皮埃尔·肖尼提供了一个线索，他说，中国所缺少的是赞成扩张的“意志集中的集团”。¹⁵⁴ 这个说法更有力，因为我们记得，在葡萄牙，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各种各样的社会集团都对海外探险和扩张同样地感兴趣。现在，就让我们回顾一下欧洲世界和中国世界究竟有什么不同。

首先在农艺方面差别很大。我们曾谈到欧洲偏重于肉类消费，并随着 14 世纪的“危机”而更加强。尽管其大量人口的肉类消费后来在 16 世纪至 19 世纪中有所下降，但这并不必然表明放牧的土地比种植谷物的土地减少。由于人口急剧增加，从 16 世纪开始，欧洲上层阶级的绝对人数增多，可能有同样的土地面积被用于生产肉类。这与下层阶级肉类消费的相对降低并不矛盾。他们从边缘地区的进口以及西欧技术进步后而从事更集约的耕种中得到了谷物。

相反，中国却在东南部地区发展稻米生产谋求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农业基地。欧洲强调畜牧业，使集约使用畜力作为生产动

力。每英亩生产的稻米固然能提供更多的卡路里，却要求投入更多的人手。

因此，肖尼认为，欧洲使用畜力表明，“欧洲人 15 世纪拥有的动力大约相当于中国人的 5 倍。而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中国人的有利地位在世界上是仅次于欧洲的。”¹⁵⁵

但是，对我们的问题而言，人与土地之间的这种不同的关系比技术进步的意义更重大。肖尼认为：

“欧洲人浪费空间。甚至在 15 世纪初人口处于低点时，欧洲仍缺乏空间……但是，如果说欧洲缺乏空间，那么中国缺乏的是人……。”

“西方的‘起飞’与中国稻米生产的‘起飞’似乎出现于同一个时期（11 世纪至 13 世纪），但前者具有极大的革命性，在一定程度上，它宣告伟大的地中海区域征服了地球……。”

“从各方面说，中国 15 世纪的失败更多地是由于动机而不是手段的相对缺乏。需求空间始终是基本动机，尽管常常是潜意识的。”¹⁵⁶

这里，我们至少得到一个为什么中国不想向海外扩张的似乎有理的解释。中国实际上也一直在扩张，却是在内部扩张，即在国境以内扩大稻米生产。在农艺依靠更多空间的条件下，15 世纪欧洲的“内部美洲”很快便告枯竭。无论人或社会都不会无偿地从事艰难的事业。探险和殖民皆是艰难的事业。

最后一个考虑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15 世纪对中国是范·德·斯普伦克尔称为“反殖民化”的时期，指的是人口从稻米产区外流。¹⁵⁷这在减轻“人口过剩”（它总是一个与社会定义相关的术语）的压力的同时，不免削弱了中国工业化的潜力，而又没有一个殖民帝国所能得到的利益予以补偿。“起飞”就会因而失败。

欧洲和中国之间还有第二个重要差别。中国是个辽阔的帝国，就像当时的土耳其—穆斯林世界一样。欧洲却不然。欧洲是个新生的世界经济体，由许多小帝国、民族国家和城邦组成。这个差

别在许多方面都很重要。

让我们从韦伯的论点开始，他曾提出帝国解体的两种形式：“如西欧的封建制度，如中国的俸禄制度。”¹⁵⁸他说，一个新的集权国家更可能产生于封建制度而不是俸禄制度。韦伯的理由如下：

“西方庄园，像东方的印度一样，是由于世袭的国家政权的中央权力机关的解体而发展起来的，例如，西方加洛林帝国的解体，印度哈里发和土邦主或莫卧儿大帝国的解体。但在加洛林帝国，新的阶层是在农村自给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其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想见一定低于东方的同等国家）。因为在后来战争之后形成的受誓言约束的附庸关系，封建主阶层与国王联合起来，并且把自己置于自由人和国王之间的地位上。封建关系也见于印度，但无论对贵族还是对地主阶级的形成都不起决定作用。

“在印度，像在一般东方国家一样，独特的封建庄园发展的基础是一个远为官僚化的国家的包税制度（与中世纪早期较不发达的西方相比，据说是由于中央政权仍然强大到足以继续征税，而经济发达程度和货币流通量都足以提供基本剩余以备纳税）以及军事和税务方面的俸禄制。因此，东方的庄园在本质上是‘俸禄制的’而没有变成‘采邑’；出现的不是世袭国家的封建化而是其俸禄化。西方可与之相比的（尽管较不发达）不是中世纪的采邑，而是罗马教皇在17世纪期间或法国购买贵族身份期间的捐官和受俸牧师……[同时，]纯军事因素对解释东西方的不同发展也是重要的。在欧洲，骑兵在技术上是封建制度的主要力量。在印度，撇开其数量不谈，骑兵比步兵的重要性小而且效率低。步兵从亚历山大到莫卧儿时代都在军队中起主要作用。”¹⁵⁹

韦伯这个论点的逻辑似乎是：在一个帝国解体的过程中，技术因素（骑兵的重要性）加强了居间的军阀对中央的力量。因此，产生的新社会形态是封建制度而不是俸禄制国家，后者的中央政

权比在封建体制下更加强大。此外，封建制经济不如俸禄制经济发达(但,这究竟是因还是果?韦伯也不清楚。)。在短期内,从地主的观点来看,封建化显然较好,因为封建化给地主带来更多的权力(和更多的收入?)。但从长远来看,一个支配土地的受俸阶级比封建地主阶级更能抵制一个集权制君主国的发展。因为,只要国王能使自己成为封建关系单一的等级制中的最高统治者(法国的加佩王朝花了几个世纪才达到这个目的),他就能利用封建价值体系建立一个对他个人效忠的体系,而这个体系一旦建立起来,就能轻易地摆脱个人因素而变成对一个国家的效忠,而国王是国家的化身。俸禄制作为比封建制更有真正契约性质的体制,不会相信这种神秘纽带的欺骗(顺便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法国18世纪俸禄制的发展看作倒退现象,而把法国大革命看作扭转这一倒退的企图。)

约瑟夫·列文森在一本讨论关于为什么中国未出现对外扩张的书中提出一个与韦伯相去不远的解答:

“在概念上和逻辑上,封建主义作为社会学意义的‘理想典型’是与资本主义完全相反的。但在历史和编年史上,前者对后者起了刺激作用。中国缺乏封建约束比有这类约束的欧洲对资本主义扩张(和资本主义世界的扩张)设置了更大的障碍。对中国这个非封建的官僚社会,这个自我补充、延续不已的社会,正是因为它在概念上比封建社会更接近初始的资本主义形式,因而容纳并且掩盖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破坏了资本主义的革命性潜力。由此看来,终于在缺少资本主义力量的葡萄牙,出现一个与中国正相反的社会过程,能释放而不是限制扩张的能量,便一点儿也不奇怪了。这是葡萄牙和整个欧洲的原始资本主义从封建制度和封建制度的腐朽中摆脱出来的过程。也是一个与中国非封建的官僚社会的延续很不相同的过程,——那种官僚社会是封建主义的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抑制剂。”¹⁶⁰

这里，我们得到一个常见的论点：一个最初对新形式能够接受的社会并不一定导致继续的渐变；相反，却会窒息变化，而最初的抵抗后来却常常引向突破。

封建化带来了帝国结构的解体，而俸禄化则维持了它。在前一种情况下，权力和收入分配给了有较大自主性的地主，他们扎根在某一地区，和一些农民相联系；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权力和收入则分配给了一个遍及全帝国的阶层，它有意不与地方相联系，通过半普遍化的方式吸收新成员，却因而依赖中央政权的垂青。加强一国的中央政权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它只是在20世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得以开始。只要在中央政权保持团结一致的情况下，例如在明朝和继之而来的明清时代，在小地方建立集权单位就是不可能的。然而，据我们所知，在封建制度下建立集权单位尽管困难，却是可行的。韦伯清晰地概括了其原因：

“东方货币俸禄世袭制的一般结果是，从典型意义上讲，只有武力征服和宗教革命才能动摇受俸利益的坚实结构，从而创造新的权力分配，然后又创造新的经济条件。但是，任何内部革新的尝试都被上述的障碍所粉碎。如上文所说，现代欧洲在这方面是一个历史的伟大例外，因为，首先没有一个统一帝国的安定局面。我们可以回想，在战国时代，阻碍了这个世界帝国治理合理化的国家受俸阶层本身曾经一度是其最有力的推动者。而后，刺激因素消失。在西方和战国时代的中国，正如市场竞争迫使私人企业合理化一样，政治权力的竞争迫使国家经济和经济政策合理化。在私有经济中，卡特尔化削弱了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合理计算；在国与国之间，权力垄断势必破坏行政、财政和经济政策中的合理性……此外，在西方，除了上述差别外，还存在一些强大而又独立的力量。诸侯王公的权力可以和这些力量结盟打碎传统的桎梏，或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这些力量可以利用自己的军事势力来解除世袭权力的束缚。”¹⁶¹

在世界经济体与帝国对立的格局中，要了解一个体系的区域中心或其前进点与边缘部分的关系，还要考虑到另一因素。一个帝国有治理和保护其广大国土和人口的责任。这将耗尽可以投入发展资本主义的注意力、精力和财力。例如日本倭寇及其对于中国扩张的影响。大体上，倭寇对中国比土耳其对欧洲所引起的麻烦要小一些。但是，当土耳其人在东面挺进时，欧洲没有一个皇帝要取消葡萄牙的探险。葡萄牙没有从它的海外冒险转向保护维也纳，因为葡萄牙没有这样做的政治义务，也没有可以诱使葡萄牙如此做的机制，更没有一个欧洲范围的社会集团的利益要求这种转变。

扩张对欧洲皇帝似乎并不像对葡萄牙国王一样有直接的利益。我们讨论过，中国皇帝可能注意到，而中国官僚的确已经注意到，郑和探险使国库耗竭，而扩大国家财源的需要却是欧洲扩张的动机之一。一个帝国没有一个企业家或一个世界经济体中的国家所具有的眼光。因为帝国自命是整个的世界。它不能靠吸尽其他经济来充实自己的经济，因为它是唯一的经济（这肯定是中国人的思想，也可能是他们的信仰。）。当然也可以在经济分配中扩大皇帝所得的份额。但这意味着国家不是寻求企业利润而是增加贡品。并且，中央的政治力量一旦衰微，贡品这种形式本身可能成为经济上的自我拆台，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贡品”可能是对帝国不利的贸易的一种隐蔽形式。¹⁶²

军事技术和一个帝国构架之间也有联系。卡洛·奇波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已看到葡萄牙人采用军事技术优势而自己却没有这样做。他的解释是：“朝廷像害怕外敌一样害怕国内土匪，像害怕外国入侵一样地害怕内乱，因此，它尽力限制枪炮知识的传播和精通工艺的手艺人的扩散。”¹⁶³ 欧洲的主权国家林立，要限制军备扩散是没希望的。而在中国则显然仍有可能。因此，中央集权体制拒绝技术进步，这对长期维持其政权有重大意义。帝国形式可能已再次成为结构上的束缚，而这次是对技术发

展的束缚。

还有最后一道难题。此时，中国出现一种个人主义思想，即王阳明学派，威廉·T·德·巴里认为它可与西方人文主义学说相比拟，他称之为“接近思想革命”，却未能“充分发展”。¹⁶⁴难道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不是正在出现的资产阶级力量的标志，不是支持它反对传统力量吗？

照罗兰·莫斯尼尔的看法，事情似乎恰恰相反。他在分析了中国明朝的社会冲突后指出，个人主义是儒家官僚即官僚阶级的武器，这个阶级在观点上是“现代化”，它反对既是“企业家”又是“封建主”的太监，而后者代表了中国明朝“民族主义的”扩张。¹⁶⁵莫斯尼尔的论点如下：

“（在中国明朝），为了事业有成，中产阶级出身的受过教育的一大部分人自愿成为阉人。由于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能发挥压倒的作用，帝国实际上被这些太监所挟制。

“一旦得登高位，他们便提携其家庭成员，通过分官封地而为自己创造一群追随者，因而变成帝国以内掌握实权的人物。由此看来，太监所起的重大作用像是资产阶级崛起的一种功能。皇亲显要们企图造就一批也由中产阶级出身、受过教育并且在文职人员中被他们提拔的人组成的追随者来保护自己，……（这后一个集团）有时是王阳明的门徒，他们实行他的教条，反对掌权的太监。而太监们崇尚的却是朱熹^[1]这个正统和权力的卫道士（在权力这一点上，太监是最先与之接近的。）。由于皇亲显要以及太监作为支配土地者都有其权力基础，这类斗争就越发严峻。明朝统治者试图通过建立某种由亲属和支持者组成的封建制度来加强他们的地位……这种局面的牺牲品是农民。国家的支出则不断增加。”¹⁶⁶当然，在欧洲也是这种情况。但在欧洲，这些支出支持了新兴

[1] Chu Hsi,从上下文看当指朱熹。——译者

的资产阶级和贵族，贵族谋求最后变成资产阶级来拯救自己，而资产阶级反而变成贵族。在中国明朝，为西方资产阶级最终取得政权服务的思想则被用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资产阶级（由于过早地获得了一些权力？）则扮演保卫正统和权力的角色。有许多问题还待解释，但这引起人们对于把个人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的崛起过于简单地联系起来观点表示怀疑。它肯定会引起人们对于把这类思想的出现看作是主要原因的任何因果关系的说法表示怀疑。

关于中国的论点可概括如下：人们怀疑 15 世纪的欧洲和中国在人口、面积、技术状况（农业技术和航海工程）等基本点上存在重大差别。而所存在的某些差别的程度很难说明是未来几个世纪发展差别之如此悬殊的原因。此外，价值体系的差别似乎被过分夸大了，同样，差别存在的程度也不足以造成如此不同的后果。因为，正如我们试图表明的，思想体系能被用来服务于相反的利益，能与非常不同的结构发展相联系。持价值第一论者急于要驳倒唯物主义论点，反倒使他们自己犯了错误，因为他们极其刻板地强调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对应关系（可是颠倒了因果顺序），其强调的程度远远超过古典马克思主义。

中国和欧洲的基本差别再次反映一个长时段的长期趋向与一个更直接的经济周期的结合。长期的趋向可回溯到罗马和中国这两大古代帝国；及其解体的方式和程度。当罗马在中世纪只留下一个淡漠的回忆时，它的现实主要是由一个共同的教会从中协调；而中国却设法维持住帝国的政治结构，尽管是一个虚弱的结构。这是封建制度和建立于俸禄官僚体制上的世界帝国的差别。结果，中国能在多方面比欧洲维持一个更先进的经济。在其一千多年中农民被剥削的程度也很可能轻些。

此外，我们还必须谈到双方较近期的农艺发展，即欧洲发展养牛和小麦，中国发展稻米。后者要求较小的空间和较多的人力。长期趋势的困境对两个体系打击的方式不同。欧洲比中国更

需要地理扩张。中国的某些集团可能发现扩张是有报偿的，但他们被限制住了，因为凡属重大决策都集中在一个帝国构架中，帝国本身首先关心的是在短期内维持其世界体系的政治平衡。

因此，如果说乍一看中国似乎具备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较好条件，如发达的国家官僚体制，在经济的货币化方面以及可能在技术上更加先进，可是毕竟处于较差的地位。它为一个帝国政治结构所制约。它为其价值体系的“合理化”所限制，这个价值体系否认国家才是变革的杠杆（假定它曾想利用杠杆的话），而欧洲的君主们却在欧洲封建忠诚的奥秘中发现了它。

现在，我们准备进一步阐述我们的论点。到 1450 年，创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舞台是在欧洲而不在其他地方。这个体系建立在两个主要结构上：“世界”范围的分工和某些地区的国家官僚机器。我们将从全球角度依次讨论每一个结构。然后我们将依次分析世界经济体的三个地区，即我们称作的半边缘、中心和边缘地区。我们采用这种次序主要是由于历史的顺序，这一点将随着论点的阐述而渐渐清晰。然后，就有可能在更抽象的水平上探讨整个论点。我们选择在结尾而不是在开头这样做，不仅因为我们相信在提供经验材料之后论点会更有说服力，而且因为我们确信，理论的系统阐述应是接触经验现实的结果，其条件是，进行接触是在已经明了一个基本观点之后，这观点使我们有可能理解这一现实。

注释

1 什缪尔·艾森施塔特(S.N.Eisenstadt), "Empire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and Free Press, 1968, V, 41。

2 关于帝国内部矛盾导致其衰落的讨论，见什缪尔·艾森施塔特，“The Causes of Disintegration and Fall of Empires: Sociological and Historical Analyses”，*Diogenes*, No. 34, Summer 1961, pp. 82~107。

3 认识到这一点曾是政治英明的标志。其第一个表现是 13 世纪威尼斯人

拒绝承担拜占庭帝国的政治负担。马里奥·阿布雷特评论道：

“从第四次十字军远征产生的政治机体东拉丁帝国把全部生存的希望寄托在继续保持它与西方的联系上。”

“威尼斯，这个曾经支持了十字军远征，并为其提供海军手段的海上霸权，不愿意承担在政治上统治帝国的负担（恩里科·丹多洛大公事实上就曾拒绝奉献给他的统治权），但却几乎自动地保障了自己对新拉丁帝国治下所有疆土的海上交通和销售的垄断权。”“Creta, colonia veneziana nei secoli: XIII - XV”, *Economia e storia*, IV, 3, lugl - sett. 1957, p. 251.

4 弗雷德里克·C·莱恩(Frederic C. Lane), “The Economic Meaning of War & Protection”, 载 *Venice and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6), p. 389.

5 费迪南德·弗里德(Ferdinand Fried), *Le tournant de L'économie mondiale* (1942), 引自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2e édition revue et augmenté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66), I, p. 339。

6 见布罗代尔, *La Méditerranée*, I, 339~340。加勒特·马丁利(Garrett Mattingly)认为,对15世纪的欧洲需要使用更小的衡量单位:“15世纪初期,西方社会仍然缺少在民族规模上建立稳定国家的能力。在意大利城邦规模上可以做到。内部需要克服的距离较小,就能在现实可行的范围内解决运输和交通问题,以及从而解决税收和维持中央政权的问题。”*Renaissance Diplomacy*, (London: Jonathan Cape, 1955), p. 59.

但是,马丁利又说,这种情况在下一个世纪改变了:“就贸易往来或军事后勤甚至外交联络而言,14世纪的欧洲显得比在16世纪要大些……”(同上, p. 60)。

7 “如果人们说的是16世纪的‘世界’……世界一词事实上通常指的是欧洲……从地理上讲,文艺复兴经济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地区现象,尽管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却是地区性的。”米歇尔·莫拉特(Michel Mollat), “Y a-t-il une économie de la Renaissance?” 载 *Actes du Colloque sur la Renaissance* (Paris: Lib. Philosophique J. Vrin, 1958), p. 40.

8 “在一个真正的世界经济体形成以前(这一过程至20世纪尚未完成),每个人口中心都处于交通网中心……每个这样的世界都与人口高度密集的中心相一致。其边界由沙漠、海洋、处女地形成。欧洲和中国就是极其明显的

例子。”皮埃尔·肖尼(Pierre Chaunu), *L'expansion europe é née du XIIIe au XVe siècle*, Collection Nouvelle Clio, No. 26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9), p. 255。

9 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迎头抨击了一个基本上糊涂的观念:“事实清楚地表明,交易刺激了以货币等价物或以实物表示的价格。因为没有更精确的证据,人们无从合法地断定支付是否真用现金进行……”

“封建制度政治体制的特征是国家权力极大地削弱,但带有昔日国家强盛时的记忆或痕迹。经济上也是如此,即使交换减到最低限度,也从未结束它对货币手段的依附,后者的原则是从以往的文明中继承下来的。”“Economie - nature ou é économie - argent: un Pseudo - dilemme”, 载 *Annales d'histoire Sociale*, I, 1939, 13~14。布洛赫进一步谈到:“因此,欧洲封建制度应被看作旧社会急剧瓦解的结果。日尔曼人通过武力把两个本来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联合起来,并且瓦解了它们。如果没有这一动荡,上述结果将是难以理解的……”载 *Feudal Society* (Chicago, Illinois: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1), p. 443。

关于“货币经济”问题,参见M.M. 波斯坦(M.M. Postan):“因而,从英国历史来看,甚至从中世纪和盎格鲁-撒克逊历史来看,货币经济的兴起在其第一次出现的意义上说并不具有历史意义。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时,就使用货币。它的兴起不能作为解释后来发生的任何现象的证明。”“The Rise of a Money Economy”, 载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 IV, 2, 1944, p. 127。

10 丹尼尔·索纳(Daniel Thorner), “L' é économie Paysan: concept pour l'histoire é conomique”, 载 *Annales E. S. C.*, X IV, 3, mai - juin 1964, p. 422。

11 B.H. 斯利彻·范巴思(B.H. Slicher Van Bath),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A. D. 500 - 1850* (New York: St. Martin's, 1963), p. 24。作者指出,在1850年前后,非直接农业生产的第二阶段开始了。在此期间,大多数人口不再从事农业生产。

12 卡尔·比歇尔(Karl Bücher)提醒我们中世纪历史条件下的“商人”阶层所引起的混乱概念:“有关德意志城市宪法起源的新近研究文献忽略了商人(Kaufmann)一词极广泛的含义,推想在中世纪接近结束时,日尔曼帝国的无数城镇,从科隆和奥格斯堡到梅德巴赫和拉多夫泽尔,都由现代意义上的商人居住着,换言之,这是一个职业买卖人的专业化阶级,他们通常以批发商为代表。所有经济史都会起而反对这个概念。这些人经营什么,又是用什么来

偿付其货物呢?另外,所用的词本身也与此不符。职业商人与公众关系的最主要的特点不是他的买的习惯,而是卖的习惯。但是,中世纪的商人却从买(Kaufen)一词而来。在鄂图三世的国家档案中,从公元900年至1000年多特蒙德(mercatores)的市政法(exemptores Trotmanniae)像科隆和美因兹的市政法一样,被认为是其他城市的典范。are spoken of in the same connection as mercatores or negotiatores in other records, 如果1075年的修道院长可以笔锋一转把阿伦斯巴赫(Allensbach)的农民及其后代变成商人,而我们脑子里想的却是职业商人,那么,没有任何智慧能解释得了这个问题。事实上当时的商人指的是在市场出售东西的任何人,不管是自己生产的还是大部分买来的。这一点从例如1420年法兰克福委员会关于被称作Marktrecht的捐税的不成文的宣言这一事例中已很清楚(市政档案第3册,编号80)。在那里,我们开始发现,捐税将由‘每个站在街头携带无论什么货物的商人’来交纳。接着,又把交纳捐税的每类‘商人’或‘商品’加以详细的分类。从这个冗长的清单中可举出下述例子:做衣小贩,糕饼制作法手册,食品小贩,制绳人,卖榛子的,自备货车卖鸡蛋和奶酪的,肩背篮子的家禽小贩;还有些异乡人不仅有奶酪出售,也有补鞋匠,烤面包的摊贩,兑换货币的商人,用手推车装着面包的异乡人,装着鹅、饲料、稻草、干草、大白菜的货车,以及所有在街上叫卖麻布、亚麻、大麻、纱线的小贩。在这里,我们见到由城市小商、小贩、工匠和农民组成的混杂的人群。市场上买卖双方被叫作Kaufleute(商人),这在大量纪录中都很清楚。事实上,也有一些段落,在谈到商人时似乎主要是指买者而言。”*Industrial Evolution* (New York: Holt, 1901), pp. 117~118, ln. 23。

13 有“长距离”贸易和本地贸易,但没有“居间”贸易。卡洛·奇波拉(Carlo Cipolla)是这样解释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奇异混合主宰了这个场面。从中国得到贵重的丝绸或从近东得到贵重的地毯在经济上是合算的,而从几英里外得到较差的商品通常却是不合算的。由于大批运输在技术上尚无可能,所以货运成本相当昂贵。特别是在不能水运时,长距离贸易不得不主要地——如果不是唯一地——依赖贵重物品。至于基本的日用必需品,任何地区都不得不尽可能自给自足。地区之间的分工不得不主要着眼于贵重物品或当地决不可能生产的物品或不易被替代的其他物品。贸易还大量依赖贵族对奢侈品的消费。”见 *Money, Prices,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Fifth to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York: Gordian Press, 1967), p. 57。

14 见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城镇在整个西欧相当普遍地兴起,其

作用远不限于仅向逃离庄园的农奴提供避难所；它还改变了仍旧留在庄园的农奴的状况。……正如低工资地区的工资必然提高一样，在农奴已有可能转到城镇时，就不得不对他们作出让步。”“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载 *Science and Society*, X IV, 2, Spring, 1950, p. 145。值得注意的是，在斯威齐和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有分歧的长期争论过程中，关于这一点，多布却指出：“顺便提一句，我完全同意斯威齐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大规模逃向城镇，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而这件事的威胁(也许再加上一点小小的运动)，可能足以迫使庄园主作出严重削弱封建制度的让步”。“Reply by Maurice Dobb”，载 *Science and Society*, X IV, 2, Spr 1950, p. 160。

15 “毫无疑问，无论在拜占庭还是穆斯林世界，最接近封建制度的形式的大举出现都是在商业扩张而不是商业衰落时期。俄国和波兰世界的情况无疑也是这样。其特点只是，在实质上组织国际贸易的大都是外国人(汉萨同盟的商人)，而当地的地主则负责生产和调集商品。利润由这两个集团之间分享，因而使一些人获得了统治农民的手段，促成封建庄园主阶级的兴起。”克劳德·卡恩(Claude Cahen), “A propos de la discussion sur la féodalité”，载 *La Pensée*, No. 68, (juil. - août 1956, pp. 95~96。

16 卡恩，同上，p. 96。A. B. 希伯特(A. B. Hibbert)同样指出：“事实 and 理论都表明，中世纪早期的贸易决没有起到瓦解封建社会的作用，而瓦解是那个社会和那些封建统治者的自然产物，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贸易的发展……封建制度从来离不开商人……有两个理由能解释为什么……一是，商人要为大的公私机构提供必需品，二是，商人要从贸易和工业获取利润，或者通过本身成为商人，或者通过对货物或货物生产者和分配者征税或收费的方式分享贸易和工业创造的财富。”“The Origins of the Medieval Town Patriciate”，载 *Past & Present*, No. 3, Feb., 1953 p. 17。

希伯特还进一步讨论了城镇统治阶层的两个来源：

“贵族阶级的形成涉及两个过程：旧的统治阶级的内部转化和从成功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中吸收新家庭，后者常常是移民或移民的后裔(p. 23)”。

“(这一解释)在暴发户的小贩和勤杂工之上，又加上商业资本作为一个来源。它最终论证了这样一种思想，即新技术或新市场可能首先是由一些新人开发的，为了扩张，这些人与旧望族中的富人结成联盟，因此，资本的用途逐渐由旧变新(p. 26)”。

17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The Frontier in History”，载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de Scienze Storiche, I: Metodologia — Problemi generali — Scienze ausiliare della storia (Firenze, G. C. Sansoni, 1955), pp. 124~125。

18 爱德华·佩鲁瓦 (Edouard Perroy), “A l’origine d’une économie contractée: les crises du XIVe siècle”, 载 *Annales E. S. C.*, IV, 2, avr - juin 1949, p. 168。佩鲁瓦关于人口饱和的说法可能是正确的, 其证据之一是, 英国档案显示, 在中世纪, 农业的一个工作日指的实际上是“从日出到正午”这段时间。见斯利彻·范巴思, *Agrarian History*, p. 183。事实上, 埃斯特·博塞拉普 (Ester Boserup) 从这一事实得出结论, 认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方面是“农业劳动时间逐渐延长。”载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Growth* (Chicago Illinois: Aldine, 1965), p. 53。

19 佩鲁瓦, 同上, p. 182。

20 道格拉斯·C. 诺思 (Douglass C. North) 和罗伯特·保罗·托马斯 (Robert Paul Thomas), “A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Western World”, 载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XIII, 1, Apr. 1970, pp. 12~13。B. H. 斯利彻·范巴思指出了对一个对“停滞”的同样的压力。他说: “耕地面积减少, 以及生产要素减少, 肯定表明整个谷物生产的减少。尽管如此, 谷物价格却没有出现与其他商品成比例的增长, 却甚至呈轻微的下跌趋势。这表明消费比生产更加倒退。” “Les problèmes fondamentaux de la société pré-industrielle en Europe occidentale”, 载 *Afdeling Agrarische Geschiedenis Bijdragen*, No. 12, 1965, p. 40。

“停滞”的严重程度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尤金·A. 科斯明斯基 (Eugen A. Kosminsky) 怀疑这种描述对英国和在某种程度上对法国以外的地区是否正确。见 “Peut-on considérer le XIVe et le XVe siècles comme l’époque de la décadence de l’économie européenne?” 载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Milano: Istituto Edit. Cisalpino, 1957), I, pp. 562~563。

21 迈克尔·波斯坦 (Michael Postan) 的描述也与佩鲁瓦接近。见 M. M. 波斯坦, “Some Economic Evidence of Declining Population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载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I, 3, 1950, pp. 221~246。

22 马克·布洛赫支持希尔顿的观点, 他提醒我们不要过高估计现金流通的作用而夸大庄园收入下降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 租金确实是固定的, 银价降低事实上会意味租佃户收入增加, 如果佃户以白银支付的话。但这些条件还有些问题值得研究。布洛赫说, 当时正值“金属货币的极大短缺 (短缺得致使英国一些农民因为得不到付租金所需的白银, 而主动要求用实物支

付)。”见 *Seigneurie française et manoir anglais*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60), p. 110。因此,布洛赫说,结果是“那些收固定地租的人从价格上得到的好处显然受到更大限制。”

23 R.H. 希尔顿 (Hilton), “Yeut-il une crise générale de la féodalité?” 载 *Annales E. S. C.*, VI, 1, janv - mars 1951, p. 25。

24 同上, p. 27。

25 同上, p. 28。

26 R.H. 希尔顿, “Peasant Movements in England Before 1381”, 载 E.M. 卡勒斯-威尔逊 (E.M. Carus - Wilson) 编,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St. Martin's, 1966), II, p. 79。希尔顿指出,租金增加,可能会使贫苦农民丧失其冬天的储备,而对富裕农民的影响不同:“对他们,更恼人的问题不是害怕饥饿,而是有碍其积累 (p. 86)”。此外,旨在通过冻结工资来降低成本的立法对大土地所有者比对富裕农民的好处更大。“现在,没有人耕种,大农场变得毫无用处。因此,佃户愿向劳力支付高价,否则便雇不到劳力。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也倾向于提高为庄园主服务的劳力价格。但地主却没有必要受经济规律作用之苦,因为他们掌握政治权力,能够不受其约束。他们仍然保留着农奴的劳力,并且,作为兼理一般司法事务的劳务官或治安官,仍控制着现有雇佣劳动者的分配。(p. 88)”。

27 尤金·A. 科斯明斯基, “The Evolution of Feudal Rent in England from the XIth to the XVth Centuries”, 载 *Past & Present*, No 7, April 1955, p. 32。他继续说:“封建剥削的加剧开始使农民的农业枯竭,同时削弱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力,破坏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这一长期的斗争……最清楚地表现在1381年的起义上……”

28 斯利彻·范巴恩, A.A.G.B., No. 12, p. 190。他这样描述其机制:“农民看到农业生产引起价格降低,而将工业中的高价格和相对较高的工资对照时,就感到不满。常有这种情况:进一步增加赋税在政府或地主眼中似乎仍能被承受,却提供了点燃长期郁积的愤怒的火花。”

29 莫里斯·多布, *Papers on Capitalism,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 1967) p. 11。

30 例如,请见让-玛丽·佩赛兹 (Jean-Marie Pesez) 和伊曼纽尔·勒鲁瓦·拉杜里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关于14和15世纪法国的讨论。“Le cas français: Vue d'ensemble”, 载 *Villages désertés et histoire économique, XIe - XVIIIe*

siècles (Paris: S.E.V.P.E.N., 1965), p. 155。他们还指出,附近城镇出于战略考虑,有时也强迫农民撤到安全地带(见 p. 156)。见卡洛·奇波拉, *Clocks and culture, 1300-1700* (New York: Walker & Co., 1976a), p. 115。

31 见乔治·达比(Georges Duby)在“Démographie et villages désertés”一文中的讨论。载 *Villages désertés, et histoire économique, XIe - XVIIIe siècles* (Paris: S.E.V.P.E.N., 1965), pp. 18-23。

32 卡尔·赫莱纳(Karl Helleiner), “The Population of Europe from the Black Death to the Eve of the Vital Revolution”, 载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E.E. 里奇(E.E. Rich)和 C.H. 威尔逊(C.H. Wilson)主编,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7,) p. 15 页。见达比, *Villages désertés*, pp. 14, 16, 以及佩赛兹和勒鲁瓦·拉杜里, *Villages désertés*, p. 181-183。

33 见威廉·埃贝尔(Wilhelm Abel), *Die Wüstungen des Ausgehenden Mittelalters*, 2nd ed (Stuttgart: Verlag, 1955), pp. 5-12。

34 见莫里斯·W. 贝雷斯福德(Maurice W. Beresford), *The Lost Villages of England* (London: Lutterworth Press, 1954)。贝雷斯福德认为,人口减少(包括村庄的彻底遗弃和随后的人口下降)的高潮是在 1440 年到 1520 年之间(见 p. 166)。他认为圈地运动是这一现象的唯一最重要原因。他把圈地运动看作一个渐进的发展:“人口减少发生在那些庄园佃户的玉米地缩小而大量草地已经随之出现的村庄……圈地运动和人口减少是个逐渐达到的目标……(p. 210)”。

35 佩赛兹和勒鲁瓦·拉杜里提出一个数字:从 1328 年到现在,东普罗旺斯语地区被遗弃的村庄是 5% 到 7%。他们说:“这些数字并非微不足道,但离德意志埃贝尔的 40% 和贝雷斯福德先生计算的数字相差甚远。”见 *Villages désertés*, p. 129。不同的人口减少比率的差别倾向于肯定农业重新组织的论点而不是人口下降的论点。我们知道,在农业的重新组织中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例如,大地产的出现在法国就比在英国或德意志少得多。当然,14 世纪和 15 世纪人口下降率也可能是不同的,但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论据较弱,因为许多证据都恰恰是从遗弃村庄一类现象中推论出来的。因此,我们不能利用这些证据,否则就会陷入循环推理。

36 马克·布洛赫, *L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64), I, p. 122。

37 亨利·勒费布里 (Henri Lefebvre), "Une discussion historique: du féodalisme au capitalisme: observations", 载 *La Pensée*, No. 65, janv - févr. 1956, p. 22。

38 “压力日益增加的结果不仅累煞了为城堡下金蛋的鹅, 而且引起出于纯粹绝望而从庄园非法外逃的运动。……(因此)逃亡问题变得相当严重, 对劳力的渴求异常之大, 尽管有协议和相互承诺, 但一场怂恿逃亡和偷盗邻近领地里农奴的实际竞争竟发展起来。这场竞争……包含一定的让步, 其存在本身则限制了封建剥削的进一步加重。”莫里斯·多布,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46), pp. 46~47。

39 “事实上, 固定报酬的下降与直接管理的减少以及必须在维修上花钱, 有些开销严重影响了(14和15世纪)所有封建领主的财政状况。他们显得处处缺钱花, 开始到外部寻求利润。因此, 他们经常投入某种职业或冒险, 从而离开了自己的庄园。但是, 受雇于正在寻求同盟者的更强大的王侯, 或走上政治阴谋和联姻的冒险道路, 这种种补充收入的方式保住了几乎所有大贵族的财产。”见乔治·达比, *Rural Economy and Country Life in the Medieval west* (Columbia: Univ.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68), p. 330。

40 由于城镇手工业的竞争和纺织工人扩散到欧洲许多农村地区, 农村工资得以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上。与此相比, 谷物价格更明显地低落, 这就决定了所有过分大的农业企业的命运。事实上, 庄园的黯然失色以庄园土地直接耕作程度的大大衰退现象是出现在1380年之后, 至少在法国和英国是如此。”达比, 同上书, p. 311。

达比早期的说法更谨慎些: “可能的结果似乎是……在14世纪后半期和15世纪, 庄园即使其规模没有明显缩小有时甚至反而扩大了, 它至少失去了其内聚力。”“Le grand domaine de la fin du moyenâge en France”, *Premièr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 Histoire Economique*, Stockholm, August 1960: *Contributions* (Paris: Mouton, 1960), p. 338。

41 “货币地租是在对收租者不利的情况下最后建立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强加给他们的, 因为群众运动的兴起迫使庄园主不得不更加迁就。”科斯明斯基, *Past & Present*, No. 7, p. 33。

42 见达比: “我们必须时刻警惕, 反对一种说法, 即: 认为14世纪和15世纪的土地遗弃和把所有(本书作者强调)田地重新组合为几个联合的、服从于严格农业限制的村庄领土是经济不景气、农业失败或人口骤降的标志。相反,

地形变换反映了谷类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阶段迟到了一至两个世纪，但其发展和性质与13世纪以法兰西岛（地区）为中心而发生的情况相类似。所以，在日尔曼西北部，封建主圈围起其正在增殖的森林。他们用篱笆把森林围起来，把农民的猪隔在外面，并禁止周期性烧荒。封建主仗恃权力强行圈占森林，使得那些住在森林地带，以森林、畜牧业和相关的耕种为生的家庭不得不改变目标。他们被迫改变了生活方式，森林居民变成了农民即在永久田地上安家落户的真正的种地人。”见 *Rural Economy*, p. 309。

43 同上, p. 315。

44 “英国资本主义的大繁荣时期是在百年战争的早期阶段，此时，皇家财政的紧急状况，税收的新试验，羊毛的投机冒险，意大利财政的破产以及新服装工业的兴起，这一切加在一起，产生了战时金融家和商业投机者、军队伙食供应商和羊毛垄断者的新竞赛。但这种竞赛既是新的又是短命的。庞大财产的丧失如同创业一样容易，轻率的财政和大规模财政实验时期随同战争的第一阶段而消声匿迹……”

英国的商人阶级以一切商人的反应方式对待贸易稳定和贸易衰退。他们采取调整和限制政策，来阻止新成员进入商界，并试图分享掉已有的贸易……那些有时被看作典型的中世纪规则的迹象的，事实上不外是15世纪背离了前几个世纪更自由更投机的状况的事例”。M.M. 波斯坦，“The Fifteenth Century”，载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X, 2, May 1939, pp. 165~166。

45 “我们认为，不是人口下降，而是庄园经济的完结，封建地租的演变和缩减带来了农民状况的改善和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铺平道路的简单商品生产的扩大。人口的适度减少……只能强化和改变……这一发展进程。”尤金·A. 科斯明斯基，*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ni*, I, p. 567。

46 马克·布洛赫，“The Rise of Dependent Cultivation and Seigniorial Institutions”，载 M.M. 波斯坦主编，*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 *The Agrarian Life of the Middle Ages*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6), p. 269。

47 “城邦的竞争对手是领土国家，后者富有希望和人力，显示它更有能力支付现代战争的费用；它把持雇佣军，采办制造火炮的昂贵材料；它不久又会自己加入了更加奢侈的大规模海战。它的兴起长期以来就是不可逆转的现象。”布罗代尔，*La Méditerranée*, II, p. 8。

但我们必须注意不能期待太早。查尔斯·奥曼(Charles Oman)爵士认为，

战争艺术的历史性的突破不过出现在 1494 年。见 *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Methuen, 1937), p. 30。奥曼认为,两个主要的“趋势”(请注意这个词)是“火器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和(部分地由于这一进步的结果)阵地防御设施的应用,这使骑兵越来越难以冲锋(p. 33)”。事实上,另一些作者走得更远,他们提出,新战争技术的社会影响甚至对 16 世纪来说也是被夸大的。例如,见 H.M. 科尔文 (Colvin), “Castles and Government in Tudor England”, 载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XXXIII, 1968, p. 226。但是,如果我们描述的是动向或趋势,那么我们可以清楚地证明,这一不断积累和不断产生的影响在 14 世纪就已经开始了。

48 “在整个西欧和中欧,中世纪的最后两百年是农村动荡和人口减少的时期……前一个时期的大规模政治建设……初步表明它无力完成其维持统治和秩序的使命,而这却正是它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布洛赫 *Caractères Originaux*, I, pp. 117~118。

49 “因而,国家从此以后开始拥有其最高统治的基本条件——任何个人或团体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大量财政资源。”布洛赫, *Feudal Society*, p. 422。

50 戴维·洛克伍德 (David Lockwood) 提出了其中涉及的理论问题:“官僚制度和税收的关系是高度相互依赖的关系。官僚体制的效率依靠其税收体系的效力,而税收体系的效力又依靠官僚机器的效率。因此,不论什么原因,官僚体制任何负荷的增加或税收能力的减少都会引起权力分散的恶性循环。的确,还可以争论,世袭官僚体制的‘税收’危机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危机在本质上是类似的。……造成紧张点的是那些代表“封建化”潜力的现实化的现象:官员‘侵占’本部门经济、政治资源的倾向;大地主要求豁免税收和(或)篡夺财政、政治职能的斗争;以及农民被迫寻求保护以反对来自官僚中心的赋税重负而造成的经济、政治依附性。这些‘离心’倾向可看作既是维持有效税收能力和中央控制的机制可能失败的原因,又是其结果。”“Social Integration and system Integration”, 载乔治·K. 佐尔先 (George K. Zollschan) 和沃尔特·赫希 (Walter Hirsch) 主编, *Explorations in Social Change* (Boston Massachusetts: Houghton, 1964), p. 254。

加布里埃尔·阿丹特 (Gabriel Ardant) 关于这一困境的说法更多地强调导致结构变化的国家财政政策的选择而不是相反,尽管很难把两者分离开来。阿丹特说:“没收财产在各个时代对政府都是一种诱惑,但却不能解决其财政困难,它所带来的只是时间上有限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又常被浪费掉。除没收

财产外,不管我们谈征服的好处,或剥夺教会财产的好处,或不断迫害一定社会部门的好处,对统治者来说有两种可能的解决办法:

“第一种,也是封建的解决办法,常常以庄园经济和官僚的受贿为先导,在大量事例中有助于引起国家的实际解体。

“我们可以用借贷和通货膨胀来反对上述方案,但是我们将会看到的财政上的权宜之计同样依赖于经济结构。

“我们诚然是在把不同领域的政策抽象化,但国家利用这些政策改变社会的社会组织。”见 *Théorie the Sociologique de l'impôt* (Paris: S.E.V.P.E.N., 1965), I, p. 541 及以下。

51 例如,阿丹特指出,“要获得贷款必须被判断为处于不利的财政状况范围内,一个国家可能会被导向保证(广义地保证)限制其主权;某个特别收入来源可能会让给外国债权人;对财政管理以及进而对行政管理的一定程度的监督可能会由债权人或支持他们的国家等等来执行(同上, I, pp. 549~550)。”

52 马克斯·韦伯(Max Webb)在比较西欧和印度时说:“在现代开始时,西方国家还出现了包税和被授权征兵的企业家,财政基本上是委托给他们的。但在印度,在大王国统治下,这类中央机关未能得到发展,而在西方却使诸侯逐渐把军事和财政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见 *The Religion of India* (New York: Free Press, 1958), p. 69。

53 “贪污受贿尽管有其诸多不便,当时却有(强化国家的)政治影响。就文职人员管理而言,这相当于有薪金的军队系统,即‘外国雇佣兵’,是一个同样遭到痛斥的体系……但它却联结在皇权的巨大的和日益增长的财富上,皇权因此不再仅仅依赖封建贵族的军事力量。”F·沙伯德(F. Chabod), “Y-a-t-il un état de la Renaissance?”载 *Actes du Colloque sur la Renaissance* (Paris: Lib. Philosophique J. Vrin, 1958), p. 66。

54 达比, *Rural Economy*, p. 331。

55 利奥波德·热尼科(Léopold Génicot), “Crisis: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Modern Times”, 载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 The Agrarian Life of the Middle Ages*, 2nd ed.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6), p. 699。

56 “理论家和实行者(例如黎塞留)对君主声誉的重视,同时,对“陛下”空前地特别留神;“凡此一切渐渐地扩大了君主与其臣民的距离,竟使他高不

可攀。”见沙伯德, *Actes*, p. 72。

57 “如果君主的权力在增长,那么另一种权力也在增长:即官僚‘团’的权力。于是创造出集体精神,这种精神把他们相互联结在一起,而置一切个人的和私人个性上的矛盾争执于不顾。并且,不仅在最高官僚阶层的法官中如此,在其他官僚中也是如此。……”

“‘第四等级’是同时也在增长的君主权力在政治上的同盟者(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和政治专制主义因而同步前进),它的权力的增长事实上是一个我们必须注意的重大因素(同上,pp. 68~69,72)。”

58 爱德华·米勒(Edward Miller)简要讨论了各种利益当时已更加复杂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在中世纪末期的欧洲各国开始形成的。见“Government and Economic Policies and Public Finances, 900-1500”,载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 8, 1970, pp. 34~40。

59 见伊维斯·雷诺阿德(Yves Renouard),“1212-1216: Comment les traits durables de l'Europe occidentale moderne se sont définis. au début du XIIIe siècle”,载 *Annal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XXVIII, I, janv. - mars 1958, pp. 5-21。

60 多少与拉丁基督教相似,由许多小自治细胞即庄园构成的一个庞大联合体,让位给许多不同的巨大领土主权的并存,这是现代欧洲国家的一个开端。”爱德华·佩鲁瓦, *Le Moyen Age*, Vol. III,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Civilisations* (Pari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5), pp. 369-370。

61 “事实上,命运已经转变了。(16)世纪早期有利于大国(西班牙,奥斯曼帝国),按经济学家的说法,大国是范围最适合的政治企业。随着这个世纪的继续,由于某些我们无法充分解释的原因,形势一步步地不利于庞大的国家。这一危机是过渡性的还是结构性的?是虚弱还是衰微?无论如何,到17世纪之初,只有中等的国家似乎还有活力。因此出现了亨利四世的法国这个突然出现的壮景;或伊丽莎白的好战而又辉煌的小英国;或以阿姆斯特丹为中心建立的荷兰;或在1555年到三十年战争之前处于物质沉寂状态中的德意志(她在三十年战争中彻底垮掉了)。在地中海地区,同样情况的还有一度盛产黄金的摩洛哥,阿尔及尔摄政管辖区——一个城市变成领土国家的故事。同样,也还有以奢侈、美女、智慧而光芒灿烂的威尼斯,以及费迪南大公的托斯卡尼。……”

“换句话说,一些帝国比中等国家在1595—1621年衰退中所受的损失肯定较大。”见布罗代尔, *La Méditerranée*, II, p. 47。

62 同上, II, p. 10。

63 弗里茨·哈通 (Fr. Hartung) 和罗兰·莫斯尼尔 (R. Mousnier), "Quelques Problèmes concernant la monarchie absolue", 载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IV: Storia moderna* (Firenze: G. B. Sansoni, 1955), p. 47。

64 V. G. 基尔南 (Kiernan), "State and Nations in Western Europe", 载 *Past & Present*, No. 31, July 1965, pp. 35-36。

65 古斯塔夫·厄特斯特罗姆 (Gustaf Utterström), "Climatic Fluctuations and Population Problems in Early Modern History", 载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I, 1, 1955, p. 47。

66 同上, p. 5。

67 同上, p. 24。

68 同上, p. 39。

69 见同上, pp. 14-15。但是, 卡尔·赫莱纳引用恩斯特·罗登瓦尔特 (Ernst Rodenwaldt) 的著作指出, 尽管人蚤相对鼠蚤而言是较不重要的淋巴腺鼠疫的媒介, 但在中世纪的情况下它可能更加重要。这降低了厄特斯特罗姆假定的意义。见赫莱纳,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 7。

70 达比, *Rural Economy*, p. 307。

71 同上, p. 308。

72 赫莱纳,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 76。

73 "1200年以后西欧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周期性繁荣—衰退不像是气候变化的结果。……"斯利彻·范巴恩, *A. A. G. B.*, No. 12, p. 8。

74 在指出厄特斯特罗姆关于气候的争论并非毫无根据之后, 他又指出他在运用气象资料方面存在方法论缺陷。他提出, 厄特斯特罗姆没有提供足够长期的趋势的资料来支持他的一般性结论。"我们可以想象, 一个历史学家或一个经济学家声称要表明价格的长期和持续上涨, 但论据却只基于曲线上他愿意解释的某些例外的'周期'点, 而略去甚至不了解所研究曲线的概貌。"伊曼纽尔·勒鲁瓦·拉杜里, *Histoire du climat depuis l'an mil* (Paris: Flammarion, 1967), p. 17。

75 诺曼·J. G. 庞兹 (Norman J. G. Pounds), "Overpopulation in France and the Low Countries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III, 3, Spring 1970, p. 245。庞兹谈到"永久营养不良的状况"。费尔南·布罗代尔采取相似的立场: "[在一个主要是农业经济的社会中,] 收成的波动、质量和不足, 决定

整个的物质生活。这会造成严重损害的后果，就像树木的白木质或人的肉体上的伤口一样。”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et capitalism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67), pp. 32~33。

76 “荷兰沿海地区的人大多靠畜牧业和渔业为生，因此，他们比从事耕作的人食用更多的畜产品和脂肪。也许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没有[像其他欧洲人一样]有那么多人死于14世纪的流行病。” 斯利彻·范巴思, A.A.G.B., No. 12, pp. 89~90。

77 “黑死病一旦出现[1347—1351年]，直到350年后才在欧洲消失。而作为地方病或流行病，它继续对长期平均死亡率和死亡率的短期波动产生重大影响。” 赫莱纳,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 5。

78 卡尔·赫莱纳提出下述假设：“下层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善本身[在黑死病引起人口减少之后]，可能妨碍了人口的迅速恢复。这个推论建立在先验基础上，但支持这个看法是有一定证据的，即：这种改善使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包括部分地从谷类转变到肉类消费标准。这一消费偏好的变化反映在畜产品和谷物相对价格的变动上。这肯定加强了弃地的过程……，其一个方面，就是欧洲部分地‘不种谷类作物’，而爱搞畜牧业。但是，在一定农业技术水平上，生产每一卡路里动物食品比生产每一卡路里的植物食品需要多用5至6倍的土地。这表明，原先人口下降所造成的人口对土地压力的任何减轻，又由于消费和生产类型的变化而部分地被抵销了。这一假设有助于解释这个难以解释的事实：即使人均所有的肥沃土地在中世纪晚期无疑要多得多，但这一时期人们遭受的死亡和灾荒之苦几乎不少于前几个世纪（同上，pp. 68~69）。”

79 “14世纪和15世纪的人口衰退加重而不是解决了空间匮乏的问题。因而，它没有减轻13世纪已经开始产生的压力，反而可能由于地租下降、利润递减和庄园负担的加重而增加了这种压力。本来可能会投入土地的资本，在某种程度上反被其他领域吸引去了。” 肖尼, *L'expansion européenne*, p. 349。

80 “大量事例表明，转变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增加了封建负担。在这种情况下，这仅仅是一种对直接强加更多劳务的替代办法。在多半由封建主主动提出转变时，转变便往往具有这种特征。增加封建收入的企图可能会采取这种形式，因为劳力相对而言是丰富的。……人口对村庄现有土地的压力使村民更难维持生计，也使雇佣劳力变得廉价和相对充裕……。可能正是这种人口压力为转变提供了进一步的诱因。” 多布, *Studies*, pp. 63~64。

81 阿奇博尔德·R. 刘易斯, (Archibald R. Lewis), "The Closing of the European Frontier", 载 *Speculum*, XXXIII, 4, Oct. 1958, p. 475。

82 同上, p. 476。

83 安德鲁·M. 沃森 (Andrew M. Watson), "Back to Gold - and Silver", 载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1, 1967, p. 1。

84 “我们忘记了, 在古代和中世纪, 我们现在认为的贫矿在当时却被看作第一流的。从 8 世纪到美洲的发现, 西苏丹是西方世界黄金的主要供应者。这一商业化了的黄金贸易最初起自加纳, 由此扩展到地中海地区, 从而加强了拥有这一富源的国王们的威望。”R. A. 莫尼 (R. A. Mauny), "The Question of Ghana", 载 *Africa*, XXIV, 3, July 1954, p. 209。

玛丽安·马洛维斯特 (Marian Malowist) 认为, 刺激这一扩张的主要因素, 是北非需求黄金 (为了出售给欧洲人), 而不是西苏丹需要用黄金来换回食盐。见 "Quelques observations sur le commerce de l'or dans le Soudan Occidental au moyen âge", 载 *Annales E. S. C.*, XXV, 6, nov. - déc. 1970, pp. 1630~1636。

85 沃森,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X, p. 34。见 R. S. 罗佩斯 (R. S. Lopez) H. A. 米斯基明 (H. A. Miskimin) 和亚伯拉罕·乌多维奇 (Abraham Udovitch) 合写的出色的文章, 文中他们很令人信服地提出, 从 1350 年到 1500 年, 黄金持续不断地从西北欧流向意大利, 流向立范特, 流向印度:

“(英国) 非农业人口的奢侈品消费和用于教堂装饰的投资扩大……由于对技工劳务的要求, 相对地有所增加, 致使黑死病之后熟练技工已经感到非常短缺的现象格外加剧。结果, 熟练技工的工资不断增加, 某些对奢侈品的新需求不能在本国得到满足, 出于经济的必然性和追求舶来品, 便转向北欧以外的地区。这一需求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货币大量出口。加之稀缺的劳力被用于生产国内的奢侈品, 而不能用于生产出口商品, 北欧经济可能得到的外汇收入势必随之减少……

“[货币] 都到哪里去了? ……罗马教皇的确是北欧金属供应的主要吸收者。但是, 除了货币的直接转移以外, 更正常的商业渠道经过奢侈品消费的中介, 也产生同样的结果……南北路线 [从汉萨诸城市起] 在欧洲大陆上的终点是米兰, 热那亚和威尼斯; ……像是有一种活跃的、可能是单方面的贸易以把贵重金属吸向南部的方式而将南北经济联结起来。

“在法国, 我们发现, 对南方奢侈品的消费在 14 世纪和 15 世纪早期同样普遍地增加……

“英国和法国强烈抱怨意大利对贵重金属的吸取，但这主要还是贵重金属从意大利流到立范特……尽管有黄金从西北欧进口，有中欧金矿的适度生产，以及有来自塞内加尔的更多的黄金，大量证据表明，黄金的供应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不充分的，而且经常是短缺的。假定人们对黄金的渴求从历史上就是不满足的，可以肯定，14和15世纪与立范特的贸易从意大利吸走黄金的数量是空前的……奢侈品贸易的相对支配地位使意大利更加依赖立范特，也把大量黄金消耗在这上头……”

“14世纪末，埃及经济出现了绝对收缩的情况……它的各个部门都出现了数量上的绝对减少……埃及经济危机伴随着其货币体系的崩溃。金银货币越发稀缺，铜币在国内流通和所有各类交易中都占支配地位……”

“在造成14世纪末和15世纪埃及硬币短缺的诸多因素中，最主要的是埃及持续不断的国际贸易支付的逆差。到13世纪，努比亚金矿已经枯竭到产金难以负担支出的地步。埃及与西苏丹活跃而有利可图的贸易把对埃及的黄金供应维持到14世纪下半叶。然后，这个贸易开始下降，而非洲的黄金被吸向欧洲……当埃及黄金供应的来源萎缩时，却没有迹象表明对外国产品和奢侈品的消费出现相应的显著下降，国家用于进口的开支也没有相应地减少……”

“在整个15世纪，欧洲是埃及保持贸易顺差的唯一地区……15世纪初期，埃及几乎完全依靠与欧洲的香料贸易……但其总量中只有一部分留在国内，因为香料贸易是一种过境贸易。此外，由于埃及本身的香料消费，又从远东进口香料，也助长了[黄金向印度的]流动……”

“所以，至少有相当一部分黄金为换取奢侈品而开始了从北欧向南部的漫长旅程，穿过意大利和埃及，找到了最后的落脚地，成为对印度已有的惊人的巨额黄金积累的补充。”“England to Egypt, 1350-1500; Long-term Trends and Long-distance Trade”，载M.A. 库克(M.A. Cook)主编，《*Studie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70), pp. 101, 102, 103, 104, 105, 109, 110, 114, 117, 123, 126, 127-128。

86 见德桑卡·科瓦赛维克(Desanka Kovacevic), “Dans la Serbie et la Bosnie médiévales: les mines d’or et d’argent,” 载 *Annales E. S. C.*, XV, 2, mars-avr. 1960, pp. 248-258。

87 “从1460年起矿业生产突飞猛进，主要是在中欧。在这个领域里，技

术变成科学的运用。钻探、排水和通风的较好方法的发明使萨克森、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矿藏开采可深达 600 英尺；液压的推广使用增加了风箱和钻机能力，以致可把炉床从山上挪放到凹地。第一座高 10 英尺鼓风炉的建立把旧炉的生产能力提高了 2 倍。在 1460 年到 1530 年间，中欧的采矿业可能增加了 4 倍。”佩鲁瓦, *Le Moyen Age*, III, pp. 559~562。

88 见 V.M. 戈丁浩 (V.M. Godinho), “Création et dynamisme économique du monde atlantique (1420-1670)”, 载 *Annales E. S. C.*, V, 1, Janv-mars 1950, p. 33; 皮埃尔·肖尼, *Séville et l'Atlantique (1504-1650)*, VIII, (1) (Paris: S.E.V.P.E.N., 1959), p. 57。

89 “在地中海地区代替了非洲黄金来源的美洲是对德意志银矿的更重要的替代。”布罗代尔, *La Méditerranée*, I, p. 433。

90 “商业扩展的每一个方向都激起了对它带来的新消费品的欲望。正如总是发生的情况那样，贵族总想坐拥奢侈品或至少过得舒舒服服以适应他们的社会地位。”亨利·皮雷尼 (Henri Pirenn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1936), p. 81。

“考虑到战争的主要伤亡者是上层社会的人（因为只允许他们携带武器），我们便会怀疑寄生阶级的规模会有相对显著的增长……另一方面，没有理由怀疑封建统治阶级日益奢侈腐化的事实……但是，这种日益滋长的奢侈，是能够被封建体系本质所解释的趋势呢？还是它反映了封建体系之外发生的事情？……从 11 世纪开始迅速扩大的贸易在其所及的范围内带来了货物数量、品种的不断增长。”保罗·斯威齐, *Science and Society*, XIV, pp. 139-140。

但莫里斯·多布认为：“从财产所有者强制剥夺剩余劳动过渡到使用自由雇佣劳动肯定要依靠廉价的待雇劳动力的存在（即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成份的劳动力）。我认为，在决定旧社会关系的生存或瓦解中，这一点是比离市场远近更重要得多的因素。”*Science and Society*, XIV, p. 161。

R.H. 希尔顿 (R.H. Hilton) 同意多布的看法：“与早期的地租斗争和封建制度的政治稳定分不开的经济进步的特征，是超过生存需要的总的社会生产剩余的增长。正是这一点而不是所谓丝绸和香料国际贸易的复兴，才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载 *Science & Society*, XVII, 4, Fall 1953, p. 347。

91 见 B.H. 斯利彻·范巴恩 “The Rise of Intensive Husbandry in the Low

Countries”,载 J.S. 布罗姆利(J.S. Bromley)和 E.H. 科斯曼(E.H. Kossman)编, *Britain and the Nether lands* (London: Chatto, 1960), pp. 130~153。

92 同上, p. 137。

93 “这类改善(bonification)运动是对城镇要求的回答。城镇人口在 15 和 16 世纪从未停止增长。向这些城镇供应迫切需要的物品,使得它们通过开垦新土地,或进行灌溉,在其近郊发展农业生产。布罗代尔, *La Méditerranée*, I, p. 62。

94 乔尔·塞拉奥(Joel Serrao), “Le blé des îles atlantiques: Madère et Açores aux XVe et XVIe Siècles”, 载 *Annales E. S. C.*, IX, 3, juil - sep 1954, p. 338。

95 见 J.A. 范·霍提(J.A. Van Houtte), “L'approvisionnement des villes dans les Pays - Bas (Moyen Age et Temps Modernes)”,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 (Paris: Mouton, 1968), pp. 73~77。

96 “在 15 世纪,葡萄牙对汉萨商人和布列塔尼人更加开放,因为他们向葡萄牙提供小麦和木材这些当时不可缺乏的重要物资。”玛丽安·马洛维斯特, “Les aspects sociaux de la première phase de l'expansion coloniale”, 载 *Africana Bulletin*, I, 1964, p. 12。

97 见鲁基洛·罗马诺(Ruggiero Romano), “A Propos du Commerce de blé dans la Méditerranée des XIVe et XVe siècles”, 载 *Eventail de l'histoire Vivante: hommage à Lucien Febvr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53), pp. 149~161。

98 贝内特(M.K. Bennett)表上的 8 个等级是:(1) 碾谷类和淀粉根类, 块茎类;(2) 植物脂肪和植物油;(3) 干豆类(蚕豆, 豌豆, 小扁豆);(4) 糖;(5) 奶及奶制品;可能还有鱼类;(6) 猪肉;(7) 牛肉, 羊肉, 山羊, 水牛;禽类和蛋类;(8) 蔬菜和水果。见 M.K. 贝内特, *The World's Food* (New York: Harper, 1954), pp. 127~128。“为什么存在这个一般分类等级?毫无疑问,它反映了不同食品的相对生产成本和内含卡路里的质量(p. 128)。”

99 见 G.B. 梅斯菲尔德(G.B. Masfield), “Crops and Livestock”, 载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E.E. 里奇和 C.H. 威尔逊(C.H. Wilson)编,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7), p. 295。

100 安东尼·勒特雷尔(Anthony Luttrell)回顾了 1500 年以前的图景:“从 12 世纪起,拉丁人开始使用穆斯林和其他奴隶在叙利亚、塞浦路斯和其他立宪殖民地生产糖,而到 1404 年,当热那亚的帕都阿·乔凡尼得到在阿尔加

维⁽¹⁾建立农场的皇家许可证时，热那亚人显然已经把它从西西里转到了葡萄牙南部。向亚速尔群岛和马德拉群岛引进糖业提供了动力、资本、碾磨和灌溉技术的主要是热那亚人，他们并从这些岛屿把糖出口到远至佛兰德斯和君士坦丁堡。他们还协助提供了必需的劳力，例如，安托尼奥·达·诺利 (Antonio da Noli) 在 15 世纪 60 年代把几内亚人带到佛得角群岛。”“Slavery and Slaving in the Portuguese Atlantic (to about 1500)”，载爱丁堡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from West Africa* (打印稿, 1965), p. 76。

101 见 E.E. 里奇, “Colonial Settlement and its Labour Problems”, 载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E.E. 里奇和 C.H. 威尔逊编, *The Economic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7), p. 308。

102 例如, 塞拉奥关于马德拉 (Madeira) 的评论: “大约在 1475 年, 小麦周期宣告结束……糖扼杀了小麦。”*Annales E. S. C.*, IX, p. 340。塞拉奥指出, 当这个情况出现时, 亚速尔群岛基本取代了马德拉, 变成葡萄牙的小麦生产地。这一循环类型“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如此, 甚至在 18 世纪仍然是如此。”同上, p. 341。

103 见戈丁浩, *Annales E. S. C.*, V, p. 33。

104 “人们一般不甚注意的是, 1750 年人们食用大量面包和少量肉类的状况……是一种倒退的结果, 不适用于中世纪。”费尔南·布罗代尔和弗兰克·C. 斯普纳 (Frank C. Spooner), “Prices in Europe from 1450 to 1750”, 载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E.E. 里奇和 C.H. 威尔逊主编的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7), p. 414。

105 “从 1400 年到 1750 年, 欧洲是面包的大消费者, 有一半以上的人是素食者。……只有这种‘落后的’食物结构才使欧洲能承受起人口不断增长的的压力……面包消费使肉类消费越来越退居次要地位。直到 19 世纪中期才发生变化。”同上, p. 413。又见 W. 埃贝尔 (W. Abel), “Wandlungen des Fleischverbrauchs und der Fleischversorgung in Deutschland”, 载 *Bericht über Landwirtschaft*, n. s. 22, 1938, pp. 411~452, 引自斯利彻·范巴思, *Agrarian History*, p. 204。

[1] Algarve 在葡萄牙。——译者

106 “葡萄牙沿西非海岸的早期探险只发现一种有直接用途的植物：天堂谷……当时，得到它比经由横穿撒哈拉的大陆路线更便宜。这个贸易使西非海岸得名‘谷海岸’。但这种作物不适应欧洲水土。”梅斯菲尔德，*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 276。

107 肖尼，*L'expansion européenne*, p. 354。

108 G. B. 梅斯菲尔德指出美洲和东半球之间的联系是如何改变了世界农业地图：“随着这些联系的建立而散布开来的谷物种植和家畜饲养对人类历史是最重要的，可能也是大发现的一切后果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没有美洲的各种作物，欧洲便不可能负担得了这么多的人口，东半球热带地区也不可能发展得那么快。没有欧洲的家畜，特别是用于运输和耕种的马和骡子，美洲大陆就不可能以它那样的速度发展。”*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 276。

109 布罗代尔谈到意大利各地的“木材荒”。“地中海的海军逐渐习惯于到越来越远的地方去取得不能在本地森林发现的木材。16世纪，北欧的木材随着满载厚板和桁条的船只出现在塞维利亚。”*La Méditerranée*, I, p. 131。

见弗雷德里克·莱恩：“15世纪下半叶当第一次清楚地感到栋梁枯竭时，这种短缺对威尼斯似乎是很奇怪的。至少拉古萨人和巴斯克人还有足够丰富的木材供应，因此他们的竞争力显而易见。16世纪末，整个地中海沿岸各国家普遍地缺乏栋梁。”“Venetian Shipping During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载 *Venice and History*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Press, 1966), p. 21。

H. C. 达比指出英国有同样情况：“从都铎时代开始，英国商业海运的增多和英国海军的发展依靠用作船体的栋梁的充分供应；作桅杆的冷杉木以及诸如树脂和柏油一类的‘海军必需品’都要从波罗的海国家进口。”见“Clearing of the Woodland in Europe”，载小威廉·L. 托马斯 (William L. Thomas) 主编，*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Chicago, Illinois: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56), p. 200。

110 见戈丁浩，*Annales E. S. C.*, V, p. 33。

111 把金属货币变成符号的关键因素是使硬币的商品价值低于（最好大大低于）其货币价值。但卡洛·奇波拉指出，这不适用于1816年以前的英国和1853年以前的美国的小硬币。见 *Money, Prices*, p. 27。

112 马克·布洛赫，*Esquisse d'une histoire monétaire de l'Europ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54), p. 50。

113 “被后来的加佩王（法国的君主）所咨询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专家是商人，经常是意大利商人以及曾经或同时是与国王和贵族有关的长距离贸易商和放债者；其中经常也有些造币承包者和出售贵金属的人（布洛赫，同上，p. 52）。”

114 “在多数情况下，造币不由国家直接经营，而是承包给私人，这些人用金属铸造成硬币，所用的金属得自其他私人。造币承包商的主要兴趣自然在于为个人谋利，而不是为公用事业。在国王本人经营造币厂时，他也经常是以私人企业家的面目出现，而不是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奇波拉，*Money, Prices*, p. 28。

115 马克·布洛赫引用 15 世纪法国会计部门本身的突出事例：“当它计算皇室帐目之间的转帐时，并不是简单地记下利佛尔(livres)、苏(Sous)和丁尼(deniers)的转帐总数，而是注意附加上相关系数以便考虑到这些货币单位的金属价值在时间先后上出现的修正。由于以前的帐目 416 利佛尔 19 苏 - 图尔努瓦是弱货币……在强（即现行）货币上值 319 利佛尔 19 苏 - 图尔努瓦”*Esquisse d'une histoire*, p. 49。

116 H. V. 利弗莫尔 (H. V. Livermore), “Portuguese History”, 载 H. V. 利弗莫尔主编, *Portugal and Brazil,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Clarendon], 1953), p. 59。

维托累诺·马加尔哈斯·戈丁浩认为葡萄牙激烈的社会斗争的中止 (1383~1385) 与葡萄牙 1415 年对休达(Ceuta)的远征之间有直接联系。见 *L' économie de l' empire Portugais aux XV^e et XVI^e siècles* (Paris: S. E. V. P. E. N., 1969), p. 40。

117 “历史学家认为 14 世纪和 15 世纪的一些大战（包括法国侵入意大利）与贵族收入水平的下降有联系……难道 15 世纪（甚至 14 世纪大西洋诸岛屿的殖民运动）大扩张运动的开端不是属于同一类的事件，难道不是由一模一样的原因引起的吗？我们可以把在东欧的扩张与丹麦、德意志贵族征服斯堪的那维亚的企图看作类似的事件。”玛丽安·马洛维斯特，“Unessai d' histoire comparée: Les mouvements d' expansion en Europe au XV et XVI siècles”，载 *Annales E. S. C.*, XVIII, 5, sept. - oct. 1962, p. 924。

118 见马洛维斯特：“看来清楚的是，在葡萄牙殖民扩张的第一阶段……贵族分子起了主要作用……随着葡萄牙殖民帝国的发展，葡萄牙商人在海外贸易中的份额增加了……这一过程类似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化过程。”

Africana Bulletin, No. 1, pp. 32~34。同样,肖尼援引戈丁浩的论述作为其权威依据,区分出葡萄牙的两种扩张:“一种扩张主要是陆地的,因而由贵族进行,采用政治形式,其代表是夺取休达以及把重新征服延伸到摩洛哥;另一种主要是商业扩张,因而主要由资产阶级沿非洲海岸进行。”*L'expansion européenne*, p. 363。与马洛维斯特一样,肖尼也补充说,他很想把这个解释用于西班牙对美洲的占领。

路易斯·瓦伊塔尔(Luis Vitale)在评价资产阶级的作用时更进了一步,他说:“葡萄牙在1381年就经历了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比法国早4个世纪。通过贸易与佛兰德斯联系起来的里斯本商业资产阶级把封建主拉下权力宝座。革命的最终失败表明资产阶级胜利的条件尚未成熟,但他们的崛起反映在与北大西洋的贸易中,反映在航海家亨利的计划中,而首先反映在15世纪的大发现上。”“Latin America: Feudal or Capitalist?”载詹姆斯·皮特拉斯(James Petras)和毛里斯·塞特林(Maurice Zeitlin)主编的*Latin America: Reform or Revolution?* (Greenwich, Connecticut: Fawcett, 1968), p. 34。

119 “宗教是这些迫害的借口,也同样是它的原因。……正如乔治斯·帕里赛特(Georges Pariset)很久前指出的,[数量规律]更晚一些,也在反对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基督徒中发挥作用。”布罗代尔,*La Méditerranée*, I, p. 380。

120 里奇,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p. 302~303。

121 这种自我定义在伊比利亚半岛自然有长期历史。见查尔斯·朱利安·比什科(Charles Julian Bishko):“8个世纪以来时慢时快反对摩尔人的向南挺进不仅是军事和政治战争的‘伊利亚特’,而首先是中世纪的伊比利亚半岛的重新殖民化。”“The Castilian as Plainsman: The Medieval Ranching Frontier in La Mancha and Extremadura,”载阿奇博尔德·R. 刘易斯和托马斯·F. 麦甘(Thomas F. McGunn)主编的*The New World Looks at Its History* (Austin: Univ. of Texas Press, 1969), p. 47。

122 肖尼, *Séville*, VIII (1), p. 60。

123 “在整个北大西洋,向暖水方向航海的最理想的路线是从里斯本北部到直布罗陀,或者可能从里斯本到摩洛哥北端。只有在这里你才能发现,适时的风,即在信风的最低点的夏至时刻把你从海岸带向公海,带向大洋的深处;你才能发现信风又把你带了回来,发现从秋天到初春中纬度倒转的水流。”皮埃尔·肖尼, *Séville*, VIII, (1) p. 52。在查尔斯·R. 博克瑟(Charles R. Boxer)

的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 - 1825* (New York: Knopf, 1969) pp. 54~55 上有一个有助于理解的地图。见布罗代尔,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et capitalisme*, pp. 310~312。

124 “无可争议,伊比利亚诸国在现代黎明时期所拥有的殖民和商业的巨大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内部贸易在中世纪最后几个世纪的逐步发展。”查尔斯·弗灵顿 “Deux aspects de l'expansion commerciale du Portugal au moyen âge”, 载 *Revista Portuguesa de História*, IV, 1949, p. 170。又见查尔斯·弗灵顿, “The Rise of Spanish Trade in the Middle Ages”, 载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 1, 1940, pp. 44 - 59。米歇尔·莫拉特提出类似的观点, 见 “L'économie européenne aux deux dernières siècles du Moyen - Age”, 载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Firenze: G. B. Sansoni, 1955), III, *storia del medioevo*, p. 755。

安东尼奥·H. 德奥里维拉·马克斯 (António H. de Oliveira Marques) 阐明了 13 和 14 世纪葡萄牙与佛兰德斯贸易的性质, 见 “Notas Para a história da feitoria Portuguesa na Flandres no Século XV”, 载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II, *Medioevo* (Milano: Dott. A. Giuffrè - Ed. 1962), pp. 437~476。他指出, 早在 1308 年布鲁日就出现了葡萄牙“民族”, 货物也由葡萄牙船只运输。(见 p. 451) 又见戈丁浩, *L'économie portugaise*, p. 37。

125 K. M. 潘尼迦 (Panikar) 指出热那亚从 13 世纪开始就有夺取印度贸易的欲望。“最终, 热那亚通过西班牙和葡萄牙打破威尼斯人的垄断和穆斯林的封锁……”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London: Allen & Unwin, 1953), pp. 26~27。尽管这个说法对解释威尼斯垄断地位的下降过于简单化(我们将在第 6 章中分析), 潘尼迦正确地指出了热那亚在这方面的长期欲望。

126 查尔斯·弗灵顿, “Italian Influence in Iberian Colonization”, 载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XXIII, 2, May 1953, p. 199。

127 同上, p. 200。

128 见弗吉尼亚·劳 (Virginia Rau), “A Family of Italian Merchants in Portugal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Lomellini”, 载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Milano: Istituto Edit. Cisalpino, 1957), p. 718。

129 弗灵顿,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p. 205。另见查尔斯·弗灵顿, “La colonie italienne de Lisbonne et le développement de l'économie métropolitaine et coloniale portugaise”, 载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Milano: Istituto

Edit Cisalpino, 1957), I, pp. 615~628。

130 弗吉尼亚·劳,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p. 718。

131 同上, p. 719。斜体字是后加的。

132 “(葡萄牙)国内市场的建立在14世纪达到高峰,并第一次遇到严酷的限制。这也许因为葡萄牙属于富裕的伊斯兰地区,因而不得不把交换维持在高于西欧的活动水平上,即一种主要以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交换……因而,正是那些流离失所、群起反抗庄园主的疯狂剥削、因为货币购买力下降以致破产,并向往沿海大城市的农民们,对这些商业城市的富裕和贸易的发展作出了贡献。”J-G. 达·西尔瓦(Da Silva), “L' autoconsommation au Portugal (XIVe - XXe siècles)”, 载 *Annales E. S. C.*, XXIV, 2, mars - avr 1969, p. 252。斜体字是后加的。

133 “(葡萄牙领先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整个15世纪葡萄牙是个联合王国,实际上绝无内争,法国则困扰于百年战争的结束阶段——1415年是阿让库尔之战和(葡萄牙)占领休达以及同勃艮第敌对的一年;英国苦于同法国的战争和玫瑰战争;而西班牙和意大利则苦于王朝和国内其他动荡。”C.R. 博克瑟, *Four Centuries of Portuguese Expansion, 1415 - 1825* (Johannesburg: Witwatersrand Univ. Press, 1961), p. 6。

134 “在封建制度下,一个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是国王的私有财产,正如农奴是陪臣的私有财产一样。……国王及其陪臣扩大其法院司法权,扩大其田地耕种,扩大其军事征服就像寻求利润的冒险一样。后来,大量封建精神和法律形式被用于海上扩张。”弗雷德里克·C. 莱恩, “Force and Enterprise in the Creation of Oceanic Commerce”, 载 *Venice in History*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Press, 1966), pp. 401~402。

135 见费尔南·布罗代尔,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et Capitalisme*, p. 24。

136 肖尼, *Sèville*, VIII, (1), p. 50。

137 小林恩·怀特 (Lynn White, Jr.), “What Accelerat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the Western Middle Ages?” 载 A.C. 克龙比 (A.C. Crombie) 主编的 *Scientific Chang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 p. 277。

138 “一个地区能够有所发明的主要因素是发明之前的发明。把这个假定运用于整个中世纪就会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西方比较伟大的创造力与下述事实有关:拉丁基督教世界比东方(拜占庭和伊斯兰)历史上所受到的震撼要深刻得多,从3世纪到10世纪出现一浪接一浪的蛮族入侵,扩张和不时的时间

歌,等等……西方……是一个熔化的社会,可以随时流进新的铸模中。它容易改变,也愿意改变(同上,p.282)。”

139 卡洛·奇波拉, *Guns and Sails in the Early Phase of European Expansion, 1400-1700*, London: Collins, 1965, pp. 106-107。

140 见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Commentary on Lynn White, Jr., ‘What Accelerate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Western Middle Ages?’” 载 A. C. 克龙比主编的 *Scientific Chang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a), p. 32。

141 李约瑟, “Poverties and Triumphs of Chinese Scientific Tradition”, 载克龙比主编的, *Scientific chang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b), p. 139。斜体字是后加的。

142 见博伊斯·彭罗斯 (Boies Penrose), *Travel and Discovery in the Renaissance, 1420-162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 Press, 1952), pp. 269-270。

143 见李约瑟, “The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Vessel Control”, 载 *Scientia*, XCVI, 99, May 1961, pp. 165-167。在把这篇文章提交第五届海运史学术讨论会时, 李约瑟特别被问及关于 W. G. L. 兰德尔斯 (W. G. L. Randles) 独立发明的可能性。他的答复是他肯定怀疑此种可能性。尽管如此, 要拿出否定的证据, 向来也是困难的。见 “Discussion de la communication de M. Needham”, 载李约瑟, “Les contributions chinoises à l’art de gouverner les navires”, *Colloqu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maritime*, 5e, Lisbonne, 1960, (Paris: 1966) pp. 129-131。

144 见威廉·威利茨 (William Willetts), “The Maritime Adventures of the Great Eunuch Ho”, 载科林·杰克-欣顿 (Colin Jack-Hinton) 主编的 *Papers on Early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Singapor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1964), p. 38。

145 “在 1405 年前后, 太監统帅郑和带领一支有 63 艘海船的船队起航, 访问了南海的许多地方……在随后 30 年中, 进行了 7 次这样的远征, 每次都带回关于地理和海路的丰富信息以及大批来自各岛和印度的产品……这些远征的原因不得而知; 可能为了平衡已经干涸的沿陆路进行的对外贸易, 或者是为了提高皇朝的威望; 甚至, 如官方历史所载, 为了寻找前一个皇帝即他的侄儿^[1] (事实上, 此人已秘密地出家当了和尚, 多年后, 在下一代政权中被

[1] 指明成祖朱棣的侄儿建文帝朱允炆。朱棣于建文四年 (公元 1402 年) 夺去皇位。——译者

发现)。不管怎样,远征像开始一样又突然停止,原因同样不明。不管其中是否涉及太监和儒家官僚的长期不和,其结局是把印度洋贸易让给了阿拉伯人和葡萄牙人。”李约瑟,*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I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54), pp. 143~144。

146 张天泽, *Sino - 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 to 1644* (Leiden, Netherlands: Brill, 1934), p. 30。

147 “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动员数百艘海船和数万人力的惊人远征的实际结果是什么呢?简短的答案绝对没有。明朝中国人不是帝国建设者。他们的政治权威们没有关于与殖民政权不可分割的实际政治是如何可怕的概念。他们没有使命感,没有“狂飙运动”的思想。理论上,天子统治整个世界(整个“天下”,即“天底下的万物”),他使大臣们认为,只要他们自己出现在处于文明世界边缘地区的一切野蛮人面前,就足以由在位的天子降临而带来太平盛世。”威利茨,*Papers on Early South - east Asian History*, pp. 30~31。

148 同上, p. 37。

149 同上, p. 38。

150 见 G.F. 赫德森 (G.F. Hudson), *Europe and China* (London: Arnold, 1931), p. 197。是否也可能是人口北移的结果呢?“这种地区分析表明,中国(明朝)南部人口的减少(1200万,南京除外)几乎恰好为中国北部(900万)以及西部和西南部(300万)的人口增加所平衡。”奥托·B. 范·德·斯普伦克尔 (Otto B. Van der Sprekel), “Population Statistics of Ming China”, 载 *Bulletin of the SOAS*, XV, Part 2, 1953, p. 306。

151 “现代中国史学家们把长江到珠江沿岸设防的工程比作防止鞑靼人从北部入侵的长城。这显然是夸张的说法。但是,必须维持耗资巨大的沿海防务以对付不断的骚扰,这无疑是明朝国库的一大负担,也可能……有助于中国放弃其向印度洋的大规模探险 (p. 126)” C.R. 博克瑟,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 7。

乔治·桑瑟姆 (George Sansom) 从日本方面来看这一现象,发现一个很有启发的类似欧洲的现象。“毫无疑问,中国和朝鲜都曾遭受倭寇劫掠之苦……这部分地是中国人的过错,因为他们反对对外贸易,而日本当局原本会很乐意进行合法贸易的。但是,这也同样是为什么幕府(日本中央政权)不愿意彻底镇压海盗行为的原因。中国人的和平意愿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幕府可能像伊丽莎白女王对待弗朗西斯·德雷克 (Francis Drake) 爵士一样,在不同情况

下把海盗头目时而看作强盗,时而看作海军舰长。此外,对海盗采取行动有赖于幕府控制西部军阀,而在1400年以前,义满(将军)的权力还没有牢固建立起来。” *A History of Japan: Vol. II 1334—1615*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 Press, 1961), pp. 177~178。

152 “(人们)会为14世纪中国人在(印度尼西亚)群岛发挥的重要作用感到吃惊……当这一海洋贸易的垄断转到穆斯林手中时,中国船只开始消失。其中可能有某种联系……” M. A. 迈林克-罗洛夫兹 (Meilink-Roelofs), *Asian Trade and European Influence in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 between 1500 and about 1630* (The Hague: Nijhoff, 1962), p. 25, p. 74。

153 见 R. 塞瓦兹 (R. Servoise), “Les relations entre la chine et l’ Afrique au XV^e siecle”, 载 *Le mois en Afrique*, No. 6, juin 1966, pp. 30~45。

154 肖尼, *L’ expansion européenne*, p. 335。

155 同上, p. 336。

156 同上, pp. 338~339。

157 “在蒙古政权被推翻以后,明朝似乎对南部地区人口过剩的压力作出了强烈的反响。” *Bulletin of the SOAS*, XV, 范·德·斯普伦克尔, p. 308。请注意, 范·德·斯普伦克尔与赫德森相反,他把蒙古威胁的下降看作重点北移的原因。

158 在马克斯·韦伯 *The Religion of China*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一书的术语表中,汉斯·格思 (Hans Gerth) 写道:“俸禄:一个官员从国家或教会土地或其他公共收入中得到收益的权利。韦伯称这类官员为‘受俸者’,称一个建立在受俸者组织上的政治社会体系为‘俸禄制度’(p. 305)。”埃里克·沃尔夫 (Eric Wolf) 从世袭(或“封建”)统治与俸禄制统治对农民的意义角度,讨论了这两种统治的区别。见 *Peasants*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66), pp. 50~52。

159 韦伯, *Religion of India*, pp. 70~71。

160 约瑟夫·R. 列文森 (Joseph R. Levenson) 主编, *European Expansion and the Counter - Expansion of Asia, 1300 - 1600*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67), pp. 131~132。

161 韦伯, *Religion of China*, pp. 61~62。斜体字是后加的。

162 欧文·拉铁摩尔描述了满洲里对明朝中国的这种贡赋关系在16世纪是如何运转的:“在明朝衰落时期,朝廷接见‘进贡使团’变成了占中国人便宜的一种手段。‘进贡者’带来数以百计的随从,其费用由中国政府支付,以提

高其政治地位。同时,他们携带‘非贡品’来作交易,这就减少了中国边境商人的利润。”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第2版 (Irvington-on-Hudson, New York: Capitol Publishing Co. and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40), p. 124。可把这种自我毁灭的政治安排与葡萄牙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对海外野蛮人的赤裸裸的殖民行径,即韦伯称作的“掠夺资本主义两相比较”。同上, p. 135。

163 奇波拉, *Guns and Sails*, p. 117。

164 威廉·西奥多·德巴里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主编的“Introduction”。*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70), p. 24。他在这本书中的另一篇文章“Individualism and Humanism in Late Ming Thought”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想:“一种带有明显现代特征的个人主义思潮出现了,它与大规模的社会和文化力量结合在一起,是16世纪王阳明学说中自由和人道主义运动的产物。因此,儒家思想虽然是主要的传统,而以现代眼光看,独裁体系,却证明有能力完成如同……中世纪基督教在西方个人主义崛起中那样的功能(p. 233)。”

165 “1368年把蒙古元朝撵下宝座的起义和明朝建立政权是中国反对蛮族的民族运动。”罗兰·莫斯尼尔, *Les XVIe et XVIIe Siècles, Vol. IV of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Civilisation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4), p. 520。

166 同上, pp. 527~528。

第二章 欧洲的新劳动分工

——大约 1450—1640 年

正是在 16 世纪中，某种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欧洲的世界经济体开始出现。这一资本主义早期阶段最奇怪的方面，是资本家没有在世界面前炫耀他们的旗帜。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不是自由企业制度，也不是个人主义、或科学主义、或自然主义、或民族主义。作为世界观，以上这些都要到 18 或 19 世纪才能成熟。似乎能达到盛行程度的意识形态就是国家统制主义 (statism)，即国家利益至上。为什么资本主义这种没有任何国界的现象的延续一直靠各强大的国家的发展？这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问题。但这里不存在自相矛盾，而是恰恰相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鲜明特征是：经济决策主要面向世界经济体的竞技场，而政治决策则主要面向世界经济体内的有法律控制的较小的组织——国家（民族国家、城市国家、帝国）。

经济和政治的这种双重导向，也可称之为“差别”，是各个集团在表明自己合适身份时的混乱和神秘化的根源，这种身份是集团利益合情合理的、理性的表现形式。然而，既然对经济和政治决策分开或单独讨论会变得毫无意义，这就尖锐地提出了一些如何分析的问题。我们将尝试把两者连贯起来论述，不时地提到它们的联系，并恳求读者在明显看到整个综合性的结果后才作出判断。无疑，我们将在很多地方有意或出于其他原因而违反我们的连贯性原则。但至少这是我们编写本书的组织原则。即使看起来我们在论述中把较大的体系看成是资本主义的表现，而各个较小体系是国

家统制主义(或者,用当前时髦的术语讲,是民族发展)的表现,我们也决不否定具体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国家只有在世界体系发展的背景下才能发展,才能被人们理解。

社会各阶级和各种族(民族、宗教)集团也是这样。它们也是国家的和世界体系构架内的社会存在,同时或有时也以矛盾的方式存在着。它们起着那时代的某种社会组织的作用。现代阶级体系在16世纪才开始形成。

然而,什么时候才算是16世纪?如果我们记得历史的世纪并不必然与年代学的世纪相同。这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这里我将完全采纳费尔南·布罗代尔的看法。因为他的看法建立在扎实的学术知识的基础上,也因为似乎与我所见到的资料非常符合。布罗代尔说道:

我怀疑……一个人们没有详细说明的16世纪,这个16世纪究竟是一个还是几个,人们在什么基础上理解它的统一性?我看“我们的”16世纪分成两个,如吕西安·费夫尔和我的非凡的老师亨利·豪泽所划分的。第一个16世纪开始于约1450年,结束于约1550年,第二个16世纪开始于同一年代而延续到1620年或1640年。¹

从不同国家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纪,开始点和结束点是不一样的。然而,把欧洲的世界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认为1450—1640年是个富有意义的时间单位,在这段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创立起来了。诚然,用布罗代尔的话来讲,这个世界经济体是“巨大而又微弱的”²。

这个欧洲的世界经济体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也是难以回答的,因为历史的大陆并不必然与地理的大陆相一致。在16世纪末,欧洲的世界经济体不仅包括西北欧和地中海的基督教地区(包括伊比利亚),而且包括中欧和波罗的海地区。它也包括南北美

洲某些地区；新西班牙，安的列斯群岛，地峡地区，秘鲁，智利，巴西——或者不如说那些在西班牙或葡萄牙有效的行政控制下的美洲各个地区。大西洋岛屿和非洲海岸的少数几个飞地或许也包括在内。但不包括印度洋地区；不包括远东，除了某一时期的菲律宾部分地区；不包括奥斯曼帝国；不包括俄国，或者俄国至多是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勉强包括在内。不存在清晰容易划分的分界线，但我认为以下看法是非常富于成效的：把16世纪的欧洲世界看成由两个以前更加分离的体系所构成。即以意大利北部各城市为中心区的基督教地中海体系³和欧洲北部、西北部的佛兰德斯—汉萨商业网。附属于这个综合体的，一边是东埃尔比亚(East Elbia)、波兰和其他一些东欧地区，另一边是大西洋岛屿和部分新大陆。

纯粹从空间上看，这是一次大扩张。仅就欧洲列强正式的海外殖民地而言，肖尼已注意到在1535—1540年5年中西班牙就实现了对西半球一半多居民的控制。并从那时到1670—1680年的时间内，欧洲人控制下的地区从大约300万平方公里增到约700万平方公里（一直到18世纪末，这一扩张成果才稳定下来）。⁴不过，空间的扩张并不意味着居民的增加。肖尼谈到了某种“人口剪刀差运动”，那时欧洲的人口增长，按地球上总体水准来衡量的话，“大部分被广大欧洲以外地区的人口下降所抵销”。⁵所以，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的土地与劳动力的比率极大地增加了，这是欧洲在这个现代早期的关键性阶段有能力维持持续经济增长的一个根本因素。但扩张的结果不只在于改善土地与劳动力的比率。它还使大规模积累农业生产合理化所需的基本资金成为可能。16世纪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的最明显特征之一是长期的通货膨胀。即所谓的价格革命。这特定的通货膨胀与资本积累过程的联系曾是现代历史学的一个中心论题。我们打算从上述观察问题的模式出发，尝试探究这一讨论的种种复杂性，以便我们将能够解释欧洲的世界经济体在该时期末所达到的特殊的劳动分工。

欧洲价格运动周期模式的背后有丰富的历史内容，虽然学者

们对周期的日期划分意见不同，对引起周期的原因的看法更为纷繁，但这一现象的真实性是大家都同意的。我们把近来关于各类价格变化的两种一览表⁶结合在一起，得到如下结果：

1160—1260——迅速上升

1260—1310(1330, 1380)——持续高涨

1310(1330, 1380)—1480——逐渐下降

1480—1620(1650)——高

1620(1650)—1734(1755)——跌落

1734(1755)—1817——上升

如果我们把我们现在关注的这段期间，即上述列为“高”价格的16世纪进一步分成几个时期来考察，这里面当然也有几次经济波动。皮埃尔·肖尼在对塞维利亚的贸易署的档案进行坚实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下述周期。塞维利亚当时是横渡大西洋的贸易的关键集散地。通过衡量贸易量(总的和具体的商品)和价值，肖尼分成四个时期：

1504—1550——稳步上升

1550—1562/3——相对地有所衰退

1562/3—1610——扩大

1610—1650——衰退⁷

贸易量和贸易价值的衡量标准不是完全一致的，“商品流动量的指数却以某种夸张的方式与价格的波动相比，而价格特有的曲线比贸易量的曲线较为平稳”。⁸肖尼认为把上升的中止点定在1610年，以便与埃尔萨斯给德意志定的中止点(1627)及与波斯蒂默斯给低地国家定的中止点(1637)相配合。因为，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欧洲不同地区衰退开始的时间并不一致。⁹

这种时间的差异提醒我们，世界经济体仅仅处于形成的过程中。肖尼指出，15世纪时欧洲的三个贸易区(地中海基督教地区、西北欧和东欧)处在三种不同的价格水平上，分别排列成从价格昂贵地区到不昂贵地区。世界经济体的创立可以明确地用这时的价

格变化来衡量：该世纪“开始时，价格上涨的趋势令人难以置信地蔓延开来。最后，各地价格差距消失”。¹⁰这最后的结果虽然是以后的事，但16世纪内这种差距的弥合过程还是可以看见的。如果说在1500年时地中海基督教地区与东欧的价格差距是6比1，那么到1600年，差距就只有4比1了。¹¹而到1750年，进一步变成2比1。亨里克·萨姆索诺维茨说，从16世纪早期开始，普鲁士的工资和价格变得“越来越接近”西欧，“尽管普鲁士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方向正好与西欧相反”。¹²这里用“尽管”好呢，还是应说成“因为”？^[1]

对16世纪价格上涨的一种主要解释是J. 汉密尔顿伯爵提出来的。开始时，他是就16世纪安达卢西亚的价格问题的论证而言，后来就更广泛地把它用于西欧：

在所考察的这一整个时期，美洲金银的输入和安达卢西亚的价格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从1503年到1505年开始到1595年止，金银的输入持续增加，而从1503年到1597年，安达卢西亚的价格也不断上涨。价格上涨最剧烈时，也是金银输入最多之时。金银输入与价格的相互关系在1600年后继续存在，这时两者均处于下降中。¹³

到1960年，汉密尔顿的理论受到多方面攻击，既有实证的也有理论的。但他甚至更强有力地再次宣称：

从百分比上讲，[从1500年以来金银供应的增加]可能比价格的变动远远大得多。所以，比寻找价格革命的辅助原因更重要的是，……需要解释为什么价格不能与贵金属存量的增加保持一致。由于商品价格上涨而金银变得相对便宜，越来越多的金银用于制造盘子、装饰品、珠宝饰物和其他非货

[1] 作者这里的意思是：普鲁士走与西欧不同的道路，是世界经济体系下新的劳动分工的结果。——译者

币的用途,这使一些新来的金银不再成为货币。……[与东方]贸易逆差的清算吸收了大量硬币。……从用农产品交地租转为用货币支付。从部分地以实物支付工资转为用货币重新计算,以及物物交换的衰落也都有助于对金银供应的增长起到中和作用。¹⁴

正如许多批评者所论述的,汉密尔顿利用了欧文·费希尔关于货币量的理论。该理论认为 $PQ=MV$,并含蓄地假定 V 和 Q 始终是一个常量(P 是价格, Q 是货物和服务的数量, M 是货币量, V 是周转速度)。他们怀疑这个假设,要求进行经验的探究。

对汉密尔顿的一种主要批评意见是英格丽·哈马斯特伦提出来的。其理由是,汉密尔顿把先后次序搞错了,正是经济活动的增加致使价格上涨,然后这种上涨成了采矿业活动频繁起来的原因,使金银供应日益增加。对此,汉密尔顿反驳说:

显然,通常“因某种原因而产生的经济活动”所引起的“价格上涨,”……会抑制而不是增加贵金属的开采。它通过生产成本的上涨,连同固定造币厂收买贵金属的价格,而达到这一点。此外,通过使非货币用途的金银比用于造币的金银相对贱一些的办法,结果价格上涨会减少而不是增加现有金银用于铸成货币的数量。¹⁵

但为什么造币厂的价格要事先固定下来?这是一个决策问题。而且,当用如此低廉的真实成本(在特定劳动形式下)突然间可获得大量金银时,阻拦贵金属的生产,会使那些在扩张时期靠贵金属流入而能获利的人们(包括西班牙国王)很少得到好处。如同哈马斯特伦指出的,根本问题是,如何解释贵金属投入何种用途的原因:

为什么西欧需要美洲的金银？不是把它作为财宝窖藏起来，也不是把它用作圣地的装饰品（亚洲人和美洲土著就是这样用的），而是使其构成流通中硬币的重要增加成分——即作为支付媒介。¹⁶

Y.S. 布伦纳论证说，看看英国的资料就能证实哈马斯特伦的意见。他发现商品价格水平的变化，虽与欧洲贵金属的增加或不增加有关，但更主要的在于库存贵金属的使用方式”。¹⁷ 他注意到，价格上涨早于美洲财富的到来。¹⁸ 布伦纳论证说，人们应该看到在费希尔等式中所有 4 个因素在这时期都是可变的。

结论是，16 世纪上半叶的价格上涨是以下原因造成的：流通中的货币周转率加快和货币量增加与农产品供应的相对减少相结合。这加剧了对农产品的需求。……

工业发展和商业扩张，土地投机和合法的资金市场二者的急剧兴起以及更多的社会阶层从自给自足的农村过渡到城市化社会，他们为了取得食物必须依赖市场（货币供应），这些都导致了货币流通速度(V)的增加。¹⁹

所以，布伦纳论证说，正是资本主义活动的普遍兴起说明了为什么把金银用于铸币。

这种认为金银的流入造成经济扩张的理论假定，即使周转速度(V)和商品量(Q)不固定，它们至少也有上限。有任何证据可证明上一点吗？就商品和服务的量而言，这理论似乎并不很有道理。比如，豪尔赫·纳达尔提醒我们，它意味着充分就业：

当所生产的商品量不能增加时，只有到那时，任何支出的增加（等于货币量和货币周转速度的乘积 [周转中的货币总量]）才会成比例地转变为价格上涨。²⁰

于是让我们不要假定说，金银的增加直接导致价格上涨，但我们可以假定，这只是通过它增加就业的能力来实现的。比如，米斯基明表明，“早期重商主义者对金银流动的迷恋”的意义在于：

贵金属的流入大概总是使人员和资源投入工作，同时倾向于增加可用于政府财政的资金，并由此降低了战争费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

根据各国减少实现充分就业的束缚以使金银的流入转变成真正的经济增长的能力（不管这能力是由于制度的或自然环境的原因），²¹

来分析哪些国家最有效地利用了金银。

什么是对周转率的限制？W.C. 罗宾逊在与迈克尔·波斯坦的论战中，提出了金银的流动是否能解释 14 世纪衰退的问题。他说，在具有原始信用机制的经济条件下，“V 是某种与每个硬币在每段期间实际进行的物质流动密切相关的东西。……”所以，13 世纪的扩张受内在限制的支配，因为它是由于窖藏的金银进入流通及周转率加速而刺激起来的：

最终……货币供应达到了上限，除了每年略有增长，周转速度已不再可能增加。到了这一点，贸易就收缩了，也感觉到价格下降的压力。早期阶段轻松活泼的乐观主义和高利润让位于悲观主义和紧缩措施。把货币窖藏起来开始作为对付价格下跌的一种办法。简言之，价格下降趋势能产生价格自我巩固的努力。²²

波斯坦在答复中争辩道，罗宾逊认为货币供应曾达到上限的观点

事实上是错误的。因为把窖藏的货币抛到市场上的做法一直在进行。他还说信用机制比罗宾逊所讲的更为灵活，商人的心理姿态在这时期是个较小的经济变量。²³但他基本上未对某种界限的概念提出异议。米斯基明却提出异议，在我看来他的异议是有价值的：

很可能这也是真的：在特定的信用机构的发展水平下，任何特定数量的金银一旦被铸成确定数量的硬币，其周转速度存在一种自然的上限。然而，缩小金银借以流通的货币单位的容量而使其贬值的作法，结果会提高加在金银流通速度的自然的和制度上的上限。在国内移居、城市化和专业化所产生的联合压力下，看来可能会也确实很像是会出现下述情况：当贬值减小了周转速度技术上的限制时，这新得到的自由会被利用起来，而且，16世纪欧洲发生的许多次贬值，相对于贬值本身的水平来说，并不总是按贬值比例增加价格，而更多地是通过周转期来增加价格。²⁴

所以我们回到这一事实：正是那种全面的制度对解释扩张来说才是关键性的，这种制度具有结构上的各种压力，要求作出某些种类的政治决策（如贬值）。关键性的不是单独的金银，而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背景下的金银。在查尔斯·弗灵登看来，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特有的各种垄断形式，大半能说明价格持续飞涨的原因：

在解释周期性危机时，我们应为投机保留很大一块地盘。“垄断”不能调整价格运动。除了对某些奢侈品（酒），短期内它对价格“不加控制”。它对价格运动的灾难性方面负有责任。无疑它间接地影响了这种特有的运动。每次高涨之后，部分由于人为的原因，价格没有跌落到危机前的水平。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垄断有助于强化和促进长期的涨价。²⁵

那么,金银流入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不是在提一个抽象的道德问题。宁可说,问题是,金银流入的种种后果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创立是有益的吗?汉密尔顿看来确实在说:是的。而约瑟夫·熊彼特的想法却完全相反:

货币金属供应的增加,不会比任何其他种类货币的量的自主增加更会在经济上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很明显,这些影响将完全依如何使用那些新增加的货币而定。……[关于16世纪]首先要考察的是,就西班牙本身而言,那些新的财富……是为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提供资金服务的。……金银的流入提供了……一种避免使货币降低铸造成色而贬值的方法(否则它必定早就会采取那样的贬值措施)并由此成为战时通货膨胀的工具,和我们熟悉的由此必然发生的贫困化和组合过程的媒介。接着而来的是价格惊人地上涨,这是整个事件的链条中我们同样熟悉的一环。……

在所有这些方面,资本主义的演变确实受到了流通媒介膨胀的影响,但最终是迟滞而不是加快它的发展。法国和英国的情况不同,但只是因为各种影响更为淡化。……英国工业和商业的一切成就持久的原因,都与贵金属的过剩无关。……²⁶

上述论点是基于熊彼特的下述坚定的信念:“通货膨胀的影响——作者认为历史和理论都把这件事夸大了,但他没有加以否认——几乎完全是破坏性的。”²⁷虽然我们可以不接受熊彼特的偏爱,即主张加强理性的控制,以防止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的刺激性、有时是无法预料的后果;但他激烈的长篇言论,确实迫使我们意识到,通货膨胀的普遍影响远远不如分化的影响那样有意义。²⁸

首先,让我们看看食品供应的问题。在普遍经济扩张的情况下,为什么农产品供应却减少了?第一,这不是从绝对意义上来讲

的。²⁹ 仅仅当人们分别考虑各国的数字(如英国或西班牙),而不是作为统一体的欧洲世界经济体的数字来考虑时,才存在一种相应于居民增长而言的食品供应的减少。在工业扩张的那些国家,有必要把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转为种植马料,³⁰ 但人们仍在那里生活,只是到这时,他们才日益采用来自波罗的海地区来的谷物。³¹ 不过,那儿来的谷物更贵,因斤两明显不足,还要加上运输费用和经纪人的利润。

那末,不断增长的金银供应真的与此无关吗? 完全不是,它为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的扩张执行着重要的职能。它支撑着扩张势头向前挺进,保护着这一仍然弱小的体系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米歇尔·莫里诺指出,在中世纪欧洲,小麦价格的升降是收成好坏的直接反应。16世纪时真正发生的与其说是金银引起的价格上涨,不如说是金银阻止了价格下跌。³² 确实,卡洛·奇波拉怀疑是否真的存在过价格上涨。³³ 他宁可相信对16世纪的金融结构真正有意义的不是价格的上涨,而是利息率的下降。他表明,在中世纪晚期,利息率大约是4—5%,在1520年和1570年间最高升到5.5%,然后在1570年和1620年间突然跌到平均为2%。金银降低了货币的价值。³⁴

看来,这里面意味着,关键性的因素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出现,该体系如马克思所说的,可以说是“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的创立。³⁵ 主要的变项是资本主义作为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的出现。或许在以下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是唯一的形式:它一旦建立起来,其他的“生产方式”所以能存留下来起作用是因为它们适应于资本主义产生的政治社会构架。至少在这时记住这一点是有益的:“不是存在一个资本主义实体,而是存在几个欧洲的资本主义实体,每个资本主义都有其自己的区域和范围。”³⁶ 确实,正好就是这种几个资本主义存在的事实,使金银贮存的增加具有重要性,因为开始时地中海欧洲金银的流通速度正好快于西北欧洲。如布罗代尔和斯普纳所总结的,“当从流通速度并从欧洲经

济的不一致的背景来考虑时，货币量的理论就有了意义。”³⁷

这把我们带到了汉密尔顿论点的后半部分。不仅存在价格上涨，而且还有工资滞后。这里关于价格上涨是否存在以及为什么会上涨的争论也是很大的。³⁸汉密尔顿争辩说，随着价格上涨，工资和租金未能保持与价格同时增加，因为制度上存在种种僵化的规定。这发生在英国和法国，但不包括西班牙。³⁹它造成了一条鸿沟，某种发横财的机会，是16世纪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

在英国和法国，价格革命引起的价格与工资间的巨大差异，剥夺了劳动者此前一直享有的很大一部分收入。这些财富被转移到有条件享有这种收入的人手中。……地租的增长像工资一样，也落在价格后面；所以地主没有从劳动者的损失中得到任何东西。……

这样得来的横财，与来自东印度贸易的收益一同为资本设备的逐步建立提供了资金。可以获取的利润十分惊人，这刺激着人们狂热地谋求建立资本主义企业。⁴⁰

地租滞后于价格的主张曾受到特别有力的攻击，著名的有埃利克·克里奇用16世纪英格兰的史实提出反驳，⁴¹还有其他人根据其他地方和其他时间的史实提出的反驳。⁴²到1960年，汉密尔顿已退向地租，但他坚持这不影响该论点的力量：

人们可以假定，在价格革命开始时所支付的工资相当于产品成本的 $\frac{3}{5}$ 。……我猜测，1500年的地租可能占英国、法国国民收入的 $\frac{1}{5}$ ；随着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以提高地租的发展趋势，以及偶尔发生的废除合同以便提高地租，使地租与价格互相抵补，因而在价格革命中地租上涨与价格上涨一样快。国民收入余下的有 $\frac{1}{5}$ 成了利润（包括利息）。由于占国民收入 $\frac{3}{5}$ 的成本费远远落在猛涨的价格后面，……在16世纪

时英国和法国的利润大概曾达到很高的水平，在四五十年间继续维持在这种高水平上。此后，虽然已有下降，但直到 17 世纪末继续维持着价格和工资间的巨大的鸿沟。⁴³

对汉密尔顿工资滞后的假定，还有其他各种批评意见。⁴⁴ 约翰·内夫提出一种重要论点，他说有记载可查的货币工资数目不等于全部工资，因为还存在实物工资，实物工资可能曾推广开来填补这一鸿沟，而且小麦的涨价幅度也可能是所有基本商品中最大的：

首先，至今为止搜集的物价指数夸大了价格革命中生活费用的增长。第二，工人饮食费用的增长在某种程度上不是由他们自己承担，而是由雇主承担。第三，许多工人拥有小块土地，他们能从中获取某些必需品的供给。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可能有能力把较多的货币工资花在食物以外的其他商品上。⁴⁵

费尔普斯-布朗和霍普金斯都同意，工资收入的恶化可能不曾坏到像表面看到的那种程度，因为谷物价格增长确实快于制成品。所以日益重要的食品加工产品价格上涨幅度小于基本谷物，而且制造方面的改进进一步减少了加工这类产品的成本。⁴⁶ 可是，更近（1968 年）的证据倾向于进一步证实这一般的假设，即在 16 世纪的西欧实际工资是下降的，这些证据是基于比汉密尔顿原先使用的更好的资料，也包括费尔普斯-布朗和霍普金斯提供的证据。⁴⁷

表一是斯利彻·范巴恩编制的，它惊人地例证了实际工资的下跌。⁴⁸ 这里是一个英国木匠的实际工资，按天计酬，用千克/小麦表示。

表一 英国木匠的实际工资^a

1251—1300	81.0
1300—1350	94.6
1351—1400	121.8
1401—1450	155.1
1451—1450 ^[1]	143.5
1501—1500 ^[2]	122.4
1551—1600	83.0
1601—1650	48.3
1651—1700	74.1
1701—1750	94.6
1751—1800	79.6
1801—1850	94.6

^a 1721—1945 = 100

从上表可得出三个事实。英国木匠的实际工资 1850 年与 1251 年没有显著区别。工资的最高点(155.1)直接处于“延长的”16 世纪^[3]的前面,而最低点(48.3)则处于该世纪的结束时期。在 16 世纪里收入的下跌幅是巨大的。如果我们认识到 1601—1650 年间英国的工资在欧洲城市工资级别中决不是最低的,这种下跌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这种引人注目的工资下跌本身是三种结构性因素的后果,这些因素属于 16 世纪时尚未消除的前资本主义经济特征的残余。皮耶路易吉·齐奥卡仔细详尽地说明了这些结构因素的运行在一个急剧通货膨胀的时代如何使实际工资减少,以及为什么在以后的世纪中这些结构性因素大部分都被消灭了。这三个因素是:货币错觉和没有连续出现增加工资的要求;工资由习惯、合同或法令固定了下来;延迟支付工资。关于货币错觉,齐奥卡指出,除了短暂的间

[1][2] 原文如此,1450 和 1500 似应为 1500 和 1550。——译者

[3] 指前面讲的 1450—1640 年为 16 世纪。——译者

歇期外物价一直在逐渐上涨，而人们不能及时准确地觉察这一点。甚至即使人们觉察到了这一点，仍然只能在相隔一段时间后协商提高工资问题。此外，16世纪在习惯或契约被破除的地方，国家常加以干预，禁止提高工资。最后，那时，许多工人一年的工资一次发清，这在一个通货膨胀的时代意味着使货币贬值。到了20世纪，货币错觉会由于工会组织，教育的普及，物价指数的存在和对付通货膨胀积累起来的经验所抵销。此外，工人有了政治组织，使国家限制工资的政策更为困难，当然，频繁地支付工资也是经过长期争取才获得的权利。但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工人们还没有上述操纵这种局面的能力。⁴⁹

16世纪时，由于建立在世界资本主义早期形成基础上的欧洲的世界经济体中的结构性因素的作用，工资增长落后于物价。能使这种似乎有理的分析确立起来的，不仅由于经验资料的证实，也由于两个著名的经验上的例外情况：意大利中部、北部和佛兰德斯诸城市。卡洛·奇波拉注意到，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在意大利，相对于与之竞争的各个国家的工资水准而言，劳动力的费用看来是太高了。”奇波拉认为原因在于“工人们”的组织成功地强行提高了工资水准，而这种水准与劳动力本身的生产率不相称。⁵⁰同样，查尔斯·弗灵登发现，在比利时的城市里，16世纪时工资紧紧跟着小麦制品的价格上涨。⁵¹为什么会这两个例外？恰恰是因为它们是“古老的”贸易中心。⁵²因而工人们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力量相对强大。由于这个原因，这些工人能够较好地抵制迅速发展的牟取暴利的行为。此外，还有资本主义的道德观的“进展”也已部分地打破了那些旧的结构。不过，恰恰就是工人们的“力量”和资本主义道德观进展的结果，意大利北部和佛兰德斯这两个地区的城市会走向衰落。它们不再是16世纪的工业中心，为那些终于要成功的新来者让开了道路，即让路于荷兰与英国，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法国。

一些工人（就是那些处于最“先进”地区的）能够比其他工人更有效地抵制工资收入的恶化，这种想法导致我们考虑：什么是由长

期的通货膨胀所决定的“损失中的差别”？⁵³ 皮埃尔·维拉尔提出了一个简单的中心—边缘交替的理论。⁵⁴ 不过，这种两分法太简单了。因为这不仅是边缘的工人，即那些我们将看到的 16 世纪在拉丁美洲和东欧从事劳动的人们是损失者；同时，大部分西欧地区的雇佣工人也是损失者，即使或许——我们知道吗？——不像东欧的工人损失的那么多（拉丁美洲工人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因为此前他们完全未曾处在同一个经济体系内）。J.H. 埃利奥特证明说，在劳动报酬的下降方面，西班牙工人的地位与其说接近英国工人，还不如说接近东欧工人。⁵⁵

这样，如果排成一个序列，波兰工人挣得最少，西班牙工人居第二位，大概威尼斯工人挣得最多，英国工人恰好处在其中，那里代表着正处在成为中心地区进程中的半边缘地区。费尔普斯—布朗和霍普金斯提出，考虑上述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一种方法是，看到“使[英国]雇佣劳动者的钱包缩小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工场作坊与乡村农场间的交换比率发生了变化。”⁵⁶ 一方面，变化了的交换比率最沉重地压在雇佣劳动者身上（无土地的或者土地上的收入是次要的）。费尔普斯—布朗和霍普金斯估计，16 世纪上半叶，这样的雇佣劳动者在英国已占从事劳动的居民的 1/3。如同他们所说的，“与雇佣劳动者贫困化相对照的是，出卖农产品或者以可提高租金的方式出租农场的那些人富起来了。”⁵⁷ 这使我们对汉密尔顿关于工资滞后是资本积累的直接根源的论点产生某种怀疑，或者至少是使我们注意到这一事实：西欧的土地所有者在资本积累中是一个关键性的中间人。

但汉密尔顿的基本观点仍被广泛接受，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表示赞同。通货膨胀造成收入再分配——这是一种复杂的再分配，因为欧洲的世界经济体具有多重层次。不过，这只是一种向政治上最弱小的各部分成员征税的方法，以便为资本积累提供资金，然后某个人就可以把其用于投资。⁵⁸ 特别是，地主能经常发现新的方法榨取农民的钱物。⁵⁹ 记住，这一论点不仅说明了发利润横财

的事实,也说明通货膨胀鼓励了投资。⁶⁰

这把我们带向另一个对工资滞后假说持有异议的约翰·内夫的论点。他声称,法国的例子说明该假设不能成立。法国的工资滞后虽然像英国一样,但法国在这时期在工业上没有重大的进展。⁶¹内夫指出,他不只是在比较法国和英国的情况,因为从工业发展的方面来看,他断言,法国的情况类似德意志南部和西属尼德兰,而英国则类似荷兰、苏格兰、瑞典和列日。这就是说,与“文艺复兴时代”相比,前者都是减速,而后者都是加速的。然而在法国;木材和劳动力不比英国贵,而是比英国便宜。可能问题在于它们太便宜了。⁶²

但内夫的这种比较只是否定了汉密尔顿关于英国与法国是否能在真空中进行比较的论点。不过,如果把它们摆进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的背景中来理解,这种比较也只是把法国的实际工资水平放在一个处于西班牙和英国的工资水平之间的地方。于是,我们能够论证的是,在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体内,工人在生产收益中应得的分配份额急剧减少,这比率因不同的国家而异。对当地从事投资的阶层来讲,最佳情况应该是得到边缘地区因低工资而产生的利润,此外,又能得到他们自己所在地区因中等工资(相对于高工资而言)而产生的利润。中等工资水平是最佳的。因为一方面,鉴于太高的工资水平(威尼斯)使利润率过低;另一方面,太低的工资水平(法国,特别是西班牙)损害了新兴工业所需要的当地市场的发展。在欧洲范围的体系内,英国和荷兰最接近这种最佳情况。不过,把膨胀的利润投资于新工业则颇有利可图,这种可能性的绝对必要的条件就是这一事实:这是一个世界经济体。

通货膨胀因而是重要的,因为它既是强迫储蓄从而也是资本积累的机制;也因为它有助于通过体系不平均地分配这些利润,即把这种不均衡分配投向我们称之为正在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的中心区,这一中心区是从“老的”发达地区的边缘区与半边缘区分化出来的。

这幅图景的另一方面,如读者可能已经从有关通货膨胀的影

响的讨论中看到的,是在世界经济体中出现了劳动分工,不仅是农业和工业工作之间的分工,而且也是农业工作中的分工。而与这种专业化一起演变的是不同的劳动控制形式和不同的居民阶层类型。这对“国家”,亦即政治活动的竞技场来说,又有种种不同的政治后果。

到此为止,我们已试图解释:为什么扩张的是欧洲(而不是,比如说,中国),为什么在欧洲葡萄牙走在前头,为什么这种扩张竟要伴随着通货膨胀。我们实际上还没有勇敢地探讨为什么这一扩张竟是如此有意义的问题。这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世界经济体的创立成了现代工业发展的先行官,而以前世界历史上创立的,明显地根植于相对丰饶的农业部门和相对强大的官僚政治机器的那些帝国,却未能朝这个方向走去?如果说这是由于技术,那只不过是迫使我们发问:什么样的制度会这样鼓励技术的发展(记住李约瑟关于西方技术突然进发的隐喻)。E.L. 琼斯和 S.J. 伍尔夫明确地把以下事实看成 16 世纪的显著特征: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为实际收入的增多开辟了道路,这在历史上是破天荒的:

历史上不甚令人惬意的教训之一是,技术上进步的和自然条件丰饶的农业并不必然造成人均实际收入的持续增长,更不用说促进工业化。具有复杂农艺的一些文明古国提供了一个出发点。但在中东、古罗马、中国、中美洲……没有一个国家带头迈向了工业经济。它们的耕作组织在技术上是超等的,……同样,它们生产的谷物的数量也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它们的社会史只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生产过程不断循环的故事,对广大民众来说,实际收入虽有降有升,却没有持续的增加。……

那些拥有灌溉农业的帝国具有的显著事实是,巨大的国家权力机器建立在一个官僚阶层的基础上,这个官僚阶层关心于反对外部的威胁和在内部维护自己的地位。纵观历史,以

下结论当是公正的：这些官僚阶层的目的在于维持并确实成功地维持了那些巨大的农民社会，即在漫长的世代中把人口稠密的居民保持在事实上的自体趋衡状态。⁶³

两位作者表明，在这样一种体系内，生产总量的增长只是产生“静态的扩张”，⁶⁴即随着社会生产者有能力供养的居民的增加，仍维持着以同样相对的比例和同样绝对的方式向社会不同的阶级分配产品。

16世纪的世界经济体的社会结构是怎样的？为什么这种结构能引起另一种性质的社会转变，这种转变很难称之为社会的自体趋衡。无疑，16世纪的官僚阶层的动机与上述琼斯和伍尔夫给更早时期的官僚制描述的动机并无多大的差别。如果说其结果是不同的，这想必是世界经济体的组织形式与以前诸帝国有所不同。其不同点在于存在着不同性质的社会压力。我们可以特别看一看这种体系中产生于统治阶级间的种种紧张关系，以及由此而提供给广大居民的各种机会。

我们已经概述了我们认为迫使欧洲走向扩张的各种压力。扩张具有它自身的紧迫需要性。成功地扩张的能力是一种功能，既是在国内维持社会相对团结的能力（具有分配报酬的机制这一功能），又是在遥远的地方使用廉价劳动力的安排组织能力（劳力便宜这一点更加重要；由于运输费用的原因）。

扩张也包括不平衡的发展，因而包括报酬上的差别。不平衡的发展是在多层次总体结构中进行的，每个层次就双峰曲线分配报酬方式而言是两极化了。这样，具体地说，在16世纪存在着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的中心地区对它的边缘地区的差别，在欧洲中心地区内的各国之间，在各国内部的各地区、各阶层之间，在地区内的城乡之间，最后在地方性更突出的各个单位之间，都存在着差别。⁶⁵

这个体系的休戚相关最终建立在这种不平衡发展现象上，由

于这种多层次结构的复杂性，为多层次的身份及各政治力量的经常重新组合提供了可能性；同时，这还提供了潜在的允许技术发展和政治转变的动荡，并且还允许包括各种反抗的意识形态混合，不管这种反抗是消极怠工、暴力、还是逃避。这样一种社会地位和社会报酬的多层体系大体上与一套分配生产任务的复杂体系相互关联：粗略说来，那些养育劳力的人支撑着生产粮食的人，生产粮食的人支撑着生产其它原料的人，生产其它原料的人支撑着那些搞工业生产的人（当然，由于工业主义的发展，这种生产中互相服务的阶梯随着工业生产的不断精确化而变得更为复杂）。

这一时期的世界经济体已拥有各种各样的劳动者：有甘蔗种植园奴隶，也有从事那种只需挖去表土的简单采矿工作的奴隶们。有在种植谷物和采伐木材的大领地上劳动的“农奴”。有经营各种商品性农作物（包括谷物）的“佃农”，也有进行某种农业生产的雇佣劳动者。这些人占欧洲的世界经济体范围内居民的90—95%。有一个新的称为自耕农(yecman)的农民阶层。此外，还有一个小小的中间阶层——监工，独立的工匠，少数熟练工人——和一个人数极少的统治阶层，这最后一群人包括现存的贵族和资产阶级显贵(patrician bourgeoisie)（当然也包括基督教教士和国家官僚），他们监督大片土地的经营，操纵维护社会秩序的一些主要机构，并在某种程度上追求其自身悠闲潇洒的生活。

稍加考虑就会发现，这些职业门类在那新生的世界经济体中，并不是按照地理区域和种族任意分布的。这一职业分布图在西半球很快形成一个来源于非洲的“奴隶”阶级，和一个分成两部分的“农奴”阶级：主要的一部分在东欧，较小的一部分是西半球的美洲印第安人。西班牙和南欧的农民大部分是“佃农”。雇佣劳动者几乎全是西欧人。大部分自耕农的来源甚至更为狭窄，主要来自西北欧。各中间阶层的种族来源是泛欧洲的（外加梅斯蒂索人和穆拉托

人)^[1]，在地区上则分布于所有卷入世界经济体的地方。统治阶级也是泛欧洲的，但我相信任何人都能证实来自西欧的特别多一些。

为什么各种不同的劳动组织方式——奴隶制、“封建制”、雇佣劳动制和自我经营 (self-employment) ——都同时存在于世界经济体中？因为每种劳动控制方式对特定的生产类型都是最合适的。但为什么这些劳动组织方式集中在世界经济体的某一地区？——边缘区是奴隶制和“封建制”，中心区是雇佣劳动和自我经营，并且我们将会看到半边缘区是分成制。因为劳动控制方式极大地影响着政治体制（特别是国家机器的力量）和本土资产阶级兴盛的可能性。世界经济体正是建立在下述的居高临下地位之上，即当时存在三个不同区域，每个区域确实有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的话，就不可能确保剩余产品流入西欧以保障其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

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些劳动控制方式，看看它们与生产和生产力的关系，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它如何影响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兴起。我们从奴隶制开始讲起。在中世纪欧洲，奴隶制并不陌生，⁶⁶ 但与 16 世纪至 18 世纪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的相比则无足轻重。一个原因是欧洲在此以前在军事上力量薄弱。正如马克·布洛赫所指出：

经验证明：在所有的动物繁殖中，人的繁殖是最难的一种。如果把奴隶制应用于大规模的企业而可以得到收益，市场上就必须存在充足的廉价人体。但你只能通过战争或者掠夺活动才能得到人体。所以，一个社会很难把经济主要建立在驯养人的基础上，除非它附近存在能打败和劫掠的更弱的社会。⁶⁷

[1] mestizos 和 mulattoes，前者是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后者是白人与黑人的混血儿。——译者

要使这样一种低下的生产方式产生利润,要求有足够大的市场,这样,人均榨取的利润虽少,但通过大量生产仍可获得好的收益。奴隶制之所以能在罗马帝国时代繁荣兴旺,之所以是一种突出的早期资本主义的制度,适合于前工业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各个阶段,其奥秘即在于此。⁶⁶

可是,当大规模的企业要求熟练技能时,奴隶是没有用的。奴隶只能从事被迫去做的工作,而不能期望他们做得更多。一旦要求熟练技巧,找到另一些劳动控制方法会更为经济。真正可称为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是那些监工管理要求投资不多的产品,因为“收获”这些产品只要求很少的技巧。这主要是蔗糖,后来是棉花,它们适于在残暴的监工下聚集起一群非熟练的劳动力。⁶⁹

甘蔗的栽培是在地中海的岛屿上开始的,后来转移到大西洋岛屿上,然后横越大西洋到了巴西和西印度群岛。伴随着甘蔗而来的是奴隶制。⁷⁰ 跟随甘蔗的转移,奴隶阶级的种族成份也随之改变。⁷¹ 但是,为什么非洲人成为新的奴隶呢?这是由于种植园所在地区的土著劳动力供应枯竭,因为欧洲需要从人口相对众多的地区获取劳动力资源,这一地区容易进出,距离使用劳动力的地区又较近。但这些劳动力必须是来自欧洲的世界经济体以外的地区,这样,欧洲人对那个养育这些劳动力的地区所造成的经济后果可以漠不关心,而这些劳动力却可以作为奴隶进行大规模转移。适合这一条件的地方首推西非。⁷²

可供选择的劳动力的供应来源显然是日趋枯竭。强加在地中海和大西洋岛屿上的单一作物制毁坏了这些岛屿的土地和居民。它们的土地被剥夺,它们的居民或者消失(例如,加那利群岛上的关切人[Guanches]),或者移居他处以逃避强制政策。⁷³ 加勒比海岛屿上的印第安居民完全消失了。新西班牙(墨西哥)的居民急剧减少。1519年人口接近1100万,到1650年只有大约150万⁷⁴。巴西和秘鲁的人口下降看来同样引人注目。⁷⁵ 这种人口下降的两个直接原因,看来是疾病以及欧洲人饲养的家畜对印第安耕种业造成的损

害。⁷⁶但纯粹因劳累过度而引起的死亡，特别是在矿山上，想必也是重要的。结果，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很早就不再在西半球吸收印第安人来补充奴隶劳动力，而开始完全依赖从非洲输入在种植园劳动的奴隶。大概运送奴隶的费用仍没有高过防止剩余的土著居民逃跑的潜在费用。而且，这些剩下的土著居民迅速死亡殆尽。

可是，并非到处都使用奴隶。出现“再版农奴制”的东欧没有使用奴隶。在出现新形式“地租”和雇佣劳动的西欧也是如此，即使在西属美洲许多经济部门也没有使用奴隶。在这些部门，西班牙人采用一种叫做委托监护制的制度，而不是奴隶种植园制。为什么西属美洲并非所有的生产部门都使用奴隶？可能因为非洲虽能供应大量的奴隶，毕竟不是无限量地供应，而且监督土著奴隶在经济上合算（从世界范围内可以得到的非土著奴隶劳动力的数量有限，使之成为唯一合理的另一种可能的选择），但在很可能爆发反抗的情况下，就不值得了。在从事基本生产的工人中，因为谷物生产、家畜饲养和矿山劳动比蔗糖生产需要更高的技巧水平，情况就更是这样。由此对这些劳动者因稍微减少一点烦苛的劳动控制就必须作出补偿。⁷⁷

由于东欧的“再版农奴制”和西属美洲的委托监护制——如果我们注意到它们是同时发生的——曾被许多人称为“封建主义”，从而造成了许多无益的争论，争论的是这些制度是否以及怎样才可与中世纪欧洲“古典的”封建制度相比较。这种辩论本质上围绕着封建主义确定的特征是等级所有制关系（把封地授与陪臣，亦即以保护与地租和服役相交换）；还是领主对其农民的政治管辖权；或者是大领地的存在，在这种大领地制度下，农民每年至少有一部分时间以某种方法“被强制”在领地上劳动，换取某种最低限度的报酬（其形式是现金，实物，或者是土地所有权，以便生产可供自用或出售的产品）。显然，也可能是各种方式相结合，⁷⁸此外，不仅下一级对上级的义务的形式可能有变化，从属的程度也可能有变化，而且如同多布所言，“前者的变化决不总是与后者的变化相配合。……”⁷⁹

从我们这里展开的观点来看，中世纪欧洲的封建主义与16世纪东欧和西属美洲的“封建主义”有根本不同之处。前者的地主(领主)基本上是为地方经济而生产，其权力产生于中央权力的衰微。他的高压剥削的经济界限，取决于他供养自己家庭的需求和战争费用，供养家庭的需要又取决于社会上认为最合适的奢侈程度(这都因时而异)。后者的地主(领主)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而生产，其高压剥削的经济界限取决于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的曲线。他所保持的权力不是由于中央权力衰微，而是他自己所拥有的实力，至少从他对农业劳动者的力量方面来看是这样。为避免任何混淆，我们应把这种“农奴制”形态称为“强制的商品性农作物劳动制度”(coerced, cash-crop labor)，虽然这个词既不完整而又笨拙。

“强制的商品性农作物劳动”是一种农业劳动控制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国家实施某种法律程序要求农民至少有部分时间在为向世界市场出售某种农产品的大领地上劳动。正常情况下，这种领地为个人“所占有”，通常由国家授与，但不一定是世袭财产。国家本身也可能是这种领地的直接所有者，但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一种改变劳动控制手法的倾向。⁸⁰使用这么一种定义，是因为在16世纪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的边缘地区，这种劳动控制形式成了占支配地位的形式。

亨利·H. 斯塔尔非常清楚地说明东埃尔比亚(通常的称呼是东欧)的“再版农奴制”从根源上讲是“资本主义的”。⁸¹

其他许多作者承认，我们称为“强制的商品性农作物劳动”是一种资本主义的而不是封建主义经济的劳动控制形式。塞尔西奥·巴古讲到西属美洲时，称其为“殖民资本主义”。⁸²路易吉·布尔费雷蒂讲到17世纪的伦巴第时，称之为“封建资本主义”。⁸³路易斯·瓦伊塔尔讲到西班牙的大地产时，坚持称它们“正是资本主义的企业”。⁸⁴埃里克·沃尔夫认为，一个领主“在其领地范围内维持祖传的控制方法”与把其领地办成“一个资本主义企业”，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不一致之处。⁸⁵

这种劳动控制方式，14世纪时威尼斯人在克里特岛和其他地方已开始使用，⁸⁶到16世纪，在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的整个边缘和半边缘地区广泛传播。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关键的各方面是双重的。第一，我们看到“强制的商品性农业劳动”，如彼得罗·瓦卡里所指出的，不是“一种可以界定为纯粹是过去的封建奴役形式的重新组合；”⁸⁷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方式。第二，它也不是这种情况：即资本主义的和封建的两种组织形式相互并存，或者可能永远并存下去。世界经济体不是这种形式就是另一种形式，当它是资本主义的性质时，那些带有某种形式上类似封建关系的关系，必须按照那些资本主义制度的指导原则重新界定。⁸⁸西属美洲的委托监护制和东欧的所谓“再版农奴制”确实都是这样的。

西属美洲的委托监护制是西班牙国王直接创造出来的。它在意识形态上为自己的政策辩护的理由，是使那儿的居民基督教化。该制度的主要功能是为矿山、大牧场提供劳动力，同时也为委托监护主和城镇及矿山的工人生产蚕丝和提供农产品。⁸⁹委托监护制本来是一种封建特权，一种向印第安人征取劳役服务的权力。⁹⁰

当早期的委托监护主过度压榨而威胁劳力供应时，——比如，西印度群岛的印第安人相继死亡殆尽——1549年一份王室的公文把委托监护的义务由劳役改为纳贡，于是从一种近似于奴隶制的状况过渡到我们可以称之为强制的商品性农作物劳动制度。西尔维奥·萨瓦拉指出，在新的规定下，被委托监护的人是“自由的”，但暗中仍有强制的威胁。⁹¹当“自由”导致劳动力供应显著下降时，法律进一步发生变化，实行了强迫的工资劳动制度，在新西班牙称为“摊派劳役制”(cuatequil)，在秘鲁名叫“米塔制”(mita)。⁹²

结果，西属美洲的委托监护制（如同巴西的领主制）[donatária]一样，很可能起源于封建的赏赐，但尽管这是真的，它们很快通过法律上的改革而转变成资本主义企业。⁹³这一事实看来进一步证实：设置“摊派劳役制”和“米塔制”正是为了避免封建制度的

离心性质。⁹⁴

地主在强制农民劳动积累资本时，不仅有西班牙王室做他的后盾：正常情况下，他还与印第安村落的传统首领达成协议，通过这种协议，后者认可殖民统治者推行强制措施的权利。⁹⁵在很大程度上，酋长的力量自然是前殖民形式的一种职能。⁹⁶当我们认识到事实上劳动者是如何得到报酬时，酋长或部落首领（cacique）的利益就相当清楚了。阿尔瓦罗·哈拉叙述了1559年建立的制度在智利运行的情况。那儿从事淘金的印第安人获得劳动成果的1/6作为报酬，这种付酬方法名叫“塞斯穆”（sesmo），但不是付给单个的印第安人，而是付给他们作为成员的那个集体。⁹⁷这种以集体为单位支付报酬的制度带来的种种不平等的分配，人们是可以猜想到的。

东欧的强制的商品性农作物劳动制度的建立比西属美洲更缓慢一些。在美洲，这种制度是作为征服结果而建立起来的。12世纪和13世纪，东欧的大部分地区（即东埃尔比亚、波兰、波希米亚、西里西亚、匈牙利、立陶宛）都经历了同一个过程：土地不断地授与农民，封建劳役义务不断转变为交纳货币的义务，如同西欧一样，还有普鲁士亦然。⁹⁸这一过程因同一原因而到处发生：繁荣和经济扩张对农奴与领主的契约关系产生了影响。⁹⁹可是，14世纪和15世纪的衰退在西欧和东欧导致相反的结果。在西欧，如同我们已看到的，这导致封建主义危机。在东欧，这导致“庄园的反动”。¹⁰⁰16世纪的“再版农奴制”和一个新的地主阶级的形成使“庄园的反动”臻于顶点。¹⁰¹

同样的现象（经济衰退）为什么会发生相反的反应？就因为我们在前面已阐明的那些原因，这两个地区变成了一个更复杂的单一的体系（即欧洲的世界经济体）中互相补充的组成部分。在这个体系中，东欧扮演为正在工业化的西方生产原料的角色，用马洛维斯特的话来讲，结果是，有了“一种本质上接近于古典殖民地类型的经济体”。¹⁰²看一下波罗的海贸易的实质就足以证实这一点。从

15世纪起，由东欧流入西欧的产品首先是大宗商品（谷物、木材、后来还有羊毛），虽然古老的出口商品毛皮和蜂蜡继续出口。而从西欧流入东欧的是纺织品（奢侈品和中档的都有）、盐、酒、丝绸。到15世纪末，荷兰已依赖波罗的海的谷物，没有东欧的木材、大麻、沥青、动物脂，荷兰人和英国人的海运事业将不可想象。另一方面，小麦已成了东欧最重要的出口产品，甚至出口到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¹⁰³

诚然，从欧洲的贸易关系上看，这种贸易方面的殖民形式此前就已存在。威尼斯与其殖民地的这种关系增加了它的势力范围。¹⁰⁴还有中世纪晚期作为商业中心的加泰罗尼亚。¹⁰⁵13世纪和14世纪，葡萄牙是一个主要为佛兰德斯生产初级产品的国家，¹⁰⁶如同英国为汉萨而生产。¹⁰⁷生产初级产品以交换较先进地区的手工业产品，正如布罗代尔讲到粮食时所说，始终是一种“经常性[地理]变动的边际现象”。而且如他所说，“诱饵每次都是现金”。¹⁰⁸16世纪时所不同的是，一个初级产品市场围绕着一个大的世界经济体而存在。斯利彻·范巴思确定了以低地国家为中心的国际谷物市场创立的年代，但只定在1544年。¹⁰⁹

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布罗代尔关于“经常性变动”的看法，那么我们必须提问：一个地区是如何被定为边缘而不是中心的。在中世纪，甚至在中世纪晚期，东欧注定要成为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的边缘这一点还是不很清楚的。许多作者曾强调东西欧发展的可比性。比如，雷金纳德·R. 贝茨这样讲到14世纪：奇怪的是[原文如此！]不仅法国，英国的大地主喜欢农奴用硬币来支付……而且捷克、波兰和匈牙利的地主也一样。……”¹¹⁰同样，Zs. S. 帕赫论证说，晚至15世纪，“[匈牙利]农村发展的趋势基本上与西欧国家的一致。……”¹¹¹

那么，为什么又向不同方向发展？人们可以按照地理的和社会的因素来回答，以说明西欧的突然兴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做了回答。人们也可以部分地按照东欧的特征来回答。例如城镇的软弱就是一个重要因素。¹¹²在13世纪时这只是一只小小的区别，而16

世纪时的区别已经很大。由于具有互补性的分向发展的结果，西欧的城镇日益壮大而东欧的城镇相对来说则弱一些。或者人们也可以强调这一事实：13世纪末，西欧相对地说已广泛耕种土地，而东欧的大量空地仍没有开发。¹¹³在这些“新”开辟的土地上，建立强制的商品性农作物劳动制度的过程相对而言也容易一些。

但接着我们必须问一下，为什么连东欧和西欧之间也会存在细微的区别？这恐怕只有一种地缘政治的解释：中世纪晚期土耳其和蒙古—鞑靼人的人侵造成很大的破坏，使居民移居出境和造成各方面的衰落，特别是削弱了国王和大诸侯的相对权威。¹¹⁴

这里起作用的是这一普通原则：即在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开始时小小的区别会得到加强而稳定化，并被视为“传统”。这种“传统”过去是而且始终是现今的而不是过去的一个方面，是现今的创造而不是过去的创造。说到现代世界，安德烈·冈德·弗兰克表明：“经济发展和低度发展是同一硬币的两面，两者都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内部矛盾的必然结果和当今的表现。”¹¹⁵但这一过程比弗兰克指出的要普遍得多。如同欧文·拉铁摩尔所说的，“文明产生了野蛮”。¹¹⁶在谈到定居民族与世界边疆地区的游牧民族的关系时，拉铁摩尔认为要理解这两种民族的起源和关系就应当观察

从原先统一的社会中形成的两种不同的类型。为方便起见，我们可以称其为“进步的”（农业变成为主业，狩猎和采集降为辅助）和“落后的”（仍以狩猎和采集为主，农业仍然为辅”，另一种情况是还没有越过散漫不经的阶段）。¹¹⁷

这样，在时间上的一个特定时刻，由于此前一系列因素的作用，如果一个地区在关键因素上对另一个地区拥有轻微的优势，这就存在一种可能性：各种事件结合而成的局势使得这种轻微的差别在决定社会行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然后这种轻微的优势转变成巨大的差异，甚至在上述局势过去以后，这种优势依然保持着。¹¹⁸15世纪和

16世纪欧洲的情况就是这样。在商业和工业世界经历巨大的地理和人口扩张的情况下，欧洲的某些地区能够积聚这种扩张带来的利益，如果在获得这种利益所必需的那些活动中，这些地区能实现专门化，它们所得到的就会更多。这样，它们在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时只需花较少的时间、人力、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不是东欧会变成西欧的“面包篮”，就是西欧会变成东欧的“面包篮”。任何一种解决方案都要服务于这一局势中的“位置需要”。轻微的优势决定了这两种可能性中哪一种会奏效。就在那一点上，15世纪的轻微优势在17世纪时变得大为悬殊，到19世纪则变成了巨大差别。¹¹⁹

东欧在采用劳动力控制方式时决定性的考虑因素是，如果增加生产就会有大规模赢利的机会（因为有世界市场存在），再加上相对短缺的劳动力与大量未使用的土地相结合。¹²⁰这样，16世纪时，东欧和西属美洲的部分经济部门，强制的商品性农作物劳动是吸引人的（有利可图）、必然的（从地主自身利益的角度看）和可能的（从所需工作的类别看）。奴隶制因劳动力相对缺乏而行不通。本土劳动力总是像奴隶那样供应不足，因为太不容易控制，而从遥远的地方输入奴隶，对于像小麦这类需要做很多管理工作的产品是不合算的。毕竟，买奴隶的成本不可忽视。

尽管可以假设农民宁愿接受强制的商品性农作物劳动制度，而不接受奴隶制，因为在形式上的自由中含有最低限度的尊严和特权，但强制的商品性农作物劳动者的物质条件并不一定比奴隶好。确实，费尔南多·纪廉·马丁内斯认为在西属美洲委托监护制下的印第安人受到的待遇比奴隶还差，大半是由于这些被委托监护者的社会状况没有保障。¹²¹阿尔瓦罗·哈拉同样证明，委托监护制下印第安人的生活标准，从智利的情况来看，是“处于最低水平，并且是从这个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的。”¹²²

这样，在刚出现的世界经济体的地理—经济的边缘地区，有两种基本活动：主要是出产金银的矿山；与主要是生产某些食物的农

业。16世纪时，西属美洲供应的主要是前者，¹²³东欧主要供应后者。二者在技术上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其社会制度都是剥削劳动力。剩余产品全部输往中心地区，多寡不等地供应各地居民的需要。企业的直接利润，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在中心地区的各集团、国际贸易各集团和地方管理人员（包括诸如波兰的贵族，西属美洲的文职人员和委托监护主）之间分配。大部分居民从事强制劳动，这是一种由国家及其司法机构所规定、约束和实施的制度。使用奴隶的程度取决于这样做是否有利可图，凡是这种法律上的极端主义做法花费太大的地方，就采用形式上自由但法律上强制的办法，雇用劳工在商品性农作物的领地上劳动。¹²⁴

在世界经济体的中心区，在西欧（包括地中海基督教世界），情况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居民密度原来就要大得多（甚至在诸如14世纪和15世纪的人口下降时期）¹²⁵，因而农业更为精耕细作。¹²⁶此外，部分土地又从耕地改为畜牧之用。结果是较少需要强制。这部分地是由于较熟练的劳动力可以用较轻的司法强制，更确切地说，强制较为间接，通过市场机制来实行；部分地还由于饲养牲口时特别在冬天通常会引诱人们把留作家畜的粮食改为人用。庄园制度没有能力有效地处理这类事情。¹²⁷但16世纪是一个肉类需求不断增加的时期，这种需求富有弹性，它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扩大。¹²⁸而且在人口增加时，对谷物的需求也会增加。结果很简单：家畜饲养有利可图，但要求不同的社会劳动组织来进行。当它不这样发展时，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畜牧生产实际上就要减少。¹²⁹所以，它在全欧洲范围都成为一件增进劳动分工的事情。

在中心地区，城市繁荣、工业诞生，商人成为一支重要的经济政治力量。诚然，整个16世纪农业仍是大多数人的活动（确实，西北欧直到19世纪，南欧直到20世纪都是这样。）。然而，东欧和西属美洲16世纪时被卷入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这不仅提供了资本（通过掠夺和高利润率），而且解放了中心地区的一些劳动力去从事其他非农业的专业化工作。中心地区的工作的职业门类是非

常复杂的。它包括与边缘地区一样的那些工作的很大一部分残余（如谷物生产）。但中心的趋势是朝向多样化和专门化，而边缘地区的趋势却是单一经营。

16世纪的扩张不仅是地理扩张。它也是经济扩张——即一个人口增长、农业生产率增加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期。它标志着欧洲和有人类居住的世界其余地区建立了正常的贸易联系。¹³⁰到这一世纪末，经济看起来与从前不大一样，也要好得多。¹³¹

到此为止，我们已描绘了刚出现的边缘地区的生产形式和劳动控制形式，明确或不明确地把它与中心作了对照。事实上，中心地区的结构比我们在这一问题上已指出的要复杂得多。可是在讨论这一复杂性以前，我们应当先看一下第三结构地带即半边缘地区的农业生产情况。我们尚未阐明半边缘地区对世界体系运转的作用。此时只要这样说就够了：就许多经济标准而言（但不是全部），半边缘地区代表了从中心到边缘这个连续统一体中的一个中间点。这在经济制度的复杂性、经济报酬的等级（平均水平和范围）以及最主要的是在劳动控制方式上，尤为属实。

边缘区（东欧和西属美洲）采用强迫劳动（奴隶制和强制的商品性农作物劳动）。中心地区，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自由劳动日益增加。半边缘区（正在向边缘化结构转变的以前的中心地区）发展了一种中间形式即分成制，获得广泛传播。固然，在其他地区也有分成制。但在这一时期它只是在半边缘地区才居于首要地位。意大利的分成制（*mezzadria*）和普罗旺斯的分成制（*fâcherie*）从13世纪以来就已为人所知；14世纪起分成制（*métayage*）出现在法国南部别的地方。14世纪和15世纪，由于庄园领主的经济困难日益增加，领地不断以分成制方式租佃出去，不是整体出租，而是分成小块，能养活一家人而不是一个村庄。达比指出，到15世纪中叶，“在西欧仍能存在的大规模粮食生产企业在哪儿却消失了……。”他把这称为“农村生活的根本转变之一。……”¹³²

可是，为什么转变要采取这种特殊的方式？这就是说，如果说

这种转变是领主受到威胁的结果，那么领主为何不要求国家强迫农民留在土地上，像在东欧那样？而且，另一方面，如果说这是让步，那为什么采取分成制的方式而不把土地转移到小农手中，由小农立即买下土地，或者付一笔固定地租，像西北欧的主要（当然，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那样？

多布按照领主对人口减少和农民逃跑的反应，把西欧和东欧加以比较，认为西欧是领主作出“让步”的区域，而东欧则是“重新强制”的区域，他把这不同的反应归因于“农民抵抗力量的强弱”。¹³³另一方面，伊恩·布兰查德同意农民骚动的程度是一种因素，但认为这是一种较不直接的方式。关键的因素在于是否较易得到劳动力。他认为直到16世纪20年代，英格兰一直缺乏劳动力，在地主没有更好的办法时只好勉强把地圈起来，而立法者确实企图强制劳动者留在原来的土地上。¹³⁴这样，布兰查德指出，当人口减少时英国也采用强制措施。只在人口增加时，农民才爆发出要求实际拥有土地的呼声。

不管哪种情况，农民抵抗的强弱却说明不了问题。因此我们想知道为什么英国的农民比波兰的农民更能抵抗——多布真的相信这一点吗？¹³⁵——为什么领主有的较强，有的较弱，为什么有的国王加强领主权、有的却削弱领主权。在单一的世界经济体中存在着互补性的差异，从这一事实我们很有可能发现其中的道理。对此，我们提出两种解释：在这种趋异发展刚开始时各城镇力量的大小，以及空闲土地的多寡。

根据土地与劳动力的比率，可以复述土地的“空闲”程度。如果有足够的土地，人们可以凑合使用效率较差的生产工具。人们可以从事粗放的农业。可以使用奴隶或强制的商品性农作物的劳动力。精耕细作的农业需要自由劳动。但是为什么那时出现了分成制？显然这是因为形势大约介乎两者之间。

让我们注意：从农民的观点来看，恐怕宁愿接受分成制而不是强制的商品性农作物劳动制度，尽管他们对分成制并非十分愿

意。纯利润是低的,虽然在繁荣时期可能有所上升。通过债务采取强制机制,常常像法律强制一样具有现实性。H·K·高桥由一认为,分成佃农是“半农奴”,是为“高利贷地主”劳动的。¹³⁶布洛赫把法国的发展看成一个农民从领主手中逐渐获得解放却又往回滑动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中世纪晚期一直在进行着。

假如——这当然是一个荒谬的假设——[法国]大革命是在1480年左右爆发,它将通过废除封建义务,而把几乎全部土地都分给广大小农,但是在从1480至1789年的三个世纪中,大庄园又重新建立起来。¹³⁷

可是,为什么一方面不是租佃制,另一方面也不是强制的商品性农作物劳动制,而是分成制?分成制虽有不利之处,与强制的商品性农作物劳动相比,监督管理上更为困难,但它也有鼓励农民努力提高生产率的优点。当然,条件是在没有法律强迫的情况下农民愿意继续为领主劳动。¹³⁸简言之,劳动力充足时,分成制可能比强制的商品性农作物劳动更为有利。¹³⁹

至于租佃制,从逻辑上讲,无疑比强制的商品性农作物劳动更为有利可图。然而有个附带条件:佃户有固定的契约,在通货膨胀时也能获益,至少契约是相对长期的。当然,市场衰退时,情况完全相反。因而分成制是一种风险最小的方式。¹⁴⁰这样就导致分成制在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最有可能被采用。在这里,对变化风险的考虑超过了对交易费的考虑。

但当时正是一个有高度风险的时刻。不断的价格上涨是非常令人不安的。分成制似乎是补救的办法。¹⁴¹在一些地区,农民很幸运地拥有法律上的自卫手段,这些手段使地主推行分成制花费太大,于是,他们发现直接出租更为可取。这样的例子出在英国。舍昂提出,关键是自由持有地,英国有自由持有地,但是在法国就没有。¹⁴²

法律因素并不单独起决定作用。因我们必须解释法国北部和南部的差异，法国北部广泛采用出租土地的办法，南部则盛行分成制。这两个地区的法律本质上是一样的，达比发现差别的关键在于，北方农民比处于“经济萧条状况”中的南方农民相对富裕，南方农民所耕种的土地的生产率，可能没有像北方那样通过改进技术而有所增加。……”¹⁴³

然而，如果这仅仅是个技术问题，我们只须后退一步问一下，为什么某一地区作出的技术进步，会被另一个地理上、文化上都相差不远的地区所采用。布罗代尔提出，地中海欧洲和西北欧的土壤情况根本不同，前者较为贫瘠。¹⁴⁴波尔契涅夫提出，进一步的考虑是卷入世界经济体的程度，而大地产的存在（所以没有分成制）却与高度卷入世界经济体有关。¹⁴⁵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把分成制看成一种次好的选择？由于没有能力一直朝大地产发展，不管是像英国那样基于圈地和租佃制的大地产，还是像东欧那样基于强制的商品性农作物劳动的大地产都不可能，于是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土地阶级选择了分成制这种折衷的办法，¹⁴⁶部分地是作为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创立的回应。这是一种半资本主义企业的形式，符合半边缘地区的实际。

如果半边缘地区一直维持半边缘地位，没有沦为由边缘地区发展而成的完全的卫星国，这不仅是因为土地与劳动力比率高，也可能是因为存在本地资产阶级在经济萧条时期对农业生产发展的特殊影响。迪比指出，在城市商人众多并相对有势力的地区，许多庄园落入这些市民之手，他们寻找土地以防备灾荒，并寻求附属于土地所有权的社会地位，但不愿涉及实际务农的艰辛。把土地以分成制形式交给农民耕种是一种合理的妥协。¹⁴⁷从农民的观点看这种妥协是何等“合理”，但G.E. 德·法尔吉罗尔斯对此表示相当大的怀疑，因为他认为这些城市资产阶级的方向是追求短期的投资利润，结果导致了下一世纪土地荒芜。¹⁴⁸

还有另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是关于最“先进的”地区的。我们

已注意到，城镇工人具有维持自己工资水平的力量，从而意大利北部相对于西北欧而言处于一种不利的工业地位。或许，这种工人的力量同样可以说明，为什么在 16 世纪人口增长期间，行会的种种限制得以阻止农民进入城市受雇，而使农村地区保持数量不相称的劳动力。人口增长产生了削弱农民讨价还价地位的后果。总之，城镇资产阶级的“力量”似曾导致采用分成制更大的可能性，这样，在西北欧的经济进步中可能会发生重大作用的自耕农就没有出现。

现在，让我们转到 1640 年时将处在欧洲的世界经济体中心的那些地区：英格兰和尼德兰，某种程度上包括法国北部。这些地区基于自由或较自由的劳动制度和相对有效规模的生产单位，发展了一种畜牧业和农耕生产相结合的形式。人们可能注意到，西班牙从这条路上起步，然后离开这条路成为半边缘的一部分。这种经济地位转移的原因，我们将在后一章里详细阐述。

在中世纪晚期的危机中，人口下降导致对农产品需求减少，同时城市工人工资随之提高（从而对农村工人来说是一种较好的讨价还价的地位）。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这时西欧的大庄园内的大自营地衰落了。它们不可能像 16 世纪东欧的那样成为商品性农作物的庄园，因为在普遍不景气的经济背景下不存在国际市场。封建主只有两种有意义的选择。一方面，他们可以把封建义务转变成货币地租，¹⁴⁹这会减少成本和增加自营地持有者的收入，但涉及对土地控制方法的逐步改变。换言之，这使从事小规模生产的自耕农的兴起成为可能，他们或作为交固定地租的佃农，或境况较好，成为独立的土地所有者（可以把他看成在购买土地时，能为多年内使用土地而一次性付出一大笔租金的人）。¹⁵⁰那时向领主敞开的另一种选择是把他的土地转变成牧场：养牛或养羊。15 世纪时，羊毛价格和肉类价格似曾更有抵制经济萧条的作用，此外，那时劳动力缺乏而价高，而畜牧业所需的劳动力较少。¹⁵¹

在这一时期，英国和西班牙的牧场都增加了。随着 16 世纪的

经济扩张，小麦看来比羊毛更有优势，¹⁵²但未能胜过养牛。牛不仅提供肉，还有牛脂、皮革和乳制品，所有这些东西的消费都随着繁荣而扩大。¹⁵³关于16世纪时的牧场，特别是牲畜，值得注意的最重要的是，它日益变成地区性的专业化活动。这里的牛多了起来，对这里的大地主是一种优势，也意味着另一个地方的牛有所减少，这又常常意味着那里的农民减少了牛肉和乳制品的消费量，也就是他们饮食的恶化。¹⁵⁴这种过分强调牲畜的情况正好发生在西班牙。两种选择——把自营地变成出租地和把耕地变成牧场——同时并进。后者使耕地更为缺乏，这又使地租价格提高。¹⁵⁵此外，由于耕地变少，耕作又必须更为精细，这意味着劳动力的质量是很重要的，于是进一步诱使人们从劳役租向货币地租转移。¹⁵⁶

16世纪英国、西班牙养羊业的兴起导致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但显得矛盾的是，谋求圈地的不是大规模的土地所有者，而是一种新型的、小规模、独立的土地所有者。¹⁵⁷当然，正是16世纪的经济复苏，使这些小规模的独立的农民得以持续增加。

正如俗语所说的出现了“羊吃人”的情况，养羊业的兴起造成食物短缺，这就必须依靠英国的自耕农更有效的耕作劳动和波罗的海的谷物（强制的商品性农作物）来弥补。¹⁵⁸

此外，日益增加的圈地使农村地区手工业增长成为可能。¹⁵⁹可是在西班牙，牧主团（mesta）根深蒂固，致使小土地所有者不能有太大的进展。我们后面将要看到，查理五世帝国的政策又增强了这些大地主的力量。西班牙不是使用农村中的失业者来发展工业，而是驱逐他们，把他们输往国外。

我们得再花点时间继续讨论这两个问题：一是西欧的农业发展，二是为什么它不能走东欧的道路，即采用强制的商品性农作物劳动的大庄园。归根到底，这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正在出现。保罗·斯威齐把这说成是一种生态上的连续统一体：“接近各个贸易中心，[贸易扩张]对封建经济的影响有强烈的瓦解作用，而离商业中心愈远的地方，这种影响正好相反。”¹⁶⁰这个公式确实很简

单,但这是波斯坦所论证过的并且为多布所同意。¹⁶¹斯威齐的理论是根据可供农民选择的办法提出来的,即农民有能力逃向城市,“接近城市的文明生活”。¹⁶²他忽视了下面这一可能性:在许多边缘地区,例如东欧,农民可以选择逃往边疆地区,那里常常像城市一样地吸引人。确实,恰恰因为农民作出这种选择,所以16世纪时采用了各种司法手段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

农民选择的办法虽曾起过作用,但与土地所有者选择的办法相比,农民的办法差别较小。贵族到哪里去取得最大、最直接的利润?一方面,他能把自己的土地转作其他用场(利润率较高的牧场或者租给小农而坐收货币——两者都意味着要求蠲免封建劳役),并把新得的利润投资于贸易、工业和(或)贵族的奢华消费。另一方面,他可以通过强化大批生产商品性农作物(特别是谷物)的方法,然后把新得的利润投资于贸易(但不是工业和[或]贵族的消费),而谋取更大的利润。¹⁶³在西北欧,前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大;东欧是后一种选择,大半是因为专业生产上的细微区别已经确立,这意味着通过把自己已做得最好的工作做得更精细、更有效率,利润最大化原则已经得到实行,或至少是认为已经实行。¹⁶⁴所以,英国政府当局鼓励圈地,把土地变成牧场(和蔬菜农场),而在东欧则创立了生产小麦的大领地。

至于为什么西北欧的劳动是契约性的而东欧是强制性的,只指出牧场与可耕地使用方式的区别是不够的。因为在上述情况下,西属美洲应该是契约性劳动。不如说,正如我们曾提及的,人口发挥了关键作用。西欧正是这样一种选择,它表现为存在足够的人力资源,而且足够廉价,使地主无须花费太多就能满足其对劳动力的需求。¹⁶⁵在东欧和西属美洲,相对于土地的数量而言,劳动力是短缺的,但在世界经济体存在的情况下,开发这些土地却有利可图。在这种短缺面前,“市场扩张和生产增长既可能导致劳役的增加,又会导致劳役的减少。”¹⁶⁶确实,在西属美洲,正是人口减少这一事实说明了养牛业和养羊业的兴起。16世纪这两者广泛流行,都采

取大规模企业的形式,并由于劳动力短缺,强迫劳动成为这些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¹⁶⁷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货币租佃的兴起意味着什么。请记住,在西欧,正如我们在上一章讨论过的,封建义务向货币地租转变在中世纪晚期就因人口减少而广泛发生。我们不应把这看成是非此即彼的命题。封建义务可以用劳役、实物或用货币来支付,封建主变过来变过去常常是出于自己的利益。¹⁶⁸因此,仅仅是封建地租方式的变化本身并不是关键性的。确实,高桥由一甚至说:这是偶发现象。¹⁶⁹但我看这种说法太过分了。即使在某种程度上,13世纪和14世纪时这可能是真实的,但到16世纪用货币支付封建义务的兴起,无疑演变成一种有意义的区别。因为“超经济”强制的力量不是迫使农村劳动者,而正好是迫使地主比他们自己的意愿走得更远。¹⁷⁰或者至少是这种力量推动了一些地主往这方面走。在扩张时期,存在着对劳动力的竞争。最富有的地方有能力把劳动力从其他地主那里买过来。最小的地主通常选择的余地很少,只有满足于在自己的土地上得到承租人。最长久地坚持古老封建关系的,可能是中等地主。¹⁷¹

中世纪晚期,英、法两国都遵循同一条道路。它们都出现了农奴解放、货币租佃的兴起和与之相关的雇佣劳动者的兴起。但在16世纪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英国继续走这条道路,东欧向“再版农奴制”转移,法国南部转向分成制,法国北部转变似乎突然停止了。如同布洛赫所注意到的:那些到16世纪“还没有获得自由的农村越来越难以获得自由。”¹⁷²

看待这一现象的一种方法,是把它看成对农奴获得自由的能力的一种限制。布洛赫却宁愿把这看成是领主强迫农奴接受租佃协议的能力的一种限制。¹⁷³布洛赫把这解释成英、法两国间先前存在的区别中关键的不同点。在货币经济较早传播和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法国在经济上比英国发达;英国在具有更强大的中央机构这一意义上,在政治上比法国更“发达”。这种情况最终来自这一事

实：英国王权是在征服的形势下产生的，而法国国王必须在真正的封建分裂中逐渐地、一点一点地集中权力。让我们来看看这每个论点的逻辑性。

首先，法国的位置比英国更处于欧洲贸易和技术潮流的中心，因而它的地主阶级发展得较早，封建义务向货币地租的转变过程也发生得较早。¹⁷⁴但因为反对庄园分裂的压力在英国和法国或多或少是同时发生的，结果，英国的庄园在“延长”的16世纪开始时，仍比法国的庄园保留得较为完整。所以，布洛赫的意思是，相对来说，英国的地主比法国地主有更自由地利用大领地进行新的商业化生产的可能性。英国人转向雇佣劳动制度，农奴继续得到解放。法国人必须尽量利用那恶劣的形势，地主们企图靠恢复旧式的压力来增加收入。

第二个论点涉及早在12世纪就已开始的国王与贵族的关系。英国人已对司法系统建立了强大集中的控制，然而这一成就的另一面是，庄园地主虽失去了对犯罪行为的审判权，但他在自己庄园以内得到了充分的权力，在决定农民的土地持有权上可以为所欲为。在14世纪和15世纪，庄园法庭用自己对习惯法的解释来贬低公簿持有权。到15世纪末，当王室法官终于能插手这类问题时，他们发现，“习惯法”允许各种各样的地租形式。

然而，在法国不存在中央的刑事审判。另一方面，庄园主对土地法从来没有独有的权力。所以不可能轻易地破坏地产世袭权。谁是土地的真正“所有者”成了一个含糊不清的法律问题。到16世纪时，有些法学家还心甘情愿地论证说，不能把佃户赶出家门。领主因而不能改变各种地租，只能靠以下办法重新获得土地：篡改、伪造司法文件，通过“重新发现”来扩大缴纳封建租税的义务。¹⁷⁵从长远看，上述差别将是关键性的。¹⁷⁶

所以，看来布洛赫所论证的是，因为英国的法律制度允许地主有更灵活的做法，货币地租和雇佣劳动继续扩大，既允许畜牧庄园的形成，也允许自耕农成为乡绅而繁荣兴旺。这也会迫使更多的农

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地区形成无产阶级，成为工业化的动力。在法国，似乎矛盾的是，正是君主制度本身的力量迫使领主阶级让土地持有权保持较少的经济功能的形式和较多的“封建”形式，这将使法国停滞不前。

解决土地持有权问题，必然也对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发挥的作用产生重要影响。东欧那样的庄园管理制度需要大量的监督管理人员。如果英国地主朝这方面转变，就可能没有足够的人员去充实正在出现的世界经济体所需的许多新的管理岗位——商业管理者，也就是最终必将从事海外活动的人员，等等。这不是地主们把自己的人员让与上述其他用场，而是由于上述其他用场的扩大，只剩下较少的人员担任庄园监督管理工作。出租土地是一条出路。

那么，请看那时的整个画面：西北欧处于把土地分作牧场和种植农作物这两种用途的过程中。这一过程之所以可能出现，仅仅是由于扩大中的市场为畜产品创造了一个更大的市场，¹⁷⁷而且正是由于世界经济体的边缘地区为中心地区提供了谷物补充。半边缘地区离开了工业（工业任务日益委托给中心地区），朝着农业上相对自给自足的方向发展。中心地区的农业专门化促进了农村劳动关系的货币化，这是由于工作中需要更多的技能，由于地主希望摆脱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负担。雇佣劳动和货币地租成了劳动控制的办法。在这个制度中，一个独立的小农阶层得以出现，并且在农产品生产和与新的手工业的联系上确实都越来越强大。一旦人口增加和工资下降，其结果，必然是像马克思讲过的，这些自耕农“同时靠牺牲自己的雇佣工人和地主的利益而致富”。¹⁷⁸他们（通过圈地）攫取了前者的土地，公开声称这是为了保证国家粮食供应的需要。¹⁷⁹然后以低工资雇佣这些农民，同时从大领地所有者手中以固定租金的方式获取越来越多的土地。我们不想过分夸大这种新的自耕农阶层的力量。认识到他们成了经济上从而也是政治上的重要力量，这就够了。他们的经济力量在于这一事实：他们有一切可

能的刺激去成为“企业家”。他们追求财富和向上层社会流动；成功的道路在于通过经济效率。但他们还没有被传统的慷慨赠与的义务，或体现自己身份的豪华花费的义务，或城市生活的重担所压倒。¹⁸⁰

显然，这种农村经济努力的成果的再分配对城市地区的特征有重大影响。城市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我们知道，16世纪是这样一个时期，总的说来是人口增加，城市面积扩大，在绝对的意义上到处如此，但对中心地区而言却是相对的。我们知道，从逻辑上和经验上的证据看，正如赫莱纳所说，结果是“人们必须假定，在[16世纪]，人口对土地资源的压力上升”。¹⁸¹在东欧，一些人移居边疆各地。有些人从伊比利亚半岛移往南北美洲，一些人（先是犹太人，后来是摩尔人）被驱逐到地中海其他地区。在西欧，一般说来，有人移居城镇及流浪者不断增加，成了“流行病”。¹⁸²不仅农村人口大批出走，包括因圈地而被排斥出来的农村劳动力和在收获季节从山区到平原来做几周工作的季节工，布罗代尔说他们是“真正的农村无产阶级”；¹⁸³还有流浪者，他们形成的原因，是“取消了封建侍从，解散了由形形色色的地痞流氓组成的并效忠帝王以镇压其诸侯的军队……”。¹⁸⁴

所有上述各种分离出来的人干了些什么事？他们当然为新兴工业提供了非熟练劳动力。马克思认为，“迅速繁荣起来的工场手工业，特别是在英国，渐渐地吸收了他们。”¹⁸⁵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可以得到这些劳动力，是地主愿意把封建义务折算成租金的条件之一。¹⁸⁶

可是，这种不是生产粮食的劳动力的扩大的情景难以与另一事实相调和。琼斯和伍尔夫认为，16世纪在西北欧历史上第一次碰到一个工业发展的先决条件，那就是随着生产率增长和市场扩大，“从紧张的人口压力中”，出现了一个“喘息空间，在这期间，与其说是人口倒不如说是收入可能在成倍增长。……”¹⁸⁷

但那时充塞着中心国家的城镇和作为流浪汉在农村闲逛的剩余人口怎么样了？不错，首先是他们大批死亡。有的则因流浪而被绞死。¹⁸⁸饥荒频仍，特别是在“运输缓慢，运价高得让人不敢问津，

[及]收成参差不齐的情况下。……”¹⁸⁹布罗代尔和斯普纳说,分析这种经济“必须考虑到这些[流浪]人口中的“青年”,这些人因为遭受饥荒和时疫以致平均寿命很短。……”¹⁹⁰

于是,这将能解释布罗代尔注意到的令人费解的另一现象。“如果不是经常的移民浪潮,城镇无产阶级不可能维持其原有的人数,更不用说增加。”¹⁹¹这也有助于解释费尔普斯-布朗和霍普金斯注意到的令人困惑的事实,即尽管工人工资显著下降,社会动乱相对说来却极其少见。他们说:“部分答案可能是,16世纪时工人工资从[15世纪的]高水平下降。下降幅度虽很大,但雇佣劳动者仍然可以维持生活。……”¹⁹²

但是,西北欧工人工资之所以能保持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水平,只是靠有一个边缘地区可供输入小麦。中心地区有金银,使这种输入成为可能,同时也听任部分居民相继死亡。这部分人的命运将是个迷人的研究课题。16世纪时,欧洲各城市中的工人阶级内部已经存在系统的种族阶层的区分,其关键可能不就在于此吗?例如,卡济米尔茨·蒂米涅斯基在16世纪东埃尔比亚的城镇中注意到了这种现象,那里的德意志工人把斯拉夫移民从较高级的职业中排除出去。¹⁹³关于现代早期欧洲城市工人阶级的种族分布的研究看来还不多,但我猜想蒂米涅斯基的描述可能表明了整个世界经济体的典型情况。在这个世界经济体中,不仅城市的分布是不平衡的,而且在城市中种族集团的分布也可能是不平衡的。这里,我们不应忘记阶层中的阶层这个概念。

如果说,我们在审视我们所讲的城市工人究竟指的是哪些人时必须小心,那么我们观察上层阶级时也必须小心。在中世纪的欧洲,称作贵族的武士-地主具有高贵的身份。在极大程度上,他们是一个职业上同类的群体。区别主要在于其与领地面积大体相关联的等级和拥有陪臣的数量。固然,个人或家族会在等级的尺度上上下下移动。在少数城镇中还出现了一个城市贵族阶层。在前一章,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一情况所引起的身份概念混淆的一些情况。

但在 16 世纪,地主—商人是贵族还是资产阶级?很明白,不管在一般的意义上还是在特殊的意义上,两种称呼都是不明确的。由于以商业和资本主义农业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的创立,这画面已变得朦胧了。让我们先看看国际商人,然后看看“工业家”,再看看两者的地理分布及其与土地所有者阶级的联系。

16 世纪使用的商业赢利技巧,在许多方面只不过是从中世纪晚期城镇学来用于邻近的内地的某些方法的推广。作为集体的城镇,面临的问题是控制自己的市场,既能减少从农村购买物品的成本,又能最大限度地削弱外乡商人的作用。¹⁹⁴有两种技巧得到了应用。一方面,城镇不仅谋求得到向市场经营活动征税的法权,还谋求管理商业经营的权利(谁该从事交易,什么时候进行交易,什么东西可以交易)。此外,他们还谋求限制周边农村绕过他们与其他城镇进行贸易的可能性。结果是形成了多布所说的某种“城市殖民主义”。¹⁹⁵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机制都向有利于市民的贸易条件转移,并因此有利于城市商人阶级反对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

但是,由此而来的利润尽管重要,与长途贸易,特别是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贸易可能挣得的相比,仍是不多的。据亨利·塞估计,早期商业殖民活动的利润率是非常高的:“有时从几乎无异于海盗行径的交易中获得的利润超过了 200% 或 300%”。¹⁹⁶ 这样高的利润率实际上归因于两个互不联系的方面。一方面是在殖民地区的“买主独家垄断”局面,即在“购买”土地和劳动力时的买主独家垄断。正如我们所见,这是靠利用法律的力量来安排的,不管在西属美洲还是欧洲都是如此。第二方面是出售这些初级产品的西欧地区缺乏有效的竞争。其所以缺乏竞争,一部分是技术不发达,一部分是因为经商的联系链是垂直的。

固然,商业交易的技术在 13 世纪晚期和 14 世纪早期已经有了很重要的进展:储蓄银行、汇票、经纪人、中心商业组织的各个分店。肖尼估计这些技术使商业资本主义增加了“可能十倍”提取剩余的能力。在与国家的密切联络下,它就有了“船只、人员,冒险考

察所需的手段,然后是开发新的空间所需的手段。”¹⁹⁷然而,所有这些商业上的革新,还不足以使从事长途贸易的商人进入世界市场,他们还需要大量资本,通常还要国家的某些帮助。所以,这样进入世界市场的人不可能很多,而那些已经进入世界市场的人也不会积极谋求改变这种状况。¹⁹⁸

更重要的是商业上的垂直联系。资本的来源是有限的。让我们记住,甚至各种国家机构都是大规模的借款人。比如,基于奴隶劳动的葡萄牙人的甘蔗种植园的利润,并非仅仅落进直接卷入这一活动的葡萄牙人手中,而是还要落入那些更“先进的”欧洲经济组织的手中,他们既提供最初的资本,又为工业品提供销路。¹⁹⁹正由于西北欧不仅能发展起工厂,而且还能发展起垂直的商业联系,才促进了对它的财政依赖。确实,谈论国际债务抵偿制将并不过分。这种制度先是在中世纪晚期汉萨商人对挪威渔民和设陷阱捕兽剥毛皮者的使用中完善起来的,²⁰⁰后来,诸如里加、雷瓦尔、格但斯克这些城市的德意志商人把它使用于东欧的内地。别的地方也知道这种方法,图卢兹的商人使用过,热那亚人则使用于伊比利亚半岛,以及进行羊毛贸易的英国和西班牙的部分地区。这方法是怎样的?非常简单:它涉及在生产前预先购买商品,即,先向供货人预付款,以后才发货。这阻止了商品在公开的市场上出售。它允许商人而不是生产者决定在最佳时刻向世界各地转卖。由于生产者倾向于在交货前就把预付款花掉,所以如果不是人不敷出,他们总是倾向于使这种安排永久化。在理论上,法律是禁止这种做法的,只有那些有财有势能够支持这种做法的商人才能使用。这就是那些“外国商人,或很容易和国外市场打交道的富商”。²⁰¹这些商人因此能获得价格革命的好处,并使利润成倍地增加。这种做法包括一个垂直的剥削网,马洛维斯特清晰地描绘了它在波兰赚取利润的经营情况:

16世纪和17世纪初,当格但斯克商人尚不甚重视海上

贸易时，他们开始在波兰所有地区对农业施加日益增长的影响。将近 16 世纪末，当输出谷物的情况特别有利时，格但斯克商人的代理人在波兰城镇和乡村的市场上定期出现，他们在那儿尽量收购谷物。……在 17 世纪，格但斯克的富商像里加的商人一样，不仅向小绅士而且甚至向波兰和立陶宛富有的贵族预付款项。……格但斯克贸易在广阔的内地的极大繁荣，可以用格但斯克商人的财富在价格革命时期得到巨大增加来解释。……这些格但斯克商人向荷兰人获得预付款，而……荷兰人为此目的有时从安特卫普的商人那里筹集相当数额的资金。²⁰²

这种国际债务抵偿制使得一批主要的国际商人得以绕过（并由此而摧垮）东欧本土的商人阶层（并在某种程度上也绕过南欧的商人阶层），与那些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地主企业家（包括贵族）建立了直接联系。这些地主企业家生产商品，并一直控制着这些商品，直到把它运到第一个重要的港口区。此后，一些西欧（或意大利北部）的商人接过这些商品，²⁰³这些商人转而通过集中在少数城市里的萌芽中的金融阶层进行活动并与之合作。

如果说：欧洲的世界经济体中的国际商人大半来自某些民族，“工业家”的分布是否也如此？这两群人的关系如何？工业生产在中世纪就已存在，但它是分散的，小规模，大部分适合于奢侈品市场。只是随着世界经济体的构架内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才有可能出现工业企业家。²⁰⁴

正是在较大的农业专业化地区，出现向工业化方向的突进，不仅在商业扩张时期，而且在商业收缩时期也是这样。玛丽安·马洛维斯特评述了 14 世纪和 15 世纪时这些地区的呢绒工业增长与农业危机相结合的情况。²⁰⁵琼·瑟斯克注意到了农村的这种突进，使那些被驱逐的农村劳动力找到别的受雇可能性的需要，如何在 16 世纪的英国继续进行的情况。²⁰⁶

可是,这种农村的压力没有在“最先进”地区发生作用,因为那时这类工业许多都在农村地区,这一事实不仅与在农村寻求雇佣机会有关,也与城市排斥这类工业有关。中世纪佛兰德斯和意大利北部的许多纺织工业中心都把它们资本投入奢侈品生产,因此不能也不愿转向新的市场。首先是因为14世纪和15世纪的货币危机使新市场成为必要,其次是16世纪世界经济体的创立使新市场有利可图。但上述企业家既然热衷于奢侈品的生产,也就不会关心边远地区的市场。²⁰⁷这种转移中很有名的、关键性的一次是佛兰德斯的资本家逃往英国。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在这阶段各种工业的基础都不稳定,时起时落就像寻找避难所的流浪者一般:“它们像一千处火头同时在干草成片的辽阔原野上点燃起来,每一处都是微弱的星星之火。”²⁰⁸很明显,那些古老的先进的中心——国际贸易的控制者——并非必然就是富有想象力和勇敢精神的中心。这看来证实了亨利·皮雷尼的信念:资本主义企业家并没有连续性。²⁰⁹

于是,这就使我们在使用我们的术语时必须谨慎。当使用阶级范畴解释社会变迁时,我们不应像通常那样把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理解为指的是“商人”和“地主”。在创立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的长期过程中,世界经济体中心地区的那些国家里,有的商人和地主仍然保持着那些与“封建主义”相联系的生产方式,从中获利,即以某种方式系统地运用法律手段使农业劳动者将最大部分产品交给地主(例如,强迫劳役,封建地租,等等)。有的商人和地主,则是从基于契约劳动的新的工业生产形式的兴起中获利。在16世纪,这两种区分,在基本上近似的意义上,常常与大商人、大地主和小商人、小地主的区分相符。大商人和大地主从旧的封建制度中获利较多;小(中等规模的?新兴的?)商人、小地主是从新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获利。但这一大一小的两分法,使用时必须小心,注意其细微差别,它只在上述历史时期的那一时刻才有效。当然,从理论上讲,它有很大意义。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对那些在现存制度下干得很好的人,比对那些精力充沛、野心勃勃而尚未达到目的的人,通常只有

较少的吸引力。从实际经验上看,问题会因为其他考虑而变得很复杂。

这个新的“工业家”阶层,不管是什么出身,有的来自自耕农,有的是从商人转变过来的,都投身于维拉尔所说的具有现代经济本质特征的活动:“在大得多的市场上实现中等的利润:即卖出更多数量的商品,而每一个单位商品所赚的钱却较少。”²¹⁰部分利润来自工资滞后,²¹¹部分是暴敛利润,部分是真正的低利润,部分是出借时依据将来不可预测的货币贬值而获得的利润。²¹²总之都有利润。利润的量不仅为这个阶级创造了政治基础;它还对经济全局有直接影响。在许多方面都能感到这一点:既可促进原料生产和人力动员,又是满足日益增长的已成为群众性需求的一种方法。此外,它还使许多承担建立外部经济设施的工业成为可能,诸如道路、洪水控制设施和港口。²¹³

16世纪时纺织工业所在地点发生的转移是显而易见的。在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初,这些工业在“旧的”中心扩展:在意大利北部,德意志南部、洛林、弗朗什-孔泰、西属尼德兰、英国(只在西南部,也只在呢绒方面)。然后新的中心随之兴起,主要是在英国和尼德兰北部,在内夫所观察到的“16世纪初还是工业落后”的那些国家……²¹⁴

在这一章里,我们曾企图展示16世纪新的经济活动的构架的出现——建立在资本主义方法上的欧洲的世界经济体。它包括生产劳动分工,这种分工只有把世界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才能给以适当评价。重要的是一个工业部门的出现,但使这成为可能的是农业活动从封建形式向资本主义形式的转变。不是所有这些资本主义“形式”都建立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只有在经济中心地区才是这样。但在非“自由”生产部门的地主和劳动者的促动因素,同中心地区的这种促动因素一样,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我们在离开这个论题前,还应当看看反对这种分析的意见。埃内斯托·拉克劳曾斥责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关于16世纪西属

美洲有一种资本主义经济体的说法。他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里无需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注释学的冗长附注,让我们简单地说一下:我认为按马克思论点的字面理解,拉克劳是对的,但他不是按其精神来理解。关于该问题本身的实质,拉克劳的主要论点是:弗兰克把资本主义解释成一种为市场并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其中的利润不是进入直接的生产者之手,而封建主义是一种与世隔离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这种关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定义在概念上都是不对的。他认为弗兰克的定义删去了“生产关系”(即劳动是否本质上“自由”),使之不仅能包括16世纪的西属美洲,而且还可包括“罗马大地产上的奴隶或欧洲中世纪教会地产上的农奴,至少在上述情况(压倒多数)中,领主都把从农奴身上榨取来的部分[着重号为我所加]经济剩余用于出售。²¹⁵然后他说,如果弗兰克是对的,“我们将不得不下结论说,“社会主义的条件在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已经成熟了……”。²¹⁶最后,他说远远不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不相容的问题,而是西属美洲这一外部市场的扩张起到了“突出和巩固[封建主义]”的作用。²¹⁷

拉克劳正是把这个问题搞混乱了。首先,中世纪教会地产上的农奴与16世纪西属美洲委托监护制下的奴隶或工人,或波兰的“农奴”的区别是三重的:即“部分”剩余投入市场与“大部分剩余”投入市场的区别;为地方市场生产和为世界市场生产的区别;消费利润的剥削阶级与受利润驱动,使之增加到最大限度并把部分利润重新投入生产的剥削阶级的区别。拉克劳关于伊丽莎白时期英国的推论,是荒谬的和论战性的。至于说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突出了封建主义,正是这样,但这是一种新变种的“封建主义”。

要害在于,能界定一种制度性质的“生产关系”应是整个制度的“生产关系”,而这一时期的制度是欧洲的世界经济体。自由劳动确实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界定性的特征,但并非所有的生产企业里的自由劳动都是界定性的。它是中心区各国对熟练工作所使用的

劳动力控制形式，而强制劳动则应用于边缘地区较不熟练的工作。因此，两者的结合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在各地的劳动都是自由的时候，我们将看到社会主义。

但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世界帝国的构架内繁荣，这就是它在罗马出现的一个原因。在形成中的世界经济体里，商人得到的各种利益，比起他们如果必须在单一的、国家的构架内谋取利益，在政治上要容易得多，因为各国统治者将不得不对多种多样的利益和压力作出反应。²¹⁸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奥秘：何以是在一个不是帝国的世界经济体的构架内建立劳动分工，而不是在单一的民族国家的构架内建立劳动分工。在 20 世纪的欠发达的国家里，K·贝里尔注意到，“国际贸易常常比国内贸易便宜得多，容易得多，……国家间的专业化常常比一个国家的各地区之间的专业化容易得多、早得多。”²¹⁹16 世纪时的欧洲也是这样。在本书中，我们将试图论证这一点是如何和为什么起作用的。

概括地说，16 世纪的经济成就是什么，我们如何说明这些成就？除了英国和北部法国采用煤作为燃料，这不是一个技术上取得重大发展的世纪。A·鲁珀特·霍尔把这时的工农业都看成处于“在技术上和组织上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的最后几个阶段”。这些变化开始于 14 世纪，与封建主义危机一同发生。但他注意到，正是在 16 世纪，有一个“从欧洲文明中心向欧洲文明边缘扩散技术的过程”。²²⁰

关于 16 世纪，有四件事引人注目。欧洲人扩张到了南北美洲。这件事本身可能不一定起决定作用，但很重要。²²¹布罗代尔抓住了有关于这一扩张的关键事实：“新世界的金银使欧洲有能力在超过其财力的条件下生活，用超过它本身所能储蓄的金钱来投资。”²²²

投资超过它本身的储蓄，并通过价格革命和工资滞后增加储蓄。不管金银的增多是否引起了生产的扩张，也不管在什么程度上，人口扩张是原因还是结果，金银本身就是“商品，而贸易的普遍

扩张构成了 16 世纪‘繁荣’的基础。繁荣不是游戏，不是海市蜃楼，也不是货币错觉”。²²³

第三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农村劳动的形式——边缘地区强制的商品性农作物劳动和中心地区自耕农的兴起。高桥由一把自耕农称为封建主义终结时的“原动力”，²²⁴可能是夸大其词。但如果说没有自耕农也可以有资本主义制度，这却值得怀疑。如果没有强制的商品性农作物劳动，道理也一样。

让·内雷攻击多布在解释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时，唯独强调可以得到无产者的劳动力这一点。他说必须把这一因素与长期的价格变动放在一起考虑。²²⁵另一方面，布罗代尔和斯普纳告诫说，不能把结构性的变化与偶然的变动（价格革命）混为一谈。²²⁶明确的一点是，在 16 世纪“资本主义时代”²²⁷出现了，它采取了一个世界经济体的形式。无疑，“这个世界第一个统一体具有的脆弱性”²²⁸是解释政治演进过程的一个关键性的变数。但事实是，这种统一却保存下来，并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得到了巩固。

16 世纪欧洲的世界体系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关于谁支配谁的问题不存在简单的答案。人们可能把低地国家通过格但斯克剥削波兰当作一个好例子，当然还有西班牙剥削其美洲属地。中心支配着边缘。但中心这么大，是热那亚商人和银行家利用西班牙还是西班牙帝国主义吸收了部分意大利？是佛罗伦萨支配了里昂还是法国支配了伦巴第？还是两者兼而有之？该怎样描述安特卫普（后来的阿姆斯特丹）与英国的真实联系？注意到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我们论述的一方面是商人的城市国家，另一方面是更大的民族国家。

如果要想在说明上述图像上取得任何进展，我们必须考虑政治方面，考虑形形色色的集团企图利用国家组织保护、促进他们的利益的种种方法。现在我们就转向这个问题。

注释

1 费尔南·布罗代尔 “*Qu'est-ce que le XVIIe siècle?*”, *Annales E. S. C.*,

VIII, 1, janv-mars 1953, p. 73. B.H. 斯利彻·范巴思根据谷物价格水平把 1450—1550 年和 1550—1650 年分为“略有上升”和“急剧上升”两个时期。Agrarian History, p. 113。

2 费尔南·布罗代尔, “European Expansion and Capitalism: 1450—1650”, 载 *Chapters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I, 3rd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61), p. 260。

3. 关于地中海基督教地区的性质和范围的讨论, 见海梅·维桑·维韦斯 (Jaime Vicens Vive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pai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 Press, 1961), p. 260。

4 肖尼, *Séville*, VIII (1), p. 148。

5 肖尼, “Réflexions sur le Tournant des années 1630—1650”, *Cahiers d'histoire*, XII, 3, 1967, p. 257。

6 尤金·A·科斯明斯基, *Past & Present*, No. 1, p. 18; B.H. 斯利彻·范巴思,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p. 150。

7 见皮埃尔·肖尼, *Séville et L'Atlantique (1504—1650)*, VIII, (2): *La Conjoncture (1504—1592)* (Paris: S.E.V.P.E.N., 1959), pp. 14—25。

豪尔赫·纳达尔 (Jorge Nadal) 对于从经过塞维利亚的贸易量中得出的关于西班牙物价变化的见解表示怀疑, 因为无法确定到底有多少商品通过这儿。“最后, 我相信, 把吨位曲线迭加在价格曲线上, 肖尼已经导致了与汉密尔顿一样的错误, 即把贵金属的装载量迭加在价格曲线上。这里两种情况, 都是把可靠的西班牙的现象——消费品价格的运动——与仅仅肤浅地触及这个国家经济的其他现象 (大多是来自国外的商品, 预定输往国外的大批白银) 相比较”。“La revolución de los precios españoles en el siglo XVI: estado actual de la cuestión”, 载 *Hispania, revista española de historia*, XIX, No. 77, oct. — dic. 1959, 519—520, fn. p. 55。

8 肖尼, *Séville*, VIII(2), p. 19。

9 “粗略地说, 1600 年在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南部该曲线开始变化。北部国家, 特别是低地国家只是到 1650 年才开始, 那儿的阿姆斯特丹正准备宣称它要支配世界舞台”。布罗代尔, 载 *Chapters*, I, p. 263。

10 肖尼, *L'expansion européenne*, p. 343。

11 “在 15 世纪末, 欧洲的三个地区处于一种互相关联的 [价格] 比率上, 即 100、77 和 16; 16 世纪末, 比率是 100、76 和 25。价格运动开始趋于使差

距弥合,但这只影响到欧洲的外侧。地中海地区与中欧的差距在整个16世纪都持续不变[同上, p. 343]。”

更边缘的地区,价格差距可能仍然相当大,如布罗代尔注意到的:“这些陈旧的经济自我封闭的范围越大,当金银出乎意料地在它们面前出现时,就愈会被估价过高。1558年时威尼斯人看到,生活在撒丁尼亚要比生活在意大利少4或5倍的开销,显然这是指对钱袋充足的人而言的。”载 *La Méditerranée*, I, p. 352。

12 亨里克·萨姆索诺维茨 (Henryk Samsonowicz), “Salaires et services dans les finances citadines de la Prusse au XVe siècle et dans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VIe siècl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 (Paris: Mouton, 1968), p. 550。

13 汉密尔顿伯爵 (Earl J. Hamilton), “American Treasure and Andalusian Prices, 1503—1660,”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I, 1, Nov. 1928, pp. 34—35。包括这方面文献所有主要项目的目录,见布罗代尔和斯普纳所列的书目,见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p. 605—615。

14 汉密尔顿伯爵, “The History of Prices Before 1750,” 载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Stockholm, 1960. Rapports: I. Méthodologie, histoire des universités, histoire des prix avant 1750* (Cöteborg: Almqvist & Wiksell, 1960), p. 156。

15 同上书, p. 157。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6 D·英格里德·哈马斯特伦 (Docent Ingrid Hammarström), “The ‘Price Revolutio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Some Swedish Evidence,” 载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 1, 1957, p. 131。

17 Y.S. 布伦纳 (Brenner), “The Inflation of Prices in Sixteenth Century Englan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V, 2, 1961, p. 231。

H.A. 米斯基明评布伦纳的观点时说:“我甚至要走得更远,并坚持居民的分布及其与固定的土地供应的关系,对一个国家保留这种进入其国界的金银的癖好有极大影响,因为居民对生产粮食的土地的压力越大,这个国家储存的货币所占的比例也越大,这种储存是直接指向国内生产的农业商品的。”见 “Agenda for Early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载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XI, 1, March 1971, p. 179。

18 Y.S. 布伦纳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V, p. 229。

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如果] 新世界的矿山是一种因素，这是因为欧洲具有利用[其产品]的方法。”见“La Méditerranée, II, p. 27。R.S. 罗佩斯和 H.A. 米斯基明强调：从大约 1465 年开始的经济增长直到‘宗教改革’是一个“缓慢恢复的过程”。这样，1520 年后的迅速提高与汉密尔顿的论点是一致的。见“The Economic Depression of the Renaissance,” 载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V, 3, 1962, p. 417。

19 布伦纳,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pp. 238—339。布罗代尔和斯普纳也证明周转率加快的现象：“这种[周转率]的加速, 生活费用的上升, 与其前各个时代相比, 是文艺复兴时期或最好说是 16 世纪最值得注意的方面……但存在比例上的不同。……欧洲[存在]一种强有力的‘增长’的进发。……但这种增长把整个世界推向了可能和不可能的极限, 这就是说, 推向了灾难的边缘。”见“Les métaux monétaires et l'économie du XVI^e siècle,” 载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e Scienze Storiche, IV: Storia moderna* (Firenze: Sansoni, 1955), pp. 245—246。

20 纳达尔, *Hispania*, XIX, p. 517。

21 米斯基明,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XI, p. 183。

22 W.C. 罗宾逊 (W.C. Robinson), “Money,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Change in Late Medieval Europe,” 载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I, 1, 1959, p. 67。

23 见 M.M. 波斯坦, “Not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I, 1, 1959, pp. 78—79。

24 米斯基明,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XI, p. 177。

25 查尔斯·弗灵登 (Charles Verlinden) 等, “Mouvements des prix et des salaires en Belgique au XVI^e Siècle,” 载 *Annales E. S. C.*, X, 2, avr. — juin, 1955, p. 198。

26 约瑟夫·A. 熊彼特 (Joseph A. Schumpeter), 载 *Business Cycles I* (New York: McGraw-Hill, 1939), pp. 231—232。

27 同上书 I, p. 233, fn. 1。

28 米斯基明,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XI, 提出了一些我们可据以探讨这个问题的思路：“在考虑战争连绵的 16 世纪工业结构和生产过程的变化时, 我们满可以问一下更充裕的和可能是更低廉的货币扮演了什么角色。当各国政府能以相对较低的利息率满足自己的需要, 无需与私人工业竞

争,无需阻拦利润的再投资,以及由此造成了一个坐吃利息的阶层时,私人的工业资本积累是否变为更为容易?较低的资本成本是否能允许工业部门,诸如荷兰的造船业,保持更多的木材和原材料储备,或者允许英国的制革工业在制革场上存放更多的兽皮,使用更多的劳动力,并由此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比较英国和低地国家的经济成功与西班牙和法国的相对失败的原因时,恐怕这种分析会提供富有成果的见解,并在这一过程中把“利润通货膨胀”(profit inflation)这个术语从分析上的错觉转变为一种有用得多的工具[p. 183]”。

29 甚至在相对的意义,这种现象是否存在?罗宾逊证明,从肥沃或较不丰饶的角度看,新开拓的土地的收益并不必然仅敷支出。见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p. 68。波斯坦(Postan)反驳说,不管理论怎么说,事实是,新的垦殖地倾向于出现在“劣等土地上”。见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 p. 81。

30 “可能曾有助于[16世纪]谷物价格上升的一个辅助原因,是[在西欧]马的数量增加。商业和工业的巨大扩张,以及伴随着的运输的发展,要求有更多的拖力和动力,这大半是由马承担的。马养得越多意味着马料的需求越大。显然,用于生产马料作物的土地就不再可能用来种植粮食作物”。见斯利彻·范巴思, *Agrarian History*, p. 195。

31 见约瑟夫·彼得兰(José Petróñ), “A Propos de la formation des régions de la productivité spécialisée en Europe Centrale,” 载 *Deux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 Histoire Economique: Aix - en - Provence, 1962*, vol II, *Middle Ages and Modern Times* (Paris: Mouton, 1965), pp. 219~220。

有时,有人说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谷物可能没有起过那么大的作用,因为它只占全国谷物消费量很小的一个百分比。有两种意见对此作出了回答。对欧洲的某些地区而言,波罗的海地区的谷物是主要的供应来源。“[欧洲全部谷物消费量的] 1%或2%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既因为它为诸如荷兰的海员等带来了繁荣,也因为像里斯本这种作为首都的城市也赖以维持生存的最低需要。”见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 “Food Supply and Public Order in Modern Europe,” (油印本, 45)。见皮埃尔·让南(Pierre Jeannin), “Les comptes du Sund comme source pour la construction d'indices généraux de l'activité économique en Europe (XVIe - XVIIIe siècles),” *Revue historique*, CCXXXI, janv. - mars 1964, 62, 让南引自E. 舍利尔(E. Scholliers)的话说,在1562-1569年间,来自波罗的海的谷物供应了荷兰消费量的23%。

第二种回答是:它对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来说具有边际的关键性;“地方

谷物运输与国际谷物运输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依照具有两个彼此不同的部门的二元经济体这种概念去理解一种商品(比如谷物)的运输和贸易,那将是错误的。如果这种论点站得住脚,那么,相对于总需求与总供给来说,来自波罗的海的谷物供应就应该是边际供给。于是,总供给量以及或者总需求量所发生的比较轻微的变化,就会引起波罗的海供应谷物部门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克里斯托夫·格拉曼(Kristof Glamann),“European Trade, 1500—1700,”载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6, 1971, 44(奇波拉主编的《欧洲经济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99页)。

32 “在16世纪,贵金属的到来‘支撑着’货币,导致了贵金属的贬值而不是货币的贬值。贵金属应为银价的增加负责,但不应为实际价格的增加负责。”见米歇尔·莫里诺(Michel Morineau),“D' Amsterdam à Séville; de quelle réalité l'histoire des prix est-elle le miroir?”载 *Annales E. S. C.* XXIII, 1, jan. - fevr. 1968, p. 195。

鲁基洛·罗马诺指出,危机的出现和消失,以我们依据金银的价格还是依据计算货币来推测物价的增高为转移:“[16世纪价格研究的各种结果]大都是任意把原本是用计帐货币表达的价格转变成金属价格的产物,因而这些价格不是价格,而是金价和银价,确切地说,是‘金属’史而不是货币史的各方面的反映。……[至于15世纪是否存在过萧条的一些论点],出现相反解释的原因,恰好大半要归之于建立价格曲线的不同方法。是银的价格吗?15世纪确实存在‘危机’;是计帐货币的价格吗?‘危机’就消失了。”见“Tra XVIe XVII secolo. Una crisi economica: 1619—1622,”载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XIV, 3, sett. 1962, pp. 481—482。

33 “[美洲的金银]创造了一种底价,在长期的萧条过程中,物价不可能再降到这一底价以下。它们的作用是强化或缓和各种一般的趋势。诚然,这种作用是很重要的,但只有通过其他趋势,如投资趋势,它才得以存在,才能得到解释。这些趋势是变化的真正反映,我们不能忽视它们,也不能把它们限制在一种次要的地位”。卡洛·M. 奇波拉,“La prétendue ‘révolution des prix’”, *Annales E. S. C.*, X, 4, oct. - déc. 1955, p. 515。

34 “因此,如果人们把1570—1620年这段时期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大体上就会判断它为一个通货膨胀的时期——历史家们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称它为‘价格革命’,——这是人们对通货膨胀时期利息率下降这一自相矛盾现象的错觉。”卡洛·M. 奇波拉,“Note sulla storia del saggio d'interesse—Corso,

dividendi, e sconto dei dividendi del Banco di S. Giorgio del secolo XVI," *Economia internazionale*, V, 2, magg. 1952, p. 266。

35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Capital*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I, Ch. IV, p. 1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23卷第167页)。

36 布罗代尔, 见 *Chapters*, I, p. 286。

37 布罗代尔和斯普纳,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 449。

38 皮埃尔吕吉·齐奥卡(Pierluigi Ciocca)在结束他讨论工资滞后假设的两篇配对的长文章时说道,与说明16世纪通货膨胀原因的问题相比,工资滞后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见“L'ipotesi del 'ritardo' dei salari rispetto ai prezzi in periodi di inflazione: alcune considerazioni generali,”载 *Bancaria*, XXV, 5, maio 1969, p. 583。

39 豪尔赫·纳达尔否认汉密尔顿这一以经验为依据的主张的真实性,他论证说汉密尔顿的数字是建立在错误的方法论基础上的,这表现在他对英国、法国使用了加权的数字,而对西班牙用了非加权的数字。他指出,费尔普斯-布朗和霍普金斯使用唯一可得到的已公布的数字,比较泥瓦工的工资时,都用同样的办法加权计算,分析结果出现了很大变化。”这些数字的教训既清楚又出乎意料:16世纪间巴伦西亚的泥瓦工得到的名义工资(西班牙唯一可计算出来的工资)的购买力,遭受了逐渐的然而却是大幅度的下降,与英国、法国的泥瓦工遭受过的完全一样。”见 *Hispania*, XIX, pp. 523~524。

40 J. 汉密尔顿伯爵,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载 *Economica*, IX, 27, Nov. 1929, pp. 355~356。

沃尔特·普雷斯科特·韦布(Walter Prescott Webb)进一步对横财进行了有价值的概念上的区分,把它分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两类横财均是欧洲人征服美洲而产生的结果。“把最大的横财——土地放在一边,让我们考虑金和银、森林产品、皮毛和龙涎香,把它们归入第一类。……主要的横财是那些能很快获得,并以最少的投资和几乎不需做什么预备性工作就能得到的东西。次要的横财包括长时间的等待,通常要很大的花费,对一个遥远的、急躁的投资者的忍耐力来说,花费是太大了。刺激16和17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就是这第一类横财,第二类横财则在18和19世纪维持资本主义继续前进。”见 *The Great Frontier* (Boston, Massachusetts: Houghton, 1952), pp. 181~182。

弗里茨·雷德利希(Fritz Redlich)提醒我们,来自欧洲战争的战利品,虽然是一种古代方式的横财,也仍然是16世纪资本产生的一种重要来源。见“De Praeda Militari: Looting and Booty, 1500—1815,”载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Suppl. No. 39, 1956, pp. 54~57。区别在于,战利品表现了欧洲现存财富的再分配,不是附加的新资源。

41 见埃里克·克里吉(Eric Kerridge),“The Movement in Rent, 1540—1640,”载 E.M. 卡勒斯-威尔逊, 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I, pp. 208~226。又见伊恩·布兰查德(Ian Blanchard):“从至今已出版的研究1485—1547年间地租变化的材料中可得到的证据是清楚的,而对这点阐述得最清楚的是在琼·瑟斯克(Joan Thirsk)主编的书中(*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Vol. IV)。在这本书中(第204页)作者宣称,从15世纪70年代以来可耕地的地租已显著增加;但同时(第690页)作者说道,很可能直到进入16世纪,地租才急剧地上升。为解决这种似乎矛盾的说法,必须查阅关于特定地产的研究,但这种研究现在还很少。”见“Population Change, Enclosures, and the Early Tudor Economy,”载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XIII, 3, Dec. 1970, p. 443。

42 皮埃尔·维拉尔(Pierre Vilar),“Problems on the Formation of Capitalism,”*Past and Present*, No. 10, Nov. 1956, p. 25。此外,纳达尔谈到西班牙:“情况迫使我们作出反对汉密尔顿的结论,通货膨胀时期对西班牙的大地产并非不利。”见 *Hispania*, XIX, p. 526。

43 汉密尔顿, *Int. Cong.*, I, 1960, p. 160。

44 齐奥卡对此进行了概述,见 *Bancaria*, XXV, 4, apr. 1969, pp. 425~426(footnote 13)。

45 约翰·U. 内夫(John U. Nef),“Prices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France and England,”*The Conquest of the Material World* (Chicago, Illinois: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4), p. 254。汉密尔顿否认内夫的观点,见其“Prices and Progress,”载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I, 4 Fall 1952, pp. 333~334。齐奥卡评论说:“上述汉密尔顿的意见认为,在日益商业化和无产阶级产生的历史时期,这里所谈到的两种因素的重要性较小。这一意见我们认为是有根据的,可以放心的。但还需要更充足的证据。”见 *Bancaria*, XXV, p. 428。

46 见 G.H. 费尔普斯-布朗(G.H. Phelps-Brown)和希拉·V. 霍普金斯(Sheila V. Hopkins),“Wage-Rates and Prices: Evidence for Population Pressur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载 *Economica*, XXIV, No. 96, Nov. 1957, p. 293。见让·德吕穆 (Jean Deluneau) 关于罗马的物价的文章：“更一般地讲，十年一次的小麦价格指数总是高于所有其他产品 [各种食品、酒、木柴、蜂蜡]，从 1590 到 1629 年的 40 年间都是这样，只有一种产品可能例外，即 1610 至 1619 年间葡萄干的价格指数。而即使存在例外，它也能反证规律，因为 16 世纪末和 17 世纪初葡萄干的价格高得反常。”见 *Vi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Rome dans le seconde moitié du XVIe siècle* (Paris: Boccard), II, pp. 741~742。

47 费尔普斯-布朗和霍普金斯展示了 16 世纪英国南部、法国、阿尔萨斯、蒙斯特、奥格斯堡、巴伦西亚和维也纳实际工资减少的证据。见“Builders Wage-rates, Prices and Population: Some Further Evidence”的表二，载 *Economica*, XXVI, No. 101, Feb. 1959, p. 21。让·福拉斯蒂 (Jean Fourastié) 和勒内·格朗达米 (René Grandamy) 不能肯定从 15 世纪到 16 世纪实际生活水平如何下降，但他们指出，在 15 世纪和 17、18 世纪间，小麦的实际价格增长到 4 倍。见“Remarques sur les Prix salariaux des céréales et la productivité du travailleur agricole en Europe du XVe and XVIe siècles.” 载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 (Paris: Mouton, 1968), p. 650。

48 斯利彻·范巴思, *Agrarian History*, Table I, p. 327。

49 齐奥卡, *Bancaaria*, XXV, pp. 578~579。

50 卡洛·奇波拉, “The Economic Decline of Italy,” 载布赖恩·普兰 (Brian Pullan) 主编的 *Crisis and Change in the Venetian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London: Methuen, 1968), 139, 140。见布赖恩·普兰, “Wage-earners and the Venetian Economy, 1550-1630,” 载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VI, 3, 1964, pp. 407~426; 多梅尼科·塞拉 (Domenico Sella), “Les mouvements longs de l'industrie lainière à Venise aux XVIe et XIIIe siècles,” *Annales E. S. C.*, XII 1, janv. - mars 1957, esp. 40~45。塞拉把威尼斯称为一个“富庶的城市”，那儿“难于负担的租金和高工资”造成了很高的生活费用。

51 见弗灵登等人写的文章，载 *Annales E. S. C.*, X, p. 198。见赫尔曼·范德·威 (Herman Van der Wee): “所以，布拉班特没有像 16 世纪时欧洲其他国家那样，广大雇佣劳动者的实际收入经历灾难性的暴跌。” *The Growth of the Antwerp Market and the European Economy* (The Hague: Nijhoff, 1963), II, p. 386。

52 这把我们带回到为什么“古老的”贸易中心是这种例外现象的中心这一问题。这完全是另一回事。西尔维亚·恩拉普 (Sylvia Thrupp) 提供了这个

简短的解释：“佛兰德斯和北意大利是最令人感兴趣的地区，因为那里的土地肥沃，生活悠闲舒适，那里的人就以此种心情从附近‘面包篮’进口额外的粮食，造成高密度的人口。这种情况使得那里不但出现可用于发展农村工业的农民部分时间劳动力的巨大储备，而且还使它们能把大部分人口变成城市市民。”见“Medieval Industry, 1000-1500,”载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 6, 1971, 47(卡洛·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1卷第210~211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53 这里我们指各国之间的差别。当然，还存在各国内的各社会集团间的差别，在我们的讨论中，这反映在地租、利润和工资率上。可是，各种雇佣劳动者间看来不曾存在这种差别。或至少英国建筑业中的工匠和工人的工资是这样，即成比例地发生变化。那儿“从黑死病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工人的工资与工匠的工资以同样的比例变化着，这种比例有极大的一致性。”G.H. 费尔普斯-布朗和希拉·V. 霍普金斯，“Seven Centuries of the Prices of Consumables, Compared with Builder's Wage-rates,”载 E.M. 卡勒斯-威尔逊主编的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St. Martin's, 1966), II, p. 189。

54 “但回想起马克思深刻的、富于启发性的警句：‘欧洲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需要以新大陆的赤裸裸的奴隶制作为基础’，我们不也可以从对殖民地劳动力和对欧洲的劳动力的剥削同时增加这一历史共生现象的角度，来看[经济活动和价格的‘长波’]吗！”维拉尔，*Past and Present*, No. 10, p. 34。

55 “汉密尔顿假设说西班牙工人的工资是与价格齐头并进的，迄今为止这看起来非常缺乏事实依据。确实，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很可能会证明，在该世纪的上半叶卡斯提广大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恶化。这种恶化，结合着与西欧其他国家的价格相关的卡斯提的高水准的价格，会大有助于解释到该世纪末卡斯提经济的特殊结构：一种在许多方面与其说接近西欧国家，不如说更接近波兰那样的东欧国家的经济：输出基本的原材料，输入奢侈品。即使卡斯提仍存在各种工业，它们也是倾向于奢侈品工业，迎合少数有钱人的需要，并遇到日益增长的国外竞争。”J.H. 埃利奥特(Elliott), “The Decline of Spain,” *Past and Present*, No. 20, Nov. 1961, p. 62。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加泰罗尼亚的发展类似上述情况。见海梅·维桑·维韦斯对“Rapport de M. Malowist”写的评论，载 *IXe Congrès Internationale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II. Actes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51)。维桑在文中把加泰罗尼亚和波兰的“第二次封建主义”作了比

较。

56 费尔普斯-布朗和霍普金斯, *Economica*, XXIV, p. 298。

57 同上, p. 299,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非常接近多布的分析:“可以问一下:在上述情况下,如果群众的实际消费下降了,价格水平在这一时期因何得以上涨,并使大笔利润(本质上依赖于价格和货币工资间的差额,由于商品的转手而成倍增加)得以成功地实现。换言之,扩大的需求出于何处?答案显然在于这一事实:正是富人和中等富裕的人(即新生的资产阶级和国王,还有新兴的地方上的资本家阶级和人数较多的自耕农)提供了不断扩大的市场;这一部分居民增加的花费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利润实现的条件。这时期许多扩大的工业部门都是迎合比较富裕的人们奢侈品消费需要的。在造船、建筑、(以及在很小的程度上)机器和各行业所用的工艺工具,还有大炮和军事设备上的投资也都扩大了。关于这一点应该加上国外贸易的重要影响,国外贸易是在十分有利的条件下进行的,并因金银明显地流入这个王国而使收入实现平衡。”见 *Studies*, p. 120。

布罗代尔附加了一种分析,说明为什么地主并不一定像汉密尔顿最早提出来的那样受到价格飞涨的打击:“价格革命……并非像产生奇迹那样固执地实行民主。它减轻了农民可以用货币支付的和美洲发现前已完全固定下来的那些负担和地租。事实上,对农民持有地的封建要求常常是轻的,有时几乎毫无要求。但并非始终如此。特别是在以下情况下:领主也接受用实物支付,其他一些领主还采取了市场的方针。……此外,在地中海地区和欧洲,土地分配都不是在一劳永逸的基础上实现的。”见 *La Méditerranée*, II, p. 51。

58 “资本主义需要资本,这是通过高度有利的价格-工资比率造成的强迫储蓄而实现的,要设想出一种比这更强有力的提供资本的工具是不容易的。”J. 汉密尔顿伯爵,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I, p. 338。见 J.M. 凯恩斯(Keynes):“这样,一次利润膨胀几乎一定会造成一种更不平等的财富再分配——除非它的影响被直接税抵销,即[1930年]体现现代英国特征的那些直接税,不是其他地方或其他时期的直接税。”见 *A Treatise on Money* (London: McMillan, 1950), II, p. 162。

59 “如果说,这个拥有土地的阶级在17世纪初还支配着欧洲,那是因为它所失去的控制比通常所断言的要少些。所以,那么多的商人和富有的市民争相购买土地或地产并非出于疯狂。”布罗代尔, *La Méditerranée*, I, p. 479。

60 “上涨的价格克服了投资滞缓的现象,它通过降低现行的利息率,鼓

励人们在预见到赚钱时借钱投资。简言之,价格上涨和工资滞后提供了资本,并强烈刺激人们用资本主义的方式使用资本。”汉密尔顿,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I, p. 339。

61 “至于在法国,我们必须解释的是,为什么在价格革命时期工业资本主义的进展如此之小;而在英国,我们必须解释为什么在同一时期工业资本主义的进展如此之大。”内夫, *The Conquest of the Material World*, p. 242。

62 “法国的历史意味着,劳动者实际工资的长期下降尽管无疑是对创办企业的一种刺激,但它本身的影响还不足以充分有力地造成工业增长率的加速提高。在16世纪最后25年里,工人生活水平的下降幅度非常之大,以至于阻碍了对某些工业品需求的增加,在宗教战争中,穷人的悲惨状况与其说有助于不如说有碍于制造业的进步,这些都是可能的。”内夫,同上书 p. 267。

内夫的观点也受到戴维·费利克斯(David Felix)的支持。见其“Profit Inflation and Industrial Growth: The Historic Record and Contemporary Analogies,”载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LXX, 3, Aug. 1956。特别是见 pp. 443~451。

63 E. L. 琼斯(E. L. Jones)和S. J. 伍尔夫(S. J. Woolf),“The Historic Role of Agrarian Chang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载琼斯和伍尔夫主编的 *Agrarian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ondon: Methuen, 1969), 1,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64 同上书, p. 2。

65 见弗朗索瓦·毛罗(François Mauro), *Le XVIe Siècle européen: aspects économiqu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6—Collection Nouvelle Clio, 32), pp. 285~286。

66 见查尔斯·弗灵登, *L'esclavage dans l'Europe médiévale*, 2 vol. (Brugge: De Tempel, 1955)。

67 布洛赫,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 p. 247。再见马克·布洛赫,“Mediaeval ‘Inventions’”,载 *Land and work in Medieval Europe*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 180。

68 对该观点进行经典式阐述的是埃里克·威廉斯(Eric Williams)的 *Capitalism and Slavery* (London: Deutsch, 1964)(《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北京师大出版社,1982年版)。支持该观点的较近的陈述,参看塞尔西奥·巴古(Sergio Bagú)“La economía de la sociedad colonial,” *Pensamiento crítico*, No. 27, abr. 1969, pp. 53~61。

69 埃里克·沃尔夫注意到，由于技术的原因，在中美洲小规模的采矿业和小规模的甘蔗种植业都证明是不经济的，因而很快让位于大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至于采矿业，技术上的进展是1557年引进了“帕蒂奥”(patio)方法，即用水银做辅助物从矿石中提取白银，这需要昂贵的机器。主要是从采用这一加工过程开始，从事深井开采变得有利可图。在蔗糖生产中则有大规模的榨汁厂或制糖厂，它需要花费大量资本。在靛蓝类染料的生产中，类似的技术要求具有类似的社会后果。见 *Sons of the Shaking Earth* (Chicago, Illinois: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59), pp. 177~180。

70 “甘蔗生产15世纪在马德拉、加那利群岛扩展的第一个结果，是与现有的欧洲的生产者展开了剧烈的竞争。美洲殖民地进入生产行列后，竞争更加强化。到1580年，……西西里的蔗糖工业濒临消灭。……西班牙的蔗糖工业在凋萎之中。……意大利南部、马尔他、伯罗奔尼撒、罗得斯岛、克里特、塞浦路斯小型的中世纪的蔗糖工业都经历了同样的衰落阶段，最后终告消失。

“在马德拉和加那利群岛，蔗糖生产都卷入使用非洲奴隶劳动力。……使用奴隶劳动可能曾有助于岛民比欧洲其他生产者卖得更便宜，但马德拉和加那利群岛又分别屈从于巴西和西印度群岛的竞争。……

“在美洲热带地区，蔗糖和奴隶的历史更加密切地联系着。这一时期热带出口的所有作物中，甘蔗最需要体力劳动，特别是在收获季节。榨汁厂必须十分接近甘蔗地，砍下的甘蔗必须在几小时内组织好把它运往工厂，这种必要性第一次要求建立种植园制度。……无疑，热带地区之所以出现奴隶制，首先是因为有了蔗糖工业。”见梅斯菲尔德，*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p. 289~290。

岛屿作为横渡大西洋拓殖的中途歇脚地并非伊比利亚的特有现象。A.L. 罗斯(A.L. Rowse)认为与此相同的过程在北欧也发生过，它分成三步：从欧洲大陆到不列颠，再从不列颠到爱尔兰，然后从不列颠到北美洲。

“我们可以把向北美洲的移民看成一千年前横渡大西洋进程的扩展，在民族大迁徙年代，不列颠成了盎格鲁-萨克逊种族最早的殖民地。……

“这些岛屿(不列颠和爱尔兰)的统一，为横渡大西洋的伟大冲锋奠定了基础。成群结队的人进入北美洲，这种开放措施是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时的人们就曾为之奋斗的。……请注意，历史学家们很少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就是这个民族最深切地关注在爱尔兰南部——汉弗莱、吉尔伯特、沃尔特、雷利、理查德、格伦维尔——的种植园和殖民活动，它带头在弗吉尼亚建立最初的一些殖

民地。爱尔兰就好像为美洲绘制的蓝图。”罗斯，“Tudor Expansion: The Transition from Medieval to Modern History,”载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rd ser., XIV, 3, July 1957, pp. 310,315

71 “欧洲人开始在非洲扩张前几个世纪，奴隶制和奴隶贸易在地中海地区一直十分活跃。15世纪发展起来的大西洋贸易决不只是发现非洲的偶然的副产品。……在美洲发现前，奴隶贸易方面最重要的变化已经开始，即从主要供家庭服务转向主要将奴隶卖到种植园或殖民地市场。一般说来，在15世纪，奴隶的肤色已从白色转为黑色，且日益发展起一种对待奴隶的倾向：不把他们看成为某个家庭或农场工作的侍者或农业劳动者一类的人，而是整个儿地把奴隶看成一件件非人的商品。”安东尼·勒特雷尔，*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pp. 78-79。

72 从自己的世界经济体以外的地方获得奴隶，这件事的证实材料可以在查尔斯·弗灵登关于14、15世纪克里特的研究中找到。那时克里特是威尼斯的一个殖民地，既是种植专供销售的农作物的中心，又是货物集散地，作为后者，它是奴隶贸易的枢纽。奴隶来自东南欧、俄罗斯和西南亚的各个地方（所有这些地区那时都处于地中海的世界经济体之外），用于克里特岛和威尼斯的其他殖民地，并转卖到埃及、法国南部和西班牙东部。见 *Studi in onore di Arnimoro Fanfani*, III: Medioevo (Milano: Dott. A. Giuffrè-Ed., 1962), pp. 591-619。

73 见布罗代尔，*La Méditerranée*, I, pp. 144-145。

74 舍伯恩·F. 库克 (Sherburne F. Cook) 和莱斯利·博伊德·辛普森 (Leslie Boyd Simpson) 用文献证明这种衰落：墨西哥1519年的人口是1100万，1540年约650万，1565年约450万，1600年约250万。见 *The Population of Central Mexico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Ibero-Americanana*: 31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48), pp. 10-16, 38, 43, 46。伍德罗·博拉 (Woodrow Borah) 增加了一个数字：1650年是150万。见 *New Spain's Century of Depression, Ibero-Americanana*: 35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51), p. 3。

75 “巴西土著居民整个地被毁灭的速度 [与墨西哥的] 同样猛烈。耶稣会会士何塞·德·安切塔观察到，‘20年前到现在 (1583年)，这个地方 (巴伊亚) 使用的人的数量似乎是一种令人无法相信的事情’。接着他提供数字，揭示了居民毁灭的过程，其规模类似墨西哥。”塞尔索·富尔塔多 (Celso Furtado),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0), 5, fn. 2。

关于秘鲁,见阿尔瓦罗·哈拉(Alvaro Jara)。“如果不存在大量高密度的、能够在某段时间内支撑人口曲线下降的人口储备,吞没一切的采矿业就会崩溃。”见“Estructuras de colonización y modalidades de tráfico en el Pacífico Sur Hispano-Americano,”载 *Les grandes voies maritimes dans le monde, XVe - XIXe siècle. VIIIe Colloque,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d' Histoire Maritime* (Paris: S.E.V.P.E.N. 1965), p. 251。

76 见 J.H. 帕里 (J.H. Parry), *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 (New York: Mentor Books, 1963), pp. 245~246。

77 见加布里埃尔·阿丹特 (Gabriel Ardant) 关于技巧要求和劳动控制形式间的关系的讨论,在讨论逐渐排除各种法律限制时,他说道:“要求农奴在组织他自己的工作进度表的同时生产更多东西的一种制度,必然要导致一种征收固定捐税的制度,并导致对农奴较大程度的解放。……用征收捐税来代替征用的方式可能增加了生产率,这种变化是领主们自己实现的。”见 *Théorie sociologique de l'impôt*, I, pp. 46~47。再见同上书 I, p. 194。

78 见拉什顿·库尔班 (Rushon Coulbourn) 主编的 *Feudalism in Histor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 Press, 1956)。见克劳德·卡恩,“Au seuil de la troisième année: Réflexions sur l'usage du mot 'féodalité'”,载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III, Pt. 1, April, 1960, pp. 2~20; 多布 (Dobb), *Studies*, pp. 33—37; 勒费布里, *La Pensée*, No. 65; 亨利克·洛米安斯基 (Henryk Lowmianski), “The Russian Peasantry,” *Past and Present*, No. 26, Nov. 1963, pp. 102—109; 乔舒亚·普劳尔 (Joshua Prawer) 和 S.N. 艾森施塔特, “Feudalism”, 载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and Free Press, 1968), V, pp. 393~403; 乔治·韦尔纳茨基 (George Vernadsky), “Feudalism in Russia,” 载 *Speculum*, XIV 3, July 1939, pp. 300~323; 马克斯·韦伯, *Economy and Society* (Totowa: Bedminster Press, 1968), I, pp. 255~256。

79 多布, *Studies*, p. 66。

80 见查尔斯·吉布森 (Charles Gibson) 的讨论,在讨论中他表明国王如何直接管辖这些委托监护地,管理者叫督办 (Corregidores), 这是从我们所称的“强制的商品性农业劳动制度”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向农民征税的机制,其中,督办事事实上成了包税人。见 *Aztecs Under Spanish Rul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 Press, 1964), pp. 82~97。

81 “像这样在德国易北河以东恢复起来的农奴制，不是退回到以前的状态，也不是过时的中世纪形式的简单重复。‘再版农奴制’得以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影响，已把新的法则强加在地方的社会发展上。

第一，必须保证不断增加粮食产量。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放弃中世纪鼎盛时期出现的三圃制的技术，容克地主从荷兰引进了更新式的草田轮作制技术，并使之适应自己的需要（‘普鲁士的轮作经济’）。

第二，农业生产的目的不再是糊口经济（subsistence economy）生活资料的生产，而是成为具有世界市场价格的商品。

结果，对农民的封建榨取呈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特征。……”亨利·H·斯塔尔（Henri H. Stahl），*Les anciennes communautés villageoises roumaines - asservissement et pénétration capitaliste*（Bucarest: Ed. de l'Académie de la République Socialiste de Roumanie, 1969），p. 15。

82 见巴古，*Pensamiento Crítico*, No. 27, pp. 34~35, 42~53, 61。

83 见路易吉·布尔费雷蒂（Luigi Bulferetti），“L'oro, La terra e la società: una interpretazione del nostro Seicento,” 载 *Archivio Storico lombardo*, 8th ser., IV, 1953, passim。

84 路易斯·瓦伊塔尔，“España antes y después de la conquista de América,” 载 *Pensamiento crítico*, No. 27, abril 1969, p. 12。

85 沃尔夫，*Peasants*, p. 54。

86 “封地授与[威尼斯人]，有充分的使用自由；除了希腊人和犹太人，它可以交换，可以转让。”见阿布拉特（Abrate），*Economia e storia*, IV, p. 262。

87 彼得罗·瓦卡里（Pietro Vaccari），“I lavoratori della terra nell'occidente e nell'oriente dell'Europa nella età moderna,” 载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ffari*（Milano: Istituto Edit. Cisalpino, 1957），II, p. 969。

88 亨利·斯塔尔，*Les anciennes communautés*：“每个‘历史时代’的特征是在一个单一的文化范围内许多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共同存在。总是存在一些处在前沿的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一个‘历史时代’所呈现的性质必然是最先进国家所固有的影响，那些后进国家必须服从该‘时代’的法则[p. 17]。

89 “委托监护主把贡物投资于各种事业：采矿、农业、畜牧业、工业、商业。但在外部需求的左右下，这些投资大多集中在采矿业，后来是畜牧业。”何塞·米兰达（José Miranda），*El tributo indígena en la Nueva España durante el siglo XVI*（Mexico: El Colegio de Mexico, 1957），p. 186。关于纳贡与蚕丝生产的关系，

见 pp. 197~204。关于纳贡与向非农业人口供应粮食等基本必需品的关系,见 pp. 204~223。

90 “在法律原则上,委托监护是为了使印第安人西班牙化而实行的一种宽厚的代理权。其基本特征是官方把一群群印第安人委托给享受特权的西班牙殖民主义者。接受委托者叫做委托监护主,有权接受委托给他们的印第安人提供的贡物和劳役。在委托的有效期间内,印第安人虽难于抵制主人对贡物和劳役的索取,但仍被看成是自由的,理由是他们不像财产一样为委托监护主所拥有。他们的自由确定了委托监护制和奴隶制间的某种法律区别。……委托监护权的授与不包括地产权、司法审判权、所有权。”见吉布森, *The Aztecs*, p. 58。关于委托监护制下印第安人的司法、经济和社会情况的描述,见 J.M. 奥茨·卡普德基 (J.M. Ots Capdequí), *El estado español en las indias* (Mexico: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1941), pp. 24~33。

91 “目的……是建立一种自愿的雇佣劳动制度,工作量较有节制;但预见到印第安人可能不会自愿地服役,该命令进一步指示在殖民地的皇家权力机关向需要劳动力的殖民主义者提供劳动力。从某个角度看,该命令是为防止种种弊端而提出来的,这些弊端产生于西班牙主人与被委托监护的印第安人之间的直接隶属关系,前者要迫使后者劳动。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其意义在于这一事实:如果建立这种自愿劳动制度的努力竟因印第安人拒绝接受工作而失败,国家马上就以调停人的身份介入,迫使劳动者工作,保护公家利益。”西尔维奥·萨瓦拉 (Silvio Zavala), *New View points on the Spanish Colonization of America* (Philadelphia: Univ.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43), p. 94。又见他的经典著作 *Le encomienda indiana* (Madrid: Centro de Estudios Historicos, 1935)。这方面观点的集成,见约翰·F·班农 (John F. Bannon) 主编的 *Indian Labor in the Spanish Indies: Was There Another Solution?* (Indianapolis, Indiana: Heath, 1966)。

又见阿尔瓦罗·哈拉关于智利的委托监护制的论述:“土著被强迫接受一种生产制度,这种制度要求他向西班牙提供大大超过他自己生活需要的剩余产品,而且他的生活必需品早已减少了。”*Guerre et société au chili: Essai de sociologie coloniale* (Paris: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de l'Amérique Latine, 1961), p. 46。

92 萨瓦拉, *New View points*, p. 95。

93 这似乎是巴古的观点,见 *Pensamiento crítico*, No. 27, pp. 32~33。西班牙王室 1549 年废除了委托监护制下的人身奴役,葡萄牙王室同类措施是

收回总督辖区的世袭权，总督由国王任命。第一次采取这种行动就在同一年，即1549年。见J. 卡皮斯特兰诺·德·阿布雷乌(J. Capistrano de Abreu), *Capitulos de historia colonial (1500—1800)* (Rio de Janeiro: Ed. da Soc. Capistrano de Abreu, Typ. Leuzinger, 1928), pp. 63—76。

94 路易斯·瓦伊塔尔表明：“征服初期，委托监护主们企图坚持他们的独立性。西班牙国王急于要避免在美洲出现一群可能最终否认其权威的领主，就建立了强有力的行政机关，以反击任何封建反抗为目的。……委托监护主不是印第安人的主人，不能对他们进行审判，因为‘印第安人不是委托监护主的农奴，而是国王的臣民。……’这样，用货币纳贡的委托监护制取代了劳役的委托监护制。……拿薪金的工人意味着两个阶级间萌芽中的资本主义关系，以及新的工人阶级的形成。”*Latin America*, pp. 37—38。

何塞·米兰达：“首先，委托监护主是他那个时代的这样一种人：为获利的欲望所驱动，发财是他的目标。在他的同时代人看来，委托监护主是个实干家，对新世界的理想和欲望最强烈地反映在他身上。他与中世纪的人是非常不相同的。……他不像封建领主那样，只是把自己的抱负限于享受贡物和劳役，而是把它们转变成多种收益的基础。……这样，委托监护主使委托监护制的劳动力征募方法[摊派劳役制]含有的资本主义因素显得非常突出，就是这种因素能把他引向如此热心追求的目标——财富。见“La función económica del encomendero en los orígenes del régimen colonial, Nueva España (1525—1531),” *Anales del Instituto Nacional de Antropología e Historia*, II, 1941—1946, pp. 423—424。这是一个在世界观上和行动方式上的资本家，但如米兰达所指出的，他不是把金融资本带到企业来的资本家(见同上书 pp. 431—444)。他最初的资本是国家给予他的，他后来的资本来自利润。

95 费尔南多·纪廉·马丁内斯(Fernando Guillén Martínez)推论道：“事实是，‘委托监护制’和‘米塔制’作为一种制度只能在以下地区存在下来：印第安人凭借自己数量上的优势和惯性的力量，维持了自己的部落制度。在酋长(部落首领)职位拥有魔力般的关系以及民众的心灵中抱有集体的奴隶意识的情况下，印第安人都以顺从的方式庄重地从事劳动并接受对他的残杀。但当宣讲福音活动和人种混杂过程瓦解了部落，为个人主义让出地盘时，印第安人就会不再允许自己屈从于有组织的被奴役状态。……”*Raíz y futuro de la revolución* (Bogotá: Ed. Tercer Mundo, 1963), p. 80。关于米塔制的定义和起源，见奥茨·卡普德基, *El estado español*, pp. 31—32。

96 富尔塔多在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中,论证说,事实上,凡是传统的地方统治阶级软弱的地方,“委托监护制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方式已被证明是无效的,委托监护主诉诸更直接的奴役方式,强迫男人们在与他们所习惯的条件极不相同的环境下从事强化劳动。这种制度导致人口迅速耗损 [pp. 10~11]。”

97 “1559年的《桑蒂利亚限制》的法令规定,把1/6的砂金,即“塞斯穆”(sestro)分给每个被委托监护的印第安人,每年付给他们作为劳动报酬。从这时开始,就已经有可能证实这种集体参与的方式获得了很确定的社会的或公有的薪金特征,这种薪金以一次总付的方法进入每个印第安群体或村庄的金库。”阿尔瓦罗·哈拉,“Una investigación sobre los problemas del trabajo en Chile durante el período colonial,”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XXIX, 2, May 1959, p. 240。

98 严格地讲,在中世纪,有些地方根本不存在封建制度,它们只知道‘再版’,从来不知道初版的封建主义。斯塔尔(Stahl)用摩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情况证实了这一点。见 *Les anciennes communautés*, pp. 241~244。

99 东欧的自然财富……要求作出很大的努力才能靠它获利。12和13世纪各国间形成了一定的力量均势局面,这意味着相互间的人侵不会为任何一方带来可观的利益,而德意志对波希米亚和波兰的压力又构成了很严重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教俗贵族被迫对开发他们自己的资源予以更多的关心。可是,只有与农民合作,这才是可能的。农民的义务一直都不确定,农民们害怕自己的剩余产品会被剥夺,他们对改善工作方法没有兴趣。另一方面,领主还没有能力向自己的农奴提出更多的要求,因为后者可以很容易逃走。这样,诸侯和那些希望在经济上开发自己地产的领主被迫去鼓励自己的臣民更精心地劳动,并引进新的方法,特别是与农业相关的新方法。他们靠引用德意志的或更正确地说是西欧的惯例而达到了目的,农民缴纳的款项不仅因此得到调整,而且还有所减少。各种劳务和用实物缴纳的地租等一律折算成货币,这办法在波希米亚13世纪早期就已开始,稍后也在波兰实施。它已经反映出农业的发展和社会劳动分工的进步。M. 马洛维斯特,“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tability of the Western Sudan in the Middle Ages,” *Past and Present*, No. 33, April 1966, pp. 14~15。见杰罗姆·布卢姆(Jerome Blum),“Rise of Serfdom in Eastern Europ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II, 4, July 1957, pp. 807~836。

100 收租人(Grundsherr)变成了直接生产者(地主)(Gutsherr)。见汉斯·

罗森伯格 (Hans Rosenberg) 的论述, *Bureaucracy, Aristocracy and Autocracy: The Prussian Experience, 1660—1815*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 Press, 1966), Ch. 1. 关于斯洛文尼亚贵族如何靠扩展领地、提高应交给他们的地租和接管商业而克服自己财政困难的讨论, 见费尔多·盖斯特林 (Ferdo Gestrin), "Economie et société en Slovénie au XVI^e siècle," *Annales E. S. C.*, XVII, 4, juil. - août 1962, p. 665.

101 “殖民地的东埃尔比亚[在 15 世纪前]就有了个别的容克,但还没有容克阶级,除了条顿骑士。一个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土地贵族阶级的形成是 15 和 16 世纪间的事情,这个阶级有很大的政治和社会野心,显示出坚定性和阶级意识,即在防御和侵略中造就的集体意志及种性般的自信和团队精神。……按年代讲,这与乡绅在英国和匈牙利的出现,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土地贵族、波兰的小贵族 (szlachta) 的出现相一致,与法国和西部德意志的靠收封建领地地租为生的有闲贵族和不在籍地主在经济、政治上的衰落也相一致。汉斯·罗森堡, "The Rise of the Junkers in Brandenburg Prussia, 1410—1653,"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LIX, I, Oct. 1943, p. 4。注意,罗森堡把英国与东欧国家包括在一起。下文我们会看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引起混淆。把英国的乡绅和东欧的地主联系起来的依据之一是 Zs. P. 帕赫 (Zs. P. Pach) 提出来的,他说两者都是“资产阶级式的”。见 "Die Abbiegun der Ungarischen Agrarenentwicklung von der Westeuropaischen," 载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Stockholm, 1960, Résumés des communications* (Göteborg: Almqvist & Wiksell, 1960), p. 155。

102 M. 马洛维斯特, "Poland, Russia and Western Trade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Past & Present*, No. 13, April 1958, p. 32。再见 M. 马洛维斯特, "The Problem of the Ine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urop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X, 1, April 1966, pp. 15~28。斯坦尼斯拉夫·豪斯佐夫斯基 (Stanislaw Hoszowski) 引用 17 世纪上半叶一位英国外交官乔治·卡鲁 (George Carew) 爵士的话说:“波兰已经成了欧洲的粮仓和造船材料的货栈。”见 "The Polish Baltic Trade in the 15th - 18th Centuries", 载 *Poland at the X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in Stockholm* (Warsaw: the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1960), p. 118。

103 见马洛维斯特, *Past and Present*, No. 13, pp. 26~27。

104 弗雷迪·蒂里耶 (Freddy Thiriet) 在 *La Romanie vénitienne au Moyen Age* (Paris: Boccard, 1959) 一书中描述了殖民地的初级产品与宗主国城市的制

造业产品的交换 (pp. 304~305)。克里特岛被说成是帝国的“面包篮”(p. 414)。至于与帝国以外的国家的类似关系,是由于“帝国的小麦不足”引起的,见 pp. 327~328。

105 见海梅·维桑·维韦斯,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pain*, ch. 17, esp. pp. 211~215。

106 奥利维拉·马克斯 (Oliveira Marques),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II*, p. 449。

107 见菲利普·多林格 (Phillipe Dollinger), *La Hanse* (XIIIe - XVIIe siècles) (Paris: Montaigne: 1964), pp. 76~80。

108 布罗代尔,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p. 94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4页)。

109 B.H. 斯利彻·范巴恩 A.A.G.B. No. 12, p. 28。见卡尔·赫莱纳:“到16世纪时,地区间的海上粮食贸易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可是,也许值得提出的是,现在由于更复杂的市场机制的发展,而首要的是在东埃尔比亚、波兰和爱沙尼亚可随意处置的剩余粮食的极大增加,那些长期和暂时缺粮的地区因而可以比以前从国外获得更充分、更定期的粮食供应。到16世纪中,每年从但泽港输出的谷物量是1490—1492年年平均输出量的6~10倍。……在这一时期,两种或三种新的重要的动物食品资源向欧洲人敞开:从科德角半岛到拉布拉多的多产的浅海渔场,出产越来越多的丰富的蛋白质;同时匈牙利、瓦拉几亚的平原,还有过去某些时间的丹麦的低地,成了为向奥地利、德意志、荷兰出口而大量饲养公牛的地方。”见 *Camb. Eco. Hist. Eur.*, IV, pp. 77~78。

110 雷金纳德·R. 贝茨 (Reginald R. Betts), “La société dans l'Europe centrale et dans l'Europe occidentale,” *Revue d'histoire comparée*, n. s., VI, 1948, p. 173。

111 Zs. P. 帕赫; “The Development of Feudal Rent in Hungar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X, 1, April 1966, p. 13。

112 “西欧经济的崛起成了东欧城镇衰落最强有力的原因之一。”见哈通和莫斯尼尔 (Moustier),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IV, p. 46。“从15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波兰经济的特征是建立在农奴劳动基础上的领地经济的扩散。这必然也妨碍了城市的发展,对国家的经济社会情况具有普遍的消极影响。见豪斯佐夫斯基, *Poland at the XIth Inter-*

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in Stockholm, p. 117.

113 见多琳·沃里纳 (Doreen Warriner), "Some Controversial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Agrarian Europ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XXXI, No. 78, Dec. 1953, pp. 174~175.

114 贝茨 (Betts) 争辩说, 这些入侵和“再版封建主义”, 与西欧中世纪早期受到的人侵和“初版”封建主义是可以类比的。见贝茨文, 载 *Revue d'histoire comparée*, p. 175。他讲明了往后几次入侵对东欧统治者的影响, 见 pp. 175-180。多琳·沃里纳推测: “如果 [欧洲的] 贸易通道不曾在去海外寻找金银时 [从东欧] 往西转移 (相对地讲), 东欧可能会继续追随像西欧那样的发展道路, 使贸易和城镇的扩张成为封建社会和封建经济的溶解剂。或者, 会有另一种可能性, 西欧在 15 世纪时的萧条或许已经移往东方。” 见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XXXI, p. 176。

115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 (André Gunder 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7), p. 9。弗兰克继续说: “经济发展和低度发展不只是相对的和量的差别, 不只是一方比另一方表现出经济上更为发展; 经济发展和低度发展既是量上的区别又是互相联系的。这表现在一方的结构与另一方的不一样, 而这种不一样又是由它与另一方的关系造成的。然而, 发展与低度发展在以下意义上又是一样的: 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的单一的、但又是辩证地矛盾着的经济结构和发展过程的产物。”

116 欧文·拉铁摩尔, "La civilisation, mère de Barbarie?" *Annales E. S. C.*, XVII, 1, janv. - fevr. 1962, p. 99.

117 欧文·拉铁摩尔,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de Scienze Storiche*, I, p. 110。莫顿·弗里德 (Morton Fried) 提出了一个很相似的观点: “在一种很特定的意义上, 大部分部落看来都是次生的现象, 它们很可能是在其他组织上远为单纯的社会中出现了组织上相对高级的社会而不断受到刺激作用的产物。如果这一点可以证实的话, 部落可以看成是对复杂的政治结构产生的一种反应, 而不是这种政治结构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的预备阶段。” 见 "On the Concept of 'Tribe' and 'Tribal Society'," 载琼·赫尔姆 (June Helm) 主编的 *Essays on the Problem of Tribe*, 美国人种学学会 1967 年春季年会纪录汇编, p. 15。

118 事实上, 对这种细小差别的积累性后果的认识, 为克服关于量和质的有些乏味的争论提供了一个桥梁。我同意 P. C. 戈登-沃克 (P. C. Gordon-Walker) 的看法: “质的变化和量的变化的区别是一种虚构的区别。如果历史学

家们从量上、从程度上看变化,他们就会发现‘质的变化’事实上只是量的变化的结果。这一道理对思想和社会观的变化,以及对经济组织的变化都是适用的。……

“质的变化不是其他什么东西,而只是此前量的变化中已达到一定强度的阶段。”见“Capitalism and Reformation”,载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Ⅷ, 1, Nov. 1939. pp. 4-5。

119 特拉扬·斯托扬诺维奇 (Traian Stoianovich) 表明了西欧与东南欧在同样增长上的悬殊:“如果说在 15 世纪时,人们发现在巴尔干各社会的铁的倾向性与西欧的铁的倾向性之间只有很少的量的差别,但到 1700 年这种差别便十分明显,1800 年的差别则相当大,1850 年时更大得难以相信。”见“Material Foundations of Pre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n the Balkans,”载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IV, 3, Spr. 1971, p. 223。

120 伊夫塞·D. 多马 (Evsey D. Domar) 假设说,“一种[与奴隶制和农奴制现象]有关的农业结构的三种因素中,即自由土地、自由农、不劳动的地主的三种因素中,任两种因素但决不是所有的三种因素能够同时存在。现实中可见到的结合方式将取决于政治因素的变化——政府的措施。……”见“The Causes of Slavery or Serfdom: A Hypothesis,”载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X, 1, March 1970, p. 21。

121 在西属美洲,“创建和构成等级制度,即一些群体永远从属于另一些群体的企图,并没有得到法律上的批准,除了在初期的或者临时性的情况下。官方关于印第安劳动力的人身立法从未真正承认白人、印第安人、梅斯蒂索人之间司法上固有的不平等。……

“正是由于法律上的预防措施及剥削阶级(土地所有者及与之联盟的官僚)的行动具有超乎法律之外的伪装,使这个统治阶级终于具有不负责任的,劫掠的和非人的暴力特征。凡在贵族阶层与国家携手结合,其特权的经济状况受到国家坚决支持的地方,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例如德意志、法国或意大利就是这样。

“这方面的证据见于以下事实:国家批准把黑奴运入新格拉纳达,在安蒂奥基亚的矿山上采矿,成为里奥考卡(Rio Cauca)地区或大西洋沿岸的农业劳动者。奴隶们从其主人得到的家长式的待遇,与分派给委托监护主的印第安部落此前所得到的待遇相比,相对不是那么残暴、较为有道德或不太野蛮的。黑奴所有者享有的特权得到法律保证,而且奴隶制可保稳定的意识使这些所有

者有了一种具体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在印第安人所隶属的委托监护主那里是没有的。”见纪廉(Guillén), *Raiz y futuro*, p. 81。

122 阿尔瓦罗·哈拉 “Salario en una economía caracterizada por los relaciones de dependencia personal,”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 (Paris Mouton, (1968), p. 608。

关于委托监护制下印第安人低下的生活水平的进一步的证据，可以在生产靛青的危地马拉看到。1563年，西班牙王室维持先前的基多检审庭(Audiencia)的决定，禁止使用印第安人在这种地产上劳动，因为这是“非常有害的工作”。罗伯特·S·斯密(Robert S. Smith)指出，该命令未起作用：

“1583年，殖民官员发现，靛青种植者已想出了一种巧妙的逃避手段：不是用工资雇佣印第安人，而是与印第安人订合同，让他们把靛青作物拖出来，每次的装载量都非常重，把衣服付给他们作工资，数量只值他们本应得到的货币工资的1/10。……7年后，检查官发现，‘许多梅斯蒂索、穆拉托和自由黑人，甚至奴隶（即政府指望由他们来做这一工作的劳动者）都在违犯这一法律规定，以微不足道的工资雇佣印第安人收获和运送希奎利特(Xiquilite，靛青主要来源的作物)。”见“Indigo Production and Trade in Colonial Guatemala,”载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XXIX, 2, May 1959, p. 187。甚至奴隶也雇佣印第安人——发展到这种程度！

123 西班牙人征服美洲后表现出来的“最初目标，是强烈地集中于在所占领和居住的不同地方建立矿山经济。……印第安人给予欧洲人的最根本的东西是贵金属，殖民地的产品看来处于较次要地位。”阿尔瓦罗·哈拉，*Grandes vías marítimas dans le monde XV—XIXe siècles*, pp. 249~250。哈拉指出，显示海上贸易量的文献在这方面是很明确的：“除了1591—1600和1621—1630这两个十年，1503—1660年间的所有其他年份看来都符合这一公式：矿山的生产越多，海上的商业运输量就越大[p. 266]。”

124 马克斯·韦伯对种植园和地产经济进行了区分，后者是一个经常使用的术语。主要的区别看来集中在劳动控制形式和典型的产品上。见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50), pp. 79~92(《世界经济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68~95页)。按韦伯的看法，庄园生产园艺产品，典型的是甘蔗、烟草、咖啡、棉花。地产用来饲养家畜或种植小麦，或两者结合。我不能肯定这样的区分法是否有用，比如，东欧的“地产”(按这里的定义)与英国的“地产”并不相像，与美洲的种植园却非常相像。

125 可是，南欧在向半边缘化的发展过程中人口密度下降了，这将在下文讨论。海梅·维桑·维韦斯在评论玛丽安·马洛维斯特一篇有关东欧发展的文章中，把东欧和加泰罗尼亚作了以下比较：“事实上，作为专家我们已注意到，有一个地区农民阶级的演变与15世纪波兰的这种演变极不相同，这就是加泰罗尼亚。如果说，这两个地区在我们所说的‘再版封建主义’上有非常惊人一致的地方，这种相似性也不能用同一原因来解释。马洛维斯特先生追随他的波兰前辈，把15和16世纪波兰在波罗的海上的商业发展和国内市场的扩大——城市发展的正常结果，看成新的封建化开始的首要环境因素。加泰罗尼亚正好相反，农民司法地位恶化的根源，一方面是地中海商业的衰微，另一方面是这一地区城镇人口的减少。所以从相反的事实出发，人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Comments made on the “Rapport de M. Malowist,” p. 148。

这种说法与事实相距很远，我认为维桑所刻划的马洛维斯特的立场并非完全确切。我相信他未看到关键之处。波兰和加泰罗尼亚农民被加上新的身份的原因是一致的。所不同的仅仅是其出发点，14世纪时加泰罗尼亚在欧洲曾是最先进的地区之一。加泰罗尼亚居民的减少和波兰居民的增加可能曾导致互相非常接近的人口密度，在“延长”的16世纪末，这反映它们在欧洲的世界经济体中地位的差别并不太大。

同样，考虑到皮埃尔·让南所指出的：事实上波罗的海诸港口在16世纪时其规模和活动都增加了，他告诫我们不要夸大边缘地区城镇的衰落，我们必须承认的确如此。见“Les relations économiques des villes de la Baltique avec Anvers au XVI^e siècle,” 载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LIII, 3, Sept. 1956, p. 196。但有几件事需要记住：(1) 国际贸易的增加当然要导致港口活动的增加，但行政中心和地方贸易中心又怎样呢？(2) 总的人口正常增加时，结果应该是城镇绝对范围的扩大，但城市面积的相关比例又如何呢？(3) 甚至边缘地区城镇人口的相对增加，相应于西欧城市化的程度而言，仍可能是（而且无疑是）相对地衰落。

126 更精耕细作的农业要求农民有较好的生活条件。见阿丹特论什一税如何阻滞了生产率的提高 (*Théorie Sociologique de l'impôt*, I, p. 208), 及固定的赋税和租金如何鼓励了生产率提高 (同上书, I, pp. 225~226)。

127 维托尔·库拉 (Witold Kula) 把理论上的窘境表达得很清楚：“这么一种制度，它把‘再生产’的功能，即照管牲畜的主要责任交给了农奴，由此为牲畜饲养创造了可能是最坏的条件。农奴对牲畜粗心大意，因这不是他们的而

是领主的利润来源。这是不管谁管理这个庄园都要担心的事情。在粮食短缺之年,通常是降雨量少的年份,农奴在喂牲畜还是喂自己这两种选择面前想到的首先是自己!选择结果是很容易推测的。最后,公牛的低生产率使大群饲养成为必要,这又进一步恶化了饲料供应的困难。”见 *Théorie économique du système féodal: Pour un modèle de l'économie polonaise, 16e - 18e siècles* (Paris: Mouton, 1970), pp. 31-32。上述考虑不只是理论上的。埃马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表明,这确实发生在 1515—1530 年间的朗格多克。见 *Les paysans de Languedoc* (Paris: S.E.V.P.E.N., 1966), I, p. 323。

128 见克里斯托夫·格拉曼,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pp. 45-52 (卡洛·M. 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 2 卷,商务印书馆,1988 年版,第 400~406 页)。“牛的贸易的鼎盛时期正好与贵族的黄金时代吻合 [p. 50]。”(中译本第 405 页)。

129 朗格多克的情况,见勒鲁瓦·拉杜里的描述:“开垦减少了放牧的土地,种植园(橄榄、栗子等)、梯田、用石头圈占土地都限制了公用的敞田(open fields)。由于所有这些原因,牲畜饲养进入停滞时期,然后衰落。在这种古老的农业型式中,农民还不知道饲料作物或仅仅限于在庭园中种上一些,所以同时发展家畜和蔬菜生产是不可能的。饲养家畜和种植蔬菜的要求互相矛盾,两者都寻找那仍然空闲但日益稀少的土地。由于缺少像西班牙的马斯塔(Mesta)那样的特权以保障家畜饲养者的利益,一个正在经历扩张的传统社会很快就牺牲了养牛业的发展。”*Les paysans de Languedoc*, I, p. 324。

130 见 J.H. 帕里,“Transport and Trade Routes,” 载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E.E. 里奇(Rich)和 C.H. 威尔逊(Wilson)主编,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7), p. 191。

131 见下述 1600 年的欧洲与 1500 年的欧洲的比较:“首先,仍然是主要活动领域的农业部门,已比 1500 年时有能力养活多得的人,并使他们吃得更好;由于与海外世界贸易的发展,纺织业比 1500 年有了重大变化,采矿业、金属工业也有大得多的进步。”见毛罗, *Le XVIe Siècle européen*, p. 257。

132 达比, *Rural Economy*, p. 325; 又见 p. 275。可是在卡斯蒂利亚,发展的情况似乎有些不同:“在 14 和 15 世纪,卡斯蒂利亚贵族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其重要性压倒一切,因而他们支配了国家。卡斯蒂利亚贵族不像其他西欧王国的贵族那样,采取防御性立场,而是完全相反,他们改朝换代,接管王家世袭权

力,把王权变成实现野心的工具。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王权不能指望城市的牢固支持。许多卡斯蒂利亚城市站在贵族一边,还有更多的城市则屈服于贵族。”见维桑,*An Economic History of Spain*, p. 245。所以,维桑论证说,16世纪时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和安达卢西亚大地产崛起,14和15世纪大量土地的赏赐为此准备了条件。见 pp. 247~248。

133 而且,就农民抵抗力量问题,多布进而说道:“地方领主要想战胜农民的反抗并强有力地阻止农民逃离庄园,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是否使自己容易做到这一点,这得依情况而定;而且还有国王的力量施加其影响加强或削弱领主权力的程度,或相反,对削弱同他竞争的那部分贵族地位的机会,采取欢迎态度。……”见 *Studies*, pp. 51~52。

134 可是,“从16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此前对圈地完全保持沉默的佃户变得大叫大嚷起来,斥责那些在牧场占有土地的人们,于是阻止他们获得新的土地,这些土地是为满足正在增长的人口的需要的。这种愤怒通常通过合法的渠道表现出来,但很明显,他们越来越表现出不愿服从法律,并要推翻圈围土地的篱笆。”布兰查德,(Blanchar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XIII, p. 440。

135 关于农民有效的抵抗程度不同这一点,布罗代尔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释:不同的人口密度,在把中欧稀疏的居民点与意大利人口稠密的居民点(“村庄-城市”)及莱茵河、默兹河、巴黎盆地上的中心城市比较后,布罗代尔写道:“在中欧和东欧的许多国家,村庄的规模小,难道不正是决定农民命运的主要因素之一吗?由于缺少巨大共同体的同心协力,农民更无力量抗拒贵族的压迫。”见 *Civilization matérielle*, p. 42(《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卷,第67页)。

136 H.K. 高桥由一(Takahashi),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A Contribution to the Sweezy - Dobb Controversy,” 载 *Science and Society*, XVI, 4, Fall 1952, p. 324。

137 布洛赫, *Caractères originaux*, I, p. 154(《法国农村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70页)。

138 见达比:“分成制给主人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优点。它能使他们既从农产品价格上涨中,又从所期望的领地生产率的增长中得到好处。……地主即使在参与最少,的情况下,契约仍能保证他从纯利润中获得重要份额。[假设比他把土地租给农民时的收入要多。]因为我们不应忘记,分成制租佃者必须从分给他的那部分中扣除种子,有时还有什一税,这在农业产量通常很低时是—

个沉重的负担。尽管如此,这种制度还是有领主充分了解的种种不便之处。作物中大量的波动变化的情况需要严密的监督管理。”见 *Rural Economy* pp.275~276。

139 像达比所说的,分成制对地主的好处是“种植成本低,在市场上出售产品的利润高……非常高[同上书,p.280]”。

140 史蒂文·N.S. 舍恩 (Steven N.S. Cheung) 从理论上阐明了这种主张:“分成制契约的条款,除了其他方面,还包括承租的百分比,即土地投入与非土地投入的比率,和即将种植的作物种类。这些是由地主和租佃人互相决定的。可是,对固定地租和工资的契约来说,即使这是按市场价格决定的,也只有一方才能决定,他将使用对方多少资源,以及他将种植什么作物。而在分成契约中,由于所分享的产量是基于实际产量,所以领主必须努力弄清收获量。因此,与固定地租和工资的契约相比,分成制的契约在谈判和实施上更为复杂。……”

“如果交易费是那时唯一考虑的事情,……就决不会选择分成制契约的方式。那么又为什么选择分成制的契约?……按照固定地租的契约,佃农承担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各种外在于生产职能的因素的]风险,[这些因素会造成产量大不一致];按照工资契约,地主承担大部分风险,即使不是全部的话。分成制在那时可以看成是一种分担风险(或分散风险)的手段。……”见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Chicago, Illinois: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9), pp.67~68。

141 “粗略地讲,16世纪以前,分成制分布得极不平衡,即使在那些已采用的地区也仍十分稀少。但从16世纪开始,它在全法国传播,并至少到18世纪,在法国甚至分布的面积更大。防止货币的波动,没有比这更可靠的方法。意大利资产阶级都是些精明的理财家,最先认识到这一点。即使有时他们不曾走得那么远——比如,博洛尼亚开始于1376年——占统治地位的城市里的每个公民用法律手段把土地租给城市周围地区(contado)被控制而且屈从于压力的居民,与他们订立这种契约,法国的土地所有者没多久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见 *Caractères originaux*, I, p.152,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42 “在永久租佃的情况下[产生于自由持有地,即按照法律规定实行终身租佃],执行分成制契约的费用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却步,因为对付不好好履行契约的分成制佃农,令其退佃是一种有效的手段。”见舍恩,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p.34。

143 达比, *Rural Economy*, p. 327。

144 对比这两个地区的形势, 布罗代尔说: 在地中海地区, “庄稼从下种到收割很少能避过连续发生的多种危险的威胁。产量很差, 除了小块用作种子田的土地, 地中海地区总是处在饥荒的边缘。” 见 *Civilization matérielle*, I, p. 223。

阿尔多·德·马达伦纳 (Aldo de Maddalena) 不同意上述观点: “一般说来, 人们应该认识到, 除了特殊的情况, [意大利] 耕地的生产率是很低的。布罗代尔把地中海地区土壤的低生产率归咎于气候因素, 但要对这种现象作出更有效的、能经得起历史事实检验的说明, 还应该同时考虑到技术设备、文化体制、农民所信奉的教条、商业容量、资金多寡、行政和社会结构、政治和军事的变迁等等方面的缺陷。” 见 “Il mondo rurale italiano nel cinque e nel seicento,” 载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XVI, 2, giug. 1964, p. 423。无疑, 人们应该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 但把什么东西都写进一本书里, 平分秋色, 使那些可能是真正的原因隐没其中, 这不是一种有助于解决问题的办法。不管怎样, 请注意西尔维亚·思拉普关于中世纪意大利北部土壤高度丰饶的观点, 见前面脚注 52 的引文。

145 鲍里斯·波尔契涅夫 (Boris Porchnev) 注意到, 这一时期在法国大庄园没有像在英国那样发展起来: “不过, [这类地产] 作为一种经济倾向来看, 仍好像很少发展, 只是稀稀拉拉地存在着, 特别是在边缘省份, 由于那儿离海不远, 提供了有利于商业发展的可能性。吉耶纳、朗格多克、普罗旺斯、圣东日、普瓦图、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的一些港口促进了酒、农产品的出口, 有时甚至出口禁运的小麦, 还甚至企图出口牲畜, 特别是绵羊。简言之, 贵族们企图尝试商业的禁果。” 见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en France de 1623 à 1648* (Paris: S.E.V.P.E.N., 1963), p. 289。可是要注意, 波尔契涅夫在他的名单中包括了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在后一章我们将回到这个问题。现在尚处于这个问题的多重因果关系之中, 让我们暂时把它搁着吧。

146 马克思把分成制看作正是这么一种折衷的办法: “分成制可以看成是由地租的原始形式到资本主义地租的过渡形式, ……从一方面说, 租地农民没有足够的资本去实行完全的资本主义经营。从另一方面说, 土地所有者在这里所得到的部分并不具有纯粹的地租形式。它可能实际上包含他所预付的资本的利息和一个超额地租。……地租在这里已不再表现为一般剩余价值的正常形式。一方面, 只使用本人劳动或者也使用别人劳动的租地人, 不是作为劳

动者,而是作为一部分劳动工具的所有者,作为他自己的资本家,要求产品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土地所有者也不只是根据他对土地的所有权,并且作为资本的贷放者,要求得到自己的一份。”见 *Capital*, III, ch. XLVII, sect. V, p. 803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905 页)。

147 14 和 15 世纪人口下降时期,“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地中海城市地区,那些因移居而空出来的土地只要落入市民之手,他们就广泛采用分成制契约的方式,这实际上是市民和农民的一种合作方式,以便利用可耕地生产谷类作物。”达比, *Rural Economy*, pp. 356~357。

148 “从现实施行的过程来看,分成制具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外貌,符合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的需要;他们的理想是从自己的土地上获取一部分可能换成货币的纯收入。他们用商业的眼光来管理自己的土地;他们仔细地把所分得的收获物,谷物或家畜的买卖,以及贷款的利息[高利贷的收入]等乱七八糟地记入家庭日记帐或食谱。对这些农业生产的局外人来说,主要考虑的是利息;对农事他们或多或少是无知的。”见 G.E. 德·法尔吉罗尔斯 (De Falguerolles), “La décadence de l'économie agricole dans le Consulat de Lempaut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载 *Annales du Midi*, L III, 1941, p. 149。

149 农奴解放“不是给与他们的,而是卖与他们的。”马克·布洛赫, *Caracteres Originanz*, I, p. III (《法国农村史》,商务印书馆,1991 年版第 124 页)。

150 在小块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下,“土地价格[所代表的]无非是资本化的地租。”马克思, *Capital*, III, ch. XLVII, sect. V, p. 805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 907 页)。

151 见斯利彻·范巴思, *A.A.G.B.*, Nb. 12, 164~168, 见彼得·J. 鲍登 (Peter J. Bowden): “相对于谷物生产而言,羊毛生产更具赢利性,正是这一点大体说明了 15 世纪中叶到 16 世纪中叶养羊业传播的原因,特别是在英格兰中部地区。……”

“随着呢绒产量和出口的增加,羊毛价格也上涨。把 1451—1460 年这 10 年作为基数,到 1541—1550 年时本国产的羊毛价格大约增加了一倍。而在 15 世纪晚期谷物价格保持相对稳定,并直到 1520 年后才表现出显著的上涨趋势,这已是各种物价普遍上扬之时。”见 *The Wool Trade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New York: Macmillan, 1962,) pp. 4~5。

152 “可是到 16 世纪中叶,从谷物生产转向羊毛的冲动正在减弱。土地

变少,劳动力更为充裕。谷物价格在总的价格水平急剧上涨时,也于16世纪20年代开始上升,到16世纪40年代增加了一倍。然后,1557年英国呢绒的国外市场崩溃,羊毛价格也下跌[鲍登,同上书,p.5]。”

见彼得·拉姆齐(Peter Ramsey):“很广义地说,[在英国]如果能节省劳动力,一直到1550年左右把可耕地转成牧场仍然是合算的。早期的评论家都坚持这样认为。但1570年后,如果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少于出卖谷物所得的利润,把牧场再转变成耕地可能更合算。”见 *Tudor Economic Problems* (London: Gollancz, 1968), p. 25。

153 如德吕穆谈到罗马时所讲的:“一个人口和财富都在增长的城市,在乡下的男爵看来,向它卖肉和乳酪比卖小麦更有利。结果是,他们系统地破坏了当局迫使他们限制其牧场的种种努力。贵族对利润的这种贪婪和日益偏好饲养家畜,似曾明确地伴随着名符其实的领主反动——而且,这也不是罗马农村特有的现象。”见德吕穆 *Vie économique*, II, pp. 567, 569。

乔治·达比把13世纪末以来法国家畜饲养业的扩张与“起源于城市的对肉类、皮革和羊毛日益增长的要求联系起来”。牛(和酒)生产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必然“极大地促进了法国农村的商业化。……”见“The French Countryside at the End of the 13th Century,”载伦多·卡梅伦(Rondo Cameron)主编的 *Essays in French Economic History* (Homewood, Illinois: Irwin, Inc., 1970), p. 33。

154 欧洲范围内“对谷物和酒日益增长的需求夺去了农村,特别是农民的肉类食品,因而剥夺了他们维持生计的一大要素。曾在很长时间里为屠夫保留了其最后的一些牧场的那些村庄因失去牧场而告消灭。……”

“那些人口相对缺乏的地区意味着不能在那儿追求较高的人均产量,例如阿拉贡,人们放弃了较不肥沃的土地,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工人移居他方。……于是,丰富的营养资源消失了,同时出现农民的贫困化,屈从和利润率[成本]的稳定,并助长了不充分就业。……”见何塞-让蒂·达·席尔瓦(José-Gentil da Silva), *En Espagn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subsistence, déclin* (Paris: Mouton, 1965), pp. 169~170。

155 见多布, *Studies*, p. 58; 道格拉斯·C. 诺斯和罗伯特·保罗·托马斯,“A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Western Worl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XIII, 1, Apr, 1970, p. 13。

156 多布,同上书,p. 53。

157 尤利乌斯·克莱因(Julius Klein)表明为什么会这样:“英国的圈地

运动和卡斯蒂利亚的类似过程……的同时发生达到惊人的程度。在这两个国家,圈地运动都是由14世纪养羊业的刺激而开始的。……在16世纪中叶的那几十年里,英国对被没收的修道院土地的开发和卡斯蒂利亚的王室从军事团体获得的地产,对这两个国家畜牧业的发展大有帮助。可是此后在这两个王国里,圈地显然是逐渐增加,但主要不是向大规模养羊企业发展,而是在英国主要向持有公簿的小农发展,在卡斯蒂利亚则是向定居的羊群饲养者和农业农民发展。在每个国家里,……高等法院……保护这个运动,而且在两个国家里支持着把公有地圈起来的动机都是促进定居的养羊业。在这两个国家里,最终的结果都是要促进小规模农业。……在半岛上,反对圈地运动的,事实上也就是两百年来成功地阻碍圈地运动进展的大规模流动的牧羊业。在中世纪和都铎王朝早期的英国,反对圈地的力量大半来自农业的各个阶层。”见 *The Mesta: A Study in Spanish Economic History, 1273-1836*(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 Press, 1919), pp. 314~315。

158 普鲁士和波兰的谷物输出贸易开始于13世纪末,14世纪时波罗的海诸国也跟了上来。谷物输往尼德兰、挪威北部和英国的缺粮地区,诸如芬(Fen)地区和大片的牧羊区。”斯利彻·范巴思, *A.A.G.B. No. 12, p. 170*。

159 在解释为什么这些工业出现在某些地区而不在其他地区时,琼·瑟斯克指明:

“共同的因素看来是这些:人口众多的小农的共同体,通常主要是自由持有农……或保有权几乎与自由持有农一样的佃户,……从事畜牧经济。这种畜牧经济可能依赖于制售乳制品,其农场通常早就圈围起来了,结果,庄园组织和合作耕种都很薄弱或者不存在;或者依赖于在肥沃的公用牧场上进行繁殖和饲养,那儿事实上不存在实行圈地的刺激,可耕地不多,也没有在敞田上从事合作畜牧的坚固组织。……我们在所有这一切表现的基础下面,有时可以看到这些共同因素联系起来的方法中的条理性。在定居村落的历史上,有些最适宜于做牧场的土地直到比较晚的阶段才开垦出来。很可能是立即圈起来;很可能由此产生独立的农夫组成的共同体,他们不承认小村子或村庄,而是承认家庭作为合作劳动的单位。如果该土地适宜于制售乳制品,它也就有足够的水源支持呢绒工业。在条件较差的乡村地区,即存在广阔的高沼地或大片沼泽地的公有地,而适于种植谷物的土地很少的地区,农民一定是从事饲养和养羊。公有地吸引着无地的年轻人。饲养业比从事谷物生产所费的劳动力较少,使得人们有时间从事副业。”见“*Industries in the Countryside*”,载 F.J. 费希尔(Fisher)主

编, *Essay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1), pp. 86~87。

160 斯威齐, *Science and Society*, XIV, p. 141。又见该书 pp. 146~147。琼·瑟斯克对斯威齐的假设略表支持:“但在 16 世纪初,在王国的一些边远地区仍能观察到鲜明对比的例子。康沃尔和德文、坎伯兰、威斯特摩兰及诺森伯兰都有许多共同体,以孤零零的村庄的形式分布各处,有的还保持着克兰(clan,一译氏族——译者)精神的残余,仍然几乎完全与商业世界隔绝。另一方面,在东英吉利、东部肯特一些产粮的村庄已深深卷入大规模的食品方面的商业交易活动,并且在进行买卖时似乎不再顾及任何社会责任,不管是对克兰、家庭、还是对庄园领主的责任。在高地和低地的两地区之间的地方[如西米德兰(Midlands)],这类对比就模糊不清起来。”见“The Farming Regions of England,”载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IV, 琼·瑟斯克主编, 1500-164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7), p. 15。有些人可能觉得东盎格利亚不是个确切接近中心的地区,对此,我们必须记住,16 世纪时它就处在这样的位置上,这里不是谈 20 世纪,问题就在于此,在这点上瑟斯克观察到:“当今,东英吉利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伦敦和北方之间远离主要交通道路的有点闭塞的地方。而在 16 世纪,与此相对照的是,河流伸入东英吉利的核心,它有很长的海岸线和许多港口,使它很容易与伦敦、英格兰东北部、苏格兰、尼德兰和波罗的海的市场来往。结果,它的农业很早就发展到可以服务国内和国际市场,它的专业化生产达到如此先进的程度,以致到 17 世纪初,甚至在丰收年代,许多地区粮食远不能自给……[pp. 40~41]。”

161 英格兰“技术更落后,离开大市场最远的地区,特别是西北部,最早摆脱了劳役,而在更先进的东南部,却把这些劳役保留得最久。”M. 波斯坦,“The Chronology of Labour Services,”载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4th ser., XX, 1937, p. 171; 多布, *Science and Society*, XIV, p. 161。

162 斯威齐, *Science and Society*, XIV, p. 147。

163 这点应是有保留的。东欧的贵族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当然对贵族的奢侈感兴趣。确实,让南甚至这样说:“无疑,皇家金库暂时或永久的拮据限制了贵族的购买力,但在 16 世纪北部[欧洲,即波罗的海周边国家],关于禁止奢侈消费规定的增加构成了贵族生活演变的重要变化标志之一。”见 *Vierteiljahrsschrift für Soc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LIII, p. 215。但请注意,让南仍指出国库空虚是一种限制。关键之点正在这里。在经济扩张过程中,绝对

沉溺于奢侈的现象增加了,但与西欧相比,我们或许可以说东欧在这方面是相对地下降了。

164 道格拉斯·C. 诺斯和罗伯特·保罗·托马斯在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XIII 的文章中注意到:“在生产原羊毛的牧区,在适于发展蔬菜农场的地区……这时发生了圈地运动。前者是对原羊毛需求扩大作出的反应,后者是对地方上食品需求增加作出的反应,这是由于城市范围扩大造成的。16世纪的圈地运动在英格兰的高地地区最为广泛,因为那里圈地带来的收入高于可耕地地区。这有两个原因。第一,适宜于放牧的地区人口密度低于可耕地地区;所以,……较少的居民不得不达成协议,实行圈地。第二,可能是最重要的,羊毛价格增长曾造成许多人共同占用公有地,但由于每个人都想饲养更多的羊,使用公有地的效益反而很低。对个人而言,在公有地放养另一群羊的代价接近于零;但对社会而言,每个人都这样做的代价是明确的。这样会使公有地过分放牧,羊毛总产量实际上会下降。……有权力圈占公有地的人可能会先把自己使用的地段圈起来,不准他人进入,以避免发生过分放牧的现象 [p. 13]。”

165 多布把这种人力资源称为“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因素”。*Science and Society*, XIV, p. 161。

166 波斯坦,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XX, pp. 192~193。

167 见弗朗索瓦·舍瓦利耶 (François Chevalier), *Land and Society in Colonial Mexico*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168 “货币地租的发展并不总是与劳役的折算相联系。在许多庄园上,货币地租产生于实物地租的折算。最后,货币地租可以与劳役、实物地租同时出现。最终,货币地租作为出租部分自营地的结果而兴起。见尤金·A. 科斯明斯基, *Past and Present*, No. 7, pp. 16-17。见波斯坦:“这篇文章曾心照不宣地假定,地租和劳役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在通常情况下,一方的增加会伴随着另一方的减少。”*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XX, p. 191。

169 “伴随着庄园制度衰落的封建地产结构的变化带动了地租形式的变化:在英国转向货币地租,在法国和德国是封建地租种类上的变化。此前,农民是以工作的形式直接献出剩余劳动,现在则是以现实的形式缴纳剩余劳动——产品或按产品价格折成的货币。这种变化不过如此而已……在两种情况下,封建地主都是凭借所有权,直接使用‘超经济强制’从生产的农民手中拿走剩余产品,商品交换的法则没有介入这一过程。这些从事生产的农民(佃农、租

用者)实际上占有土地,亦即生产资料。”高桥由一, *Science and Society*, XVI, p. 327。

170 韦伯令人无法反驳地说明,为什么庄园外许多力量的利害关系推动这一转变过程达到更完整的状态:“城市新兴资产阶级的商业利益……促进了庄园的削弱和瓦解,因为庄园限制了他们市场活动的机会。……仅由于佃农需承担的强制劳役和地租这一事实,庄园制度就对农村人口的购买力设下了限制,因为它阻碍农民把他们的全部劳动力投入为市场生产并发展他们的购买力。……此外,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对于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建立有着切身利益,……新兴资本家欲获取土地,这又成为他们和庄园制度利害冲突的另一个原因,……最后,国家的财政利益也插手进来,它指望庄园瓦解,可以提高农村的纳税能力。”见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p. 94(《世界经济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第80~81页,本译文略有变动)。

171 见多布:“经常发生的是,与较大的庄园,特别是与教会庄园的情况相比,较小的庄园能得到的农奴劳动力较少,不能满足需要。此外,如果发生一个庄园主‘引诱或强行绑架另一个庄园主的农奴,总是较小的庄园主最容易遭受比其富裕、强大的邻居的竞争与劫掠。所以最渴望获得法律保护的也是他们。……但有时……有相反的结果。如果一个庄园所支配的农奴劳动力的数量下降到一定关键性的数字以下,其领主必然被迫基本上依赖雇佣劳动力,只要他认为值得耕种自己的自营地。而他对自己的每个农奴能支配的强制性义务的量的问题,相对来说是较不关心的,至少比他富有的邻居对这个问题的关心要少得多,如果找不到雇工,他所能作出的选择不是增加或扩大劳役(因为无论如何这样做已是不恰当的),而是放弃耕种自营地的做法,转而找那种为使用他的土地而向他付一笔地租的佃农。”见 *Studies*, pp. 59~60。

172 布洛赫, *Caractères originaires*, I, p. 117(《法国农村史》,第130页)。

173 “在东德,易北河以东地区,以及向东延伸的斯拉夫人地区,整个旧领主制度发生了变化,确立了新的制度,封建义务已不值钱。这无关紧要,乡绅自己成了生产小麦和销售小麦的商人。他剥夺农民的田地并集中在自己手中。……地产吞噬并且榨取了保有权。在英格兰则是另一种显然不同的演变过程。诚然,在那里也同样靠广泛地牺牲农民的土地和公有土地来进行自行经营农田的开发。但是,英国的乡绅依然是主要靠地租生活的人,不过大部分地租不再固定不变。小块土地的出租最多只限定在某段期间,而且经常要听从领主的意向,在每一次重新出租时,再没有比将租金调整得同经济行情相一致更简

单的了。因此,在欧洲的两端,基本特征是相同的:构成[13和14世纪封建]危机主要原因的终身租地制已被人们抛弃了。

“然而,用这种赤裸裸的形式,法国却做不到这一点[布洛赫,同上书,I, pp.131~132]。”(上引中译本第145~146页)。

174 在英国,“缩减庄园运动的发生[比法国]晚得多:在13、14和15世纪末,而不是11、12和13世纪就已开始(大体上)。因为领地产生得晚,自然,缩减也就延迟了。”马克·布洛赫, *Seigneurie française et manoir anglais*, p.114。

175 见布洛赫, *Caractères originaux*, I, p.132~139(《法国农村史》,第146~156页)。A.D. 鲁布林斯卡娅(Lublinskaya)说到这一分析:“马克·布洛赫的这些解释在我看来是肤浅的。”可是她在文章中没有提出更好的解释。见“Préface à l' édition russe d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 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e,” 载 *Annales E.S.C.*, XIV, I, janv.-mars 1959, p.201。

爱德华·佩鲁瓦(Edouard Perroy)沿着这些思路甚至比布洛赫走得更远,因为他论证说,英国在中世纪晚期摆脱其封建特征时,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法国却实际上加强其封建特征,法国国王不仅同意这样做,而且非常主动。他的论据是这样展开的:在中世纪早期,法国曾是个受封建分裂影响最深的国家,所以国王实际上只拥有一个地主的权力,居“同侪中之首位”。加佩王朝解决这一困境的办法是把国王的领主权扩大到包括整个法国,成为一个巨大的封建金字塔形的结构,国王为其唯一的顶峰。因此,在13世纪及以后,国王们鼓励把自主地(allodial land)转变成封地,以便使这些土地处于自己的最高权力之下。见佩鲁瓦, *Le Moyen Age*, pp.370~371。

176 我们必须在论述之前指出:“在英国,专制制度的衰落,有利于乡绅地主阶级,它允许著名的‘圈地’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技术方法的转变,但实际上,由于这一转变及其影响,致使无数佃农破产和被扫地出门。在法国,通过类似的逆向发展,君主专制的胜利限制了‘封建反动’的程度。”布洛赫 *Caractères originaux*, I, p.139。

177 F.J. 费希尔描述了伦敦日益增长的食品市场,如何刺激了英格兰和威尔士越来越远的地区从事畜牧生产。见“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ndon Food Market, 1540—1610”载 E.M. 卡勒斯-威尔逊主编的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 (New York:St.Martin's, 1965), pp.135~151。

178 马克思, *Capital*, I, ch, XXXIX, p.7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第 249 页)。

179 在英国，“新工业主义的传播增强了公簿持有农的抗辩力量，他们声称小规模农耕取代大规模的畜牧业是解决国家粮食问题的唯一办法。”见克莱因，*The Mesta*, p. 344。

180 马克·布洛赫注意到，16 世纪的法国确实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绅士农场主 (gentleman farmer)，即亲自监管自己土地的领主：“如果是机智地进行管理，那么没有什么比由主人自己来经营管理更有利的了。但这必须以主人常住为条件。……但远居他地 [离开巴黎] 毕竟是一种十分遗憾的解决办法，再说，许多大地主、贵族或资产阶级对田地没有兴趣，也没有在田地上生活的情趣和空闲的时间，还不说富人拥有的土地通常非常多又非常分散，以至他们不可能都亲自经营。”见 *Caractères originaires*, I, p. 149(《法国农村史》，第 165 页)。

181 赫莱纳，*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 24。

182 布罗代尔和斯普纳，*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IV, p. 242。

183 布罗代尔，*La Méditerranée*, I, p. 67。“从属于可怕的健康和卫生条件，农民在这里不得不以很少的东西维持生活。他有主人，他是为自己的主人而生产。通常新到来时，他是来自山区家乡备受折磨的微不足道的人，他常受领主或领主代理人的愚弄。不管在法律上的确切地位如何，他在许多方面都是生活在某种殖民地般的飞地中。……平原属于封建领主。”

184 卡尔·马克思，*The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 1947), p. 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62 页)。

185 同上书，pp. 51~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63 页)。

186 多布，*Studies*, p. 55。多布进而说：“确实存在这样自相矛盾的问题，如果不是已经达到关键的生产率水平 (相对于雇佣劳动力的价格)，雇佣劳动甚至可能比不自由的农奴劳动效益更差些，从而使用不自由的劳动力可能仍会证明是有益的 [p. 56]。”他在脚注中写道：“从雇佣劳动身上得到的剩余物不必多于农奴劳动产生的剩余物 (= 为领主劳动时农奴劳动的产品)，因为，虽然我们假定雇佣劳动正在取代自营地上的农奴劳动；但实际上它不是取代，而是在农奴劳动的基础上增加了雇佣劳动作为榨取剩余物的来源。如果我们假定，领主在折算劳役时是以农奴把剩余劳动时间投入自营地耕种时所能生产的相等的成果为标准；那么，如果新的雇佣劳动力生产了任何超乎其工资的剩余

物,领主就将得到收益,因为现在他将把这笔剩余物加到他与农奴通过劳役折算而得到的租税上去。”

而且,马克·布洛赫提醒我们,对地主来说,强迫的劳役并非总是绝对自由的,特别是在办‘慈善事业’(boon works)期间通常还得向劳动者[租佃人]供应食物。因此,如果食品价格超过劳动力的价值,这就不合算了。对雇佣劳动者来说,提出工资可能少于食品的成本不免显得荒唐。但我们必须记住工作质量都很差。……[此外],当不要求必须参加强迫劳役的农民服劳役时,这意味着农民已经把劳役买回来了,即不服劳役需要向领主付一笔钱。这样,我们可以把这种赎买劳役的价格——可以合情合理地期望的一笔钱(这意味着遭受充分的社会压力的结果),加上可以把省下的餐费列入同一栏里;我们将把要取代强迫劳役的按天数计算的雇工工资列入另一栏。人们会依据这一栏的总数量是否超过另一栏,来考虑是否免除强迫劳役。”见 *Seigneurie française*, pp.116~117。

187 琼斯和沃尔夫, *Agrarian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 4。

188 马克思, *German Ideology*, p. 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2~63页)。

189 布罗代尔, *La Méditerranée*, I, p. 300。

190 布罗代尔和斯普纳,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torie*, IV, pp.241~242。

191 布罗代尔, *La Méditerranée*, I, p. 306。“这些不可缺少的移民常常不是穷困平庸之辈。他们经常带着新的技巧,对城市生活来说这同样是不可缺少的。犹太人被迫离开,是因为他们的宗教而不是他们的贫穷。在这些技巧的传播过程中他们发挥了杰出的作用。”

192 见费尔普斯-布朗和霍普金斯, *Economica*, XXVI, p. 294。比较起来,各个城镇居民阶层生活方式同当代欧洲城镇居民的生活方式的差别可能不是那么大。一份关于1559年马拉加3096户居民(约1.2万人)的研究材料会给我们一些启发。这一研究发现的阶级划分情况如下:

殷实户(*raznables*),不一定是富人,占10%

小民(*pequeños*),占70%

贫民(*pobres*),占20%

一份20世纪关于马拉加或甚至巴黎的调查会提出与此截然不同的情况吗?本调查结果是布罗代尔引用的。见 *La Méditerranée*, I, p. 413。

193 “易北河以东的德意志部分地区，从卢萨蒂亚经勃兰登堡到梅克伦堡——也就是那些尽管有德意志人(或德意志化诸侯)长期统治的而斯拉夫人仍然很强大的地区，特别在农村——人们看到，在这一时期，即从14世纪起，特别是在15世纪和16世纪上半叶，那儿的城镇里很典型地出现了限制斯拉夫人进入手工业行会的现象。这样，除了以民族为基础的区别外，我们还见到其他直接针对[斯拉夫]居民的‘社会的’区别。这是由斯拉夫人移居到城镇的强大趋势而引起的。”见卡齐米尔茨·蒂米涅斯基(Kazimierz Tymieniecki), “Le servage en Pologne et dans Les pays limitrophes au moyen âge.”载 *La Pologne au X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à Rome* (Warszawa: Académie Polonaise des Sciences, Institut d’Histoire, 1955), p. 25。

194 从城市资产阶级的观点看，在某些方面人们简直可以把经商的贵族看成“奇怪的商人”。见弗里茨·雷德利希的分析：“[反对贵族经商]的限制性规章和制裁准则看来都是在相当晚的时期发布和产生的，即到1600年时。……实际上，看来这些限制是由于贵族幼子们的职业引起的，而不是由于长子(继承人)的活动。……在相当多的情况下，颁发限制贵族从事商业活动的规定，是为了保护因贵族的竞争而受到危害的城市商人，而不是因为这种活动被认为不适于贵族。……限制的法规看来一般都是关于零售业和手工业方面的；它们总是为我们所说的农业、大规模工业……方面的企业活动留有余地，在许多情况下，还有海外贸易。”见 *European Aristocra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载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VI, 2, Dec, 1953, p. 83。

195 多布, *Studies*, p. 95。从“城市殖民主义”到“民族殖民主义”那时可以看成是一个自然的进程，这是一旦技术的扩张达到如弗雷德里克·莱恩所说的那种力量的“自然垄断”的规模时就会发生的：“在欧洲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统治一个省以上的地区从规模上讲是不利的。与此相对照，到17世纪时，除非政府的军事力量强大到足以征服一个民族王国，否则它甚至在单独的一省之内要维持垄断不准外人进入都已变得几乎不可能了。自然垄断的规模已经变了，那时已是竞争和较高的保护费用的时期，而与新的技术相一致的新的自然垄断也在建立之中。在我们的原子时代，恐怕不存在小于整个世界范围的自然垄断规模。”见“*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Organized Violence*,”载 *Venice and History*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Press, 1966), pp. 415~416, fn. 4。

196 亨利·塞(Henri Sée), *Modern Capitalism* (New York: Adelphi Co., 1928), p. 41。多布同样证明：“[在英国]，国内市场在扩大，不仅因为城镇发展和

城市市场增加，而且还在于随着雇佣劳动和出租自营地收入货币地租的增加，货币经济日益向庄园经济渗透。不过，正是外贸为商业的迅速进展提供了更大的机遇，给人印象最深的财富也是在这个领域获得的。”见 *Studies*, p. 129。

列宁也论证了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中国际贸易必不可少的作用，“资本主义国家对国外市场的需要，决不取决于社会产品（特别是额外价值）的实现规律，而取决于下面几点：第一，资本主义只是广阔发展的、超出国家界限的商品流通的结果。因此，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设想的，而且的确没有这样的国家。”列宁，*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6), p. 44(《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6页)。

正是因为世界贸易具有这样重要的作用，弗朗索瓦·毛罗能够说：正是“商业资本主义把1500和1800年间，把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年间的欧洲文明区分为一个阶段。见“Towards an ‘Intercontinental Model’: European Overseas Expansion Between 1500-1800,”载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V, 1, 1961, pp. 1-2。

197 肖尼, *L'expansion européenne*, p. 311。

198 “正是市场不够发达——生产者没有能力在超出地方范围的市场上进行交换——给了商人资本以黄金般的机会。……只要这种原始的状况继续存在，就存在这种机会，那些有办法利用这些机会的人就能获得罕见的利润。使这种状况永久化而不是把它废除，将会成为商人资本有意识的政策，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多布, *Studies*, p. 89。

199 “[在圣多美]，甘蔗种植园制度紧密地与大规模的国际商业相联系，起先是与安特卫普的大公司，后来阿姆斯特丹的大公司取代了前者。由于从圣多美运来的糖浆越来越多，上述巨大的经济生活中心在16世纪时建立了众多的制糖厂。我们应该看到，尽管葡萄牙商人在从这个岛输出蔗糖中发挥了很积极的作用，但加工过程不是葡萄牙人承担的，他们的经济太弱；而是由那时经济繁荣的国家承担的，他们拥有重要的资本来源，熟练而自由的劳动力。这就是那些已经走上发展道路的国家。”见玛丽安·马洛维斯特，“Les débuts du système des plantations dans la période des grandes découvertes,” 载 *Africana Bulletin*, No. 10, 1969, p. 29。

200 “这是一种收买货物的制度，在尚未发货前预先付款。……人们知道，250年来在卑尔根的汉萨商人靠这种方法，几乎把来自挪威北部的全部鱼

和毛皮贸易控制在自己手中。汉萨商人向挪威北部的渔民预先付款,使他们直接依附于自己。同时,这使汉萨商人在很长时间里把挪威各自治市的市民排除在这种贸易之外。”见玛丽安·马洛维斯特,“A Certain Trade Technique in the Baltic Countries in the Fifteenth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ies”,载 *Poland at the X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Warsaw: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1960), p. 103。

201 同上书, p. 104。

202 同上书, p. 114。

203 见多布, *Studies*, p. 71。

204 “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以前,即在中世纪,普遍地存在着以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为基础的小生产。……把这些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代的强有力的生产杠杆,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体现者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53), p.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6页)。

205 “在英国、低地国家、德意志南部、意大利,正是在14和15世纪……我们发现农村纺织工业有非常显著的发展。农民们从事纺织业,为住在城里的企业家干活,或有时也为他们自己干。我认为这种事实证明,农业不足以使他们维持生计。……事实上,在佛兰德斯、布拉班特和托斯卡尼,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一时期奢侈品生产逐渐衰落,然而与此同时,在佛兰德斯本身、在埃诺、荷兰、英国、德意志南部、意大利某些部分,一种新型的纺织业生产在小城镇和农村成长起来。这些纺织品虽不具有最优质量,但比较便宜,因而贫困的贵族和其他较不富裕的消费者也买得起。……14和15世纪在工业生产和长途贸易中,奢侈品的地位下降了,而大众消费品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见M. 马洛维斯特,“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Baltic Countries from the 15th to the 17th Centurie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I, 2, 1959, p. 178。

见马克思:“在原始的历史形式中,资本起初零散地或在个别地方出现,与旧的生产方式并存,但逐渐地到处破坏旧的生产方式。属于这种原始的历史形式的,从一方面说,是本来意义上的手工工场(还不是工厂)。手工工场产生在为出口、为国外市场而大批生产的地方,因而是产生在大宗海陆贸易的基地,贸易中心地,例如,意大利的城市、君士坦丁堡、佛兰德斯和荷兰的城市、西班牙的某些城市如巴塞罗那等等。工场手工业最初并没有侵入所谓城市工商业,而

是侵入农村副业,如纺和织,即最少需要行会技巧、技艺训练的那种劳动。除那些大的贸易中心地以外,——在这些地方,工场手工业找到国外市场的基地,因而可以说生产自然而然以交换价值为目标,这也就是直接与航海有关的手工业工场、造船业本身等等,——除这些大的贸易中心地以外,工场手工业起先不是建立在城市中,而是建立在乡村中,建立在没有行会等等的农村中。农村副业构成工场手工业的广阔基地,而城市工商业为了能够按照工厂方式生产则要求生产的高度发展。构成工场手工业广阔基础的,还有这样一些生产部门,如玻璃厂、铁工厂、锯木厂等等,它们一开始就都要求劳动力的大量集中,更多地利用自然力、大量生产以及劳动资料等等的集中。造纸厂等等也是一样。”*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 p. 1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514~515页)。

206 “人们可以合情合理地假定,16世纪的人口增加及其对土地的压力与约克郡各地间编织业的兴起有某种联系。”瑟斯克, *Essay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p. 88。

207 “工业资本家渴望有便宜的呢绒出卖,但当他们企图在自己所处的城镇里让人生产这种呢绒时,发现这样做是不允许的。于是,他们愈来愈把工作交给乡村工人去做,如果他们的城市里的行会和政府禁止这样做,他们甚至把自己的工业迁到其他国家去。欧洲大陆上的‘国家’并不都那么大。”罗伯特·L. 雷诺兹 (Robert L. Reynolds), *Europe Emerges* (Madison: Univ. of Wisconsin Press, 1967), p. 399。

208 布罗代尔, *La Méditerranée*, I, p. 399。

209 我相信,我们的经济史可以划分开的每个阶段中,都有独特的、不相联的资本家阶级。换言之,特定时期的资本家集团并不产生于前一时期的资本家集团。在经济组织的每一变迁中我们都发现连续性中断的现象。这好像是直到那时一直活跃着的资本家都承认他们没有能力适应新的情况,这些情况是此前不知道的需要所引起的,并且需要使用此前没有用过的方法。他们从斗争中抽身出来一变而为贵族,即使仍在事态的进程中起一分作用,也只是以被动的方式行事。”亨利·皮雷尼,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IX, 3, Apr. 1914, pp. 494~495。

210 皮埃尔·维拉尔,载 *Acts du Colloque de la Renaissance*, p. 50。

211 埃文·J.D. 古尔德 (Even J.D. Gould) 虽然对该假设表示怀疑,但仍承认这一时期雇佣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有非常明显的下降。见 “The Price Revo-

lution Reconsidere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VII, 2, 1964, p. 265。又见多布：“14和15世纪商人资本的优厚利润，既是垄断的果实，又是靠排斥广大生产者从扩大的贸易量中分享利益而获得的，但不是靠任何实际上降低总的生活水平的办法。换言之，新的商业阶层的丰厚利润的来源，归之于相对地而不是绝对地减少生产者的收入。但在16世纪下半叶（17世纪可能也一样，至少是17世纪上半叶），有证据表明情况不再是这样。”见 *Studies*, pp. 119~120。

212 古尔德认为，这一因素特别重要：“今天广泛认识到，20世纪中叶的物价上涨对工业利润的影响与任何工资滞后于物价的问题关系较小——在大多数情况下已不存在这种滞后——但与资本成本滞后于物价的关系则较大……表面上的利润的一部分——这部分日益增多——遭受不恰当地贬值，即以某种方式补偿机器最终被更换时的损失。机器报废的那一天确实要到来。但是，如果该机器或建筑物的寿命很长的话——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时代固定资本的绝大部分正是这种情况，诸如水车、盐池、熔炉，等等——那么，在那几百年里表面上高的利润率可能曾广泛流行。”同上书，p. 264。

213 见毛罗 *Le XVI^e siècle européen*, p. 298。

214 内夫, *Conquest of Material World*, p. 116。

215 埃内斯托·拉克劳 (Ernesto Laclau(h)), "Feudalism & Capitalism in Latin America," *New Left Review*, No. 67, May—June 1971, p. 25。

216 同上书, p. 30。

217 同上。

218 塔尔科特·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认为，工业主义的最初发展必须采取资本主义的方式，这是一种体制，在这种体制中有种种“关于行使政治权力的制度性限制，而且它独立于政治结构之外，所以对经济发展提供特有的推动。”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Modern Societi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0), pp. 101~102。按帕森斯的解释，原因在于，“政治影响本身……似乎不是引向比较短期的‘选民利益’，就是很容易落入传统主义的陈规老套中。看来这些就是韦伯谈到政治利益对‘经济上的非理性’的影响的原因 [p. 107]。”

这种说法似乎有理，但看来与经验的事实不符，因为在整个现代史过程中，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上的作用始终存在。他没有看到这里的结构分化实质上是不同地理区域间的分工与组合，即经济活动在世界经济体的范围内展开，同时政治领导人的权威，如果不是指他们的权力的话，也被限制在一定的活动

范围内,这范围小于经济企业的活动范围。正是这种关键性的结构不一致,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灵活性。

219 K. 贝里尔 (K. Berrill),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I, 3, 1960, p. 352

220 A. 鲁珀特·霍尔 (A. Rupert Hall), "Scientific Method and the Progress of Techniques," 载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E.E. 里奇和 C.H. 威尔逊主编,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7), p. 100。

221 “所以,遥远的大西洋彼岸新边疆的开放造成了种种新的机会,造成了一种思想风气,激发起可能成功的信念。这些机会存在着,但只对那些准备去抓住并有能力抓住它们的人才是现实的。……美洲可能曾很好地加快了欧洲的进步速度。如果没有美洲,这种进步甚至可能不会出现。但即使采纳了这极端的主张,记住布罗代尔教授的金玉良言仍是明智的:‘美洲并不支配一切’。” J.H. 埃利奥特, *The Old World and New, 1492—165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0), p. 78。

222 布罗代尔, 载 *Chapters*, p. 268。

223 布罗代尔和斯普纳,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IV, p. 243。

224 “废除了封建的生产、财产秩序和很自然地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动力,存在于小商品生产(小资产阶级和作为商品生产者的独立农民)的发展中,并因而存在于他们经济上的‘两极分化’过程中,即分化成工业资本家和被剥夺了土地而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我们相信,这种资本主义的演变形式应成为西欧经济史经典性的、独有的特征。”见“On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 载 *In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XXXV, 140, 1955, pp. 149~150。

225 “多布先生……把‘可以得到的劳动力变动的情况’作为走出经济史迷宫的线索(阿莉阿德尼线),^[1]这确实会成为一个有趣的研究对象,但我们的作者……几乎完全忽视了另一条线索,长期的价格运动,……他没有考虑把这两种探讨方法结合起来的可能性。”见让·内雷 (Jean Néré), “Le développement du capitalisme,” *Revue historique*, CCIII, janv. - mars 1950, p. 68。

[1] 阿莉阿德尼线 (fils conducteur), 希腊神话中阿莉阿德尼用小线团帮提修斯逃出迷宫。——译者

226 “每一种经济波动，即使是决定性的，或剧烈的，或创新性的，仍然是长期的‘结构’史——即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次偶发事件，而结构的本质超越于偶发事件。”布罗代尔和斯普纳，*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450。

227 “虽然在 14 和 15 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 16 世纪才开始的。”马克思，*Capital*, I, ch, XXVI, p.7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21~222 页)。

228 布罗代尔，载 *Chapters*, p.285。

第三章 绝对王权与国家统制主义

绝对王权在西欧的兴起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出现，显然是同时发生的。但它是原因还是结果？有充分依据可以表明，它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因为，一方面，若不是由于商业的扩张和资本主义农业的兴起，扩大的官僚国家机构就得不到足以资助它的经济基础。¹但是另一方面，国家机构本身就是新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经济基础（更不用说是其政治保障了）。正如布罗代尔所说：“不管其愿望如何，[国家乃是]本世纪最大的企业家。”²此外，国家还是商人的主要主顾。³

关于国家在资本主义企业中的作用，有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涉及其规模，第二种观点涉及其经济影响，第三种观点则涉及其阶级内容。第三种观点我们将在以后讨论。就第一种观点来看，虽然，人们对国家卷入19世纪世界经济的程度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意见时，似乎普遍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的早期，即至少在16世纪初，并延续至18世纪，国家在欧洲世界经济体中起着经济中心的作用。

可是如果说大多数人认为国家的确起过这一作用，有人却觉得这是一种没有必要的令人讨厌的作用。例如熊彼特，他坚持私营企业有优越的长期效益的观点，否认国家作为商品的购买者或借贷者对工商企业有好处。他说，那种认为没有宫廷的奢靡，就不会用相应的手段从农民和资产者那里获得相应的货物的看法，是不可原谅的错误。⁴这也许不可原谅，但错误大概算不上。为什么不能

设想农民是为了纳税才生产剩余产品，这剩余产品他本可自行消费或不去生产？熊彼特是否真的以为欧洲农民在 16 世纪就已全部面向商业市场了？

至于宫廷的开销与创立信贷至关重要的论点，熊彼特有两点答复。其一为，发展“信贷操作机器”得到的任何效益，都必须“用经济活动受到的破坏和出现的瘫痪加以衡量，这些破坏和瘫痪都是由于提高岁入和挥霍无度造成的。”⁵ 这涉及到一场事实尚欠充分的大争论，这场争论的正确与否，只有通过对本书的全部论证方可断定。这里阐明的观点是，欧洲世界中心地区强大国家的发展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组成部分。熊彼特答复的第二点是，宫廷借贷的连带产物是经济特权，而这一经济特权从更大的社会利益前景看，在经济上最可能是不牢靠的。⁶ 无疑这是确实的，但据我看，这是在描述资本主义的本质，而不是描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偶然偏离，故而熊彼特的这一论点事实上恰好否定了他的前一论点。

国家官僚机构缓慢然而稳定的发展，造成了 14 世纪与 15 世纪的经济危机，我们在前面已经考察了经济危机的各个方面。我们还提到过军事技术的进步使中世纪的骑士变得陈腐无用，从而加强了中央政权的权力，使其得以控制大量的步兵。君主们主要的政治目标是恢复秩序，这是经济复兴的前提。以热尼科言简意赅的话来说：“通过展示权力崩溃的有害影响，动乱时代为中央集权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依据。”⁷

然而为什么这种政体会产生于这个特殊时代呢？经典性的回答是就新国家的离心现象来谈论其产生原因的，这一论点也常常用于评论 20 世纪的新国家。⁸ 15 世纪的“秩序恢复者”的最初动因来自“封建制度的危机”。封建领主受到经济压力，迫使他们增加对农民的剥削，结果导致农民的叛乱。还导致贵族之间自相残杀战争。力量受到削弱的贵族，期待在混乱秩序的威胁面前得到国王的庇护。国王从中渔利，加强了恰恰是通过这个贵族阶层而获得的财

富和权力。这就是国王提供安全保障的要价，弗里德里克·莱恩称之为他们的“保护金”。他还提醒我们，在那个时代，这是“比工业技术或工业组织的优越性……更重要的利润源泉，[同时]是贸易中牟得的主要财富源泉。”⁹

当然，国王之所以从中得益不光是机遇的作用，而且还是他自身压力的作用。艾森施塔特认为，当“政治统治者无法靠他们自己的资源（例如国王领地）或其他集团的无条件的奉献而有所依仗时……”¹⁰，所谓的“官僚政治”便应运而生了。但是其他集团的奉献果真可靠无疑吗？至于说到国王可资运用的资源，国王本人的财源不足以实现他们的目标，实际上这是更雄心勃勃的目标在起作用。因此我们必须探讨促使统治者去寻求实现这更雄心勃勃的目标的压力。

阿奇博尔德·刘易斯提出一种观点，把它归诸土地的可获得性：“当……君主分赏掉所有的自由土地并一点不留时，他就必须开始征税——以另一种形式，把他当初施给人民的财富收回来。”¹¹对国民税收的这种需求并未立即导致“专制制度”。相反，君主必须设立议会，以谋得贵族在征税过程中给与支持，但是“这时统治者又必须感到自己足够强大，没有贵族的支持也行。”¹²多布则强调别的方面。他认为对国王的压力不是由于土地短缺，而是由于“劳动缺乏。”国家机器的壮大有助于促进对“劳动市场的控制。”¹³

从以上分析可以推论出，假如经济危机导致君主权力增大，则16世纪的经济扩张势必产生相反的结果。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事实。“第一个”16世纪是帝国奋进的时代，而不是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的强国林立的时代。直到“帝国衰败”（我们稍后就会谈到），一些强国才重新涌现。而有些历史学家确实也仅仅把18世纪看作“专制主义时代”。¹⁴

然而事实上，不管曲线怎样浮动，我们面前看到的却是，在整个现代时期国家权力持续增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看来需要并促进了这一增强中央集权与国内控制的长过程，至少在中心国家

是这样。

16世纪国家机器的操纵者是国王，国王如何巩固其统治呢？他们运用四种主要机制：官僚化、垄断武装、创立法统、所属臣民均匀化。我们将依次论述。

假如国王变得更强大了，那肯定是由于他有了新的机构供他使用，有一批常设的附属的官吏集团。¹⁵当然，在这方面，欧洲那时刚刚在追赶中国。我们知道，依靠官僚国家结构本身并不足以认识16世纪的巨大变化，更不能说明这一巨变。不过国家官僚制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将要从根本上改变从政规则，确保今后经济方针的决策，非经国家机构，不得轻易制定。这就意味着，所有阶层的人才的精力都必须大部转向政治王国的确立。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这一时代的官僚制度，同当代欧洲的相比较，当然是相对弱小的。¹⁶但是，同中世纪晚期相比，其规模与结构均不同，委实是一个质的飞跃。

国王如何获得这些人呢？花钱收买。国王的问题并不在于他没有代理人。王国内有履行行政与军事职能的人，但是他们原先大部分都不依附于国王，因此当他们面临来自与他们自身利益或他们贵族的或家族的利益相反的压力时，就没有义务贯彻国王的旨意了。于是国王转向通常“出身寒微”¹⁷的人，使其成为领薪俸的专职官员。推行的主要作法后来称为“出卖官职”。同那种基于普遍招募、不干财政收益的规范官僚制度相比，出卖官职无疑说明了王权的有限性和国库收入转为增加对贿赂公行的官僚的报酬。但是同先前的封建制度相比，出卖官职使国家体系有可能占有相对高于一切的地位。正像哈通和莫斯尼尔所说：“不管表相如何，出卖官职，对君主专制仍最为有利。”¹⁸

政治选择是国王在几种现实的方案中作出的。为了建立合理的官僚制，国家需要预先获得可靠的基金来源，而不是靠官僚制度来赚钱。K.W. 斯沃特提出，同后来的政府不同，16世纪君主缺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无需用其收入的专门一部分作为利息担保而

发放贷款”。¹⁹为了使这成为可能,他们首先得建立更强大的国家机器,国王因此落入一种循环。出卖官职兼有既能提供直接收入(出卖职位)又能提供官员的好处。当然这种政策的推行同时招致了自私自利的贪官结帮成伙的发展。²⁰可以肯定,正如理查德·埃伦伯格所指出的,出卖官职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在这一“恶性循环”中,增长起来的官僚吃掉岁入,筑起债台,导致国家增大财政需求。²¹国家运用手腕,使恶性循环变成上升螺旋式,从而官僚阶层能充分有效地从居民身上榨取比维持国家机器所需的花费更大的剩余。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做得成功。另一些国家则不成功。关键性的突出因素是它们在世界经济体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

螺旋式上升的运行方式大体是这样的:由于对贵族的经济压榨,国王在中世纪后期,取得暂时好处,积下资金,得以动手“购买”官僚。反过来,这又使征收更多的赋税和举借更多的债款成为可能。国家发现,在世界经济体中,以保证获得世界剩余中较大份额的方式进行经济改革的地区,征税和借款更为方便,货币持有分子对未来的信心在此完全反映了出来。国家利用这些增加的收入增强其强制权力,强制权力又反过来提高了可称之为对国家的“强制潜力的信心”。

这就有可能出现国家债务,这便是国家的赤字预算。国债在古代世界是闻所未闻的,在中世纪也没有可能,因为中央政府孱弱,王位更替频仍。唯有在16世纪法国弗朗索瓦一世治下,我们才首次碰到这样的经济现象。²²因为只有当国家能强迫人民推迟提取债款或是在适当时机拒付债款,同时强迫各个集团以硬币或各种纸币大宗借款时,国债才会存在。它是旨在确保国王增加收入的全部努力中的一个部分。国王需要钱来建立他的国家机器,而且他掌握足够的国家机器去获取钱币。他所运用的那套制度还不是旨在巩固国家长期税收基础的重商主义,而是非常类似马丁·沃尔夫所说的“国库主义”,²³其政策目的在于增加国家的直接收入。

不过当时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国家财政机制的缺乏仍很严

重，布罗代尔把这称作 16 世纪国家较之后来国家“虚弱的另一标志”。²⁴然而，身为财政主宰者的国家的虚弱无损于国债反映出国家作为经济角色日益增长的自主利益，不过，这是具有追求自身经济目的的特殊能力的经济角色。一旦聚敛钱财的行政开支扣除以后，剩余钱财最重要的用场也许就是建立一支常备军。这回国家获取兵员的方法一开始还是花钱雇人。与“出售”官吏相对应的是“雇佣”兵。

可是花钱雇佣谁呢？并不是人人都愿干。因为雇佣兵是个危险职业，尽管有时也有利可图。这不是一般人所愿意选择的职业。那些乐意当雇佣兵的，确实干得很好。因而雇佣兵是这样一种职业，其招募在地理上和社会上是不均衡的，这种职业成了欧洲新的劳动分工的组成部分。

正如我们提到的，西欧人口增长产生了“流浪”现象。“流氓无产者”到处都在增长，他们对于那些秩序还不大稳固的新国家是一种威胁。把一部分流氓无产者招募入伍有很多用处。它为一些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又可用这批人去镇压另一批人。²⁵它为国王提供了控制贵族的新武器，但也支持贵族。V.G. 基尔南具体指出有多少雇佣兵来自西欧那些“欠发达”角落：他们来自加斯科涅、皮卡迪、布列塔尼、威尔士、科西嘉、撒丁尼亚、达尔马提亚。“总之，这些招兵地点中很大数量都位于凯尔特人或巴斯克人这类外来民族居住的欧洲边沿山区。”²⁶并且，看来首先来自瑞士。²⁷

基尔南认为，招兵的这种方式不仅直接对控制 16 世纪的社会爆炸负有任务；²⁸假如我们记得我们论述的是世界经济体，那么这种招兵方式还有第二种更微妙的然而却同样重要的影响：

雇佣兵招募地较之相邻地区政治停滞，有点像英军两大募兵基地尼泊尔和旁遮普两地长期以来的情况。瑞士与专横的法国共处三个世纪，带来的后果是有害的。由颁发输出士兵许可证而收取费用，会使州县政治腐败，贵族集团以牺牲普通

人的利益为代价，增加自身的权力。……正如阿尔菲耶里严厉地指出的，这些山里的自由人变成了专制暴政的主要看门狗。假如 1524 年德意志农民战争时期，瑞士人仍像前 50 年那样，是一支革命的军队，那么欧洲历史可能已经改观了。²⁹

在大多数情况下，雇佣兵甚至不由国家直接招募，现存的机制不允许这样做，而是由国家与企图谋利的“军事承包人”签订合同。雷德利希怀疑这种作法是否是资本积累的一种乐观方法，因为即使他们的收入“高得非同寻常……他们的开销也是非常大的。”³⁰但它却再一次证明国家建筑如何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兴起。至少在短时期内，“在一个资源经常得不到充分利用的社会里，增加军事开支常常刺激其他方面更多地生产，从而在战争时期，盈余总量增长。”³¹但是军事企业包括的不止商业与生产。这个体系是信贷创立。因为不仅亲王们从银行家那里借钱；军事企业家亦然，其资本由福格尔家族之类的大商业银行家供给。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三十年战争时期。³²

此外，雇佣军不仅为穷人提供了就业，而且给企业家提供了机会。军队得吃饭。通常食品商在战场上随军供给食物，也充当出售战利品的中间人。³³艾伦·埃弗里特认为，军需对英格兰都铎王朝时期谷物生产的地区专业化起着重要的刺激作用，³⁴甚至还刺激了出口贸易。³⁵如果考虑到国家也认识到有责任确保日益增多的官员也有充足的食物，上述情况就更有道理了。³⁶资本主义的扩张就这样为国家的短期需要服务。

君主在这个问题上，同在文职官僚问题上一样，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军需业主是君主谋取权力的必要帮手。他也搜刮了颇大一部分剩余财富。无疑，军需业主比起贵族封臣来是君主更为可靠的代理人，但他最终追求的还是以他自身的利益为首要。倒霉的是君主却丧失了这种流动性！³⁷可是，这类情况正是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角色所起的直接作用。

直到那时为止,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尽力支付自身费用。因为军队使税收增多。由于“[这些捐税负担几乎全都落在人民——特别是乡村居民身上,]”³⁸人民愤怒了,他们汇集起来造反了。³⁹于是军队被派去尽其可能地镇压这些叛乱。盗匪活动是国家最难对付的,这种造反形式成为山区人民最方便的叛乱形式。⁴⁰国家的警察力量太弱。除了对付中央地区的叛乱以外,几乎无法应付,并且这些盗匪活动常常博得一些反抗新国家的世袭领主的共鸣。⁴¹

无疑,正像德吕穆说的,“土匪活动常常就是农村反抗城市的起义。”⁴²但是,农村中闹事的是哪些人,最重要的是在什么时间闹事的?很显然,农民卷入盗匪活动几乎总是在粮食短缺的时候。⁴³当然,发生饥馑骚乱时,最穷的人是会卷进去的,但是盗匪活动作为一种运动,尤其是在地中海地区,成为运动核心人物的就不再是最穷的人了。更明显的是,16世纪晚期,这些新生自耕农发现盗匪活动是反抗正在发生的“重新封建化”,反抗将他们的乡村半边缘化的斗争形式。“在这类国家里,尤其是像意大利南部的麻萨里(massari)这样的小业主,他们比大地主缺少抵御荒年的手段,生怕一下子落入乡下穷人的境地,于是他们利用盗匪活动来对付那些他们视为直接敌人的大地主。”⁴⁵

加入土匪活动的另一种成分是部分贵族,但问题又是哪部分贵族?看来是那些被经济状况剧变而排挤出贵族行列的人。我们在探讨雇佣军问题时曾经指出,人口增长和圈地运动造成了流浪问题,雇佣军的兴起,其目的之一,便是利用这些“流浪汉”中的一部分去稳住其余的流浪汉。雇佣军增强了国王的权力,而且削弱了传统贵族,不仅由于它建立了强大的武装足以贯彻国王意志,而且由于它为小贵族造成了就业空间。⁴⁶当然,对很多地区的破落骑士来说,仍有其他的选择。他们可以加入为国王效力的行列。此外,在国王力量较强的地方,盗匪活动比较困难。但在国王力量较弱的地方,他的软弱就使盗匪活动更有利可图,骑士们选择为国王效力的也就更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匪患意味着要求有较强的国家,而

不是借助于“传统的”抵御。这是一种对抗形式,在某些情况下,是王国内现存的“最强有力的对抗形式”⁴⁷,但这是近代国家结构内部的对抗形式。

因此,把盗匪活动视为传统的封建制对抗国家权力的形式是一个严重的错误。⁴⁸它是国家权力尚未充分发展造成的,即国家无力补偿经济和社会动乱造成的失调,国家不愿在通货膨胀、人口增长、粮食匮乏的情况下确保分配比较平等。在这个意义上,盗匪活动是国家本身造成的,国家剥夺某些贵族的传统权利(也就是财富源泉)和某些农民养活新官僚的产品,也在国家内部造成更大的财富集中,以致攫取这部分财富具有更大的诱惑力。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创立引起大规模的经济再分配,盗匪活动乃是由于这种再分配造成的混乱的一种症状。

政治有机体要求比较稳定,达到能够取得哪怕是部分合法性的程度。假如单纯从政府与广大民众的关系着眼分析合法化的过程,那就会百思不解。如果人类历史上许许多多政府会被遭受政府剥削、压迫、虐待的大多数人视为“合法”政府,那才是咄咄怪事。民众也许听天由命,或者铤而走险,也许为一时的好运惊喜,或者桀骜不驯。但政府力图忍耐,而不是赏识,赞扬,爱护,甚至加以支持。16世纪欧洲的情况就是如此。

合法化与民众无涉,但与官僚有关。政治稳定这个问题意味着操纵国家机器的小集团能够使中央官员和地方豪强势力这个大集团在一定程度上相信,政体已经形成,并在他们所相信的价值观念一致性的基础上运行;而且正是为了这些官员的利益,这一政体继续运行而不会出大乱子。达到这种境况时,我们就可以说这一政权是“合法的”。

再说,合法性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它是不断妥协的产物。在16世纪,作为使君主的新政权合法化的手段的意识形态便是君权神授,我们把这样的制度叫做绝对王权。既然专制制度是一种意识形态,我们就得小心,不可从表面上看待它的各种要求。而应具体

考察它的各项要求是什么,它们如何反映社会结构的种种现实,才会是有益的。

首先,在多大程度上“绝对”意味着是绝对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任何人都无权提出拒绝履行君主意志的合法要求,这并不是什么新理论。但是在这个时代,比起早先和往后的各个时代,都得到更广泛的解释,并更为知识界所接受。然而“绝对”一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不恰当的。在理论上,绝对并不意味着不加限制,因为正如哈通和莫斯尼尔所指出的,它受“神法与自然法的限制”。他们认为,“绝对”一词不应读作“不受限制”,而应读作“不受监督”(pas contrôlée)。王权之所以是绝对的,是对比过去的封建权力分散而言。“它并不意味着专横施暴政。”⁴⁹同样,马拉瓦利说道:“无论近代国家的初期或后期,‘绝对王权’都不意味着不受限制的君主政体。它是一种相对的专制。”⁵⁰关键性的可行主张是,君主不应受法律的约束限制:ab legibus solutus。

不管是什么要求,君主的权力实际上是相当有限的,不光在理论上是这样,而且在事实上也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国王的权力远不如20世纪自由民主制的行政权力,尽管后者受制度与道义的约束。例如,20世纪国家机器具有一定程度的组织能力,足以补偿国家所受到的增加的约束。要想理解“专制”君主的真实权力,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当时当地的政治现实中加以考虑。王权是绝对的,就是说在国内出现政策对抗时,他有压倒其他势力的相当可能。⁵¹但在16世纪,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难以表明其在自身力量范围内所拥有的明显优势,或对财源的控制力量,⁵²更不用说臣民的忠诚居于首位了。

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国家的兴起和作为其意识形态的专制制度,不应与民族和民族主义混淆。世界体系范围内强大国家的建立是强国和边缘区内的民族主义兴起的一个历史前提条件。民族主义是对一个成员国作为国际社会集团成员的承认,就像公民身份,需具备集体团结要求的一切条件。专制主义是确认这样的国家的

生存具有头等重要性。前者被界定为大众感情；后者则被界定为国家机器利益直接相关的一个少数人集团的感情。

毫无疑问，强盛国家的辩护士终究会把培养民族感情作为实现其目标的坚固支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在16世纪已经这样做了。⁵³但是这种集体的感情倘若存在，通常主要地是适应君主个人的需要，而不是作为整体的民族国家。⁵⁴绝对君主是个“英雄式的”人物，⁵⁵随着时间的推移，神化君主的过程日甚一日。在这个时代，繁琐复杂的宫廷礼仪发展了，恰好使君主从平庸的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附带也较好地为宫廷贵族提供了就业，从而使他们留在身边，以便监督和挟制）。

只有到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民族主义才在重商主义框架内的资产阶级中间找到了第一批真正鼓吹者。⁵⁶但是在16世纪时，资产阶级的利益尚未同国家确定无疑地联系在一起。极大多数人对开放式经济比对封闭式经济更感兴趣。而对国家的缔造者来说，早熟的民族主义有局限于过于狭隘的民族疆域的危险。在早期，中央集权下的国家统制主义(statism)几乎可以说是反民族主义的，因为“民族主义”感情的边界常常比君主国家的边界还狭窄。⁵⁷只有在很长时间过后，国家机器的管理者们才设法建立“一体化”的国家，⁵⁸其中占支配地位的民族集团将把边远地区“吸收”进来。

在16世纪时期，少数几个国家在权力集中化和至少部分地使中央集权获得合法承认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不难概括发生这种情况的环境。当控制资源的形形色色的官僚核心和形形色色的集团感觉到，通过努力说服和影响君主，比通过其他活动渠道达到其政治目的更符合他们的阶级利益时，我们便能谈论一种相对有效的君主制，一种相对的“绝对”国家了。

“绝对”一词表达的是错误的基调，这当然是国王希望转达的。专制制度是一种辞令，不是严肃认真的表述。不强调中央集权于国王个人，而只谈国家的强盛，也许是明智的，或者更有“国家味儿”。⁵⁹我们不如称这种意识形态为“国家统制主义”。国家统制主义

要求国家机器掌握更大权力。在 16 世纪,这就是指专制君主手中的权力。这是要求权力,是要夺取权力的努力的一部分。在当时或今天,谁也没有把这看作是或认为应该看作是那个时代现实世界的写照。在某些将构成欧洲世界经济中心的国家,这一要求被证明是有效的。在其他地方则告失败,其原因,我们以后将予以阐述。

中央集权化过程的一个主要成功标志和一个重要机制是:人口按某种方式被改造成具有文化同一性的集团的程度。这与一般民众的关联少于与广义上的骨干成分的关联(骨干指国王、国王的官僚和陪臣、农村的大地主和小地主、商人)。在 16 世纪,当中心国家的这些阶层正在朝着更大的“民族”同一性方向变动时,边缘地区恰恰在向相反方向变化。

让我们先看一看国家机器对属于“少数民族”集团的商人的态度。首先是犹太人,这个集团在整个中世纪贸易活动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犹太人在中世纪后期地位逐渐恶化。”⁶⁰一方面,当英、法和西班牙建立了较强大的集中化的社会结构时,他们就开始排犹:英国在 1290 年,法国在 14 世纪末,西班牙在 1492 年。但是这种现象在德意志也有发生,犹太人在那里如果没有被驱逐,其充当贸易集团的作用在许多方面也被削弱了。正是犹太人,在公元 800 年至 1200 年之间,沿着北方横跨大陆的路线,进行着东西欧之间大宗的国际贸易,而且是它的主要依靠力量。⁶¹在这一时期,他们在这两个地区的合法地位都是相当有利的。⁶²在 13 世纪和 14 世纪,犹太人在整个欧洲的合法地位和经济作用都大大削弱。⁶³然而,到 16 世纪之前,我们可以说犹太人在地理上的分布不平衡:在西欧基本看不到犹太人,可另一方面,在东欧和南欧部分地区,犹太人数量增加,就是说,中心地区没有犹太人,而边缘和半边缘地区的犹太人增加了。⁶⁴

尽管犹太人在东欧经济生活中起着日益增长的作用,他们却只被允许充当比工人阶级地位略高的商人角色。唯独对犹太人来说,要走从企业家到食利者的古典式道路是不可能的。⁶⁵同样,在意

大利北部也有这种情况，由于城市规模小，征税基础小，无力保护它们在国内的公民，致使城市国家财政力量衰落，⁶⁶因而犹太人的地位开始有所改善，重新充当商人的主要角色。⁶⁷犹太人问题，正如它向统治者表明的那样，是一个在“理财之道”和与之相对的新产生的“重商主义”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的两难问题。一方面，这些犹太商人是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非犹太商人视犹太商人为竞争者，土地所有者则视他们为债权人，非犹太商人和地主这两个集团常常联合向统治者施加压力，要求驱逐犹太人。前一种考虑起初占上风，国王常常出面调解犹太人问题。⁶⁸随着本地资产阶级在中心国家逐渐强大，对犹太人的不宽容取得了实质性的合法进展。

由于思想意识上的原因，犹太人成为他们的竞争者易于攻击的目标。人们可以宗教为藉口非难他们的经济作用。在西欧，君主采用的手法之一是驱逐犹太人，但是代之以另一个在宗教上不太易于受中伤的集团，尽管在当地商人眼中都是同等的竞争者。例如，P. 埃尔曼写道，1290年当英格兰君主终于被迫驱逐犹太人时，他欢迎意大利放债人代替犹太人。由于国王常常借钱不还，“出于种种实用目的，意大利的贷款同犹太人的人头税并无太大差别。”⁶⁹到16世纪，就连意大利人作为企业家在英国的作用也被剥夺了，⁷⁰如果不算在西班牙的话。⁷¹但是犹太人却正在波兰取代波兰人。⁷²这是怎么可能的呢？

在西欧，伴随新兴工业，出现了日益多样化的农业基地，从而加强了商业资产阶级的地位，国王不得不在政治上对他们予以考虑。事情的另一方面是，商业资产阶级已经能够充当君主制的财政后盾——当纳税人、放债人和商业合伙人——即使不比外国商人更出色，也彼此相当。这样一来，“民族主义者”的反应就是自然而然的了。⁷³然而在东欧，问题却截然不同。君主力量较弱，商人势力很小，农业生产者则较强。16世纪东欧的问题，像在日益走向经济作物生产专业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所有其他地方一样，不是

商业资产阶级存在或不存在的问题。如果有了货币经济,那就必然得有人充当复杂的商品交换的渠道,提供货币使用所鼓励的种种服务。问题在于这个商业资产阶级究竟将大部分为外国人还是大部分为本地人。若是本地人,国内政治便增添了重要的附加因素。若是外国人,他们的利益首先与正在涌现的发展极,即当时称为宗主国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当地地主(可能还有西欧商人)宁可要犹太人也不要当地商业资产阶级作东欧必不可少的地方商人,这难道不是16世纪东欧“欢迎”犹太人的根本原因吗?“当地商业资产阶级如果积蓄了力量,就有了政治基础(犹太人全然没有这种基础),就会力争成为制造业资产阶级。他们无疑将选择降低国民经济的“开放式”道路,而这将威胁东欧地主—商人的共同利益。我们知道,近代初期是东欧本地资产阶级衰落的时代,⁷⁵“而另一方面,在农村,犹太人作为土地所有者与商人的代理人和小村庄中的手工匠,日益发挥作用。”⁷⁶这可以解释清世界经济体的一个更普遍的现象。国家政治制度内部的阶级联盟的作用是解决统治集团是由那些在世界市场上靠出售初级产品营利的人主宰,还是由那些赚工商业利润的人主宰。

犹太人不是这种跨国政治经济联盟的唯一的玩物。天主教国家的商人常常是“新教徒”。16世纪和17世纪泛欧意识形态的中心争论——宗教改革对反宗教改革——与强大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创立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割。16世纪重新均分土地的欧洲部分也是那些反宗教改革获胜的欧洲部分,而就大部分来说,正在工业化的国家始终信奉新教,这并不是偶然的。德意志、法国和“比利时”多少是“处于两者之间”,长远结果在于意识形态的妥协。德意志划分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法国和“比利时”终于有了少数“新教徒”,但却发展了反教权主义的自由思想传统,某些集团能坚持这种传统。

这并非偶然,倒不是因为根据韦伯的观点,我们才认为新教神学比天主教神学更与资本主义相符合。此种论据的例证肯定能找到。另一方面,任何复杂的思想体系都可拿来为任何特殊的社会或

政治目的服务，一般说来这似乎是确实的。可以肯定，天主教神学也已证明它有适应其社会环境的能力。从抽象的思想观念上看，完全有理由写出一部不错的著作，名之为《天主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加尔文派神学亦可认为有反资本主义的含义。⁷⁷我现在要提出不同的观点。通过一系列心智上偶然的⁷⁸历史发展，新教在宗教改革时期很大程度上与强大民族国家内支持商业资本主义的力量融为一体，并与这些力量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融为一体。这样，当这些势力在波兰或西班牙、或“意大利”、或匈牙利失势时，新教也就衰落下来，而且常常衰落得很快。有利于出口农业扩张的各种因素亦有利于天主教的复兴。

必须依照宗教改革的发展来看待宗教改革。正如克里斯托弗·希尔所写的：

教会长期以来对法国和西班牙一类主要强国的统治者来说，一直是权力、庇护和财富的源泉。16世纪初与罗马分裂的那些政府处在天主教文明的边缘，这是些二等强国，像英国、瑞典、丹麦、瑞士、苏格兰，其统治者还没有强大的力量足以跟教廷硬碰硬地讨价还价。⁷⁹

在这一点上很清楚，当时北欧对较“先进的”地中海基督教世界的经济地位是一种冲击因素。⁸⁰但是我们知道，到延长的16世纪末期，西北欧已经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的中心，东欧成了边缘，南欧也迅速滑向这个方向。

P.C. 戈登-沃克力图将新教的发展——先是路德，后是加尔文——与价格革命的两个阶段连在一起：1520年至1540年或1550年——温和的有限的发展在德意志与荷兰（中欧银矿生产）；1545年起持续近一个世纪（美洲银矿）。他认为，这两个阶段进一步与新的资本主义体系连续的结构需要连在一起：

价格革命带来的社会问题实际上是个包含两个部分的问题。第一种需求是原始积累。……第二种随之而来的真正基本需求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阶级要适应原始积累的资源所必然造成的新地位……

这两个阶段左右着欧洲不同部分的重要性。1520年至1540年，领先地区为西班牙（西班牙从中世纪即由并不强大的中产阶级所接替）⁸¹和德意志（德意志有强大的封建的资产阶级）。1545年至1580年，西班牙和德意志均衰落下来，英国、荷兰、法国的部分地区和苏格兰取得了领先地位。这些地区与宗教改革的地区的平行发展令人瞩目；价格革命的第一阶段与路德（均在1520年至1540年左右），价格革命的第二阶段与加尔文（均在1545年至1580年左右），在时间上也是平行的。⁸²

用不着深究全部历史细节就可看出，这是一个恰当的假说。

此外，当我们回过来看反宗教改革在波兰获胜时，对宗教与政治经济局势的紧密联系，便有了进一步的证据。斯特凡·查尔诺夫斯基详细分析了为什么波兰从看来形势大好的宗教改革退回到天主教，以及波兰为什么骤然转变。他注意到，拥有土地的贵族（noblesse territoriale）在他所谓的“阶级专政”中接管政权的时刻与天主教的反攻时刻是同步的。在他的分析中，他区分了世袭贵族、土地贵族和小（petite）贵族。他认为正是在贵族（以及资产阶级）阶层里存在宗教改革的拥护者。他认为贵族在渴求教会的土地。小地主觉得，本堂神甫有更强有力的天主教主教团支持，要同他们斗争就更困难了。因此对他们来讲，拥护新教好处不大，他们也就不拥护新教。查尔诺夫斯基和其他一些人指出，在波兰支持加尔文教派的是领主，国王和资产阶级却倾向路德教派。⁸³这种观点对韦伯思想是很大的歪曲，但它却使我们想起埃里克·莫尔纳的论点，他看出君主、小贵族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贵族统治。查尔诺夫斯基进一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分化了。城市“上层资产阶

级”，特别是克拉科夫(一个“古老”商业中心)的上层资产阶级与贵族结盟。他在这里所说的城市贵族，是指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中期左右，“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出现的金融家和商人阶级的一部分。”⁸⁴但是波兰并没有注定要走英国的道路，成为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资产阶级聚集地。1557年的大危机(对这场危机我们将在后边论述)不仅毁了里昂、安特卫普、南德意志的金融家，也毁掉了克拉科夫的银行家：

[从]那时起，贵族和加尔文教派的热忱就减弱了。……曾经使过去时代的伟大商业精神兴盛繁荣的种种货物：奥尔库什的银、匈牙利的铜、工业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农民偿付地租的钱贬值速度之快令人绝望。可是国际上对波兰小麦、钾、橡树皮、皮革和牲畜的需求却大大增长。这类货物的生产者不用掏腰包，利用强制的无偿农奴劳动，以物易物，换取所需产品，他们越是这么干，就越能抵挡[金融危机的影响]。这恰恰是中小地主和贵族所能办到的。⁸⁵

查尔诺夫斯基指出，这并不是说波兰不存在资产阶级。克拉科夫的资产阶级可能破产了，但意大利人、亚美尼亚人和德意志人替代了他们。1557年，一个国际网络垮台了，维系在上边的波兰资产阶级贵族与之俱亡。此后，另一个国际网络诞生。和这个网络一起工作的波兰人——“贵族”——接受了波兰在世界经济体中的新角色。他们把自己的子女交给耶稣会会士去教育，不让他们受旧贵族的影响：“这样，人们可以说波兰教会再也不是贵族的宗教表现形式了。”⁸⁶而现在取胜的贵族可以认为波兰的“民族”感情实际上与对天主教的虔诚没有什么区别。

于是，波兰变成牢靠的天主教国家，因为它明确地变成了世界经济体中的一个边缘地区。反宗教改革象征着(而不是引起了)新教徒所认为的“社会衰退”。但是新教徒杞人忧天。因为西北欧的社

会进步是由于东南欧的“衰退”，当然，也是对美洲的统治，才得以实现的。反宗教改革不仅针对新教，而且针对着各种各样与文艺复兴相关联的人文主义力量。这可以由 16 世纪威尼斯与罗马之间的紧张关系来说明。1605 年，当限制教会若干权利的威尼斯法案导致罗马宣布将威尼斯元老院革出教门时，这一争论达到顶点。反宗教改革在意大利就是反文艺复兴⁸⁷，它在意大利的胜利作用是使意大利北部变为世界经济体的半边缘地区。

正是由于作为一种跨国界机构的教会受到同样是跨国界的一种经济体系出现的威胁，这一体系在某些（中心）国家的强大国家机器的创立中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力量。由于这种发展威胁着教会在这类国家的地位，教会才拼命反对现代化。但自相矛盾的是，正是由于教会在一些边缘国家的胜利，才保障了欧洲世界经济体的长远成功。1648 年以后宗教改革斗争的热情终于降低，其原因也许不在于双方势衰力竭，出现了僵局，而在于欧洲地理划分是世界经济体系潜在推动力的自然实现。至于新教伦理的作用，我同意 C.H. 威尔逊的论点：

倘若新教和新教伦理不足以像它们一度能做到的那样解释经济现象，那么在宗教改革时代，同样也解释不了多少。……经济活动的领导地位缓慢地从地中海地区转向北方，意大利城市衰落之际，荷兰的城市崛起；但是北方经济中所用的经营方式或工业技术，对 15 世纪的威尼斯商人或佛罗伦萨织布工匠来说并不新鲜。⁸⁸

在 16 世纪，一些君主通过出售官职、募集雇佣军、君权神授和宗教的统一（*cuius regio*），获得了很大的力量。另一些君主则失败了。正如我们提出的，这是与世界经济体内劳动分工的地区作用紧密相关的。不同的作用导致不同的阶级结构，不同的阶级结构产生不同的政治。这就使我们碰上了关于国家与新的资本主义时代的

主要阶级相比起什么作用这一经典性的问题。把资本主义地主和资本主义商人简单地归并为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有时无助于说明问题，因为有些贵族是资本家，另有些则不是。不幸的是，国家到底起什么作用，它是谁的代理人，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可被视为第三种势力，这些问题都还没有一定的看法。皮埃尔·维拉尔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作过很好的论述：

一个特别有关的问题是，封建收入怎样通过“仲裁”系统和其他方式，在有闲贵族阶级和“商人—种植农”这样的中间阶级或类似一类的人们之间进行瓜分，后者转移了领主收入，准备做新型投资；换言之，封建收入究竟是怎样被动员来用于资本主义投资的。⁸⁹

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是，封建贵族面临着封建制度的“危机”，领主收入的降低，以及其他阶级（商业资产阶级、自耕农、农业劳动者）的猛烈进攻，专制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封建贵族的归宿。高桥有一种观点，认为专制制度“只不过是应付不可避免的发展[朝着农民解放与独立的方向]所引起的封建制度危机而聚集起来的力量体系。”⁹⁰ 这种观点实质是克里斯托弗·希尔⁹¹、V.G. 基尔南⁹²、埃里克·莫尔纳⁹³和鲍里斯·波尔契涅夫⁹⁴的共同观点。

第二种观点认为，绝对王权是一种贵族起重要的、也可能是决定性影响的政治，但是君主不只是贵族统治要求的简单延伸。例如，约瑟夫·熊彼特认为：

这样，[在绝对王权之下] 贵族作为一个整体仍旧是一种必须加以考虑的强有力的因素。它对王权的服从更多的是出于和解的性质而不是屈从。它类似于一种选举——实际是一种强制性的选举，选举国王作为贵族的领袖和行政首脑……

[贵族不反抗君主政权，甚至连消极反抗也不进行]，其原

因从根本上讲是因为国王所做的就是他们所想要做的，国王把国内资源交给他们支配。……贵族是个阶级而不是个人，实际上国家的主人是一个阶级而不是个人。⁹⁵

布罗代尔同样坚持认为，国王和贵族的冲突是一种有限度的冲突，一方面，国王竭力使贵族服从，另一方面，国王竭力保护贵族的特权，对付民众的压力。⁹⁶A.D. 鲁布林斯卡亚的立场与布罗代尔非常接近。⁹⁷J. 赫斯特菲尔德强调君主制处境为难，“没有贵族，就难于统治；但是与贵族共同统治，同样困难。”⁹⁸

第三种观点也许是最传统的，即罗兰·莫斯尼尔的观点，他把君主制看作一种自主的力量，经常与资产阶级联合反对贵族，有时又为他们双方进行调解。⁹⁹

但是这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国家机器有相对自主的作用，一种认为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阶级斗争，二者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呢？莫尔纳似乎不这样认为。首先，他使用了更多的范畴。他谈论君主明确反对的封建贵族。此外还有“贵族”和资产阶级均为潜在的盟友。贵族是指小地主和更趋向于资本主义农业的地主，但并不完全明确。他指出，专制制度对农民课以重税，但钱如何分配却不大清楚。一方面，增长了的国家预算用来支付包税人和官僚，偿付国家贷款，购置军队设备，这一切都对资产阶级有利。但是另一方面，国家的所有经常性开支——即用于维持宫廷和军队的费用——都支付给贵族。莫尔纳把这种作法视为“在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玩花招”的策略。¹⁰⁰恩格斯同样指出，国家机器运用这种方式，有些违背其意志，起到了调解人的作用，至少在“非常时期”是如此。¹⁰¹

君主与贵族之间关系不明确的根源之一是贵族的构成模糊不清。无疑，贵族的家庭成员因时而异；凡是有贵族存在的社会，其景况永远在变动。但是16世纪是一个不仅家庭变动而且职业也在变动的时代。例如，贵族身份在西方封建制度下被认为与企业家职业

很可能是不相容的。在中世纪晚期的都市里，这种看法一定程度上已成神话。到16世纪，在整个欧洲，在城市和乡村，这种看法已完全不合现实。在意大利、匈牙利、波兰、易北河以东地区、瑞典、英国，贵族成员已经成为企业家。¹⁰²大势已成，贵族顺利地设法清除阻碍他们从事这种职业的任何正式的障碍，西班牙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¹⁰³我们不应忘记，尽管在新教国家，教会土地被没收，16世纪却是教会成为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家的时代，尤其是在意大利。¹⁰⁴

事情的另一方面是，成功了资产者不断地转变为地主和贵族，30年过后，要想在资产阶级与贵族二者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肯定是困难的。R.H. 托尼认为这是个正常过程，不过在16世纪大大加快了。¹⁰⁵布罗代尔¹⁰⁶和波斯坦¹⁰⁷都同意非贵族身份的人从企业家转变为食利者是一个持续的过渡模式这种看法，并且也都从这一形式中寻求长期的安稳。但是关键性的问题是要估计到，尽管出现职业流动，地主阶级的力量并未瓦解。正如马克·布洛赫指出的：“领主制并未被破坏。它确实很快就会复苏。不过在很大程度上，领主的财产已经易手。”¹⁰⁸正是君主专制制度造成了稳定局面，允许人员和职业有这样大规模的转移，而与此同时，至少当时在这一点上，却没有取消社会地位与报酬上的基本等级制划分。

那么，国家在帮助商业资产阶级施展才干、获取利润、保存利润方面，起着什么关键性的作用呢？内部联系肯定存在，但是有一个程度和时间的问题，早期的互相支持发展成了后来的窒息式的控制。商人与国王共存的关系在17世纪和18世纪变成为对立的关系并不是偶然的。哈通和莫斯尼尔看出了在16世纪已然存在这种紧张关系的迹象。¹⁰⁹道格拉斯·C. 诺思和罗伯特·保罗·托马斯在努力概括形形色色的司法与经济机构，这些机构鼓励企业以提高生产率为基础，而不是以仅仅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商业形式为基础的活动¹¹⁰的兴起时，力图阐明国家机构的意义和作用得以强调的各种条件。他们认为，随着国家干预给市场从而也给发明创造带来经济扭曲，必然产生“准许政府推行哪怕会遭到社会上一

部分人强烈反对的政策强制权。”¹¹¹这种归纳问题的方法，提醒我们注意从成本效益分析的角度来审视国家统制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功能。而对贵族来说，绝对王权是特权的最后一道防线，对那些通过使企业经济效率增至最大而牟取利益的人来说，国家机器有时极为有用，¹¹²有时却是重大的障碍。

我们已概述了现代世界体系的两个主要构成成分。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我们名之为中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另一方面，政治行为最初产生于国家结构之内，而这些国家由于它们在世界经济体中的作用不同结构也不同，中心国家中央集权化最甚。我们现在要从发展过程来考察整个16世纪，在这个过程中，某些地区变为这个世界经济体的边缘区、半边缘区或中心。我们前面的分析过于抽象，因而我们将努力补充以血和肉。我们也将满怀希望地证明全部过程的统一性。发展不是偶然的，在一定的可变动的范围内，它是由结构所决定的。

注释

1 “在16世纪，国家日益担当起大规模征集和再分配收入的角色；通过税收、出售官职、租金、没收，国家夺取了各种‘国民产品’的极大部分。这种多重夺取很有效，因为预算是随着经济状况和物价水平的上下波动而或多或少地变化的。国家的兴起伴随经济生活的点滴成果，并不是偶然的，或者像约瑟夫·A. 熊彼特贸然认为的那样，并不是动荡的力量。”见布罗代尔：*La Méditerranée*，I，p. 409。

2 同上书，I，pp. 409~410。

3 “给国家贷款、提高税收、剥削王室领地、战争与宫廷的开销，使得贸易有可能带来利润，没有带来利润的贸易，商业资本主义绝不可能在16世纪上半叶惊人增长。”见哈通、莫斯尼尔：*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IV, p. 44。

4 约瑟夫·A. 熊彼得: *Business Cycles*, I, p. 296。

5 同上书。

6 “借款给宫廷尽管通常有获利丰厚的允诺, 却极少做成好买卖。然而正是因为这类贷款按规矩可以不还, 贷款才能带来工商业领域的特权和特许, 在当时, 获得这样的特权和特许是宗大交易。……福格尔家族的兴盛在金融界无可匹敌……这与查理五世的拮据有很大关系[同上, I, p. 236, 最后一行]。”

7 热尼科(Génicot):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 p. 700。约瑟夫·斯特雷耶(Joseph Strayer)同样认为, 中世纪晚期秩序瓦解与16世纪贵族重新愿意“接受王权领导”, 二者间有因果关系。他怀疑集体社会心理的变化中, 存在插入变量:

“很难断定什么因素改变了有产阶级的行为。他们当中一些人, 特别是地主, 像穷人一样, 饱尝内乱之苦, 跟穷人一样, 渴望和平与安全。他们当中一些人认识到, 经济复兴将使他们获益匪浅, 支持稳定的政府就会带来经济复兴。他们当中一些人对15世纪末大多数革命的失败也许留有印象。”见 *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 Press, 1970), p. 91。

莫斯尼尔谈到16世纪西欧说: “强大[中央]权力的必要性来自民族[即国家]构成本身。国家与领土共同体、省、地区(pays)、市、村以及行业机构, 例如教阶……军事团体、大学、行会, 是并列的。……国王必须强大到足以仲裁他们间的冲突, 协调他们的努力, 以图公共的福利。但他们的分裂使国王有可能拉一派打一派。”见 *Les XVIe et XVIIe siècles*, p. 97。着重号是后加的。

必须强大? 为什么这样? 功能分析很少能解决起源问题, 因为功能选择不仅有可能预见, 而且不能满足功能需要, 它不仅是一种可能的偶然性, 而且常常是可信的偶然性。因此, 让我们暂时坚持“原因”上的判断。

9 见莱恩: *Venice and History*, pp. 421~422。

10 S.N. 艾森施塔特: “Political Struggle in Bureaucratic Societies”, 载 *World Politics*, IX, 1, Oct. 1956, p. 17。

11 阿奇博尔德·刘易斯: *Speculum*, XXXIII, p. 483。

12 同上, p. 483。见爱德华·米勒: 建立普遍直接税这一企图是自13世纪以来代议制主要影响之一, 纳税人的不同团体推举他们的监理人或代表召集会议。”见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 p. 14。

13 多布: *Studies*, p. 24。多布把“国家干预”与“自由”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内两种政治组织形式加以对比——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 是一种奇怪的自由观点。他用劳动缺乏来解释二者的交替。“自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最盛行, 当无产阶级过剩, 生产方式稳定时, 就是这样; 可是一旦工作争夺人力, 作为资本收入源泉的生产方式越来越不稳固, 利润越来越少时, 国家强制就大显其能了[pp. 24~25]。”

14 例如, 见马克斯·贝洛夫 (Max Beloff): *The Age of Absolutism, 1660—1815* (New York: Harper, 1962)。

15 “那么, 什么东西可用来说明 16 世纪现实的专制制度与中世纪理论上的专制制度——它从未成现实或仅仅暂时地、非持续性地、间断地实行——之间的区别呢?”

“我们必须在国家新的内部结构机关寻找答案, 即在政权的加强与扩大中找答案, 公务员集团, 国王(或君主)的‘官员’, 今天我们称作‘官僚’的这些人站到了公共生活前列, 介入国家日常活动, 首先在对外事务上是这样。”沙伯德: *Actes du Colloque*, pp. 63~64。

爱德华·佩鲁瓦认为这个过程早在 13 世纪就在法国开始了: “法国国王私人权力的发展, 包括领主的与封建的, 导致了[中央]权力机关的发展。……”

“[在] 13 世纪最后的 25 年, 始终在不断壮大的王权开始在两种因素影响下发生性质上的改造。一种是专制主义思想, 公共权力[王权]的思想。……另一种同样重要, 是国王自己人的压力, 随着行政日益复杂, 书写的用途空前扩大, 他们的数量大大增长, 一个新的阶级, 权力代理人阶级, 执行法律和舞动笔杆的阶级, 诞生了。……实际上, 那时政府人员集团集体掌握政权, 能够自行其是, 开始使国王的随从们黯然失色。……”见 *Le Moyen Age*, pp. 372~373。

16 “庞大政治机器的赫然景象会使人产生错觉。16 世纪较之 15 世纪, 政治机器的体积大大增长。但这仍然是相对的。如果想想当代那些为国家工作的大量政府雇员, 16 世纪的‘官员’数量也就少得可笑了。”见布罗代尔: *La Méditerranée*, II, p. 37。

17 同上书, p. 29。

18 “这就是准许西班牙国王将城市置于其保护之下, 并在法国给路易十二、弗朗索瓦一世、亨利二世、亨利四世及路易十三对宫廷和同伙施加影响的强大手段的东西。……只有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8年]之后, 出卖官职……才变得无法忍受。……”哈通、莫斯尼尔: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V,

p. 48。

19 K.W. 斯沃特(K. W. Swart): *Sale of Offic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Hague Nijhoff, 1949), p. 117。

20 “随着税收制在君主制中的统治增长, 财政官员在国家中的重要性也在增长。随着出卖官职的发展, 财政官员数量大增, 组织并参加了各种协会, 扩大了他们的权力, 确保他们获取更多利润。”见 G. 帕热斯(G. Pagès): “Essai sur l'évolution des institutions administratives en France du commencement du XVIe siècle à la fin du XVIIe”, 载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n. s., No. 1, janv. - févr., 1932, p. 26。

21 “国王方面过多欠债是由我们已经看到的种种情况必然造成的。没有征收捐税或收入的个别分支担保制度, 过多欠债便无可能。这引起财政制度可怕的堕落。然而形势若长此以往, 堕落便不可避免, 结果是债台高筑。”理查德·埃伦伯格(Richard Ehrenberg): *Capital and Finance 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 (New York: Harcourt, 1928), p. 39。

22 见厄尔·J. 汉密尔顿: “Origin and Growth of the National Debt in Western Europe”, 载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XXXVII, 2, May 1947, pp. 118~130。如果我们谈的是当时现存的国家, 这种情况是真实的。实际上, 和大多数近代的现象一样,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城邦便有国债先例。马文·B. 贝克尔(Marvin B. Becker) 追溯了佛罗伦萨公债从 1303 年“微不足道的数额”增长到 1427 年将近与佛罗伦萨居民总财富相等的数额。见 “Economic Change and the Emerging Florentine Territorial State”, 载 *Studies in the Renaissance*, XIII, 1966, pp. 7~9。

23 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e): “Fiscal and Economic Policy in Renaissance France”, 载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 (Paris: Mouton, 1968), pp. 687~689。见费尔南·布罗代尔: “始于 16 世纪并在这复兴世纪更富光彩的国家——至少那些存在, 兴盛, 尤其是抵御海陆战争庞大开支的国家, 控制着经济生活无法正常进行, 使经济生活受到重重束缚, 置于国家的罗网之中。人们非常喜欢用国家的愿望和虚弱、不稳定来解释一切。但是历史从不是单方面的。人们有可靠根据来辩解, 认为在当时最现代的, 我们会轻易把它归入大规模商业资本主义范围的经济生活, 与国家的那些财政起落是连在一起的, 国家刺激和追求经济生活, 国家的贪婪和过于沉重的开支必然导致的穷匮使经济生活逐渐瘫痪。这种贪婪和缺乏效率——历史的伟大力量

——在 16 世纪的倒退 (repli) 中起了作用。”见“Le Pacte de ricorso au service du roi d'Espagne et de ses preteurs à la fin du XVI^e siècle”, 载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ffari* (Milano: Istituto Edit. Cisalpino, 1957), II, p. 1115。

24 “庞大的国家尚未与广大纳税人建立全部联系,以便任意盘剥他们;故而国家在税收与财政上渐趋软弱。除意大利[少数地方],16 世纪末,国家还没有财政部或国家银行。”见布罗代尔: *La Méditerranée*, II, p. 39。

25 弗里茨·雷德利克 (Fritz Redlich) 指出,有两种雇佣军。一种是完全无着落的个人——当时叫做流民 (fahrendes Volk)。瑞士、德意志还有一种更“定居的”人,“始终不离家乡”。他们近似于召之即来的民兵。“The German Military Entrepreneur and His Work Force”, I, 载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Supp. No. 47, 1964, pp. 115~117。

26 V.G. 基尔南: “Foreign Mercenaries and Absolute Monarchy” 载 *Past & Present*, No. 11, April 1957, p. 70。

27 “法国的例子对欧洲有决定性意义,在法国,路易十一于 1474 年与瑞士各州商定招募瑞士后备军,便于法王指挥,就像威尔士人对于英王一样,路易十一创始的这一制度一直延用至大革命[同上, p. 72]。”

奥通·拉斯科夫斯基 (Oton Laskowski) 认为瑞士雇佣兵孚民望是因为善战。见“Infantry Tactics and Firing Power in the XVIth Century”, 载 *Tekni History czne*, IV, 2, 1950, pp. 106~115。

由于当时法国步兵极其低劣,所以法国迫切需要瑞士雇佣兵。据查尔斯·奥曼先生解释,“瑞士常备军之外的部队从来都是匆匆忙忙募集,危机一过即解散。”见 *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p. 45。我们不禁要问,法国步兵为何比别国解散速度更快?答案不清楚,史实也不确凿。但要属实的话,就表明法国君主制为创建强大国家而鏖战。

28 “可见欧洲政府严重依赖外国雇佣军。外国雇佣军一大用途为镇压叛乱,16 世纪革命蔓延,雇佣军常用来镇压。‘我的瑞士人在哪儿?’克劳迪阿斯喊道,许多君主仓惶中也这样喊。……富人为首的叛乱也可雇用自己的雇佣军。……可是总的说来,政府稳操胜券。”基尔南: *Past & Present*, No. 11, pp. 74~75。

雇佣军制的第二层含义是使用雇佣军可以限制社会爆炸。使用雇佣军限制了战争的破坏。奥曼指出,一旦不给赏赐,雇佣军便开小差。这对军事战术有直接影响。不作前线的进攻而用拖延战术,常比依赖军事优势更易奏效。指挥

官看到“敌营兵疲惫沮”，常常只消拖延时日，因为“几个星期无粮餉，敌军就会瓦解。”奥曼：*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p. 38。

29 基尔南：*Past & Present*，No. 11，p. 76。

30 雷德利希：*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p. 401。

31 弗雷德里克·莱恩把这种观点归诸 H. 约翰·哈巴库克 (H. John Habakkuk)。莱恩另有如下保留看法：“但是能否说，从长远看，其他条件都一样，一个光靠高昂军事开支获得高水平资源利用的社会，不及一个军事开支小的社会生产的利润多，如果以较小军事开支可以达到同样的资源利用水平的话。”见 *Venice and History*，p. 422，fn. 11。当然，问题却是在最后那个“如果”。

32 见弗里茨·雷德利希：“Military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Credit System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载 *Kyklos*，X，1957，pp. 186~188。

33 见雷德利希：*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No. 39，pp. 49~50。

34 见艾伦·埃弗里特 (Alan Everitt)：“The Market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e”，载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IV；琼·瑟斯克编，1500—164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7)，pp. 521~522。

35 “英国农民战时提高生产或扩大面积，以满足都铎王朝军队所需，当和平恢复时，他们获得了可观的利润。他们的战时经验表明要尽一切可能开发欧洲市场，他们的利润从英国士兵身上转到法国或佛朗德斯手工匠身上 [同上书，p. 524]。”

36 “政府雇用的专门职员设置——特别是常备军设置——使饥饿的人数量大增，对此，政府有直接责任。”查尔斯·蒂利：“Food Supply and Public Order in Western Europe” (mimeo.)，p. 20。亦见 pp. 36~40。

见 C. S. L. 戴维斯 (C. S. L. Davies)：“前工业社会政府面临的问题其困难程度很少比得上为野战部队提供充足食品的问题之难。”“Provisions for Armies, 1509—50: A Study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Early Tudor Governments”，*Economic History Review*，2nd ser. XVII，2，1964，p. 234。

37 “实际上，军阀最大的危险是，军事企业家，偶而还有劳动力，竭力要先拿报酬，不管其主人政治目标如何受损。由于付不出报酬或欠款迟迟不还（这是军事企业家的家常饭和最大风险），军阀须冒险输掉战争的危险，因为战争是企业家与劳动力替他打的。”雷德利希：*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p. 69。

38 热尼科: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 p. 700。

39 布罗代尔注意到, 16 世纪上半叶特别活跃, 而自 1550 至 1600 年则较平静。他评论道: “因此菲利普二世时期国家的稳固很可能用来解释这种平静, 这种万马齐喑。警察当时过于强硬。……”见 *La Méditerranée*, II, p. 80。

40 “因此, 16 世纪结束时, 地中海山麓处处人口过密, 形势紧张, 为解放自己而爆炸。这场遍布各地的战争与我们称之为土匪活动的那种被掩饰的无休止的社会战争形式混杂在一起。土匪一词很模糊。在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亚平宁或其他山脉, 不论是基督教徒、还是穆斯林, 一个共同命运沿着这广袤的山脉花环——花环正中海在翻腾——划定。[布罗代尔: 同上, p. 93]。”

41 “在海盗 (*la course maritime*) 背后是城市、城邦。在公路劫掠 (*la course terrestre*) 背后是领主的不断援助, 他们支持冒险家。土匪的头领或后台常常就是真正的领主。……

“我们不可过于简单从事: 普遍的形形色色的土匪为一些贵族所利用, 但常常是用来反对另一些贵族。……因为土匪不仅与贵族中某种成分的危机有关联。土匪是群众的、农民为基础的运动 [同上, II, pp. 88~90]。”

42 德吕穆: *Vie économique*, II, p. 547。

43 见同上书, II, pp. 543, 546~547, 608, 625。

44 罗萨里奥·维拉里 (Rosario Villari) 阐述农业发展对意大利南部的影响: “意大利南部没有被伴随新教改革而来的农村暴乱所波及, 现在却反抗空前强化的封建土地重新征税, 反抗改组教会财政经济的现代力量。重要的事实是, 参加运动的那些人不仅有穷苦劳动者, 而且有在农村发挥管理与社会聚合作用的团体。

“他们是农业企业家、*massari*、半资本主义的粮食生产组织者: 农村中的这些力量有能力利用 16 世纪有利局势的长时段, 部分地收割工资萧条的果实, 间接地利用贵族的财政危机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发展。当时他们是工资劳动者、中小所有主、农业企业家。同富有的资产阶级面貌截然不同, *massari* 在王国的初级生产与畜牧业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组织职能。”见 *La rivolta antispagnola a Napoli: Le origini (1581—1647)* (Bari: Laterza, 1967), p. 61。

45 同上书, pp. 61~62。

46 格奥尔格·鲁舍 (George Rusche) 与奥托·基希海默尔 (Otto Kirchheimer) 从这种形势中得出如下结果: “廉价提供雇佣军使骑士变为多余, 花去其一大部分收入。一些人两头受罪, 尤其下层骑士, 因为土壤耗竭, 农民苦难日

重,无法交纳地租。……这些世袭的却无土地的骑士中许多人拦路抢劫,就跟他们的属民一样,不过规模较小。主要区别在于,穷苦农民公开抢劫,而骑士则以合法战争或替穷人向城市商人报仇为借口掩人耳目。……”见 *Punish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39), p. 13。

47 维拉里; *La rivolta artigiana a Napoli*, p. 58。

48 “把[土匪]现象与封建的反抗国家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并不符合这种历史形势的事实。……16世纪末期并不是国家大量施加压力反对贵族的时期;即使在罗马,教皇恢复被大地主[feudatari]篡夺的财物与权利的努力在1581年已告结束,篡夺者们取得了确定成果[同上,p. 60]。”

49 哈通、莫斯尼尔;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V*, p. 8。

50 何塞·A. 马拉瓦尔(José A. Maravall):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IV, 4, 1961, p. 800。

51 埃里克·莫尔纳(Erik Molnar)提出这样一个谨慎的定义:“专制制度是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在专制制度下,国家权力从根本上由君主有效地施行于整个领土,君主所控制的军事官僚组织起辅助作用。这个定义把有效权力作为基本条件,当有争议时,有效权力要压得过反对的愿望,诸如议会或世袭官僚的作对。”见“Les fondements économiques et sociaux de l'absolutisme”,载 *XI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e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Rapports, IV: Méthodologie et histoire Contemporaine* (Wien Verlag Ferdinand Berger & Sohne, 1965), p. 155。

52 “没有什么比事实更能清楚地表明16世纪王权的有限,那时政府多年陷于财政困难,无法从最有能力纳税的人身上挤出钱来,一旦政府试图发展充足的收入时,就可能掀起一场耗资巨大的起义。”见威廉·J. 鲍斯马(William J. Bouwsma): “Politics 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载 *Chapters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3rd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61), I, p. 233。

53 “15世纪、16世纪都没有真正的民族传统;但是却有共同体的感情,国王能够把它转过来为自己服务,使王权易于被接受,人人自由协作。”马拉瓦尔;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VI, p. 796。

54 “[我们应当]避免试图将政治思想[国家的观念]的这一新方向解释为集体的民族团结意识。……”

“我们应当注意这样的事实,在16世纪,法学家和思想家逐渐炮制国家的思想,他们更多地谈君主(依照马基雅维利的用法),不谈人民,更多地谈政府,不谈集体。

“我们因此应就这个出发点进行思考：‘国家’本身尚不存在。它首先从根本上确定一种政府的新形式：君主的公共权力。”乔治·德·拉加尔德(*Georges De Lagarde*)：《16世纪国家概念形成考》，载恩里科·卡斯特利(*Enrico Castelli ed.*) *Umanesimo e Scienza Politica* (Milano:Dott. Carlo Marzocati, 1951), pp. 247~248。

55 “古典风尚在16世纪又显示出罗马法的新力量，并且加进‘英雄’、半神，法力无边，为民造福这类古代思想。……英雄乃是各民族顶礼膜拜者的典型。”见莫斯尼尔：*Les XVI et XVII Siècles*, pp. 96~97。

56 “在纯经济学的对立极，有一个地方提到那富有弹性的混合公式：‘市场是资产阶级最先学习民族主义的学校。’”见皮埃尔·维拉尔 *La Catalogne dans l'Espagne Moderne*, I (Paris:S.E.V.P.E.N., 1962), p. 34。

57 “[西方国家的]许许多多人民，尤其是首都或首都周围的人民，日益认为他们自己是国王本人的特殊臣民，具有近乎今天称之为 *Staatsvolk*(国民) 的身份。……君主力争控制那些势力强大的臣民，让中产阶级去反对他们，但他也希望通过扩张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从外围包抄本地区的封建制度。”基尔南：*Past & Present*, No. 31, p. 33。

58 “社会应当一体化，可能的话，国家应当只有一个种族、一种语言、一种文化，拥有政治边界的所有人民或差不多所有人民，应当有权决定该做什么——这种思想是全新的思想，是19世纪西方思想的成果。见沃尔弗拉姆·艾伯哈德(*Wolfram Eberhard*)：*Conquerors and Rulers: 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 (Leiden:Brill, 1965), 2nd rev. ed., p. 6。

59 查尔斯·蒂利用“正式的自治、同非政府组织相区别、中央集权以及内部谐调”来衡量“国家性”。由此得出结论：“极端的国家性既不保证政治的稳定，也不确保国际舞台上的实力。人们可以揣测，国家性的增长通常确实使政府对臣民流动资源的控制增长，确实增长了政府在国际国内范围解放资源以达目的的能力。”“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tatemaking”，查尔斯·蒂利所编 *The Building of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第9章油印初稿, pp. 18~19。待出版。

60 萨罗·W. 巴伦(*Salo W. Baron*)：*A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 2nd ed., XI: *Citizen or Alien Conqueror*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67), p. 192。

61 “13世纪末，犹太人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在德意志已经削弱，其原因也是由于一系列针对犹太人的禁令。从那时起，同东方的整个贸易都流入了后来

闻名于世的渠道：南方的意大利—地中海渠道与北方的汉萨同盟渠道。早先多少世纪曾经发挥作用的穿过俄国与波兰的跨越大陆的商道在历史记载中消逝了。”J. 布鲁茨库斯(J. Brutzkus):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800—1200”, 载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I, 1943, p. 41。

62 关于波兰, 萨罗·巴伦说道: “[11、12 世纪] 期间犹太人的生活我们知之甚微, 但犹太人确实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 即使有什么法律限制, 他们身上所受的限制也很少。”*A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 2nd ed., III: *Heirs of Rome and Persia*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57a), p. 219。在西欧, 封建制度倾向于对犹太人有利, 把犹太人作为“国王封臣中的新团体, 与基督教贵族有亲缘关系。”萨罗·巴伦: *A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 2nd ed. IV: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57), p. 50。在西班牙(见 pp. 36~42)、加洛林王朝的法国(见 pp. 43~53)、德意志(见 pp. 64~75)、英国与诺曼底(见 pp. 75~86), 情况都是如此。尽管封建制度“在西欧搞无政府多样化, 加强教会对犹太人的统治, 从而使犹太人的生活大大复杂化,” 实际上也还是“教会的中央与省机构为犹太人的安全做出重大贡献, 继续坚持宽容政策, 强调君权神授以加强王权, 命令国王公正统治, 不懈地宣传和睦一致, 在包括神职人员和犹太人的居民中, 为毫无防御力的团体确立‘神圣的停战’”[pp. 53~54]。”

63 中世纪初期, 犹太人从“国王封臣”中得到益处。中世纪末期, 这些国王变得更强大。可是犹太人的地位却开始下降。巴伦评论道: “由于他们可敬的君主从那种关系中攫取越来越大的财政利益, 可是他们却不能利用他们日益增长的权力更有效地保护他们的犹太‘奴隶’, 就不能不使人倍觉惊愕[p. 198]。”巴伦在“19 世纪后期逐渐形成的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中找到了解释[p. 199]。此外, “中世纪社会日益增长的世俗化加强了民族宗教的不宽容[p. 200]。”

64 “[14、15 世纪, ……犹太人] 被从一个又一个国家驱逐出去, 以日益增多的数量向东部中欧开放边境移动, 在斯拉夫、匈牙利和立陶宛领土上建立了日益增长的空前自立的犹太人社会。在这番努力中, 他们发现, 自己作为现金与信贷的提供者, 对未来社会有用, 作为心甘情愿、孤苦无告的征税对象, 对国家有用, 这是他们的一大经济财富。”见萨罗·W. 巴伦: *A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 2nd ed., VII: *Economic Cataly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67b), pp. 30~31。

德意志是边缘地区：“可是黑死病灾难过后，九死一生、贫困不堪的德意志犹太人越来越被迫集中于以放债为生。尽管其财政收益逐步缩小，还是招致居民的强烈憎恨。……那些通过征税，在很多方面曾作为犹太银行家的暗中合伙者的统治者，现在越来越不热衷保卫他们的被保护人了。……16世纪初，风云变幻，形势恶化，社会不安与宗教纷争酝酿着内战与宗教战争 [pp. 151~153]。”

65 “看来，对波兰的大量犹太人来说，形势有所不同，对于他们，土地财产与社会晋升的道路在原则上是堵死了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相信，[工业与矿业]投资开展得更频繁。”M. 马洛维斯特：“L'évolution industrielle en Pologne du XIVe au XVIIe siècle: traits généraux”，载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ì* (Milano: Istituto Edit. Cisalpino, 1957), I, p. 601。

66 “但是我们如何解释 [意大利城市商业领导地位的] 衰落呢？导致这一后果的因素如下：城市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王家借债不还引起的破产（巴尔第·佩鲁齐的破产），没有一个能保护海外公民的大国家；这就是说，根本原因是城市在结构上无法改造成为领土广阔的国家。”安东尼奥·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Il Risorgimento* (Roma: Giulio Einaudi Ed., 1955), p. 9。

67 “只要意大利北部各共和国仍为世界银行中心，犹太人就被有效地排除在这些‘伦巴德人’的故乡之外，因为他们的财源始终在世界上远胜于犹太人。但是13世纪财政危机之后，各式各样大商行的倒闭，犹太人的新机会到来了。……

“不久，意大利公国也欢迎犹太人前来补充其经济力量。”巴伦：*A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 Ⅷ，pp. 161, 163。

当西班牙和西西里的犹太人1492年被驱逐时，“意大利成为基督教欧洲唯一向流亡者开放的国家。……”塞西·罗思 (Cecil Roth): *The History of the Jews of Italy*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46), pp. 178~179。

68 “如果在 [西欧] 某些地区犹太人没有彻底被驱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所在国政府财政上的利益，他们对犹太人放债的征税日益加重，直接或间接从中征集岁入。”巴伦：*A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 Ⅷ，p. 197。

见 J. 李·施奈德曼 (J. Lee Shneidman) 论 13、14 世纪的阿拉贡：“平常人们借钱总希望能还。当人们借钱给国家时，情况就不然了。国王们的确常常偿还小笔贷款，可是他们的一贯作法是借新债还旧债或从东家借债还给西家。通常犹太人借给国家的钱白丢了，他只好从收税的利润中找补。由于这些利润变成

了进一步借贷的来源，君主最急于做出保证，犹太人可捞回贷款外加利润。”
The Rise of the Aragonese - Catalan Empire, 1200—1350 (New York: New York Univ. Press, 1970), II, p. 433。

69 P. 埃尔曼(P. Elman): “The Economic Causes of the Expulsion of the Jews in 1290” 载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II, 1, Nov. 1936, p. 151。埃尔曼进一步认为，正是因为犹太人已被“榨干”，所以请意大利人取而代之。

70 “那时，……英国海外商人与英国市民的力量汇合在一起，城市的排外扩大为经济民族主义。14世纪末，英国呢绒商人打进地中海的企图在汉萨同盟各城市很不受欢迎。在这种形势下，汉萨同盟在英国的种种特权(包括呢绒抽税低于本地居民)显得极其不合理，英国商人不是要求在地中海享有同等贸易特权，就是要求取消汉萨同盟在英国的特权。……与此同时，意大利人成了同一场争论的中心。……[市民转而]反对流行一时的金银小玩物。他们的银行和交易业务被认为会导致金银外流，他们的贸易特征[奢侈品‘玩意儿’]被认为是捞取金银的渊藪。”爱德华·米勒：“The Economic Policies of Governments: France and England”，载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I: M.M. 波斯坦、E.E. 里奇、爱德华·米勒所编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Policies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3), pp. 330~331。

71 1492年是关键性年份。在那以前，维桑斯写道：“像在西方其他国家一样，城市资产阶级并不存在。这个空隙是由基督教之外的一个社会阶级填补的：这就是犹太人。”*An Economic History of Spain*, p. 248。犹太人之后，热那亚人主宰：“热那亚商人在西班牙的历史转折点是美洲的发现和随之而来的与新大陆贸易往来的开始。从那时起，他们在西班牙的经济主宰地位与西班牙在16世纪称雄世界并行不悖。命运同时赐与西班牙两个帝国，一个在旧世界，一个在新世界。西班牙对于帝国的责任，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的责任毫无准备，这就为热那亚人的升进架了跳板。”鲁思·派克(Ruth Pike): “The Genoese in Seville and the Opening of the New Worl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II, 3, Sept. 1962, p. 348。见肖尼: Séville, VIII, (1)pp. 285~286。

亦见哈维尔·鲁伊斯·阿尔曼萨(Javier Ruiz Almansa): “三个种族集团(基督教徒、犹太人、摩尔人)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每一个都担负着特定职能。特定职能的消除造成了难以填补的真空，西班牙社会出现了真正结构性的大混乱。热那亚人和佛兰德斯人继承了原先犹太人履行的职能，但不是全部。

法国南部手工匠填补了摩尔人留下的大部空白。……”“Las ideas y las estadísticas de población en España en el siglo XVI” *Revista internacional de Sociología*, I, 1947, 胡安·雷格拉(Juan Reglá)引证; “La expulsión de los moriscos y sus consecuencias, Hispania,” *revista española de historia* XIII, No. 52, 1953, p. 445。

72 “15世纪初,波兰突然大兴现代化,犹太人数量日益增多,几乎构成了一个犹太民族和国家,所有这一切在17世纪的经济困难和残酷镇压中都被扫光。……”布罗代尔; *La Méditerranée*, II, p. 137。

73 “13、14世纪之交,意大利大家族控制着英国羊毛出口,在若干年内完全垄断出口,整个控制王国海关。

“意大利人终归被本地商人行会从这种地位上赶下来,英国斯特普尔公司最后取而代之。……”

“到1361年,英国斯特普尔公司实际上占有了向北欧‘出口羊毛’的垄断权。……”

“垄断适合……羊毛商的要求……; 它适合呢绒织造者们日益增长的利益,因为它在国内羊毛与国外羊毛价格之间划定很宽的差价。然而它首先适合于国王的愿望。关税与羊毛出口津贴是国王最有可能提供的保障,特许公司享有贸易垄断权,比起那些在英法百年战争中接连破产的一系列商行与行会,它们是国王更为保险的贷款来源。……唯一的利益受损者是养羊人;而这也可能就是羊毛生产衰落的一个原因。”M.M. 波斯坦; “The Trade of Medieval Europe: The North”, 载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M.M. 波斯坦、E.E. 里奇编 *Trade and Industry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52), p. 238。

74 强迫皈依基督教发生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乃是推行半边缘化的良策。犹太人被准许被迫改信基督教(实则仍信犹太教)。这使他们在资产阶级内部发挥比以前大得多的重要作用。当伊比利亚半岛的发展达到需要排挤当地资产阶级的程度时,‘资产者’与‘新基督教徒’的巧合使后者成为轻易被迫害的目标。见 I.S. 勒瓦(I.S. Revah); “L’hérésie marrane dans l’Europe catholique du 15e au 18e siècles”, 载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 *Hérésies et sociétés dans l’Europe préindustrielle, 11e - 18e siècles* (Paris: Mouton, 1968), 特别是涉及葡萄牙的 p. 333。

75 见马洛维斯特; *Past and Present*, No. 13; 费尔多·热斯特兰 (Ferdo

Gestrin): *Annales E. S. C.* XVII(1962)。

76 萨罗·W. 巴伦:私人信件, Nov. 16, 1970。见D. 斯坦利·艾岑(D. Stanley Eitzen):“由于犹太人[在16世纪]为贵族和国王工作,犹太人进一步受到人们厌恶。他们作为国王的财政代理人,租赁和管理王室领地和富豪产业,并且常常充当收税人。”“Two Minorities: The Jews of Poland and the Chinese of the Philippines” *Jew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X, 2, Dec. 1968, p. 227。

77 “可是人们今天常常想当然地认为,加尔文教是一种鼓励商人的进取精神的宗教。这种教义赤裸裸地主张,加尔文教颂扬进取热情,或至少鼓励人们相信商业中的成功是成为上帝选民的标志。对加尔文教进行如此歪曲并非不可想见,尽管不值一提,它不仅是一种歪曲,而且是一种为严格的加尔文教徒所特别厌恶的歪曲,因为它包含试图披露上帝那无法预知的劳作这一邪恶的设想。对加尔文教的一种更流行的歪曲,性质截然不同。就是让人们从信奉先定论滑向宿命论,变得无所作为,毫无工作兴趣,因为在上帝意志面前,个人的努力是无能为力的。几年以前,卡内基公司委派专员到南非调查‘穷苦白人’问题,引起激烈争论,‘穷苦白人’缺乏主动性和自立精神,而‘错误的加尔文教’培养的那种宿命论是否就是原因之一呢。这对人们广泛认为刺激企业精神的加尔文教是有趣的评论。它的确非常强烈地提出,除教义影响外的其他影响决定着加尔文教徒对经济机会与刺激的反应。”H.M. 罗伯逊(H.M. Robertson):“European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XVIII, 1, Mar. 1950, p. 48。

78 我并不是力图否认用加尔文神学比用天主教神学更容易为资本主义活动找根据。不仅韦伯这样认为,而且他的一些最激烈的批评家也这样认为。例如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认为:“利用心灵的动力,让社会压力更自由地影响个人行为,这种说教尤其……在社会快速变化时期,在那些身受社会变化影响的人们中间盛行;宗教改革者从圣奥古斯丁神学中获益不少,圣奥古斯丁也生活在旧伦理准则崩溃的时代;他也强调内心动机,不强调外部行动。……看来有一种永恒的倾向,使官方教会恢复仪式,反对派团体强调内在因素。”见“Protestantism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载F.J. 费希尔编;*Essay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0), pp. 34~35。

我的观点则是,如果社会需要,天主教本可用来为资本主义作根据,而新教则不必要。我最多只会同意希尔的说法:“但新教并没有什么自动引向资本

主义的东西；新教的重要乃在于它破坏了天主教更顽固的制度礼仪所设置的重重障碍[p. 37]。”

79 克里斯托弗·希尔：*Reformation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530—1780*, Vol. II of the Pellic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67), p. 34。

80 “后来，到16世纪20年代，发生了大暴乱，即路德的暴乱。这并非欧洲旧的成熟经济内部的暴乱：这是长期以来为维持地中海地区与莱茵河高度文明而[身受]剥削、抽税、绝望的中欧北欧‘不发达’‘殖民’地区的暴动。”H. R. 特雷弗-罗珀 (H. R. Trevor-Roper)：“Religion, the Reformation and Social Change”，载 *The European Witch - Craze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哈珀, 1969), pp. 32—33。

81 见巴伦：*A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 VII, p. 18。

82 P. C. 戈登-沃克：*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II, 1937, p. 14。“路德阶段的具体结果……是摧毁天主教对中下层阶级的控制，夺取天主教封建财产。……

“[第二阶段]主要问题现在变为阶级适应。……资产阶级必须将低三下四换成统治意志。……工人阶级必须把松弛宽泛的劳动换成有纪律的正规而有组织的工作。……资本主义社会……需要个人主义掩盖那比封建制度下更接近表层的社会阶级结构。……阶级结构(从永生中)得到根据，又因强调作为社会分化唯一标准的个人精神行为而黯然失色；巩固阶级结构的正确社会伦理和方法是现成的，自列为选民，必要的话，对被上帝打入地狱的人加以强制。

“[因为]宗教改革的最高任务——阶级适应的完成，新教徒转而从从事其他更重要的活动；首先必须给世俗国家和科学让位[pp. 16—17, 18]。”

83 见斯特凡·查尔诺夫斯基 (Stefan Czarnowski)：“La réaction catholique en Pologne à la fin du XVI^e siècle et au début du XVII^e siècle”，*La Pologne au VI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e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Société Polonaise, Varsovie: 1933), II, p. 300。见萨德·格拉波夫斯基 (Thadée Grabowski)：“路德教主要鼓吹者 [1530年 1555年之间]是教士、德裔资产者以及从当时大学教育中心维滕贝格与柯尼斯堡归来的波兰大学生。

“贵族几乎完全不介入。在他们看来，路德教太温和而且支持……王权。……因为路德教太教条并主张君主制，幻想建立古罗马共和式共和国的领主感到不快。”“La réforme religieuse en Occident et en Pologne”，*La Pologne au Ve Congrès Internationale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Bruxelles, 1923 (Warsaw, 1924),

pp. 67~68。

斯坦尼斯拉夫·阿诺德 (Stanislaw Arnold) 却认为这不太准确：“可以肯定有一部分，但只有一部分，大亨变成了宗教改革尤其是加尔文教派的精通者。但加尔文教派特别吸引当时在国家尤其是在议会中当权的中等贵族中最进步的成分。”“Les idées politiques et sociaux de la Renaissance en Pologne”，*La Pologne au Xe Congrès Internationale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à Rome* (Warszawa: Académie Polonaise des Sciences Institut d'Histoire, 1955), p. 160。阿诺德特别批判查尔诺夫斯基。见 p. 159。

福克斯 (Fox) 与塔齐比尔 (Tazbir) 却提供一幅接近查尔诺夫斯基与格拉波夫斯基的图画。见 P. 福克斯：“The Reformation in Poland”，载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oland*, I: W. F. 雷德韦 (I. W. F. Reddaway) 等编 *From the Origins to Sobieski (to 1696)*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50) pp. 329, 345~346; J. 塔齐比尔：“The Commonwealth of the Gentry”，载亚历山大·盖斯托尔 (Aleksander Gieysztor): *History of Poland* (Warszawa: PWN - Polish Scientific Publishers, 1968), pp. 185~186。

84 查尔诺夫斯基, p. 301。

85 同上书, p. 304。

86 同上书, p. 308。J. 乌明斯基 (J. Uminski) 强调波兰新教中的非波兰成分：“路德教主要吸引波兰城镇中居住的德裔居民。……不久便开始在贵族中取代加尔文教派的所谓反三位一体教派，严格说来并不是波兰的。波兰反三位一体教派主要是外国人组织和指导的。”“The Counter - Reformation in Poland”，载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oland*, I, p. 412。

雅努斯·塔齐比尔指出宗教民族主义的国际含义：“天主教使波兰不同于新教瑞典、东正教俄国和伊斯兰教土耳其 [p. 228]。”反之，“教廷力图通过波兰不仅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且经常实现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目的 (p. 229)。”

87 “因为在新的异端路德教派与加尔文教派背后潜伏着更加危险的敌人，对此天主教当局早有察觉。而罗马教廷长期以来可能却不太关注镇压新教 (暂时的挑战)，罗马教廷更关心的是恢复当时正在兴起的政治特殊神宠说，把几乎到处都在日益推行联邦自治的教会机构中央集权化，将解脱羁绊的俗人附属于教会当局，结束艺术知识文化的危险的自由，重申客观的、教阶的与哲学的现实概念有效，罗马教廷监督基督教世界各种活动的要求藉此得到支持；总之，中止所有那些被历史学家联结于文艺复兴时代的进程。”威廉·J. 鲍斯

马: *Venice and the Defenses of Republican Liberty*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 294。

88 C.H. 威尔逊: "Trade, Society and the State", 载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 490。

89 维拉尔: *Past and Present*, No. 10, pp. 33~34。

90 高桥由一: *Science and Society*, XVI, p. 334。

91 "君主专制国是一种封建国家形式。" 克里斯托弗·希尔: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Science and Society*, XVII, 4, Fall, 1953, p. 350。

92 "西方君主专制国产生自特殊种类的封建君主制。" V.G. 基尔南: *Past and Present*, 31, p. 21。

93 "一切形式的欧洲专制制度都是为贵族阶级或地主利益服务的, 都体现他们对社会上其他阶级, 尤其是为数最多的阶级——农民的统治。" 埃里克·莫尔纳: *XI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Rapports*, IV, p. 156。

94 波尔契涅夫力图解释官僚制的资产阶级起源, 认为它恰恰是源于封建制度固有的矛盾。在封建制度下, 政治经济现象不可分离意味着每个贵族追求特定的利益, 不必与贵族阶级整体的利益一致。"结果出了奇怪的难题: 贵族等级 [état nobiliaire] 的权力结构并未能放在贵族手中, 因为贵族中任何一个特定集团掌权都必然挑起一场与领主阶级其他分子的公开斗争。"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p. 563。

95 约瑟夫·A. 熊彼特: "The Sociology of Imperialism", 载 *Social Classes, Imperialism*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55), pp. 57~58。

96 "在基督教中亦如在伊斯兰教中一样, 贵族占据高位, 而且他们决不放弃。……各个国家都在发生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 但这场革命才刚开始, 国家必须处处与那些'封地占有者, 村庄、田地和道路的主人, 以及广大农村居民的保护人'作斗争。斗争意味着与他们达成协议, 分化他们, 而且还保留他们, 因为要在社会上保住政权, 统治阶级就不可能是清一色的。近代国家握有这种武器; 如果打碎它, 一切都得重新做起。而社会秩序的再创不是一桩小事, 尤其是在 16 世纪尚无人认真思考这种可能性。" 布罗代尔: *La Méditerranée*, II, p. 50(亦参考 p. 54)。

97 "涉及到贵族中两个集团, 专制制度的政策目的就是保卫他们根本的

阶级利益,即他们的财产。君主专制制度并不满足佩剑贵族(noblesse d'épée)公开的反动要求,在许多情况下,它直接反对他们——但这离‘平均主义’还差得远。”A. D. 鲁布林斯卡亚; *French Absolutism: The Crucial Phase, 1620 - 1629*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8), p. 26。

98 J. 赫斯特菲尔德 (J. Hurstfield): “Social Structure, Office - Holding and Politics, Chiefly in Western Europ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R. B. 沃纳姆 (R. B. Wernham) 主编: *The Counter - Reformation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1559 - 161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8), p. 130。他写道:“但是整个西欧贵族在社会上的职能原本就自相矛盾。身为贵族,他们有传统的野心与抗衡性,这与国王的和平不断发生冲突。但身为世袭官吏——就像他们当中许多人一样,他们是被期望来巩固法制的,法制的持续力量全靠抑制他们自己自私自利的权力。”

99 “君主专制国是资产阶级与贵族两个阶级抗衡的结果。……”

“这种阶级斗争可能是君主专制国发展中的首要因素。”莫斯尼尔; *Les XVIe et XVIIe siècles*, pp. 97, 99。

100 莫尔纳; *XI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Rapports*, IV, p. 163。

101 “占有公共权力和征税权,官员们就构成凌驾社会之上的社会机构。

……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抗,也是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毋庸置疑,国家就是最强大的经济上居统治地位并藉此在政治上亦成为统治阶级,从而获得统治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的统治阶级的国家。……然而,当交战的阶级势均力敌之际,国家作为调停者,暂时获得了某种对双方都独立的地位,这时,例外的时期就出现了。17、18世纪[但16世纪怎么不是?]便是如此,互相对抗的贵族与资产阶级达到平衡。”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The Origins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Lawrence Wishart, 1940), pp. 195~196。

102 在讨论15世纪意大利形形色色城市的商业贵族现象时,保罗·科尔斯 (Paul Coles) 说道:“贵族正在排演他们将在16世纪欧洲商业活动中扮演的角色。……” *The Crisis of Renaissance Society: Genoa, 1448 - 1507*, *Past & Present*, 11, April 1957, p. 19。

“[将近15世纪末,出现]一种新的匈牙利发展趋势,在经济上归结起来就

是领主阶级日益投身市场贸易,后来还投入[葡萄酒、牲畜、小麦]这类商品的生产。”Zs.P.帕赫:“En Hongrie au XVIe Siècle: l'activité commerciale des seigneurs et leur production marchande” *Annales E. S. C.*, XXI, 6 nov. - déc. 1966, p. 1213。

“始于15世纪末并蔚然成风的贵族投身农牧产品出口贸易,构成与贵族直接开发土地的发展相关的有趣现象。……16世纪促使[贵族充当呢绒与奢侈品进口商]这种发展的因素,是在贵族压力下,逐渐在最大的城市里取消关税。”玛丽安·马洛维斯特: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ì*, I, pp. 587-588。

“16世纪期间容克企业活动范围随着对城市工业生产和贸易垄断的袭击而扩大。……容克作为商人、走私犯和工业家的出现,最终破除了城乡之间传统的平衡。”汉斯·罗森伯格: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IX, p. 236。

自16世纪后期开始,大部分罗马农村掌握在一小撮地主手中。他们被称为 *mercanti di campagna*, (农村商人)。见德吕穆: *Vie économique*, II, p. 571。

前面已讨论过的军事企业家大部分出身贵族。即使不是贵族出身,这类企业活动通常也会使他们受封贵族。见雷德利希: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Suppl. No. 47, pp. 411, 427-428。

亦见戈兰·奥林(Goran Ohli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of the Swedish Aristocracy” 载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VI, 2, 1953, pp. 147-162; 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 “The Nobility in Business, 1540-1640”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X, 2, Dec. 1957, pp. 54-61。

103 “为避免将来的困难和建立统一规章,1622年教皇颁布教谕,将圣地亚哥法规扩大至所有[军事]团体,[对于其成员来说]禁令不适用于大规模企业家,只适用于小店主或普通放债人。……西班牙继续保持帝国力量,商业至关重要,不能认为庸俗谋财而废弃。”L.P. 赖特(L. P. Wright): “The Military Order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Spanish Society” 载 *Past and Present*, No. 43, May 1969, pp. 66-67。

104 “在土地投资竞赛中,教会与非牟利团体[*gli enti morali*] (大部分受[教会]影响)占有优势,因为他们比俗人和‘私人党派’早些加入这一竞赛。15世纪末,米兰一半地产在他们手中,造成有名的社会宗教后果。”布尔费雷蒂: *Archivio Storico lombardo*, IV, pp. 21-22。

105 “从非常早的时期起,成功的商人便将积蓄投资地产,买得尊严与社会敬重。一文不名的绅士靠商业投机恢复了家族衰落的财产,与商人家庭联姻

是有利可图的投机。16世纪初,这两种运动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自发进行着,这是所有形式的商业活动大大增长的结果。从商业获得的巨大收入的增长,诞生出一个新的商人等级,他们的企业不限于海港和享有特权的城市,而是购买地产,那时寺院赐地的世俗化还未使土地投机成为整整一代人的狂热。”R.H. 托尼(R. H. Tawney): *Agrarian Problem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Longmans, 1912), p. 187。

106 “16世纪束缚于君主制并为国王服务的资产阶级始终处于消失的边缘。他们不仅冒着毁灭的危险。假如他们太富有,或疲于商业生涯的风险,他们就购买官职、地租、封地头衔,陶醉于安逸庸懒享有特权的贵族生活。为国王效力会迅速封为贵族;唯有此路也同样使资产阶级消失。”布罗代尔: *La Méditerranée*, II, p. 68。

107 退居过食利者(rentier)生活的倾向并不难解释。海外贸易活动的甘苦并不总是能使人致富,而发财机会因国外市场越来越小而日益渺茫。同时,很可能资本太少,无法控制高利率。……[这种进程]只能说明一部分新资产阶级,还有其他部分。首先,有那些仍旧在商业职业中,而不在外面寻找并发现安全保障的人。他们以较小规模在组织良好受到保护的市场上进行贸易。……大宗贸易掌握在中等财富者手中。由于财富中等,他们便寻找安全保障,并在合作、联合,更通常是在数量中找到保障。”M.M. 波斯坦,载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p. 218。

108 布洛赫: *Caractères Originaux*, I, p. 129。

109 “资本主义和君主专制国的联系并不总对资本主义有利。可以断定从16世纪60年代起,影响全欧的破产与国家管辖对大陆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迟缓绝非是次要因素。另一方面,商业资本主义发展迟缓从长远看有利于君主专制国。它阻止资产阶级过于迅速增长,有利于维持资产阶级与贵族的相对平衡,这乃是西欧专制制度的特征之一。”哈通、莫斯尼尔: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IV, p. 45。

克里斯托弗·希尔同样认为:“垄断本身并不坏;垄断是落后国家保护新工业的形式。最早的垄断与国防有关——伊丽莎白皇家矿旨在使英国不依赖外国铜制造大炮。还有类似的硝石与火药垄断。但是当敌视资本主义发展的政府把垄断用于征税目的时,垄断就迅速变为有害。17世纪垄断创立,以便出售。……”*Reformation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 96。

110 他们指的不仅是规模经济,而且是通过境外商品“国内化”(通过重组

产权),降低信息费(通过股票交易),降低风险费(通过合股公司),使得商业经营成本降低。见道格拉斯·G. 诺思、罗伯特·保罗·托马斯;*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XIII, pp.5~7。

111 同上书,p.8。

112 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强调国家对企业家有用途的关键因素:“君主政府的存在具有肯定的意义,即对国内和民间经常发生的有关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引起的冲突,有可能作出决策。”*The State as the Unit of Study of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 1, Winter, 1951, p.28。

第四章 从塞维利亚到阿姆斯特丹：帝国的失败

正在产生中的欧洲世界经济体是一笔巨大的横财，人们千方百计要控制它，这是可想而知的。帝国统治的道路是那个时代人们所熟悉的古典式道路。许多人对此梦寐以求。查理五世统治下的哈布斯堡王朝雄心勃勃，欲将整个欧洲并入自己的版图。到1557年，这一企图宣告失败。西班牙不仅逐渐丧失了政治统治，而且丧失了经济中心地位。许多城市渴望成为欧洲世界经济体的中心。塞维利亚、里斯本、安特卫普、里昂、热那亚和汉堡都有这种愿望，即使它们没有提出这一要求。可是实际上，阿姆斯特丹在1450年时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城市，到1600年已首屈一指。现在，我们回顾帝国失败的这段历史，西班牙和它的所有联盟城市国家都衰落下去，为阿姆斯特丹的崛起廓清道路。

1450年前后开始的经济跃进首先出现在所有的旧贸易中心，即在人们称为欧洲的脊骨的地方——佛兰德斯、南德意志、北意大利，当然还有西班牙，这是因地理大发现的原故——造成一派热气腾腾的繁荣景象。恰恰是这些地区构成了查理五世治下的哈布斯堡帝国，这点很引人注目。在这次扩张中，最新的重要成分是16世纪西班牙的跨大西洋贸易，以塞维利亚和西印度贸易署为中心，跨大西洋贸易变得如此重要，乃至“欧洲的生计，世界的生计，就当时已存在的世界而言，都得指靠[它]。塞维利亚和它的帐目……可以告诉我们世界的节奏。”

西班牙究竟是怎样起到这一中心作用的？我们在第一章曾讨

论过，15世纪欧洲海外扩张的领先国家毕竟不是西班牙，而是葡萄牙。况且15世纪在西班牙历史上也不是一个安定的时代。的确，海梅·维桑说道，“15世纪西班牙史可概括为危机二字。”²

危机包括政治危机（叛乱与内战时期）和经济危机（欧洲范围的经济衰退）。西班牙在经济上对危机的反应是发展它的羊毛工业，通过低价大量夺取（已缩小的）世界市场。³ 西班牙的羊毛生产者联合组织的牧主团力量强大，卡斯蒂利亚有潜力的资产者在14、15世纪屡次促使国王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均告失败。⁴ 甚至在自诩为工业活动的坚决支持者的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天主教君主统治时期，维桑发现，所谓的工业，生产的“不是奢侈品就是只拥有地方市场。”⁵ 与英国不同，西班牙没有走向发展重要的纺织业的道路。⁶ 有趣的是，也许正因为卡斯蒂利亚的竞争和中世纪末期的萧条，鼓励英国走上一条工业发展的道路。可是事实是，西班牙并没走这条道路。

那么，西班牙经济既然如此结构薄弱，我们又如何解释16世纪上半叶西班牙的经济中心地位呢？其原因一部分在于虚弱是长期的而非短期的，一部分在于政治体制在某些层次上是强大有力的。卡斯蒂利亚在整个中世纪都有着一个明确的“民族”任务。一方面是收复失地，将摩尔人逐渐逐出伊比利亚半岛。1492年，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那一年，穆斯林的格拉纳达终于垮台，犹太人也被逐出了西班牙。另一方面是努力统一西班牙各基督教国家。这个运动的结果只实现了最高一级的合并，阿拉贡仍保持单独的立法、国家预算和社会法律制度。

由于西班牙建立在收复失地上，封建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形式便很软弱。⁷ 因此，就像何塞·马拉瓦尔指出的那样，“有了一个并非建立在封建结构之上的政治社会秩序，就为‘国家’形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场所。”⁸ 一流的道路系统使得中心与边远地区的政治经济来往相当方便。⁹ 斐迪南与伊莎贝拉帮助牧主团建立强大的国家市场体系。¹⁰ 他们提供了个人流动制度，尽管流动的前提是维持

社会阶层和等级制度的价值。¹¹他们加强官僚制度,让官僚制度“在社会生根……成为社会的……‘公共统治’。”¹²可以说,他们将天主教教士国有化。¹³首先,他们创造了“卡斯蒂利亚现存经济潜力能够充分实现的各种条件。”¹⁴

如果金银能通过西班牙流入,如果卡斯蒂利亚能一下飞到欧洲上空的中央,彼埃尔·维拉尔写道,“那么它既是结果,也是原因。”¹⁵但究竟是什么东西的结果呢?是围绕金银的经济作用为中心的一系列事件的结果:地中海世界薄弱的金银基础,苏丹作为黄金的供应者从前占有的中心地位,葡萄牙的扩张对北非的意大利城市国家中间人的影响,热那亚人在西班牙的作用,以及热那亚人寻找非葡萄牙所有的金银来源运动(这个运动只有西班牙能完成)。

让我们追溯一下这段复杂的历史。我们已经谈论过中世纪贸易中金银的作用,讲到了苏丹的黄金如何经由北非至基督教地中海世界而到达欧洲。到15世纪中期,北非的作用突然大大缩小了。缩小的程度似乎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布罗代尔论述了北非地位的衰落。¹⁶马洛维斯特承认北非地位降低,但并不认为是灾难性的。¹⁷金银突然短缺加剧了西班牙国家的财政负担,由于军事和宫廷的开销日增,财政负担日甚一日,导致西班牙钱币马拉维迪贬值。¹⁸

财政危机严重,促使西班牙的热那亚人作出反应,因为他们既是西班牙的银行家,又是黄金买主。我们早已谈到热那亚在西班牙商业中的作用。热那亚人是以多种方式投入西班牙商业的,不光是作为金融家。¹⁹但是热那亚人为什么不能通过葡萄牙弄到黄金呢?也许作为探险上领先的国家,葡萄牙力量强大,允诺热那亚的条件不如西班牙给予的优越。²⁰也许力量如此强大,使葡萄牙缺乏想象力。想象力通常不是指别的,而是指短期渠道被阻塞的人转而去追求中期利润。当渠道未被阻塞时,想象力便受损。葡萄牙在非洲海岸的航行已然一帆风顺。向西航行的风险对它来说是无所谓的。²¹肖尼雄辩地论证这样一个明显的命题——西班牙发现美洲并不是

靠运气。西班牙是当时最有魄力的国家，“不仅能抓住天赐良机，而且能为自己创造时机。”²²英国雇用意大利人约翰·卡伯特，但卡伯特的第二次“英国”探险却得要西班牙支持。直到17世纪，法国和英国才成为海外探险国家，而且直到18世纪，才真正获得成功。²³

西班牙16世纪就建成了一个庞大的美洲帝国，海上运输的代价允许多大，帝国就有多大。²⁴跨大西洋贸易闪电般增长，1510年至1550年间贸易总额增长8倍，1550年至1610年又增长3倍。²⁵跨大西洋贸易的中心焦点是塞维利亚的国家垄断，它在很多方面成为西班牙关键性的官僚结构。²⁶跨大西洋贸易的中心项目是金银。起初西班牙人只知收取印加人已经开采的用于宗教仪式的黄金。²⁷这是个富源。正当这个富源衰竭之季，西班牙人发现了白银汞齐化法，他们用这个方法开采了大量白银，金银由此大量流入欧洲。²⁸

贸易闪电般地增长也带来了欧洲惊人的政治扩张。1519年查理五世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其领地在欧洲包括各种各样互不相连的地区，如西班牙（包括阿拉贡）、荷兰、南德意志若干部分（包括奥地利）、波希米亚、匈牙利、弗朗什-孔泰、米兰和西班牙的地中海属地（那不勒斯、西西里、撒丁尼亚、巴利阿里克群岛）。这个帝国在结构上与同时代的苏莱曼大帝的奥斯曼帝国和恐怖的伊凡的莫斯科帝国并列，一时间似乎要囊括整个欧洲。新生的世界经济体似乎会变为另一种统治。查理五世苦心孤诣要把欧洲世界经济体纳入自己的辖圈。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也试图这样干，²⁹而且法国在国土广大和中央集权上拥有优势。³⁰但是法国资源不足，查理五世当选皇帝而弗朗索瓦一世未当选，对法国是一大挫折。不过，法国地处西班牙帝国的“心脏”³¹，它的强大足以使以后的50年成为两个巨大帝国——哈布斯堡和瓦卢阿干戈频仍的50年，这场斗争到1557年以两败俱伤而告终，在欧洲实现大一统的迷梦停息了很长时间。

法、西两大国长期斗争，在军事上的主要焦点是意大利半岛，第一次是1494—1516年的法西战争，然后是持续到1559年的哈布

斯堡—瓦卢阿之争。³²从帝国的观点看，斗争集中在意大利，原因很清楚。北意城市国家在中世纪末是欧洲大陆上工商业经济活动最“先进”的中心。即使它们不再垄断长途贸易，它们积累的资本与经验依然雄厚，³³渴望建立世界帝国的国家亟需加以控制。在意大利分散的地图上，³⁴只有伦巴第发展了相对强大的国家机器，统治着一块中等规模的地区，³⁵但伦巴第过于弱小，政治上无法图存。³⁶

我们实际上讲的是个相当小的地区，“一个狭小的城市四边形，即威尼斯、米兰、热那亚、佛罗伦萨，它们彼此不和，互相纷争，每座城市都分量不等……。”³⁷这些城市国家的政治问题（亦如佛兰德）长期以来一直是“[摆脱]封建干涉，[同时避开]新的君主国施加的更新的进一步推行中央集权政治控制的威胁。”³⁸它们避免君主制的方法之一是与帝国联合。³⁹所以尽管吉诺·卢扎托描述过1530年至1539年意大利“半岛绝大部分落入西班牙直接或间接统治”下的情况，⁴⁰保罗·科尔斯同样说过：“16世纪上半叶国际历史的主题是法、西帝国主义争夺意大利，”⁴¹我们还是不清楚城市国家对这种“统治”形成的反抗达到何种程度。它们也许竟然以为这是它们的最佳选择。我们当记住这是一个世界经济体，经济活动的地点和关键性经济团体的“国籍”并不总是与政治决策的焦点相关。在这样一个格局中，城市国家与帝国的联合首先是“利害关系的结合。”⁴²于是比喻变成了现实。鲁思·派克指出，1503年至1530年之间，塞维利亚的热那亚人增加到最大程度，到16世纪的中期，他们大体控制了美洲贸易，对塞维利亚的经济生活发挥了强有力的影响。⁴³然而正如葡萄牙人对早先的热那亚来的人潮所做的那样，西班牙人也是通过吸收热那亚人进而使之解体：“加入国籍带来稳定和同化，这一策略在16世纪的西班牙只能导致热那亚的后裔抛弃商业。”⁴⁴

除了控制四个主要的意大利城市国家（威尼斯始终在其统治之外）中的三个以外，查理五世帝国还有其他两个经济支柱：南德意志的商人银行家（尤其是福格尔家族）和16世纪“上半叶”欧洲

世界经济体的大商业中心——安特卫普。

地处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南德意志的商业城市与意大利北部的那些商业城市,处境并无多大差异。例如,R.S. 洛佩斯写道:“15世纪,发展最迅速的地区是南德意志和瑞士。”⁴⁵从1460年至1500年左右或至1510年,银矿在中欧迅速增加,提供了经济力量的进一步源泉。⁴⁶16世纪的贸易扩张看来只是加强了德意志在北意大利和佛兰德斯之间的贸易通道作用。⁴⁷起初,大西洋贸易的增长和地中海贸易的相对衰落都未能影响他们的经济繁荣,尤其是他们一旦能够纳入哈布斯堡帝国之内分享到大西洋贸易的利益,⁴⁸就更不能影响他们了。

这是所有那些现代商业资本家中的佼佼者福格尔家族兴旺发达的时代。他们的力量达到顶点的查理五世时代,时常被称之为福格尔家族时代。福格尔家族替查理出钱买下了王位。⁴⁹他们是他的帝国的财政中心,是他最出色的私人银行家。同时代的编年史家克莱门斯·森德评论道:

雅各布·福格尔和他的侄子闻名四方;甚至在异教徒中也享有盛名。皇帝、国王、诸侯、贵族纷纷遣使逢迎,教皇誉之为自己的爱子,向他敞开自己的怀抱,红衣主教们在他面前起立。举世的商人都称他为开明之士,所有异教徒都因他而惊叹。他是全德意志的光荣。⁵⁰

福格尔家族与查理相互给与权力和互为靠山。但这也意味着他们兴衰与共。因为实际上福格尔家族的活动“局限于查理的帝国范围之内,只有帝国被看成国际性的帝国,福格尔家族的活动才具国际性……。”⁵¹当查理和他的继承人掏不出钱时,福格尔家族也就无钱可赚。到头来,17世纪中叶哈布斯堡帝国的未偿债务使福格尔家族蒙受的全部损失“高达800万莱茵盾。”⁵²

但是比北意大利或福格尔家族更重要的却是安特卫普。安特

卫普“在 16 世纪经济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⁵³ J. A. 范·霍提找出了 14 世纪的“民族”市场中心(主要对佛兰德斯而言)布鲁日与 16 世纪的“国际”市场中心(通过南德意志进行跨大陆贸易,将地中海贸易与波罗的海贸易连成一体)安特卫普之间的巨大差异。⁵⁴安特卫普不仅大大协调了哈布斯堡帝国的国际贸易,而且还是英、葡两国投入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关键。⁵⁵它首先是作为英国的贸易中心城镇。⁵⁶如果安特卫普能够起这种作用,尽管英意贸易经过哈布斯堡运输费可能便宜些,这恰恰是因为安特卫普给商人们多方面的优惠,只有帝国商业中心才有这样的优惠。⁵⁷

此外,安特卫普当时成为欧洲的超级货币市场,“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对短期贷款的要求日益增长,皇帝查理五世推行世界政策,更导致了这一结果……。”⁵⁸安特卫普不仅是帝国的保险交易所;城市本身作为一个集体还是查理的一个主要放债人。⁵⁹由于帝国没有坚实的税收基础,很难取得现代国家轻易便可搞到的贷款。16 世纪的帝国拥有的贷款几乎等同于它的君主拥有的贷款。⁶⁰故而他必须转向城市这个“公共财富的中心”⁶¹,以保证取得借款。但城市的贷款也有限,它们也得投靠某个大家族,例如福格尔,来作担保,朗查伊对此论述道:

城市信贷同君王的信贷和收款人的信贷一样,均很有限。正因为如此,一些金融家在借钱给政府之前,先得要求有偿付能力的商号,最好是大银行,出面担保。故而 1555 年商人们要求国家出具借款证书或福格尔“偿付”,有了这样的担保才借款 200 000 镑。匈牙利的玛丽亚请福格尔家族的代理商奥特尔批准并答应用税收(le produit des aides)给他作对应担保。⁶²

这样,查理五世、卡斯蒂利亚、安特卫普、福格尔家族一一列在用信贷和纸牌筑起的庞然大物上,利润的诱惑使人乐观,充满希望。

从16世纪30年代起，日益增长的跨大西洋贸易使安特卫普进入新的发展阶段。⁶³两个商业发展中心——以德意志南部商人为中心的跨大陆贸易和西班牙人（有热那亚人）的大西洋贸易——结合在一起，都汇聚在安特卫普市场上，而安特卫普也是货币市场，这种形势带来了“热火朝天的资本主义繁荣。”⁶⁴繁荣有其自身的动力，使哈布斯堡假想的世界帝国的政治行政机构充满了生气。然而，帝国正为惊人的财政负担所困扰，引起财政紧张的原因一方面是遍及全德意志的社会危机，另一方面是统辖欧洲其余部分的欲望带来的军事开支，其结果不是帝国走向破产就是资本主义力量破产。结果资本主义力量更强大。我们来考察一下帝国活动于其中的两种紧张局势。

在政治方面，1450年至1500年是德意志“各公国巩固”的时代，虽说这是个困难的任务，但部分获得了成功。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写道：“亲王们……把德意志从固有的无政府状态中解脱出来……。”⁶⁵然而这种巩固太不完全。当宗教改革运动和1525年的德意志农民战争一起打乱了新的繁荣时，不像其他国家这时所能做的那样，政治上的分裂使混乱无法控制。⁶⁶对德意志“民族”的失败有过各种各样的解释。拿破仑曾说这是查理五世自己想当新教领袖的失败。⁶⁷恩格斯详细论证道，这是路德和中产阶级对农民的革命愿望的畏惧。⁶⁸托尼指出了同英国的对比，英国农民（即自耕农 yeomen）在其他阶级中找到了重要的同盟者，并且受到足够的重视，“成为那些关心民族利益的政治家关注的对象。”⁶⁹

政治上自己拆台造成的社会危机，和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彻底屈服造成的后果并无太大区别，那么造成社会危机的原因何在？可能是由于同一原因：缺乏先期的政治统一，即缺乏哪怕是萌芽状态的国家机器。16世纪初的“德意志”是最好的例证，表明先于行政统一就存在，而不是在行政统一之内成长起来的德意志，其“民族主义”感情能够分裂到何等深的程度。查理五世由于专注帝国，无法领导德意志新教。德意志政治家不会以民族的利益考虑自耕农

的需求,而当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实现政治上的妥协。人们只好转向政治舞台以实现其目的。这就是那些公国,它们国土小,在经济上无足轻重,只好投靠外部恩主。结果是动荡与灾难。

关键性时刻看来是查理五世统治初年。A.J.P. 泰勒的论述颇为绘声绘色,但并非没有说服力:

查理五世初年,正值歌德的名言——机会一失,永不再来问世的时刻。造就民族的中产阶级德意志的时机于 1521 年丧失,也许是永远丧失,丧失几个世纪是确定无疑的。到 1525 年,民族觉醒的时期显然已消逝,从这时起,专制独裁日渐发展,一直持续了 250 多年。……⁷⁰

无论怎样,动荡以剧烈的形式继续下去,直到 1555 年的奥格斯堡和约,及其根据教随国定(*Cuius regio eius religio*)的原则分割德意志的决定时为止。即便在这时,动荡仍未结束。17 世纪初,德意志成为三十年战争的战场,人口和经济上都出现严重倒退。

不过德意志的社会动荡对查理五世来说只是一个问题,也许还算不上最大的问题。肯定不足以解释他的帝国的垮台。那么帝国分崩离析原因何在?为何它最终基本缩小到西班牙加上西属美洲?为何后来的西班牙失去了优势,变为欧洲半边缘的部分?皮埃尔·肖尼认为,西属美洲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西属美洲对于哈布斯堡帝国经济命脉乃至全欧洲的经济命脉的中心地位,并不是查理五世领有的诸国家瓜分德意志的结果,而是其原因。⁷¹ J.H. 埃利奥特和拉蒙·卡兰同样认为查理五世的欧洲帝国主义对于西班牙,特别是对于卡斯蒂利亚,经济上过分沉重。⁷² 的确,布罗代尔认为,由于物价暴涨,即使帝国已经缩小(包括西班牙、尼德兰,不包括中欧),它还是“过于庞大”,只要是价格引起巨大的通货膨胀,就无力维持财政收支。⁷³ 其理由看来是在通货膨胀大于帝国收入的价值时,尤其可能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政治上的过度扩张是一种财政

负担。⁷⁴16世纪需要的是中等大小的国家,而这时西班牙却是个帝国。官僚制度不充分,帝国的西班牙需要更加庞大的官僚系统,而它的资源、人力和财力却不敷此用。这是历史学家所说的西班牙官僚制度的“迟钝性”的根本原因。⁷⁵

世界经济体作为一种体制比世界帝国作为一种体制所具有的结构优势,又一次摆到我们面前。例如,H.G. 柯尼斯贝尔格论述西班牙无能力开发西西里殖民地,原因是缺乏政治理论。⁷⁶我觉得这是本末倒置。西班牙缺乏鼓励它在西西里建立贸易垄断的理论,从官僚制度上看,是因为它已经扩张得太露骨,无力妥善开发它的帝国。它的力量都用来在美洲维持一个帝国,以及在尼德兰进行战争和治理西班牙。要在美洲维持它的帝国,它必须投入日益发展的官僚制度,以控制西班牙殖民者和他们在印第安贵族中的同盟者。⁷⁷

西班牙帝国要是能成功呢?也许,除非它有另一种结构。正像柯尼斯贝尔格所说:“西班牙帝国的根本弱点是……税收基础狭窄。卡斯蒂利亚和白银给帝国提供资金并保卫着帝国;其他的领地都袖手旁观,程度大小不同而已。”⁷⁸费兰·索尔德维利亚用资料证实卡斯蒂利亚人如何特意将加泰罗尼亚人这样的“亲密”同伙排除出西班牙—美洲贸易。⁷⁹但是如果它是另一种结构,它也就不成其为帝国。而这正是我们的问题所在。假如加泰罗尼亚人和卡斯蒂利亚人并入一个国家(事实上他们不属一国),假如查理五世的帝国野心未将卡斯蒂利亚和他自己卷进与帝国其他部分必不可免的利害冲突(自我拆台式的冲突),⁸⁰那么西班牙确实可能有机会变为欧洲世界经济体的中心国家。相反,过分的扩张只能使查理五世和他的后继者民穷财尽。

1556年帝国分裂。查理五世退位。查理五世之子,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接受了尼德兰,但中欧的疆土形成了独立王国。1557年菲利普宣布破产。在西班牙—尼德兰内部,1559年菲利普迁往西班牙时,政治重心移回西班牙。随即爆发了尼德兰革命⁸¹,经过差不多80年的艰难反复,尼德兰终于划分为加尔文教派的独立的北方联

省共和国(或多或少等于今天的荷兰)和南方天主教的所谓西班牙尼德兰(多少等于今天的比利时)。但这次危机不光是西班牙的危机,或哈布斯堡帝国的危机。它是欧洲世界经济体发展的转折点。因为这次革命中决定性要素是1559年西班牙与法国签订的卡托—康布雷西和约。要理解该条约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先看看另一个渴望帝国统治的国家——法国。

没有哪个国家比法国更能说明“第一个”16世纪西欧国家的窘境。一方面,可能没有哪个欧洲国家走出中世纪时有相对更强大的君主制。⁸²我们在前一章已回顾了布洛赫对法、英、东欧在16世纪时土地占有权制度方面的差异所作的解释,这种差异的基础是中世纪末期各国司法机构的动力各不相同。我们看到,英国制度为满足14世纪至16世纪地主的新需求,允许对土地所有权在法律上重新定义,而在法国这些定义却是不许改动的。因此贵族为保持其优势,必须在政治上更富于斗争性。布洛赫正确指出了16世纪法国“领主司法的腐朽”。⁸³同样,拉什顿·库尔班也正确地指出,贵族的政治力量所导引的那种经济结构在新的世界经济体中难以得到施展。⁸⁴

法国世袭贵族和新兴商业贵族不像英国那样地相对合并,这种情况造成了多种后果。我们先集中看一下它对世界体系中国家政策的影响。爱德华·米勒指出,贸易利益的政治力量在英国比在法国大。法国贸易政策在中世纪晚期更加开放。⁸⁵最终结果是,尽管法国有着更强大的官僚制度,它在16世纪初取得的“经济领导力量”却比英国少。⁸⁶处于这种形势下,财政上的压力推动法国君主去实现帝国抱负,尤其因为哈布斯堡家族也有这种野心。他们本应像西班牙一样推行海外扩张,但他们缺乏国际资本的支持,国际资本就是北意大利资本。⁸⁷代替海外扩张的是欧洲大陆内的帝国扩张,矛头直指北意大利。

法国有能竞争的财政贸易国际网,中心在里昂。在中世纪盛期,香槟市集一时成为北意大利和佛兰德斯商人的大汇集点。香槟市

集也是国际金融中心。后来到了13世纪末、14世纪初,香槟市集走向衰落。⁸⁸到15世纪,法国君主细心扶植里昂的发展,⁸⁹鼓励里昂与当时的大银行家佛罗伦斯⁹⁰联系。⁹¹16世纪初的里昂和安特卫普汇集了大量资本,“把单个金融家的势力降低到极限,从而能以适中的比率聚起大宗资本。……”⁹²里昂之所以不是安特卫普那样的国际中心,是因为法国国王同时竭力使之成为“他们自己的财政宝库。”⁹³作为商业中心,里昂也从未与安特卫普相匹敌。总之,里昂稍次于安特卫普,居一流商业中心的第二位。

不过,法国曾试图领先。哈布斯堡与瓦卢阿一起失败垮台了。1557年不光西班牙而且法国也宣布破产。但哈布斯堡首先宣布破产,仿佛即使在失败上也得强调哈布斯堡领先。双方的财政崩溃使战争骤然结束,1559年签订卡托—康布雷西和约,这个条约将改变一百年来欧洲的政治关系。哈布斯堡和瓦卢阿的破产不止是一次财政上的调整。而是整个世界都行将倒台了。

垮台的不仅仅是个别国家结构。不止是查理五世在他的骑士们的泪水中悲戚的退位。垮台的乃是世界经济体。一百年来,欧洲一直享受着新的繁荣。人们曾试图用旧方式获利。但是技术的进步和资本主义成分的增长已经走得太远,已不可能再建立一些能与经济舞台相匹配的政治帝国了。可以说,1557年标志着那种尝试的失败,这一年也标志着欧洲的均势的确立,那些旨在成为民族国家的国家将兴盛起来,靠更加繁荣的世界经济体而壮大。

危机是象征性的转折点。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所指出的,“第一个”16世纪的许多组织上的特征直到很晚才消失:1576年西班牙当局在尼德兰垮台,或1588年无敌舰队战败,或1598年韦尔万条约(和南特敕令)。这是最适宜的日期是勿容争议的,因为要突出的结构因素的移动极其缓慢,从而在组织方面总是逐渐转变的。

但是转变已经存在,我们应探讨一下它对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影响。我们先看R.H. 托尼对“第一个”16世纪的组织转移的论述:

在经济组织上，国际贸易机器已达到的效率并不明显次于后来三个世纪。在西班牙与尼德兰之间的斗争和法国的宗教战争毁灭那个时代最高度组织的经济体系之前，也许有 10 家至 12 家商号，他们的货币市场是支配欧洲贸易的金融权威商号，他们的意见和政策对决定财政条件举足轻重。在金融组织已发展到顶点，英国亦以之为师的佛兰德斯、法国、意大利的城市中，16 世纪金融组织的实质是：国际主义，每个资本家充分开展各种交易的自由，所有主要市场具有以互相同情为特征的统一，以及国际金融战略点上巨大资源的动员。金融组织的中心和象征是安特卫普交易所和交易所上意义深远的题词：“Ad usum mercatorum cujusque gentis ac linguae(这里的商人们讲各种语言)”。在安特卫普交易所，圭奇亚迪尼说道，可以听到世界上各种语言，用威尼斯人的话说，“里昂市集是整个意大利和大部分西班牙与尼德兰的金钱交易的基础。”⁹⁴

托尼说这种体系的垮台是由于毁灭性的战争。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因果关系过于直接。我们在上一章提出，16 世纪经济推进受到结构上的局限，那就是生产水平相当低下，官僚机构薄弱，却要应付分散的中型企业为基础的日益扩展的经济，16 世纪欧洲的这种经济冲击力是使帝国体制无法生存下去的有效原因。

一个至关紧要的难题是帝国国家机器财政需求日益增长，公共信贷随之膨胀，导至 16 世纪中期帝国破产。查理五世把那不勒斯、西西里、米兰、安特卫普、卡斯蒂利亚等⁹⁵各国和各国商人的资财挥霍殆尽。亨利·豪泽出色地阐明了上述观点，认为 1559 年的欧洲财政危机“可能阻碍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经济地理的改造。”⁹⁶豪泽认为，1557 年爆发的法西战争使国家信贷耗尽，出现亏空，迫使法、西两国急于在 1559 年缔结卡托—康布雷西和约。

地域广大的哈布斯堡帝国垮台的后果是巨大的。它直接导致了西班牙衰落的开始。⁹⁷危机导致安特卫普和英国最终破裂，使得

英国可以自由地发展同阿姆斯特丹的新的胜利的经济联盟。⁹⁸安特卫普基于西班牙轴心之上的繁荣宣告终结。”1557年菲利普二世的破产招致了最终决定安特卫普命运的决裂。⁹⁹

整个佛兰德斯因危机而使加尔文教派势力增强，尤其在技术工人中是这样。1567年西班牙人派遣阿尔瓦公爵镇压新的社会政治动乱，但从长远看，这只不过造成加尔文教派商人和手工匠迁徙到新教各国去，¹⁰⁰到1585年，佛兰德斯的工商业衰败，“多年停滞不前。”¹⁰¹尼德兰起义与因这场灾难引发的社会政治动乱相结合，在低地国家北半部建立了一个有生气的政治基地，从16世纪后期开始发挥世界商业中心的作用。¹⁰²

南德意志也受到沉重打击。卢扎托指出，“最严厉的打击首先是西班牙王国政府无力偿付债务，其次是政府宣布破产，不仅福格尔家族而且南德意志大部分大商人银行家的私人财产全都被一扫而光。”¹⁰³随着经济形势恶化，南德意志和北意大利这两个原先的商业联盟国家开始互相侵犯领土，抢夺买卖，双方均深受其害。¹⁰⁴

这次崩溃对德意志国家的政治后果是巨大的。巴勒克拉夫所说的“针对帝国衰落进行的新教的革命骚动，带有强烈的民族特征”¹⁰⁵，席卷了德意志。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查理五世卷进他的帝国纷争说明他既不能把他的政治命运投入德国的统一上，也不能采取西班牙民族主义者的观点。“教随国定”的妥协造成德意志诸侯割据，使德意志资产阶级遭到破坏，把德国统一的全部希望推迟了几个世纪。德意志将大致分裂为两部分：路德派的北部和东北部（东北部经济上起码也是东欧边缘部分），与更富庶的天主教西南部（包括莱茵国家若干部分）。正如A.J.P. 托尼所说：“德意志这两个部分的发展都从文艺复兴时期整个德意志兴旺繁荣的日子倒退下来。……”¹⁰⁶甚至在比较富庶的西南部，17世纪也出现了向手工业的倒退。¹⁰⁷泰勒也许夸大了16世纪初德意志的繁荣和经济领导地位，但是他注意到新生的经济发展引人注目地崩溃，无疑是正确的。¹⁰⁸

查理五世在政治上统治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努力给西班牙、德意志诸国、佛兰德斯和北意大利各城市,以及命运与帝国连结在一起的各商号,都带来了消极后果。建立帝国似乎是合理之举,甚至是一件可能的事。但实际上却不然。

我们已经讲了大部分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事业史。这里只需略述西班牙帝国内部的局势,以便了解西班牙的衰落对美洲的影响。西班牙在加勒比海和加勒比海沿海地区(今天的墨西哥、危地马拉和哥伦比亚)以及秘鲁和智利建立了殖民地。这些殖民地不仅被看作是整个欧洲的经济补充,而且特别是西班牙的经济补充。¹⁰⁹西班牙没有行政能力在美洲建立大规模官僚机构。因此他们就使用帝国历来的权宜之计,选用当地头目进入政治体系,充当王国政府与西班牙殖民者之间的中介人。¹¹⁰

西班牙也没有能力完全控制西班牙自己的殖民者。为使他们在政治上保持效忠,西班牙作了许多经济让步。其中之一是禁止印第安人拥有独立的经济基础,不准他们饲养牲畜,因为印第安人可藉此在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展开有力竞争。¹¹¹此外,印第安人不仅不得从事饲养牲畜这种可获利的活动,而且饲养业成功在经济上反而削弱了他们,因为在中美洲同在英国一样,都是羊吃人。¹¹²然而西班牙殖民者依赖西班牙不断的支持,与其说是为了反对印第安人和非洲奴隶的叛乱,不如说是为了反对英国和别国侵犯他们的贸易,从而损及他们的利润率。¹¹³因此尽管有时他们对王国政府及其官僚机构感到不快,他们并未组织成为一种自治力量。加之殖民者们多出身寒微,殖民地出口型经济使他们有利可图。¹¹⁴

的确就像常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在帝国结构内成长出次帝国主义,一层套一层。我们可以谈谈墨西哥(即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对秘鲁“殖民化”的方式。整个16、17世纪都存在价格水平持续不断的悬殊。墨西哥向秘鲁出口制品、奢侈品和奴隶,换取硬币和水银。¹¹⁵当菲律宾进入西班牙贸易领域时,墨西哥的西班牙人便成为马尼拉与利马之间的中间人,取代了西班牙籍的马尼拉人。¹¹⁶中国

货物经过马尼拉再从墨西哥向秘鲁再出口，成为殖民地间贸易的主要依靠。¹¹⁷ 西班牙王国政府竭力破除墨西哥的中间人作用，因为它侵犯卡斯蒂利亚的利润，但未成功。¹¹⁸ 肖尼说道：“毫无疑问，墨西哥 16 世纪对于秘鲁的所作所为就像宗主国对殖民地一样。”¹¹⁹

16 世纪“下半叶”在欧洲的政治上过度扩张和经济收缩产生的后果之一是，日益增多的西班牙人移居美洲。¹²⁰ 它为需要工作的西班牙人提供了工作机会，为西班牙国家提供了直接收入来源，因为美洲殖民地官僚机构的职务均标价出售。¹²¹ 另一方面，在美洲依靠土地维生的西班牙人人口增加，他们面临经济收缩的形势，加之早期西班牙统治下印第安人人口锐减，在西属美洲造成一个“萧条世纪”，¹²² 结果逐渐产生了以劳役偿债为基础的大庄园制。¹²³ 但是大庄园的对象是比大种植园要小的经济世界，¹²⁴ 属于相对自给自足的殖民者上层人物。¹²⁵ 西班牙发现，正在发展中的制度带来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少，而政治困难越来越多。当西班牙继续承担着它的帝国的种种政治代价时，后来其他欧洲国家却将轻易地获得西属美洲的经济利益。¹²⁶

这样一来，在 1557 年以后的时代，西班牙不仅丢掉了帝国的中欧部分，而且在长期斗争之后，丧失了北部尼德兰。西班牙正在失去它剩余的殖民地的某些利益。此外，美洲已经成为西班牙岁收的重要来源，多达其总收入的 10%，这一事实促使西班牙放慢扩张进程，以便巩固已经取得的果实。¹²⁷ 但是放慢速度的结果并不只是暂时放慢而已。

西班牙的衰败是近代欧洲历史编纂学的一大课题。用我们的话说，西班牙衰败的原因似乎是没有建立（也许因为它不能建立）能使西班牙统治阶级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创立中获利的那种国家机器，尽管 16 世纪西班牙在这个世界经济体中居于中心的地理经济位置。这表明“中心”地区不必是那些不论就地理方面还是就贸易活动方面而言都位于最“中心”的地区。

西班牙在进入 16 世纪时即已为某些经济结构中潜在的缺陷

所苦。首先，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流动的牧羊人相对有组织的力量对自耕农的兴起是个重要的障碍，因为他们能够保持特权，反对圈占可耕地。在英国，养羊勿需移动，更适宜圈地制度，由此慢慢出现了登录产业持有权。¹²⁸其次，缺少重要工业部门，已有的工业部门(卡斯蒂利亚的呢绒和丝绸业)也在1590年的危机中垮台。¹²⁹维桑有点莫名其妙地把这归因于“卡斯蒂利亚未能理解资本主义世界。”¹³⁰无论如何，他对危机后发生情况的实证性描述依旧表明，支出方式至少代表了一个衰落的插入变量：

恰恰是那些真正有钱的人（贵族、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的豪绅，以及退休的政府官员）把钱用到建筑（教堂、宫殿、修道院）上，使钱丧失活力，或用到艺术品上，使钱神圣化。但却没有一个人倾心于工业，或单纯经商。¹³¹

投资方式上同样的转移影响了极为适应新资本主义经济的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布罗代尔注意到他们逐渐从商业转移到投资于可耕地。“这难道不是巴塞罗那经济戏剧的一个方面吗？巴塞罗那资产阶级开始把钱放在土地上，而不再放到海上事业中去冒险。”¹³²这岂不令人深思：在欧洲最重要的帝国中心，此时此刻资产阶级是如何正从海外投资转向粮食种植，而不去建设资产阶级的工业基础？¹³³还有另一个难解的问题。很多作家都作出与维拉尔相似的论断：“使西班牙获得寄生性富裕的金银流入了那些购买力最强的国家。”¹³⁴或者用维桑的话说：“千真万确，卡斯蒂利亚在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斗争的关键时刻，的确依赖来自美洲的贵金属的注入。”¹³⁵

这里的一个因素确实是外国人继续起着关键性的金融作用：包括热那亚人、荷兰人、葡萄牙的犹太人、法国人。¹³⁶另一个因素是查理五世不愿采取西班牙民族主义的观点，执行重商主义政策，¹³⁷而是听凭卡斯蒂利亚资产阶级被物价飞涨的影响、贵族的穷奢极欲和皇帝借钱产生的通货膨胀与反保护主义所压垮，¹³⁸这一切都

与西班牙介入泛欧的哈布斯堡帝国息息相关。上述两因素的结果，非西班牙金融利益在西班牙内部的巨大作用与西班牙政府不愿（或不能）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造成了西班牙经济角色的倒置。¹³⁹

西班牙不是顶着外国商人干，而是走上驱逐西班牙非天主教徒的自我毁灭之路。西班牙在欧洲是反新教的首领，在地中海是反伊斯兰教的首领，一旦在 1588 年无敌舰队战败，¹⁴⁰它的这种国际地位就循着国际政策的内在逻辑结论走下去。1492 年驱逐犹太人，1502 年和 1525 年驱逐摩尔人，整个 16 世纪都在迫害被迫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和“伊拉斯漠派”，1609 年西班牙驱逐了最后一个假的宗教少数派即所谓的皈依西班牙的摩尔人。¹⁴¹他们共有 300 000 人，多为农业工人，多少不等地分布在巴伦西亚和安达卢西亚。¹⁴²驱逐西班牙的摩尔人使西班牙国内社会结构分裂。事件的发生部分是由于 17 世纪头 10 年经济上的挫折，¹⁴³部分是由于西班牙日益衰落的国际地位。¹⁴⁴这是西班牙资产阶级分子针对拥有大地产的土地贵族采取的行动，是打碎这个与资本主义发展不一致的阶级的统治的最后努力。¹⁴⁵但是贵族却拯救了自己，他们拒绝偿付欠资产阶级的贷款，为损失的收入找到了补偿，对此国家给予了支持。¹⁴⁶皮埃尔·维拉尔总结这一后果说道：“事情不仅没有损害封建经济，反倒使他们的债权人，即富裕的自耕农（*la boueurs riches*）和资产者，自食其果。”¹⁴⁷最后结果是双重的。一方面，“驱逐西班牙的摩尔人使伊比利亚半岛的发展失去平衡达一个多世纪。卡斯蒂利亚解决以后，它严重损害了巴伦西亚和阿拉贡。”¹⁴⁸另一方面，它使经济困难更加严重¹⁴⁹，迫使西班牙老是去寻找它衰落的更短命的替罪羊。¹⁵⁰

与此同时，政府发现国外债务空前增多，靠赖债方可弥补预算危机（1557 年，1575 年，1596 年，1607 年，1627 年，1647 年），终于政府“不能筹集更多的钱，因而不能继续斗争了。”¹⁵¹在国内，查理五世耗资惊人的外交方针和他依赖贷款为外交方针筹资造成的后果，据 J.H. 埃利奥特的看法，不仅确立了“外国银行家对国家财源

的统治”，而且确保“在卡斯蒂利亚内部由那些最无能力承担重负的阶级承受主要压力。”¹⁵²早在1600年，一位名叫马丁·冈萨雷斯·德·塞罗利哥的律师—神学家就发现了西班牙所处的窘境：“因此情况是这样，如果说西班牙没有黄金或银块，那就是因为它拥有它们；西班牙贫穷的原因是它的富有。”¹⁵³

西班牙日益增长的经济困难加上不能够建立强大的国家机器，引来盗匪四处流窜而国家难于应付。¹⁵⁴官僚机构的“迟缓”日甚一日，而不见好转，因为正是重重困难造成机构僵化，使西班牙国王们得以代代因循，没有丝毫变化与改革。¹⁵⁵尽管国家收入下降，国家依旧维持着，甚至可能还增长了寄生宫廷官僚高水平的奢侈开支。

最严重的打击也许还是人口（人口问题如前所说是一种插入变量）。如果16世纪“前期”西班牙人口（或者至少卡斯蒂利亚人口）众多并在增长，¹⁵⁶16世纪“中期”情况就不再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移民美洲、战争死亡、1599年至1600年安达卢西亚和卡斯蒂利亚的饥荒与瘟疫，以及我们已看到的1609年对西班牙的摩尔人的驱逐。这倒不是说西班牙比欧洲其他国家缺少企业精神。¹⁵⁷情况是由于我们已提出的种种原因，国家机器没有充分而合适地建立，因而“逆境显得太强大”（埃利奥特语），¹⁵⁸西班牙“对长期的收缩现象……表现过敏”（肖尼语）。¹⁵⁹无论如何，西班牙都没有成为欧洲首强。相反，它注定成为第一个半边缘国家，继而成为边缘国家，直到20世纪，它才慢慢努力开始回升。衰落下去的不光是西班牙。那些在西班牙上升时期与它有联系的所有欧洲地区，北意大利、南德意志、安特卫普、克拉科夫、葡萄牙，都和它一起衰落下去。除了葡萄牙，这些基本都是为哈布斯堡（和西班牙）帝国和整个世界经济体服务的城市国家。它们的繁荣随“第二个”16世纪世界经济体的改组而消失。

新体系将是此后一直居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它的中心国家将处在不断的经济和军事紧张状态中，互相为夺取

剥削(和削弱)边缘地区(的国家机器)的特权展开竞争,中心国家将会容许某种统一体发挥半边缘强国的特定媒介作用。

从哈布斯堡和瓦卢阿诸帝国的经济灾难中,中心国家吸取了有益的财政教训。它们决心不再陷入无法控制的财政混乱。首先,它们设法建立一种进口控制,以便维持有利的贸易平衡,这种想法当时很流行。¹⁶⁰但这些国家担心的不只是贸易平衡,它们还担心国民生产总值,尽管它们不这样称呼,担心国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以及如何加以控制。其结果,到“第二个”16世纪时期,正如卡尔·弗里德里希指出的,“国家本身变成了信贷源泉,取代了一向出借资金的金融家。”¹⁶¹

于是开始了转向国内的时期。总的说来,以后的时期也许可以象 R. B. 沃纳姆所认为的是“欧洲现代史上一个最野蛮、最偏执的时期,”¹⁶²但冲突起先在国内而不在国家之间。国家之间暂时相对平静,因为各国都很疲惫——这是一种“火光闪烁、爆炸性的共处。”¹⁶³

国家政治转向国内——即中央集权下的国家统制,因为它不一定是民族主义——这种转向与经济发 展的性质密切相关。首先回忆一下各国人口比较情况是很重要的。1600年法国人口约1600万,为欧洲之最,尽管德意志各邦国加在一起也有2000万。西班牙和葡萄牙(1580年以后联合)近1000万,英格兰和威尔士450万。人口密度殊异。传统工商业城市国家地区居首位:意大利每平方英里114人,低地国家每平方英里104人,法国每平方英里88人,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平方英里78人。西班牙(和葡萄牙)每平方英里仅有44人。¹⁶⁴

人口绝对数字和密度意义并不明确。数字说明战争与工业力量,也说明统治的人数和养活的人口。最理想的规模完全不清楚,我们前面的讨论已经表明这点。至于“第二个”16世纪,弗兰克·C. 斯普纳对人口扩张的经济效益持怀疑态度。他谈到“报酬递减”问题。¹⁶⁵卡托—康布雷西和约以后,“西欧经济活动起先得到一段

较长的舒适的恢复时期。”¹⁶⁶ 这是银价上涨要挤垮德意志矿业、黄金抬价、欧洲经济受到刺激的时期。¹⁶⁷ 银价上涨的一个后果，正如托尼所观察到的，“到 16 世纪下半叶，农业、工业和外贸大部分都依赖信用贷款。”¹⁶⁸ 第二个后果是，经济重心明确从中欧移到新的大西洋贸易，移到西欧。斯普纳谈到卡托—康布雷西条约“并不是作为未来之开端的时期的终结，”他又说道，“未来的道路在于……横跨大西洋和世界七个海洋。”¹⁶⁹

但从经济上看，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并不在大西洋，而在北方。阿斯特里德·弗里斯认为，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更确切地说，“是尼德兰、英格兰海上贸易的异常扩张，同时波罗的海的货物，特别是粮食，向欧洲其他地区出口迅速增加。”¹⁷⁰ 按照她的观点，金银危机、信贷与财政危机并不是经济（和政治）变革的动力，而是其结果。¹⁷¹ 在这种情况下，她认为，货币市场紧张的直接原因正是缺乏粮食。¹⁷² 形势发展的结果之一是阿姆斯特丹地位大大增加，在当时已成为波罗的海粮食市场的枢纽，所以比安特卫普和南方各省其他城市有着更大的偿付能力。

这样我们的目光就从塞维利亚转到阿姆斯特丹。“第二个” 16 世纪的历史是阿姆斯特丹接续正在瓦解的哈布斯堡帝国，为世界经济稳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历史，英国和法国从此开始成为强国，终于有了强大的“国民经济”。

上述发展大部分是欧洲世界经济体第一个扩张阶段在这个时期正接近结束的结果。这是“大潮开始退落的时刻，好像它的掀起缺少必要的冲击力去克服它自己竖立的障碍和阻力。”¹⁷³ 现在我们将回过来看人口与金融的传统中心，低地国家和北意大利的反应。然后在下一章我们将探讨英国不只是作为欧洲第三政治强国（与法国和西班牙并列）而且作为工业发展最快的国家的出现，探讨法国在从帝国导向转向国家编制导向中，如何竭尽全力获取组织转变带来的全部利益。

低地国家这个时期的重要性如何？吕西安·费费尔在给肖尼

关于大西洋贸易的大作写的序言中提出——不对，是断言——**尼德兰的往来贸易相形见绌：**

从高处审视的经济史观点和从宏观审视的世界文化史观点来看，沿海贸易与美洲至欧洲的贸易有什么共同点呢？沿海贸易经营大宗实用但并不贵重的货物，从北方运往南方，再从南方运往北方……沿海粮食贸易，以货易货，有节制的购买，短距离运输，这是沿海贸易的基础；美洲至欧洲的贸易输入的却是空前数量的在这之前不为人知的贵金属，它振兴了经济和政治，复兴了欧洲列强的“宏伟政策”，从而促进和加快了规模无法估量的社会大变动：商人和金融资产阶级富裕起来，上升到王公贵族的地位，福格尔家族和许许多多其他的人就是这样；像寄生虫一样靠剥削财富创造者才能维持自己地位和荣耀的贵族一天天腐朽衰败；哈布斯堡在欧洲长期称霸，控制了海外的白银和黄金：与这许许多多大事相比较，地方贸易（*trafic casanier*），海湾的便餐式的贸易和那些驳船，在雾气蒙蒙的天空下小心翼翼地拖载着那些肥胖的肚子，又有什么重要性呢？¹⁷⁴

到底有什么重要性？这正是问题之所在。即使费弗尔的史实全都正确——看来有理由认为他严重低估了北方贸易¹⁷⁵——我们在接受费弗尔文锋逼人的华丽词句之前，也当有所顾忌。因为这便餐式的地方贸易给新兴工业运来了原料，给市民运来了食品。¹⁷⁶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它奠定并规划了新的欧洲劳动分工。贵金属毕竟要用来购买实用货物，我们还看到，贵金属除了过一下分类帐外，对西班牙并没起太大作用。

这并不光是环绕低地国家的贸易的经济中心地位问题，还是经营世界经济的财政商业中心所需要的各种新技术的专业化问题。正是这些技术的要求使荷兰人在我们从“第一个”16世纪走向

“第二个”时，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对世界香料贸易的控制。¹⁷⁷

低地国家对于欧洲内部贸易的重要性当然不是什么新问题。正如 S.T. 宾多夫提醒我们的，“从 11 世纪到 17 世纪，尼德兰……一直是欧洲贸易枢纽之一……。”¹⁷⁸ 我们注意到“第一个”16 世纪安特卫普的关键性作用。¹⁷⁹ 1559 年安特卫普衰落，¹⁸⁰ 值得注意的重要事情是后继者一点也不显著。据我们所知，阿姆斯特丹插了进来，但劳伦斯·斯通认为这个事件如从一方面看，既是荷兰的成功也是英国的失败，这一失败将“推迟”英国在世界体系中赢得优势。¹⁸¹

阿姆斯特丹的成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很重要的。但是使这一成功成为可能的政治结构是什么呢？16 世纪最后 50 年不仅标志了阿姆斯特丹的崛起，而且还标志了所谓的尼德兰革命，尼德兰革命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界限同它的社会内容一样难以讲清（或不如说众说纷纭）。

首先看一下，它是不是一场革命？如果是革命，那它究竟是民族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两种革命又有何区别？我现在不想就革命的概念高谈阔论。我们还不准备按照本书的逻辑去论述那个问题。我只是想在这里点明，据我看这个问题，就尼德兰“革命”而言同现代其他任何一场伟大“革命”一样含糊（肯定一样不清楚）。

有关的史学论著在解释上有一个极其巨大的学派分歧。有些人认为尼德兰革命基本上是“荷兰”民族的革命——就是说，是北部尼德兰人加尔文教派反对由“比利时”（南部尼德兰）天主教徒支持和煽动的西班牙王国政府，争取独立自由的革命。另一些人认为它基本上是受到所有教派支持的全尼德兰（“勃艮第”）民族的造反，它的胜利只解放了半个民族。J.W. 斯密特对这段史学加以概括，用下面的精辟论述作结语：

这些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即除非我们不把造反作为集团来对待，除非我们懂得当时有代表各种各样社会、经济和思想派别的利益的大量的造反，它们有时并列进行，有时

相互冲突,而另外一些时候则汇合成为一场运动。¹⁸²

从正在发展的世界体系的观点出发,我们必须问为什么正是尼德兰而且唯独在尼德兰,“第二个”16世纪爆发了一场复杂的民族—社会革命,而这个时期在其他国家(除法国外,这点最为重要)社会秩序相当平静,以及这场造反是怎样取得主要的成功的。¹⁸³

查理五世时代,尼德兰国内政治同欧洲其他国家的政治没有明显的不同。贵族对国王抱有一种矛盾心理,他们既害怕国王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力量,又把国王视为反对资产阶级和民众造反的贵族利益的保护人,为国王服务是“幼子们”或贫困贵族的财政出路,贵族终究站在国王一边。¹⁸⁴接着,突然形势一变,“繁荣城镇里灰心丧气的有钱资产者与失去社会地位的走投无路的手工艺人,以及家道兴盛或衰落的贵族汇合到一起,并且地方上的骚乱汇成了一场普遍的革命。”¹⁸⁵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认为革命爆发的关键不在手工艺人和城市工人的社会不满,也不在资产阶级,尽管资产阶级无疑是革命的大受益者,革命爆发的关键在于“尼德兰”贵族的大部分突然害怕国王不是他们的代理人,害怕国王的政策在短期和中期内将严重威胁贵族利益,担心他们在政治上没有说服国王改变其政策的可能,因为国王的政治舞台(西班牙帝国)比一个他们如能确立并加以控制的政治舞台要大得多。¹⁸⁶总之,他们持有一种“民族主义”反对派的观点。¹⁸⁷

让我们看一些证据吧。这里的贵族像其他国家一样负债累累。而且皇帝一步步侵犯他们的现行收入来源。¹⁸⁸菲利普二世登基的时候,突然发现人们反抗他的资金筹措。¹⁸⁹查理五世末年多灾多难——皇帝的财政需求巨大,而贵族由于价格飞涨而实际收入下降。卡托—康布雷西和约造成的破产和经济困难,使形势突然恶化。¹⁹⁰

以后除经济上的难题外,菲利普二世于1559年由罗马授权建立新主教辖区。此举旨在使政治、语言区划合理化,增加主教辖区

数量,要求主教技术上熟练(就是说,他们应是神学家而不是大贵族子弟)。此外还添上一条,计划要求从某些历史上一直财政独立的修道院的收入中,提取资金授予新主教辖区,新主教在各种政治会议中取代男修道院长。毫无疑问的是,正如彼得·盖尔扼要指出的,这表明菲利普是个“勤奋的”国家缔造者。¹⁹¹可是,“正当他的设计受到四面八方的不信任时,这样一个旨在加强国王权力的计划遭到强烈的反对,也是不足为奇的。”¹⁹²

在另一方向,贵族力图把国务会议改造成一个“清一色贵族的执行机构。”¹⁹³菲利普拒绝了,但作为妥协,他撤回西班牙军队,给他的尼德兰的政府只留下由地方贵族和城市中心提供的军队维持秩序。如果在这幅画面上再加上60年代经济衰退带来的下层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普遍不满,¹⁹⁴以及近40年来教会在攻击下的普遍虚弱,那么一场起义就成为可能了:

宗教上冷淡的下层民众攻打代表压迫的可憎象征的监狱,解放了新教徒。宽容变成了普遍的口号,连同召开自由的三级会议的要求一起,成了反对党政治纲领的核心。这些口号在一段时间内一度成为全国或联省范围完美概括的信条;它们是些简单的原则,而且首先是社会中立的。¹⁹⁵

我们绝不能忘记这是在卡托—康布雷西和约签订之后不久,和约批准特伦特宗教会议重新召开,于是反宗教改革开始制度化。¹⁹⁶从此以后,天主教与西班牙王国政府比以前更紧密地融为一体。

这场“革命”经历了几个阶段:首次起义(在南方和北方)及其被镇压(1566—1572);第二次起义(1572—1576),这次是在北方,只包括荷兰和泽兰(更大程度上的新教起义),并以根特和约告终;南方佛兰德斯的激烈起义(1577—1579);从1579年起,国家分裂为两半(北方联省共和国、南方效忠西班牙政府);1598年试图统一;1609年缔结永久性停战协定。

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起初无一定目的的多方面的冲突逐渐明朗化，成为新教徒或不如说“新教化”的北方争取北方的民族独立的斗争，以争取建立符合商业资产阶级需要的政治制度，这个商业资产阶级的力量经过这场斗争以及在17世纪中终于在世界范围增长起来。斗争一旦爆发，由于“帝国的失败”，尤其是由于新的欧洲均势将出现，西班牙已不可能加以阻止。¹⁹⁷的确，西班牙的严峻局势显而易见，实际上1557年至1648年间西班牙—尼德兰关系的每次重大转折之前，都紧连着西班牙的财政危机。¹⁹⁸

虽然尼德兰革命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它却一开始就包含宗教成分。贵族在开始时企图垄断与国王争论的形式与性质，加尔文派民众则打破被动局面，掀起席卷全国南北的名为破坏圣像运动的狂潮。盖尔描述政府当局“吓得目瞪口呆”，连加尔文派领导人也显得“吃惊和狼狈。”¹⁹⁹正是宗教给尼德兰革命加上了思想感情色彩，使得1. 斯赫费尔将破坏圣像与攻克巴士底狱和1917年3月的彼得堡街头骚乱相比。²⁰⁰

虽然这个阶段很快过去，但加尔文派作为革命政党和被H.G. 柯尼斯贝尔格比作16世纪的雅各宾派的力量说明，²⁰¹当其他人都半途而废的时候，他们仍有力量坚持运用“恐怖”政策，²⁰²“在战略性时刻能够动员下层民众。”²⁰³当政府按根特和约试图以宗教划分来解决冲突时，他们仅仅保住了荷兰和泽兰的宗教改革派，加强了政治和宗教事业的统一，²⁰⁴终于使新教控制的地区“新教化”。1579年国家的分裂巩固了双方的地位，从而出现长时期的宗教两极分化。²⁰⁵行政上的现行分割线乃是军事地理因素的结果。南部尼德兰地势开阔，西班牙骑兵适于驰骋。北方则水道遍布，种种障碍不适于骑兵运动。总之，这里是游击队用武之地。²⁰⁶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方的人变为新教徒，南方的人变为天主教徒。

可见事情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新教特别适应社会变革——适应民族主义，也适应资本主义。相反，正如刘易斯·纳米尔爵士所说，“宗教是16世纪民族主义的代名词。”²⁰⁷新教对统一尼

德兰北方起了作用。我们在前一章注意到天主教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与波兰民族感情联系在一起。而且在爱尔兰,天主教也起了同样作用。²⁰⁸凡是宗教没有与民族事业牢固连接在一起的地方,它就无法存在下去,法国的加尔文教派便是例证。²⁰⁹

形势的发展是,在利益冲突的漩涡中,新的组织性结构只有通过奇怪的不稳固的联盟才能建立。人们竭力确保这些联盟。H.G.柯尼斯贝尔格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宗教是一种结合力,它把不同阶级的不同利益结合在一起,为它们提供组织和宣传机器,这种组织和宣传机器能够建立近代欧洲史第一个真正的民族的与国际的政党;因为这些政党的构成从未能超出各个阶级中的少数分子。此外,他们正是通过宗教才能向最下层阶级和下层民众发出号召,叫他们在野蛮屠杀和疯狂劫掠中为他们遭受的贫困与失业带来的绝望发泄忿恨。对社会和经济的不满情绪,是双方招收新成员的肥沃土壤,民众性民主暴政在加尔文教派的根特和天主教的巴黎都曾出现。²¹⁰

即使宗教这时成为一种民族粘合剂,它并不能向我们表明后来产生的国家结构的社会内容。J.W.斯米特认为,尼德兰革命尽管意义不明确,基本上是一场促使资产阶级上台掌权的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的分割与后来产生的国家边界则是衡量资产阶级在自己敌人面前有多少力量的尺度。²¹¹

贵族固然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尤其在开始阶段参加了革命,但他们被重新抬头的社会激进主义潜流所吓倒,脱离了民族主义事业。²¹²但是即使激进社会运动在经济扩张和衰退中产生的城市流氓无产阶级中有充分基础,就像1577—1579年让·范·赫姆比泽暂时控制根特所表明的那样,²¹³他们还是迅速遭到孤立,自己毁灭了自己,因为他们无视民族这个主题,反过来反对资产阶级,自

相矛盾,竟转向与国王的势力联合。²¹⁴

于是慢慢出现了各市镇政府的同盟,它迅速脱掉那些“民主的”装饰,但也摆脱了它们在旧的西班牙制度下承受的种种经济负担。²¹⁵商人们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松散的联盟,没有像大多数其他国家那样设立行政机构。许多人称此为虚弱,但斯米特的看法更近于事理,他提醒我们荷兰共和国的国家机器“比欧洲任何君主制度都能取得更高程度的经济一体化。荷兰资产阶级将改革恰好进行到促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程度,而且避免了过分中央集权化。”²¹⁶这样看来,若无许多贵族背叛现行制度,尼德兰革命可能永远不会爆发。若无自下而起的激进潮流,就不会刮起第二场风。但是归根结底,牢牢掌权并成为新社会秩序的获利者的正是资产阶级。

但是这为什么会发生在尼德兰而不在其他国家发生?我们说过“第二个”16世纪是转向国内的时代,帝国的理想被抛弃,建立强大国家是当时努力的方向。但是,这个时期有一段时间还出现列强纷纷干涉的一片混乱的场面。这就是尼德兰。对尼德兰革命有一种解释是把它看作地方统治集团排除外来政治干涉,争取自治的斗争,当时西班牙、法国、英国至少正在努力去享有与此相同的权利。

对尼德兰革命的另外一种解释是,由于1559年以后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相互间失去均势,故而尼德兰得到一个争取独立并打碎西班牙枷锁的社会空间。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战败后的形势尤其是这样。²¹⁷这并不是说这些国家中有哪一个赞成尼德兰独立。西班牙丝毫不想失去它的领地。法国尽管也想削弱西班牙,但鉴于法国国内宗教斗争的影响而踌躇不前。英国想把西班牙赶走,但也不让法国进入,故而宁愿尼德兰在名义上的西班牙主权下自治。²¹⁸但主要之点在于,世界体系内的这场斗争,西班牙世界统治的这种削弱,都使联省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有了通过各种手段最大限度扩大其利益的可能。到1596年,他们能以平等身份与英法签约,而仅仅在不久之前,他们还对英国或法国称臣。正如盖尔所评论的,“法英之间就有关低地国家的事又一次互相嫉妒,证明是有

利可图的。²¹⁹

尼德兰革命的意义并不在于树立了民族解放的典范。尽管有19世纪浪漫派自由主义史学，荷兰的范例并不充当思想潮流的发动者。尼德兰革命的意义在于对欧洲世界经济体的经济影响。尼德兰革命解放了能够支持世界体系的力量，使之作为一种体系能渡过一些困难的调整年代，直到英国人（以及法国人）准备好采取必要的步骤使这一体系得到明确的加固。

让我们回顾一下阿姆斯特丹和尼德兰北方其他一些城市早先的经济史。荷兰人在波罗的海贸易中一直发挥日益增长的作用。²²⁰他们在中世纪晚期站稳脚跟，到16世纪初逐渐取代汉萨同盟诸城市。他们的整个波罗的海贸易在16世纪走了一个上升曲线，1560年左右达到最高点，当时70%的贸易都为它们所控制。尽管尼德兰革命时期多少干扰了波罗的海的贸易水平，荷兰人到1630年就弥补上了它们暂时的下降。²²¹

尼德兰革命的结果不仅确定了佛兰德斯经济衰落的局面，而且由于许多佛兰德资产者向北方移民，在人才方面巩固了北方。“如果荷兰和泽兰繁荣起来，一部分原因就是他们吸收了佛兰德斯和布拉班特最优秀的生命力。”²²²此外，1579年联省共和国宣布的宗教宽容原则使得西班牙和葡萄牙籍的犹太人自1597年起来到荷兰。“他们带来他们的财富和经营商业的聪明智慧，以补充北方商业国家的繁荣，这样的移民终将成为一种欧洲现象。”²²³

一旦尼德兰内部的政治斗争趋于稳定，荷兰人就不再仅仅是波罗的海贸易的中心，而一跃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²²⁴不仅如此，新的贸易不仅没有降低而且还增加了荷兰人誉为“贸易之母”的波罗的海贸易的重要地位。东欧毕竟为荷兰城市提供了食粮，为荷兰的捕鱼业和造船业提供了船只供应。²²⁵造船业反过来成为荷兰在其他领域成功的关键。²²⁶

这再一次说明了经济优势的积累性质。由于荷兰人在波罗的海贸易中占有优势，遂成为木材的主要市场。因为是木材主要市

场,他们便降低造船成本,在技术上进行革新。结果转过来使他们在波罗的海贸易中更能进行竞争。由于这一优势,他们能够给更大规模的扩张提供资金。²²⁷在此基础上,阿姆斯特丹变成欧洲经济的三重中心:商品市场、转运中心和资本市场,“这三个方面不可分离,很难说究竟哪一方面是阿姆斯特丹强大的最根本方面。”²²⁸在经济发展的扩张阶段,这个积累优势过程作用最大,在这以后,由于设备陈旧、相对固定的高劳力成本,经济领先地区遂丧失了优势。

荷兰人能繁荣起来还有一个原因。布罗代尔提出这样的问题:英国人1588年以后为什么未能统治海洋,像他们以后终于达到的那样。他发现原因在于尽管发生政治动乱,荷兰与西班牙的经济关系并未破裂。²²⁹英国那时是否与西班牙的美洲宝藏建立了同样的联系?还不能建立,英国对西班牙仍旧是一大威胁,不可能确立这样的关系。²³⁰而西班牙的强大尚可抵抗英国。帝国也许垮台了,但控制欧洲世界经济体仍靠获取西班牙殖民地财富。尽管荷兰反叛了西班牙,它仍是西班牙的一部分。不管怎么说,荷兰不像法国和英国,它没有政治威胁。

荷兰因为是一个小国而得益。并且还因是一个“财政健全”的国家而获益。²³¹它给那些要使用它的地盘的商人以最大的好处。荷兰致富的道路不是其他各国刚出现的重商主义道路²³²——靠商业和金融阶级谋取长远利益而非最大的眼前利益的道路。荷兰道路是自由贸易道路。²³³或者不如说这是“第二个”16世纪荷兰统治海洋时的道路。当阿姆斯特丹还在为争得商业阳光下的一席之地而奋斗时,它就在推行保护主义政策了。²³⁴

就欧洲世界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的观点来看,由于扩张时代趋于终结,荷兰的世界贸易成为维持机器运转的一种宝贵的生命液,而这时一些国家正全神贯注于重新组织它们的国内政治经济机器。但是反过来尼德兰政策的成功依赖这样一种形势,即当时无论英国或法国的重商主义倾向都尚未发展到真正打入进行自由贸易的荷兰商人的市场的程度。²³⁵这可能是因为荷兰人与西班牙继

续保持联系,相对地控制着货币市场,力量仍太强大。²³⁶

如果阿姆斯特丹接替塞维利亚,如果尼德兰北方在16世纪“第二时期”变为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商业金融中心,那么我们如何描述意大利北方那些城市国家,尤其是威尼斯和热那亚发生的情况呢?恰恰是在这一时期,它们的商业金融作用非但没减少反而在扩大。我们可以解释说这种扩大是暂时现象,它掩盖着暗中的衰落,到“第二个”16世纪结束以前,这些地区都降为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半边缘地区。

阿姆斯特丹的真正跃进是在1590年。尼德兰革命爆发于1557年和1590年两次危机之间。革命期间尼德兰在世界商业中的作用必然缩小。结果安特卫普从前承担的职能和福格尔家族在银行业方面的职能,均由热那亚接了过去。²³⁷奇怪的是,由于英国因安特卫普陷入面临无法接近美洲金银的威胁,损失最大,²³⁸就迫不及待地从事短期军事劫掠,这样就迫使西班牙把大批金银转道运抵热那亚。²³⁹热那亚的实力部分是由于尼德兰动乱,部分是由于它全力以赴发展经济,²⁴⁰部分是由于和西班牙君主制与商业体系继续保持着紧密联系,²⁴¹这种联系之渊源我们已在前面阐明。

至于威尼斯,“第一个”16世纪是地中海贸易的衰落时期(由于土耳其征服君士坦丁堡和埃及、葡萄牙人找到通往东方的海上新通道的影响),然而“第二个”16世纪出现了贸易大复兴,特别是东地中海。²⁴²这次复兴于1540年前后即已开始,部分归因于葡萄牙人无力控制印度洋贸易,²⁴³部分归因于威尼斯有一些胜过葡萄牙的竞争优势,²⁴⁴部分归因于葡萄牙在欧洲的虚弱,²⁴⁵以及西班牙在尼德兰的危机。²⁴⁶

但北意大利的复兴为时不久。它不同于尼德兰北方和英国,工农业基础都不坚实。到了17世纪,我们就该论述意大利的衰落了。

农业基础薄弱是多方面的。16世纪人口增长,1580年至1620年这一时期人口增长尤其严重。²⁴⁷我们已经提到过土壤条件相当

困难。的确，“第一个”16世纪由于商业利润下降，人们转向农业特别是小麦投资。²⁴⁸ 修道士等级尤其如此，因为不准他们从事城市商业。1570年至1630年之间，这种倾向在威尼斯附近的泰拉费尔马尤其突出，²⁴⁹ 当地投资者看到农业价格上涨工业利润下降，作出了这样的反应。

可是尽管增加生产，饥荒仍然产生。从社会制度的观点看，饥荒的发生是由于偶然性的外部因素：16世纪最后几十年降雨骤增，气候寒冷，这使沼泽地增多，疟疾随之发生。²⁵⁰ 疟疾格外严重，在国内拓殖过程中，由于扩大土地垦殖的结果，意大利早就苦于疟疾蔓延。²⁵¹ 人们仍旧会想，一个有如此大量金银的地区一定会进口小麦。小麦看来是进口了一些，但只能造成别的地区的缺粮，扩散饥荒的后果，²⁵² 而用来维持工业生产所需的农业基础却显然不够。为什么不够呢？人们可以推想新的大农业生产者（诸如修道院）不会对已经扩大了粮食进口施加政治压力。²⁵³ 这里当然有成本因素。波罗的海的粮食很远，埃及和叙利亚的粮食常常弄不到，不是因为它们也缺粮，就是因为与土耳其人正在交战。²⁵⁴

此外，到了意大利人进口粮食的地步，便落到了可能最坏的讲价条件，而且要经他们的商业对手荷兰人之手。因为阿姆斯特丹控制着波罗的海货物，可以任意掐他们的脖子。²⁵⁵ 荷兰对北意大利的这种连带的优势后来可能因世界经济体建立的联系而改变成永久的现象。斯普纳注意到新的复杂信贷技术的作用——签署汇票，即 *patto di ricorso*（一种短期贷款形式）以及公共银行——所有这一切都正好在这一时刻出现。这套信贷系统是国际性的，而且由于北意大利开始衰落，这些活动地点立即转移。²⁵⁶ 因为在热那亚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商人金融家自顾自，无暇顾及在地理上忠诚与否。

但工业呢？北部意大利特别是威尼斯，难道不是工业中心，而且是的确注入了新生命的工业中心吗？J.H. 埃利奥特谈到1560年至1600年之间的新的投资，以及“繁盛光辉”的时刻。²⁵⁷ 但是繁盛为时不长。1600年北意大利是欧洲最先进的工业区之一，到1670年，

变成了萧条的农业地区。我们已经指出，繁荣是欺人的。多梅尼科·塞拉谈论 16 世纪末威尼斯经济繁荣，说它可能“掩盖了一个事实，威尼斯经济繁荣存在的基础比过去更加狭窄，因而威尼斯经济变得更加脆弱。”²⁵⁸ 这里有两点主要的考虑。一点是英法自己的纺织工业兴起，威尼斯失去了英法两国主顾。于是市场这时多少被局限于北意大利和德意志。第二点是，这时海上运输越来越为非威尼斯船只所控制。正如卡洛·奇波拉所说：“国家整个经济结构过于依赖它向国外出售高比例的制成品和提供服务的能力。”²⁵⁹

过于依赖制成品出售是什么意思呢？总之，世界经济体中心地区成功的秘诀是，用加工制品换取边缘地区的原料。但是这张简图忽略了两个因素：压低原料进口价格的政治经济能力（我们认为这对于尼德兰比对北意大利更有可能），以及在中心国家市场上与其他中心国家的工业产品进行竞争的能力。

这里事情十分简单。荷兰人在英国可以把价格压得比英国人还低出售，反之，意大利人则可能抬高价格²⁶⁰而货物却陈旧过时。²⁶¹ 意大利行会不压低劳动成本。国家税收比较高。意大利人为高级市场而生产。其他国家的人则带来更轻巧更鲜艳的布料——不太经用，质量较低，但却便宜。现代工业成功的秘诀很早就显露出来了。当三十年战争也干扰德意志市场时，灾难随之即来：纺织生产衰落；资本不再投入；工业迁往农村，避开行会劳动费用和征税人。工业既然无竞争性，就只好死亡。²⁶²

北意大利能否至少起到北尼德兰的作用呢？有可能，但是这两地几乎都没有起作用，而荷兰倒是有大量理由比威尼斯、米兰、热那亚更适于这项任务。意大利也走不了英法道路，因为缺少政治统一。²⁶³ 1630 年瘟疫打击意大利时，²⁶⁴ 食品供应压力因之减轻，但却使工资上涨得更高。它终于成为使意大利无法忍受的最后一击。北意大利就这样完成了从中心向半边缘地区的过渡。我们前边已经注意到西班牙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同一过渡。无疑，北意大利比南意大利²⁶⁵和西西里²⁶⁶一类地中海地区的境遇要强得多，而这在以

后几个世纪中将成为一个小小的慰藉。R.S. 洛佩斯在列举 1450 年以来基督教地中海的所有失误时,悲哀地作出结论:“显然,地中海各民族的优越地位并未能熬过这许许多多的劫难。”¹²⁶⁷

注释

1 肖尼: *Séville*, Ⅷ, (1), p. 14。

2 海梅·维桑·维韦斯: *Approaches to the History of Spain*, 第 2 版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p. 76。

3 “没有 14、15 世纪的危机、没有卡斯蒂利亚羊毛可能价格低廉这种吸引力,没有英国羊毛出口有名的呆滞,没有意大利城镇活跃的呢绒业,拥有羊群数百万的卡斯蒂利亚养羊业的兴起将是不可能和不可想象的。”布罗代尔: *La Méditerranée*, I, p. 84。

4 “呢绒业在 15 世纪已有相当发展,这个事实实际上可由 1348 年在马德里戈尔召开的议会奏章证明,奏章要求禁止外国呢绒进口和卡斯蒂利亚羊毛出口。约翰二世并不接受这种明确的保护主义政策,原因是牧主团和那些从羊毛贸易中获利者,即商人、收税人、生意人和高利贷者的坚决干涉。正是在这种时刻,爆发了大地主企图阻止卡斯蒂利亚资产阶级发展的猛烈斗争。我们必须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 1462 年托莱多议会协议,当时亨利四世决定牧主团全部出口的 1/3 可由卡斯蒂利亚呢绒业占有。如果欲将流向国外的财富保留在国内,使许许多多贵族发家,这个比率是很低的。”海梅·维桑·维韦斯: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pain*, pp. 259—260。

5 同上书, p. 305。

6 “卡斯蒂利亚基本上是原料、羊毛而不是呢绒出口国,而……天主教君主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基础之一便是鼓励牧主团羊群的美利奴羊毛。另一方面,养羊业同样发达,9/10 的羊毛一贯出口佛兰德斯的英国,14 世纪即已在羊群规模日增的同时开始推行与原料相平行的工业改造方针。”约瑟·拉拉兹 (José Larraz): *La época del mercantilismo en Castilla (1500 - 1700)* (Madrid: Atlas, 1943), p. 20。

7 路易斯·维塔尔 (Luis Vitale) 列举了西班牙封建主义为什么比其他西欧国家封建主义弱的五点原因。其核心是阿拉伯穆斯林征服、牧主团的作用和资产阶级的早期作用。见 *Latin America: Reform or Revolution?* pp. 34—36。

8 马拉瓦尔：*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VI, p. 791。这并不一定是说大地主的经济作用弱。相反，皮埃尔·维拉尔基于这一事实认为，西班牙帝国主义是“封建主义的最高阶段。”见“Le temps de Quichotte”，载 *Europe*, 34, No. 121-122 janv.—févr., 1956, p. 8。

但是，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论证为什么大庄园这种现象不应认为是“另一种封建主义”，而应视为“资本主义农业”。不过，按维拉尔的观点：“在西班牙……或不如说在卡斯蒂利亚，统治阶级以光复的方式——即以封建方式——进行征服。占领土地，迫使人们臣服，聚敛财物，所有这些都~~不是~~为资本含义的‘投资’作准备。新生资产阶级本来能做到这点。从1480年到1550年曾放手去做了。但是由于它在货币流通中的地位，它首先尝试港口集市这种不稳定的资本主义。此外，由它支配的‘生产力’——土地、人、技术革新——非常快就在卡斯蒂利亚平原上受到报酬递减律的制约。因此1550年以后，它尝到了货币投入一无所获的滋味。人们花钱，进口，贷款。可是生产无几。价格和工资上涨。寄生性在发展，而企业在萎缩。这表明贫困即将来临[同书，pp. 9-10]。”

维拉尔关于“港口和集市的不稳定的资本主义”的讨论似乎涉及到马克思对于商人资本进步性的怀疑：“可是它的发展……本身却不能促进和解释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相反，凡是商人资本仍占主导地位的地方，我们都发现落后的状况。”*Capital*, III, ch. XX, p. 327。着重号是后加的。

9 “正是‘交易品运输’能够保障卡斯蒂利亚与其周围的把它与大海隔开的半岛外围地区建立联系。正是这种现象而不是卡斯蒂利亚本身，像[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说的，‘造就了西班牙’。……因为交通状况难道不是有效能的政府的首要条件吗？卡斯蒂利亚……由于这一切原因，成了引力中心，西班牙的心脏。”布罗代尔：*La Méditerranée*, I, p. 49。

10 “斐迪南与伊莎贝拉对于限制牧主团的羊群并制定入市税[古代由城市抽取的对运往市场的牲畜货物所征捐税]有特殊兴趣，这是因为牧主团这个组织作为一种工具对鼓励内地交通重要性大增。贸易国有化、从地方和都市市场向全国市场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半岛上首先认识到这一深刻重要性的是那些开明君主。”克莱因：*The Mesta*, p. 223。

11 “因此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政策的后果是确定和巩固社会阶层和社会等级在卡斯蒂利亚社会的重要性，但同时也给许多在前朝没有什么希望取得特权地位的人提供社会晋升的机会。晋升的关键之一是教育，教育可使人最终在宫廷中谋得职位。另一个是财富，尤其是都市财富，它将使有钱的

商人家庭(包括犹太血统的家庭)与可敬的贵族血统的家庭有可能联姻。” J. H. 埃利奥特: *Imperial Spain, 1469—1716* (New York: Mentor, 1966), pp. 113~114。

12 马拉瓦尔: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VI, p. 805。

13 天主教国王们不愿在他们王国的教会职位中有一个外国人,部分是为了保持他们的特权,但另一部分也是鉴于外国人对他们王国了解甚微[同书, p. 86]。”

14 埃利奥特: *Imperial Spain*, p. 117。埃利奥特另一方面注意到一些关于他们王朝的反面特征。见 pp. 123~127。

15 维拉尔: *Past & Present*, No. 10, p. 32。而且,阿尔瓦罗·哈拉又说,因为征服了西属美洲,西班牙青云直上:“西班牙并未从欧洲的结构中孤立;它也得到来自欧洲金融中心并经过这种或那种方式传来的经济需求的影响和反映。不论这些是西班牙消费的需要(把消费理解为一般意义的供应)还是君主制出兵作战的要求,西印度群岛殖民地都形成一道屏障,没有它帮助,西班牙的优势就不可能解释。因此我们毫不犹豫地谈论,西班牙征服美洲的大幅度推进(*rasgos*)——以私人企业为基础——与宗主国国家机器的需求之间,有平行的利益巧合。宗主国鼓励那种既无风险又不花费即可积聚巨大财富的征服形式。”“西属美洲殖民结构与太平洋交通方式。” *Les grandes voies maritimes dans le monde, XV—XIXe siècles, VII Colloque,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Maritime* (Paris: S. E. V. P. E. N., 1965), p. 251。

16 “从15世纪最后10年起,苏丹黄金至少再也不以同量的数量到达北非城市。……地中海突然间失去了重要的部分黄金供应。……北非地方性繁荣随即像纸牌搭起的房子一样垮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只是这么回事:1460年葡萄牙探险家抵达了几内亚湾入海口。……1482年开始建立的圣若热达明纳……建成。……这就开始真正‘占领’撒哈拉经济交通,使方向颠倒并改道。”见费尔南·布罗代尔:“*Monnaies et civilisation: de l'or du Soudan à l'argent d'Amérique*,”载 *Annales E. S. C.*, I, 1, janv. - mars 1946, pp. 12~13。

17 “关于阿尔贵因(1448年后)和圣若热达明纳(1482—1484年)的葡萄牙商站对非洲黄金商业的影响,出现了许多误解。我们必须承认,阿尔贵因商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苏丹黄金出口方向,但并未损害跨撒哈拉国家及其居民的利益。……苏丹黄金供应者和柏柏尔人从事此业的游牧民,由于欧洲人到达阿尔贵因,而有了新的黄金购买者,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在黄金贸易中的地

位。传统的黄金买主,即马格里布人和埃及人,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他们似乎感受到了欧洲竞争者在西非海岸出现的影响。……

在研究的现阶段,我们倒不如认为苏丹向马格里布和埃及的黄金出口确实可能已经减少,但是这种现象对阿拉伯世界并未造成灾难。对于苏丹黄金流通的下降能够归因于相隔遥远的米奈港商站的活动,我们也感到可疑……

不管怎么样,16世纪末17世纪初,据《苏丹的捐税》一书作者的说法,哲内仍然是撒哈拉盐对黄金交易的大中心。”玛丽安·马洛维斯特:“Le commerce d'or et d'esclaves au Soudan Occidental”,载 *Africana Bulletin*, No. 4, 1966, pp. 56—59。

18 见米盖尔·安杰尔·拉德罗·奎萨达 (Miguel Angel Ladero Quesada): *Les finances royales de Castille à la veille des temps modernes*, 载 *Annales E. S. C.* XXV, mai—juin 1970, p. 784。

19 热那亚人和其他非西班牙人不仅在金银的探寻和西班牙商业中,而且在加那利群岛的初期生产中,都起了巨大作用。见曼努埃拉·马雷罗 (Manuela Marrero): “Los italianos en la fundacion de Tenerife hispanico”, 载于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V: Exi modernie contemporaneo* (Milano: Dott. A. Giuffrè—Ed., 1962), pp. 329—337。

20 “如果有光荣的话,当时唯一能找到反葡萄牙答案的,是热那亚的光荣。”布罗代尔: *Annales E. S. C.*, I, p. 14。

21 “哥伦布在葡萄牙的失败可以用政府的地理知识和国家商业非常发达来解释。假使人们清醒地特别考虑到路程的遥远,无人愿意把金钱与人命托付给这种明摆着错误的臆想。

“而且葡萄牙全力以赴地执行非洲探险的成功政策,力争通过苏丹寻找一条直通香料群岛的海路,它不可能按哥伦布提出的靠不住的路线铤而走险。”肖尼: *Séville*, Ⅷ 1), pp. 89—90。

22 同上书, p. 235。

23 “人们不承认16世纪初和18世纪之间曾发生一场技术革命,不承认位于地中海和大西洋交叉口,向北的贸易风的至高点与向南的中纬度对流 (contreflux) 点的交叉口的卡斯蒂利亚,在再征服运动中能起先锋作用,在于其地理位置有利,那么从这时起,人们就会把从帕洛斯出发的热那亚航海家发现美洲归因于机遇,亦即谬误,而且以同样的精神,一旦人们不去考虑风和16世纪安达卢西亚的生活、半岛南部伊比利亚人长期训练有素的努力,安达卢西亚

的垄断就会变成异想天开的荒谬结果。……”肖尼：*Séville*, VIII (1), pp. 236—237。

24 “西属美洲不到半个世纪就达到了它的面积。阿劳卡尼亚人的智利未能被征服证明了这点。为了发展与生存,殖民地美洲不久就开始把基础放在有效的海上贸易体制上。运输的代价要求财富的大生产。它谴责第一个美洲是唯一能够立即生产这些财富的制度。”皮埃尔·肖尼：*L'Amérique et les Amériques*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64), pp. 85—86。

25 “这个扩张第一时期的干劲多么惊人：我们在这里真正面临着结构性突破。这种不一致很容易解释：1504—1550年难道不是从无到有的过渡时期吗？”肖尼：*Séville*, VIII 2), p. 51。

26 “西班牙国家在其大洋政策上,无法摆脱控制局势的安达卢西亚集团的影响,竭尽全力确保[塞维利亚的]垄断地位不可动摇,这对西班牙国家的有效统治十分有利。”于盖特·肖尼(Huguette Chaunu):“Economie atlantique, économie mondiale(1504—1650)”*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I, 1, juil. 1953, p. 92。

27 见阿尔瓦罗·哈拉：“La producción de metales preciosos en el Perú en el siglo XVI,”*Boletín de la Universidad de Chile*, No. 44, Nov. 1963, p. 60。见 p. 63 图表。

28 “很有可能若无基于水银纯度的技术的应用,整个欧洲涨价过程就会中止,美洲矿业就会陷入停滞和衰落。”阿尔瓦罗·哈拉：“矿业经济与西属美洲经济史”,载于 *Tres ensayos sobre economía minera hispano-americana* (Santiago, Chile: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de Historia Americana, 1966), p. 37。

29 “[16世纪]有法国帝国主义。首先法国人不承认对[神圣罗马]皇帝有任何依赖性。‘国王在其王国内是皇帝。’于是查理八世[1494年]到意大利,以便抵达东方,领导十字军,在君士坦丁堡帝国获得一些新头衔。他头戴金冠,手持皇帝节杖和小金球,进入那不勒斯,人人高呼:‘至尊皇帝。’德意志因此而惶恐不安,担心查理八世希图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法国帝国主义当时采取的形式是企图统治意大利,并在1519年神圣[罗马]帝国选举中让弗朗索瓦一世充当候选人,查理五世当选后,法国帝国主义就被反哈布斯堡的防卫政策所代替。莫斯尼尔;*Les XV^e et XV^e Siècles*, pp. 321—133。

米歇尔·弗朗索瓦(Michel François)同样谈到弗朗索瓦一世的“双重继承”,一方面是作为君主,君主的权威已由政治哲学家(légistes)和政府官员的艰苦工作所确立,另一方面则是作为查理七世和路易十二的帝国的意大利大

业的继承者，“为法国君主制开辟了独一无二的广阔前景。”“L'idée d'empire sous Charles - Quint,” 载 *Charles Quint et son temps*, Colloques internationaux du C. N. R. S., Paris, 30 sept. - 3 oct. 1958(Paris: Ed. du C.N.R.S., 1959), p. 25。

30 谈到 1500 年,可以说:“英国、西班牙以及勃艮第-奥地利就像在轨道上一样围绕欧洲头号大国法国旋转……法国的首要优势是国土幅员和中心位置。对于西欧,在近代时期开始,法国是中心地带。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德意志帝国都对称地排列在法国周围,这样法国就主宰了内线。而且这个中心地带也是人口最多的王国。”加勒特·马丁利: *Renaissance Diplomacy*, pp. 129, 131。

31 此语出自 16 世纪西班牙人 A. 佩雷斯(A. Pérez), 载 *L'art de gouverner. Discours adresse à Philippe II*, 引自鲁基洛·罗马诺: “La pace di Cateau - Cambresis e l'equilibrio europeo a metà del secolo XVI,” 载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I, 3, 1949, p. 527。

32 见奥曼: *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p. 14。奥曼评论了意大利发生的军事斗争有多大比例。

33 R. S. 罗佩斯提出,与 1870 年以后的英国平行是恰当的,他还说:“如果所有这一切意味着腐朽,那么无论是意大利人还是他们新的竞争者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点。”“The Trade of Medieval Europe: The South”, 载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II: M. M. 波斯坦、E. E. 里奇主编: *Trade and Industry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52), p. 351。

阿明托雷·范范尼(Amintore Fanfani)也注意到中世纪末期意大利的光荣与 15、16 世纪意大利的衰落:“意大利中世纪的好运气是与亚平宁半岛上诸港口成为西方通向利范特和利范特通向西方贸易的基地有关;此外还与这样一种情况有关,与利范特的商业联系属殖民性质,与西方的联系则为工业品出口者的性质。意大利人拥有他们自己的海外殖民地,而在阿尔卑斯山那边却没有,这种看法不完全属实,实际上,所有或几乎所有意大利人都享受着纯经济殖民的好处,虽然不是特别明显,故而大受宽容,但却是实质性的,因此富有成果。……”

14 世纪开始,两个事实开始搅扰意大利繁荣所赖以存在的局势……随着土耳其人的前进,法国人和英国人自己解放自己,意大利经济繁荣的前景黯淡下来,尽管整个 16 世纪他们都在设法不被全部消灭。”*Storia del lavoro in Italia dalla fine del secolo XV agli inizi del XVIII* (Milano: Dott. A. Giuffrè - Ed., 1959), pp. 24-25。

34 意大利在政治上如此四分五裂,其原因跟这种分析无关。答案可能在于有些城市国家在中世纪初的政治发展,到中世纪末经济也比较成功。一种经典解释是雅各布·布克哈特提出的:“教皇与霍亨斯陶芬间的斗争使意大利处于与西方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政治状况。在英、法、西班牙,封建制度是如此的有组织,以至到它结束时,自然而然就转变成统一的君主制度,在德意志,封建制度至少在外表上帮助维持帝国的统一。意大利几乎完全摆脱了封建制度。14世纪的皇帝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从未被接受和尊为封建君主,而是当作业已存在的政权的可能领袖与支持者;而罗马教廷拥有各种工具和联盟,它的势力强大,足以在将来阻碍民族统一,却无力实现统一。二者之间有许多政治单位……它们的存在仅仅靠自我维持。”*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New York:Modern Library, 1954), p. 4。

见华莱士·弗格森(Wallace Ferguson):“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国家根本不同于北方国家,因为意大利的以往历史就不同,这种差异一部分是两个纯政治事实的结果:第一,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从10世纪到13世纪吞并了意大利;第二,教皇统治着横贯亚平宁半岛中部的领土国家。”“Toward the Modern State,”载于华莱士·弗格森主编 *Renaissance Studies*, No. 2 (London, Ontario: Univ. of Western Ontario, 1963), pp. 147~148。

35 “14、15世纪,使伦巴第与意大利其他地方分开的是伦巴第的政治改革。……僭主政治[是]奠定该时期伦巴第经济大变革的根本性‘革新’。……这个时期伦巴第的经济政策远远超出了公社政策的范围,不仅在对待教会及其土地上,而且在更多的方面预示了英国的重商主义。……”

“在所谓的公共工程、鼓励工商业政策、农业政策和人口政策(对大家庭,遣回和移居伦巴第给予物质鼓励)方面,米兰公爵在许多,也许在所有重要的方面都走在尚在襁褓中的所谓重商主义国家的前面。”道格拉斯·F. 多德(Douglas F. Dowd):“The Economic Expansion of Lombardy, 1300—1500; A Study in Political Stimuli to Economic Chang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I, 2, June 1961, pp. 147, 160。

36 为证实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不光限于伦巴第,可见莫斯尼尔: *Les XVIe et XVIIe siècles*, p. 93。

37 布罗代尔: *Méditerranée*, I, p. 354。

38 C. H. 威尔逊: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 492。

39 亨利·皮雷尼指出一些城镇的双步骤解放过程:“城市共和国摆脱对

直接领主的效忠时，实际上并未享有绝对独立。它只是寄身更高的封建主的直接权力下而摆脱伯爵或主教的权力。德意志城镇把邻近的非常活跃的领主政权换成遥远的非常软弱的皇帝政权，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德意志城镇是自由的。” *Early Democracies in the Low Countries* (New York: Norton, 1971), p. 183。

建立强大国家的结果很清楚：“在英、法，近代国家的主要对手是大贵族，而在低地国家阻碍其进步的却是城市[p. 187]。”

40 吉诺·卢扎托 (Gino Luzzatto): *Storia economica del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 Part I, *L'età moderna* (Padova: CEDAM, 1955), p. 116。他还说道：“意大利唯有威尼斯保持了独立，但它也由于土耳其人日益严重的压力丧失了活力[p. 117]。”但多梅尼科·塞拉 (Domenico Sella) 依旧认为“威尼斯在打击着半岛其他城市的危机中得以幸免。” *Annales E. S. C.*, Ⅷ, p. 36。

41 保罗·科尔斯: *Past and Present*, No. 11, p. 41。

42 “16世纪帝国主义在意大利不限于卷入初期军事征服。意大利各共和国丧失政治独立的经济补偿措施是一种必要，热那亚的情况尤其迫切，该城公民迫望弥补利范特贸易收缩造成的损失。西班牙拥有新世界以及后来的佛兰德斯，格外适合提供这种补偿。16世纪西班牙与意大利国家关系史基本上是利害联姻史，西班牙王国政府在政治上靠意大利养肥自己，意大利商人在经济上靠西班牙养肥自己[同书, p. 41]。”见脚注 57, pp. 46~47。

43 鲁思·派克: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Ⅱ, p. 370。

44 同书, p. 351。

45 罗佩斯: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Ⅱ, p. 349。

46 见约翰·U. 内夫: “Silver Production in Central Europe, 1450—1618”,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XLIX, 4, Aug. 1941, pp. 575—591。关于南德意志人在西、葡新殖民世界的作用与南德工业生产之间的关系，见雅各布·施特莱德 (Jacob Streider):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Early European Capitalism”,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Ⅱ, 1, Nov. 1929, p. 18。

47 “整个16世纪大部分时期，北意大利和佛兰德斯是欧洲工商业活动的主要地区，它们之间的联系对双方的繁荣至关重要。……除了非常大宗的货物，对于一切货物，陆路都有许多优势。……北意与南德间繁荣的跨阿尔卑斯山贸易于16世纪后逐渐衰落。”帕里: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Ⅳ, p. 185。

48 杰拉尔德·斯特劳斯(Gerald Strauss)谈到德意志商人对贸易地理改变方向的反映：“[他们]通过加强与那些欧洲交通中心[安特卫普和里斯本]的古老联系，适应了这种发展。1500年以后差不多半个世纪，新的商业加快了纽伦堡与奥格斯堡以及其他城市的国际贸易，不仅仅只补偿了从前一度依赖的跨阿尔卑斯山转运贸易的迅速衰落。”*Nuremberg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New York: Wiley, 1966), p. 148。帕里在前引书中似乎认为，17世纪以前并不存在“迅速衰落”。但是两位作者都一致认为，至少到1550年前后，南德意志商业一直繁荣。亦见施特莱德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pp. 14~15。

49 见理查德·埃伦伯格：*Capital and Finance*, pp. 74~79。

50 同上书，p. 83。

51 鲁布林斯卡亚：*French Absolutism*, p. 8。

52 埃伦伯格：*Capital and Finance*, p. 131。

53 埃米尔·科纳尔 (Emile Coornaert)：“La genèse du système capitaliste: grande capitalisme et économie traditionnelle au XVIe siècle”，*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Ⅷ, 1936, p. 127。

54 见 J.A. 范·胡特 (J.A. van Houtte)：“Bruges et Anvers: marchés ‘nationaux’ ou ‘internationaux’ du XIVe au XVIe siècles”，*Revue du Nord*, XXXIV, 1952, pp. 89~108。赫尔曼·范·德·威(1963)：“安特卫普作为西欧商业大都会的出现和以中部德意志为中心的跨大陆贸易的发展是连在一起不可分开的。”*The Growth of the Antwerp Market and the European Economy*(The Hague: Nijhoff, 1963), II, p. 119。他认为这发生在1493—1520年左右，而且南德意志人因此而在16世纪上半叶取得了安特卫普的“商业领导权”[p. 131]。见皮埃尔·让南：“安特卫普陆上商业16世纪达到与海上商业相等的——如果未超过的话——重要性。”*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LIII, p. 198。见埃伦伯格：*Capital and Finance*, pp. 112~113。

55 “英国呢绒贸易对安特卫普的繁荣有决定性影响。它的曲线与安特卫普市场总的发展曲线一致。……葡萄牙人、南德意志人和英国人构成安特卫普世界商业的三个支柱。”J.A. 范·胡特：“Anvers aux XVe et XVIe siècles: expansion et apogée”，*Annales E. S. C.*, XVI, 2, mars - avr. 1961, pp. 258, 260。

见菲利普·德·弗里埃 (Philip de Vries)：“16世纪初，英国……与勃艮第遗产哈布斯堡诸国构成经济统一体，其中安特卫普和佛兰德斯是金融与工业中心。”*L'animosité anglo-hollandaise au XVIIe siècle*”，*Annales E. S. C.*, V, 1,

janv. - mars 1950, p. 43。

另一方面,帝国的敌对损害了安特卫普与法国的经济关系。“非常自然,安特卫普与里昂的贸易,特别是葡萄牙香料的出口受害严重。”范·德·威: *The Growth of the Antwerp Market and the European Economy*, II, p. 144。

56 简·克雷贝克斯 (Jan Craeybeckx) 对集市的概念这样定义:“谁对现实比对抽象区别更感兴趣,谁就很容易同意集市首先是市场。只有相当重要的市场才能要求将其‘集市’变为强制性的,并强迫商人们遵守它的规定。……因而只有少数城市才能授予的特权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任何拥有市场或‘集市’(就该词狭义而言)的城市足以把它的统治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强加到多少扩大了的地区,这样的城市就应视为集市。”“*Quelques grands marchés de vins français dans les anciens Pays - Bas et dans le Nord de la France à la fin du Moyen Age et au XVIe siècle: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 la notion d'étape*”,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II (Milano: Istituto Edit. Cisalpino, 1957), p. 819。

57 见维尔弗雷德·布律莱 (Wilfred Brulez): “*Les routes commerciales d'Angleterre in Italie au XVIe siècle*”, *Studi in Onore di Arrintore Fanfani*, VI: *Evo moderno* (Milano: Dott. A. Giuffré - Ed., 1962), pp. 181 ~ 184。

58 范·德·威: *The Growth of the Antwerp Market and the European Economy*, II, p. 362。他认为,尽管后来的年代相对衰落,“安特卫普货币市场甚至在 50 年代初始终都是哈布斯堡财政的战略中心 [p. 206]。”

资本通过套汇渠道在安特卫普、威尼斯、里昂、普莱桑斯、佛罗伦萨、塞维利亚以及鲁昂间流动。见何塞 - 让蒂尔·达·席尔瓦: “*Trafics du Nord, marchés du 'Mezzogiorno', finances génoises: recherches et documents sur la conjoncture à la fin du XVe siècle*”, *Revue du Nord*, XLI, 1959, p. 140。

59 见费尔南·布罗代尔: “*Les emprunts de Charles - Quint sur la Place d'Anvers*”, *Charles Quint et son temps*, Colloques internationaux du C.N.R.S., Paris, 30 sept. - 3 Oct., 1958 (Paris: Ed. du C.N.R.S., 1959), pp. 197 ~ 198。

60 “由于一般财富的发展,国家今天享有几乎无限的信誉。国家,一个生产型国家,很容易得到货币。……

“公众捐赠、容易、迅速是现代国家获得贷款的特征。16 世纪则不同。因为资本稀少、分散,大金融家必须以高价才给借款人提供服务;由于缺乏有关国家资源的知识,大金融家不信任君主。它区别不了国家元首与国王个人,或者说,区别不了国王与私人。”H. 朗查伊 (H. Lonchay): “*Etude sur les emprunts des*

souverains belges au XVIe et au XVIIe siècles”, *Académie Royale de Belgique, Bulletins de la Classe des Lettres et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et de la Classe des Beaux-Arts* (1907), pp. 926, 928.

61 同上书, p. 941。

62 同上书, p. 943。

63 “新的商业扩张非常有利于尼德兰。这并非巧合。西班牙-尼德兰联系由于尼德兰纺织业日益增长地消费西班牙羊毛, 得到坚固有力的结合。从30年代起, 新世界贵金属在哈布斯堡世界政治中发挥着主宰作用。由于他们的财政大大依赖安特卫普货币市场, 这就成了更为重要的刺激。1539年, 尼德兰经济通过安特卫普与西班牙已经牢牢地联接在一起, 以至在那场因贬值引起的危机中, 范·德·莫伦写道: “如果意大利或西班牙的大宗订货单还不赶紧到来, 大部分佛兰德斯呢绒制造商就得破产。” 范·德·威: *The Growth of the Antwerp Market and the European Economy*, II, p. 178。

64 同上书, p. 317。

65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Geoffrey Barraclough): *The Origins of Modern Germany* (Oxford: Blackwell, 1962), p. 352。

66 16世纪上半叶, 即查理五世时代, 安特卫普也经受了巨大的社会紧张局势, 虽然在这里主要不满的是城市工人, 他们苦于工资停滞, 这个问题直到1561年方才解决。见查尔斯·弗灵登: “Crise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en Belgique à l'époque de Charles Quint”, *Charles - Quint et son temps*, Colloques internationaux du C.N.R.S., Paris, 30 Sept. - 3 Oct. 1958 (Paris: Ed du C.N.R.S., 1959), 尤其是 p. 183。然而安特卫普在此时期并无政治动乱, 也许并无法农假设的示威, 城市工人比农民更不可能依赖自发起义。见弗朗茨·法农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6), pp. 85~117。

67 A.J.P. 泰勒 (A.J.P. Taylor) 所引文: *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 (London: Hamilton, 1945), p. 163。见赫斯特菲尔德: “原本会统一德国反对教皇的新教改革却分裂德国反对皇帝。”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p. 130。

68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The Peasant War in Germany*, 载于 *The German Revolutions* (Chicago, Illinois: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7), 多处。

69 托尼: *Agrarian Problem*, p. 347。

70 泰勒: *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 p. 162。

71 皮埃尔·肖尼：“Séville et la ‘Belgique’, 1555—1648”, *Revue du Nord*, XLII, 1960, p. 269。他还说道：“所谓的分裂实际是多样化,对此我们是否充分注意到? 1560年后菲利普的国家,尽管过于注重欧洲的历史学家给我们的种种印象,究竟比1540年前,即美洲引起的大变化之前的查理五世帝国大多少,我们是否认识到……?”

“一旦这种看法被接受,1555—1559年的分裂就可还其本来面貌。查理五世并不认为其子能够在欧洲继续他开创的大业。这些国家空前庞大且众多,远涉重洋,简直是一个世界,从人类的苦难、辛劳和时间来看,它更像是宇宙,不像20世纪我们这小小的行星,要把这些国家结合在一起看来是不可能的。……正是在征服末期在美洲的推动下,查理五世帝国分裂了,或更确切地说,围绕它的给养轴心,塞维利亚与加勒比海间的交通,组织起来了[pp. 270~271]。”

72 “查理五世的帝国主义与其子的帝国主义不同,基本上是以欧洲为基础的帝国主义。查理的欧洲领土中,在他统治前半期的帝国开支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尼德兰和意大利。但由于一个个被耗尽,查理被迫另寻财源。……[1540年以后]西班牙的财政贡献——主要是指卡斯蒂利亚——较之低地国家,承担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从阿拉贡榨取不到大宗资财,皇帝被迫日益依赖卡斯蒂利亚的财源,卡斯蒂利亚的议会软弱无力,许多财源都在议会控制之外。”埃利奥特: *Imperial Spain*, pp. 197, 199。

“查理五世苦于无尽无休的贫困折磨,知道经济可为其大业服务,但他手中并无一项可与被他推向巅峰的西班牙霸权相适合的政策。无论是他还是卡斯蒂利亚人都丝毫未察觉民族政策的微光。他的力量的强大不如他的雄心的膨胀,假使他能设想一个适当政策,在帝国范围内,加蒂纳拉给他提出过一项政策,他能否在这样的形势下付诸实施还是疑问。这些难以承受的法令是使卡斯蒂利亚贫困的种种原因,尽管近代经济最大量的财富抵达这里并迅速转运。”拉蒙·卡兰德(Ramon Carande): *La vida económica en Castilla (1516—1556)*, 2a ed. corr. y aum *Carlos V y sus banqueros*: (Madrid: Sociedad de Estudios y Publicaciones, 1965), I, p. 140。

73 “在这场价格风暴中,地中海国家或滨地中海国家是比其他国家更受其影响呢,还是相反?就西班牙而论,肯定的答复我们看来可能正确。尤其是当人们记住这过于庞大的帝国的巨大战争开支时更是这样。”布罗代尔: *La Méditerranée*, I, p. 486。

74 “帝国内还可看到一种运动，……卡斯蒂利亚在欧洲孤立，卡斯蒂利亚的繁荣终于毁于帝国其他成员的‘背信弃义’，毁于因孤立而最终落到自己头上的无数负担。

“在美洲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墨西哥和上秘鲁生气蓬勃的矿区终于落入财政日益枯竭的边缘地区的欲壑中。似乎欲脱离主体的边缘变得极端沉重，似乎帝国凝聚力的代价由于经济从扩张转向收缩，而超出了凝聚与统治单位的所有比率，卡斯蒂利亚是一例证，采矿业的墨西哥或秘鲁是另一例证。这种情况在下述程度上是真实的，即 18 世纪意大利和佛兰德斯边缘地区脱离卡斯蒂利亚，从而促使卡斯蒂利亚经济复苏，不再负担耗尽其财力的帝国凝聚，利益独享。……

“对卡斯蒂利亚来说，它在地中海的扩张这个 16 世纪上半叶的能动因素，到 17 世纪初，逐渐变为被动因素，对此，人们必须偿付代价，靠士兵和金钱，每当人们要求士兵为共同防御多出力时，士兵总要造反（如 1640 年的阿拉贡）。”肖尼：Séville, Ⅷ(1), pp. 248~249。

75 见布罗代尔：La Méditerranée, I, p. 343。

76 “鉴于西西里是一个与邻邦享有传统商业关系的古老王国，西班牙政治家从未把它与美洲殖民地同样对待。欧洲不存在发达的西班牙帝国理论使得西西里幸免于西班牙人在新世界殖民地推行的贸易垄断。由于对经济资源不能真正协调，这种贸易垄断就成了西班牙经济帝国主义得以表现的唯一形式。西西里无法摆脱热那亚银行家的财政监护，无法摆脱对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制造商在工商业上的依赖；但是，西西里公民至少还能把他们的小麦和丝绸的更大部分卖给那些能给他们提供上好商品的人。”H.G. 柯尼斯贝尔格（H.G. Koenigsberger）：The Government of Sicily Under Philip II of Spain（London: Staples Press, 1951）, p. 143。

77 “从 16 世纪 70 年代起，私人企业的经营和殖民地的管理显然都必须加以更改，以便遏制西班牙人和其盟友，他们藉以获取贡物和劳力的印第安贵族部落酋长的残忍无度。为了有效地保护、组织和繁衍印第安村社，必须实行城市化，基督教化，并把他们并入西欧经济。”斯坦利 J.、巴巴拉·H. 斯坦（Stanley J. and Barbara H. Stein）：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70）, p. 71。

78 H.G. 柯尼斯贝尔格：“The European Civil War”，载于 The Hapsburgs and Europe, 1516—1660（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 Press, 1971）, p. 257。

79 见费兰·索尔德维利亚 (Ferran Soldevila): “巴塞罗纳要求皇帝查理五世准予直接与美洲通商 (1522 年)”, 载于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V: *Exo moderno e contemporaneo* (Milano: Dott. A. Giuffrè - Ed), pp. 638-641。

80 例如见马洛维斯特: “从波罗的海沿岸, 特别是从波兰, 粮食与木材的输送每有扰动, 荷兰和低地国家其他省份就会生活费用上涨, 荷兰外贸就会瘫痪, 无法与伊比利亚半岛、布列塔尼半岛及英国商品交易。故而阿姆斯特丹和邻近城市的商人努力与但泽和波兰保持良好关系, 他们竭力反对查理五世 16 世纪上半叶推行的敌视丹麦的政策, 该政策曾导致港口关闭, 结果使波罗的海无法接近。”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 p. 185。

同样, 安特卫普的商人也遭到查理五世维持金银固定比率的种种企图 的打击, 查理五世的行径在不同地点使尼德兰黄金外流到法国。见弗洛伦斯·埃德勒 (Florence Edler): “The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Measures of Charles V on the Commerce of Antwerp, 1539-1542”,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XVI, 3-4, Jul. - dec. 1937, pp. 665-673。

81 要说明其社会内容和评价其原因, 见 J. W. 斯米特 (J. W. Smith): “The Nether lands Revolution”, 载于罗伯特·福斯特、杰克·P. 格林 (Robert Forster and Jack P. Greene) 所编: *Preconditions of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Press, 1970), pp. 19-54。该论文有一很好的简明书目。

82 “君主专制基础最牢固的是法国。……实际上, 自 1484 年三级会议失败以来, 再没有反对国王 [当局] 的公私自由要求。” 莫斯尼尔: *Les XVIe et XVIIe Siècles*, p. 100。

见伊莱·F. 赫克舍 (Eli F. Heckscher): “在地理上, [法国] 早在 16 世纪上半叶, 就是一个统一严密的王国, 外国几乎完全没有在法拥有领土和重叠的主权。法国君主对国家拥有的权力也许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君主都大。最后, 法国政治家从很早就遵循自觉的经济政策, 捐税有确定要完成的目的。……封建组织形式的一贯性只有在河流道路税、通行税 (Pedagia) 上, 才真正体现出来, 此外, 城市税保留下来——在这里, 同在其他国家一样, 是多多少少自治的城市经济的遗迹。” *Mercantilism*, I, 重订版 (London: Geo. Allen & Unwin, 1955), pp. 78-79。

83 布洛赫: *Caractères Originaux*, I, p. 107。

84 “15 世纪 [法国] 贵族和英国贵族一样有与平民 [roturiers] 融合的倾向,

但16世纪政府极力予以制止，通过立法禁止贵族经商和从事其他赢利活动，政府取得了成功。同大多数大陆国家一样，法国的的问题是贵族享有免税权，他们若经商，属人豁免权也随之而来，国家就要损失一笔重要的新收入。……法国王家政府害怕贵族，不敢剥夺他们的豁免权。……”拉什顿·库尔班：“A Comparative Study of Feudalism,”拉什顿·库尔班编；*Feudalism in History*, III, p. 316。

85 “[路易十一的]首要意图是根据他的信念——‘集市与市场使国家富裕’，‘增加’王国内交通与商品，财富即可自然增长——再一次把法国变为贸易通道的汇聚地。……在法国，当时政府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对国内贸易利益方面给予支持，并不能把那些利益建立在永久性组织形式中。”米勒：*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I, pp. 334~335。

86 同上书，p. 338。约瑟夫·斯特雷耶同样认为，行政上更高程度的中央集权化这一法国程式背后却是法律的不统一，从而不可能有一个全国性的经济政策：“对法国同对英国一样，发展的基本领域是司法与财政。但法国国王必须缓慢建立有关的制度，并且他们的早期制度较之英国更加简单而不定形。……”

“[12、13世纪法国所进行的]一系列兼并，使法国政府面临严重问题。原来经管一个小王家领地已足够的比较简单的制度显然必须扩大和整饬，以便应付现在臣属国王的空前增长了的地域与人口。新省份有自己的制度和关税，常常比王国政府的制度和关税更加复杂和特殊化。……”

“菲利普·奥古斯都(1180—1223)国王，法兰西国家的真正缔造者，找到了这些问题的基本解决办法。他让各省保持自己的关税和制度，但从巴黎派人担任所有重要省级官职。诺曼法庭继续执行诺曼法律，但主持官员并非诺曼人，而是大部分从旧王室领地擢拔的王家代理人。省内的自豪心理得到抚慰，而国王则有效地控制着他的新领地。……”

“(相形之下，英吉利国家尽管政治制度和法律一贯统一，在归化地区却倍感棘手，它们有各自的政治传统，诸如威尔士的公国或爱尔兰的小王国。)但新起的法兰西国家对它的灵活政策要付出沉重代价。地方领导人只关心保存地方关税与特权；中央政府不信任他们，他们也不信任中央政府。在地方政府的工作中，他们得不到任何重用。实际上，法国政府的基本原则就是任何人均不得在出生省份任职。”*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 pp. 49~51。

87 “15、16世纪，法国在世界七海洋上两次失败。……15世纪的失败是当

时的地理大发现中竟无法国海员，或几乎没有。16世纪的再次失败是法国……放弃了在大西洋、非洲和美洲争夺航路、岛屿、海岸和利益的斗争。……

“甚至在百年战争以前，人们压倒一切的考虑是，自从热那亚军舰把地中海与北海成功地连接在一起以来，将跨大陆商路和法国经济从商业大循环中排除出去。香槟市集只延续了一段时间。现在，若不考虑这种普遍的经济合作，我是说若无15世纪威尼斯或热那亚的支持，若无意大利或北欧国际资本的合伙关系，何以解释里斯本或休达的夺取，或热那亚在安达卢西亚的扎根，或更晚些的麦哲伦航行？伊比利亚人好运的后面有14、15世纪的这次冲击，这次国际资本主义和它的冲力与塞维利亚、里斯本、后来的安特卫普这些体戚相关、胜过法国的城市的合谋。在这一切之上……百年战争一出戏把世界搞得一团糟。搞得一团糟，但却未造成一场业已由商路革命引发的危机。”费尔南·布罗代尔：“La double faillite ‘coloniale’ de la France aux XV^e et XVI^e siècles,” *Annales E.S.C.*, IV, 4, oct. - déc. 1949, p. 454. 也许不仅仅是缺乏外部支持。布罗代尔的结论是：“殖民职业使国家的全部生活、整个结构，直至国家的心脏，都成了问题。16世纪的法国……对此尚无准备（公开地亦内心地）[p. 456]。”

88 罗伯特-亨利·博第埃 (Robert-Henri Bauthier) 提出如下解释：“依我们的见解，香槟市集的衰落与13世纪末14世纪初西方经济的普遍改造有关。重大变革发生在两个基本领域：(1) 意大利工业化；(2) 贵重金属市场革命。……

“香槟市集的主要目的是提供硬币供意大利购买，供应法国和佛兰德斯呢绒，所以它的衰败就不可避免，因为整个北部法国的呢绒业发生了同样的危机。……

“国际经济传统上依赖白银；13世纪末，黄金开始发挥作用，两种贵重金属比值的突然变化彻底打乱了那些从事外汇交易和硬币出售的公司的平衡。”“The Fairs of Champagne”，载于卡梅伦编：*Essays in French Economic History*, pp. 62-63。

89 见埃伦伯格：*Capital and Finance*, pp. 281-306。

90 见同上书，pp. 202-220。

91 见同上书，p. 193。

92 见同上书，p. 333。

93 见同上书，p. 307。

94 R.H. 托尼：“Introduction” to 托马斯·威尔逊 (Thomas Wilson), *A Dis-*

course Upon Usury(London: Bell & Sons, 1925), p. 62。

95 布罗代尔: *Charles Quint et son temps*, p. 199。

96 亨利·豪泽(Henri Hauser): “European Financial Crisis of 1559,” *Journal of European Business History*, II, 2, Feb. 1930, p. 241。关于信贷膨胀的论述, 见 pp. 242~250。

97 “但若我们无视 1560—1565 年这个时期开始的通货膨胀节奏的减速, 就不可能认识从菲利普二世统治初期就潜在的危机状况。1557 年国家第一次破产即已发生, 1568 年菲利普政策发生第一次大转变, 均非偶然。”纳达尔: *Hispania*, XIX, p. 513。纳达尔指出, 汉密尔顿认为西班牙价格上涨在世纪末达到顶峰, 与此说相反, 资料证明 1501—1550 年(107%)的增长大于 1551—1600 年(98%)的增长。见同书, pp. 511~512。

98 “1557 年的危机已经灾难性地影响到安特卫普在公共金融领域中所占地位的基础。以后的年代衰落在继续。在格雷沙姆推动下, 英国王家政府 60 年代彻底摆脱了安特卫普的监护。……

“当 1569 年英国—尼德兰禁运令彻底破裂时, 英国已经十分强大, 能够摆脱安特卫普的商业和金融影响。汉堡取得安特卫普的商业遗产, 伦敦取得了安特卫普的金融遗产。两座城市都确保有光辉的前程。这样安特卫普便永远失掉了第一次扩张的最后基础。”范·德·威: *The Growth of the Antwerp Market and the European Economy* II, pp. 228, 238。

99 同上书, p. 207。

100 见同上书, pp. 232—236。见帕里: “1576 年‘西班牙的愤怒’严重损害了安特卫普。1585 年帕尔马包围并夺取安特卫普, 使许多商号撤离该城或破产, 成千上万新教手工匠流落四方, 其中大多数去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经营的海上贸易转归阿姆斯特丹。”*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 169。

101 范·德·威: *The Growth of the Antwerp Market and the European Economy*, II, p. 183。但两位新近作者却认为安特卫普的衰落是被夸张了, 安特卫普在后来很长时间内依然相当强大。见简·克雷贝克斯: “Les industries d’exportation dans les villes flamandes au XVI^e siècle, particulièrement à Gand et à Bruges”,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IV: *Exo moderno* (Milano: Dott. A. Giuffrè - Ed., 1962), p. 415。不过克雷贝克斯承认安特卫普 1585 年后的新企业“当然阻止不了国际商业重心滑向阿姆斯特丹和伦敦[p. 416]。”

让·A. 范·霍提观点更强烈。他称对衰落的描写为“严重歪曲”。“*Déclin et survivance d'Anvers (1550—1700)*,”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V: *Evi moderno e contemporaneo*(Milano: Dott. A. Giuffrè - Ed., 1962), p. 706。他指出,即使战时封锁损害安特卫普的海上贸易,它并未影响它的陆上贸易。见同书, p. 720。他认为,整个 17 世纪安特卫普商人阶级仍保持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性 [p. 722]。”

102 见弗灵登载 *Charles Quint et son temps*。海梅·维桑·维韦斯在论文后面的讨论中认为这种情况在加泰罗尼亚亦属实。见同书, p. 187。见 J.W. 斯米特:“总之,我们不能不为作为尼德兰革命先决条件的社会经济形势所打动 [*Preconditions of Revolution*, p. 43]。”

103 卢扎托: *Storia economica*, p. 151。

104 见斯特劳斯: *Nuremberg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 150。

105 巴勒克拉夫: *Orgins of Modern Germany*, p. 370。

106 泰勒: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 p. 20。

107 R. 鲁德洛夫 (R. Ludloff) 这样描述德意志的发展:“16 世纪向着资本主义组织的技术进步与决定性发展,受抑制的一部分原因是领土贵族封建势力的勒索和 17 世纪小生产方式的回复。”“*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16th—17th Century Germany*,” *Past & Present*, No. 12, Nov. 1957, p. 58。

108 “德意志这时是欧洲商业的生命线,德意志城市的繁荣首屈一指。的确,其他国家的民族君主制是从反抗德意志商业霸权而不是从反抗帝国中产生的。……

“每一个贸易共同体都伴随世界市场经历着兴衰起落;但近代欧洲没有一个贸易共同体经历过德意志中产阶级所经历的那种深刻持久的灾难,德意志中产阶级当时正处在金融实力达到鼎盛,民族一致充分表达的时刻,在这时他们简直可以期望成为主宰一切的政治力量,因为他们在中欧已然是主宰一切的经济力量。”泰勒: *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 pp. 17~18。

109 “殖民者从西班牙进口在美洲环境下维持西班牙生活方式所需的货物。为支付进口,他们发展起大牧场、种植园和矿业经济,生产在欧洲出售的商品。为了种植园,他们需要奴隶,于是建立了与西非进行全部新贸易的市场。最后,到那个世纪中叶,他们偶然找到了世界上最丰富的银矿,他们藉此偿付更多的进口商品,他们向欧洲供应购买东方产品必需的硬币,同欧洲的贸易由此得到滋养。”帕里: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 199。

110 “在各式各样土著社会内，前哥伦布时期当局最高权力的终结一方面导致了传统头领(酋长、Curacas)对广大居民滥施权力威风，另一方面导致这些头领与殖民者特别是监护者(encomenderos)私下合作。……

“正像英、法、比利时等国 19 世纪在非洲或亚洲一样，西班牙国家在 16 世纪的美洲调整了土著社会领土的再划分，取代了人口中心，要求人们只承认一个头领统治集团，该集团由西班牙国家任命并控制。在 16 世纪如同在 19 世纪一样，殖民当局必须达成妥协，但这些头领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新的，终归不过是收税的工具。”查尔斯·弗灵登：“L'état et l'administration des communautés indigènes dans l'empire espagnole d'Amérique”，*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Stockholm, 1960. *Résumés des communications*(Göteborg: Almqvist & Wiksell, 1960), p. 133。

111 见沃尔夫：*Sons of the sacking Earth*, pp. 182~183。

112 见同上书，pp. 197~198。

113 见 E. E. 里奇关于奴隶贸易经济学的论述：“奴隶所有制里，最容易消耗的因素是劳动力，对奴隶劳动的要求永不可能完全地廉价地满足，这几乎是依赖奴隶劳动的必然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走私合谋装运奴隶数量之多，获利之丰厚，不足为怪。……一般认为这类装运当驶向非洲海岸获取奴隶时，会严重侵犯葡萄牙的不动产，而把奴隶卖到西班牙殖民地，只须避开一道正式禁令；葡萄牙是自由贸易的严重障碍，西班牙则不然。对奴隶贸易的这种态度使得 16 世纪的商人们为之振奋，英国商人强力集团看到了英西合伙经营以满足殖民者对奴隶的需求，满足西班牙政府对经济实力与经济控制的欲望，以及满足英国商人的利润欲望都有可能。……约翰·霍金斯开始向西印度群岛贩运奴隶，希望能在英西之间建立正规商业合作。”*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p. 325~326。我们要想一想为什么西班牙当局不接受霍金斯这个似乎主要针对葡萄牙商人的计划。是否可能因为英国插手对西班牙王国政府和殖民者危险更大，西班牙王国政府把该建议视如打开缺口的楔子？

114 “从[16 世纪]殖民地刚刚建立开始，智利就有出口经济。智利殖民地的突出特点是黄金出口。但金矿……不富，持续不久。……可是尽管在西班牙殖民地中不占首位，像危地马拉那样，智利也出口特有产品：牲畜身上提炼的油脂。”安德烈·冈德·弗兰克：*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p. 29。

115 伍德罗·博拉：*Early Colonial Trade and Navigation Between Mexico and*

Peru, Ibero - Americana: 38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54), pp. 81~82, 86~88.

116 见威廉·C. 舒尔茨(William C. Schurz): "Mexico, Peru, and the Manila Galleon,"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 4, Nov. 1918, p. 391.

117 见博拉: *Early Colonial Trade*, p. 121.

118 见同上书, pp. 118~120, 124~127.

119 皮埃尔·肖尼: "Pour une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mérique espagnole coloniale," *Revue historique*, LXXX, 216, Oct. - déc. 1956, p. 218.

120 乔治·纳达尔在 *La Población española (siglos XVI a XX)* (Barcelona: Ed. Ariel, 1966) pp. 73~80 探讨了移民范围。人口过剩确实存在。"[人口过剩的卡斯蒂利亚的] 形象与西班牙的强盛形象是分不开的," 何塞-让蒂尔·达·席尔瓦断言。"Villages castillans et types de production au XVI^e siècle," *Annales E. S. C.*, XVIII, 4, juil. - août 1963, p. 735. 那么移民与衰落是否有关系? 也许有关系, 但并非简单的连带关系。

121 "在殖民地任官……给各阶层西班牙人都提供了机会, 由于宗主国经济收缩, 工作和挣钱致富都无望。此外, 膨胀起来的殖民地行政组织编制使西班牙君主政府乘机向热心谋官者出售殖民地官职, 其他西班牙人则愿预支贷款给新任官员, 让他们到任后控制驯服的美洲印第安人群众。" 斯坦兄弟(Stein & Stein): *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 pp. 71~72. 斯沃特强调下述事实, 西班牙把出卖职位推广至殖民地, 法国却没有, 这是当时殖民地负担的标志。见斯沃特: *The Sale of Offices*, p. 41.

122 "所有可看到的资料都证明如下结论, 只有 1576—1579 年以后至 17 世纪的很长一个时期, 是白人居民容易取得充足食物以备自己和直接依附他们的仆人劳工食用的最好年代。这个时期除劳力供应外其他因素可能也在起作用; 16 世纪末和 17 世纪最初几十年, 牲畜数量莫名其妙地下降, 这很难都归诸牧人短缺; 但劳力供应却可能是持续食品和其他城市供应品缺乏的最重要因素。……在采矿业, 由于印第安人人口缩减, 劳力也明显地严重持续短缺。……"

"经济困难困扰着新西班牙城市, 新世界的主要西属殖民地的发展, 也必然面临同样的问题。……在西班牙本土, 经济机会更少, 生活状况恶化, 使许多西班牙人移民殖民地, 那里经济条件虽差, 但纵贯 16 世纪末 17 世纪大部分时期, 粮食却比西班牙丰富。由于殖民地社会的性质, 这些移民要说给新世界增

添劳力,实在微不足道,他们的到来只是增加了要吃饭的人数。……由于时代的巧合,西班牙及其殖民地的经济和人口危机……互相作用,彼此吃亏。”博拉: *New Spain*, pp. 25~26, 29。见阿尔瓦罗·哈拉在 *Guerre et société en Chili: essai de sociologie coloniale*, pp. 105~119 关于世纪末智利危机的论述。

123 “可以断言大庄园的兴起从根本上是发展而不是斗争。大地产的发展与城市和西班牙人口规模、印第安人的文化适应程度,以及近代初期西班牙社会性质是相符合的……表面看王国政府与教会是大地产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但细加考察就会发现更深层的力量在起作用。王国政府的政策一直被认为是消灭监护制,但是殖民地的自然发展已注定了这种制度的灭亡。一方面源于商业与矿业的财富并不直接依赖监护制;另一方面,西班牙社会的纯增长产生了新的强有力的家族,他们把自己的不动产划分开,破坏了僵死的监护制。”詹姆斯·洛克哈特 (James Lockhart): “*Encomienda and Hacienda: The Evolution of the Great Estate in the Spanish Indies*,”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LIX, 3, Aug. 1969, p. 428。

124 斯坦兄弟把大庄园和大种植场加以如下区别: “[大庄园是一] 幅员广阔的种植粮食或牧放牲畜的地产, [其] 产品在当地供采矿中心或墨西哥城和利马这样的大城区消费。美洲印第安人构成依附性的相对不流动的劳动力,通过工资劳动、劳役偿债的特殊形式对他们加以强制。……大种植场不同于大庄园,它是独立的经济单位,目的是为外国,即欧洲消费而生产大宗商品。” *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 p. 40。

125 “16世纪90年代,西班牙所有的地产的组成达到这样的程度,只要它们有足够劳力,它们的生产就可满足西班牙各城市的粮食需求。这并不是说西班牙城市摆脱了对印度产品的一切依赖,而是说必要时它们从自己居民所有并直接控制的农场所产粮食中,可以挤出一小部分。”博拉: *New Spain*, p. 33。

见于盖特与皮埃尔·肖尼,他们注意到西班牙向美洲的出口16世纪主要为供应殖民者的初级商品,到17世纪变为意大利或北欧制造而由西班牙转运的加工商品。他们问道:“我们如何解释这一重大转移呢?用这个事实解释,西班牙殖民运动随其发展,愈加成为自然环境的主人。且举一例:尽管安达卢西亚贵族从自满的政府那里得到柏拉图式的禁令,制酒葡萄还是成功地移植到太平洋之滨,移植到秘鲁干燥的绿洲。用另一事实也可解释,生于西印度群岛印第安人之中的后来几代西班牙人,当地方食物从一个世界移植到另一个世界时,再也不像他们父辈那样抱有烹饪偏见。最后特别应提及的是,因为西班

牙和美洲间路途遥远，以高昂代价运输价值低而且根本无法运的产品得不偿失，这种蠢举由于新世界银矿利润极高也不可能进行。当银矿利润因许多原因（最好采的矿脉枯竭、矿区劳力缺乏、汞合金必需的水银涨价，尤其是因16世纪价格革命，银的购买价压低）减少时，白银遂不大出口欧洲，而是用来在美洲创立更平衡更多样的经济。”*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I, pp. 99~100。

126 “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帝国主义一直以西班牙一大西洋经济为基础，美洲和卡斯蒂利亚的资源给它提供了资金，而卡斯蒂利亚本身亦从新世界的银矿获得定期白银输入。……

“从16世纪90年代起……西班牙及其美洲领地的经济开始分道扬镳[即变成竞争经济而非互补经济]，荷兰人和英国人乘机而入，挤进大裂口。”埃利奥特：*Imperial Spain*, pp. 285, 287。这是西班牙正在变成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半边缘部分的另一说法。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注意到16世纪智利产生的经济盈余在多大程度上花在奢侈品上，奢侈品实在等于“智利外汇与国内资源的消耗”，对西班牙有害无益。*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p. 33。

127 “很自然，菲利普[二世]出于安全利益要继续征服下去，直到现有各省住满勤劳的西班牙人、定居的印第安人，并由有条理和遵命的文官管理。首先，疲于扩张是源于认识到西印度群岛作为王国收入源泉愈加重要。……菲利普二世登基时，他得自西印度群岛的收入占他总收入的10%，而且还在增长。菲利普债台高筑，在欧洲又雄心勃勃，越来越迅速地增加西印度群岛收入必然成为王国政策的主要目的；还要把西班牙资本与才智和印第安劳力集中到银矿和其他产生收入的活动上去；坚持发展现有获利省份，而不要把力量分散到又远又冒险的新腹地。”J.H. 帕里：*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pp. 510~511。

128 “[16世纪西班牙大城市]已经在注意土地经济的根本真理，卡斯蒂利亚最不幸的就是直到灾难性的两个世纪过后才完全领悟这条真理，即耕作与放牧生活能够完满结合，二者决不敌对，决不互相排斥。”克莱因：*The Mesta*, pp. 327~328。

129 “从16世纪到17世纪，尼德兰、英国、法国从西班牙进口原料：橄榄油、染料、羊毛，而西班牙换取它们的制造品，但也有粮食。由此确定的国际专业化使西班牙工业得不到长期投资。只有小手工业企业还在为生存斗争。”达·席尔瓦：*En Espagne*, “pp. 177~178。

130 维桑·维韦斯：*Approaches*, p. 98。拉蒙·卡兰德也许关系更大，当他

指出，西班牙呢绒生产的质量在整个 16 世纪都处于逐步下降状况。见 *Carlos V. I*, pp. 191~192。见埃利奥特：*Imperial Spain*, p. 193。

131 维桑·维韦斯：*Approaches*, p. 99。

132 布罗代尔：*La Méditerranée*, I, p. 63。

133 西班牙在日益转向适合大地产生产的农作物。一大例证是成为“挣工资的农民、农村工人的工作”的葡萄酒。达·席尔瓦：*En Espagne*, p. 159。此外，这些工人的工资水平因法国移民流入而进一步降低（p. 113）。见纳达尔：*La población española*, pp. 80~88。

相反，西班牙虽继续呆在消费市场，但作为渔业生产国却在失败。H.A. 英尼斯 (H.A. Innis) 指出西班牙失败的影响：“西班牙 [在纽芬兰] 渔业的衰落是西班牙市场向英、法、新英格兰渔业开放的反面。它开始了一种贸易，这种贸易几个世纪以来对英国则意味着纽芬兰的发展，海员培育地的继续，英国制造商品的消费，以及吸收西班牙硬币的手段。16、17 世纪，西班牙贸易是英帝国真正的奠基石，这样说可能并不过分。随着生活水平变化，新教英国鳕鱼的消费量下降，但天主教西班牙市场仍稳步增长。纽芬兰渔民的祝酒辞是：‘为了教皇和十先令干杯’。英帝国所有好公民都会举杯同祝。”“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panish Fishery in Newfoundland,” *Proceedings and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Canada*, 3rd ser., XXV, Section II, 1931, p. 167。

134 维拉尔：*Past & Present*, No. 10, p. 32 (fn. 88)。

135 维桑·维韦斯：*Approaches*, p. 97。

136 “这次危机主要受益者是外国人——可恨的热那亚人（气愤的加泰罗尼亚人称之为‘白种摩尔人’）、葡萄牙犹太人以及异教徒荷兰人。外国银行家操纵王国政府的财政；外国商人扼住了卡斯蒂利亚经济，他们的触角伸向塞维利亚赚钱的美洲贸易。”约翰·埃利奥特：*Past & Present*, No. 20, p. 69。

“对世俗事务深为蔑视，对西班牙世界使命的理想，最终葬送了卡斯蒂利亚经济复苏的任何规划。热那亚银行家垄断了美洲矿业开发的利润；热那亚零售商控制了舰队的供应。同时意大利、佛兰芒和法国商人通过麦地那·德尔·坎波集市和从塞维利亚与加的斯装载而控制了殖民地贸易。西班牙君主国非但没有反应，反而越来越陷入危险的财政混乱中，被缚在比利牛斯山遥远一侧的资本主义机器上；起初这种束缚必不可少，后来成为毁灭性的，而最后是一无所获。……我们找不到一点投在国内增加农业土壤生殖力或组织商业公司开发大洋世界的资本——更不用说投资开发奴隶贸易，葡萄牙人和法国人

已经控制了它。”维桑·维韦斯：*Approaches*, pp. 97~98。

拉蒙·卡兰德说得非常清楚，西班牙 16 世纪对外国银行家的这种依赖性 是驱逐犹太人的直接后果：“16 世纪以前，外国银行家在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 并不存在，例如他们在英法那样。但这并不是说很长时期内，13、14 世纪和 15 世纪，这些王国就没有外来商人。……然而我们的国王们，卡斯蒂利亚和阿拉 贡国王，都不需要外国银行家。亚伯拉罕、以撒和撒母耳足够了。在经济领域特 别是在信贷领域，整个中世纪犹太人在王国内无人可以匹敌。犹太人同时既是 国王的司库又是国王的放债人。”*El crédito de Castilla en el precio de la política imperial*, discurso leído ante la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Madrid, 1949), p. 24。 见克莱因：*The Mesta*, p. 38。

137 埃利奥特：*Imperial Spain*, p. 196。这也是拉蒙·卡兰德的 *Carlos V, I*, ch. vii 名为“The mercantilist crossroads”的推动力。见该章：“正如查理五世自己 承认的，他在追求其目的时，把西班牙作为其禁脔。他给斐迪南写了这样的话： ‘我唯有靠我在西班牙的王国才得以支持’；但是他并不因此而建立任何民族 统一计划。形形色色的领土像在古典时代一样，成为彼此利益不合的许多省 份。尽管它们没有作为整体加入帝国，它们共同的经济利益却使它们依赖皇帝 的决策，因此它们在民族市场内就得不到必要的重视[p. 159]。”

路易斯·瓦伊塔尔认为西班牙政策并不是“重商主义”政策而是“交易主 义”政策[*cambiaría*] *Pensamiento Crítico*, No. 27, p. 23。他的确论证西班牙衰落的 根源在于它不能接受保护主义政策。“自相矛盾的是，西班牙自己倒变成了敌 国英、法工业的主要推动力[p. 24]。”

138 见埃利奥特：*Imperial Spain*, pp. 192~193。克莱因指出皇帝借钱损害 了他裁决西班牙国内冲突的能力。16 世纪初，导致粮价上涨的牧主团特权在 国会中遭到各种希望鼓励更多耕种农业的利益的反对：“查理本人碰上整个牧 场问题也有点处境尴尬。首先他自然像他祖父辈所作的那样建议利用牧主团 及其工业——这就是说不限制牧场。1525 年他曾把牧主团或军事团体一手控 制的非常值钱的牧场委托给其债权人福格尔家族，这对他这方面的政策是一 种鼓励；而允许任何大量垦殖侵害这些土地都会使他的银行家们发出诘难。另 一方面，随着财政需要的增长，必须向国会请求特别津贴或帮助。要想得到这 笔钱，他不得不给几个较大城市颁发圈占公地特许证，靠它们的影响使津贴问 题在国会表决通过。

“但查理不能迟迟不作决定，因为他的计划与抱负无法耐心等待整个新工

业的发展。他必须立即得到资金,而西班牙王国内最可开发利用的资源就是久已建立而当时最为繁荣的牧业,此时此刻,牧业的繁荣空前绝后。……森林保护与可耕地二者均隶属牧场的利益。”克莱因: *The Mesta*, pp. 327~328。

如果这还不够,1590年以后白银进口的衰落迫使西班牙政府试图依靠加重残存的西班牙资产阶级赋税负担这一灾难性的政策,补偿它的损失。见埃利奥特: *Past & Present*, No. 20, p. 71。

139 “我看菲利普二世在19世纪南美洲政府中地位牢固,生产、矿业、种植园富足,但对付国际金融却愈加解除装备。政府可以大发雷霆,甚至打将出去,但随后就被迫屈服,交出其资源、指挥职位,以表示‘谅解’。”布罗代尔: *La Méditerranée*, I, p. 464。

140 “很明显,在某一时期,西班牙在和国际新教军队作战中连连败绩。……如果找出一年划分前两个哈布斯堡家族胜利的西班牙与其后继者战败失望的西班牙,这一年就是1588年。”埃利奥特: *Imperial Spain*, pp. 282~283。

141 “西班牙的摩尔人是生活在基督教领土的穆斯林的学名,他们被迫接受基督教洗礼,否则就得离开西班牙,在卡斯蒂利亚是从1502年开始,在阿拉贡则是从1525年开始。大多数人最低限度地照办了,但仍保持阿拉伯语和古老习俗。”琼·康内利·乌尔曼 (Joan Connelly Ullman) 在维桑·维韦斯的 *Approaches* p. 31 写的脚注。

142 见维桑·维韦斯: *Approaches*, pp. 102~103。维桑的数据基于亨利·拉佩尔 (Henri Lapeyre) 的著作 *Geographie de l'Espagne morisque* (Paris: S.E.V.P.E.N., 1959)。

143 “17世纪初年, [西班牙发生了] 1601—1604年主要价格趋势的颠倒, [以及] 1608—1609年西班牙大西洋地区和西属美洲之间贸易总额主要趋势的颠倒。驱逐西班牙的摩尔人 [1609年] 的年代的精确选定主要归因于西班牙形势的这种变化。”皮埃尔·肖尼: “Minorités et conjoncture: L'expulsion des Morisques en 1609”, *Revue historique*, CCXXV, 1, janv. - mars 1961, p. 93。

144 胡安·雷格拉指出16世纪西班牙的摩尔人被视为潜在的“第五纵队”,而对奥斯曼进军的恐惧又影响到西班牙的摩尔人的待遇。见“La cuestión morisca y la conjuntura internacional en tiempos de Felipe II”, *Estudios de historia moderna*, III, 1953, pp. 222~228。

145 见胡安·雷格拉: “La expulsión de los moriscos y sus consecuencias”, *Hispania, revista española de historia*, XIII, No. 51, 1953, p. 222。但是,克莱因认为它

部分是畜牧利益对耕种生产利益的防御：“可以说牧主团利用它与君主的影响在1609年驱逐西班牙的摩尔人并非不可能。菲利普二世统治末年，牧主团指控个别人为耕种目的圈占牧场的讼案证明西班牙的摩尔人被告数量大得惊人。尽管很大部分西班牙的摩尔人是小贩、商人和乞丐，为数更多的还是农民农学家。他们的被逐……无疑是……西班牙农业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损失。”*The Mesta*, p. 338。见纳达尔：“这场迫害的动机可以归诸两个原因：一方面，摩尔少数民族思想稳定，在经济方面比基督教少数民族更善于从日益增长的经济困难中崛起；另一方面，穆斯林臣民比他们的对手更加驯服，支持封建贵族的利益。”*La población española*, p. 63。

146 见胡安·雷格拉：*Hispania, revista español de historia*, XIII, No. 52, 1953, p. 446。

147 维拉尔：*Europe*, 34, p. 6。

148 肖尼：*Revue historique*, CCXXV, p. 97。见胡安·雷格拉：“La expulsión de los moriscos y sus consecuencias en la economía valenciana”，*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V；*Era moderni e contemporaneo*(Milano: Dott. A. Giuffrè - Ed., 1962), pp. 525—545。J.H. 埃利奥特，如果对驱逐西班牙的摩尔人对整个西班牙有消极经济影响持保留态度，他还是承认：“至少对巴伦西亚，驱逐西班牙的摩尔人当时是场经济灾难。”“The Spanish Peninsula, 1598—1648,”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V: J.P. 库珀(J.P. Cooper)编；*The Decline of Spain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1609—48/ 59*(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0), p. 455。

149 “驱逐西班牙的摩尔人的直接后果之一可能就是1614—1622年这一时期卡雷拉贸易额赶不上1605—1613年这一时期的贸易额纪录。……”肖尼：*Revue historique*, “CCXXV, p. 93。

150 “我们是否充分注意到了……17世纪西班牙形势恶化，有用的西班牙的摩尔人替罪羊突然缺少，在这期间发生的把[目标]转向犹太人或被斥为犹太人的程度？”肖尼：同上书，p. 94。

151 G.N. 克拉克(G.N. Clark)：*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clarendon), 1929), p. 42。

152 埃利奥特：*Imperial Spain*, p. 204。

153 维拉尔引用：*Europe*, 34, p. 10。H.G. 柯尼斯贝尔格用更现代的语言论述了同一观点：“这样，使外国人感到诧异的是，所有来自秘鲁的白银都不能使

西班牙变成富国。美洲的财富帮助支付皇帝的战争费用,并成了热那亚银行家的财富,但是投入生产以便克服国家经济落后局面的钱财却微乎其微。随着查理五世帝国越来越变为西班牙帝国,西班牙经济的软弱便成了与西欧敌手斗争的越来越严重的障碍。”“The Empire of Charles V in Europe”,载于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 G.R. 埃尔顿, (G.R. Elton) 编; *The Reformation, 1520—1559*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58), pp. 322~323。

154 达·席尔瓦把土匪兴起归因于“销售价格与市场的极端紧张使农民横遭地方领主摆布。……”*En Espagne*, p. 161。胡安·雷格拉认为这是法国危机的副产品之一:“此外,法国危机把大批横行为匪的加斯科尼流民潮水般注入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Hispania*, XIII, p. 233。无疑把一切都归到加斯科尼人头上是有点言过其实。但是恩里克·塞拉伊马(Enrique Serraina)注意到,1582年比利牛斯山形势由于胡格诺教徒和本地山匪“共同举事”而变成灾难性的。“Hugonotes y bandidos en el Pirineo catalán”, *Estudios de historia moderna*, IV, 1954, p. 211。

155 V.G. 基尔南; *Past and Present* No. 31, p. 37。

156 “16世纪西班牙伟大的帝国成就基本是靠拥挤的卡斯蒂利亚的过剩人口的勇敢与活力取得的。16世纪西班牙人口数据既贫乏又不可靠,但现在可能普遍一致认为卡斯蒂利亚人口在16世纪较长时期增加,像欧洲其他国家一样,16世纪30年代增长率最快。”埃利奥特; *Past & Present*, No. 20, p. 57。

157 见埃利奥特在 *Imperial Spain* 中的论证, pp. 194~195。

158 同上书, p. 195。

159 肖尼; *Séville*, VIII, (1), p. 244。

160 “16世纪50年代末的鏖战使所有列强财政崩溃,结果签订卡托—康布雷西和约,各国政府由此感到必须以金银积累战争基金。”劳伦斯·斯通; “Elizabethan Overseas Trad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I, 1, 1949, p. 35。斯通引用了新的法国指导原则:“Les choses desquelles les hommes se peuvent passer ne doivent être jugées nécessaires。”(“人们不用也行的东西便不是必需的。”) ”

161 卡尔·J·弗雷德里希(Carl J. Friedrich); *The Age of the Baroque* (New York: Harper, 1952), p. 8。

162 “Introductio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R.B. 沃纳姆编; *The*

Counter - Reformation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1559—1610(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8), p. 1。

163 “这样，随着交战者一个接一个力竭而垮，16 世纪上半叶分裂欧洲的大冲突平息下来。在东部，基督教徒与穆斯林土耳其人的长期斗争慢慢冷却下来，变成火焰闪烁还会爆发的共处。在中部，神圣罗马帝国内，1555 年奥格斯堡和解达成了路德教诸侯、天主教诸侯和哈布斯堡皇帝三方虽不稳定但却普遍珍视的平衡，哈布斯堡皇帝的力量（当时如此）越来越放在帝国遥远的东部边疆，放在奥地利公国和波希米亚。在西部，1559 年 4 月卡托—康布雷西和约承认法兰西君主国与哈布斯堡家族西班牙分支间大致的不稳定的平衡，这两大巨兽仍旧耸立在所有国家之上，它们的长期争端现只暂停并未终结。这些争端中的每一个都在平息时留下自己特殊的政治体系，而 1559 年以后，这些体系中的每一个都越来越走自己的路，与其他体系日益分离。”同书，p. 2。

164 这些数据见于弗兰克·C. 斯普纳：“The Economy of Europe, 1559—1609,” 载于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R. B. 沃纳姆编: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1559—1610*(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8), p. 33。见布罗代尔; *La Méditerranée*, I, pp. 361~362; 奇波拉: *Guns and Sails*, p. 86(fn)。

165 “可是人口变化并不总像人们起初想象的那样有利于经济发展。人越多产生的生活在社会和法律边缘的流民土匪越多；就业的要求也会提出，造成另一难题。总之，人口增长含有一系列好处，也有种种负担和不便。可能……在一定时刻，人类生产要遵循报酬递减律，走上恶化过程。……16 世纪末欧洲人口曾相对过剩，尤其是在西欧国家，那里人口最密最富。像工业革命那类技术革命似乎挽救了形势，但那是两个世纪以后的事了。换句话说，很可能生产水平达不到所要求的能力，不能满足人口需求。实际上，供应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需求。”斯普纳;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p. 34。

166 同上书，p. 14。

167 见同上书，p. 26。

168 托尼; *A Discourse Upon Usury*, p. 86。

169 弗兰克·C. 斯普纳：“The Hapsburg - Valois Struggl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 G.R. 埃尔顿编: *The Reformation, 1520—1559*(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58), p. 358。

170 阿斯特里德·弗里斯 (Astrid Friis): “An Inquiry into the Relations be-

twee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Factor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 2, 1953, p. 193. 亦见 pp. 209~213。

171 她特别论述了豪泽关于 1557—1559 年危机的论点, 认为: “有害发展的根源应在普遍的经济环境中找, 不应在财政政策中找。我并非赞誉后者。可能尼德兰—西班牙的财政从长远看不可能避免破产。但肯定来说, 居民纳税和预付贷款——藉此捐税收人可提前使用——的能力是尼德兰统治者的财政制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W. R. 斯科特(W. R. Scott)……非常关注近代初期的萧条, 尤其是英国的萧条。他说, 在当时同时存在的可能加速萧条的诸因素中, 欠收、瘟疫、商业因战争中断非常显著, 却被忽略。在 1557 这致命的年代里, 在尼德兰可找出的恰恰是这三个因素。”同上书, p. 195。

172 见同上书, pp. 213~217。

173 斯普纳: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p. 42。

174 吕西安·费夫尔(Lucien Febvre): 于盖特、皮埃尔·肖尼(*Séville et l'Atlantique* (1504—1650) I Préface: *Introduction Méthodologiqu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55), XIII。

175 见简·克雷贝克斯给埃米尔·科纳尔 *Les français et le commerce internationale à Anvers (fin du XVe - XVIe siècles)* 一书写的书评。在书评中他注意到, 科纳尔的书“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证明旧大陆各个部分间的交通远远不是小范围的天天倒火车(*train - train quotidien*), 像吕西安·费夫尔给于盖特和 P. 肖尼的杰作 *Séville et l'Atlantique* 第 1 卷所写前言中描述的那样。当我们认识到单单从米德堡运抵的葡萄酒至少在吨数上若不是在价值上就常常等于甚至超过西班牙与新世界年交易总额时, 这种论断就必须大加修正。”“*Les français et Anvers au XVIe siècle*,” *Annales E. S. C.*, XVII, 3, mai - juin 1962, p. 543。

176 见阿克塞尔·E. 克里斯滕森(Aksel E. Christensen)的论述: “波罗的海出口……除玉米外实际是清一色的供应荷兰和西南欧工业的原料和辅助物资。在它所支持的工业中, 造船业是最突出的。……大麻是制绳——造船业与捕鱼业(鱼网)特有的辅助工业——的原料, 而亚麻则是另一辅助工业造帆的基础。[还有沥青、焦油以及造船用金属]……”

“的确, 波罗的海贸易是荷兰的‘贸易之母亲’与‘灵魂’, 不仅是最早最重要的批发贸易, 而且还是商船繁荣与成长的根本基础。”*Dutch Trade to the Baltic about 1600* (Copenhagen: Munksgaard, 1941), pp. 365~366。见 J. G. 范·迪伦

(J. G. van Dillen): "Amsterdam's Rol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Dutch Politics and its Economic Background," 载于 J. S. 布罗姆利、E. H. 科斯曼主编: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II (Groningen: Wolters, 1964), 特别是 pp. 133~135。

177 “新的世界经济体…… [15 世纪下半叶] 建立起来, 在这一经济体中, 里斯本和交易所控制了世界香料贸易, 指挥香料船队驶向果阿贸易中心, 然后驶向塔古斯河锚地。葡萄牙的行政和财政技术不能胜任这种赚钱的负担, [而] 荷兰人却有能力插足。……荷兰控制的香料贸易成为他们对波罗的海与西北欧贸易的无法估价的附属物。新的扩大了香料与东方产品贸易连接上了遍布全欧甚至横跨大西洋的贸易体系。” E. E. 里奇: "Preface", 载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E. E. 里奇、C. H. 威尔逊主编: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7), xii。

又见 E. E. 里奇: “同时荷兰人无须投身向东方或向西方的航行贸易, 便坐收新世界贸易之利。他们的大量精力都贯注在宗教争端和与西班牙的长期斗争上; 他们能靠地理位置和商业上的精明强干把他们国家和他们伟大的安特卫普城变为东方香料贸易中心和美洲财宝的交易所。北海鲑鱼贸易也使他们与葡萄牙和地中海建立了有利可图的接触, 而木材、亚麻、焦油以及皮毛等波罗的海贸易则使他们成为其他西欧国家特别是英国不可缺少的贸易伙伴。” “Expansion as a Concern of All Europ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 G. R. 波特 (G. R. Potter) 主编: *The Renaissance 1493--152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57), p. 468。

178 S. T. 宾多夫 (S. T. Bindoff), “Economic Change: The Greatness of Antwerp,”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 G. R. 埃尔顿主编: *The Reformation, 1520—1559*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58), p. 51。

179 汉萨同盟对法国以及后来对伊比利亚半岛的贸易早在 13 世纪就取道布鲁日。到 16 世纪, 安特卫普不准汉萨同盟的船只越过。总的来说到这个时代汉萨同盟的船只更多的是作为运输者而不是作为商人留在大西洋贸易中。见皮埃尔·让南: “Anvers et la Baltique au XVI^e siècle”, *Revue du Nord*, XXXVII, avr. - juin 1955, pp. 107~109。让南注意到“安特卫普社会环境是汉萨同盟传统与典章的溶剂 [p. 97]。”

180 并非人人同意。弗兰克·J. 小斯莫拉 (Frank J. Smolar Jr.) 认为安特卫普的衰落在下述论文中被夸大了: “Resiliency of Enterprise: Economic Causes and

Recovery in the Spanish Netherlands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载查尔斯·H. 卡特(Charles H. Carter)主编;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counter-Reform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5), pp. 247~268。详细论证在 pp. 251~252, 他结论道:“固有经济力量的显示和广泛恢复的潜力很强;这方面证据众多,而且多未使用[p. 253]。”

181 “英国对安特卫普崩溃这一粉碎性打击作了充分补偿,藉此成功地整顿了商业。但它尽管努力仍未能接过以利亚的衣钵。在安特卫普垮台与阿姆斯特丹兴起期间给它的天赐良机就付诸东流了。有迹象表明,在英国经济史的关键时期,英国的确从德意志夺得了矿业与工业技术领导权。但它在商业与海运业争雄中输给了更有进取精神,更有效率,组织更精良的荷兰人。由于未能从安特卫普的垮台中获利,英国上升到世界强国的时间至少推迟了一个世纪,这一提法并不过分。”斯通;*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 p. 54。

182 J. W. 斯米特:“The Present Position of Studies Regarding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载布罗姆利、科斯曼主编; *Britain and Netherlands*(Groningen: Wolters, 1964), I, p. 28。

183 “[16世纪末]发生的……政治发展,加之统治家族为首的商人阶级引导的戏剧般经济崛起,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他们终于在17世纪的荷兰取得了杰出地位。”D. J. 鲁尔达(D. J. Roorda):“The Ruling Classes in Holland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载布罗姆利、科斯曼主编; *Britain and Netherlands* (Groningen: Wolters, 1964), II, pp. 112~113。

184 “贵族或者寻求国王帮助反对他们共同的资产阶级敌人,或者联合资产阶级反对同样想剥夺贵族权力的国王,贵族要作出抉择。查理五世统治时期,贵族似乎选定了国王。上层贵族在皇帝手下迅速晋升,下层贵族则满足于半官半职或在军中服役。”J. W. 斯米特;*Preconditions of Revolution*, p. 31。

185 同上书, p. 41。

186 “是否伟大的革命归因于想成为革命家的富裕阶级与被迫成为革命家的穷苦阶级的联合,而纯粹贫困的革命实际上是短命的革命呢?”皮埃尔·维拉尔在 *Charles - Quint et son temps* 一书中的评论, p. 188。

187 “16世纪,几乎是头一次,反对党运动成了全国范围的运动,囊括了各阶级,或各阶级的成员,从血统诸侯直到失业手工业者。”H. G. 柯尼斯贝尔格:“The Organization of Revolutionary Parties in France and the Netherlands During the Six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XVII, 4, Dec. 1955, p. 336。

188 “此外，中央政府和可憎的法学家逐步侵犯他们残存的领主权利。1520年宣布禁止征收新什一税，要废除存在不足40年的封建权利。1531年，王国政府禁止贵族向佃户勒索贡物与劳役。我们已经提到从执行司法权得来的收入下降。”H.G. 柯尼斯贝尔格：“Property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Hainault, 1474—1573),”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X, 1, 1956, p. 14。

见斯米特：“但是很难断定这种敌意起初是由一心要保持其经济地位，还是由急欲维持其社会地位所激起的。上层贵族仍有相当大的收入，但他们的相对经济地位却(在较小程度上)像下层贵族一样，由于挥霍无度，似乎一直在下降。显然，经济压力只是贵族许多怨痛之一，但经济压力却是在一个陷入重围的阶级中引发革命的主要导火线。” *Preconditions of Revolution*, pp. 41~42。

189 见彼得·盖尔 (Pieter Geyl): *The Revolt of Netherlands (1559—1609)* (London: Williams & Norgate, 1932), pp. 69~70。

190 “如果下层贵族实际收入下降是因价格上涨，那么它的分布在16世纪头3/4就不均衡，而是集中于尼德兰革命爆发前的15或20年，即1550年以后价格上涨较前快得多的年代。因而若有危机，就是比较尖锐突然的危机，这场危机因1559年卡托—康布雷西条约后遣散传令兵队和贵族尼德兰骑兵而严重化。”柯尼斯贝尔格：*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X, p. 14。

191 “在国家建设方面君主可以作些什么，这是个突出例子，菲利普的举止表明他是继承家族传统的勤奋的工作者。”盖尔：*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p. 71。

192 同上书，p. 72。

193 斯米特：*Preconditions of Revolution*, p. 47。

194 见同上书，pp. 42~43。

195 同上书，p. 48。

196 “法西和约是天主教特伦特改革依赖的政治基础。这不仅对一个民族，而且对所有基督教徒，都是卓越的事件。”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阿尔瓦雷斯 (Manuel Fernandez Alvarez): “La Paz de Cateau-Cambrésis,” *Hispania, revista española de historia*, XIX, No. 77, oct. - dic. 1959, p. 544。

197 柯尼斯贝尔格终于替菲利普二世辩护道：“菲利普二世因派阿尔瓦去尼德兰而几乎遭到举世谴责。但这些定论难道不是史家的事后之论吗？16世纪强大的统治者面对着上层贵族(尽管是立宪反对派)和拥有军事组织的革命宗教运动(尽管尚属雏形)的双重反对，难道能采取什么不同的行动吗？在法国

和苏格兰,由于两国政府软弱,加尔文派建立起可怕的组织。16世纪治国术的通则就是把叛乱粉碎于萌发状态。此外,这项政策几告成功。其失败或许因为即使在1567年也已经行动太晚,还因为阿尔瓦未率领海上力量粉碎水上乞丐。无疑,菲利普误解了形势的复杂性,选择阿尔瓦亦属不当。但是这在当时并不像在后来那样明显,因为阿尔瓦在对教皇保罗四世的战争中行动相当老练。然而……甚至阿尔瓦的残酷也没有激起被压迫人民揭竿而起;1572年起义之所以可能只是由于高度组织和残忍无道的水上乞丐的行动,以及他们在荷兰、泽兰城市有同样高度组织的‘第五纵队’。”*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XVII, p. 341。

198 西班牙国内发展与尼德兰革命的起落关系, H. 朗查伊讲得头头是道:“[西班牙财政]危机不仅关系到安特卫普、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交易,还影响到人们尚未注意的[比利时]事件。1557年财政危机说明为什么尽管有圣—康坦和格拉夫莱恩的胜利,菲利普二世仍急于与法国签订和约。1575年的财政危机使我们懂得西班牙人的愤怒和长期不发饷的外国士兵的一切暴行。1596年的交易是将低地国家移交给大公的前奏,菲利普二世此决定只是因为他认为这样作比用武力更容易在低地国家建立和平。1607—1608年的敕令告诉了我们菲利普三世为什么甘愿签订如此有损尊严的十二年和约的原因。1647年的财政危机肯定与菲利普四世突然愿意最后承认联省共和国的独立有关。这样,比利时的命运便系于西班牙的命运,若不知道另一国的财政形势,就常常无法理解一国的政治史。”*Académie Royale de Belgique*, pp. 994—995。

199 盖尔又说道:“无论如何,这是加尔文教派的工作,凶猛诚实,不拘于对艺术与美的尊重,一心从上帝选民的国土上清除魔鬼的修饰与怠惰,摧枯拉朽,涤荡千年陈迹。这些举动并非没有得到加尔文教派精神领袖们的严格批准。”盖尔:*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p. 93。

200 见 I. 斯赫弗尔 (I. Schöffer): “The Dutch Revolution Anatomized: some comme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III, 4, July 1961, p. 471。

201 见柯尼斯贝尔格: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XVII, p. 335。戈登·格里菲思 (Gordon Griffiths) 同样提出,根据克兰·布林顿 (Crane Brinton) 发展的分类,荷兰革命可与法国革命相匹。见 “The Revolutionary Character of the Revolution of the Netherland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II, July 1960, pp. 452—472。

202 柯尼斯贝尔格: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XVII, p. 342。

203 同上书, p. 343。

204 见盖尔: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p. 161。

205 彼得·盖尔认为:“尼德兰分裂为新教的北方与天主教的南方的真正解释与现行解释截然相反。并不是因为南方是天主教北方是新教,起义才在北方胜利而在南方失败;而是因为河流使起义在北方能够固守,位于战略屏障之外的省份则为西班牙收复,久而久之便出现了新教北方共和国和天主教南方尼德兰,或新教荷兰与天主教比利时这双重制度。”*Debates with Historians*(New York: Meridian, 1958), p. 209。见亨利·拉佩尔: *Les monarchies européennes du XVIe siècle*, Collection Nouvelle Clio 39(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7), pp. 188~189。

这样,行政分裂导致了宗教两极分化。此外,并不是加尔文教徒变成了资本家,而是资本家变成了加尔文教徒。H. R. 特雷弗-罗珀证明:“17世纪中叶伟大的加尔文派企业家如果不是由加尔文教的虔诚,甚至由假定的社会表达所联合起来,还能由什么来联合?如果仔细观察,很快就会发现某些明显的事实。首先,无论好的或坏的加尔文教徒,其大多数都不是土生土长的人。既非荷兰,亦非苏格兰、日内瓦、巴拉丁领地这四个明显的加尔文社会产生了自己的企业家。这些社会土生土长者所受的强制性加尔文教派的教育决无这样的效果。几乎所有大企业家都是移民。其次,这次移民大多数是尼德兰人。……此外当我们更加仔细观察时,就会发现这些尼德兰人一般来自荷兰共和国一个特殊的阶级。甚至在那里,他们或他们的父辈也是移民。他们或是‘佛兰芒人’——即来自当时西班牙统治的南部诸省的移民——或是来自列日天主教诸侯-主教管区的列日人。”*The European Witch-craze*, pp. 15~16。

206 “比利时(用现代术语称)绝大部分是适于从冈布洛尔到滑铁卢大规模公开作战的‘骑士国家’。‘欧洲斗鸡场’^[1]是个在战场上决定予夺的地区。荷兰(用现代术语称)就不是这样,那里较大部分幅员纵横海、河、运河、沼泽,简直找不到大军可正式列阵的一块地盘。”奥曼: *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p. 541。

207 引证于克里斯托弗·希尔: *Reformation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 23。希尔在个人通信中指出:“纳米尔 1934 年在牛津主持福特讲座时与[巴利奥尔]学院本科生有几次晚间讨论,其中一次讨论时,他作了上述评论。”见 F. 沙伯德:“16 世纪国家生活中如果有发挥作用的感情,那它们在性质上是宗教的,而不是民族的或爱国主义的。以法国为例,这只适用于国内政治,因为外

[1] “欧洲斗鸡场”是比利时的别称,因欧洲多次重要战争都发生在比利时。——译者

交政策早就不受意识形态制约。但就哈布斯堡而言,这是否也适用于外交政策呢?”*Actes du Colloque*, p. 620。

208 “爱尔兰天主教像尼德兰新教一样,从投身民族事业汲取新的力量。虽然爱尔兰社会比尼德兰社会简单得多,爱尔兰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却与荷兰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斗争有许多共同特点。在这两个社会中,宗教事业都提高了民族认同感,而民族认同感也加强了宗教事业。在两个社会中,民族领袖加入国际宗教运动,提供了获得国际援助的新机会。” J.H. 埃利奥特: *Europe Divided, 1559—1598* (New York: Harper, 1968), p. 302。

209 “法国与尼德兰社会制度间的本质区别,深深影响着两国政治反对派的各自特征。[法国的]卡特琳是半个外国人,但她领导的王国政府仍旧是分裂国家中的民族统一象征。玛格丽特是查理五世之女,是佛兰芒女人,是有血统的尼德兰人;但她领导的王国政府却日益被视为外来政府。久而久之这就成了举足轻重的事,造成了反对派的出现——16世纪60年代法国的情况再明白不过——反对外国革新,捍卫民族传统。”埃利奥特:同上书, p. 126。

若问加尔文教派在伊丽莎白统治的英国为什么不像当时在尼德兰和法国那样革命,其原因则又是王国政府的处境有所不同:“首先,英国在亨利八世与罗马教会的争吵中,已经花费大量民族主义精神反对教皇统治。……在英国,玛丽女王之后,外国影响直到查理二世统治之前再也不是什么严重问题。但英国形势中更加重要的是1588年以后缺少一个天主教君主,像法国与荷兰那样,使人不断想起罗马基督之敌。”利奥·F. 索尔特(Leo F. Solt): “Revolutionary Calvinist Parties in England Under Elizabeth I, and Charles I,” *Church History*, XXVII, 3, Sept. 1958, p. 235。

210 柯尼斯贝尔格: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XVII, pp. 350~351。见罗伯特·M. 金登(Robert M. Kingdon)关于跨民族运动的加尔文教的论述:“16世纪的起义不能仅仅视为个别民族历史的篇章;至少必须将它们部分地视为革命的国际宗教组织——加尔文教会的工作。” “The Political Resistance of the Calvinists in France and the Low Countries,” *Church History*, XXVII, 3, Sept. 1958, p. 233。

211 “尽管我们必须定性,新共和国毕竟是第一个真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国家,带有强烈的商业国家特性。我认为,[解释有矛盾的事实]关键在于革命只在部分尼德兰获得成功。我想替这种提法辩解,即尼德兰革命在许多其他事物中,的确是革故鼎新的进步的社会革命。但是商业资产阶级……过于软弱,不能在全尼德兰建立自己的政府;……只有在荷兰它才能依自己的形象建

立国家,荷兰市场经济已处在高级发展阶段,由于南方的资本、人力与技术而膨胀起来,并且荷兰没有来自敌对社会集团的重大反对派。”斯米特:*Preconditions of Revolution*, pp. 52~53。见 T. 威特曼(T. Wittman):“1566—1605 年反西班牙的独立战争构成一个连贯过程,完全达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标准。城市与农民群众反封建斗争融为对西班牙压迫和对天主教会的反抗;而且这些群众运动特别是在乌特勒支联盟成立之后把三级会议这一领导推上了前列,不管它有多少局限性与矛盾,三级会议都表达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愿望。”“*Quelques problèmes relatifs à la dictature révolutionnaire des grandes villes de Flandres, 1577—1579*,”*Studia historica*, No. 40(Academic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1960, pp. 3~4。

212 “每当出现社会革命的严重威胁——从 1566 年圣像破坏运动到 70 年代末根特加尔文派放肆的民主专政——埃诺贵族就紧密团结,为维持社会现状而联合起来,哪怕这意味着向西班牙统治屈服。”H.G. 柯尼斯贝尔格:*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X, p. 15。

“从长远看,甚至连宗教也不能使贵族与民主专政调和,而一方或另一方迫于形势与原先的共同敌人联合起来。结果革命政党破裂,人民运动失败,例证比比皆是。”H.G. 柯尼斯贝尔格:*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XVII, p. 351。

213 见威特曼:“公司……根本不支持革命向左推进;它们是革命的受益者,而且不止一次成为革命的束缚。在佛来芒大城市存在激进化的条件;封建制度解体,可是迅速向资本主义生产过渡的因素还不存在,于是激起贫困化与加速社会分化。从破产雇主、雇工、学徒、小商人和形形色色的流氓无产阶级分子阶层中形成的平民群众,他们在这一发展阶段的政治行为,还只是本能的反映。*Studia Historica*, p. 16。在脚注中威特曼还写道:“关于 16 世纪流氓无产阶级的巨大增长……恩格斯在 *The Peasant War in Germany* 中作了中肯的论述。……在分析中世纪群众运动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尚未密切考察这一因素 [p. 16]。”

斯米特对这些流氓无产者的宗教观点评论如下:“同时我们还必须问自己,群众中对教条主义宗教所持冷淡态度达到什么程度:1566 年曾为圣像破坏者 1572 年成为革命失业者的人民;在多大程度上成了冷淡的流动集团,他们是未来的新兵,而不是此刻新教或天主教的先锋。起义特点是加尔文教派的还是纯政治的,是现代的还是保守的,问题的答案主要靠考察全体居民的社会思想结构。”*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I, p. 24。

214 “没有哪个地方革命像在根特那样开展得长久。”柯尼斯贝尔格: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XVII, p. 334。亦见威特曼：“然而既没有客观条件，以自身利益为指导的革命资产阶级，也没有主观条件，亨拜兹及其支持者方面更加行之有效的政策。由于缺少这些条件，激进化到 1583 年就走向了反面，‘法国人的愤怒’之后，彻底毁坏了奥兰治派权威的亨拜兹，成了反对奥兰治威廉的根特军队首领，并向西班牙人呼吁援助。亨拜兹的背叛并未引起道义问题——这与历史学家迄今通常采取的态度相反。倒不如说这是所有早熟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均可见到的过程。也是在英国克伦威尔护国主时期，某些平等派一旦其党垮台就像亨拜兹和达尔森奴斯一样，与保皇党和西班牙人建立起联系。”*Studia Historica*, p. 36。

215 “这样，共和国的贵族便不受下层的制约。但是，更引人注意的是尼德兰起义几乎把上层的制约也去除干净。16 世纪上半叶，中央政府曾支持地方贵族反对有野心的杰出人物与城里心怀不满的小市民结成任何联盟。中央政府还努力使总督不得超出其城市行使权力。尼德兰起义后，另一方面，城市地方行政官终于在实际上完全独立。他们的统治不受任何干扰，几乎肆无忌惮。”鲁尔达：*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II, pp. 114~115。

216 斯米特：*Preconditions of Revolution*, p. 52。

217 见盖尔：*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pp. 217~219。

218 关于法国，见 G.N. 克拉克：“The Birth of the Dutch Republic,”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946, p. 191。关于英国，见 R.B. 沃纳姆：“English Policy and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载于布朗利、科斯曼 (Bramley and Kossmann) 主编：*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Groningen: Wolters, 1964), I, pp. 30~31。

219 盖尔：*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p. 225。

220 “15 世纪，泽兰和荷兰各省渔业和造船业城市缓慢但不可阻挡地兴盛起来，沿海贸易越来越向东延伸，终于正好在汉萨同盟主要经济力量之所在的那些普鲁士地区成为汉萨同盟最危险的敌人。”卡尔·布林克曼 (Carl Brinkmann)：“The Hanseatic League: A Survey of Recent Litera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4, Aug. 1930, p. 591。

同时，荷兰获得苏格兰海外贸易的大部分，约在 1560 年达到船舶总吨位的二分之一左右。数字没有那样有力：“无论怎么说，不同贸易航路行驶的船舶数量乃至船舶总吨位对苏格兰与低地国家间的贸易的真正意义都是不完全的向导。因为除了煤、盐之外，进入贸易的货物相对价值高，例如与 [苏格兰的] 挪威贸易相比。”S.G.E. 利思 (S.G.E. Lythe)：*The Economy of Scotland in its Euro-*

pean Setting 1550—1625 (Edinburgh: Oliver & Boyd, 1960), p. 245.

221 “荷兰对波罗的海贸易的船只数量分析可得出初步结论,无论是反西班牙起义还是 1600 年前后新的远航航路的大发展都不包含荷兰对波罗的海贸易统治的长期衰落。”克里斯滕森:*Dutch Trade*, p. 90。

奥斯卡·艾伯特·约翰逊(Oscar Albert Johnsen)证明,挪威人乘 1572 年荷兰起义反对西班牙之机开始了“与西班牙王国诸国的直接定期商业关系。……”但是,1621 年十二年停战结束后,荷兰舰队强大起来,足以进攻挪威人:“这种海盗行为和这些没收财产实际上彻底毁灭了我们在地中海的航运。”“*Les relations commerciales entre la Norvège et l'Espagne dans les temps modernes*,” *Revue historique*, 55e année, fasc. 1, sept. - déc. 1930, p. 78。约翰逊承认不光是荷兰海军力量,而且还有荷兰的商业力量毁灭了挪威。见 p. 80。

正如皮埃尔·让南所说:“荷兰商业战胜汉萨同盟的准确时刻可以争议,但在 1600 年左右,已全面战胜汉萨同盟。”*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LIII, pp. 193—194。

222 盖尔:*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p. 239。

223 斯普纳:*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p. 31。布罗代尔更进一步:“1350—1450 年持续几个世纪的退缩把犹太商人推向意大利和那里受庇护的经济,因此,1600—1650 年的危机又迫使他们寻找庇护,而这回是在北海。新教世界拯救了他们,给他们以厚爱,反过来他们由于得到厚爱也拯救了新教世界。总之,正如沃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所指出的,热那亚和汉堡或阿姆斯特丹一样,都排列在通往美洲、印度或中国的航道上。”*La Méditerranée*, II, p. 151。

224 “1590 年和 1600 年之间的短暂时期内,荷兰人……创立了全新的贸易体系。尽管尚在襁褓之中,荷兰殖民和利范特贸易通道立即建成。新贸易,主要是印度贸易,立即成为统治机构、领导商人以及全体同时代公众的利益中心。”克里斯滕森:*Dutch Trade*, p. 19。

维奥莱特·巴伯(Violet Barbour)提出,阿姆斯特丹的迅速崛起在同时代人眼中是显而易见的:“外国人惊异地注视着阿姆斯特丹在世界贸易中称雄,心中不无忿恨。仿佛突然之间,阿姆斯特丹这座城市就出现了。”*Capitalism in Amsterdam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n Arbor, Michigan:Ann Arbor Paperbacks, 1963), p. 17。见达·席尔瓦:*Revue du Nord*, XLI, p. 143。他把荷兰称霸的年代非常精确地定在 1597 年和 1598 年之间。

225 克里斯滕森：*Dutch Trade*, p. 424。见巴伯：“城市新财富的主要源泉——如它早先小有名气时一样，看来是粮食贸易、海军供应、运输贮藏和销售这样那样的沉重货物。种种环境——饥荒、战争、需要更多更大的枪炮而变换了的战争技术、需要更多更大更好的军舰的海上冒险——使人们对阿姆斯特丹所能提供的货物与服务需要大增。”*Capitalism in Amsterdam*, p. 26。她还谈到 1592 年以后阿姆斯特丹在海事保险中的作用 (pp. 33~35)，以及 1609 年以后在武器和军需品供应中的作用 (pp. 35~42)。

226 “阿姆斯特丹是荷兰木材、造船的主要市场，比其他地方都便宜。鉴于英国人坚持用庞大武装的商船，1595 年左右荷兰人开始建造称为飞船 [fluyt] 的一种新式船只，它体轻实用，船身狭长，速度快，适于装载沉重粗笨的货物。飞船便于少数船员工作。运费低廉是航海业国家难与从事波罗的海、挪威和莫斯科公国航运的荷兰人竞争的原因。”J.G. 范·迪伦：*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II, p. 136。见维奥莱特·巴伯：“Dutch and English Merchant Shipping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载于卡勒斯-威尔逊主编：*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St. Martin's, 1965), I, pp. 227~253。

荷兰飞船技术优点的简略描述见 J.H. 帕里：*The Age of Renaissance* (New York: Mentors Books, 1963), p. 83。赫伯特·希顿 (Herbert Heaton) 则认为荷兰造船业的优越在于财政经济方面：“(1) 现金低价采购原料；……(2) 造船设计、部件、方法实行标准化。……(3) 造船者可以比外国竞争对手低得多的利息借款。”*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rev. ed (New York: Harper, 1948), p. 275。

227 “粮食提供了货物，付给了运费，使阿姆斯特丹商船队保持运转，从而使不太满载的批发商品运输尽可能低廉。……迟至 1666 年，据估计活跃在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的 3/4 资本都投入了波罗的海贸易。”巴伯：*Capitalism in Amsterdam*, p. 27。

228 巴伯：同上书，p. 18。安德烈-E. 塞尤乌 (André-E. Sayous) 进一步阐明了阿姆斯特丹作为金融中心的优势：“另一方面，阿姆斯特丹改进了技术；更便于在资本家集团中散发海险和以现代形式获取贷款。海上保险由于有许多分担危险和在定利率上享有更精确读数的个人参加而发展起来；……至于贷款，即使方法未改进，至少商品贷款量增加了；而且汇票不仅用于异地汇兑支付，而且作为先期贷款；但它还没有按市场要求用于套利。”“Le rôle d'Amsterdam dans l'histoire du capitalisme commercial et financier,” *Revue historique*, CLXXXIII, 2, oct. - déc. 1938, p. 263。亦见 pp. 276~277。在塞尤乌看来，阿姆斯

特丹兴起的关键因素实际上是“集资与投机的新形式[p. 279]。”

229 “只有一种解释是可取的；荷兰由于位于天主教低地国家之邻并坚持撞开西班牙大门，便同[伊比利亚]半岛和维系荷兰商业生命线的美洲财富保持着比[英国]更多的联系。……西班牙与荷兰之间存在金钱关系，1609至1621年的和约使之加强，17世纪中叶左右当荷兰形势不利时——岂非纯粹巧合？——西班牙的全部财富付诸东流，西班牙与荷兰间的金钱关系遂告破裂。”布罗代尔；*La Méditerranée*, I, pp. 572~573。

巴伯强调阿姆斯特丹对粮食的控制：“阿姆斯特丹作为金银市场的兴起大可归因于与西班牙的贸易与战争劫掠。这样在1595年以及后来至1630年的若干年，西班牙政府被迫批准贵重金属出口，以换取粮食进口。”*Capitalism in Amsterdam*, p. 49。而且我们又一次发现了累积的优势：“但是直接减免从加的斯柜台流向荷兰的白银只是历史的一部分。还有从其国民享有加的斯财富的国家的间接减免——减免支付给商品购买服务，它们受投机可能所诱，或仅仅为了求得安全和处置财产的自由[pp. 50~51]。”

230 见布罗代尔；*La Méditerranée*, I, p. 209。

231 弗雷德里希；*The Age of the Baroque*, p. 8。

232 正如约瑟·拉拉兹(1943)所说，假如有荷兰重商主义，那“不过是重商主义的随便说法。”*La époque del mercantilismo*, p. 186。

233 “荷兰人赞成世界各地尽可能广泛地开放贸易；英国人喜欢严加限制的贸易，尤其是英国与殖民地间的贸易，但也包括外界国家与英国的贸易。”罗伯特·雷诺兹；*Europe Emerges*(Madison: Univ. of Wisconsin Press, 1967), p. 442。

亦见巴伯：“17世纪尚属罕见的货币金属出口自由有利于稳定阿姆斯特丹汇率，从而鼓励汇票作为贷款洽谈工具流通，汇票贴现与出售成为阿姆斯特丹的活跃交易。”*Capitalism in Amsterdam*, p. 53。

234 “阿姆斯特丹在西欧商品交换中能起重要作用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由15世纪下半叶海运政策中推行的保护主义路线提供的。依此路线，从波罗的海抵达的所有身为阿姆斯特丹公民的船主都必须停靠该城。此规定同样适用于阿姆斯特丹公民共有而船长为非公民的船只。这项规定是航海法的雏型，矛头针对吕贝克和波罗的海至佛兰德斯尤其是布鲁日的直达交通。”格拉曼；*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II, p. 35。

235 “大量购买，自由信贷，廉价运输三者结合使阿姆斯特丹物价与原产地物价持平。1606年一位下院议员坚持荷兰人可以销售尼德兰穿戴的英国呢

绒, 从那里再出口, 价格比英国贸易公司还便宜。”巴伯: *Capitalism in Amsterdam*, p. 95。

236 例如见巴伯关于荷兰外国投资及其实力的论述: “[17世纪] 大部分外国货物寻找购买信贷或短期贷款, 向阿姆斯特丹私人资本发出呼吁。……”

“在北方各王国政府争霸波罗的海的连续战争中, 荷兰资本像荷兰海运一样, 站在双方作战。……”

“英法提供给外国资本主义的处女地少于北方诸国, 北方诸国自己的中产阶级的工商业才能富于生气和竞争精神, 为各自的货物寻找有进取性的支持。但在两个国家中, 荷兰资本都在起作用。”同上书, pp. 105、111、119。见布罗代尔前引书 p. 229 脚注。

237 “1557 至 1627 年热那亚银行家世纪在大资本主义的时间表上是定在福格尔家族的短暂世纪与阿姆斯特丹混合资本主义世纪之间。……很明显, 热那亚人的财富并不是 1557 年随着西班牙国家的奇怪破产而凭魔杖一挥就突然出现的, 也不是在 1627 年正当西班牙第五次或第六次破产之际一夜间消失的。……热那亚在很长时期一直是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布罗代尔: *La Méditerranée*, I, pp. 454~455。

亦见埃利奥特: “热那亚银行家与福格尔家族一起作为查理五世的债权人而活动, 1557 年王国破产, 福格尔家族影响衰落, 因而热那亚人的影响增长。”*Europe Divided*, pp. 59~60。

还有斯普纳: “约在 1570 年以后, 热那亚人的全盛期开始了, 随着 1530 年以后德意志矿业繁荣的消退, 福格尔家族金融上的卓越地位也衰落下去, 热那亚人开创了一个继往开来的世纪。”*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p. 27。

这个时期威尼斯也发挥了关键性的金融作用: “在 16 世纪长期的经济扩张中, 威尼斯变成一个国际汇票流通的决定性中继点。……1587 年以来, 威尼斯有了储蓄银行, Banco della Piazza di Rialto。根据 1593 年法令, 上院规定汇票必须入分类帐结算。结果, 国际交易的伟大工具就这样创造出来了。实际上, 共和国有双重币制: [流通货币和银行货币]。”弗兰克·G. 斯普纳: “Venice and the Levant: An Aspect of Monetary History (1610—1614),” 载于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V: *Eui moderno è contemporaneo* (Milano: Dott. A. Giuffrè - Ed., 1962), pp. 646~647。

238 “伊丽莎白女王和英国商人获准通过在安特卫普借款参加美洲金矿开采 (Pactole), 在这个时期菲利普二世与伊丽莎白间的协约政策曾是可能

的。但是，正是那种秩序，那种平衡被 1566 年危机和 1567 年阿尔瓦公爵威胁登陆尼德兰所危害。……从那以后，大西洋广大区域一切都变了。”布罗代尔：*La Méditerranée*, I, p. 438。

239 “在金融领域，……1568 年开始，安特卫普开始失去中心地位。这年，英国伊丽莎白没收了曾在普利茅斯港避难的西班牙舰队船上发现的财宝。……英吉利海峡再也不安全了；由此热那亚银行家决定改变贵金属的航线，取道热那亚和贝桑松集市。于是，贝桑松到 16 世纪末变成了西欧领导银行业的地方和新世界源源不断运抵的白银的集散中心。

“从银行角度看，继安特卫普而起的并不是阿姆斯特丹；……直到 1640 年后，阿姆斯特丹才成为世界贵金属中心。……”雷蒙·德·鲁维尔(Raymond de Roover)：“Anvers comme marché monétaire au XVI^e siècle”，*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XXXI, 4, 1953, pp. 1044~1045。

见布罗代尔：“1580 年开始，白金属的真正集散中心是意大利大城市，它们的白金属和西班牙一样多甚至更多。它们从这种角色中获取暴利，条件是向利范特出口一部分西班牙过剩的银币，这事既轻易又赢利。”*La Méditerranée*, I, pp. 450~451。

240 “我认为没有必要坚持尽人皆知的事实，热那亚是特殊不受任何非商业成分侵害的货币市场。例如从未有过任何明显的对金融活动的教会压力。”卡洛·M. 奇波拉：*Economia internazionale*, V, p. 256。

241 朗查伊证明，意大利银行家向西班牙王国政府索纳的实际利率为 16% 至 20%。见 *Académie Royale de Belgique*, pp. 950~951。H.G. 柯尼斯贝尔格道：“热那亚比任何别的国家更把自己的前途押在西班牙君主制上。……只要秘鲁向塞维利亚送白银，热那亚富豪统治集团就兴旺发达。”“Western Europe and the Power of Spa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R.B. 沃纳姆主编：*The Counter-Reformation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1559—161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8), p. 257。

242 “由于几种不同力量的合并，到 16 世纪中叶，利范特市场东方商品充足，威尼斯也恢复了昔日商业繁荣。但是 16 世纪上半叶萧条深重。”戈丁浩：“Le repli vénitien et égyptien et la route du Cap, 1496—1533,” 载于 *Eventail de histoire vivante: hommage à Lucien Febvre*, Vol. II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53), p. 300。见弗雷德里克·C. 莱恩：“The Mediterranean Spice Trade: Its Revival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载于 *Venice and History*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

kins Press, 1966), pp. 581~590, 以及其早期论文:“Venetian Shipping During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载于 *Venice and History*, pp. 13~24; 亦见 E.E. 里奇;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 特别是 p. 447。

243 “可能系于阿拉伯中间人的地中海商业靠高价优质可以维持下去。葡萄牙人大概干得太过分,在亚洲购买价极端低廉。……地中海至利范特的商业并未因中间人而受丝毫损失,只有暴力才能使之中止,就是说监视起源点。葡萄牙人多次成功地做到了这点。……但是他们的严厉监视为期不长,以后就主动松弛下来。”布罗代尔; *La Méditerranée*, I, pp. 459~496。

244 “16 世纪初,地中海西班牙贸易由于葡萄牙人开辟了经好望角与印度的直接贸易而经历了严重危机。……但是葡萄牙垄断为时不长。尽管在海上难以对付,葡萄牙人却无法指望用四散于各个基地的少数军舰,就把供应埃及和土耳其帝国以及欧洲顾客的整个繁荣商业永远压制下去。……印度洋西班牙贸易——或其更大部分——不久又进入旧航道;藉此威尼斯船只复活了地中海贸易。在香料与质量的直接竞争中,优势也并非都在葡萄牙大洋贸易一方。好望角航路的代价与危险很大,并有增长势头;而葡萄牙人也没有什么货物可供海外运输生利。他们用金银块买香料,回程的收入还必须弥补出航的费用。……香料质量也可能有优劣,葡萄牙香料‘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趋于变质而丧失香味。’”J.H. 帕里;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p. 164~165。

245 见 S.T. 宾多夫关于 1549 年中止常设机构葡萄牙王家工场的影响的论述。“不管此步骤原因如何,或直接后果如何,它都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 p. 68。

246 见 J.B. 哈里森 (J.B. Harrison): “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ies Outside Europe, II: Asia and Africa,”*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R.B. 沃纳姆主编;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1559—161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8), pp. 533~534。

247 例如,卡洛·M. 奇波拉注意到 1580 年和 1610—1620 年之间米兰“有过急剧人口扩张。”*Mouvements monétaires dans l'Etat de Milan (1580—1700)*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52), p. 31。佛罗伦萨亦有类似扩张,1619—1620 年为其下降点,见于鲁基洛·罗马诺;“A Florence au XVIe siècle: industries textiles et conjoncture,”*Annales E.S.C.*, VII, 7, oct. - déc. 1952, pp. 508~512。

248 “小麦本身确立了压倒其他所有〔16 世纪经济活动〕的农业生产的优势。农业是地中海的首要行业,尽管小麦代表的只不过是农业收入的一部分。”

布罗代尔；*La Méditerranée*, I, p. 385。

249 “[这种转移]根本原因一定是威尼斯人希望从土地取得利润。……早在15世纪大修道院就靠开垦获利,这例子可能便是早期的刺激。……”

向土地活动转变的关键时期似乎在1570年和1630年之间,威尼斯领地当时增加了大概35%。”S.J. 沃尔夫;“Venice and the Terraferma Problems of the Change from Commercial to Landed Activities”载于布赖恩·普兰主编: *Crisis and Change in the Venetian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London: Methuen, 1968), pp. 194~195。

见施斯马;“意大利教会土地占有制在反宗教改革时期到处都在扩展;而且特有环境使这种趋势在威尼斯领土上比在别处更加盛行。教会公司以其在那个时代大开垦项目中特别积累的资本热情参与。” *Venice and the Defenses*, p. 343。

250 布罗代尔阐述降雨与退缩的关系以这样的评论结尾:“在最后几年主宰着16世纪的整个饥饿社会剧,也许其真正根源,也许有点浅薄的根源,就在这不确定的大气环境上。我们对这一假设的提出慎而又慎,但还是必须提出。” *La Méditerranée*, I, p. 248。

251 “人们到哪里也无法摆脱16世纪灾难[疟疾]复发的印象。也许这是由于当时人类从事着其宿敌——低地的发展的缘故。整个16世纪,乃至15世纪,人们都在追求附加土地。还有比湿润、土壤疏松的平原更可能找到附加土地的地方吗?但是翻动被感染的土地是最有害不过的事。……16世纪地中海到处都在进行的国内殖民带有高昂代价。……意大利尤其高。如果意大利输掉了对遥远土地的征服,一直呆在那场伟大运动之外,那么在其他原因之中岂不是因为它正忙于用当时可用的技术在国内征服从洪泛平原到高山之巅的整个可耕地区吗?”布罗代尔; *La Méditerranée*, I, p. 59。见P.J. 琼斯(P.J. Jones) *Per la Storia agraria italiana nel medio evo: lineamenti e problemi*,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XVI, 2 giugno, 1964, pp. 307~308。

252 “地中海地区食品形势若无美洲贵金属流入提供大宗购买粮食的支付手段,很可能会严重得多。因而气候波动成为促使贵金属流入的影响遍及全欧的因素之一。15世纪中叶以来进行的商业和海运业扩张必然也有助于缓和粮食歉收的影响。然而,气候变化大大削弱了有关大西洋和北海正在兴起的民族的地中海国家。”厄特斯特罗姆;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I, p. 44。

253 “[1591年]食品危机以后像在危机前一样,地中海主要靠自己的农业

产品生活。阿姆斯特丹一类低地国家的情形和后来更为广泛的英国自由贸易中出现的情形,在地中海从未出现。城市地区没有把粮食供应任务移交他人。”布罗代尔: *La Méditerranée*, I, p. 387。

然而,粮食进口确实增加。事实上正是布罗代尔和罗马诺指出了小麦在里窝那扩张中的作用:“里窝那的兴起难道与它日益增长的小麦港口的作用无关吗?我们相信,1591年大饥荒和从北方流入小麦……标志着重大的转折。”费尔南德·布罗代尔、拉吉罗·罗马诺: *Navires et marchandises à l'entrée du Port de Livourne (1547—1611)*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51), p. 22。

254 利范特中止粮食来源有多么重要,这在J.H. 帕里对15世纪形势的描述中已指明:“在人口多生产少的西方,形势更困难。佛罗伦萨、热那亚、威尼斯、拉古萨、那不勒斯以及西班牙东海岸城市——西班牙东海岸城市大部分位于葡萄酒、油或羊毛产区——由于当地供应不足或不可靠,加之陆路运输昂贵,所以它们都是海上粮食进口城市。主要西方来源是阿普利亚和西西里,阿拉贡的统治者在政治上控制着它们,定期进口粮食;但整个西地中海粮食不能自给,进口城市也不断地依靠利范特充裕便宜的粮食接济。尤其是威尼斯对东方粮食的依赖;它的爱琴海殖民地是有用的供应来源,而且共和国还定期从埃及进口粮食。因而东地中海存在着一个专业化的、复杂而又有必要灵活性的海上粮食贸易。威尼斯、拉古萨、热那亚的船只云集,都是启航运载大宗货物,并且通常只运粮食,不运其他货物。”*The Age of Renaissance*, p. 53。

255 “地中海的情况不同:因为经常有阿尔及利亚海盗进行威胁的危险,大型武装船只在这一地区必不可少。……不过阿姆斯特丹由于有大量粮食储备,成功地夺得部分地中海贸易。16世纪后期的许多年和17世纪上半叶,一度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缺粮时期,然而阿姆斯特丹仓廩丰盈,藏满波兰和东普鲁士的黑麦和小麦,荷兰商人由此获利甚丰。”范·迪伦: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II, p. 136。

见帕里: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p. 158~159。帕里对地中海缺粮原因又有进一层思考:“16世纪70年代土耳其—西班牙的大规模敌对行为和威尼斯与西班牙的联合,也打乱了正常粮食贸易,同时增加了供应海军、陆军和驻军食物的需求[p. 159]。”

256 “另一方面,信贷规模与贸易网,与全欧洲各港口、市场与市集的商人联合紧密相连。热那亚商人金融家的活动是出色例证。他们在欧洲传统中心的意大利开业,参与西班牙在大西洋的冒险,其代理人遍布全欧,他们对国际经

济从南欧向北欧和大西洋进行重点转移起到了沟通作用。因此，他们为荷兰的非凡成功铺平了道路。”斯普纳：*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p. 31。

257 “在欧洲其他国家把注意力与资源更多地投向海上贸易时，威尼斯却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威尼斯舰队在 1560 年以后的年代开始衰落。……但是这海上退却与威尼斯资本从海上向大陆的大转移恰好相合。在这里资本不是用于贸易，而是用于获取土地，建立大规模纺织工业，足以与意大利北方和尼德兰纺织工业匹敌，因为这两国正苦于欧洲战争。这个方针至少在短时期内大大获益。16 世纪剩下的年代，……〔威尼斯〕辉煌灿烂，仿佛昔日的光荣又奇迹般重现。”埃利奥特：*Europe Divided*, pp. 58~59。

258 多梅尼科·塞拉“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in Venetian Trade,”载于布赖恩·普兰主编：*Crisis and change in the Venetian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London: Methuen, 1968), p. 90。

259 卡罗·M. 奇波拉：“The Decline of Italy: The Case of a Full Matured Economy,”*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 2, 1952, pp. 180—181。这不仅在威尼斯如此而且在米兰亦然。见奇波拉：*Mouvements monétaires*, pp. 33~34。威尼斯衰落的细节在涉及 1620—1720 年这一时期的专题论文集中有精彩论述：*Aspetti e cause della decadenza economica veneziana nel secolo XVII. Atti del Convegno (27 giugno—2 luglio 1957)* (Venezia—Roma: Istituto per la Collaborazione Culturale, 1961)。

260 E. J. 霍布斯鲍姆(E. J. Hobsbawm)对意大利定价过高这一论点的确实性多少持保留态度。见“The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载于特雷弗·阿斯顿(Trevor Aston)主编：*Crisis in Europe, 1560—1660*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5), p. 19。但巴里·苏普莱(Barry Supple)提出很有力的证据证实奇波拉的假设，见于 *Commercial Crisis and Change in England, 1600—1642*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59) pp. 159~160。亦见鲁基洛·罗马诺对威尼斯造船业特别是 1570 年以后的衰落所作的解释：“〔建设贷款政策〕并不能使较之其他地方尤其是北欧海军建设造价高的威尼斯军火库的高昂造价平衡。”“La marine marchande Vénitienne au XVI^e siècle”,载于 M. 莫拉特等主编：*Les sources de l'histoire Maritime en Europe, du Moyen Age au XVIII^e siècle, Actes du IV^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Maritime* (Paris: S. E. V. P. E. N. 1962), p. 46。

261 “北方呢绒的成功缘于两个因素：成本低，质量也许不及威尼斯，但更

合于新时装要求。”塞拉：*Annales E. S. C.*，Ⅻ，p. 39。

人们应当记住质量劳动在16世纪是指更多的，而非更少的工业化劳动。工场劳动与为民众生产以及成批生产相结合，手工艺作为专门化市场要求的好手艺样式继续存在，在这样一个时代，要求人们具有飞跃的想象力，认识到在工业时代以前相反的情况是真实的。当时正是那些工场，即在一个地点处于直接监督下一起协作的工人集合体，才仅仅在罕见情况中使用，例如某些奢侈品生产要求质量第一，有些部门为安全起见，要求精确性第一，还有些部门则必须有大规模控制，以防发生问题。例如，威尼斯16世纪的绳子(家具)生产就是这样的情况，威尼斯上院担心“我们军舰和船只的安全，同样担心我们水手和资本的安全。”而且上院未把这种企业委托私人之手。上院的声明为弗雷德里克·莱恩所引证于“The Rope Factory and Hemp Trade in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载于*Venice and History*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Press, 1966), p. 270。

262 “当一个国家处于17世纪初意大利所处的不幸地位时，许多种力量，无论天生的还是诱发的，或迟或早地都会起作用，进行重新调整。校正不平衡的必要步骤可能多种多样：发展新型生产，寻找新市场，阻止某些消费类型，降低国内价格水准与世界价格水准间的关系，等等。如果国家能够发展新型生产或开发新市场，广义的讲，它就能保持就业水平和生活水平。否则它就必须自然默认生活水平，而且很可能出现就业水平的急剧下降。”奇波拉：*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 pp. 186~187。

E. J. 霍布斯鲍姆怀疑北意大利是否还有别计可图：“意大利的衰落……说明寄生在封建世界身上的‘资本主义’的软弱。因而16世纪意大利人可能控制了最大宗的资本，但却胡乱投放。他们把资本投在建筑上化为固定资本，并在价格革命(自然有利于债务人)期间浪费在外国贷款上，或是把资本从制造业活动转向多种形式的不动产投资上。……可是意大利投资者早就知道太庞大的大教堂有损于商业，所以行动起来相当谨慎。几个世纪的经验已证明，最高利润不能在技术进步乃至生产中取得。……如果他们把大量资本花在非生产方面，那可能仅仅是因为在‘资本主义部门’限度之内，已无进行任何规模的进一步投资的余地。……16世纪末的普遍繁荣……和依赖私人承包商的伟大君主专制国的突然扩大的需求，以及贵族阶级的空前奢侈，延缓了灾难的日子。*Crisis in Europe*, pp. 18~19。

263 A. 范范尼把以下原因作为衰落的重要的解释，尽管这不是唯一的解

释：“在意大利除了在农业中寻求庇护外，没有别的出路，另一方面，他们无法减慢衰落的到来，因为缺少三种东西：(1)缺少大的统一市场或缺少强有力的统一趋势；(2)意大利没有参加伟大的欧洲海洋扩张运动；(3)缺少一个适合意大利经济真实需要的重要经济纲领。”*Storia del lavoro*, p. 48。

264 瘟疫的严重性可从对人口的影响看出：“1630年和1657年的传染病使1580—1629年和1631—1655年粮食颗粒无收，意大利人口退回到1100万的水平。”奇波拉：“Four Centuries of Italian Demographic Development,”载于D.V.格拉斯、D.E.C.埃弗斯利(D.V. Glass & D.E.C. Eversley)主编：*Population in History*(London: Arnold, 1965), p. 573。

265 “土地出售[因而封建资本主义的兴起]遍及整个[意大利]半岛，从皮埃蒙特……到西西里。……”布尔费雷蒂：*Archivio storico lombardo*, IV, p. 21, fn. 30。维拉里为南意大利描述了他所谓的“封建土地[feudo]商业化”过程。*La rivolta antispagnola a Napoli*, p. 164。由国家出售这类土地有利于新封贵族集团的兴起。“这是一个扩大和巩固封建领地的复杂运动，上层资产阶级给与强有力的推动，这个运动也非常有力地肯定了传统贵族的社会经济权力[p. 192]。”一个结果是“城市的封建化[p. 168]”，虽遭到强烈反抗，但无济于事。城市生活方式变了：“封建扩张的最显著结果之一是奢侈品和非生产性商品的消费增长，城市发展新阶段的各省城市中心建起了宫殿、小教堂、别墅、花园[pp. 193~194]。”

266 “严重的低度工业化，多数银行和信贷被外国人控制，出口贸易利润养肥了热那亚、威尼斯和加泰罗尼亚商人，把封建经济的不利条件与现代信贷制度的不利条件结合起来的农业体系，这些使西西里始终是个穷国，永远无法赶上北意大利在中世纪末期获得的领先地位。”柯尼斯贝尔格：*The Government of Sicily*, p. 82。

267 罗佩斯：*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p. 353。布罗代尔写到了17世纪20年代起整个地中海的“经济衰退 [reflux]。”“L'économie de la Méditerranée au XVIIe siècle,” *Les Cahiers de Tunisie*, IV, 14, 2e trimestre, 1954, p. 195。伊曼纽尔·勒鲁瓦·拉杜里谈到这“[从1620年起]折磨着意大利人、卡斯蒂利亚人和西籍美洲人的衰落 [décroissance] 的麻疯病人。”*Peysans*, p. 636。

第五章 强盛的中心国家：阶级的形成与国际商业

“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交替出现是现代世界历史中的持久主题之一。尽管观念上的交替的确存在，但我并不是指这一点，而是指二者在组织上的交替。在某些时候，主要的政治和经济机构适合于在国际舞台上的运作，并且认为地区性的利益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发展直接地联系在一起。在另外一些时候，社会活动角色倾向致力于当地的事，倾向于把巩固国家边界作为头等大事，进而对边界以外的事采取一种相对不关心的态度。这当然仅仅是倾向，并非所有的社会活动主体都按主导的趋势行动，并且活动主体们既无责任也不可能保持一致。

我要强调的是，我是在讨论组织上的趋势，而不是结构上的趋势。问题不在于世界经济体是否更多或更少地一体化，也不在于这些趋势是在加强还是在削弱，更不在于财产权是否更多地或更少地集中。这些结构变量是组织选择的基础，但两者的相互关系是长期的，而不是中期的。组织选择是政治上的选择，是人们对最能确保其利益的形式作出的决策。

在“第二个”16世纪，在卡托—康布雷西和约之后，经济平衡行将动摇。欧洲西北部变成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的中心地带。现在可以看一看，是什么给了英国和法国这种原动力。既然工业部门的兴起是这幅历史画面中的重要因素，让我们看看正在发生哪种形式的工业变迁，看看英格兰是怎样特别地从中大为获益。

在“第二个”16世纪中工业变迁的最重要的方面并不在于其

技术的革新(尽管有一些),也不在于其社会组织。工厂和大规模生产在当时尚未出现。欧洲经济体的工业生产的总体水平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多梅尼科·塞拉提醒我们,尽管有作为“延长的 16 世纪的所有经济发展,”欧洲的工业部门在 1700 年建成时,更像它的中世纪的前辈,而不是像 19 世纪的后代。”¹

关键性的变化在于工业的地理分布。直至 1500 年前后,欧洲各地分布着一些工业活动的中心点。“欧洲的工业支柱从佛兰德斯一直延伸到托斯卡纳。”²但各地还有一些工业。从大约 1550 年起,工业活动开始集中在某些“西北”欧国家,并且在其他欧洲国家衰落了。这种衰落的程度是惊人的,以至于冲击了一个又一个组成查理五世的帝国的地区。³

当工业在一些地区显著衰落时,在欧洲其余地区工业似乎分为两大类。约翰·内夫将意大利北部、法国和瑞士划为一类,将“北欧”(英格兰、荷兰共和国、瑞典、丹麦和苏格兰)划为另一类。据内夫称:

在[前一类]中艺术品和奢侈品工业的产量有明显增加,艺术行业和手工业有了新发展,但在重工业的生产上仅有微小的增加,产量没有显著变化;在[后一类]中,重工业有扩展,因而产量也增加了。这是此前所没有的。⁴

塞拉所划的地理界线略有不同。他将佛兰德斯和南德意志与意大利北部一同划在衰落的地区。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样划是很有道理的。他没有提及瑞士。他区分了瑞典与法国;瑞典、法国显示出一些成就,而英国和荷兰共和国的成就则“更显著得多”。⁵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都建立起“工业活动的广大范围。”⁶

然而,两位作者都同意英格兰的崛起,尤其是当我们想到许多人将中世纪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关系描述为“殖民地性质”时,⁷这种崛起就更加惊人。内夫指出,直到 1547 年英国“同包括法国在内的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相比,在工业上仍处于下游。”然而,由于英国

的工业扩张,尤其是在1575年到1620年之间,“这两种类型的国家地位[开始]颠倒过来。”⁸

中世纪晚期,英国出口贸易的构成发生变化,从而贸易的对象也发生变化。他们开始成为原料——谷物、羊毛,以及较少程度上的金属和皮革——的供应者。16世纪以前,这几项产品的出口相对下降,其中谷物是绝对下降。呢绒成为英国的主要出口产品。

谷物(尤其是小麦)从14世纪以来地位不断下降。这部分归因于东欧开始出口粮食,并吸收了国际粮食市场的很大一部分。这本来可以有助于抑制英国生产过度扩大的趋势。⁹然而,正如我们所知,英国封建领地制却趋于解体。这往往被解释为人口减少、价格水平下降(特别是谷物价格)和高生活水平的结果。固然,伦敦市场在15世纪和16世纪的成长导致了对小麦的新需求。¹⁰但到这时,英格兰的领地已经解体,粮食部分地从海外供给。¹¹尽管英国仍然是欧洲大陆的“殖民地”,¹²但爱尔兰和挪威已成为英国的经济“殖民地”。这段时间威尔士从法律上合并到英国国王治下,它为英格兰提供了内部殖民地,当时特别致力于养牛业。¹³

羊毛出口贸易在15世纪“已经持续下降,”¹⁴这是由于西班牙的竞争、纺织品出口的上扬、英国本身的纺织品工业对羊毛的吸收。尤其是国家将对羊毛征收出口税作为财政手段,以此作为新生的英国呢绒业的关税屏障。¹⁵到1614年,羊毛出口被正式禁止。此时英国力图使爱尔兰从事羊毛贸易,将爱尔兰变为羊毛而不是呢绒的输出地,并且只对英国输出。¹⁶

英国的纺织工业有两个特点,对崛起的世界经济体有重要意义。这就是在英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乡村工业,并且导致英格兰寻求更广阔的出口市场。

我们在前一章已谈到玛丽安·马洛维斯特的理论:正如在欧洲的其他一些地区一样,在英国,14、15世纪的衰退引起农业收入的剧减,导致了乡村纺织工业的出现,以此来增加收入。从资本家的观点看,乡村工业还具有避免城市行会强加的高工资的好处,¹⁷

其缩呢漂洗机作坊还有利用廉价水力的优越性。¹⁸这些乡村工业生产出的纺织品“不具备最高的质量，但价格较为低廉，所以其价格在贫困化了的贵族和其他较不富裕的消费者的支付能力之内。”¹⁹英格兰乡村纺织工业的这种扩张对弥补任何城市中心的衰落是绰绰有余的。²⁰但在经济紧缩的时期，内部市场太小，不足以支撑这一工业，“因此，这一工业不得不寻找国外市场。这一点……英格兰和荷兰从14世纪下半叶起，成功地做到了。”²¹

这样，纺织品成为英国出口贸易的中心，这相对于自13世纪以来谷物出口起更大作用的情况是一个转变，这一转变是在波斯坦所说的“早熟的重商主义”的范围内发生的。²²其内容之一是排除外国商人，尤其是意大利商人。这一过程是在15世纪完成的，²³肯定是很困难地完成的。²⁴排除汉萨同盟的商人更困难，但到16世纪这个过程也完成了。²⁵

呢绒贸易给英国造成很大困难。在许多市场进行销售的必要性意味着英国会因为竞争和政治困难而易于遭受更多的损失。这种损失比来自于相对地受到保护的羊毛贸易的损失更大。²⁶实际上，由于其不受保护的地位，呢绒贸易在15世纪遭受了多次挫折。波斯坦和宾多夫都把这几次的挫折看成是新的海外贸易商的商业组织伦敦冒险商人协会(Fellowship of Merchant Adventurers)产生的原因。该会正式成立于1486年，垄断了同安特卫普的出口联系。²⁷但英国在市场的广度上所受的损失，在数量上得到了弥补。进而，他们被迫进行合理化并提高效率。其原因正如宾多夫所指出的：“新情况不仅意味着对呢绒的需求量的增加，尤其是购买者所喜爱的一些特定品种；更重要的是，在一特定时间内要求有更多的呢绒在海外市场交货。”²⁸并且，英国方面比荷兰更统一，而荷兰为城市间的竞争所困扰。这样伦敦冒险商人协会就能“有意避免由于单独利用某一城市而受的约束”，²⁹从而在经济上占据了更有利的讨价还价的地位。

英国的贸易地位还有一个更积极的方面：它的税收比一些老

商业中心(佛兰德斯、意大利北部)要轻,其技术组织更先进,因而更经济,于是早在“第一个”16世纪初就具有更有利的竞争优势。³⁰这样在“第二个”16世纪,英国已有了繁荣的出口贸易,其中2/3是对安特卫普,1/3是对法国和伊比利亚半岛。它得自同哈布斯堡王朝各地区贸易的顺差的金条,抵销了它与法国贸易的净逆差。在伊丽莎白时代之初,英国的海外贸易已是光彩夺目。³¹

在“第二个”16世纪开始时,英国不仅有经济优势,同时也具有政治优势。可以说:英国内部从较早时期就享有独一无二的统一。³²在这里我们不考察其原因,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讨论过了。但要注意到,对其解释分成两种观点:中世纪社会结构的形式特别有助于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国的发展;³³英国对外隔绝的自然地理状况,在君主集中权力的奋进中的障碍要比欧洲大陆其他地区少。³⁴

基于这样的解释,让我们看看都铎王朝的君主们是如何充分利用这些“自然”机会的绝大部分的,并以此来解释英国在“第二个”16世纪寻求暂时的工业优势的能力。

因素之一是有时被称为亨利或都铎王朝“行政革命”的东西,这是埃尔顿提出的。“行政革命”发生在1530—1542年间,是在“最激进的现代化分子”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影响下发生的。³⁵埃尔顿称这一时期是一个真正的变化时期,此间产生了现代主权国家:“都铎建立的是一个民族君主国,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英格兰是新出现的。在表面上强调君权的同时,实际上已经强调了其民族国家的性质。”³⁶行政革命是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势力所要求的与之更加协调的伴生物。如果英国将在世界经济体的构架内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它就不能是一些某种程度上分离的经济单位。³⁷

埃尔顿看到一系列新程序的建立:新的财政管理方式,在首席国务大臣(principal secretary)之下建立的行政集中,作为一个协调场合的枢密院的组建,王室的合理化,其中每一项都涉及到“沿着更大的准确性、专业化和官僚秩序的方向进行重组。”³⁸埃尔顿的著

作激起一场无休止的论战。论战中历史学家在没有计量资料的情况下争论一些“不同点”所达到的质的跳跃的程度。³⁹

亨利的改革到底是不是新的？行政的变化真是革命性的，抑或仅仅是自 14 世纪到 17 世纪的连续进程中的一步？我觉得克里斯托弗·希尔似乎持有一种比较公允的观点：

整个中世纪 [这种] 起伏在继续着：当国王力量虚弱或国王尚未成年时，就会出现更多的贵族控制下的“官僚”政府；当国王强大时，就会出现国王个人控制下的“王室”政府。但在 16 世纪这种循环被打破了，政府各部门“走出宫廷”，但仍处在国王控制之下。⁴⁰

正如希尔所提醒我们的，这个加强国家行政力量的时期同时也是“英国历史上自 1066 年以来唯一没有海外属地（爱尔兰除外）的时期。”⁴¹所以政府可以只考虑内部事务。其结果是十分直接和重要的。

英格兰能够开发一个作为文化和经济上的统一力量的强大首府。⁴²并且英格兰可以在没有常备军的情况下保持国内和平，而此时欧洲大陆则动荡不已。这是英国工业发展的部分原因。⁴³为什么英国会摆脱欧洲大陆的宗教战争呢？当时存在着沃纳姆所讨论的那种情况：在卡托—康布雷西和约之后的那个阶段，“英伦诸岛内部的不稳定（很大程度上是由英国王位继承不确定引起的）使这里成为一个危险地区和西欧敌对的焦点。”⁴⁴主要是因为这种敌对与法兰西帝国和西班牙帝国的相对疲弱（对此我们已详细说明），加上 1559 年至尊法规（Act of Supremacy）大胆地将英国建立为一个基督教圣公会国家，⁴⁵这些因素“使得西欧第三个强权的兴起成为可能，也使得用多极力量的平衡最终取代哈布斯堡和瓦卢阿两个帝国主义成为可能。”⁴⁶

相对的内部和平和不设常备军也意味着对税收的需要较小，

还意味着通过出卖职位使官僚集团的膨胀超过其有效的规模。⁴⁷中央权力的扩张,更多地是通过建立一个更有效的官僚集团,而不是通过建立更大的(同时也是更难以负担的)官僚集团。君主本人作为英格兰的大土地所有者的经济地位也使中央权力的扩张成为可能。⁴⁸但是作为一个相对孤立的和统一的民族经济中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且这个民族经济的力量在于其新兴工业,那么国王的利益在哪里呢?无疑国王的利益是模糊的,因为作为土地所有者,他要极力增加他从土地上得到的收入,而作为国王他要极力增加他从土地所有者那里得来的税收。⁴⁹一个解决这一两难困境的办法就是国王减弱他作为土地所有者的身份。但是国王必须找到可替代的财源。最后到1610年,国王向议会提出了“大契约”(Great Contract)的建议——用封建权力换取年金。⁵⁰由于年金多少问题未达成协议,这一提议未获通过。因为从王室地租得到的收入逐渐减少,这一失败将促成这个时代的政治紧张局势。

内部不稳定和内部和平、行政革命但官僚集团相对较小、全国性的市场网络和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国王——这个奇特的混合物使艾尔默认为这“既是一个悖论又是一个自明之理,那就是斯图亚特早期的英格兰在一段时期内既是一个‘被管得很多’的国家,又是一个‘几乎没有政府’的国家。”⁵¹这一悖论实际上是英国相对成功的秘密。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转向现代英国史学所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革命前一个世纪的英国上层阶级的性质,以及争论很多的“乡绅”的角色。

阅读关于这一辩论的文献时,赫克斯特所说的“席卷乡绅的风暴”⁵²给人一种观看一连串又快又长的乒乓球对攻的感觉。在这里每一击都被精彩地挡回去。它要求把注意力分散在两方面,而不是集中在一方面,以便认识到这里有两个纠缠在一起的争论:一个是关于“第二个”16世纪的英国历史的实质性问题,另一个是现代社会科学论战中的基本方面。从这种认识出发,就必须集中地注意到:在论战中间一些人实际上很快地从一方转向另一方。这样就造

成一种单一的一直向前的球赛的错觉。

如果这一争论难以阐明,那是因为事情本身太复杂。先来看看对土地所有权问题的有关思考。

斯普纳指出,约1540年至1560年震动欧洲的经济危机“在英格兰特别严重”。⁵³毫无疑问,这是官方宣布宗教改革的因素之一。这个改革使没收修道院和其他教会财产成为可能。然后国王出卖了这批土地中的绝大部分,一是提供直接的收入,二是作为政治巩固的手段。这样就给予购买者以克里斯托弗·希尔所说的“新教的既得利益。”⁵⁴“这一政策显著地扩大了在市场上购买的土地的数量。这加速了资本主义运行方式扩展的整个过程,其速度和程度都是其他欧洲国家(可能除了尼德兰北部)在当时所不曾经历过的。”⁵⁵被出卖的土地又被转卖(经常是多次转手)。所有这些在其后的75年中将向什么方向发展?这一点似乎是争论的基点之一。

对R.H. 托尼在其早期的文章中提出的两个论点似乎没有什么争议。论点之一是:“土地市场上活跃发展的趋势在总体上是增加中等规模财产的数量,同时减少最大的财产的数量。”⁵⁶然而,对于谁拥有这些“中等规模”的财产,是贵族还是“乡绅”,就不一定要说什么了。⁵⁷托尼提出的第二个观点是土地转卖最终导致“更具商业色彩的农业。”⁵⁸对此,相对而言也几乎没有争论。

但是那些控制土地的人是什么社会等级呢?争论集中在这里。这不是一个语义学的问题,但语义学又起了作用,因为每个人都赋予贵族、乡绅(上层乡绅、下层乡绅、纯粹的乡绅、绅士)和自耕农以不同的含义。学者们对此激烈地争论并非偶然,因为从整体来看,英国历史的这一阶段不仅是经济发生变化和个人的社会流动性很大的时期,而且是一个类别发生变化的时期。不仅我们不能肯定如何界定有意义的社会集团,当时的人们也不能。⁵⁹然而指明一个概念在一定时期有变化并不是说这个概念没有用处。这应促进学者怀疑的勇气。

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讨论中的术语出发。让我们一个

接一个地考察贵族、乡绅和自耕农。但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必须记住：“经济变化正在加速促使[那些控制土地的人，无论他们的身份是什么]更有进取心的人转用新的方式管理财产。……如果他们使自己的农场管理符合新的商业条件，他们就会多获收益。如果他们保守地坚持沿用旧的方法，他们就一定会受到很大损失。”⁶⁰看来十分清楚，在社会地位和适应资本主义农业的需要这两者之间并没有普遍的联系。劳伦斯·斯通把贵族描述为对大地产“经营不善”的罪人，并且“对挥霍浪费有着日益浓厚的兴趣，”以致于“收入和开支之间距离由很小的缝隙发展为巨大的鸿沟。”⁶¹再者，贵族不得不承担高昂的诉讼和公务的费用，因为“都铎王朝是通过一个不被支付工资的官僚机构来运行的。”⁶²但是他们增加收入的努力是徒劳的：他们出卖长期的租约以换取短期的现金收入；他们负债过度；他们依赖于国家的恩赐直到国家不能或不愿再向他们提供这种恩赐。所有这一切都是毫无用处的：

贵族在经济上物力和财力被消耗的过程……毫不间断地贯穿于整个伊丽莎白时期。到1603年，都铎王朝社会的整个统治集团结构似乎已经到了解体的边缘。⁶³

然而正是同一位作者在数年后又为这群伊丽莎白时代的贵族的想象力和事业心唱起赞歌：

在这一时期，贵族充当了一个其他任何一个阶层，包括乡绅和商人，所无法也不愿与之竞争的角色。……这一阶段贵族的重要性更是由于他们愿意鼓励和资助新的冒险事业。这些冒险事业被认为风险很大，因而不能确保更谨慎的社会集团的支持。由于大型矿业和冶金工业在都铎时期还是新鲜的事物，他们在这些行业的扩展中起了带头作用。由于大洋贸易和探险也是新鲜事物，他们再次在其中发挥了突出作用。⁶⁴

在他们的领地上似乎也不缺乏这种开创性：

旧贵族令人惊讶地表现出他们愿意在自己的领地上开拓新的财源。……在 1558 年和 1642 年间贵族较之乡绅相对地在经济上和社会上衰落了，但这显然不能归结于他们缺乏开创性。⁶⁵

把斯通的这两种描述调和起来是很困难的，由于斯通关于贵族财政危机的程度的数据遭到如此多的攻击，也由于他部分地而非全部地退却了，“我们可以就教于特雷弗-罗珀：

如果“1600 年时 2/3 的英国贵族不仅是入不敷出，而且已濒于破产，”……那么我们怎么能解释这一事实，即他们不仅从这一迫近的崩溃中恢复过来，而且度过了此后长达 60 年的更大的危机？他们的奢侈在这些年中并没有减少，……他们是怎样做的呢？⁶⁷

特雷弗-罗珀的解释是，贵族的这种境况“尽管是真实的，但绝不像斯通先生根据他那些夸大的数字所想象的那么严重。”并且他们“坚守”着他们的土地，而 1600 年以后地价的上涨“比詹姆士国王所做的和其他任何国王所能做的更能”保持他们的财富。“然而，结果是斯通并非不同意这点。尽管他认为地价上涨是从 1620 年开始的，他仍说道：

即使是最低能的 [土地所有者阶级的成员] 也能从 17 世纪早期的平均地租大幅度上升中获利。此后，价格水平降低了低效的地产管理的重要性。⁶⁹

至于 J.H. 赫克斯特，他一方面攻击斯通和托尼，另一方面攻

击特雷弗-罗珀,他认为:

1580年前后土地市场开始兴旺起来,并似乎要持续到此后半世纪。……总的看来,地价在总体上的上涨对于那些拥有最多土地并从中获利的人来说是最有利可图的。就是说:恰恰正是拥有土地的阶级中的这一部分人被托尼和特雷弗-罗珀断定为堕入经济衰落之中。⁷⁰

然而除了双方关于具体时间的相互纠缠外,赫克斯特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与斯通和特雷弗-罗珀的立场并没有不同。最后,让我们来看一看第四种观点。克里斯托弗·希尔的观点在许多方面与前三种观点不同,在这个问题上,他说:

至于贵族当中的一部分,宗教改革给他们带来了经济上的损失,尽管这不是对整个阶级而言。我们必须小心地不要把[土地转移]过程中的任何事物都看成是“反封建”的。的确,从某种意义上[修道院]的解体导致了对封建主义的强化,因为这增加了君主的所有权。……转到君主手中的教会财产很快就流失了。……于是在短期内,宗教改革在总体上加强了一般的拥有土地的统治阶级的地位,尽管它削弱了到此时仍实力雄厚的这个阶级的某些成员。⁷¹

关于贵族的争论实际上要比乍看上去少得多,我们怎么能对作为这一争论的最初焦点的乡绅也持同样的观点呢?乡绅当然是一个更加模糊的概念。库珀说明了某些困难:

贵族是由享受法律所规定的地位的个人所组成的集团。这种地位……仅为一个家庭中的一位男性成员所享有。那么贵族的幼子及其后代将会成为托尼教授所作的分类中的乡

绅。大地主在他们能力所及的时候,给予他们的儿子的金钱和土地往往比有时想像的要慷慨得多。……这种供给当然会影响到财产的分配。……乡绅像贵族一样,它的补充不仅来自下面,而且也来自上面。再者,从另一方面看,这些集团是互不相容的:贵族是一个被法律地位严格地加以界定的集团,而乡绅则不能从法律上加以界定。这是一种按财产和一定程度上按生活方式的分类。……尽管在 1603 年以后贵族爵位可以出卖,但晋升贵族从来不是单单视财富和生活方式而定。⁷²

那么什么是乡绅呢?乡绅还不是贵族,但也不是“自耕农”,后者同乡绅一样也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术语。但我们发现包括在“乡绅”中的不仅有贵族的幼子,还有其他不同阶层如 knights(骑士)、esquires(地位次于骑士的绅士)和 gentlemen(属有土地的绅士阶级但不是贵族)。这应使当时的事情清晰可辨。在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中,出现大量反映不同身份的级别,以规定等级、义务、特权和荣誉。等级在不断地演化着,家族的连续性当然也不稳定,与等级相关的收入也有变化。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被新的一类“地主”(它可以据财产规模进行细分)在社会分层系统中反映出来。乡绅作为一个涵盖资本主义地主的称谓而出现。其他的称谓还没有消失,但“乡绅”是慢慢扩大到吸收和消灭其他名称的一个群体标签。在伊丽莎白时代,除“乡绅”之外,起码还有“贵族”和“自耕农”。在 20 世纪,则实际上只有“农场主”(farmers)了。如果我们要使“乡绅”概念具体化,无论是按过去某一时期所给予的定义,或者按我们推断的某一时期的社会现实来予以确定,我们都不能解决问题。关于“乡绅”的整个要点是,它不仅是一个形成中的阶级,而且是一个形成中的概念。然而这是旧瓶装新酒。我觉得 F.J. 费希尔对此讲得尤为正确:“16 世纪和 17 世纪经济变化的影响,与其说是产生了一些新的人群划分,不如说是给已存在的各类人等提供了新的机会,并用新精神激励他们。”⁷³

与此相反，在我看来克里斯托弗·希尔似乎在这个问题的论述中增加了混乱：

我们肯定必须从“乡绅”不是一个经济阶级这一事实出发。他们只是社会的和法律意义上的阶级。他们在经济上是分裂的。1640年前发生通货膨胀的一个世纪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此间在社会的各集团中都发生了经济分化。一些自耕农上升为绅士，另外一些则衰落了。一些贵族积累了大量田产，另一些则濒于破产。如果我们从这个阶级中抽取样品，则我们很容易论证“乡绅”是“兴起”或者是“衰落”，因为一些家族是这种情况，而另一些家族则是那种情况。⁷⁴

在我看来，尽管对社会事实的经验性描述是没有错误的，但在其理论性归纳中却忽略了一点。准确地说是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朱利安·克伦威尔说：“乡绅的标志是土地所有权。”⁷⁵当时这个称谓正在用来指所有那些在生产方式中具有相同关系的一类人：即那些为市场生产的非限定继承土地的所有者。这一过程的明确性被以下事实搞乱了，即人们仍然看重古老的法律范畴所认可的社会特权的享有，⁷⁶但共同的经济推动才是16世纪及其后使这一范畴趋于一致的决定性的主题。在同一个经济阶级中，有些人可能比其他人更富有，在市场中比其他人更成功。收入上的差别并不表明这一类人不是一个阶级。

那么，这一点在关于乡绅的著名讨论中说明了些什么呢？托尼的基本观点是：乡绅是这样一个集团，其生活方式比挥霍无度的贵族和失去信用的投机商更好地适应了通货膨胀的年代里生存的需要。“比起那些经营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财产的冒险商人，地方上的乡绅则是仅需对付抢劫者的定居的居民。”⁷⁷他们具有法国的乡绅所无法企及的优势：即他们“由于英国家族体系的严格而为数很少并且很强韧，这一体系以牺牲个人来维护体制。”⁷⁸他们在政治

上也远比荷兰乡绅强大。荷兰乡绅“完全割断了同农村根基的联系，”⁷⁹因为他们“把对他们作为头面人物至关重要的在当地公众中的声望与那种小贵族特有的气质结合起来，以其机智而又冷酷的现实主义打出每一张牌。”⁸⁰这样他们体现了精英阶层的传承的进程，这一进程被皮雷尼认为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史的实质。⁸¹结果是“政治制度与经济现实不相协调”。这必然导致“客观力量十分强大，以至[议会和统治者都无法控制]，终于引发了由‘崛起的’乡绅所领导的英国革命。”⁸²

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除了向托尼的统计数字和编制程序提出挑战外，⁸³特雷弗-罗珀批评的基点是他认为政治活动舞台的基础模式是大错特错的：

我已指出：官方机构而不是土地才是许多无疑“正在崛起”的家族的基础。在此我将进一步说明。我将把“宫廷”和“国家”之间的差别、官员和单纯的地主之间的差别，而不是“老”地主和“新”地主之间的差别，贵族和乡绅之间的差别，作为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地产社会的显著差别。

亨利八世的官员们完成了教产国有化，他们发了什么财呢？自然他们占了许多便宜，他们在地方的代表——在乡村中有一官半职的乡绅——也占了便宜。

但没有这样的官职的纯粹的乡绅怎么样了呢？奖赏越有价值，他们越是沾不上边。⁸⁴

这样，英国内战至少可以部分地被看作：被过度课税的“纯粹的”乡绅对文艺复兴式的宫廷的反叛。

最后，J.H. 赫克斯特坚持认为存在着一个“英国地主中的第三集团。”⁸⁵他说，观察一下议会对斯图亚特王朝的对抗，就会看出这个集团不是从托尼所说的“渴望得到权力的乡村中产阶级”中划分出来的，因为他们是“富裕的农村绅士”（这一点真的同托尼的观

点如此不同吗?);他们也不是特雷弗-罗珀所说的“愤怒的深受压迫的庄稼汉”,因为他们是一个“少见的教养良好的集团”。(这一点真的不能同特雷弗-罗珀相容吗?)⁸⁶

然而,如果我们接受赫克斯特的具体论断,我们就会被引向相当清晰的关于乡绅的社会角色的图景,尽管这个图景显然并不是他试图引向的图景。他在自己的批评中指出一点说:“我们仍然停留在托尼起初探索的问题上。……为什么在这个特定的历史关头,‘国家’在顶端下面的社会阶层中找到了它的领导?为什么是在乡绅中而不是在贵族中?”⁸⁷赫克斯特的回答基本上是:乡绅在政治上兴起的原因是国王的军事力量不断上升,以及地方权贵军事力量的衰落。“因而都铎时期的乡绅比他们在兰开斯特时代和约克时代的先辈在行动上有很大的独立性……”⁸⁸正如许多人所见到的,谁还说过别的什么呢?正如斯通指出:“赫克斯特先生在紧要关头突然站出来,他关于乡绅政治力量兴起的解释全然过于肤浅;据他说是贵族失去了军事控制权。这没错,但为什么会这样?”⁸⁹这样我们就转回到我们所讨论的那些关键性的变动(正如托尼和特雷弗-罗珀所讨论的):官僚制国家机器的成长、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⁹⁰

赫克斯特接下去着手清算“中产阶级的神话。”这里他实际上是在向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而不是向“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挑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为现代经济史做了很大贡献。⁹¹实际上他自己的分析在实质上与托尼和特雷弗-罗珀相去并非很远。他说,都铎君主们并非亲中产阶级,只是亲“都铎商人——银行家内部的一小部分人”,以及一个“与宫廷有密切联系的资本家集团”。⁹²

都铎王朝的政策具有很强的连续性:

[它]通常对既得利益集团相当温和。它保护老的利益集团,并创造新生企业形式的利益集团。……都铎君主们对变化的潮流既不逆之而行,也不听之任之,他们的政策是引导这种

变化，并且正如他们所说，是将这种变化引向在良好秩序下进行安安稳稳地统治。⁹³

并且赫克斯特补充说，作为一项上策，“都铎王朝把中产阶级看作国家的一群乳牛。”⁹⁴

但正是劳伦斯·斯通强调都铎王朝实行经济控制与偏袒一小群企业家而不是整个资产阶级的程度，及其把加强国家军事力量放在重要地位的程度。⁹⁵特雷弗-罗珀的论点的实质则是乡绅反对变成乳牛群。

最后赫克斯特称：资本主义精神仅仅在16世纪才兴起并非事实，因为它早已存在。“16世纪的地主期待以城市商人的“范例和激励”来从事资本主义农业⁹⁶的说法也不是事实。的确如此。但这样我们就返回到新兴资产阶级从各种社会背景的人们中补充力量的图景中来。”⁹⁷

为什么这会是一件奇怪的事？正如我们已看到的，这些都发生在欧洲经济体中。⁹⁸无疑，“乡绅”内部的不同的集团有不同的政治表现。例如，巴林顿·莫尔就对特雷弗-罗珀所说的“衰落的乡绅”的政治对抗有一点引申，使这一现象可同托尼所说的“崛起的乡绅”的政治对抗完全调和起来。他引用托尼的话说：“大量的乡绅止步不前或走下坡路。却很容易发现一些赶上浪潮的贵族积累了大量的财产。”⁹⁹然后莫尔谈到“止步不前”的那部分人：

这些“怒气冲天的人和心怀不满的人”可能成为支持克伦威尔和清教徒革命的激进分子的一部分，尽管这种驱动力主要发端于社会的下层。这样，在商业和某些工业的影响之下，英国社会自上向下四分五裂，由相同的力量产生的激进的不满情绪在一时之间大爆发。……在这一过程中，当旧秩序解体时，由于长期经济趋势而失败的那部分社会力量走向前台，做了大量摧毁旧制度的暴烈的“肮脏工作”，从而为一套新制度

的建立扫清了道路。在英国,主要的肮脏活动就是处决查理一世的事件。¹⁰⁰

赫克斯特指出有三种地主,那就是“新兴”地主、“没落”地主和其他地主,这大概是正确的。并且他认为政治对抗潮流与前两类的关联比同第三类的关联多的观点也似乎言之有理。这些细节对早期斯图亚特时代政治的解释是至关重要的¹⁰¹。为了评价社会变迁的趋势,把乡绅的兴起看作一个社会范畴,要比把它看作是一种经济力量和政治实体更为重要得多。

如果单纯地致力于具体细节而不能进行归纳和总结,同样会使长期变化模糊不清。劳伦斯·斯通在对英国这一阶段社会流动的复杂性作了这样一个具体分析之后,指出这种分析形式来自英国社会的两个重要变迁:

第一个是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上层阶级的数量相对增加,他们的实际收入上涨;穷人的数量也相对增加而实际收入下降;第二个是上层各阶级中出现了更大程度的平等,首先是更大的乡绅集团的财富和力量比贵族的财富和力量增加了,其次是贸易人员和专业人员在财富、人数、社会地位方面相对于土地所有者阶级上升了。¹⁰²

J. 赫斯特菲尔德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并强调它对“第二个”16世纪的政治影响:

在英格兰,贵族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等级(*caste*),拥有土地的乡绅从来没有成为小贵族。故而,中等阶级和上层阶级相互之间的关系远比他们各自同君主的关系更为密切;并且,在危机时期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远比他们同君主之间的共同点更多。¹⁰³

斯通和赫斯特菲尔德都在这里展示了关键的一点：在一个新阶级崛起的过程中，贵族—乡绅原来的“旧”的区别正在失去其重要意义。正如佩雷·扎戈林对形势的总结：在延长的16世纪，英国的总趋势是，“让那些能够在农业、贸易和工业领域投资的人……得以支配社会生活。”¹⁰⁴并且这个联合而成的阶级是以牺牲农民来取得利益的。¹⁰⁵英国的状况很好地说明了拉铁摩尔的总结：“在一个逐步变化的社会中，总是那些统治者紧紧抓住旧的秩序中所剩下的有利的东西，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新的因素，[及时地导向]相当程度的多样化……”¹⁰⁶

如果“乡绅”仅仅是资本主义农场主成为一个阶级时的另一个名称，那么自耕农怎么样了？自耕农这个词正如乡绅一词，是一个以前早有的社会—法律词语，其内涵在16世纪中不断发展。坎贝尔在她关于英国自耕农的著作中，清理了所有关于这个词的各种用法，以及这个词同农场主、绅士、自由持有农、庄稼汉和雇工等词语的联系，尖锐地指出，“本来从一开始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看出，最明显的恰恰就是被排除的那些特征”¹⁰⁷。她的结论是：

从自耕农同其他集团在社会结构的关系上看，自耕农的地位表现出一种相当明确的特性。他们是本质上的乡村中产阶级。他们主要考虑的是土地和农业利益。他们是生活在“高尚与渴望之间的适中地带”的一个群体。他们被看作是“中间居民”，在居于乡绅和农民之间的条件下……服务，为英国服务¹⁰⁸。

为了评估这一群体的作用，我们必须回到前一章中所讨论过的一个题目中去：英国农业中的土地所有权制度的演化。马克思在他对资本主义地租的起源的讨论中，提出了关键的一点。这一点在他的观点的解释中经常被忽视：

地租一旦取得货币地租的形式，同时交租农民和土地所有者的关系一旦取得契约的形式，——这种转化一般只是在世界市场、商业和工业已有一定的比较高的发展程度以后才有可能——也就必然出现租赁土地给资本家的现象。这些资本家一向置身在农村范围之外，现在却把他们在城市中获得的资本和城市中已经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产品只是作为商品，并且只是作为占有剩余价值的手段来生产的形式，带到农村和农业中来。这个形式只有在那些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期支配着世界市场的国家，才能成为一般的常规。¹⁰⁹

马克思的观点的中肯之处在于土地所有权制度的转变过程不仅仅为英国所有，这是很明显的。但当英国（以及荷兰共和国）在第二个16世纪越来越成为欧洲经济的中心地带（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更甚于16世纪），这一进程在这些地区走得更远和进行得更快，这完全是因为这些地区是中心地区。关键的是：资源被更有效地利用，以便从世界经济体的贸易和财政的中心地位中获益。这一点，在英国赋予拥有土地的阶级走向一种完全可转让的土地制度；而在波兰（甚至可以说在法国南部）这种情况却限制了向这一方向转变。

使土地完全可以转让，使产品可作为商品出售是农业的首要考虑，人们不仅必须消除各种封建地租制度，还必须消除小农场主（the peasant farmer），因为小农紧握土地不放而从事边际类型的生产活动，所得补偿不会使短期利润增加到最大限度。那么，这种消除在事实上是怎样完成的呢？

哈巴库克指出有三种剥夺小农的途径：把他们从所保有的土地上赶走，并且将他们的土地并入领地；迫使他们放弃终生所有权而改为有限的租金；削减农民的公地权利。他认为在“第二个”16世纪里，只有那些在一段时间内是佃农的农民，或终身是佃农但没有

权力或没有重新订约的农民，易于遭受这几种形式的有效剥夺。他估计这部分农民只占农民总数的 35%。¹¹⁰ 至于出售土地，情况远不是单方面的：

在〔这个〕阶段……当然有从小农手中买得土地的领主（贵族庄园主）；也有一些积累了大量商品以至于达到乡绅等级的小农。在这两种情况下，结果都是小农的财产的减少。但也有一些小农在领地出售时购得大量土地，或取得公簿持有农的租借权。我们还不知道这些交易的最终结果是什么。但总体上情况可能是，把所获之物加在一起对农民是有所得而不是有所失；同时，一方面地主剥夺农民，而另一方面农民在获得财富时也蚕食地主的领地。¹¹¹

那时英国农业的完全资本主义化还未到来。在 16 世纪，自耕农仍有其作用。农业商业化的日益增长在当时不仅给小土地所有者带来“风险”，而且提供“机会”。坎贝尔变得有点罗曼蒂克，认为自耕农颇有英雄气概：

狡诈的地主和渴望得到土地的邻居总是趁机利用别人的不幸。尽管价格的主要趋势是稳定上涨，但有时仍有波动。这种波动来得既突然也无确定规律可循。其他不利因素也增加了当时的不安全。无法控制的传染病不时袭来，引起恐慌。火灾造成损失也是常有的事。各种保险实际上还不为人知。每个人手中都必须有些积蓄以备万一，不然就会负债。……

但在生死关头，除非成功的希望太小，一个人总会奋力求生。尽管有上述种种不确定状况，在英国土地制度史上仍比以往更多地出现了这种情况：拥有工业和大批实业的小人物得到了机会。他们当中能度过难关的人在更高的价格和更

好的市场中发现了赢利的机会，这促使他们更加努力。赚了钱就想赚得更多。¹¹²

如果自耕农不是修道院解体的直接受益者，那他最终也会分享一块饼。¹¹³

正如许多人指出的，在那个时代有两种形式的圈地：圈占大片土地做牧场；为了更有效地耕作而合并小块土地。正是在后一种圈地的进程中，自耕农扮演了主角。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增加了食物供给而没有引起牧场圈地碰到的那种政治上的反对，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具有重要的社会后果。¹¹⁴这些改进部分地来自提高劳动效率的其他一些因素，瑟斯克将其归因于：

加强采用轮作制，同时增加肥料的使用量；使用各种良种；也许最重要的是犁耕农田面积的显著增加，这是开垦荒地和改造牧场的结果。……对耕地施以重肥，当然是以饲养大量牲畜为条件的；而饲养大量牲畜又增加了肉类、羊毛和其他动物产品的供应。使用肥料的牧场和草场的增加，西部农村对草地进行浇灌和其他地区稗草的生长增加了春季放牧的供应，通过利用沼泽地和对沿海滩涂进行改造而增加了夏季放牧的供应。这样，在农耕和畜牧方面的改良接连出现，一项改良往往有助于另一项改良，共同提高了专业化程度和地区间的相互依赖。¹¹⁵

在这段时间中威尔士并入英国的劳动分工有助于农业改良的进程。第一，英格兰法律形式尤其是长子继承制的加强，导致了土地所有权制度的极大的不确定性，这有利于威尔士大地产业的建立。“在威尔士全境，这是一段建立庄园和置办家产的时期。”¹¹⁶在显示财产规模“显著不平等”的……“英国化的低地”，情况更是如此，¹¹⁷我怀疑地主中有很多是英格兰人。在威尔士进行圈地带来的

农业改良的程度似乎比英格兰更大。威尔士直至当时一直为“掠夺性技术”所苦。¹¹⁸然而,这意味着尽管有移向英格兰的人口流动,更多的人却成为流氓无产者中的一部分,他们当中许多人最终成为雇佣兵,这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

坎贝尔说那个年代是一个“渴求土地”的年代。¹¹⁹“在对土地的渴求中没有人比自耕农更贪婪。”¹²⁰这一点明显地为我们从1570年到1640年“大重建”(The Great Rebuilding)期间英格兰的乡村住房中得到的证据所证实。依照W.G. 霍斯金斯的看法,这种工作是由“上层的农民即自耕农和小乡绅进行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来自中世纪的同一社会阶层。”¹²¹劳伦斯·斯通引用了这一事实,然而作为“乡绅兴起”¹²²的更进一步的证据,再一次显示出我们所用的名称的变动性。难道这些自耕农不正是乡绅(资本主义农场主)中资本主义化程度较低的那部分人吗?¹²³

如果看出实际上是谁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圈地过程中蒙受损失,这个问题就会清楚得多。当圈地进行时——无论是牧羊主的大规模圈地还是家境改善的小自耕农的小规模圈地——一大群以前以土地为生的人被迫离开土地,其余的人沦为挣工资干活的无地农业工人。¹²⁴这一点长期被认为是创造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因素,而剩余劳动力是“英国生活商业化”的关键因素。¹²⁵这一变化发生在1540年和1640年之间。在经济压榨中,一小部分人获益,而更多的人则受损。¹²⁶的确,恰恰是将农民从封建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过程,可能又造成另一种形式的贫困化。亚历山大·萨文在他关于都铎时期英格兰的封建农奴制残余的文章中,指明了这样一个悖论:“对16世纪的农奴来说,他对其领主的人身依附在他获得自由时是最不堪忍受的。”¹²⁷这一悖论很容易被揭示。释放农奴不是无偿的,而是需要赎金。的确,赎金肯定是高昂的,因为萨文指出:

对农奴的释放被认为是领主收入的正常来源。……对最后一批农奴的解放是一项有偿的政策。这件事在16世纪是公

开进行的，以至于伊丽莎白的朝臣们把君主授权他们解放皇家领地上一定数量农奴家庭视为皇恩的特殊标志，这就是说；他们能够将赎金据为己有。¹²⁸

农奴们不再必须在庄园领地为主人服为期一周的劳役。¹²⁹然而，“农奴的人身依附成为被勒索的纯粹借口”。¹³⁰这样，在这一进程中，无疑有许多人成为无地的穷人。

在庄稼汉这一阶层消失的实际过程中，我们会得到农民贫困化的进一步证据。一方面，一些“庄稼汉上升为自耕农，而且自耕农和一般农民的差别正在模糊起来。”¹³¹同时，在另一方面，更穷的农民的状况却比身为茅舍农(cottagers)的乡村劳工更加恶化，为了糊口他们需要打短工。¹³²被间歇雇佣的庄稼汉不是希望成为被经常雇佣的劳工吗？

在任何情况下，两种农村劳工都容易在圈地和他们的公地被侵占时受到伤害。特别是公地被侵占，使得他们离乡背井。¹³³埃弗里特指出，农民—自耕农和“贫穷的定居者和流浪者”（他们实际上没有土地，并且经常从别的地方被驱逐出来）之间日益增长的差别，是一个我们可在农村中，特别是新近有人定居的森林地区常见的现象。¹³⁴他还指出，“后一群体由于他们那种半流浪汉的出身，由商业性农业的需要促成的日益增长的季节工队伍是从他们当中大量雇佣的。”¹³⁵

这样又引出有关乞丐和流浪汉这个关键性的政治问题，这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臭名昭彰的特点。¹³⁶弗兰克·艾德洛特认为有三个独立的因素可用来共同解释伊丽莎白时代的流浪汉猛增现象：圈地是肯定的，而且是最重要的；还有都铎时代的和平以及由此而来的贵族收养的大量侍从的解散；还有修道院的解体和他们作为慈善布施者角色的消失。艾德洛特的观点和当时统治者的看法相去不会太远，那就是将这些流浪者看作一个社会问题：

16世纪的流浪汉远非一个软弱无能的和无害的阶层，他们代表了中世纪英格兰的坚实力量。他们当中有许多来自富裕家庭，但在现代英国的经济组织中却找不到有用的位置。他们凶恶狡诈而胆大妄为。他们当中有政治、宗教、社会各方面的不满者和煽动者。因而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他们不仅是有害的，而且是危险的。他们的存在足以使制定法律的人，即从亨利七世及其后的各个君主起，挖空心思寻找一个对策，包括制定法规和保证这些法规的执行。直到1572年、1579年和1601年通过的令人赞叹的济贫法，才最后得以解决这个问题。¹³⁷

这令人赞叹吗？也许是，尽管艾德洛特并非在简单的意义上希望我们赞叹这几个法案。

然而这几个法案确实说明了国家机器所起的作用。首先，让我们注意一下“社会福利”立法。这在此以前是不为人知的，但在这一时期却在许多地方出现了。进而言之，这不是一个不约而同的发明的问题，而是一个有意识的文化传播的问题。¹³⁸第二，这种立法相对于经济转型的关系是模糊的。这肯定是对经济变化导致的社会危机的一种反应，一种避免发生政治叛乱的手段，¹³⁹但其经济意义绝非对资本主义性质的各阶级的直接支持。这是一种稳定政治的形式，其影响对雇主是约束，对劳工也同样是约束，或许更甚。¹⁴⁰16世纪君主对资本主义活动进行限制的政策，与18世纪国家通力合作对大规模的圈地进行干预形成鲜明对照。¹⁴¹

都铎王朝的君主们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们经常被认为“失败”，因为他们的政策的最终结果是英国革命。但也许英国革命应该被看作都铎—斯图亚特君主们的一项“成功”的手段，因为他们用这种手段将革命推迟了如此之久。让我们看看16世纪英国农民在重压下的反应吧。许多人选择做流浪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农民造反。确实发生过农民造反，但应该注意到英国此时的农民造反

比在此前要少，也比同时期的法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地区少。

这每一项对比都值得观察。R.H. 希尔顿认为，16 世纪的圈地运动有一个“预演”。与土地分离的进程可以追溯到 13 世纪。当然存在人口减少的现象，但希尔顿感到穷困是农村地区人口迁移的更本质的原因。¹⁴²然后是充满通货膨胀的“延长的”16 世纪的到来。在东欧，地主强迫农民回到土地，因为扩大的商品粮生产需要这样。英国却走上一条畜牧业的发展道路（这需要较少的劳动力），并提高了农耕生产的效率（这需要较少的劳动力）。大土地所有者并不想直接经营地产，而是寻求租地者。他们更愿意把地租给“资本主义农场主”而不是租给小农。¹⁴³既然这将在农村地区对很多人带来不利，那么农民为什么不更多地进行抵抗呢？希尔顿认为他们太软弱，无力进行抵抗。¹⁴⁴在戴维斯的观察中我们得到进一步证实，在“第一个”16 世纪，农民的反抗相对地比“第二个”16 世纪多，而如果条件的恶劣能完全解释农民的骚动，那就会发生相反的情况。仅仅在 1590 年以后，租金上涨才比价格上涨更快。戴维斯对这一点作出两点解释。一方面，浮动地租的概念在“第一个”16 世纪相对来说还是新的，因而令人不能容忍；而在“第二个”16 世纪，农民已习惯于这一概念。¹⁴⁵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圈地对“自耕农”的影响并不是消极的。¹⁴⁶

让我们比较一下这同一时期英国和法国“自耕农”的命运。戴维斯注意到税赋的重负直接导致了反抗中央政权的造反；而英国的赋税比法国轻。这是因为英国比较小；相对较少腐败，因而官僚集团榨取的财富也较少；地方机构弱小，减少了国家机器的份量，也减少了造反所要消灭的目标。¹⁴⁷

最后，让我们看看最后一项对比：农民在 16 世纪的造反和在 18 世纪的造反。托尼指出这种对比是农民造反“在 16 世纪中期……蔓延”，而“在两百年后相对较少。”尽管圈地作为潜在的原因在这两个时期都存在。¹⁴⁸托尼认为，16 世纪农村地区的骚动“标志着从 15 世纪一个地区内所有阶级联合反抗中央政府的封建叛乱，

过渡到由于经济利益抵触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造反。”¹⁴⁹

那么我们所说的意味着什么呢？似乎 1540—1640 年这一阶段是一个阶级形成的阶段：形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的农业阶级（其中的富有成员被称为“乡绅”，下层成员被称为“自耕农”）。这一时期英国土地集中的社会进程是一个增加整个这一阶级（包括其中较下层的成员）的收入阶段，同时这一进程涉及到无产阶级形成的开始。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还没有稳定地居住在城市中，而是“流浪者”，拥有小块土地以维持生存的雇佣季节工人和城市中的流氓无产阶级。

国家机器并非一个统一的强大的独立力量，而是两种相互冲突的潮流的战场。一种是拥有高贵的传统地位的人，他们至多部分地适应新的经济可能性；一种是那些正在兴起的人（无论从传统地位的角度去看他们有什么样的背景，也无论就他们当时相对的财富而言），他们推动了经济生活的全面商业化。

这两方面力量都在寻求并多次得到政府的支持，但二者都不能确知他们是否能继续从一个力量强大的国家机器受益，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双方都担心另一方会控制国家官僚机构。“社会福利”政策有助于保持秩序，并干涉各种市场力量的全面活动。它使转型顺利进行，因而对运动中的各种力量都有利。

英国在世界经济体中的地位使得这种平衡运行成为可能。由于两大军事强权——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斗争，它得以免遭许多外部干涉。它没有帝国义务负担。¹⁵⁰因而尤其是在东欧原料的支援下，它可以从容地追求经济的专门化。东欧的原料部分地通过与荷兰共和国的商业联盟运入，而后者也想得到躲避军事大国的庇护所，并以保证世界贸易机制的正常运转作为“回报”。英国的国家机器强大到刚够抵御毁灭性的外部势力；但同时又还没有力量去大力支持“传统”势力和国家官僚机构中新的寄生者，因而这两者都不能完全吞掉最强大的生产力创造出的剩余。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处于最有利地位的问题：在政治上相对孤立而在经济上却享有

世界经济体的利益；内部力量相对平衡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国内和平局面，却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专横的国家机器的错误。

有人可能会合情合理地问，那么英国革命是怎样爆发的？现在可以说，我们认为这个时代英国“成功”的证明是革命来得正是时候——既不早也不晚；还有，现代资本主义诸种力量显然已成功地兴起，尽管有他们的所谓“失败”和所谓的旧势力的“复辟”。要评价这个时间问题，我们应该看看三个互相关联的现象：这段时期的结盟政治、移民的类型和所谓的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商业危机。这将促使我们来讨论有关英国革命背景的一些“真实的问题”。

特雷弗-罗珀坚持认为基本冲突是宫廷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如果这是他的关键论点，那么他已经胜利了。因为他的假想对手，例如斯通和希尔，¹⁵¹已经承认了这一点。但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宫廷在玩弄什么样的政治手腕，这种政治策略又是如何同正在进行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联系起来的，这种政治手腕又是怎样成为英国在欧洲世界经济体中的作用的结果和原因的。

国家机器即宫廷，同时集这场戏的主角和各种不同力量的调解人、引导者为一身。这就是一切所谓君主专制国的真相。君主们平衡各种力量，充当权力经纪人；他们影响着各种妥协。但他们希望得到的一个结果是加强自己的力量，成为真正的而不只是理论上和愿望上的专制者。

了解了宫廷这个角色和它的目标的模棱两可性，就可以看到它对资本主义因素的兴起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国王向“资产阶级”大献殷勤，后者是一个包括资本主义地主、富裕农民、专业人员（律师、神职人员、医生）和富裕商人的混合群体。¹⁵²正如托尼所说，国家“因封建叛乱而提心吊胆”，¹⁵³在叛乱中看出实现自己目的的同盟者。但是宫廷毕竟是为贵族所左右的，而国王居于这样一个群体的首位，该群体包括旧贵族、新得到头衔并把它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人及其他为国王服务并渴望进入贵族行列的人。宫廷不可能对破坏等级身份制度持乐观态度，它自己居于这种制度体系的顶

端。实际上它也没有抱这种态度。它爱护这种制度，加强这种制度，精心维护这种制度，为这种制度支付费用。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使所有其他欧洲宫廷相形见绌。

对金钱和对政治盟友的需要，促使宫廷推进商业和商业化。对稳定和服从的需要，使它对新阶级咄咄逼人的成就感到忧虑。就它所具有的权力范围来看，它试图慢慢地使加速进行的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进程停止下来，同时加速国家机构在政治上的集中。在这一点上，都铎王朝时的英国同瓦卢阿王朝时的法国和哈布斯堡王朝时的西班牙没有什么区别。所不同的是同样在 16 世纪的历史背景下和国际地位中，英国的资产阶级相对更加强大，更加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吸收大量旧贵族阶级中的分子。

许多作家指出，在大约 1590—1600 年间，英国政治中有一个关键性时刻，托尼写道：

几乎没有哪个统治者像早期都铎君主们那样毫无顾忌地依照权力的基础在于经济这么一个信条行事。他们扩大了皇家领地，扩大了对小耕作者的保护，这是新的君主政体的两个基本原则。在伊丽莎白女王晚年，头一项政策被严重破坏，而后一项总是不受大土地所有者的欢迎，遭到了更加顽强的对抗。¹⁵⁴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王决策的重心偏向资本主义农场主，对贵族则恰好相反。¹⁵⁵后者为了生存，变得越来越像“新兴乡绅”，因而从农民的观点来看，也同时变得越来越富于剥削性。¹⁵⁶因此，领主和农民之间的联系变少了，并且农民也不愿意在国内冲突中就地方上层对忠诚的呼吁作出反应。¹⁵⁷然而，王室官僚集团本身却变得败落和“挥霍无度”，正如特雷弗-罗珀指出的，这一过程有其自然限度。¹⁵⁸这样，斯通和特雷弗-罗珀都同意，到 1590 年，过度消费导致旧事重演。欧洲的和平（1598 年至 1618 年间的停战）减少了所有

国家的费用。¹⁵⁹在英国,詹姆士一世搞的出卖爵位增加了收入,¹⁶⁰从而避免了危机。危机是避免了,但奢侈却增加了,这是英国国王的双股线政策的必然结果。¹⁶¹

与托尼最初所想的不同,都铎王朝统治的一个世纪可能并没有引起贵族土地所有权的锐减。似乎最后所发生的全部事情是皇家领地部分地转到非贵族的资本主义农场主手中。¹⁶²都铎统治的受益者无疑是贵族和那些能够掌握经济的非贵族。¹⁶³都铎王朝玩弄把戏将他们置于最有利的地位。但“延长的”16世纪行将结束。斯图亚特王朝初期将感觉到它的种种矛盾的紧张形势。这是特雷弗-罗珀的观点:

即使在16世纪90年代,即使一个开支少得多的、比较有效的官僚集团只是因和平而获救;如果16世纪的长期繁荣和17世纪保全的和平中断了,[当时斯图亚特王朝和其他欧洲君主的]这一令人不能容忍的制度怎么能生存下去呢?

实际上,在17世纪20年代,这两种情况都中断了。1618年,布拉格的政治危机使欧洲大国都行动起来……同时欧洲经济……突然遭到一场大萧条——1620年全面“贸易衰落”——的打击。¹⁶⁴

所以我们再次回到世界体系的运作上来。英国对所谓的“17世纪危机”的反应同其他国家有所不同。这正是它能以强劲的力量进入重商主义时代的原因。这种力量的一个方面是其农业的高度商业化,其过程我们已描述过。另一方面则是它的“工业化”。

约翰·内夫认为英国在1540—1640年期间进行了一场“早期工业革命”,而那时的法国却没有。¹⁶⁵他断言在英国有三项主要的进展。一些在此以前只是大陆才有的工业如造纸、火药、火炮铸造、明矾和绿矾制造、制糖、制硝石、制铜等被引入英国。新的技术,特别是采矿和冶炼技术从大陆引入。最后,英国人在技术上,尤其是

在以煤炭取代木材方面，¹⁶⁶做出了自己的积极贡献。内夫进一步指出“连同技术上的发明设计，资本投入首次被导入提高产量的方向。”¹⁶⁷但是，如果有人问内夫，英国为何能很快地由工业上的“死气沉沉状态”进入相对发达状态，内夫主要提供了一个地理上的解释。作为工业集中的一个前提，巨大的国内市场是依靠“廉价的水运设施，而大不列颠以其岛国的位置和优良的港口，比除荷兰之外的其它国家更大程度地享用这些设施。”¹⁶⁸毫无疑问这是事实，但是由于地理状况在前几个世纪亦是如此，所以我们仍无法确定为何突然发生这一跃进。

显而易见的是的确发生了这一跃进：在工业技术上，在工业化程度上，以及相应地在人口上。K.W. 泰勒观察到都铎时期英国人口的翻番，提出了两个解释：国内和平及在世界贸易中新的地理位置，这种位置改变了英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从而结束了其人口集中在南部和东部的状况。“如同一个长期搁置在窗台上不被人注意的盆栽植物，在放入一个开阔的园地后，英国的经济迅速抽出了新的枝叶。”¹⁶⁹与内夫的国内地理优势论相对，泰勒提出了英国在世界经济体中的位置，因而也是一种地理上的解释。但这种解释更能令人信服，因为它涉及到了在此前 16 世纪就发生了变化的一个因素。进一步，如果我们还记得波罗的海及大西洋贸易的新的的重要性，这一论点还会被加强。然而，仅从其本身分析还不足以解释英国与法国的区别。或许我们应到法国内部去寻找那些阻碍她像英国那样利用新的地理位置优势的因素。

让我们进一步指出，英国人口的翻番是有选择性的，因为这不仅包含人口统计上的增长，还包含了优质的移入人口及有裨益的移出人口。一方面，有常被人提到的大陆工艺人的注入，如佛兰德斯的织布工、德意志的冶炼人员等。他们的到来通常归因于宗教战争造成的混乱。但他们之所以选择英国，则是因为如同 G.N. 克拉克所说的那样，英国变成了一个“资本与管理能够获取更丰厚的报偿的地方”。¹⁷⁰但我们还得记住，伊丽莎白时代的末期正是英国经

历经济与社会严峻考验的时期——过于庞大的宫廷开支，加上人口增长、圈地运动及流浪汉人数的增加。正像 F.J. 费希尔提醒我们的那样，当代人把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视作“一个人口压力逐渐使很多人陷于贫困并可能减少人均国民收入的国家。”¹⁷¹

有两种方式处理国内的人口剩余问题：或者把他们从城市移出（即地理上隔离），或者把他们悉数迁往国外。在都铎—斯图亚特时代的英国，这两种方法都曾试过。一方面，济贫法（“针对穷人的法律”，如布罗代尔所称¹⁷²）把他们推到农村地区去过一种边境居民的生活。另一方面，正是此时英国开始考虑海外移民——先是从 1590 年起移向爱尔兰，然后是北美洲和西印度群岛。对移民的吸引力在于社会流动性。¹⁷³对于始于 16 世纪末的欧洲第二次扩张浪潮——即英国、荷兰及稍次一点的法国的扩张，马洛维斯特建议不仅应从人们常常提到的商业因素上去寻找原因，还应考虑到处置剩余人口的需要。他说很多人认为人口扩张刺激了经济扩张，但他提醒我们还有一种更理想的解释。“困难的经济环境及特定的不利于经济进步的社会环境会产生有利于向外移民的条件，哪怕是那些最危险的移民活动。”¹⁷⁴此外，在一个“过早的人口过多的”国家里，只有最适合的条件才被考虑。¹⁷⁵法国像英国一样，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向西班牙输出了大量人口以取代那里被驱逐出西班牙的摩尔人。随后，法国人有移向美洲“各岛屿”的，有在对新教徒迫害中被大批杀害的。¹⁷⁶到 18 世纪末，法国人口再一次获得平衡。¹⁷⁷但获得平衡所费的时间大大长于英国，并且是以国内战争为代价的。这种战争强化了一些错误的力量，排斥了一些正确的力量——正确与错误，当然是从工业过渡的角度来说。英国的发展在 17 世纪 20 年代欧洲经济危机带来的后果中已更为明显。但在论述这些发展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卡托—康布雷西和约与危机之间法国发生了什么。

对于弗兰克·C. 斯普纳来说，“1550—1560 这十年是关键性的（对法国而言）”。¹⁷⁸其标志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黄金短缺使法国的

注意力转向了非洲探险并导致了西部沿海地区的发展。这十年里，巴黎作为金融中心开始崛起（与之相对的里昂在1580年后就衰落了）。¹⁷⁹另一个标志是，此时法国爆发的国内宗教战争持续到了世纪末。此种双重发展（沿海地区及巴黎）与宗教战争并非不相关联。

通货膨胀影响了贵族的收入，尤其是那些依靠固定租金生活的小贵族。但是农民并没有像正常设想的那样从中受益，这是由于内战带来的灾难的缘故。一个重大后果是国家机器的重要性急剧增长。这不仅是因为此时农业税的扩大，还因为那些希望在经济上得以生存的贵族为寻求财政上的庇护而去依附于宫廷。¹⁸⁰

此时的法国正面临卡托—康布雷西和约之后在新的欧洲世界重新定位的问题。它既不再是帝国，也不太像个民族国家，有点不伦不类。它半是朝向陆路运输发展，半是朝向海上运输发展。它的国家机器是既太强大又太软弱。

这种模棱两可的选择在两个领域表现得最为清楚。一是贸易领域，另一是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经济贸易区并不与政治边界相契合。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况欧洲各处都是如此（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一直都是如此），但这一点在法国尤为引人注目，特别是把法国同它未来强大的经济对手——英国和尼德兰北部作比较时。埃米尔·科纳尔是这样描述16世纪初叶的情景的：

“粗略地说，在整个西欧自中世纪末期以来，从巴黎和卢瓦尔河的河弯处到地中海，这一地区的经济仍然处于意大利人、首要实务家和商业技术师傅的强大影响之下。法国是这个经济区的一部分。从组织和工作方式的角度来看，正是由于这批人才使该地区获得最大程度的发展。在法国，既是这个地区的中心同时也是出口港的城市是里昂。里昂同南部及大陆中心保持接触，并同西北部保持活跃的联系。后者包含法国北部、西部的沿海地区、低地国家及英国。帝国的莱茵河

边缘区则构成了另一个区域。它的中心是安特卫普，控制着与北欧及大部分德意志的联系。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这里正朝追赶南欧地区水平的方向发展。”¹⁸¹

这种经济分裂意味着法国进一步偏离英国式的民族经济方向，而更接近于西班牙式的方向。但是，西班牙是庞大的哈布斯堡帝国的一个部分，至少在查理五世的时候并不真正受其控制。而法国在1557年之后至少受到了三个方向的吸引。国家的政治心脏——基本上是法国东北部及首都——被大陆的大片土地所吸引。在“第一个”16世纪曾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与安特卫普联在一起，即使安特卫普衰落之后仍是如此。¹⁸²法国的西北部及西部则被新的欧洲世界经济体及其大西洋、波罗的海贸易所吸引。¹⁸³法国南部发展了分益佃耕制（此前我们已讨论过），成为基督教的地中海地区朝向初级生产、出口导向和资本主义农业总运动的一个部分。¹⁸⁴

亨利·豪泽认为这些多种活动的聚合与多向发展的聚合促成了“一种法国可以不依赖其邻国，而邻国必须依赖法国的良好条件。”¹⁸⁵他甚至想称之为“自给自足”（autarchy）。而我认为恰好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是各种经济离心力的总和。正是为了对抗这种分裂，统治者才大力加强国家机器，创造了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这就是路易十四时期君主专制国的模式，在当时与后来都是模式。

法国经济困境的关键性原因之一是欧洲世界经济体技术基础发生的变化。为估计这一变化的重要意义，我们要首先分析一下前工业时期欧洲海上运输和陆路运输的相对成本问题，与此有关的证据是相互冲突的。一方面，大量的著述明确地指出前工业时期的欧洲，“陆路运输仍然极为昂贵，那些最能控制海上贸易的国家获得了最高速的经济增长。”¹⁸⁶而且，如同克里斯托夫·格拉曼认为的那样，由经济互动而造成的不断扩大的周期理论也特别适用于沿海贸易。事实上，他说：“国际贸易（经由水路）在很多情况下比国内贸易廉价且容易建立。”¹⁸⁷另一方面，维尔弗雷德·布律莱指出：

“在 16 世纪……陆路运输只刚刚开始起作用。在低地国家与意大利之间的贸易中有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尽管他们拥有像安特卫普这样一流的出海口和世界中心，但是低地国家与意大利的商业关系的绝大部分仍是经由陆路。[航运]在两国之间也有，但其重要性是微小的。”¹⁸⁸

到 17 世纪情况似乎有所不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很简单。陆路和海上运输尽管在技术上都有进步，但提高的程度不一样。在所有情况下（畜群除外），数量多而又笨重的物品经水路是最为经济的运输方式。¹⁸⁹前面提到的荷兰平底船的发展在这方面的意义最为重大。相反，在 16 世纪对于轻便而昂贵的产品、贵金属和人的运输来说，陆路仍是较为廉价、高效和安全的方式。¹⁹⁰

这对于法国有何意义呢？我们把“第一个”16 世纪的政治当作西班牙和法国试图将欧洲世界经济体转化成世界帝国的种种努力。尽管有大西洋探险，这种种努力主要还是导向陆路。实际上，这或许正是解释他们何以失败的补充理由。“第二个”16 世纪的政治则是要创造团结一致的民族国家，在非帝国的世界经济框架中获取政治与商业优势。这种种努力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利用海路（包含外海及内海）。尼德兰北部和英国的自然地理优势使其得以顺利实现这种目标。法国的政治表现为海路发展派和陆路发展派之间不甚明确的紧张关系。法国一方与英国及联合省一方的关键性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确立海上发展取向同建立强大的政体与民族经济的愿望是相互兼容的。而法国由于其地理环境的原因，这些选择有点相互抵触。

这方面的不同之点，我们可以从 1560 年弗朗索瓦二世去世至 1598 年南特敕令停战期间发生的那些折磨法国的宗教争端和内战中，找到端倪。

让我们简略地来看一下宗教斗争与阶级和地理的相互关系。只要法国把对哈布斯堡帝国的斗争作为首要任务，并指望里昂成

为争夺国际贸易中心的竞争者，宗教宽容就有可能实现。¹⁹²在卡托—康布雷西和约之后国际金融界对宗教宽容的需求已经消失。与此同时，里昂失去了往日的繁荣，这是因为它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程度降低了，同时它还是一场宗教战争的主战场。¹⁹³战争把各种互不相联的力量汇总起来，这些力量的政治斗争往往偏离了原来的动机。在蔓延的政治骚乱的白热化中就时常发生此种情况。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可能理清一些线索。赫斯特菲尔德在《新编剑桥近代史》中是这样描述内战起源的：

在法国这一时期王权与贵族的矛盾终于导致长久的血腥斗争。当然，法国内战既源于强大的世俗力量又源于宗教因素，这一点已广为人知……法国的加尔文教徒运动在16世纪中就首先控制了商人和工匠；该教派早期的殉道者——如同玛丽时代的英格兰那样——来自于最低贱的家族。但是到1562年内战开启的时候，上层贵族和地方贵族已经加入并实际上控制了该教派。当代法国人认识到对这一运动的两翼加以区分的重要性，把其中一派称之为“宗教的胡格诺教徒”，另一派称之为“国家的胡格诺教徒”。后者代表的远非是宗教上的异端。他们代表了法国外省统治家族的一种长期的敌意，这种敌意指向巴黎的权力，指向王权及其联盟天主教会；但最主要的是指向吉斯家族。这个家族与教会结合最为紧密，并且激烈反对外省中状况日益恶化的贵族的利益和目标。（对于“外省贵族”[provincial nobility]这一称谓的传统用法常把问题弄错；其中的大部分成员相当于英国的骑士或乡绅家族的成员，而非贵族。）¹⁹⁴

赫斯特菲尔德描绘出的法国的景象近似于特雷弗—罗珀笔下英国的景象，是农村与宫廷相对的景象。这一景象引起各种含混不清之议，英国的情况与此类似：那就是贵族（或乡绅）到底是“崛起”还是

“衰落”了？国家在为谁的利益服务？

让我们再来看柯尼斯贝尔格在《剑桥史》的同一卷所描绘的另一情景：

“1557年破产之后，亨利二世从他不幸的臣民那里榨取了额外的700万里弗尔的特别税。不过，极限已经达到。在诺曼底和朗格多克发生了农民反叛。贵族尽管被免于征税，但是在圣康坦之难（1557年）以后，为帮助国王支付赎出狱中贵族所需的大量赎金，他们花费掉了收入，并把地产抵押或出卖……”

在城镇，小匠人和小店主受到重税及因农业歉收（如1557年）而造成的农村购买力下降的打击，雇工们发现食品价格比工资增长得快，而且行会日渐增大的影响及其严格的限制阻碍了多数人提高技艺……”

1559年之后，大批贵族投入了这场运动，尤其是南部……”

到1573年，胡格诺组织已得到充分的发展，在一个广阔的弧形地带，从多芬内经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扩展到贝亚恩及吉耶讷。就像在尼德兰一样，成功的革命趋于地方化，这一方面是靠了与地方势力的结盟来对抗中央政府的干涉，另一方面是因为对军事形势抱有的希望。¹⁹⁵

由此引起的反应是，天主教地方联合会出现了，他们也强调自己的地方属性，并且要求获得（传统的）地方自治。巴黎的本地派站在天主教联盟一边。¹⁹⁶而且，两个阵营都与外部势力有联系，胡格诺教徒靠在英国和德意志新教诸侯国一边，而天主教徒有罗马及西班牙、萨瓦的统治者的支持。“这样，这一时期所有的革命运动派别都与国境以外的权力和利益集团挂上了钩。”¹⁹⁷

国王亨利三世试图仲裁这场斗争，最终对两个阵营既有打击

又有离间。他把新教徒王位觊觎者纳瓦拉的亨利(亨利四世)确认为王位继承人,条件是其皈依天主教。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为消弥冲突而进行的一场漂亮的战术性政变。只是到了这时亨利四世才发表了他的名言“值得为巴黎做一次弥撒。”请注意这里说的是巴黎而非法国,而且是出自纳瓦拉之口。

因为亨利四世的动机与其民众基础的动机截然不同,所以他很容易地就转换了营垒。此时的贵族也基本上从冲突中退缩出来并皈依天主教。这样就使冲突的宗教内容失去了爆炸性,因而也减弱了政治反对派的力量。¹⁹⁸下层阶级也从中受到挫折,他们转而愤怒起来但也只是爆发了一些相对来说无效的农民反叛。¹⁹⁹最后,胡格诺教徒在地方上的势力比以往更强大了。他们失去了北部和东部的会众,在南部依然很强大。²⁰⁰

一个基本的矛盾明显是地方性的。一方面诺曼底和布列塔尼半岛正在被拉走;另一方面,自13世纪失败后分离主义一直潜伏着的整个南部也开始脱离。其原因都在于一个强大的民族经济的产生限制而非扩大了当地贵族的获利机会:西部沿海的资产阶级是想利用他们的财富挤进大西洋—波罗的海贸易,而非建设国家官僚体系和军队;南部的农业资本家想获取的是自由的国际市场。中部的一派在取向上并非反对资本家。他们有一个中间性的取向:先加强国家,商业机会自然应运而生。

在英国,国君一方面希望创建一个立足于新兴势力基础上的民族经济,以便在新的世界经济体中成功地参与竞争,另一方面,它又是基于各种社会保守力量而形成的身份与特权系统中的顶端,因此陷入了一种矛盾境地。法国的国王同英国的国王一样,都不想草草做出选择。比起充当新兴势力的先驱者角色,他们觉得保留原先的贵族爱好更为舒适。但不同之处在于,在英国不管是乡村还是城市中新生的资本主义分子,都认为能从更加强大的民族经济中有所收获。然而法国的商人却感到是为遥远的巴黎做出牺牲。南部的农业资本主义在结构和需求上更接近边缘国家如波兰

(波兰首先需要有一个开放式的经济体)的地主阶级,而不像英国的地主阶级,在其领地之内已有新的茅舍工业成长起来。在英国,国王可以依仗其对手对他们进行约束,因为他的“民族”立场是符合其对手的“短期”利益的。法国的国王做不到这一点,他只能靠比较严厉的方式把这个国家的各种力量聚在一起;于是便有了16世纪下半叶的内战和17世纪上半叶的官僚中央集权制。

然而代价是沉重的。宗教战争的确是有助于绝对王权的上升。但如莫斯尼尔所说:“不同于英国,贸易、工业和资产阶级的发
展都滞后了(freine)。²⁰¹代价还没有全部付完。路易十三和黎塞留的时代还要进一步偿付。但为了估计出这一代价,我们必须先回到世界经济体的总的环境中来。

“延长的”16世纪就要结束了。很多历史学家这样说,证据是当时存在一场危机。是一场危机还是多场危机?因为在16世纪90年代有过一次经济衰退,17世纪20年代有一次更大的衰退,在1650年前后有一次致命打击。我们不在分期上过多争论——不管合适的断限是1622年或1640年,还是1650年。斯普纳认为,观察漫长的16世纪“高峰点与低谷点”的时候,一个关键的现象是转折点“分散在相当宽广的期间内。”²⁰²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把1640年作为终止日期,但并不保证不越过这一界限。主要一点依然是历史学家毫无例外地认为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关键性的转折。²⁰³

这一转折都包含些什么?首先是价格趋势发生倒转,即曾支撑欧洲世界经济体的经济扩张的价格膨胀结束了。价格趋势并非一次全部倒转回来。总起来说,南部比北部发生得早,西部比东部发生得早,沿海比内陆发生得早。明了这一点对于理解该时期和随后的世界经济体的发展至关重要。²⁰⁴其间有一个不仅是几年的断裂。

西班牙在其无敌舰队被击败后不久便遇到了麻烦。贸易依然有升有降。肖尼的数据表明1608年是西班牙大西洋贸易的高峰。随后是一段停滞期,直到1622年。肖尼认为短暂的和平使经济形

势有所缓和。²⁰⁵紧接着是明确的下降趋势。无敌舰队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失败仅仅是刺破了一只气球，这只气球又因西班牙财富的大量消耗而变薄。西班牙对美洲的探险尤其具有多样的破坏性，是利用先进技术进行的某种原始狩猎和采集的活动。²⁰⁶在这一过程中，西班牙耗尽了它的土地和人。而且，西班牙不仅耗尽了印第安人的劳动力，它还以其它方式耗尽了自已的劳动力。前面我们已看到这一点。²⁰⁷

一个非常重要的后果就是金银进口的减少。例如，1641—1650年期间从美洲进口到塞维利亚的银锭年平均量只及1591—1600年期间的39%，而金锭只有8%。金银的产量成了“减少边际利润和降低获益的无情法律的牺牲品。”²⁰⁸由于贸易并没有突然减少——实际上仍在扩大，贬值便不可避免了。

这里，由发展不平衡的国家组成的单一世界经济体的存在首次带来了关键性的区别。西北欧国家贬值的程度要远比南欧、中欧和东欧国家低。²⁰⁹这当然指的是金银价格。勒内·巴勒尔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论点，认为锭块价格的变化与其它物品价格的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人们主要是依据后者作出经济上的抉择。²¹⁰有意思的是，他是在一本主要讨论17世纪和18世纪经济的著作中附带提到这一点的。A.D. 鲁布林斯卡亚认为17世纪与16世纪的区别恰恰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1615年后首次有了一场“并不依赖于金银注入的独立的价格运动。”²¹¹她断言这一事实确定了“价格革命”的结束。鲁基洛·罗马诺认为在1619—1622年期间发生了一次突然的严重贬值：“重要的是这种现象的强度……”²¹²在1619年钱币如此之多以至于利率降到了1.2%，这是“整个1522—1625年期间绝对最低的利率。”²¹³

在普遍的萧条中，只有荷兰以及某种程度上（何种程度我们不久就会看到）的英国从中逃脱了。²¹⁴事实上，罗马诺认为荷兰不仅逃脱，而且在1590—1670年前后进入了一个农业扩大发展时期。²¹⁵

西北欧为何能相对地免于恶运的侵袭？肖尼的解释相当复

杂。在 16 世纪由于银锭到来的时间滞后,使得西北欧的价格不如西班牙上涨得快。西北欧总是可以通过走私获得部分金银。走私金银的比例随时间而上升。这样,当西班牙的价格开始下跌之时,走私金银造成的通货膨胀的影响在总影响中所占比例也在上升。“北欧的价格因其受萧条因素的影响较小,因而趋向于接近西班牙的价格水平。”²¹⁶这一观点似乎有点牵强,因为它假定与金银走私的相对供应量相反,其绝对数量并没有下降。从斯普纳的数据可以推知,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西北欧抗拒了那些侵夺该地区在世界经济体中的优势的抑制力量。皮埃尔·让南对西北欧抗拒的分析似乎更接近目标。²¹⁷他引证了地理位置(处于大西洋上的一个十字路口,联接谷物产地,东北部森林区与需要进口这些产品的国家)和工业生产能力(荷兰和英国的纺织业古已有之;瑞典的铁矿由于国际经济的延伸而释放出经济力)。而且,北部生产力的扩大意味着人口的持续增长,而此时的地中海地区的人口正在下降。皮埃尔·肖尼估计在 1620 年到 1650 年期间帝国人口从 2000 万降至 700 万,意大利在 1600 年到 1650 年期间下降了 200 万。英国和此时的法国相对来说避免了人口下降。²¹⁸

作为一种地理现象,这意味着西班牙大西洋时代的终结和欧洲大西洋时代的开始。²¹⁹1624 年荷兰进攻葡萄牙的殖民地巴西,而当时的葡萄牙属于西班牙王室。这场战争的开启是对西班牙经济的一次毁灭性打击。²²⁰在 1590 年到 1600 年间,荷兰和英国侵入了此前曾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独占的亚洲贸易,尤其是胡椒贸易。这导致了香料价格的暴跌。²²¹人们足以理解那个时代的人何以发展出这样一种重商主义思想,即认为“世界财富的总额是永恒不变的,商业政策的目标……是为每个国家尽可能捞取蛋糕上的最大一块。”²²²

但财富并非永恒不变。一方面,可以认为 16 世纪的结束意味着整个欧洲“利润丢失,租金抽逃,经济停滞。”²²³但还要具体分析。罗马诺认为 16 世纪“正像 12 世纪和 13 世纪一样,是一个巨大

的农业获利的世纪。”²²⁴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建立在更加强化和低工资的农业劳动力基础上的大规模资本主义农业，其作用的增加只能用简陋农业获利下降才能解释。罗马诺的评论是恰当的：

“费尔南·布罗代尔一方面曾称之为“破产”、“资产阶级的背叛”，另一方面又称之为“领主反动”的这些显著的现象进一步审视，并不能对其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类，而只是一类；几乎还是同样的人，或至少是那一家族的后裔，背叛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出身（首先是资产阶级的功能），进入了领主反动的体制，我曾把意大利出现的这种现象称为‘再封建化’（refeudalization）。”²²⁵

但是罗马诺再一次看到，荷兰和程度稍次的英国是例外。

我们还不能向下叙述。细观英国和法国是如何应付“延长的”16世纪接近尾声的动乱，对于理解随后的时代至关重要。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巩固是围绕英法争霸而发生的。但在某种意义上，关键的牌在1600—1640年间已经打出了。

克拉克认为在“第二个”16世纪英国工业取得“出色的”进展，其根源在于发展国际商业。他在分析这一时期英国的国际商业时，发现在这一时期结束时与开始时相比，有三项主要对比：（1）尽管英国的国际贸易绝对数额在扩大，但与国内工业相比，在提供消费品方面却在下降；（2）尽管阿姆斯特丹取代安特卫普成为欧洲世界经济体的枢纽，但英国与荷兰已从一种依附和补充关系变成了竞争关系；（3）英国同欧洲内部的贸易更趋多元化，并开始同俄国、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印度洋地区和美洲建立系统的贸易关系。²²⁶

然而，在伊丽莎白统治结束之前，这些变化并没有发生到引人注目的程度。也不是像克拉克暗示的那样以一种平和的方式发生的。这些变化打破了都铎王朝巧妙建立的、微妙的社会政治平衡，并把那些可能分裂英国政治体系的、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充分暴

露出来。让我们依次看看这些变化。

毫无疑问，国际贸易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在下降，这一事实或许可以解释为英国经济长期健康的迹象。但有一点可能被忽略，国内工业化的进程使英国的社会结构更多而不是更少地依赖变幻莫测的世界市场。巴里·苏普莱指出，与工业革命以后的时期不同，固定资本在工业经济中只起到很小的作用，国民经济的波动不是由多余的生产能力造成的，生产资料工业的波动也不会加剧国民经济的波动。同后期相比，信用波动也是一个较小的因素。这样国内市场的繁荣就受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农业收成波动（由气候变化造成），一是“常常是决定国内活动变化战略性因素的海外需求。”²²⁷正由于英国的工业发展，这些改变才在政治上至关重要：

“呢绒生产相当长足地进展，大体上已不再是占优势的农村人口的副业。对政府和社区来说，纺织工业的存在意味着在没有土地、没有财产的阶级中引起连续不断的贫穷和混乱的威胁。这种状况促成了伊丽莎白济贫法的产生，并使数代政治家在鼓励工业增长上谨小慎微。”²²⁸

英国为确保经济、政治稳定应如何去做呢？苏普莱指出了两个解决方案：进一步向后退。F.J. 费希尔发现“培根把伊丽莎白的统治看作是一个关键时代，就在这段时期，英国曾危险地依赖于外国谷物……”²²⁹这就是过些时候北部意大利所走的非工业化道路。另一个方案是向外推进，通过获取额外的供应资源来克服供应紧缩，通过获取新的市场来克服需求紧缩。²³⁰这正是尼德兰北部所走的道路。对于英国的国内社会结构来说，尝试采用哪种解决方式是至关重要的选择。某些选择正是都铎王朝竭尽全力企图避免的。结果出现了一个折衷方案。劳伦斯·斯通考察了伊丽莎白时代海外贸易的数额，得出的结论是“伊丽莎白时代广为人知的贸易扩大只不过是虔诚的神话。”²³¹

我们再来看 1600 年时英国从荷兰的经济监护中解脱出来的程度。英国商业资本家对国内贸易加紧控制的过程先是在 1552 年；后是在 1598 年随着取消汉萨同盟特权等行动的实施已几近完成。²³²这对诸如冒险商人协会之类封闭的垄断组织极为有利。这些团体的利益很大程度上存在于由妥协方案造成的不容易的平衡中。

在斯图亚特时期，当其他商人获得了合法权力向荷兰在纺织工业精加工中的地位进行直接挑战的时候，也就是进行所谓的奥尔德曼·科克因的方案 (Alderman Cockayne's Project) 的时候，²³⁴他们却失败了。苏普莱认为这一失败表明：

英国制造了纺织半成品后由荷兰印染与加工，这种国际劳动分工并非是公司人为的规章所规定的专横现象。相反，它反映了 17 世纪初的一种经济现实；如果不那样做，英国就可能大为不利。²³⁵

因此，伊丽莎白对向外扩张的约束措施也并非那么不明智。²³⁶都铎王朝随后延缓了国内社会冲突，直到国家机构摆脱局外人的政治自治权得到加强为止。这样英国才可能有力量宽容各种政治、社会力量所具有的爆炸性的、却又不可避免的重新调整。

最后，伊丽莎白时代海外贸易的多样化达到了何种程度？的确，此时的英国轮船往返于波罗的海，并开始了通向地中海、俄国和非洲的航行。而且这正是第一批特许公司组建的时期。但我们一定要留心不要夸大。一方面，东欧（通过阿姆斯特丹）同法国和西班牙的经济联系要远比与英格兰的联系紧密。²³⁷另一方面，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与法国和荷兰叛乱诸省的贸易仍是其最主要的贸易。²³⁸

英国商业的现实情景既是都铎君主们政策的原因又是它的后果。这些君主采取了骑墙政策。²³⁹1590—1640 年的国际经济危机使

这种骑墙政策越来越不可能了，随之君主制的政治稳定及其庇护下的垄断也越发变得脆弱了。稳定对每个人来说并非都是至善。对某些人来说它令人“讨厌”。²⁴⁰到1604年，那些追求扩大商业机会的商人的急躁情绪表达在议会通过的各种自由贸易法案上。紧接着的推动力或许是与西班牙的媾和。这一和平开辟了已经发生变化的贸易的前景，使某些贸易障碍被消除，也带来了一些人、就是那些此前非常活跃的私掠船团伙的失业。²⁴¹

随后的十年，英国的呢绒工业前景看好，出口在1614年达到一个高峰。但用苏普莱的话说，这是“短暂的晚秋里的阳春。”²⁴²紧随其后的是一场“罕见的”经济萧条，这场萧条“确定了对古老的毛布业海外市场的永久限制。”²⁴³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突然的下降呢？实际上并非那么突然，而是像欣顿所说，是“一直在起破坏作用的局面的突然恶化。”²⁴⁴与英国相关的大陆货币的贬值产生了极为不利的贸易条件，“使[英国的]呢绒价格过高而被挤出了[北欧和中欧的]市场。”²⁴⁵1621年和1622年的歉收导致的对外国谷物的需求更加剧了金银的外流。²⁴⁶金银的大量流失“对一个依赖于金属铸币稳定供应的并不复杂的经济体具有极大的意义。”²⁴⁷

J.D. 古尔德认为，英国为1550—1600年因“争夺特权”而“浪费”它的国际价格优势，付出了代价。结果是价格优势已经逆转之后，“英国背上了一种僵硬的、由卖主操纵的、成本高昂的经济包袱，很不适于对付因成本低、适用和时新而繁荣起来的竞争者（荷兰）。”²⁴⁸荷兰现在有能力挤入英国的进口贸易，²⁴⁹英国向德意志和东欧输出的纺织品也因荷兰及当地竞争而受到打击。²⁵⁰

商人和政府都大为震惊。商人做出反应，要求更多的保护。如限制非英国人向英国输入货物的权利，要求增加强制使用英国航运，要求将波罗的海谷物再出口的自由，这样既扩大了呢绒贸易，又能带来换取谷物的金银。²⁵¹政府则有完全不同的观点。首先，农业利益集团在议会有充分的发言权，他们禁止谷物进口，因为需要对付低廉的价格，保护自己。²⁵²第二，政府集中精力来协调两种需

求，“一是缓和地方上的贫困，以防骚动和暴乱，一是复苏商业，以便保持经济稳定和权力。”²⁵³为做到前一点，政府想采用 20 世纪欠发达国家政府的解决方案，即创造就业。但如同今天一样，这个办法并不容易做到。²⁵⁴政府没有提供新的保护，而是朝着放松垄断的方向移动，看这样是否能复苏工商业。²⁵⁵但政府不可能在此方向上走得太远，因为特许权公司的安排对政府极为有利。特许公司发挥了领事馆和海关的作用，还通过贷款和税收成为收入来源，甚至取代了海军成为国际商业的保护力量。政府从这种准国家官僚机构中获得了效忠。²⁵⁶“专利和垄断是斯图亚特政府网络的组成部分，在冗长的陈词滥调下掩藏着自私自利的目的。”²⁵⁷如果政府朝向反垄断方向行进的话，实际上它只能是在议会的压力下“输出港和小乡绅喧嚷的代表”。²⁵⁸

只要上层卷入，英国也不会有好运气。1623—1624 年的贸易复苏因 1625 年的瘟疫和歉收而有所回退。同西班牙重新开启的战争，对西班牙贻害非浅，对英国也无任何益处。对谷物的新需求导致了另一场收支平衡危机。²⁵⁹这样英国工业的传统中心依然“处在持续不断的衰退、痛苦的调适、普遍的过剩之间。”²⁶⁰王室的干预并没有解决问题；它只是通过创造一个“重商主义信念的危机”使情况更加恶化了。²⁶¹

明显地，英国纺织工业降低成本并非易事，这部分是因为商人过于紧密地附着于国家机器，以致王权无法强迫实业家减少收益。²⁶²另一方面也因为，工人的力量相对强大，足以顶住大幅度削减工资的做法。²⁶³因此，唯一的解决方案不是非工业化，而是通过发展新工业来包抄既得利益集团。正是在这里，英国找到了自己的商业拯救方案，就是所谓的“新式呢料。”²⁶⁴这种产品作为一种出口项目有了显著的增加，而与此同时“旧式呢料”却下降了。²⁶⁵

解决高价格困境还有第二个方案：英国发展了一种再出口的贸易。正是这方面的英国商业政策刺激了 17 世纪两个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对殖民扩张的兴趣和英、荷竞争。这两个趋势在内战后明

朗化了,但两者在内战之前都已出现。²⁶⁶

新的产品需要新的市场。总的来说,是西班牙和地中海地区为英国的出口提供了新的、最重要的市场,²⁶⁷这一地区比起英国旧的垄断地区的限制要相对自由一些。²⁶⁸西班牙市场因其“国内通货膨胀和殖民地购买需求”²⁶⁹而特别有吸引力。英国正开始吃掉西班牙帝国的腐肉。当意大利工业衰落的时候,英国的出口品部分地填补了这一缺口。²⁷⁰

对于殖民化,我们要记住,很长一段时间,英国(法国,或荷兰)没有必要卷入直接的殖民事业当中去。卡托—康布雷西和约,无疑表明了对帝国扩张的部分厌倦,却也包含了下面不寻常的条款:“在本初子午线以西,北回归线以南……一方发动的针对另一方的暴力行为将不被视为对条约的冒犯。”²⁷¹这一原则,即通常为人们所知的“线外无和平”,在1598年的韦尔万条约中再次得到确认。它规定了建立新的定居点的自由,也规定了抢掠的自由。五十多年来抢掠要远比建立定居地更能得到丰厚的利润。²⁷²形成对照的是,殖民化却是一种没有把握的冒险。据认为西班牙人已经把好地方占尽了,“即使狡诈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人——最肯定的是女王本身——都注意到了在一个辽阔的大陆上漫无目的的勘探是没有希望的。”²⁷³此外,英国有爱尔兰作为给移民安家的一个出口。²⁷⁴

这些态度在1600年后发生了变化。通过詹姆斯一世对两个王权的联合,英格兰巩固了同苏格兰的联系。爱尔兰的殖民化给英格兰和苏格兰带来了新的重要性。²⁷⁵爱尔兰被纳入不列颠的劳动分工之中。她的森林被悉数用来供应英国做木材。²⁷⁶在随后的一百年过程中她将会成为英国人控制下的主要的冶铁地区。²⁷⁷英国也将开始在北美建立殖民地。巴里把此种变化归因于西班牙特权的衰落和对原材料的搜寻——廉价食品,特别是鱼,²⁷⁸以及战略性供应品(木材、大麻纤维、沥青),在战时波罗的海对这些商品的供应会被切断。另外,这里还将是制造业的新市场和穷人移民的地方。²⁷⁹如果不是对西班牙军事力量的考虑,这一切在一个世纪之前就本

该是事实了。西北欧三个强国对殖民地新一轮的攫取难道仅仅是他们相互竞争的一种迹象吗？这种攫取，特别是在西班牙衰落之后，难道不是一种先发制人的殖民地开拓吗？

这些国际经济激变的影响，给英国带来了一场政治危机。我认为佩雷·札戈林准确地抓住了这场冲突的实质：

“从阶级斗争中找不到英国革命的起源，因为内战双方的领导成员很多是来自同一个经济阶级，这一阶级在前一世纪一直稳定地发展着。革命的起源在于这一阶级中英国当政各集团的冲突。”²⁸⁰

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的自相残杀，不仅为国际经济舞台上的迫切需要所推动，而且还由于此前英国政治体系的两大危险的消除而成为可能。如斯通所断言，“竞技场(已经)清除了穷人或西班牙人的干预……。”²⁸¹

有两个与内战发动相关的，近乎愚蠢的议论。一是内战是否不可避免。托尼断言“君主制的衰亡过程因都铎王朝采取的保存措施而加快了。”²⁸²特雷弗-罗珀断言其主要问题在于一个挥霍的行政机构，这个机构本可以由议会加以改革。“因为，君主制本身当然并非障碍。要说没有革命这种政策就不可能实行，这种说法是荒谬的。”²⁸³

不久我们将会看到法国行政改革的种种后果。特雷弗-罗珀曾回顾地认为长期议会也应进行此种改革。但说什么“不可避免性”实为一种乏味的游戏。如果一种因素有所不同，结果当然会不同。但如果是两种、三种不同因素呢？事实是内战确实发生了，学者的任务是如何解释它。

另一个愚蠢的问题是，是否造成英国分裂的，并非是关于自由和宗教的信仰这一真正的争端问题，赫克斯特先生认为正是这样，并对在这场争论中他的很多赞成者和反对者都同意此点(欣顿、斯

通、波科克、希尔、特雷弗-罗珀都为他和托尼说话),佯装吃惊。他欢迎他们加入他的“辉格党”同伙。²⁸⁴波科克至少为此感到不愉快,坚持说他是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而非“新辉格党人。”²⁸⁵但这是一个愚蠢的争论,因为内战的主人公们当然围绕政治自由和宗教观点来表述意识形态上的许多分歧。他们当然会有此打算。而内战的结果当然要对治理英国政治生活的规范制度发生重大影响。

对一种政治和社会冲突的意识形态相关方面的分析,应植根于当时普遍的社会关系之中,并把意识形态的要求置于这些社会关系中去理解,否则便不会有意义。需要争论的是这些关系的整体性,这些关系是否保留了原样,还是向某一特定方向发生了变化。

如同所有的重大社会动乱一样,英国内战是一场复杂的冲突。一些人强调王权的作用,希望抓住正在滑落的特权与服从的制度,他们对社会革命的恐惧超过了其他的考虑,他们在世界经济体的强制选择下有点处于瘫痪状态;另外一些人则把持续的农业商业化放在首位,欢迎社会模式的某些变化,认为宫廷的铺张浪费是不道德的,他们是以英国在世界经济体中的最大优势为取向的。主要的裂痕就存在于这两者之间。

让我们来看看法国,那里很多情况是一样的,但最重要的事情却不一样。戴维斯·比顿说到1560—1640年时,认为这是“一个法国贵族由中世纪晚期到旧制度时期转变的关键阶段。”²⁸⁷英国也是如此。但法国的转变很不相同。在鲍里斯·波尔契涅夫与罗兰·莫斯尼尔的那场大争论中——我们就要加入进去——波尔契涅夫基本上认为,“职务上贪污受贿带来的不是权力的‘资产阶级化’,而是资产阶级的‘封建化。”²⁸⁸对此莫斯尼尔的回答是:“没有一个所谓的‘封建—专制’秩序。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专制王权的趋势,它被卷入了同封建秩序的斗争。封建秩序的残余则试图使专制王权瘫痪。”²⁸⁹尽管我认为这场争论部分是语义上的,尽管波尔契涅夫在其他观点上有较好的意见,这里要说的是莫斯尼尔解释英国的论证要比波尔契涅夫解释法国的论证更进一步接近事实。用图式化

和简单化的方式，就是说，在英国，贵族通过把自身转变为资本家而失去了暂时的利益，但获得了长久的利益；在法国，贵族阶级通过强迫资产阶级放弃他们的正常功能而获得了短期的利益，却丧失了长期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济的停滞。为什么事情会变得这样？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它们与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关系造成的。

首先，让我们再一次看看在多大程度上这是对法国社会体系的公平描述。由于我们已经列举的原因，1600年的法国政府要比英国政府强大。这意味着官僚制度“对资产阶级来说是攀登社会等级阶梯的主要手段。”²⁹⁰这一点法国比英国明显得多。反过来这种腐化导致了资产阶级在法国君主政体中有更大的直接利益。²⁹¹这使得莫斯尼尔认为此时的法国有一个相对开放的阶级状况。²⁹²但莫斯尼尔本人也表明了向上攀登是何等困难。他指出由平民上升到行政法院审察官的地位通常需要四代人的努力。²⁹³我认为事实上波尔契涅夫对于阶级状况的认识更为精妙。与其说在各阶级之间有很大的流动性，不如说各阶层的人的阶级依附因具体情况而各异。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出身的官僚阶层即穿袍贵族中最为明显：

当一个与农村仍保持联系的工人失去了工厂里的工作，他就又变成了农民。同样的方式，当官吏的财产权和特权被剥夺后，也就是他们作为特权贵族的身份被剥夺后，他们实际上便自动地返回到原先出身的资产阶级身份中……受到马扎兰〔决定〕负面影响的官吏们感觉到自己仍是资产阶级。在投石党（福隆德）运动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同整个资产阶级的态度是一样的。²⁹⁴

正是因为法国获取正式的贵族身份相对容易（在斯图亚特时期的英国也是如此，只是程度上差一些），16世纪才产生了法国

贵族所抱怨的“贵族身份的模糊性，”这种特性导致了他们对“荣誉特权认真而着迷的关心，”²⁹⁵还导致了严格的~~行为规范及关于丧失贵族资格的行为的理论~~的异常重视。²⁹⁶

对于专制王权与资产阶级结盟来对抗贵族的传统描述，总是意外地碰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所谓典型的路易十四的专制王权政体同样确认了封建领主的特权。马克·布洛赫是这样解决这个两难困境的，他认为对封建领主权力的确认是两种相互对立现象的更基本的方面，如果没有绝对王权，封建化的趋势将获得更充分的力量。换句话说：“专制王权的胜利限制了‘封建反动’的程度。”²⁹⁷

A.D. 鲁布林斯卡亚在描绘“第二个”16世纪法国的景象时，基本上同意此点。²⁹⁸1559年后，外国银行家在法国的作用下降了，这是由于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衰落及宗教战争。这些战争阻止了法国商业资产阶级填补这些缺口。为获取资金，法国政府因而建立了一种包税制。这种租税包收终于被融入了国库。“租税包收是有利可图的事业。正是基于这一事实，政府建立了强制借款制度，把主要的包税人变成了自己的债权人。”²⁹⁹金融家与国家的密切联系是如此广泛以至于他们自己的生存都要依赖于国家的力量，只要“他们所需要的强大政府……继续强烈地需要从他们得到贷款。”³⁰⁰尽管王权不向贵族征税似乎不尽是事实，³⁰¹但是对于~~贪官污吏~~的依靠已使之变得非常困难了。因而鲁布林斯卡亚断言，税收改革必然会带来再次购买职位的现金支出，其开销是相当庞大的。³⁰²增加国家债务的任何事情，都会加强这些~~官吏~~的地位。特别是“战争对于金融家们尤为有利可图。”³⁰³

参照一下英国就可以看出，这里的某些推理是非常特别的。在英国商人联合组织下的“财务封建制”或包税岁人在伊丽莎白和早期斯图亚特时期已成为寻常之事，³⁰⁴无需用宗教战争来解释，也无需依靠腐化的官僚制度的大规模成长。再者，就收取暴利所受的限制而言，这是行政改革的结果，这一改革的直接动机是应付战时财政的紧急状态，并大大减少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财务手续。³⁰⁵

但这不要紧。鲍里斯·波尔契涅夫向这种推理思路发动了更为激烈的攻击。波尔契涅夫对那种认为“唯利是图是资产阶级政治优势的一种形式”³⁰⁶的观点展开了全面攻击，他把这一理论归因于帕热斯和莫斯尼尔。波尔契涅夫认为，就17世纪法国的主要特征而言，它仍然是一个封建生产方式和封建经济形式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³⁰⁷

波尔契涅夫认为存在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但资产阶级“参与封建国家政治权力的程度很低，尚未达到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阶级去行动的程度。”³⁰⁸资产阶级因虚荣和贪婪而追求各种头衔，并吸收了贵族的生活方式。此外，他们还被诱使放弃真正的资产阶级经济活动，因为把钱用作信贷资本而非工业或农业资本能获得财政上的收益。³⁰⁹

这样，当1623—1648年期间爆发农民起义的时候（我们不久就要谈及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摇摆不定了。一方面他们对高税收也不满意。另一方面，他们又认同于贵族阶级的利益并害怕平民。一些人叛乱了；一些人逃离了这个国家；另一些人通过购买官职和用钱参与信贷活动而与政府修好。³¹⁰

如果有人问英国和荷兰何以产生了一个被“资产阶级化”的贵族，而法国却没有，答案是“在法国，封建制度具有的完美的形式和传统的活力阻碍了贵族的资产阶级化。”³¹¹不是因为法国更为落后，而是因为“法国经济性质上的特点使得各阶级的组合不可能允许发生仿效英国模式的资产阶级半截子革命(Semi-revolution)。”³¹²波尔契涅夫清晰的论点在这一关键的比较中显得难以招架，他只能陷入说不清的完美、界定不明的特殊性和“半截子革命”的含混概念之中。

正是在这一点上，科拉多·维万蒂向波尔契涅夫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完全同意波尔契涅夫对莫斯尼尔的观点的摒弃，即认为投石党运动只是法国历史上的孤立因素。维万蒂认为波尔契涅夫没有沿着自己观点的逻辑走到底，而是在谴责资产阶级背叛革命时

陷入困境。资产阶级无法作出另外的选择，因为他们“尚没有形成足够强有力和自治的社会集团”来作出别的选择。³¹³维万蒂是以提问的方式提出这种假说的：

“17世纪的‘封建反动’或‘复辟’以及‘资产阶级背叛’，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为16世纪法国经济所未能创造出的资本积累奠定了基础呢？这当然是在相同的危机条件下采用了与别处不同的方式。”³¹⁴

这就是说，即使有“阻碍第三等级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从事自主行动的那些客观障碍，”³¹⁵这难道不是一条次佳道路吗？即便这条道路未能使法国达到英国的发展程度，它仍然使得法国免于下降到如西班牙和意大利那样的半边缘国家的地位。即使法国南部走上了分成制的道路，也没有在经济上倒退到相邻的地中海地区的地步。勒鲁瓦·拉迪里认为法国南部（及加泰罗尼亚）不像北意大利和卡斯蒂利亚，经济状况“处于停滞，受抑制状态，而是巨大增长，但并没有转变过来……朗格多克的形势不是农业生产的衰落，而是农业生产缺乏弹性，有些僵滞；不是倒退，而是缺少明显的增长。”³¹⁶此种情况将在法国南部发生，但比其它地区晚五十年。

卢西恩·戈德曼对专制王权同资产阶级结盟的理论作了对应的批判。他认为，恰好相反，基本的联盟是在君主与贵族之间，但是君主为了保护他的侧翼而创造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戈德曼认为，正是为了使这个资产阶级像资产阶级，而不像假贵族，君主在17世纪早期引入了官职税的改革。³¹⁷官职税通过实际上向官员征税而使官僚制变得可以买卖，使资产阶级保持了资产阶级特点，³¹⁸并且依附于王权。³¹⁹

戈德曼的解释围绕着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官员：一种是旧官员，由贵族、穿袍贵族、官吏及最高法院和议会成员组成；一种是新官员，他们是国事专员和国事顾问，作为行政法院、审察官和总

督服务于国王。戈德曼认为在“17世纪上半叶，尤其是1620年至1650年期间”前者被后者逐渐取代。³²⁰戈德曼分析新体制背后的动力是王权试图在“1598年亨利四世掌权以后重新夺取地盘，”³²¹试图夺回宗教战争中失去的权力。

由于官吏在宗教战争中对王权帮助甚大，因此君主希望他们的权力和重要性上升而不是下降。但他们受到官职税³²²和新起的国事专员的打扰。官吏与国事专员的矛盾在增长，大约在1637—1638年达到了顶峰。戈德曼把它与官吏中兴起的詹森派教义(Jansenism)相联系，这派思想坚持认为世界浮华虚幻，坚持拯救只能在孤独与隐退中找到。³²³

戈德曼对君主制的描绘接近于波尔契涅夫，而他对资产阶级的描绘更接近于莫斯尼尔。莫斯尼尔承认“把17世纪当作‘封建’时代，能感觉到极端矛盾之处，因为这是一个‘商业资本主义’对国家深入渗透的时代。”³²⁴是对整个国家而并非仅是城镇。垄断不是资本主义上升的中断，而是“它在这个阶段发展的条件。”³²⁵但是莫斯尼尔对官吏被贵族同化这一点非常恼火。他以一个真正贵族的鉴别力做出反应：

一个重要的官吏在法律上是一个贵族。贵族，但不是绅士，也不是领主。波尔契涅夫从未加以区分。我们能把威尼斯贵族，即那些大商人称作一个封建团体吗？法国公众是坚持这种区分的。一个官吏由于其官职而被授于贵族称号，仍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人们哀叹这样一个事实：即绅士中的真正贵族没有受国家的安排使用，公职是那些被戏称为“笔墨绅士们”的特权。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不管是官吏还是国事专员，即使是坐在有百合徽的席位上并穿着紫袍官衣，即使戴有骑士头衔，即使是男爵，即使是议会议长或王家参议院成员，莫不如此。³²⁶

莫斯尼尔否认他和帕热斯曾认为资产阶级控制了王权。“是王权统御所有的阶级来重建国家。在这一工作中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援助……”³²⁷

重要的是需要指出，在这场争论中一些问题被混淆在一起了。一是这一体制的实质，一是各阶级关系的实质，第三是王权的作用。在前一章里我们已经做出解释：为什么我们认为“封建主义”这一术语就此时的农业生产而言（市场取向的商品性农作物，即便是靠强制劳动或半强制劳动的），是含糊不清而无助于分析的。坚持认为法国基本上卷入了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并非必然地认为资产阶级已经行使实质性的政治权力。很明显，还是没有。在东欧，贵族就是资本主义农场主，当地的商业资产阶级正趋于灭亡。这并非一定要说法国王权的特殊作用与世界经济体中其它国家正好相反。萨蒙发现，“正如关于英国乡绅和贵族的争论一样，这场争议〔涉及17世纪早期的法国〕所涉及的是早期近代社会与政府的性质问题。”³²⁸确是如此！

即使在法国，君主制也远没有控制住整个局势，而只是一种力图确立君主的政治统治的制度。在这一点上，莫斯尼尔或许比波尔契涅夫更正确。法国与英国的发展中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法国旧贵族获得了相对的政治上的成功。旧贵族的短期利益无助于法国从世界经济体的劳动分工中获取最大利益的长期能力。在这一点上，波尔契涅夫比莫斯尼尔更为正确。

现在让我们回到“延长的”16世纪行将结束的“危机”，仔细看一下它对法国政治有何种影响。首先，1600—1610年法国的价格下跌事实上对法国及其资产阶级的经济极为有利。³²⁹即使波尔契涅夫也承认，那种认为工业资本家在法国毫无意义的观点是太过分的。他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的进化仍在进行，但步子放慢了。”³³⁰

问题主要是对外贸易，我们以前在讨论英国对商业危机的反应时，曾讨论过它对于国民经济的重要意义。尽管1600—1610年

的法国在某种程度上挽回了由宗教战争招致的损失，但 1610 年后又开始了一场大的衰退。这次主要是由荷兰及某种程度上英国的竞争造成的。在世界市场紧缩时期，使荷兰甚至英国能够在价格上击败法国的关键原因是，在此以前五六十年它们在工业资本和技术上积累起来的优势：

法国在所有重要的指标上都落后于它的竞争者。法国制造业的劳动分工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技术工人的短缺使企业家无法建立合适的工资水平等级制。此时绝对必要的国家补贴是随意而零星的，数量很小，资金积累未形成足够大的规模，对殖民地的直接劫掠，哺育了荷兰和西班牙的原始积累及英国的工业，而法国却被排除其外。

后果之一就是法国工业产品相对昂贵。这样，法国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就无法与荷兰和英国在其国内市场和在一定程度上也无法在国外市场进行成功的竞争。法国被迫把资金用于他途……法国的造船业和航运业及远洋贸易在经济和技术上都落后于荷兰和英国……

所有这些原因使得法国资产阶级对增加保护颇感兴趣，法国政府也努力满足这方面的要求。³³¹

这使得法国在世界经济体中处在中间层。一方面法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西班牙和德意志市场，另一方面英国和荷兰又利用法国和西班牙的市场。³³²

比起英国和联合省，法国国家机器的相对强大并非必然地有助于法国克服这种两难困境。如果那时的法国君主无保留地支持工业发展和资产阶级利益，毫无疑问法国会超过另外两个国家已经得到的领导地位。毕竟那时它们的领导地位还不是那么强大。但是法国的君主怀有矛盾心理。他们的干预并非总是有助于其国家在世界经济体中获取最大的商业利益。事实上，内夫认为英国成功

的秘密之一不在于王室意图的不同,而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国对资本家企业的干预更为有效。³³³同样,内夫认为英国此时由于相对远离于欧洲战争之外,因而可以不必像法国那样过于强调对“王室权威的遵从习惯。”³³⁴法国君主征税的能力加上法国贵族免税的能力,意味着更重的担子不仅落在了普通居民身上,也落在了资产阶级身上。

最后,我们还不能忘记,到1610年为止在世界经济体中已获得地位与未来的地位之间的联系。法国与荷兰和英国在它们国内市场上竞争的困难鼓励它们集中于具有一定传统优势的物品的生产,这些物品——奢侈品,特别是丝织品³³⁵比其它欧洲国家有相对较大的国内市场。但是从长期来看,拥有广泛市场的廉价商品才会提供一个有保障的工业基础。

三十年战争给法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军费上升,军队扩大,国家官僚制度膨胀;另一方面,国家征税加上军队在农村中的劫掠,加重了税收程度。以上两个方面互为因果。³³⁶我们已经提到了战争对波罗的海地区谷物及食品价格的普遍影响。这种情况由于1628—1633年间,尤其是1630—1631年间的大瘟疫而进一步恶化。不管是欠收导致了疾病的传播,还是疾病导致了谷物的短缺,两者的同时发生沉重打击了法国。³³⁷

从这种分析中,可以容易地看出此时的法国农民造反何以如此广泛。国家对农民的盘剥在上升,贵族对于农民的经济压榨已使其在获取税金方面困难重重。³³⁸无疑,在很多场合下这意味着一个地区的贵族和农民会同时都被王权搞得心烦,在一定程度上17世纪初期法国“(在封建主和农民之间)存在着效忠感和相互的义务。”³³⁹但是,这一看法如走得太远(某些人倾向如此),则将是个错误。因为如萨蒙所述,不仅今天的作者,就是当时的农民也曾在宗教战争后意识到,封建主“不管是新贵族还是旧贵族,与其说他们是同情农民苦难的伙伴,还不如说是造成这种苦难的部分原因。”³⁴⁰毕竟,经济发展的低速度恰恰是由贵族的政治行为造成的。³⁴¹同时,法国

的部分工业化确保了这种不满由农村扩展到了城市地区，两者与不断增加的游民无产者相联系。这些游民无产者没有固定的工作，游来游去，他们的生存限度如此狭小，以至于不能承受危机的加剧。³⁴²

罗贝尔·芒德鲁建议我们把1623—1648年广泛的反叛放在法国历史的背景下去考虑，此前此后，这类反叛都是存在的。他提醒我们，各种税收“必须被看作是经济状况极度恶化的信号，而不仅仅是唯一的、或最直接的导致反叛的原因。”³⁴³芒德鲁让我们回到了一条最富成效的道路。他要我们：

“注意不同的地域：西部，诺曼底，吉耶讷，中部（马尔歇、贝里、波旁内），这是最常受影响的地区，最常受到各种麻烦的连锁反应的刺激。这些省份面对着“延长的”16世纪上升时的中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参与其事的一个后果：1620—1680年的萧条岁月使该地区比那些靠近内陆、更加不发达的地区更为衰败，但17世纪这些农村和城市骚动不安的地区不正是上一个世纪宗教战争最为激烈的省份吗？”³⁴⁴

这实际上是一个可贵的线索，非常符合我们的总的假说，而且莫斯尼尔和波尔契涅夫都予以赞同。莫斯尼尔说：

“对每次反叛的研究都不能与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研究相分离。为什么农村反叛总是主要发生在西部、中部和西南部？是否有可能依据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来给城镇分类，并考察这种程度是否与反叛中的某些常数有关？”³⁴⁵

波尔契涅夫指出，1623—1648年的反叛之前，在16世纪有过三次反叛浪潮。第一次是与宗教改革相关的1520—1550年反叛，第二次是1570—1590年的反叛，此时民众运动“把希望放在天主教联

盟上，并自称是其徒众。”最后一次是 1590—1600 年的反叛，在形式上已是非宗教的了。³⁴⁶事实上，波尔契涅夫进一步认为，民众对宗教战争的厌倦剥去了权威的神圣外衣，这反过来又促成了 17 世纪早期重新确立国家权威的需要。³⁴⁷

波尔契涅夫的这一观点再一次引起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现代欧洲早期的宗教运动及其分支活动的意义，这些活动与国家实体的以及反过来与宗教离心力的联系。我们已经提到柯尼斯贝尔格把胡格诺运动看作是一场法国民族革命运动的观点。³⁴⁸加尔文派教徒在尼德兰北部得到巩固可能导致了尼德兰的分裂，而以同样的方式胡格诺教徒也在法国西部和南部得到了巩固，这都是合理的推测。这在当时肯定是一种恐惧。³⁴⁹在这样一个分析框架内看问题，胡格诺派呼吁天主教西班牙的援助也就不奇怪了。对胡格诺派的清算也就成为保持法国国家完整的一个步骤。³⁵⁰莫斯尼尔还指出了贪污受贿在 1620 年之后收买加尔文派骨干时所起的作用。³⁵¹

地方主义比宗教分裂是更具根本性的问题，这一点在法国南部，即老奥克西塔尼亚的胡格诺派据点发生转变的方式上清楚地表现出来。亨利·埃斯皮优发现宗教改革的据点“在奥克西塔尼亚地区和 6 世纪古罗马高卢地区的边缘地带，而天主教势力主要在北部……”³⁵²但是，他指出，当纳瓦尔的亨利成为国王损害奥克西塔尼亚事业时，“通过不寻常的转向，奥克西塔尼亚便变得同情联盟了——这是它寻求差异的唯一办法……”³⁵³最后，埃斯皮优认为，奥克西塔尼亚人以同样的“非国教精神”来拥护詹森派教义，原因之一在于“他们要保持自己的态度。”³⁵⁴埃斯皮优把这种反叛视为奥克西塔尼亚抗拒与法国合并的一种方式。这种合并是在 16 世纪被强加的，由于被迫承受的财政负担而获致加强，又因“第二个 16 世纪马赛和波尔多的经济衰退而变得更加难以忍受。这不仅与巴黎有关，还与巴塞罗纳和热那亚有关——这里又是一层套一层。”³⁵⁵

波尔契涅夫在对 1639 年诺曼底农民反叛的描述中也带有类似的论题。他追溯历史,认为在 14 世纪和 15 世纪诺曼底的农民所负担的封建义务比法国任何地方都重。因为这样一个事实以及百年战争的破坏,农民纷纷逃离,造成了劳动力极端短缺,这就导致了永久租约相对迅速地减少,而限期租约是有利于农民的。价格革命及法国在世界经济体中正在形成的作用使农民业主受到了挫折——高租金,小块土地,向自然经济的部分回归,一句话,导致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停顿。³⁵⁶当英国的自由农民正受益于对可耕土地的圈占的时候,他们的法国同行正经历着失败。波尔契涅夫指出了资产阶级的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地方官员与当地利益集团联结,操纵着叛乱;一是金融家与政府紧密联结,一心一意支持地方贵族。³⁵⁷叛乱可看作是对中央的政治措施的不满,这种措施剥夺了法国农民业主〔及当地资本家〕更广泛参与新的世界经济体的收益。

在西部也同奥克西塔尼亚一样,人们认为国王寻求的“民族的”前途在经济上是倒退。在传统的名义下,外省要求更多而非更少的经济进步。³⁵⁸1639 年诺曼底反叛后继之以普罗旺斯、布列塔尼、朗格多克和普瓦图的反叛,这并非偶然。³⁵⁹诺曼底反叛的直接背景是在 1632—1633 年瘟疫之后,诺曼底正逢经济困难之时,国王不愿减免税收负担,这并非偶然。因为:“国王陛下承受巨大开支的负担,不能如愿地减轻他的人民的负担。”³⁶⁰他无法这样做,因为钱都用来创造法国民族实体了。

假定——巨大的历史游戏——法国曾有一个不同形状的地理实体,只包括法国北部和西部,并以鲁昂为首都。假定奥克西塔尼亚自 13 世纪以来就是一个分离的国家。在这样一个被截短了的法国中,中央国家机构的国家利益是否会与资产阶级的商业利益更加协调一致呢?这样一个看起来弱小的法国是否能像英国那样通过创造一个工业基础来回应正在兴起的世界经济体?或许吧。

但这样的法国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法国有些不伦不类,又被宗教和地方斗争撕裂了。16 世纪欧洲朝向单一宗教国家的压力同 20

世纪非洲朝向一党制国家的压力是同样强大的，因同样的原因，同离心力斗争的需要也是如此。但代价是沉重的。在法国，代价是按贵族的条件去同贵族达成协议——“领主的反动”、资产阶级的“封建化”。在17世纪没有发生内战，只有投石党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另一时代、为了另一目的爆发于1789年，有些为时过晚。在17世纪，法国参与行政的资产阶级即穿袍贵族，必须牢记他们不能过多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否则国家的完整和参与行政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就会受到威胁。

最后，英国和法国王权的不同作用(作用，不是意图)是个关键性的因素。一种观察方法认为那个时代的君主把政治斗争视为破坏一切非政府团体的各种特权的手段，如库珀所论，他们反对城镇的斗争(随后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一些部分)要比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更为成功。³⁶¹布罗代尔认为城镇受到君主们的“制衡”和“管束”。³⁶²按这种观点，地主阶级利用国家来加强自己在经济扩张洪流中的地位。从这一角度来看，投石党人尽管有所失，却胜利了，而英国贵族尽管有一场复辟，却失败了。最后，布罗代尔认为英国在世界中的首要地位将是伦敦的首要地位，伦敦“在1688年和平革命后按照自己的要求建设了英国。”³⁶³

摇摆于资产阶级和贵族的要求之间，英法两国的君主更倾向于满足贵族的要求。不同之处在于，在英国，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强大的中央相联结，而在法国，他们只是同国家的外缘相联结。这种差别的形成是出于对欧洲世界经济体框架下的地理重要性的考虑。

一个后果是，为了遏制生性蛮横的资产阶级，法国君主一方面要加强自己，另一方面要通过官吏的贪污受贿来收买他们。这反过来分散了他们对工业的投资。在英国，贵族为了生存就不得不学习资产阶级的方式，并部分地融入资产阶级。在法国，压力来自资产阶级要求生存。在英法两国，中心都战胜了边缘。但在英国这意味着民族资产阶级事业的进步，而在法国则意味着资产阶级的挫折。

英国内战爆发于最后可能的时机。在随后的 150 年地主阶级的复苏即使在英国也比比皆是。但至少资产阶级获得了城市权力。地主阶级带有较少的贵族色彩和较多的乡绅色彩,这些乡绅最终变成了好的资产阶级。在 17 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过于软弱而无法造就出一个克伦威尔。直到 1789 年,他们才同国家利益相协调一致。到那时,世界经济体已经展开,法国由于过迟而无法在其中获取首要地位了。

注释

1 多梅尼科·塞拉,“European Industries, 1500—1700.”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5, 1970. 5. 鲁杰罗·罗马诺称 16 世纪几乎没有“真正的”工业,只不过“基本是纺织工业、矿物提炼工业和造船工业。其余所有的生产活动基本上建立在个体手工劳动的基础上。” *Re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XIV, p. 500。

2 塞拉,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5, p. 64。

3 “在欧洲的许多地区,在帝国和西班牙的管辖范围内,包括弗朗什-孔泰和南尼德兰地区(所有这些地区都名义上统一于皇帝查理五世),工业企业的产量明显下降,规模缩小,工业的相对重要性下降。”约翰·V. 内夫, *War and Human Progress* (New York: Norton, 1963) 6. 内夫在第 6—7 页给出前哈布斯堡帝国复合体中每一地区衰落的时间。

4 同上书, p. 6。

5 塞拉,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5, p. 65。

6 同上书, p. 66。见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pp. 314~319。赫克舍在对瑞典的描述中称从 1520 年到 1600 年间是“中世纪经济成熟”的阶段,这有助于佐证塞拉的观点:“16 世纪瑞典经济的最显著之处不在于其最终有一个变化,而在于这个变化来得如此之晚。瑞典在这一阶段始终基本上保持着中世纪的状态。尽管这个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保持着隔绝状态,它仍然面对过去,而不是面向未来。政府所履行的责任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统治者和纳税人都感到受自然经济继续存在的困扰。政府未支付海外任何真正的开支,所以它不需要通过出口取得外汇。人民的生活方式基本保持不变,故而除了盐,进出口贸易几乎无人关心。”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weden* (Cambridge, Mas-

sachusetts: Harvard Univ. Press, 1954), pp. 77~88。弗朗索瓦·毛罗坚持用关键工业的现象解释英国和荷兰的领先地位：“是采矿业和冶金工业在商业革命中扮演了类似于钢铁工业在当代第三世界所扮演的角色。商人阶级身边出现了工业家阶级。两者都在英国和荷兰的暴富中存在；一个帮助另一个，一个提供机器，另一个为大批工人提供消费产品。安特卫普—列日—洪兹肖特是16世纪比利时的成功的三角区。伦敦—纽卡斯尔是伊丽莎白女皇时期英国的前工业革命的轴心。”*Le XVIe Siècle européen*, pp. 298~299。

7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p. 233。然而，波斯坦在其他场合很不情愿地表明他看到英格兰和意大利在中世纪的关系类似殖民统治被驱除后那种借取资本和技术的20世纪的殖民主义循环相提并论。他争辩说区别在于英国增长的渐进性，英国的起因主要是人口增长和其他国内因素，或许再加上借贷和外国投资。他在这里争辩说意大利人的统治“与作为整体的民族经济景象比较是第二位的和相对不重要的。”实际上情况更可能是：意大利人的影响最有效的地方并不在于他们的直接投资，也不在于他们的较高水平的技术指导，而在于他们在帮助国王扰乱国家经济生活的方面所起的作用。王家税收和王家财政从土地所有者阶级和土地劳动者阶级中抽取了大量原先的不动产，并将它转到商人、银行家、军需品承包商和战争爆发户手中，通过这种办法，本来可以积蓄起来的部分国家财富可以被用于商业和工业。“Italy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ngland in the Middle Ages”，载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 4, Fall 1954, p. 345。

8 内夫,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in France and England, 1540—1640* (Ithaca: Great Seal Books, 1957). p. 1。

9 整个早期中世纪，但更主要地是在13世纪，英国是食品（包括粮食）的出口地。其后，其他的和更重要的谷物产地出现了。作为德意志在易北河以东的斯拉夫地区推行的殖民化的结果，大片新的农业产地被开辟，从13世纪末东德意志和波兰的裸麦开始向西流动。到14世纪初，巴尔干的粮食开始提供给佛兰德斯，至此它将英国的粮食从斯堪的那维亚市场排挤出去。波斯坦，*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p. 121。

见 A.R. 迈尔斯 (A.R. Myers): “直至16世纪，英国的出口除呢绒外大部分是原料，包括金属、小麦及其他食品、羊毛和皮革；但在14世纪以前，英国某些商品的出口，尤其是小麦，面临着新近殖民化了的东德意志地区日益强大的竞争。” *England in Late Middle Ages*, Volume IV of the Pelican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Penguin Books, 1952), p. 57。

10 见 F. J. 费希尔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I, pp. 197~207。

11 见波斯坦,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of England and the Hanse (1400 to 1475)” 载 Eileen E. Power and M. M. Postan 编, *Studies in English Trad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66), esp. pp. 139~141。见 N. S. B. 格拉斯 (N. S. B. Gras): “都铎时代, 发生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伦敦结束了早先不依赖外国谷物的状况。……伦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需求, 这种需求又导致了有组织的进口贸易的产生。……当认识到在 16 世纪谷物总出口量有巨大增长时, 所有这些就更加有趣。” *The Evolution of the English Corn Market*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15), pp. 101~102。见玛丽安·马洛维斯特, “Histoire Sociale: époque contemporaine, 载 *IX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I: Rapports*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50), p. 310。

但是参看范·迪伦: “[在 17 世纪], 英国能自给自足, 而荷兰则不能。这就是为什么最初进口的谷物主要总是流向荷兰。”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II, p. 134。又见艾伦·埃弗里特, 载 *Agrarian History*, IV, pp. 524~527。

12 G. N. 克拉克, *The Wealth of England from 1496 to 1760* (London: Oxford Univ. Press, 1946), pp. 27~28。但挪威也向苏格兰、丹麦和荷兰出口农产品, 这减少了它对英国的依附。见利思 (S. G. E. Lythe), *The Economy of Scotland*, p. 147。

13 都铎王朝期间威尔士在行政管理上的变化消除了马尔歌地方的无秩序, 从而大大帮助了牛贸易的发展。卡罗琳·斯基尔 (Caroline Skeel), “The Cattle Trade Between Wales and England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ies”, 载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4th Ser., IX, 1926, p. 138。

14 艾琳·E. 鲍尔 (Eileen E. Power), “The Wool Trad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载鲍尔和波斯坦编 *Studies in the English Trad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66), p. 39。

15 迈尔斯, *England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p. 132。

16 见 P. J. 鲍登, *The Wood Trade in Tudor & Stuart England* (London: Macmillan, 1962), pp. 203~212。

17 见波斯坦,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p. 244。见拉姆齐 *Tudor Economic Problems*, p. 101。

18 “12 世纪晚期以来迅速扩大漂洗机的使用, 用水力提高了长期以来用手或脚做的事, 用水转动磨的方法首先出现在科茨沃尔德、奔宁山区和湖区,

到 14 世纪初,呢绒工业已经移到这些地区。精纺绒线,尤其是东英吉利生产的,不需要漂洗,因而对水力就不至于很依赖。但由于城市行会的限制政策,甚至精纺制品也倾向于移到乡村里去。行会保持自己产品的价格的努力加速了它们的衰落,因为无组织的乡村纺织工人愿意接受低工资……这样,中世纪晚期英国乡村纺织工业的发展就归因于技术和组织上的进步,而不是(像有时被宣称的那样)归因于爱德华三世将佛兰德斯织工引进英格兰。”迈尔斯, *England in the Middle Ages*, p. 56。

19 M. 马洛维斯特,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 p. 178。

20 “13 世纪[呢绒]工业在曾经是最繁荣的城市中心的地方衰落,与此同时它在农村地区的扩展一样是醒目的。但引起史学家们注意的是这个问题在城市一方面的内容,而且他们由此错误地推论出这一工业整个地衰落了。”E.M. 卡勒斯-威尔逊,“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载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L, 1941, 59, 见爱德华·米勒:“14 世纪[英国纺织工业的]产量在一个许多学者认为是经济缩减的时代里迅速增加了。”“The Fortunes of the English Textile Industry During the Thirteenth Century.”载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VIII, 1. Aug., 1965, pp. 39~60。

21 马洛维斯特, *Economic History*, p. 179. 见波斯坦:“只要英国出口主要由羊毛构成,英国商人就不需要走出很远去寻找市场和消费者。羊毛是一种原料,它的买主是外国呢绒制造者;并且,恰恰呢绒生产中心不仅高度集中,而且位置很近;主要在低地国家。另一方面,成品呢绒必须售给有潜力的买主,并被销往有潜力的消费中心,就是说要销给欧洲大陆内外的所有男男女女。”*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p. 245。

22 波斯坦,载鲍尔和波斯坦编, *Studies in English Trade*, p. 103; 参见拉克, *Wealth of England*, pp. 39~40。

23 见阿尔温·A. 拉多克(Alwyn A. Ruddock) *Italian Merchants and Shipping in Southampton, 1270—1600*(Southampton:University College, 1951), 各处。

24 见雅克·埃尔斯(Jacques Heers), “Les Génois en Angleterre: La crise de 1458—1466.”载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Milano: Instituto Edit. Cisalpino, 1957), II, pp. 812, 824。

25 见波斯坦, *Studies in English Trade*, p. 101。

26 15 世纪羊毛贸易和呢绒贸易之间的显著区别在于这两种商品在市场上销售的条件。除了由意大利人进行的运输,羊毛由英国人在英国拥有的一个

市场——加莱卖给欧洲大陆的买主。相反地，外国人在欧洲大陆销售呢绒同英国人一样广泛，从欧洲西海岸周围的普鲁士到意大利都有呢绒销售。这一扩展和不受保护的市场区域，比起集中的受保护的并有意大利人贸易补充的加莱市场，更易受动乱的影响。英国呢绒更大的市场是波罗的海地区，尤其是普鲁士和波兰、低地国家、下莱茵地区，最后是法国南部和吉耶讷地区。1448—1476年间，英国不仅失去了吉耶讷地区，而且巴尔干和低地国家的市场因为政治纠纷而解体。因而，这三个市场区域的情况可以用来说明呢绒贸易衰落的原因。H.L. 格雷 (H.L.Gray), “English Foreign Trade from 1446 to 1482”, 鲍尔和波斯坦编, *Studies in English Trad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66), p. 25。

27 “15世纪中期以前，英国呢绒商人已从他们的所有更远的据点中被排除出来。斯塔的那维亚市场在15世纪、16世纪之交失去了。与普鲁士的联系以及通过普鲁士与整个中欧和东欧地区的联系，因英国人与汉萨同盟在30年代与50年代的连续冲突而中断。英国贸易在尼德兰的集中、英国工业在未完成最后加工的呢绒方面的专门化、公司和商人企业家的垄断的兴起——中世纪结束时英国贸易的所有这些类似的特点，都可以追溯到百年战争末期英国中世纪帝国的解体。”波斯坦,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 1942, 3. 又见波斯坦, 载鲍尔和波斯坦编, *Studies in English Trade*, p. 153。

“但无疑是英国人掌握着当时的安特卫普‘诸国’区域内的价格。作为把商人从全欧洲各地吸引到这里的原因，选择安特卫普作为英国呢绒的‘集散城市’仅次于建立香料贸易中心城市。15世纪在面对许多困难的情况下，英国呢绒贸易奋力争取在尼德兰获得一个商品集散地。它所表现出来的坚韧性得到了足够回报，而这种坚韧性的确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英国商人没能使自己留在欧洲沿海其他地区，故而来到尼德兰试试运气。对这样一种观点有许多值得商讨的地方：即英国呢绒贸易在安特卫普的发展，正如将要垄断这一贸易的商人冒险公司的兴起一样，不起一种增长的作用，而起英国海外贸易整体紧缩的作用。”S.T. 宾多夫,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 pp. 53~54。

28 宾多夫, *Tudor England Vol. V of The Pelican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Penguin Books, 1950), p. 20。

29 宾多夫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 p. 54。

30 无论在国际贸易还是在内部交易的问题上，包装、运输、装卸、法律诉讼、税收等费用加在一起，只不过是成本的一小部分。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事

实；在 15 世纪，这种西方贸易须得拥有比热那亚的贸易更为有利的条件，后者保持着更为沉重的税收政策。在任何情况下某些商业技术（运输和附属设施）的发展足以使较低的价格成为可能，无论昂贵商品如英国呢绒，还是廉价产品如明矾，这些成本都保持低水平：一个更加现代的经济标志……

“信贷的状况也很重要。在伦敦，一个人获得现金很容易，没有各种多余的手续，也不必或多或少地使用一些幕后手段。”埃尔斯，*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ffari*, II, p. 832。

31 “英国的海外贸易……由单一的产品——呢绒的交易构成，其结果就当时而言是导致了真正庞大的工业化，并涉及伟大的农业革命和整个国内经济格局的变化——返回来的是大量产品（包括许多英国所不能生产的产品），连同各种工业制成品，以满足开化的和喜好奢侈的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增长着的需要。英国为北欧农民提供呢料，反过来吸收了欧洲技术创造的产品和欧洲商船队从东方和南方运回的产品中的很大一部分。贸易的平衡完全依赖于欧洲处理、运送和购买呢绒的能力，而英国几乎可以无限地提供呢绒。”劳伦斯·斯通，*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 p. 39。

32 见斯特雷耶，*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pp. 44~45。赫克舍指出英国在 12 世纪下半叶亨利二世治下有一个统一的币制，而法国到 1296 年才发展了这种制度。*Mercantilism*, I, p. 119。

33 例如，马克·布洛赫指出：“[威廉的征服]恰恰发生在整个欧洲的经济和思想状况的转变开始有助于反分裂斗争的时候。有意义的是，几乎从一开始这位诞生于一场打赢了的战争的君主似乎在早期就拥有一批受过教育的人员和官僚机器”……

“尽管就某些方面而言没有一个国家是十分完全地封建化的，封建主义是一种最终加强国王权威的体系。在这个每一块土地都有租佃关系的国家，国王实际上是所有领主的领主。没有哪里更有秩序地采用军事采邑制度。”*Feudal Society*, pp. 429~430。

34 例如，赫克舍认为：“关于中世纪统一国家难以产生的两个主要原因之一是，现有交通设施的状况，尤其是陆上交通。在原始技术的条件下，在出现重大发明之前，陆路交通总是比内陆水路和沿岸航线造成更大的困难。一个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与其陆地面积相比，明显地有很长的海岸线；因此就比大陆国家享有达到政治统一的更大可能性，这些大陆国家中数德意志的情况最糟。”*Mercantilism*, I, p. 36。见克拉克，*The Wealth of England*, pp. 4~5, 44~45。

35 这句话是特雷弗-罗珀说的，见于“England's Modernizer: Thomas Cromwell”载 *Historical Essays* (New York: Harper, 1966), p. 74。

36 G.R. 埃尔顿 *The Tudor Revolution in Govern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53), p. 4。

37 英国的不同地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同城市)……在 14 世纪和 15 世纪都有他们不同的经济历史，正如 19 世纪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被正确地看作是各自不同的历程。在这方面，资本主义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相互影响。”多布，*Studies*, p. 21。

38 埃尔顿，*Tudor Revolution*, p. 415。还有，“根本的变化是一种在教会和宫廷中训练出来的官僚集团转向一种在大臣的官邸中训练，然后又在国家机构中服务的官僚集团[p. 308]。”

39 见彭里·威廉斯 (Perry Williams) 和 G.L. 哈里斯 (G.L. Harriss), “A Revolution in Tudor History?”载 *Past & Present*, 25, July 1963, 3—58; G.R. 埃尔顿 “The Tudor Revolution: A Reply.”载 *Past & Present*, 29, Dec. 1964, pp. 26—49; G.L. 哈里斯和彭里·威廉斯, “A Revolution in Tudor History?”载 *Past & Present*, 31, July 1965, p. 87—96; G.R. 埃尔顿, “A Revolution in Tudor History?”载 *Past & Present*, 32, Dec. 1965, pp. 103—109。

40 希尔, *Reformation to Industrial Revolution*, p. 28。我认为这是一个较好的概括，比埃尔顿更极端的看法要好：“16 世纪 30 年代的诸项改革，政府的官僚化，都继续下来，保持了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是现代政府的标志，甚至在内战期间也防止了真正无政府状态。”*Tudor Revolution*, p. 147。

41 希尔，同上书，p. 25。

42 “16 世纪，英国城市被纳入单一的国家整体，在某种程度上这在欧洲是无与伦比的。……伦敦的重大扩展，及其作为一种统一力量而增长着的力量，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后的时代。……从法律、秩序和国内警察的确立中，从威尔士和北部的私人战争的结束中，从特许权的消失和交通的缓慢发展中，伦敦商人得到好处，逐渐打破地方公司的特权。同时经过得到伦敦资助的新教传教士的努力，使王国内的蒙昧无知的僻远地方真正理解了首都已接受的宗教。”希尔，同上书，pp. 25—27。

赫克舍还强调了同大陆相比英国的特殊地位：“没有哪个国家像英国这样相对容易地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征税体系。这主要有两个因素：第一，正如在所有其他领域，英国君主制具有统一的和不可动摇的力量；第二，海运具有极大

的重要性，比起德、法那样有重要地理障碍的情况，使陆路和内河水路的重要性大为下降。

“英国占据了特殊的地位，并非仅仅是因为它对陆路和水路的征税不具重要性。它还能够发展出一套全国性关税系统，完全独立于市政税收并由国家掌握。这一关税系统既不因为若干免税而减轻，也没有进行通常的包税。

“再者，它的特点是关税不仅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且显示了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之间早熟的区别。”*Mercantilism*, pp. 16, 51, 52。

见吉诺·卢扎托，*L'età moderna* (Padova: CEDAM), p. 14。

巴里·苏普莱较保守地阐述了经济一体化问题：“我们还不能说拥有关于生产要素或大多数消费品的全国市场。但地区专门化和贸易已充分发展，能够产生一种经济平衡，这种平衡对商业动荡具有特殊的敏感。”*Commercial Crisis*, p. 3. 关于伦敦市场的成长对全国经济发展的刺激问题，参见 F.J. 费希尔的两篇文章：“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ndon Food Market. 1540—1640,” 载卡勒斯—威尔逊编，I, pp. 135~151; The Development of London as a Centre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载卡勒斯—威尔逊编，II, pp. 197~207。

43 “在由中世纪向现代的过渡方面，英国人在文化方面落后于西欧和中欧的其他地区，包括西德意志和南德意志，无论这一过程被认为是从 15 世纪开始，还是更早；也无论是在工业和物质文明领域还是在思想成长和生活艺术等非物质领域。但在后一个世纪中，英国社会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以至于这个世纪末他们已经与他们的大陆邻国并驾齐驱（也可能是值得怀疑的）。英国的成就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并且都归因于这个岛国的加速发展，尽管大陆在 17 世纪的停滞甚至比 16 世纪末更为明显。……”

“伊丽莎白时期英国就企业而言具有不同的优势：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地区都卷入了毁灭性的战争，这些战争对英国工业界来说是幸运的，因为这极沉重地打击了它们最强大的工业与商业的竞争者。”索尔斯坦·维布伦 (Thorstein Veblen), *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n Arbor, Michigan: Ann Arbor Paperbacks, 1966), pp. 92, 98。

44 R.B. 沃纳姆，“The British Question 1559—69”，*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R.B. 沃纳姆编，*The Counter-Reformation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1559—161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8), p. 209。

45 同上书，p. 212。

46 同上书。p. 233。

47 见赫斯特菲尔德关于包括英格兰在内的整个欧洲的基本问题：“16世纪各国政府发现它们在面对相对不足的资源的情况下承担越来越多的任务。……[他们]面临的情况是中产阶级不能或不愿承担全国政府开支的主要部分。但是如果中产阶级被证明是不合作的,那么君主政体本身就中产阶级而论便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不清了。……[这样就导致了]整个欧洲都在力图找各种借口征税,力图在现有的商业与工业发展过程中榨取财源。这些作法必然引起经济的扭曲,并且在很大规模上进行。最鲜明的表现是广泛出卖官职。”J. 赫斯特菲尔德,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pp. 139—140。

然而,参见克里斯托弗·希尔关于英国的论述:“都铎时期的和平与英国没有常备军,按欧洲大陆的标准,表明税收相对轻。……捐献的少量金额又使英国不能发展像法国那样强大的官僚机构。” *Reformation to Industrial Revolution*, p. 101。

48 基本的事实是,王权的复辟就是王室财产的恢复,为了成为这个王国中最有力量的人,国王必须成为最富有的人。实际上,至15世纪末,这意味着国王必须成为最大的地主。埃尔顿, *Tudor Revolution*, p. 25。

49 专制王权时期是随着修道院的解体而开始的。修道院的解体拯救了统治阶级,并且通过封赐新的家族自下而上地补充了统治阶级。此前的一段时期内,地主一直在设法通过圈地和提高租率来重建他们的经济力量。但这些办法激起了农民的不满,势必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以从政治上加强地主的经济和社会力量。然而,这把专制王权引入一个从未得到解决的两难困境,并最终导致了它的垮台。如果放手让地主行动,君主专制制度就会面临农民发动的将会推翻统治阶级的暴动;如果君主专制制度限制地主,保护农民,“它将面临统治阶级中的暴动,这将威胁到君主政体。”布赖恩·曼宁(Brian Manning), “The Nobles, the People, and the Constitution”, *Past & Present*, 9, Apr, 1956, p. 48。

50 见戈登·巴索(Gordon Batho), “Landlords in England. A. The Crown,” 载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琼·瑟斯克编, IV: 1500—164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7), p. 273。

51 G.E. 艾尔默(G.E. Aylmer), *The king's Servan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61). p. 7。

52 J.H. 赫克斯特(J.H. Hexter), “The Myth of the Middle Class in Tudor

England,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1963), pp. 117~162.

53 斯普纳(Spooner),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p. 15. 劳伦斯·斯通说从1540年开始,有一个“时期,发生三次剧烈高涨与严重衰退交替的周期,结果导致1553年财政崩溃。”“State Control in Sixteenth-century Englan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VII, 1, 1947, p. 106.

54 克里斯托弗·希尔,“Som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Henrician Revolution,”载 *Puritanism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58), p. 44. 马克·布洛赫称:“修道院的解体(1536—1539)加速了阶级融合。国王赏赐或出卖了最大的部分。所有阶级,贵族、乡绅(他们当中许多人曾作为管理人员或耕种修道院土地,为僧侣服务)、商人(伦敦商人联合会)都是受益者。”*Seigneurie Francaise*, p. 122.

55 见克拉克, *Wealth of England*, pp. 64~65. 劳伦斯·斯通认为:再者,家族体系解体的紧迫需要导致贵族出售他们的土地。见 *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1558 - 1641*, abr. ed. (London: Oxford Univ. Press, 1967), pp. 76~88.

56 R.H. 托尼,“The Rise of the Gentry, 1558—1640,”载 E.M. 卡勒斯—威尔逊编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St. Martin's, 1965), I, p. 202.

57 这一点尤其是托尼的一项最激烈的批评中的观点。库珀(J.P. Cooper)认为,许多贵族拥有中等规模的地产,而许多世俗人员却拥有十个以上的庄园。见“The Counting of Mancor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3, 1958, pp. 381~383.

58 托尼,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 p. 189.

59 “如果不是被误导,一个人很难在严格的‘阶级’概念下观察到现代社会的开端,特别是如果坚持把阶级的概念限制在马克思主义的三重划分下。在一定时期,雇佣工人可能反对他们的雇主;在这以后,他们也可能反过来同他们的雇主一道反对商人资本或政府的压迫;农民很可能在一定时期起来反对国王削减他们的贵族的权力的图谋,同时又反对贵族增加封建租税的企图。在整个国家的层面上,农民从来没能建立起真正的团结:相反,人们经常发现城市居民是农民的压迫者。每一个人都同时属于数个社会集团:他的家族、他的行会、他的城镇或乡村、他的郡——在16世纪称作“国家”——在现代意义上的他的国家和他的经济阶级。无疑,他最经常地用一些概念来界定自己,这些概念是不同的身份的合并。一个人说‘诺福克(Norfolk)的织布工人’而不是说织布工人整体或诺福克人整体。个体的人关于他们自己的身份,他们的忠诚归

属的概念仅仅依据当时的环境而定。关于单个人“基本的”忠诚是什么的问题，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这不仅是因为资料难以估价，而且因选择极少是抽象确定，而是在特定的环境下确定的。C.S.L. 戴维斯，“Les révoltes Populaires en Angleterre (1500—1700).” *Annales E.S.C.*, 24. I. janv. - févr. 1969. pp. 59 - 60。戴维斯关于社会归属的自我确定的方式和复杂性的论述当然是真实的，但并不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模式相抵触。戴维斯在这里有助于提醒我们，阶级地位是地区性的，而不是全国性的。

60 托尼 *The Agrarian Problem*, p. 195。

61 劳伦斯·斯通，“The Anatomy of the Elizabethan Aristocrac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VIII, 1 & 2, 1948, pp. 3~4。

62 同上书, p. 15。

63 同上书, pp. 37~38。见托尼：“用以进行归纳综合的材料几乎没有收集在一起。但是说许多贵族家庭——尽管不仅是他们——在内战以前的两代人期间面临一个财政危机，可能是过分的。”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 p. 181。

64 劳伦斯·斯通，“The Nobility in Business, 1540—1640.”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X, 2, Dec, 1957, p. 61。

65 同上书, p. 60。

66 见 H.R. 特雷弗-罗珀，“The Elizabethan Aristocracy: An Anatomy Anatomize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II, 3, 1951, pp. 279~298, 并答复：“但是特雷弗-罗珀先生指出我夸大 16 世纪 90 年代的危机的长期严重性，这可能是正确的。”，劳伦斯·斯通，“The Elizabethan Aristocracy——A Restatement,”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V, I, 2, & 3, 1951—1952. p. 311。在结论部分，斯通说：“[特雷弗-罗珀]否认大部分伊丽莎白时代的贵族完全沦入经济衰落中，这似乎与事实不符。……[p. 320]” 又见库珀，*Encounter*, XI, p. 388；劳伦斯·斯通，“Letter to the Editor,” *Encounter*, XI, 1, July 1958, p. 73；J.H. 赫克斯特，“Letter to the editor,” *Encounter*, XI, 2, Aug., 1958, p. 76。

67 特雷弗-罗珀，*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I, pp. 290~291。

68 同上书, pp. 291~292。P.J. 鲍登认为衰退比一些人设想的要轻，他就此进一步解释道：“然而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地主也不见得注定要遭受实际收入的下降。前面假设地租是地主唯一的收入来源，实际上这并不代表真实情况，地主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收入来自各种渠道。如果不是为市场生产的话，大多数地主可能从事直接的农耕以满足家用。……”

除了地租收入和直接耕作的收获外，……大多数地主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是木材。“Agricultural. Prices, Farm Profits, and Rents.”载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琼·瑟斯克编, IV; 1500—1640(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7), pp. 675, 677. 鲍登称有些地租是固定的而另一些则不是, 实际的后果有二: “在不同的租借地之间, 地租的范围扩大了;” “较好的和较差的土地之间价格的差别却[缩小了], [pp. 689, 693].”

69 斯通, *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p. 94.

70 J.H. 赫克斯特, “The Storm Over the Gentry,” 载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1963) . p. 133. 如果一个人要相信赫克斯特, 论争中就可能出现两个方面——托尼和特雷弗-罗珀——但是, 赫克斯特正确地发觉这两个对手都是“假马克思主义者”, 他以自己的“辉格党的解释”来与之对立。然而更难理解的是经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赫克斯特的论据实际上可以划为三类: 一类实际上是亲托尼的(和“更糟的”, 与克里斯托弗·希尔一致), 第二类是特雷弗-罗珀的, 第三类是与两者都不同的。根本不能确信第三类在这些类别中是最广泛的。而且, 正如引文所显示的, 赫克斯特有时创造了不真实的区别。

71 希尔, *Puritanism and Revolution*, pp. 36~37.

72 库珀 *Encounter*, XI, p. 381. 赫克斯特也希望区别 peerage 和 aristocracy, 把 peers 的较小的儿子算作 “aristocrats” 而不是 “gentry”。*Reappraisals in History* p. 127.

73 F.J. 费希尔,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The Dark Ages in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Economica*, n, s., XXIV, 93. 1957, p. 17. 然而, 费希尔还提醒我们这些范畴的旧含义还没有失去其社会影响: “如果土地本身并不足以保证达到社会幸福, 绅士的身份也并非不可企及。乍一看这是真实的。16世纪和17世纪的身份制度似乎对新冒起来的人并不怎么有利。据我理解, 这个体系至少在其天然的表现形式上, 本质上是生物学的。这一体系建立在有色的藩篱——尽管是血液的颜色而不是皮肤的颜色——的基础上。一个人的地位更多地依赖于拥有一个早已声名卓著的祖先, 而不是他自己的成就。这个祖先离他越远, 就可以假定他的血在某个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的血管中就越少, 这个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的地位就是越高。我认为16世纪最可悲的事情之一就是, 伯利 (Burleigh) 勋爵——一个用任何合理的标准衡量都不失为卓越的人——去尽力证明自己是一个威尔士小诸侯的后代。而这个威尔士小诸侯可能从来就不存在, 而且即使存在过, 也同勋爵家乡山坡上的绵羊没什么区别 [pp. 13~14].”

74 克里斯托弗·希尔,“Rec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ivil War.”载 *Puritanism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58), p. 8。

75 朱利安·克伦威尔(Julian Cornwall),“The Early Tudor Gent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VII, 3, 1965, p. 470。他补充说:“他们实际上是主要的土地所有者阶级,远远超过了当时在任何情况下都为数很少的贵族。”

76 托尼附带地讨论说,乡绅,或者在争论的这一点上不妨说是地主,拥有“一个不由法律区别而定,而是通过共同的估定加以确定的地位。……”*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 p. 174。

77 同上书, p. 197。

78 同上书, p. 174。

79 同上书, p. 175。对荷兰情况的这一估计与最近的一篇博士论文观点相对立,这篇论文的简短摘要已经发表。它认为,在当时的荷兰经济中,乡村部分完全同英国一样重要。见让·德·弗里埃(Jan de Vries),“The Role of the Rural Se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utch Economy: 1500—170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XI, 1, Mar, 1971, pp. 266—268。

80 托尼,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 p. 175。

81 皮朗教授在一篇著名文章中已讨论过:每一个传承的时代,资本家队伍的正常的补充不是来自前一个时代的资本家,而是来自出身卑微的人,他们奋力上进,终于形成一个新富豪群体,然后又沉陷到高贵而麻木的状态中,这就轮到他们被取代。在英国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历史当中,有些时候可以发现多少相同的这种上升与停滞的交替变化。在哈林顿(Harrington)写作之前三代人就已是这种情况。“R.H. 托尼, Harrington's Interpretation of His Age,”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941, p. 218。

82 同上书, p. 207。

83 见 H.R. 特雷弗-罗珀 “The Gentry, 1540—164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upplement 1, 1953, pp. 4—24。关于这一部分争论的继续,见 R.H. 托尼, “Postscript,” 载 E.M. 卡勒斯-威尔逊编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St. Martin's, 1965)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pp. 124—129; 希尔, “Recent Interpretations,” p. 9。

84 特雷弗-罗珀,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pp. 26, 27, 30。

85 赫克斯特,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p. 131。

86 同上书, pp. 135—136。赫克斯特从来没有因形象化的思维而不知所措,

但是不喜欢统计数字。在另一处，他谈起早期斯图亚特的英国：“农村乡绅们填补了由于权贵们暂时没有能力而造成的真空——不是托尼教授所说的生气勃勃的顽强的小乡绅，也不是特雷弗-罗珀教授所说的陈腐的败落的乡绅，而是富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小贵族，他们在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的议会中享有席位。见库珀关于赫克斯特对统计数字的态度的评论：“最后，与赫克斯特教授相反，我相信，如果起初就对账目和租金进行细致的研究，同时少一些对采邑的计算，争论就绝不会按现在的方式进行。为了对斯通先生公平起见，我要补充说：从他最初致力于这个题目起，他已就这项研究花费了大量时间。我猜想，斯通先生和我至少都同意有必要将这项研究继续下去，而不是像赫克斯特教授所建议的将其放弃。”“Letter to the Editor”, *Encounter*, XI, 3, sept, 1958, p. 74。

87 赫克斯特,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p. 142。

88 同上书, p. 147。

89 劳伦斯·斯通, *Encounter*, p. 74。

90 “如果我不再能毫无保留地接受托尼教授的这个主旨，即在 1540 年到 1640 年间，乡绅通过牺牲贵族(peerage)而崛起，或者詹姆士一世时期的贵族在地产管理上与伊丽莎白时代显著不同，就不会否认某些家族组成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当中有人兴起；也不会否认，这些家族中有许多人，尤其是在早期斯图亚特时代，因为官职收益、职业和贸易而提高了地位，而不是因为他们土地上的收获物。”戈登·巴塞，“Landlords in England. B. Noblemen. Gentlemen, and Yeomen.”载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IV: Joan Thirsk, ed., 1500—164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7), p. 285。但巴塞补充说：“然而，不能夸大官职和政治影响对提高一些家族的社会等级的重要性。当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被幸运的少数所享用时，大多数宫内职位和中央政府的职位所得到的报酬很少；并且即使在斯图亚特时代，这些职位也不允许从官方费用中抽取很大的部分[p. 289]。”

91 J.H. 赫克斯特，“A New Framework for Social History,” *Reappraisals*, p. 14。

92 J.H. 赫克斯特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pp. 103, 105。

93 同上书, p. 103。

94 同上书, p. 110。

95 “16 世纪上半叶是一个在经济控制上进行试验并取得更多经验的时期，但没有证据表明商业自由有所提高……”“都铎王朝经济统治的主要目标

是安全而不是繁荣……”“都铎王朝在行政上的矛盾，也许还有整个体系崩溃的最终原因，都在于这个家长式国家的运行程序。或者说，社会公正和保守主义因实施有计划的经济自给与机会主义的战争财政的紧迫需要而被牺牲。历届都铎政府都是那些社会变动与新兴资产阶级最坚决的理论上的反对者，而这些政府本是应从新兴资产阶级那里取得很大支持的。”斯通，*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VIII, pp.109, 111, 115。

96 赫克斯特，*Reappraisals in History*, p. 91; cf. also pp. 83~84。

97 正如希尔指出的，这可能是事实：“在那个通货膨胀的世纪，似乎是农场主、自耕农和较小的地主最先培养了成功所必需的资产阶级品质：节俭、勤奋、敏于榨取租金和窥测市场，适度消费和将利润进行再投资。保持着传统消费水平的贵族和上层绅士的适应性变化更加缓慢。他们继续花费租册上不能证明是正当的款项。这种人变得日益依赖于宫廷以求得在经济上生存下去。”*Reformation to Industrial Revolution*, pp. 65~66。但这至多是一个程度问题。

98 见 Zs. S. 帕赫对匈牙利和英国的具体比较：“如果拿 [匈牙利] 与英国在这一时期的发展相比，[土地所有者正如商人一样]并非最初的现象，那里也发生着一个类似的进程。我们想到“新贵族”，想到基本上以地租形式付给他们的租费。他们已经剥夺了农民和小农场主，从事着羊毛、小麦和其他商品的出售，转而进行具有资产阶级性的剥削以获得财富。”*Annals E.S.C.*, XXI, p. 1230。

99 托尼，*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 p. 186。

100 巴林顿·莫尔 (Barrington Moore, Jr) ,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p. 16。

101 在这一联系上，克里斯托弗·希尔是绝对正确的：“我们应该停止对乡绅的概括”*Puritanism and Revolution*, p. 27。

102 劳伦斯·斯通，“Social Mobility in England, 1500—1700.” *Past & Present*, 33 April 1966. pp. 28~29。

103 赫斯特菲尔德，*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p. 148。

104 佩雷·扎戈林 (Perez Zagorin),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X, 3, Sept. 1959, p. 388。他补充说：“这个阶级的形成是当前兴趣集中的焦点。这个阶级在不断地被补充，并且自然地包含了诸如地位、财富、收入来源各异的不同分子。但尽管有这些和其他区别，其成员仍是同类中的不同支系。他们组成同一个阶级，因为他们都拥有用以旨

在获利的和进一步积累的资本。[p. 389]。”

105 “在 1500 年和 1700 年间，在土地转移方面的大规模活动的最终结局，好像是有 1/4 的土地跨越社会界限的网状运动。有时是通过所有主带着土地跨越社会界限，有时是通过土地所有权的改变而跨越社会界限。这一进程中的获益者是大土地所有者和乡绅，受损者是法律上的所有者、国王和教会，以及农民。可能他们所损失的部分大致相等。……”

“在 16 世纪，土地所有制结构对市场压力产生了反应；对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同时农业生产的主流由粮食种植转向更多地进行商业性种植，这对农民产生了影响；不仅造成领主最大限度地运用其法律权利的局面，而且幸运的和有事业心的农民也有机会发家致富。但是这一结构还要应付有关身份的竞争性压力，应付新生的商业财富在土地上寻求安全的趋向。身份要求新的防卫，需要的是开支而不是为数众多的由家臣及追随者组成的群体，而这就是对农民的地位施加压迫的另一个来源。”F.M.L. 汤普森(F.M.L.Thompson), *The Social Distribution of landed Property in England Since the Six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ed., XIX, 3. 1966, p. 515.

106 欧文·拉铁摩尔,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p. 123.

107 米尔德里德·坎贝尔 (Mildred Campbell), *The English Yeoman Under Elizabeth and Early Stuarts*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 Press, 1942), p. 25.

108 同上书, p. 61.

109 马克思, *Capital*, III, Chap. XLVII, Sect. IV, p. 799。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他补充说：“资本在农业上作为一种独立的和主导的力量，并不是一下子普遍出现的，而是逐渐在各个特殊生产部门内出现的。它首先占领的不是真正的农业，而是畜牧业特别是牧羊业之类的生产部门。牧羊业的主要产品羊毛，在工业兴盛时最初经常会提供一个市场价格超过生产价格的余额，只是到后来才归于平衡。例如，16 世纪英国的情况就是这样。[p. 801]”。⁽¹⁾

110 见 H. 约翰·哈巴库克, “La disparition du paysan anglais” *Annals E.S.C.*, XX, 4, juil.-août 1965, pp. 652~654。托尼指出了法律状况如何使这种情况得以存在：“如果经济原因使新的耕作体制产生利润，那么决定于利润由谁获得的法律原因就并不真实。……许多向来是佃农的人在相当规模上从事养羊业，因

(1) 正文中及以上译文见《资本论》(中译本)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900~901, 903 页。——译者

此很不容易发现,为什么呢?工业发展所需的廉价羊毛,不是由那些在自己的茅舍里梳毛与纺纱的农民提供的,经济原因决定性的因素……是这一事实:绝大多数小耕作者的土地使用权使他们任由过度的地租榨取,或者当他们死亡时就被没收他们的土地使用权(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在一生中持有契约文本)。他们的不幸之处是,自从15世纪以来,由法院给予公簿持有农的保护,仅仅在于强化现存的庄园制度。……当他们活着时,隶农式租佃的印迹仍打在他们身上。在我们所谈到的这一阶段,小耕作者们仍被残存的中世纪法律的非正义性所禁锢,却不能享受中世纪习俗所赋予的实际上的安全,并且已感受到现代商业主义所带来的苦难,因为无所不包的现代国家并没有给他们提供保护,而只有现代国家能使他们的苦难变得可以忍受。”*Agrarian Problems*, pp. 406~408。(注意:托尼谈到了“小耕作者中的绝大多数”,然而,他没像哈巴库克那样仔细观察这一经验性问题。)

租佃制的不明确性也是城市中律师阶层兴起的一个主要因素。当更多的土地在实际上分离以后,更明确的个人权利的划分就出现了。对于小耕作者来说,一个避免被迫出卖土地或避免其所有权的不良变化的办法,就是雇用律师以保护自己的权益免遭半合法的侵害。

“除了私商及其经销人与仆从外,一群为数很少而很有能量的专业人员精英在16世纪崛起。每一个不同规模的地方性城市都有其由公证人、律师、书记员组成的群体。北安普敦或梅德斯通这种规模的城市可能有六位这样的人。他们经常把自己划归‘绅士’。他们出身于拥有少量土地的家庭……”埃弗里特,*Agrarian History IV*, p. 555。

111 哈巴库克, *Annales E.S.C.*, XX, p. 657。

112 坎贝尔, *English Yeomen*, pp. 68~69。埃里克·沃尔夫更加精明地分析了使农民日益转向为市场进行生产的条件:“这样,农民阶级终年的问题中就包括了平衡外界的需求与家庭的需要。然而面对这个根本性问题农民可能采取相反的对策。第一个是增加产量,第二个是减少消费。

“如果农民采取第一种对策,他必须提高土地的劳动产出,以提高生产率和增加投入市场的产品量。他这样做的能力主要在于:他在多大程度上动员了所需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无论是以积蓄的形式,还是现金和信用的形式),当然还有市场的总体状况。

“首先,当对农民的地租资金的传统的置留权被削弱时, [这一对策] 就成为可能。当使资金流入传统封建领主手中的权力结构变得无效时,这种情况就

有可能发生。其次,当农民有可能逃避强加的用以维系与其伙伴之间社会联系的仪礼费时,我们就有可能看到这种现象。如果他能够拒绝将其剩余花在仪礼费上,他就能将这笔钱用于提高他的经济水平。这两个变化经常同时发生。当拱形权力结构被削弱时,许多传统社会关系就失去其特定的约束力。在这种环境下,农民村落中可能会崛起一支富裕农民,他们推开比他们不幸的同辈,进入衰落的上层权力掌握者留下的权力真空。在他们兴起的过程中,他们经常运用新获得的权力,以牺牲邻居为代价来加强他们自己。*Peasant*, pp.15~16。

113 也许很少有自耕农在修道院解体后的最初年代中因租用教产而获利。因为这部分财富首先作为馈赠和服务的报酬,或者通过购买流入大地所有者手中。但也有许多早已流入市场中的投机商之类的人的手中。这些地产在市场中经分割和再分割,到16世纪晚期已在小购买者的财力所及之内。”坎贝尔,*English Yeomen*, pp.70~71。

乔伊斯·约因斯(Joyce Youings)提醒不要夸大事实:“大量教会地产被最初的授与者卖出,其中有许多还多次转手,但市场并不像许多作家认为的那么活跃,投机活动也并没有他们所想的那么盛行。……并非所有的土地所有权的变动都是通过明确的买卖。一部分地产从合伙人手中被转让出去的情况被忽视了。一些‘转卖’仅仅是从代理人手中转到其主要委托人手中。”“Landlords in England.C.The Church.”载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琼·瑟斯克编, IV: 1500—1640(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67), pp.349~350。进而,她指出:“对大多数普通人(无论他们是绅士还是自耕农)来说,租用教会地产比购买教会地产能更快地获利[p.348]。”

114 但是,自耕农作为土地蚕食者经常躲过同时代人和大多数后来的作家的谴责。还有一个事实,小规模的地经常用来通过耕作获利,而不是将其转化为牧场。这使得进行小规模围地的人没有受到那些加剧人口衰减进程的人们所受到的那么多的谴责。”坎贝尔,*English Yeoman*, p.91。

115 琼·瑟斯克,“Farming Techniques.”载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IV: 琼·瑟斯克编, 1500—1640(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67).p.199。然而,与英格兰与威尔士之间相反,不能十分肯定英格兰有大规模的地区专业化。至少E·J·布卡茨奇(E.J.Buckatzsch)在他关于税收的研究中显示:“英格兰的财富的地理分布状况在13世纪末到17世纪基本保持不变,只是到18世纪才发生根本变化。”“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England, 1086—1843,”*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I, 2, 1950, p.195。

116 弗兰克·埃默里(Frank Emery),“The Farming Regions of Wales,”载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琼·瑟斯克编, IV: 1500—1640(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 1967), p. 124。

117 同上书, p. 152。

118 T. 琼斯·皮尔斯(T.Jones Pierce),“Landlords in Wales. A.The Nobility & Gentry,”载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琼·瑟斯克编, IV: 1500—1640(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 1967), p. 380。

119 坎贝尔 *English Yeomen*, p. 65。

120 同上书, p. 72。

121 W.G. 霍斯金斯(W.G.Hoskins),“The Rebuilding of Rural England, 1570—1640”. *Past & Present*, No. 4, Nov, 1953, p. 30。

122 斯通, *Past & Present*, No. 33, p. 26。

123 彼得·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看到在绅士(贵族加乡绅)和其他阶级(自耕农和普通劳动者)之间发生着阶级分化。见 *The World We Have Lost* (New York:Scribners, 1965)Chap. 2, 特别是 p. 26~27。但在同一章中他复制了格雷戈里王关于 1688 年所做的图解,这一图解用国王的话说,在那些“增加”王国财富的人(贵族、乡绅、商人、世袭地产主、工匠)和那些减少王国财富的人(劳工、茅舍农、普通士兵、流浪汉)之间划了一条线。依我看,这一图式是更正确的。[就是说,我认为国王的分界线是正确的,当然他对划分出的这两类的特性归纳得并不正确。拉斯莱特确实承认自耕农“是那些经营土地最成功的人的身份的名称,”并且看到了“它很早就变得浪漫化了[p. 43]。”但他似乎固执地认为乡绅愿意加入那些“无所事事”的人的行列,而没有对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进行分析家式的观察。

“自伊丽莎白时代以来,充裕的国内商品种类展示了下层乡绅的生活方式,这与富裕的自耕农的生活方式当然是难以区别的。”M.W. 巴利(M.W.Barley), *Rural Housing in England*, 载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琼·瑟斯克编, IV: 1500—164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67), p. 713。

见戈登·巴索:“但是,在下层乡绅和富裕的自耕农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区别。……实际上,[对自耕农]进行[法律意义上的]定义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都铎时代和早期斯图亚特时代的许多自耕农如拉蒂莫的父亲就没有自己的土地,而是公簿持有农或租地人。根据当时难以数计的遗嘱和法律文件,一个人

会在一处被划分到自耕农中去,而在另一处被划分到绅士中去;或者,一个人把自己定为绅士,别人却将他定为自耕农。因为不是依据门第和财富多寡来区别各阶级的。许多小乡绅的幼子成为自耕农;许多乡绅新近从自耕农中兴起,或者,靠从生意和专业中得来的钱,从更低贱的出身变成乡绅。乡绅中很少有人能将其世系追溯至三个世纪以前,而一些自耕农家族,如德文郡的雷德韦家族,却能够做到。”*Agrarian History*, IV, p. 301。

124 关键的一点是以不同方式进行榨取:“归纳起来,都铎时期的英国一定数量的小农场主处境险恶。他们在圈地风盛行的乡村中容易被剥夺土地,并且这在16世纪初期和末期的英格兰中部地区完全是真实的。当圈地未以法律形式进行时,他们易受高额地租任意罚款的侵害,他们的公共牧场的权益也容易受损。不安全是很普遍的情况,而且形成农民主干的(当时的人也这样认为)公簿持有农仅仅可能从都铎政府中得到部分的和暂时的保护。”拉姆齐, *Tudor Economic Problems*, p. 36。

125 从更广泛的观点出发,16世纪农业上的变化可以被视作英国社会生活商业化进程中的漫长一步。纺织工业的增长与牧场经营的发展紧密相联,是呢绒的出口这一“贸易奇迹”,还有出现在多次海外扩张中的寻求市场的动机,将英国堂而皇之地带入世界商业体(world-commerce)。从新发现的市场中,产生出种植园、殖民地、帝国。……大量家庭离开土地的过程如果不是开始引发,那么也是加剧了中世纪的工资问题(这一问题包含在劳动力的缺乏中)向现代的工资问题(包含在劳动力的充足中)的转化。托尼, *Agrarian Problems*, p. 3。见琼·瑟斯克,“Enclosing & Engrossing.”载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琼·瑟斯克编 IV: 1500—1640(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7), p. 210; 鲍登, *Agrarian History*, IV, p. 598。

126 少数农场工人仍持有相对广泛的所有权和公共权利,并能够从当时的商业开放中获益。这样下来,经过一两代人,他们就进入自耕农行列。然而,茅舍农中的中下层却正在失去他们为数不多的财产权,沦为无地的无产阶级。艾伦·埃弗里特,“Social Mobil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ast & Present*, 33, Apr. 1966, p. 57。

127 亚历山大·萨文(Alexander Savine),“Bondsmen Under the Tudor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n. s., XVII, 1903, p. 268。

128 同上书, pp. 270~271。

129 同上书, p. 275。

130 同上书, p. 276。

131 巴索, *Agrarian History*, IV, p. 303。

132 有时, 在自营其产业并靠当季节工补贴收入的经济情况较好的劳工与其产业不足以维持生存并靠打短工以增加收入的贫穷庄稼人之间, 并没有严格的区别。全部能说明的是: 前者的雇佣一般是定期的, 后者的雇佣则是间歇性的。埃弗里特, “Farm Labourers.” 载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琼·瑟斯克编 IV;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7), p. 397。

133 同上书, p. 409。

134 森林地区的一个吸引力就在于这里能提供兼干几种行业的受雇机会(森林行业与林地行业, 亚麻、大麻与羊毛的纺织行业)。见埃弗里特, *Agrarian History*, IV, pp. 425~429; 瑟斯克, *Agrarian History*, IV, pp. 109~110。

135 埃弗里特 *Past & Present*, No. 33. p. 58。

136 “英国的乞丐和流浪者在 17 世纪才出现。然而有充分证据表明, 16 世纪乞丐和流浪汉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比在此前后都大。……”弗兰克·艾德洛特 (Frank Aydelotte), “Elizabethan Rogues and Vagabonds,” Volume I of *Oxford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Clarendon], 1913). p. 3. “难以驾驭的流浪汉和可怖的丐帮, 与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的学生相似, 有点像‘故意把自己称作埃及人的闲汉和妓女。’他们席卷了苏格兰, 勒索食物金钱、抢劫、要挟, 给偏远的农场和村落带来恐慌。”利思, *The Economy of Scotland*, p. 29。

137 艾德洛特, “Elizabethan Rogues and Vagabonds,” p. 17。

138 见罗伯特·M. 金登, “Social Welfare in Calvin’s Europ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XVI, 1. Feb. 1971, pp. 50~51。

139 “16 世纪的大多数反圈地立法恰恰都出现在饥荒时期。在 1536 年、1548-1549 年和 1596 年的反叛中, 可以听到对饥荒的抱怨。”埃德温·F. 盖伊 (Edwin F. Gay), “The Midland Revolt and the Inquisitions of Depopulation of 1607,”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n. s., XVIII, 1904, 213, fn. 2。

140 G. N. 克拉克描述了都铎时期的经济制度。这一制度可以从工匠(或者学徒)的规章、关税、鼓励造船的法令、反圈地法案、济贫法各方面去说明。他说: “新的立法接受乃至加速了货币经济: 它推行了对贸易的限制或实物支付工资。但这些立法的总趋势是保守的。这些立法的目的在于, 首先为农业, 其次

为较简单的手工业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其目的还在于限制人们进入具有更高社会地位的职业或进入那些被认为在不合适的地方开展的职业。……

“这样，伊丽莎白时代的制度就力求稳定现存的阶级结构、工业布局和劳动力供给的流动。这是通过授予特权和对流动性和契约自由设置障碍来进行的。但这一制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仅体现在文字上的经济政策的产物。它影响着相互冲突的利益中达成的妥协，但也与其相协调。” *Wealth of England*, pp. 84, 86。

141 “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运用君主的权力减缓了经济发展，直到这种发展可以为社会所承受——即运用中央政府的权力使转型中的受害者的苦难得以缓解，并且为变革的进程开创渠道以减少这个进程的破坏性。仅仅是因为这些，英国挺过了[16世纪]圈地的灾难而没有受到重大破坏。”卡尔·波拉尼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44), p. 38。

142 “所有权流入领主手中这一事实并不能简单归因于人口不能自然更替。……贫困……——不是土地的缺乏，而是设备和货币储备的缺乏——可能才是财产让渡的一个原因，这与向城市和乡村工业流动的趋向并不是不相容的。” R.H. 希尔顿, “A study in the Pre - History of English Enclosur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Milano: Istituto Edit. Cisalpino, 1957), I, pp. 678~679。

143 “领地可能出租给大资本主义农场主。他们将从这块土地的产品中，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地产中收取他们收入的最大部分。对地主来说，这个办法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可取的。资本主义农场主比一般农民有更雄厚的资金基础，他并不像小农那样更精心地经营自己的农场，而牺牲他从领主那里租来的土地。这就是为什么领主更愿意将有限的土地租给为数不多的资本主义农场主，而不是为数众多的小农。”哈巴库克, *Annales E.S.C.*, XX, p. 650。

144 “13世纪和14世纪的英国农民群体能够发动起大规模的抵抗，甚至能够成功地进行反抗以攻击领主给他们造成的境况。如果他们在15世纪和16世纪容忍他们自己被驱除，那是因为经济和社会变化破坏了他们已往形成其力量源泉的凝聚力。”希尔顿,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p. 685。

145 见 C.S.L. 戴维斯, *Annales E.S.C.* XXIV, p. 35。

146 然而，“对于那些依靠工资过活的人来说，情况并不是这样，对那些用得自工业劳动与农业劳动的额外工资填补开销的人来说，情况也不是这样。后

者在这一阶段损失重大。”同上书，pp.36~37。

147 同上书，pp.54~55。见托尼 *Agrarian Problems*, pp.340~342。

148 同上书，p.321。

149 同上书，p.322。

150 “英国的中世纪末期是以紧缩而不是以扩张为其标志的：放弃了长期以来征服法国的梦想，尤为重要，爱尔兰受英国控制，受英国语言和文化影响的地区明显缩减了。凯尔特人像潮水般再一次涌来，包围了都柏林、沃特福德、科克、戈尔韦这最后几个早先的盎格鲁—爱尔兰人的据点。在15世纪早期，随着欧文·格伦道尔(Owen Glendower)的反叛，威尔士取得暂时的半独立；尽管它被击败并受到重创。威尔士人仍然愤而远之，不接受同化。将康沃尔地区和苏格兰边境地区统一到国家整体中去的事业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进展，在那里，他们除了一个珀西(Percy)之外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国王。”A.L. 罗斯，“Tudor Expansion: The Transition from Medieval to Modern History,”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rd ser., XIV, 3, July 1957, p. 312。

151 斯通, *Encounter*, XI, p. 73; 希尔, *Puritanism and Revolution*, p. 28。

152 见托尼,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 p. 176。

153 托尼,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p. 211。

154 同上书, p. 216。见托尼,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 pp. 176—177。

155 见斯通,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pp. 124, 133。

156 见托尼, *Agrarian Problems*, pp. 191~192。托尼总结道：“开端于伊丽莎白的辉煌时代，在社会的丑恶和苦难的背景反衬下熠熠生辉。……农民们只知道他们的土地代理人更加严苛了[p. 193]。”

157 同上书, p. 229。

158 “一个繁荣的经济能带来许多反常现象和许多弊端。它甚至还能带来——如果它继续繁荣下去的话——惊人地奢侈、浮华、寄生的文艺复兴式的宫廷和教会。如果它继续繁荣的话——但它能繁荣多久呢？到1590年，衰落的迹象已开始出现。”特雷弗—罗珀，“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载 *The European Witch - Craze of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Harper, 1969a), pp. 68~69。

159 同上书, p. 69。

160 见斯通,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VIII, p. 39。

161 当伊丽莎白女王设法对16世纪90年代的经济危机作出反应时，贵族

本身也受到威胁。见斯通,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pp. 124~133。并没有准备要消除“只有贵族才能提供的支持”(托尼,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p. 212), 王室恢复和扩大了它的奢侈。见特雷弗-罗珀, *The European Witch-Craze*, p. 69。

162 见 R.W.K. 欣顿(R.W.K.Hinton), “Letter to the Editor” *Encounter*, XI, 1, July 1958, pp. 74~75。

163 见特雷弗-罗珀, “Letter to the Editor”, *Encounter*, XI, 1, July 1958, pp. 73~74。即使 J.P. 库珀所说的是真实情况:“没有很好的证据说明贵族的土地财富[在 1642 年比 1559 年]更少,” (*Encounter*, XI, p. 74) 土地也很可能流入了那些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的贵族手中。

164 特雷弗-罗珀, *The European Witch-Craze*. p. 70。

165 见约翰·U. 内夫, “A Comparison of Industrial Growth in France and England From 1540 to 1640”, 载 *The Conquest of the Material World* (Chicago, Illinois: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4), pp. 144~212。P.J. 鲍登对这一假说的保留意见载于 *Agrarian History*, IV, pp. 608~609。从法国史资料方面对内夫的论点持更为赞同的评价, 可见加斯顿·泽勒 (Gaston Zeller), “Industry in France Before Colbert”, 载伦多·卡梅伦 (Rondo Cameron) 编, *Essays in French Economic History* (Homewood, Illinois: Irwin, Inc., 1970) pp. 128~139。

166 纽卡斯尔煤的年产量从 1563—1564 年的 30 000 吨增至 1658—1659 年的 500 000 吨。见布罗代尔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p. 281。

167 约翰·U. 内夫, “The Progress of Technology and Growth of Large-Scale Industry in Great Britain, 1540—1640”, 载 *Conquest of the Material World*, (Chicago, Illinois: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4), p. 136。

168 同上书, p. 142。还可见内夫:“英国不断增长的经济独立性与力量应首先归因于沿海贸易和内陆、沿河贸易的非凡扩大。由于大不列颠岛自然资源和市场的充分开发, 这种扩张才成为可能。矿藏丰富, 土质优良, 港湾便利, 这一切使得大宗商品可以经由水路以相对低廉的成本运往不列颠群岛的任何一个港口。” *War and Human Progress*, p. 111。

169 K.W. 泰勒 (K.W. Taylor), “Some Aspects of Population History”,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XVI, Aug. 1950, p. 308。

170 克拉克, *Wealth of England* p. 51。见爱德华·陶贝 (Edward Taube), “German Craftsmen in England During the Tudor Perio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

ry, IV, 14, Feb. 1939, pp. 167~168。佛兰德斯移民以多种方式在基本的和细微的方面改变了英国人的生活方式, 对此的描述可见约翰·J·默里 (John J. Murray), "The Cultural Impact of the Flemish Low Countries o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II, 4, July 1957, 853ff。这也是威尔士人第一次向英格兰大移民的时期。见宾多夫, *Tudor England*, p. 24。

171 费希尔, *Economica*, XXIV, p. 16。

172 布罗代尔,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p. 56。G.N. 克拉克指出: "从西班牙无敌舰队时代起, 王室先是通过议会法案, 继而是通过公告、委托和司法诉讼来试图阻止伦敦的扩张。" *Wealth of England*, p. 94。

173 见斯通, *Past & Present*, No. 33, pp. 32~33。

174 马洛维斯特, *Annales E.S.C.*, XVII, p. 929。

175 布罗代尔,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p. 37。鲁布林斯卡亚指出早在 1615 年 A.de 蒙特克雷显 (A.de Montchrétien) 就曾谈论过这个问题。见 *French Absolutism*, p. 132。

176 但要注意到, 皮埃尔·古贝尔 (Pierre Goubert) 认为, 16 世纪尽管有宗教战争, 法国人口仍稳步增长。"Recent Theories and Research in French Population between 1500 and 1700," 载 D.V. 格拉斯和 D.E.C. 埃弗斯利 (D.V. Glass and D.E.C. Eversley) 编, *Population in History* (London: Arnold, 1965), p. 465。

177 1628—1633 年的大瘟疫无疑有助于此。见 J. 默夫雷特 (J. Meuvret), "Demographic Crisis in France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载 D.V. 格拉斯和 D.E.C. 埃弗斯利编, *Population in History* (London: Arnold, 1965), p. 509。黑死病也波及德国和意大利。

178 弗兰克·C. 斯普纳, "A la Côte de Guinée Sous pavillon Français (1559—1561)"。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tori* (Milano: Instituto Edit. Cisalpino, 1957), II, p. 1001。

179 见布罗代尔, *La Méditerranée*, I, p. 449。见埃米尔·科纳尔, "Les échanges de la France avec l'Allemagne et les pays du Nord au XVI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XXXV, 3, 1959, p. 244。

180 见亨利·豪泽,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French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Middle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Middl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V, 3, Oct. 1933, pp. 261~262。

181 科纳尔,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XXXV, p. 242。

182 “1550年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安特卫普仍然强有力地吸引着法国，这一点被认为是工业设备仍极为缺乏的法国经济分裂(*morcellement*)造成的。”简·克雷贝克斯，“Les français et Anvers au XVI^e siècle,” *Annales E.S.C.* XVII, 3, mai - juin 1962, p. 548。事实上，内夫认为匮乏在加剧：“英国工业在50年中迅速增长(1550—1600)，而法国却是倒退的时期……” *Conquest of the Material World*, 1964a, p. 146。

183 见 J.H. 帕里，“Colonial Developments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Outside Europe, I. America”，*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R.B. 沃纳姆编，*The Counter - Reformation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1559—161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8), p. 530。H.A. 英尼斯指出：“在16世纪上半叶，美洲的渔船队大部分属于法国……” *The Cod Fisheries*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1940), p. 49。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各港都包括在内。贸易是如此广泛，以至于他们可以支撑“英国市场干鱼的剩余生产。”

同样，让南指出：“在法国对波罗的海的远征中，主角当然……是迪耶普人……16世纪穿越松德海峡的法国船只绝大部分来自诺曼底，这其中迪耶普人又占多数。”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o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LIII, p. 329。

法国同苏格兰的广泛贸易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诺曼底贸易，出口制成品和各种劳务，一是比斯开贸易，出口盐和葡萄酒。见利思，*The Economy of Scotland*, pp. 172~182。前一类贸易非常像此时的低地国家同苏格兰的贸易。“两者(法国北部和低地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蔬菜产品，都有相对较高的工业技术水平，都可作为来自远方的舶来品的集散地(pp. 174~175)。”

184 “在实践中，分成佃耕制成为一种基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满足了资产阶级业主的需要……” G.E. 德·法尔吉罗尔斯，“La décadence de l'économie agricole dans le Consulat de Lempaut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Annales du Midi* LIII, 1941, p. 149。德·法尔吉罗尔斯认为这种制度源于16世纪晚期因王室税赋和价格的上漲而造成的小土地所有者债务的增加。见 pp. 142~146。他认为这种制度大大加重了土地的负担：(1)通过出口小麦来付税；(2)向资产阶级交租(部分谷物、蔬菜、动物产品、砖、秋收产品，优等林木产品)；(3)养活人畜。这三种灾难加在一起导致了18世纪的灾难：“地力耗尽，资产阶级毁灭，农村人口的灾难(p. 167)。”

185 豪泽，*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V, p. 260。

186 K. 贝里尔，*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d ser., XII, 3, p. 357。

187 格拉曼,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p. 7。

188 维尔弗雷德·布律莱,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IV, p. 125。另外,布律莱认为,造成此时大部分英意贸易经由陆路的因素是相同的:“作为英意贸易核心的纺织品,肯定从未经由海路运出海外,而是经由陆路(p. 126)。”

189 格拉曼,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p. 31。

190 见雅克·埃尔斯,“Rivalité ou Collaboration de la terre de l'eau? Position générale des problèmes,” *Les grandes Voies maritimes dans le monde, XVe - XIXe siècles*, VIIe Colloque,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Maritime (Paris: S.E.V.P.E.N., 1965), pp. 17~50。

191 见 A.L. 罗斯对 16 世纪中叶法国政府未能为海洋取向集团的利益效劳的讨论:“15 世纪 50 年代西印度群岛中的法国无照营业者极为活跃。但到了 1556 年停战以后,法国接受了菲利普二世的要求,禁止了该地的贸易,除非能得到他的特别许可证——我们可以设想这并非易事。法国的船长们拒绝接受,但他们失去了政府的支持,与伊丽莎白英国形成鲜明对照:英国是个新教国家,这是不可低估的优势;这放开了我们的手脚,使我们不再像法国那样遭受牵制和阻挠。卡托—康布雷西和约(1559)非常明确,亨利二世于是为了天主教的团结而抛弃了所有在南美的法国企业……由于灾难的(和正统的)的瓦卢阿而使法国损失惨重!火炬传到了海军上将科利尼的手里,他是胡格诺领导人,法国利益的真正而有远见的代表者。” *The Elizabethans and America* (New York: Macmillan, 1959), pp. 7~8。无疑应对罗斯的新教激情打折扣。但他对法国不同团体的冲突及其对法国在世界经济体中地位的影响的描述,我看还是正确的。关于新教徒的问题,如我们在讨论新教在波兰的衰落时已谈到的,这是那些对在一个世界经济体中发生的民族国家新兴起感兴趣、想在成为新教徒时得到内心的和谐者,从而代表了一种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势力和世界观的反对派,哈布斯堡王朝在卡托—康布雷西和约之后与反宗教改革运动保持着特别紧密的联系。

192 “1552 年,为了弥补‘德意志之行’的费用,国王,确切地说是图尔农(Tourmon),不仅向意大利人,而且向两个奥格斯堡家族的人,赞格迈斯特兄弟,向乌尔姆的格奥尔格·魏克曼伸手要钱,三者都在里昂开业。国王把这些反对帝国的、德意志金融代表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保证他们的宗教自由,不泄露他们的秘密。”亨利·豪泽, *Journal of European Business History*, II, p. 247。

193 “在法国，圣—康坦危机之后紧接着便是宗教战争的爆发。里昂因其地理位置而显得特别无遮无拦。它依次由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教徒占领围攻，劫掠，并受到法国所有的敌人的威胁，其中萨瓦公爵身临前线。”豪泽，同上书，p. 255。

194 赫斯特菲尔德，*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p. 131。

195 H.G. 柯尼斯贝尔格，“Western Europe and the Power of Spa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R.B. 沃纳姆编, *The Counter - Reformation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1559—161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8), pp. 281~282, 290。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注意柯尼斯贝尔格提到了行会不断增长的影响。内夫作了下面的比较：“但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英国的行会制度正在崩溃，而法国的却正在加强和延伸。”*Industry and Government*, p. 25。

196 见柯尼斯贝尔格，*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pp. 302~303。

197 同上书，p. 292。

198 “宗教曾是团结不同阶级、不同利益的粘合力量，为它们提供一个组织和宣传机器，并形成了欧洲现代史上第一批真正的民族的和国际的党派；这些党派所包容的力量都从未超过每个组成阶级中的少数人。通过宗教，他们可以吸引最低层阶级和暴徒在狂暴的劫掠和野蛮的屠杀中发泄他们对穷困的愤怒和对失业的绝望。”柯尼斯贝尔格，*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pp. 306~307。

199 “当各党派失去了革命的冲动力和宣讲的社会内容时，他们迅速地失去了下层阶级的支持。同盟战争造成的灾难，法国农民不断加重的苦难，两者造成了反对封建主和租金、反对教士和什一税、反对收税人和人头税的农民运动；但他们没有考虑到各宗教或各政治派别。这些扎克雷农民反叛在1594—1595年法国南部和中部的农民运动中达到高潮。他们同封建主的联盟进行了艰苦的战斗，这个联盟唯一的目的是击败他们。17世纪这些类似的运动为法国的税制和农业社会投下了暗影；但直到1789年革命之前，他们仍未发生政治上的作用。”上引书，p. 307。

勒鲁瓦·拉杜里认为1550—1590年朗格多克的最低层农民遭受到了“双重贫困化”。按照他的观点，这些农民反叛并不难解释：“小土地所有者受到折磨，他们的数目因土地分割而增加，反映补偿地块减小的单位收入没有增加；工资工人受到折磨，这是因为实际工资的下降所致。”*Paysans du Languedoc*, I,

p. 317。

200 见柯尼斯贝尔格,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p. 314。

201 莫斯尼尔, *Les XVIe et XVIIe siècles*, p. 103。宗教战争的负面经济影响达到了一个高潮, 因为如 H.M. 罗伯逊 (H.M. Robertson) 所论, “经济条件恶化的地方, 使用国家来保护现存的、但受到威胁的利益集团已经成为寻常的活动了。”在德意志, 权威的多元化意味着市场的萎缩, 并导致了行会和市场垄断的再次出现。

“在法国, 通过 1581 年和 1597 年法令, 到世纪末行会的权力也得到了相当的加强。” “European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XVIII, 1, 1950, p. 46。

202 弗兰克·C. 斯普纳, “The European Economy 1609—50,”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V: J.P. 库珀编, *The Decline of Spain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1609—48/59*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0), p. 69。

203 勒内·巴勒尔 (René Baehrel) 可能除外, 他反对这种潮流, 并划分了从 1594—1689 年的价格阶段, 其中 1628—1655 年只是中间一段。见 *Une Croissance: la Basse - Provence rurale (fin XVIe siècle - 1789)* (Paris: S.E.V.P.E.N., 1961), pp. 50—57。

204 见肖尼, “Le renversement de la tendance majeure des prix et des activités au XVIIe siècle,”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IV: *Evo moderno* (Milano: Dott. A. Giuffrè - Ed., 1962), p. 231。

205 “从 1608—1612 年到 1619—1622 年阶段, 贸易得以反常地延续, 其中最主要的秘密可能是和平。这十年多的时间里, 中间有个长的停顿, 前面标志着繁荣上升阶段的结束, 后面标志着西班牙大西洋下降阶段的开始。”皮埃尔·肖尼, *Séville et l'Atlantique (1504—1650)*, Vol. VII (2 bis): *La Conjoncture (1593—1650)* (Paris: S.E.V.P.E.N., 1959), p. 889。亦见 pp. 1404—1405。

206 “整个美洲在 16 世纪被视作一块可以到处俯拾产物 (*Champ de ceuillette*) 的大地。几个世纪来贫瘠的劳动力窖藏起来的财富被简单地转入商业循环中, 靠近交通路线的矿藏和土地被刮取。这些采集性的活动只有靠了印第安人的中介、铺垫才成为可能。但对印第安人的首次使用是毁灭性的, 没有保存他们, 就像使用那些无意贮藏的财富那样。这样 40 年中耕种的土地被迅速耗尽, 70 年内整个表土被耗尽。17 世纪的大种植园不得不完全依靠进口劳动力。”肖尼, 上引书, pp. 1422—1423。

207 同上书, pp. 1423—1425。

208 斯普纳,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V, p. 79。

209 斯普纳在上引书中使该观点变得清晰透彻, 见表 II (p. 86), 地图 I (p. 87)。英国和荷兰对贬值抵抗最有力, 波兰、热那亚、西班牙最次。法国只比西班牙稍强一些。

210 见巴勒尔, *Une Croissance*, pp. 2—20; 也见勒内·巴勒尔, “Economie et Histoire à propos des prix,” 载 *Excentail de l'histoire récente: Hommage à Lucien Febvr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53) I, pp. 287—310。巴勒尔总结他的文章: “马克·布洛赫建议我们注意‘社会屏障’。我们也一定要谈‘经济屏障吗’? 吕西安·费夫尔曾有一次指教我, 路德反对赦罪符是因为其提供了虚假的安全。我们也能如此评价金银价格吗?(p. 310)”

211 鲁布林斯卡亚, *French Absolutism*, p. 15。

212 鲁基洛·罗马诺,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XIV, p. 522。

213 上引书, p. 525。罗马诺从奇波拉那里引的数字: “Note sulle storia del saggio d'interesse.” 图表 III, 我相信罗马诺把奇波拉的数字印错了。应该是 1.1%。

214 见鲁基洛·罗马诺, “Encore la crise de 1619—22.” *Annales E.S.C.*, XIX, 1, janv. — févr. 1964, p. 33。

215 见罗马诺,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XIV, p. 516。格拉曼不经意地指出了最终结束的原因。他指出, 1650年后波罗的海谷物在欧洲的作用急剧下降, 荷兰的经济作用也随之下降, 因为南欧和西欧新的谷物自给能力在增长。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p. 42。这可以被部分地解释为人口的减少(或许), 主要地被解释为可耕地面积和产量的增加。对于南欧这是其边缘化过程的一部分。另外, 在 1650—1750 年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萎缩中, 英国发现保持自己的高度贸易均衡是可以获益的。这要通过抽回它在容易获利的年代获取的国际贸易中的谷物, 并输出到边缘地区才能得以实现。

216 肖尼, *Séville*, VII (2 bis), p. 90。

217 “西北部享受的‘繁荣’并非是一种神秘的力量赐予的形式; 它是由国内原因造成的, 其中一个扼要的清单就可迅速地区分出是结构性还是机遇性因素。”皮埃尔·让南, “Les comptes du Sund comme source pour la Construction d'indices généraux de l'activité économique en Europe (XVIe—XVIIe siècles),” *Revue historique*, CCXXXI, avr. — juin 1964, p. 325。

218 见皮埃尔·肖尼, “Réflexions sur le Tourant des années 1630—1650,”

Cahiers d'histoire, XII, 3, 1967, pp.259~260。

219 见鲁布林斯卡亚, *French Absolutism*, p. 52。

220 见肖尼, *Séville*, VIII(2 bis), 1535-1537 年对西班牙经济的影响。

221 见 H. 凯伦本茨(H.Kellenbenz), "Autour de 1600: le commerce de poivre des Fuggers et le marché internationale de poivre," *Annales E.S.C.* XI, 1, janv. - mars 1956, 特别是 pp.23, 27。

222 格拉曼,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p. 5。即使从今天的观点看这也是非常错误的吗? H.M. 罗伯逊的观点是: "在 19 世纪或许有一种减小甚至忽略经济进步的代价的趋势; 现在, 或许有一个给予过多注意的趋势。在 16 世纪这些代价是如此大以至于人们公认为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的所得就是另一个人或国家的所失; 此处的巨大活力就意味着彼处的失业; 如同荷兰的格言简明表述的那样: "De één man zijn brood is de ander zijn dood."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XVIII, p. 46。

223 肖尼, *Cahiers d'histoire*, XII, p. 264。

224 罗马诺, *Annales E.S.C.* XIX, p. 33,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225 罗马诺,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XIV, pp. 511~512。荷兰是个例外, 见 p. 512; 英格兰是个有限的例外。见 pp. 517, 519。

226 见克拉克, *Wealth of England*, pp. 103~107。

227 见苏普莱, *Commercial Crisis* p. 9。

228 苏普莱, 同上书, pp. 6~7。见阿斯特里德·弗里斯, *Alderman Cockayne's Project and the Cloth Trade* (Copenhagen: Levin & Munksgaard, 1927), p. 22。

229 F.J. 费希尔, "Tawney's Century," 载费希尔编, *Essay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1), p. 4~5。

230 费希尔列举出了几种压力: "在农产品中, 扩大生产的障碍主要在于供应领域和当时的技术限制……"

16 世纪和 17 世纪如同中世纪一样, 人们不仅指望从土地中获取饮食, 而且还要获取基本的工业原料, 如木材、羊毛、皮革、油脂……在这种条件下, 经济与人口的扩大趋向于加重土地的压力, 而后一时期在不同的条件下, 则一定会影响收支平衡……

"第二产业相反, 生产扩大的障碍在于需求领域而非供给领域……在多数

工业中,生产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劳动力既丰富又廉价……雇工和村民工作不固定,收入低,是贫穷的消费者。”上引书,pp.3,4,6。

231 斯通,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 p. 50。

232 “按照一种象征方式,1598年事件标志着英国正从边缘移向新贸易体系的中心。”W.E. 明钦顿 (W.E. Minchinton), “Introduction,” *The Growth of English Overseas Trad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London: Methuen, 1969), p. 3。 “正移向……”,但还没有到那里——这才是关键!

233 见里奇,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 pp. 461—462。

234 标准的描述见弗里斯, *Alderman Cockayne's Project*. p. 22。

235 苏普莱, *Commercial Crisis*, pp. 49—50。

236 斯通自己承认:“两大消费市场对于英国经济的新模式有重要意义。为市场提供的扩大生产一方面满足了国家的军事需要,另一方面又满足了贫困阶级基本的生活需要。”*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VII, p. 108。

237 见 R.W.K. 欣顿, *The Eastland Trade and the Common Weal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XVII, ix—x)。

238 见斯通,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VII, p. 51。

239 “稳定需要限制资本主义的增长,这就是专制君主的经济政策……(同时)专制君主的军事与战略又需要在某种程度上鼓励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起。”曼宁, *Past & Present*, No. 9, p. 49。

240 “到16世纪末,一代人之前如此急需的稳定已经令人厌倦了;当扩大贸易的条件再一次形成时,反对这种扩张的感情下降了;根除那些在大萧条时种种限制下增长起来的既得利益便成为17世纪的主要任务之一了。”费希尔, 载卡勒斯-威尔逊编,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 p. 172。

241 见弗里斯, *Alderman Cockayne's Project*, pp. 149—150。

242 苏普莱, *Commercial Crisis*, p. 29。

243 同上书, p. 52。

244 欣顿, *The Eastland Trade*, p. 20。见苏普莱:“最好记住,萧条的全面影响只有在考虑到下列情况时才能被解释:科克因 (Cockayne) 方案带来的损害,竞争工业的增长,英国呢绒的金融负担,大陆战争激起的混乱,以及英国商人先期存在的困难的传播。这意味着一旦发生不幸事件,经济就会经历急剧衰落的时期,这就是历史上常有的、与‘大萧条’对等的萧条。”*Commercial Crisis*, p. 64。

245 苏普莱,同上书, p. 80。

246 同上书, pp. 89~96。

247 同上书, p. 162。

248 J.D. 古尔德,“The Trade Depression of the Early 1620' 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II, 1, 1954, p. 87。

249 见欣顿, *Eastland Trade*, pp. 18~19。还见他特别描述的经验性研究:“1611—1618 年间,是英国和联合省处于和平的时代。因此他们的船和商人可以按照平等的条件进行竞争。明显的是,在平等条件的竞争下,荷兰迅速地建立起了绝对的商业优势。这无疑是通过其闻名于世的低运费而建起的。1615 年是我们看到波士顿港口帐目的第一年……我们发现在 1615—1618 年期间,从联合省进口的干货物(意即除去葡萄酒)价值要大于从其它各处进口的干货物价值总和,其它时间则存在着相反的情况。相似的是,同一时期从联合省驶往波士顿的船只数量要超过从其它各处驶入的船只总和。其它的年份则并非如此(1628 年除外,那一年贸易量很小)……[这些事实]给当代关于 1620 年萧条的解释带来了生气,这一萧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为荷兰转口仓库在英国出口贸易中的影响。”“Dutch Entrepôt Trade at Boston, Lines. 1600—164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V, 3, April. 1957, p. 470。

250 欣顿, *Eastland Trade*, p. 45。

251 同上书, pp. 28, 31~32。

252 同上书, p. 29。

253 苏普莱, *Commercial Crisis*, p. 64。

254 “商人们宣布他们在国外出售呢绒无法从中获利。枢密院在劝导他们继续收购呢绒时,尽管有不同程度的成功,却发现自身好似在众多富有争议的问题上捅了马蜂窝。”上引书, p. 237。

255 同上书, pp. 68~69。

256 同上书, pp. 242~243。

257 同上书, p. 227。

258 同上书, p. 71。

259 同上书, pp. 99~102。见 W.B. 斯蒂芬(W.B. Stephens):“从文字材料上看,不太好预言的是 20 年代晚期对很多出口港是真正的危机年份,而 20 年代早期遭受的挫折是有限而短暂的,随之有一个景气阶段。”“The Cloth Exports of the Provincial Ports, 1600—1640”。*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XII, 2,

Aug. 1969. p. 241.

260 苏普莱, *Commercial Crisis*, p. 119.

261 同上书, p. 125.

262 同上书, p. 147.

263 “非熟练劳动力廉价而又充足的地方, 低质产品的成本也就低。普遍贫困的地区尤为如此, 那里的纺织生产只为劳动者提供了一种副业。受雇零工赚不到全部生活费用, 其劳动力通常要比全日制工作的劳动力便宜。这就是亚当·斯密用来引证何以长期以来粗布比细布廉价的原因。17世纪早期, 东欧的经济条件与此类似, 这就意味着如果市场需求对质量要求低的话, 该地区就特别适合于低价布的生产。”同上书, p. 140。

264 呢绒是多种多样的。当时有(a)羊毛制品: 暖而重, 即绒面呢; 其强度依靠羊毛粘结的质量; 使用卷曲的短纤维; 绒线常被梳理而成错综复杂的络纱; 羊毛已经过缩水, 即经过漂洗使它更加保暖、结实和耐用; 设计单一, 适于寒冷气候; (b)“新型”呢绒(主要仍是羊毛制品): 幅窄而价廉; 包括克瑟斜纹呢、达申呢、紧身衣; 较早地转向了南部新市场; (c)精纺绒线: 由长纤维羊毛精梳而纺成; 依靠经纱和纬纱的强度; 比绒面呢轻, 每根纱用羊毛量要少; 不经漂洗; 适合于非热带的地中海气候; (d)“新布匹”或“呢绒”: 基本上是精纺毛纱的一个变种; 样式变化多; 有时经漂洗, 有时由丝、亚麻或棉花组成纬线; 包括棉经毛纬平纹呢、棉亚麻混纺布、哗叽、bayes、sayes、perpetuanas、stanmets、rashes 和其它许多品种。见鲍登, *Wool Trade* pp. 41~43; 弗里斯, *Alderman Cockayne's Project*, p. 2; 苏普莱, *Commercial Crisis*, p. 5; D.C. 科尔曼(D.C. Coleman), “An Innovation and its Diffusion; The ‘New Droperie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XII, 3, Dec. 1969. pp. 418~423.

265 D.J. 鲍登把这种上升归因为技术因素而非商业因素。他认为, “对于羊毛的精细和纤维长度来说, 放牧比气温的影响更大。绵羊吸收的养份越多就长得越大。羊毛的纤维也不例外。就像其它部分一样, 喂养得越好, 就越能增加长度和密度……对牧场的圈占使生活变得容易了, 不管对农场主和羊来说都是如此。如厄恩利勋爵(Lord Ernle)所说, ‘当圈地增多的时候, 羊养得更好了, 羊毛在重量和长度上都有增加, 尽管质量上有所损失。’ 这样整个16世纪和17世纪, 英国生产的短而精的羊毛供应在逐渐下降, 长而粗的羊毛供应却有了上升。” “Wool Supply and the Woollen Indust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 1, 1956, pp. 45~46. 苏普莱答复说鲍登“既未能考虑到大陆工业的扩

大，这里面低质产品应计算进去，也未能考虑到欧洲羊毛供应的巨大增长，大陆工业化正建基于此。另外，竞争最激烈的并非是直接的高质量产品市场，而是粗纺市场——这种市场的扩大竟使海外生产的低质产品被传统的英国绒呢所取代。是市场和供应的一系列剧烈变化，而非仅仅是英国工业中的衰败才使得古老的毛布业发生了不幸的反弹。”*Commercial Crisis*, p. 143。

266 见 F.J. 费希尔，“London's Export Trade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II, 2, 1950, pp. 159~161。

267 “英国经济在内战前的半个世纪的巨大增长，表现在它与地中海的关系上。该时期英国工业解决了一直困扰着它的技术难题，羊毛制品像洪水一样涌入了东部和西部地中海，这无意中使意大利和土耳其变成了工业原材料的供应者。”拉尔夫·戴维斯(Ralph Davis)，“England and the Mediterranean, 1570—1670”，载 F.J. 费希尔编 *Essay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1), p. 117。

268 见费希尔，*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I, p. 336。见鲍登：“[旧式的羊毛制品]最适合于在北欧、东欧和中欧穿着，而[新的精纺制品]则极适合于温暖的、非热带的地中海地区。英国的运气是它近乎占有了长纤维羊毛的半垄断地位。……”*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X, p. 57。这里的垄断意指缺少竞争，而非对进入的法定限制。到 17 世纪中叶，在爱尔兰有了长绒羊毛，到世纪末，在荷兰、泽兰和佛兰德也有了有限的数量。(见 p. 53, fn. 3)

269 费希尔，*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I, p. 155。

270 见查理·威尔逊 (Charles Wilson)，“Cloth Prod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17th Century”，*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II, 2, 1960, p. 212。

271 引自里奇，*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 p. 467。

272 “(西班牙美洲)殖民者，渴望奴隶和各种制成品，有大量可供支配的硬币，仍然执着于用法律处理贪婪而无效率的垄断。他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无许可证贸易者的市场，进入这一市场要冒相当大的风险。”帕里，*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pp. 516~517。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第一批认识到英国资本积累过程中海盗重要性的人之一。他指责老一代的史学家忽略了金银的这一主要来源：“我们的历史学家的特点，如《剑桥近现代史》竟然不提及那些影响了伊丽莎白时代并使其著名于世的经济因素。”*Treatise on Money*, II, p. 156, fn. 1。

韦布认定这一过程“一旦转移便遇到了意外之财。”即“不是像西班牙人所做的那样把金银从原地取出，而是在西班牙人得到以后很短的时间内把它取走……”。*The Great Frontier*, p. 196。

273 帕里,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p. 524。

274 同上书, p. 526。即使在爱尔兰, 英国此时的态度也放松下来。爱尔兰同西班牙有着广泛的贸易。如果英国人对此不满或怀疑, 他们并不打算去压制这一贸易。“伊丽莎白治下的英国至少在这件事上比随后的几年更随和。爱尔兰天主教徒并不受经济无能的支配。”西里尔·福尔斯(Cyril Falls), *Elizabeth's Irish Wars* (London: Methuen, 1950), p. 20。

275 见利思, *The Economy of Scotland*, pp. 63~70。此时苏格兰人想在新斯科舍建立居留地的相应努力失败了, 因为“1603年之后苏格兰便不再有独立的外交政策, 它还没有获得英国全心全意的支持, 而且在新斯科舍它同法国发生了争斗。法国是另一个可以向它的野心挑战的国家(p. 75)。”

276 在1600年, 爱尔兰1/8的领土上覆盖着森林, 到1700年森林几乎全部消失。出售用以鞣皮、造船、炼铁、制桶的木材, 短期利润唾手可得。也可以为国内用途砍伐树木(建筑材料、柴火)。另外, 除了经济动机, 铲除泥沼和森林还有军事上的考虑, 因为爱尔兰抵抗者可以据此免于英国骑兵的追捕。见埃琳·麦克拉肯(Eileen McCracken), “The Woodlands of the Ireland Circa 1600” *Irish Historical Studies*, XI, 44, Sept. 1959, pp. 273, 287, 289。

277 “普遍认为英国控制的爱尔兰制铁业的兴起与英格兰燃料的短缺同时发生。现在看来, 可能是燃料的成本而非短缺困扰着英国工业……

到16世纪末, 燃料和劳动力是经营英国工厂的成本中最为昂贵的项目……同一时期在爱尔兰则要便宜得多……”。上引书, p. 295。

278 1550—1600年, 英国人开始取代北美捕鱼业中的西班牙人。1580年丹麦在冰岛海域实施捕鱼许可证费制度之后, 英国更是实力大增。到16世纪末, 英国便得以在阿瓦朗半岛上立足。但是直到1600—1650年, 英国才在纽芬兰和新英格兰获得稳固地位, 并得以获取西班牙的市场。见英尼斯, *The Cod Fisheries*, pp. 30~81。

279 见帕里,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p. 527。

280 扎戈林,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X, pp. 391~392。这个观点同托尼原来的观点很相似: “这主要是不同类型的经济之间的斗争, 它与地区特殊性之间的一致比社会分工更为紧密。”*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 p. 186。

281 斯通,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VII p. 120。当然,只有在这种相对安全的环境下我们才能找到特许公司求助于其受益人——国家这样一幅奇怪的图画。见罗伯特·艾什顿(Robert Ashton)的解释:“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很多公司在发展中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他们倾向于把政府的大力支持视为想当然的事情,而且特别留意那些未达到的目标,忽略已经有了的收获。在这种心态下,对特权的表面冒犯在特权受益人眼里便带有了不成比例的重要性。”“Charles I and the City”,载费希尔编,p. 151。如果社会结构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真正攻击,很难想象特许权公司还会这样放纵自己。

282 托尼,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p. 212。

283 特雷弗-罗珀, *The European Witch - Craze*, pp. 86 ~ 87。

284 赫克斯特, *Encounter*, XI, p. 76。

285 J.G. 波科克(J.G. Pocock), “Letter to the Editor”, *Encounter*, XI, 4, Oct, 1958, p. 70。

286 见斯通,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pp. 349 ~ 351。

287 比顿(Bitton), *The French Nobility in Crisi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 Press, 1969), I。

288 鲍里斯·波尔契涅夫,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en France de 1623 à 1648* (Paris: S. E. V. P. E. N., 1963), p. 577。

289 罗兰·莫斯尼尔编, *Lettres et mémoires adressés au Chancelier Séguier (1633 - 1649)*, Vol. I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4), pp. 82 ~ 83。

290 罗兰·莫斯尼尔, *La vénalité des offices Sous Henri IV et Louis XIII.* (Rouen: Ed. Mangard n. d. Ca. 1945, p. 58。)也见 pp. 518 ~ 532。

291 见 G. 帕热斯, “La Vénalité des offices dans l' ancienne France,” *Revue historique*, CLXIX, 3, 1932, pp. 493 ~ 494。

292 “如果在各阶级的等级结构中存在距离,有时甚至发生阶级斗争的话,那么阶级的划分并非一清二楚。从一个阶级进入另一个阶级时常经由复杂的、微妙的关系而在细致的排列中发生。”莫斯尼尔, *Vénalité*, p. 532。

293 见莫斯尼尔, *Lettres et mémoires*, I, pp. 168 ~ 169。

294 波尔契涅夫,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p. 578。

295 比顿, *The French Nobility in Crisis*, p. 100。

296 同上书, pp. 70 ~ 76。

297 布洛赫, *Caractères originaux*, I, p. 139。

298 “专制王权的主要政策路线指向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方向。资产阶级急需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威来捍卫法国边界内外的经济利益。”鲁布林斯卡亚, *French Absolutism*, p. 330。

299 同上书, p. 240。

300 同上书, p. 271。

301 “以为贵族可以完全免于路易十三和摄政的政府的财政压力的想法, 是极不符合事实的。”皮埃尔·德约恩 (Pierre Deyon), “A propos des rapports entre la noblesse et la monarchie absolue pendant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VIIe Siècle,” *Revue historique*, CCXXXI, avr - juin, 1964, p. 342。

302 见鲁布林斯卡亚, *French Absolutism*, p. 226。科拉多·维万蒂 (Corrado Vivanti) 还说: 这样一个举动对国家不仅在政治上也在财政上带来危害, 因为它“造成了整个第三等级联合起来与专制王权作对。”“Le rivolte popolari in Francia Prima della Fronde e la crisi del Secolo XVII”,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XVI, 4, dic, 1964, p. 966。

303 鲁布林斯卡亚, *French Absolutism*, p. 271。

304 见 J. 赫斯特菲尔德, “The Profits of Fiscal Feudalism, 1541—1602”,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II, 1, 1955, pp. 53~61; 罗伯特·艾什顿, “Revenue Farming under the Early Stuart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II, 3, 1956, pp. 310~322。

305 见赫斯特菲尔德,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II, p. 60。

306 波尔契涅夫,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p. 39。

307 同上书, p. 43。

308 同上书, p. 545。

309 同上书, pp. 545~561。

310 同上书, pp. 282~285, 446。

311 同上书, p. 580。

312 同上书, pp. 580~581。

313 维万蒂,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XVI, p. 966。

314 同上书, p. 965。

315 同上书, p. 965。

316 杜鲁瓦·拉勒里, *Paysans*, pp. 636~637。

317 官职税 (Paulette) 以发明该税种的金融家鲍莱 (Paulet) 而命名。在 1604

年法令规定官职税之前,官职可以买卖,但不得继承,因为如果一个官员在辞职不到 40 天内死亡,这笔交易就失去了效力。1604 年的法令使官职传给继承人成为可能,条件是该官员在每年初交纳相当于那个官职价格的 1/60 的税 (the Paulette)。见斯沃特, *The Sale of Offices*, pp.9~10。

318 “有限君主制政府依靠官吏和最高法院,因此在国王和第三等级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君主专制政府依靠国事顾问和省长,因此在不同阶级,一边是贵族,另一边是官吏和第三等级之间存在着权力平衡。君主专制制的发展卷入了……王权与贵族结盟的政策。这就带来一种危险,贵族会想办法进入政府机构,就如同国王与第三等级结盟时资产阶级所做的那样。因此,首先王权要看到这种机构是否凌驾于各社会阶级之上;第二要保证官吏坚守中产阶级的本份。”卢西恩·戈德曼 (Lucien Goldmann), *The Hidden God*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64), pp. 127~128。Ergo, the Paulette。

319 同上书, p. 120。

320 同上书, p. 141。

321 同上书, p. 106。

322 干扰,是指刚开始。一旦他们失去了早先获得权力和影响的希望,他们便看到了官职税有利的一面。见戈德曼, *The Hidden God*, p. 129。

323 同上书, p. 120。

324 罗兰·莫斯尼尔, “Recherches sur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en France avant la Fronde”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V, 1958, p. 107。

325 同上书, p. 108。

326 同上书, p. 110。科拉多·维万蒂回答莫斯尼尔道:“莫斯尼尔为了表明这种术语的极端后果及其滥用,问道:‘我们能把威尼斯贵族,那些大商人,称作封建团伙吗?’以此类推,两行著名的诗句涌上心头:‘你是萨丁的国王,但在比萨只是个资本家’ [‘voi che re siete in Sardegna/ed in Pisa Cittadini’]。这引得人们至少要答称,威尼斯贵族也在事实上参与了接管东方(即拜占庭和后来的奥斯曼)帝国与新大陆的封建领地。”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XVI, p. 969。

327 莫斯尼尔,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V, p. 110。

328 J.H.M. 萨蒙 (J.H.M. Salmon), “Venality of Office and Popular Sedition in Seventeenth Century France”, *Past & Present*, No. 37, July 1967, p. 43。明纳·普鲁斯特维克 (Minna Prestwick) 在评论波尔契涅夫的书和罗贝尔·芒德鲁 (Robert Mandrou) 的书时几乎使用了同样的语言:“始于对 17 世纪法国起义实质的争

辩已转入到对社会结构和政府特点的争论……”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CC-CXX, July 1966, p. 572。

329 “低价格并没有给工业带来不利影响。例如在法国 17 世纪头十年就是一段制造业、手工业和农业的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国债减少了,预算平衡了,等等。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利润增加了,这些年头他们变得更加富裕。”鲁布林斯卡亚, *French Absolutism*, p. 13。

330 波尔契涅夫,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p. 560。

331 鲁布林斯卡亚, *French Absolutism*, pp. 144~145。泽勒指出,整个王室制造业制度,在 16 世纪的法国特别是亨利四世时代兴盛起来。这个制度是建立在防止贵重金属流出国外的要求之上。这样,国王就鼓励建立奢侈品工业,以避免进口奢侈品。 *Essays in French Economic History*, pp. 130~131。

17 世纪早期商业收缩的后果是严重的。“紧缩通货对法国经济尤为困难。法国出口的产品没有提供明显的利润边际。它的出口主要停留在法国货和西班牙货的差价上。从贵金属的注入开始减慢的那一天起,这种差别就减小了。”

“从另外一个观点看,紧缩通货时期还标志着那些坚决地走向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联合省和英国进行了明显的经济合理化尝试。资本主义生产意味着用适当的货币手段,利用货币积累在市场上获取最大的利润。”

“通过比较就很容易理解从亨利四世到路易十四,法国的制造业只是在发展旨在限制进口的奢侈品工业中获得了或多或少的成功。尽管如此,整个国家还是停留在货币匮乏的状态。这一点为德马雷(Desmarets)所观察到,而柯尔贝(Colbert)早在 1670 年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向国王承认农民经受着‘普遍的困难’,收税人在‘向各省收税’时也经历着‘普遍的困难’。他总结说‘在公共商业’中货币更为稀少。”让·默夫雷特,“Monetary Circulation and the Economic Utilization of Money in 16th - and 17 - Century France,” 载伦多·卡梅伦编, *Essays in French Economic History* (Hemewood, Illinois: Irwin, Inc., 1970), pp. 148~149。

332 见鲁布林斯卡亚, *French Absolutism*, p. 328。

333 “(法国和英国)最大的差别不是在(工业)法律的本质,而在于它们的实施。在法国,官员在实施法律时是如此地有力,以致于手艺人时常想杀掉他们以遏止其热情。在英国,官员是如此地松懈,以致于工匠们时常要提醒他们注意自己的责任……大部分规章都是那种干涉资本主义工业企业进步的……”内夫,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p. 56。

334 同上书, p. 98。

335 见塞拉,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p. 26。

336 波尔契涅夫和莫斯尼尔都同意此点。见波尔契涅夫,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pp. 458-463。见莫斯尼尔, *Peasant Uprisings in Seventeenth - Century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New York: Harper, 1970), pp. 306-311。

“战争, 连同长年的经济萧条, 向这些国家(西欧和北欧)的金融、行政机构提出了要求。这些国家强使它们的政府一方面增强其行政上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还要增加税收。这两个政策在逻辑上互补, 在政治上却互不相容。扩张王权的官僚机构或者还没有存在, 或者没有效率, 难以控制。金融压力越大, 中央政府在接授特权阶级和自治机关的合作方面受到的阻碍就越大……”

“理论上法国的君主制是绝对的。它的立法和行政当局及其几乎不受限制的征税权得到了全国普遍的认可, 但在实践上, 君主制受到各种不可触动的豁免权的限制。这些豁免包含阶级、自治机关和个人。此外还受到缺乏对于庞大而异质的王室官员进行有效的中央控制这种限制。像别处一样, 战时生产既要中央集权, 又使中央集权的实施变得困难。” H.G. 柯尼斯贝尔格, *The Hapsburgs and Europe*, pp. 279-280。

337 见 J. 默夫雷特, *Population in History*, 特别是 pp. 511-512。“在法国税收从 1623 年的 4 300 万镑上升到 1640 年的 8 000 万镑。小麦价格却从 1638—1640 年开始明显地下降。财政支出增加与经济衰退结合在一起正可解释黎塞留主政末期爆发的大起义。”阿丹特, *Impôt*, II, p. 754。

338 见波尔契涅夫,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p. 119。

339 伊丽莎白 .S. 蒂尔 (Elzab. eth S. Teall), “The Seigneur of Renaissance Franc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XX VII, 2, June 1965, p. 150。

340 萨蒙, *Past & Present*, No. 37, p. 43。

341 “法国贫困农民的上面是一个收取固定租金的阶级; 它仍然很贫穷, 只是依靠传统的经济方法才有了可怜的发展。始于宗教战争爆发前的和平时期的趋势没有成熟起来, 而在英国这一趋势却有了迅速的发展。”弗里德里希·吕特格 (Friedrich Lütge), “Economic Change: Agricultur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 .G.R. 埃尔顿编 *The Reformation 1520 - 1559*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58), p. 47。

342 见波尔契涅夫,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pp. 268-275。波尔契涅夫从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中借用了“无产者”这一术语来描绘市民。他说: “无产

者还没有组成前无产阶级,只组成了一个根本不同的一伙人。这伙人在封建社会的各种群体中都有根源,而且渐渐地融合到一起,变成了真正的整体(p.269)。”

343 罗贝尔·芒德鲁“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et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u XVIIe siècle”, *Annales E.S.C.* XIV, 4. Oct - déc. 1959, p. 760。

344 同上书, p. 761。

345 莫斯尼尔,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V, p. 112。

346 “接近16世纪末,平民大众在经历了种种政治和信仰上的幻灭之后,确信宗教改革和天主教的旗帜对于保护他们的利益已无甚用处,便放弃了阶级斗争的宗教外衣。正是部分因为16世纪末法国平民大众简明而直率地使用阶级的语言,法国各封建阶级才急急忙忙‘结束了自相残杀的宗教战争’,并且忘掉了争吵,集合到亨利四世的王权之下。”波尔契涅夫,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p. 47。也见 pp. 280~281。

347 前引书, pp. 572~573。

348 见柯尼斯贝尔格,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X VII, pp. 338 - 340。

349 见鲁布林斯卡亚, *French Absolutism*, p. 166。

350 乔治·达比和罗贝尔·芒德鲁谈到“那些正在保卫王国政治统一的天主教徒。”*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 Vol. I: le Moyen Age et le XVIIe siècl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58), p. 341。见维克多-L. 塔皮埃(Victor-L. Tapié)“摄政时期和路易十三头几年的法国……是一个牺牲品……法国的几个省份成了领土争端的目标……”

“那时,没有一个国家富强到足以创造出一个围绕自己的和平与经济进步的盾牌(concours)。但一个果断的国家能够保卫领土的独立状态,并可自由支配自己的自然资源。黎塞留的优点是看到了这一点,路易十三的优点是他能理解他的首相可以极好地为他效力。”*La France de Louis XIII et de Richelieu* (Paris: Flammarion, 1952), pp. 524~526。

351 见莫斯尼尔, *Vénalité*, pp. 601~602。

352 亨利·埃斯皮优(Henri Espeix), *Histoire de l'Occitanie* (Nîmes: Le Centre Culturel Occitan. Collection Cap - e - Cap, 1970), p. 155。

353 同上书, p. 159。

354 同上书, p. 161。

355 同上书, p. 146~154。

356 见波尔契涅夫,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pp. 402~403, 418~419。

357 同上书, p. 578。

358 让娜·法弗尔 (Jeanne Favrer) 在 “Le Traditionalisme Par excès de modernité,” 描绘了这种现象在 20 世纪的例子。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II, 1, 1967, pp. 71~93。

359 见波尔契涅夫,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p. 470。

360 同上书, p. 425。

361 J.P. 库珀, “General Introductio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V: J.P. 库珀编, *The Decline of Spain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1609 - 48/59*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0), p. 15。

362 布罗代尔,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p. 399。

363 同上书, p. 396。

第六章 欧洲世界经济体：边缘与外部领域

用政治术语界定一个实体的边界是比较容易确定的。如果我们想知道 1600 年中华帝国所覆盖的领土，我们需要查阅一些档案。它们会告诉我们那时法律上的所有权。肯定总有一些边缘地区，其主权被两个相互竞争的国家所争夺，或者在那里帝国的权威很难看得出是实际存在的。这就可能使我们将这一所有权视为法律上的虚构。但是标准是直接了当的：宣称的权威与一些衡量有效权威（不论如何少）的标准（不管怎样粗糙）两者相结合将大体上向我们提供所需要的东西。

然而对不用政治术语界定的社会体系的边界，就像我们在这里一直讲的“世界经济体”的界限，我们将说些什么呢。我们说 16 世纪存在一个欧洲世界经济体，指出其边界小于整个地球。然而小多少呢？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与“欧洲”进行贸易的世界任何部分都包括进来。在 1600 年葡萄牙人与中非的莫诺莫塔帕（Monomotapa）王国和日本进行贸易。然而，要论证那时莫诺莫塔帕或日本是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确实困难。但是我们认为巴西（或者至少巴西的沿海地区）和亚速尔群岛是欧洲世界经济体的组成部分。那时欧洲和波斯之间存在着穿越俄国的过境贸易。¹ 而我们还是认为波斯肯定在这个世界经济体之外，甚至俄国也如此。俄国在其外，而波兰却在其内。匈牙利在其内，而奥斯曼帝国却在外面。这些区别是基于什么呢？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贸易量或者贸易构成的问题。塞尔索·富

尔塔多说：

除了金银，美洲在殖民的第一个世纪中几乎生产不出任何能在欧洲销售的东西。东印度群岛生产按单位重量计价值很高的商品，如香料、丝和平纹薄棉布。与东印度群岛不同，美洲生产不出任何东西足以成为有利可图的贸易的基础。²

尽管如此，美洲是在体系内，而东印度群岛是在体系外。至少我坚信是这样。

我们要指出世界经济体的边缘与其外部领域之间的区别。世界经济体中的边缘是世界经济体中主要生产低级商品（即生产这种商品的劳动得到较低报酬）的地区。然而这个部分是整个劳动分工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这些商品是日用必需品。世界经济体的外部领域是由其它世界体系构成的。它们与一个已知的世界经济体有某种基本上建立在贵重物品交换上的贸易关系。这种交换有时被称为“贵重贸易”。我们将主要通过分析16世纪中俄国与东欧不同部分之间、印度洋地区与拉丁美洲之间的不同来展示这种区别。

初看起来，俄国和东欧似乎有很多地方相似。两者似乎都经历了建立在强制劳动之上的并从事商品性农作物生产的大片领地增加的情况。正如布罗代尔指出的，这种情况当时也出现在奥斯曼帝国。³在这两个地区，对农民的强制基本是国家政权运行的结果。从这个时期起，这两个地区的地主阶级似乎大大加强了，而资产阶级则削弱了。另外，两个地区似乎都受到价格革命的影响，并似乎相当忠实地遵照一般的参照系。然而仔细观察便会发现一些差别。⁴

我们将俄国与西欧的关系和东欧与西欧的关系的区别冠以三项标题：(1)贸易性质的区别，(2)国家机器的力量与作用的区别，(3)作为以上两点的结果，本土城市资产阶级的力量与作用的区别。

俄国革命前的伟大历史学家V.O. 克柳切夫斯基把他的俄国史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即“俄国历史的基本要素是移民或者说开拓

殖民地，……其它所有因素都或多或少不可分地与之相联系。”⁵ 假定这是正确的，正如欧洲其它部分一样，俄国“进入了一个经济增长的新时代。……”⁶ 这是 16 世纪的一个现象。通常认为 1552 年占领喀山的伏尔加汗国，继而于 1556 年占领阿斯特拉罕是一个转折点。⁷ 在下一世纪中，俄国人向南拓殖了沿顿河到亚速海和沿伏尔加河到里海的森林与草原地带，还跨越西伯利亚向前推进了很大一部分地区。与此同时，乌克兰人（那时在波兰人的统治下）沿第涅伯河推进，所有这些到 1654 年都变成俄国的领土。俄国向南和向东的扩张是现代世界历史上的重要事件。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这一扩张的方向是俄国周围地区统治者的力量所起的作用。正如乔治·韦尔纳茨基提醒我们的，“正是俄国人在西面被遏制和赶回时，他们开始向东面的西伯利亚推进。”⁸

因此，就俄国来说，西方商人面对的是一个远比波兰或者波希米亚或者梅克伦堡巨大的国家。这个国家从结构上讲本身就是一个帝国。波兰的对外贸易几乎完全是对西欧，俄国的则既向东面又向西面。正如杰罗姆·布卢姆所说，“东方贸易可能比西方贸易对俄国更重要。”⁹

对东方贸易不仅在数量上较大，而且它还具有要创造一个世界经济体的性质和规模。或者用一些作者的话来说，它处在一个稍微不同的理论框架中，即有一个全国市场。A.G. 曼科夫指出粮食生产的重要作用，这是一个我们已经熟悉的概念：“在谷物成为商品之前——这一点证明农业与手工业（*métiers*）之间的分化达到一定水平——不能说在封建社会内部商业关系有力地发展了。”¹⁰ 因此让我们看一下 15 世纪和 16 世纪在波兰和俄国都出现的小麦生产扩展的现象。正如我们已经论证的，到 16 世纪波兰已经并入欧洲世界经济体。其小麦是在这一市场上出售，并为这一市场生产。如布罗代尔和斯普纳所说：“这一[16]世纪末的主要特征是波兰的小麦被吸收入欧洲价格的总体经营之中。”¹¹ 这一点对波兰和欧洲其他国家都至关重要，因为波兰已经成为当时“谷物的最大出口者。”¹²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波兰小麦出口经济的崛起意味着以强制性商品性农作物劳动为特征的大领地的兴起。这也意味着贵族政治力量的加强。他们铲除贸易障碍的兴趣比得上西欧商人们的兴趣。他们的共同努力使波兰维持着一个开放式经济。¹³1626年至1629年瑞典的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对维斯都拉河的封锁所引起的经济困难，清楚地显示出波兰贵族的繁荣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这一开放贸易。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这时企图由此“割断”波兰的“神经”。¹⁴“通过波罗的海港口出口的谷物[在波兰]的比重迅速提高，以至于它统治了这个国家的整个经济结构”。¹⁵这一事实被杰齐·托波尔斯基用来解释造成17世纪波兰倒退的破坏性后果。根据当地经济面向出口的程度不同，在波兰的不同地区，这些后果也不同。¹⁶

也许所涉及的小麦价值在欧洲世界经济体的总产品中占相当小的份额，这一点会遭到反对。但是鲍里斯·波尔契涅夫回答说“学者们的注意对象不应是出口商品的数量，（事实上不太大），而应是利润率。利润由中间商人和剥削农奴劳动的土地占有者们分享。”¹⁷斯坦尼斯拉夫·豪斯佐沃斯基指出：在16世纪的价格全面上涨中，不仅波兰的价格在西欧和中欧上涨之前，在美洲金银¹⁸影响价格之前就已上升，而且在波兰内部是“土地占有者们从[价格上升]中得到最大好处，而农民和城镇居民只有受损失。”¹⁹与这种经济榨取相对应的是农民骚乱的频繁。²⁰

我们现在来比较一下这时俄国小麦生产的作用。我们从曼科夫关于16世纪俄国的论据开始：“此时人们所能说的只是一个国内谷物市场。”²¹尽管几乎没有小麦出口，“在16世纪已经存在着地方市场之间的联系，有时这些市场相距很远。”²²这样资本主义农业以相似形式，一方面在波兰（和东欧其他国家），另一方面在俄国出现。但是前者是为扩大的西欧市场生产，而在俄国，“封建领主”是为扩大的国内市场而生产。²³的确，在16世纪“把[粮食]运出国需要得到沙皇的特殊许可。”²⁴16世纪西欧世界经济体的专业化在俄

国世界经济体内部以较小的形式再现。俄国世界经济体的中心是出口制成品(金属器皿、纺织品、皮革制品、武器和弹药)换回奢侈品、棉布、马匹和绵羊。²⁵另外,他们再出口西方的制成品到东方,“尽管在16世纪这一活动显然不具备很重要的意义。”²⁶俄国体验到作为一个经济共同体的焦点的可喜效果:“毛皮、盐、皮革和其它物品从殖民地流入较老的地区,创造新的财富和刺激商业与工业活动。”²⁷

然而俄国与西方的贸易如何呢?它是否与波兰贸易相似呢?我们必须小心,不要把18世纪和19世纪的现象混同于16世纪。到18世纪和19世纪,独立的俄国世界经济体确实已经消失了,俄国已经成为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又一个边缘地区。²⁸

确实一眼就可看出,16世纪所发生的是“俄国在对西方的贸易中用原料和半成品交换制成品。”²⁹俄国出口多种用于海军补给品的原料(亚麻、大麻纤维、脂肪、蜂蜡)和裘皮,进口奢侈品和金属品(包括军火)。但是这种贸易没有一个方面看起来是重要的。对于西欧来说,到17世纪才能说俄国是一个重要的“谷物、林产品的储备库”。³⁰T.S. 威兰认为俄国对于其16世纪的主要西方贸易对象——英国的主要价值在于“海军所需基本原料的来源。”但是他补充道:

有点难说这一贸易对俄国人同样重要。与向英国出口海军供给品相对等的,可能是向俄国出口武器和弹药,特别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据公司称它正在向俄国提供这些东西。³¹

我们将回过头来考察这一点:“特别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A. 阿特曼提出重要的进口不是金属制品,而是银块和银制艺术品。他指出教堂、修道院和宫廷中积累了大量白银,以及金属条块的重要发现,来论证这一假设。³²如果记住主要的出口品之一是裘皮,“其次是显示高贵身份和财富装束的东西,”³³即所谓“贵重贸易”的一种,我们便可以考虑16世纪俄国与西方的贸易中主要

部分是贵重品的交换。这是一个消费剩余的方法，而不是生产剩余的方法，因为在经济收缩的年代它并不是必需的，从而对经济体系的运作并不起关键作用。这并不是说它不重要。中间人从中获利。毫无疑问，国家也从中得到一些关税收入；毫无疑问这还加强了社会威望积累体系。然而，要点是如果发生像 1626 年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对维斯都拉河那样的封锁，俄国国内经济受到的影响要远远小于波兰所受的影响。

我们一直在用波兰作为欧洲世界经济体中的一个边缘国家的例子（与外部领域相对）。然而波兰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那么，如果我们来考察边缘中的其他国家，会有什么区别吗？回答是区别会有一些，但不重要。

比如在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农奴”的“强制劳动”不总是以“劳役”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有时以“强制的雇佣劳动”的形式表现。³⁴约瑟夫·瓦尔卡注意到波希米亚这种劳役的中间形式与其农业生产的多样化和面向国内市场有关。³⁵同样地，约瑟夫·彼得兰指出在中欧许多领土较小的国家中（波希米亚、西里西亚、萨克森和奥地利），大庄园的发展趋势较弱。他提出我们不仅要从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分工中观察专业化的开始，还要从农业本身中观察。但是这当中“分工自然不能完成”。³⁶马洛维斯特指出丹麦的农业专业化类似东欧，因为在 16 世纪，丹麦和荷尔斯泰因的贵族“发展了一种建立在农奴劳动与农产品和乳制品贸易之上的经济，这种经济已建立在农奴的自身的产品基础之上，这些农奴从事商业的机会是极小的。”³⁷但是他说贵族剥夺的这一社会过程，“我们能够在波兰、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梅克伦堡和利沃尼亚清楚地看到，而在丹麦则表现得较微弱。”³⁸

我们可以说，这些例子表示 16 世纪欧洲劳动分工的结构已经开始变得较复杂。但是波希米亚是一个被欧洲世界经济体所包围的小国家，而俄国是一个在欧洲世界经济体边上的巨大帝国。前者的低出口率和后者相似的低出口率的意义是相当不同的。波希米

亚的政治行动自由终究小得多,而其经济依赖最终要大得多。这是一个分析家必须在绝对值中看最小值,在相对值中看最大值的情况。³⁹在出现贸易被切断的情况下波希米亚比俄国具有较小弹性。因而其经济活动必须自觉地在欧洲世界经济体的需要范围内发展。

现在让我们回到威兰关于 16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论述。从我们的说明中可以明显看出边缘和外部领域之间的分界线是不固定的。这既是就其难以确定而言,也是就其易变而言。看待俄国这个时期的历史的一种方法,是把它看作俄国对欧洲试图将其并入世界经济体所起的反应。当时这一尝试失败了,是因为欧洲的技术和经济还不够强大。在稍后的时期它终将取胜。罗伯特·雷诺兹略带种族优越感地叙述了这一过程:

至此我们所能说的是,英国人打开了门路并引发了俄国的扩张。……英国[1553年]开辟的[北方]航线为俄国提供了裘皮的巨大市场。这刺激了边区的哥萨克人和斯特罗加诺夫人,以他们的资本和管理才能尽可能远地向东部和北部推进。每一年他们都为裘皮贸易开拓新的区域,正如法国和英国的裘皮商,以及以后的美国人在北美洲向西不断推进一样。有了巨大的裘皮市场,就提供了从西欧购买优质的纺织品、金属制品和其它物品的可能。⁴⁰

英国人打入俄国世界是如何顺应了俄国国内的政治发展呢?我们现在必须转到这个方面来观察俄国对“它被卷入欧洲”是如何反应的,以及这种反应是如何使俄国进一步区别于东欧的。马洛维斯特注意到俄国中部生产的粮食出售给俄国欧洲部分的北部和东北部以及西伯利亚。⁴¹这样俄国小麦生产的发展“帮助了”对自己的北部和东部广大富饶领土的“拓殖和征服”。这些反过来“首先为沙皇提供了巨大的财富,后来又为商人提供了财富。”⁴²

要估计俄国国家的作用，我们要扼要重述我们在前一章中所论述的西欧一些中心国家的作用，接着看东欧的边缘国家的作用，然后把这两者与俄国的国家作用进行比较。我们说过专制王权是这样—个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国王及其随从通过世袭的和可收买的官僚和雇佣常备军的直接帮助追求最高政治权力。一方面，国王寻求城市商业资产阶级的受益部分的支持，他们为国王提供金钱和对旧贵族离心趋势的政治抗衡力量；另一方面，国王又居于传统社会地位体系的顶端，他保护着贵族，使之免受发展中的资本主义体系的侵蚀影响。⁴³

因而对于这两个社会阶层，即对旧贵族和城市商人资产阶级来说，专制王权制度对每一方来说都只是较小的弊病，其力量的成长是建立在他们缺少其他选择的基础之上。因为它通过创造一种可能性，使这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从整个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的剩余产品中得到一个不成比例的份额而很好地为他们双方服务。在16世纪我们最多只能把国家称为“财政主义”或“早熟的重商主义”。从1650年起，西方国家采取全面的重商主义政策以进一步加强他们在世界经济体中的相对地位。

16世纪既是国家力量在西欧上升的阶段，也是国家力量在东欧下降的时期。这一升一降是东欧经济地位的原因和结果。这是进一步说明社会变化的累积影响的例子。当拥有土地的波兰贵族通过它在国际贸易中有利可图的角色成长壮大而国内的资产阶级变弱时，国家税收的底子被逐渐消耗。这意味着国王付不起保持一支军队的充足的费用。“权贵们需要确保自己得到保护，但是这反过来又造成私人战争的可能。”⁴⁵这些私人军队中，有些与国王军队的规模相当。⁴⁶国王成为选出的国王，中央立法机关Seym开始将其权力的大部分转给地方议会。

从这时起，国家机器的解体迅速进行。杰纳斯·塔兹伯尔展示了如何从上步引出下步：

从 1613 年开始,关于税收的决策通常转由地方议会作出。财政制度的这一分散化导致了有些地方纳税不得不高于另一些地方的情况。当地方议会受委托就税收甚至用于国防的税收表决时(1640 年),混乱更加深化。所有这些都导致财政收入下降。这又反过来使向军队提供费用实际上已不可能。

欠饷的士兵们组织起军事社团或联盟。他们蹂躏国家,构成危险的政治骚乱中心。⁴⁷

在西欧,王室财产的增长是以牺牲教会财产取得的,甚至在天主教的西班牙也如此,但是在波兰不是这样。在宗教改革运动的最初影响下,一些地区的教会土地被信奉新教的缙绅所没收。但是即便在那时,教会财产的大部分也并没有被侵犯。之后反宗教改革胜利了,原因我们已经阐明。然而由于国家非常弱,王室财富仍在减少。⁴⁸

类似的过程也在东欧其它地区出现。现在大多数人把普鲁士国家与两个现象联系在一起:强大的国家与强大的容克阶级。在 16 世纪可以确切地看到强大的容克阶级在以后构成普鲁士的地区崛起。但是 16 世纪也是国家变弱而不是变强的世纪。

第一点,建立在小型家庭土地和劳役(Corvée)⁴⁹基础之上的地产体系,这时在易北河东部地区成长起来。它被称为地主家族(Gutsherrschaft),并取代了被称为 Gutswirtschaft 的旧的封建形式。这个体系,正如其名称所表明的,在国内权威体系中最明显地不同于旧的形式。在新的体系中,正如弗里德里希·吕特格所称,“地产[成为]像是国家内的某种小政治单位;其居民只[是]该国王公的间接臣民。”⁵⁰第二点,如同在波兰,霍亨索伦家族用他们的王室地产、甚至以前教会的土地⁵¹作为贷款的抵押。这个过程逐渐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国王把这些措施推行到极端,而这些措施又极端地有利于容克阶级。⁵²

德意志君主的力量下降过程持续在整个 16 世纪,在 1648 年

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三十年战争”时达到谷底。A.J.P. 泰勒认为和平“不是德意志衰落和虚弱的原因，而是其结果……。”虽然和平是外国列强“强加”的，没有他们的干涉，事情会更糟。“在1648年唯一可替代的抉择不是外国干预更少，而是更多——继续这场战争，直到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区实际上被瑞典、法国和哈布斯堡王朝所瓜分。”⁵³

瑞典的地位值得略提一下。虽然那时其经济非常不发达，瑞典国家机器的演变近似于西欧的模式而不是边缘国家的模式。它的强大不是因为其商业与工业的强大，尽管从1540年开始，铁的生产逐渐增加；⁵⁴相反地，倒是农业的落后和贵族希望占有其他国家土地的利润以便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创造利润。或者至少如马洛维斯特所指出的：

我们值得费些时间考察瑞典统治波罗的海的某些方面。事实上，在15世纪也能发现瑞典扩张的开始，起初是很有节制的。另外，在15世纪和16世纪，瑞典是经济上十分落后的国家。这不仅是与西欧相比，就是与德国东部和波兰相比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应当注意到，瑞典商人的地位根本不能解释其对邻国的侵犯，因为这些商人从瑞典对他国的占领中获利极少。有时他们甚至企图反对占领政策，把占领看作不断增加税收的根源。相反，大力支持扩张的集团是贵族。贵族不能靠加重一个强大而组织得很好的农民阶级的负担来增加在当时数量较少的收入。占领和统治被占领土恰恰给封建领主与贵族带来新的收入源泉。⁵⁵

如果我们问为什么农民这样强大，下面的回答也许是不确切的事实，即瑞典那时具有“一个勉强能供给自己必需品的农业，”因此它的直接财富的唯一真正来源就是“靠邻国的弱小而过寄生生活。这是贵族力量巨大增长的结果。”⁵⁶

这样，瑞典作为一个稍为偏离正道的例子，很好地展示了一个过程。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弱小的边缘国家，它是这样一个政治舞台，贵族在其中的政治力量随着 16 世纪的经济扩张而增长。但是小麦的增长被当时气候下降趋势所阻碍。这尤其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起了负作用。⁵⁷因此贵族需要征服，为此他们需要一个强大而不是弱小的国家。一旦他们有了强大的国家。他们便能够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用重商主义作为促进工业的手段，从而避免了波兰的命运。

我们现在可以看看俄国了。我们假设俄国不是欧洲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支持这一假设的一个关键证据恰好是俄国的君主专制的成长方式与西欧的发展非常相似，且与东欧明显不同。

事实如何呢？俄国 16 世纪强制性商品性农作物劳动的发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产物。这与称为领地的以服军役为条件的封地的出现直接联系。这些封地被用来作为沙皇支持者的报酬。在某种意义上，这与拉丁美洲的监护制有些近似。然而所不同的是，强制劳动的制度不能骤然采取，因为首先要剥夺旧的大贵族和修道院的土地。没有任何相当于地方的政治领袖作为居间人物，除了俄国东正教的教士可能会在某些范围扮演类似的角色。农民债务增长这一过程使“重新封建化”的过程开始。最后导致“农奴”法的实施。V.O. 克柳切夫斯基描述了这一过程：

地主的贷款使这样一种关系发展起来，即庄园中的农民必须在破产农民和奴隶[即以个人劳动的形式来抵消债务]之间做出选择，但是这一束缚不是警察使其附着于原籍，……而仅仅是在国家的一般民法下通过债务在劳动上对个人(地主)的依附。这样在 16 世纪末，农民迁移的权利自行废除了，而不是通过法律取消的。……

当一个农民为取得一小块土地和贷款而与地主订立契约时，他自己，永远地(通过其租佃契约)放弃了任何时候(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中止根据契约他所承担义务的权力。⁵⁸

然而当伊凡雷帝在 16 世纪中的军事胜利导致东南部，即今俄国的欧洲部分的大片空地并入俄国时，自愿成为农奴在俄国已经变得不够了。为使农民不逃向新的土地，“实施了对农民迁移自由的限制。”⁵⁹因为这种逃离意味着对于领地的所有者们来说是丧失他们的劳动力，对于政府来说是丧失纳税人。正如亚历山大·格尔申克隆所说，“农奴化的过程离开国家的力量几乎不能想象。在这样一个像俄罗斯大平原向东部和南部的辽阔的、人烟稀疏的地区敞开的国度，国家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做到这一点呢？所以，国家机器的积极作用与俄国从事征服作战有紧密联系。

西班牙当然也是如此。但是由于金块、意大利放债者和哈布斯堡联盟，西班牙过去是并仍然是紧紧地与欧洲世界经济体联在一起。俄国企图创造其自己的世界经济体。不管怎样，俄国国家的创立初始过程与西班牙的有某些相似之处。西班牙的诞生是基督教十字军从北非穆斯林占领者手中夺回其领土的结果。俄国的诞生是基督教十字军推翻“鞑靼统治”，从中亚的穆斯林（或者伊斯兰化的）侵略者手中夺回自己的领土的过程形成的。莫斯科公国的角色与卡斯蒂利亚相似。共同斗争的激情极大地帮助了莫斯科公国取得胜利。⁶¹

作为在夺回领土中得到传统的武士阶级旧贵族(the boyars)支持的代价，莫斯科公国沙皇不得不对他们提出的根据一个古代历史上存在的等级次序来安排永久的优越权位的要求作出让步。⁶²这一被称作任官等级^[1](Mestnichestvo)的制度是变革过程所创造的重要传统之一。为了抗衡贵族的这一新力量，伊凡三世在 15 世纪末创造了一种称为领地的新的非绝对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封地制度。它是一种对以服军役为回报者的俸禄。这种封地的来源是占领的边疆土地、没收的寺院和有罪的旧贵族的土地，以及自由农民的土地。⁶³

[1] 俄国 15 至 17 世纪按贵族门第规定的任官等级。——译者

然而由于没有经历宗教改革，教会能够卷土重来。两种土地租佃制：领地和被称为世袭领地的旧的庄园形式的存在给了修道院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世袭领地的所有者开始出卖或者向教会捐献他们的土地，特别是在 1550 年以后，用以换取终身租佃。宗教的理由确是存在的，但是关键的因素似乎是社会 - 政治的。⁶⁴

往往存在于边疆地区的，且不是在传统的相互封建义务基础上的新的土地占有形式，领地的建立，加上领土扩张的事实以及因此出现的可以随时得到的土地，导致政府在整个 16 世纪使农民的工作与居留变得越来越具强制性，这始于 1497 年法典，到 1649 年议会法典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⁶⁵没有这些限制，农民会拒绝服务。教会的政治力量意味着国家无法遏制土地流出税收体系。唯一的办法是对其余的土地增税，进一步压榨农民。⁶⁶另外，由于农民从修道院的土地上得到较有利的条件，增税就成为进一步推动农民外迁的因素。

这是“50 年代和 60 年代”问题的背景。伊凡四世(雷帝)从 1547 年至 1584 年的统治在俄国历史上是一个关键时期，因为伊凡在力图建立一个独立于欧洲世界经济体之外俄罗斯自主国家时，一心注重增加国家的权威，使得俄国几个世纪以后所熟悉的内部社会结构定形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在一个短时期内成功地达到了前一个目的。或者换一种说法，他把狼拒于门外的时间长到能够使俄国以后被吸进世界经济体时，俄国确实像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西班牙那样是一个半边缘化国家，而不是像波兰那样作为一个边缘国家。

在俄国内部，沙皇增强国家权力的主要武器是建立一个世袭的国家机器，像西欧那样。这一国家机器在俄国的情况比在法国和英国对土地权的再分配有更多联系。一项关键的改革是地区行政机构的采地制度的废除。这是一种以包收租税为俸禄的制度。取代它的是部分以现金，部分以授地为报酬的官僚制度。⁶⁷这一改革不仅建立了一个中央官僚机构；同时也创立了税收基础。⁶⁸与此相联

的还有牢牢地掌握在当地缙绅手中的地方政府的建立。缙绅阶级的崛起受到沙皇的支持,也是沙皇权威的扩张的一部分。⁶⁹正是在这一时期(1556年),服军役与领地的占有牢牢地联在一起。这样就保证了沙皇拥有一支相对忠诚的常备军。⁷⁰领地的发展,以及因此而越来越复杂地对这一体系的管理进行监督,导致了在莫斯科为领地建立一个中央土地办公室。⁷¹

与此同时,伊凡四世对外正推行不仅向南部边疆(当时指克里米亚),而且还向西面的波罗的海地区扩张的政策,即持续了25年之久的所谓利沃尼亚战争(1558—1583年)。这一战争的目的是把俄国建成波罗的海的强国。这是一个漫长而根本无确定结果的战争。⁷²要是它具有较确定的结局,俄国在那时就会确定地被卷入欧洲世界经济体。

人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向西的扩张诱使沙皇以其身份在其位上成为一个企业家。与东欧各国的统治者不同,沙皇由于现成的较强的国家机器可以从贸易扩张中直接获利。在波兰,力图得到对出口贸易的垄断控制的是贵族;在俄国则是沙皇。他给自己和他所宠爱的人保留这些权力。⁷³因此,对于沙皇来说,对外贸易是值得重视的,因为它不仅是关税收入的来源,而且还是他的农民以实物形式缴纳给他的数量很大的各种货物的出路。伊凡四世设法利用整个欧洲像城市为中世纪封建主服务那样为自己服务。由于这个企业如此巨大,他感到谋求一个(包括外国的和本国的)商业资产阶级的合作来经营买卖,不仅方便,而且有利。当波兰贵族消灭波兰的商业中间人时,他们因此逃避了支付某些对其商品所征的税。这样,国家失去了收入,而波兰资产阶级衰落了。当地主是君主时,任何豁免的或保留的税收都只是账面上的交易。因此,在俄国,把监督商品交易的人从独立的企业家变为公司成员在财政上没有很大好处。由于他们一开始就是后者,让他们保持不变较为容易。

因此,在俄国如同在欧洲一样,本国的商业资产阶级得以幸存。同时国家机器也得到加强。⁷⁴要是沙皇伊凡四世胜利了,俄国商

人们也许会如他们所预期的那样得到发展也不一定。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了，因为当利沃尼亚战争在以表面上形成僵局而告终时，实际上所取得的全部就是使俄国内部的社会经济危机臻于顶点。

在当时内部不稳定的政治领域中，一个国家在国际领域中不能连续取得胜利便会导致国内利益集团的公开冲突。而这往往会导致国家解体的危险。为了遏制这一内部动乱局面，伊凡四世采取了强大的警察手段——臭名昭著的沙皇直辖的禁卫军，为此他得到了“雷帝”的称号。这主要涉及一支特别的皇宫卫队的建立。沙皇依靠它迅速地清除了他的敌人，特别是在贵族中的敌人。手段有两个：处死和没收财产。后者使沙皇能够把土地重新分配给他希望继续对他效忠的人。

这是政治上的胜利，因为它结束了对政变的隐忧。但是许多人认为，这适得其反。比如布卢姆说：

沙皇直辖的禁卫军造成的震荡，以及漫长的、失败的利沃尼亚战争不断地耗尽了国家的资源，并打乱了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没收大地产综合体及其附属地块，使它们变为领地，是对作为国家经济基础的农业体系使用暴力，使技术倒退，生产下降，制造庄园主与农民之间的新的冲突。⁷⁵

布卢姆还指责说，重税以及瘟疫、歉收和侵略造成农民的大批逃亡。⁷⁶1575年至1590年的突然的价格猛涨反映并且加重了所发生的这一切。A.G. 曼科夫在他对16世纪俄国价格变动研究的基础上，也愿意把“1580年至1590年的危机看作国民经济的总危机。”⁷⁷他称这是一个他与苏联一般的历史学著作共同持有的观点。⁷⁸

韦尔纳茨基以近似的倾向称利沃尼亚战争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因为俄国别无他途，只有继续在克里米亚作战。这样通过选择在利沃尼亚作战，俄国采取了两面作战的政策。这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⁷⁹在我看来这似乎忽视了重要的一点即俄国很可能在利沃尼

亚也没有其他选择。韦尔纳茨基把利沃尼亚战争看作一个失败。在这场战争中俄国“幸运地同瑞典于1583年8月5日达成停战协议，尽管其条件非常不利。”⁸⁰也许，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巨大胜利。俄国没有被拉入欧洲的世界经济体。其资产阶级与其君主至少暂时避免了他们的波兰邻国的命运。

这并不全是想入非非的想法。鲍里斯·波尔契涅夫分析了16世纪欧洲国际关系的大格局，认为其中哈布斯堡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单一的帝国体系，而其敌对者则力图鼓励建立一个由瑞典、波兰（后来是波兰—立陶宛）等国家组成的东部屏障和奥斯曼帝国。这一屏障“主要针对中欧，”但是也“把变得更强大的俄国与欧洲其他地方隔离开。”⁸¹

但是当天主教在波兰重新立住脚跟时，波兰—立陶宛国就成为西班牙的盟国。在伊凡四世以后的年代中，俄国由于内部纷争而四分五裂，在所谓“纷扰时期”（1610—1613年）达到顶点。波兰受到哈布斯堡的秘密支持，还有出于不同动机的瑞典，“企图瓜分和征服俄国。”⁸²这一尝试失败了。另外，韦尔纳茨基还断言，这时英国也有意在“整个俄国或部分地区建立保护国关系。”⁸³毫无疑问，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对三十年代战争存在尖锐的分歧，这不断地使俄国眼前的敌人转向更迫切的任务。

然而俄国越来越接近于被欧洲所吸收。伊凡四世“灾难性的”政策延缓了这一点。看一下克柳切夫斯基关于“延长的”16世纪末所发生的事情的论述：

我们看到英国和荷兰帮助[沙皇]米哈依尔[1613—1645年]与其敌人波兰和瑞典和解，原因是莫斯科公国是前者的宝贵市场，同时也是通向东方——波斯，甚至印度——的便捷之路。再者，我们看到法国国王提出与米哈依尔结成联盟，以满足法国在东方的商业利益，英国和荷兰都是它在东方的竞争者。……沙皇米哈依尔的帝国比沙皇伊凡[四世]和西奥多尔

[1584—1598年]的帝国都虚弱；但是在欧洲远不是那么孤立了。⁸⁴

“但是”是否应当读作“因此”呢？伊凡所追求的是建立一个俄罗斯帝国，而不是欧洲大饼的一角。这是后来彼得大帝的目标。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俄国与东欧的第三大区别是贸易方向与结构的不同和国家机器力量不同的直接结果。在俄国，城市和本地的资产阶级在“延长的”16世纪中生存了下来；而在东欧，则大部分没有。在俄国，尽管最大部分的土地是像在东欧所形成的大庄园形式，但土地是在“新人”手中，有时称他们为“缙绅”，有时称“小贵族”（我们已经看到这一区分是不贴切的）。他们不是旧的大贵族后裔，而是从两个集团中衍生出来的，即 *dворяне*（一种宫廷贵族）和所谓的“大贵族的子弟”，这些人在早年是次要的和边远的贵族。这些残存下来的贵族多半是“沙皇的非王族亲属。”⁸⁵这样，特别是在“困难时期”之后，当米哈依尔能够将伊凡四世的政策贯彻到其逻辑的结局时，一个新的权贵阶级便出现了。⁸⁶最后这个新的权贵阶级接掌了旧贵族的所有正式的附属产业。任官等级制于1682年被废除。领地通过出卖和继承而变成事实上可以转让的，这样就使与世袭领地的区别失去作用。⁸⁷1649年法典显著地减少了这两种地产的区别。⁸⁸1731年这两种形式从法律上合并了。⁸⁹

当然，这种“新人”的兴起到处都有——正像我们已看到的，在西欧是肯定无疑的，在东欧也很常见。但是布卢姆抓住了要点：

俄国的经验……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与其他东欧国家有所不同（但却与西欧类似）。在其他东部国家小贵族的崛起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君主力量的衰落。在俄国缙绅的上升是由于沙皇力量的增强。它是新专制主义的风筝的尾带。⁹⁰

最后，东欧和俄国的对比差异在城市地区很明显。在东欧，城

市、本国城市资产阶级和本地工业都衰落得更厉害。这肯定是比较而言。俄国与西欧对比可能会被认为,如果不是绝对地也是相对地衰落了。在东欧这种衰落也不是全部的。然而证据似乎显示了在东欧与俄国之间有一个质量的差距。

区别在“第一个”16世纪可能小些。⁹¹但是由于土地所有者越来越多地从事直接贸易,他们在东欧公开推行“反城市”的活动。⁹²随着波兰的“小国之君”和易北河东部地区的地主家族的上升,王公作为地主没有任何急迫的需要使自己同情城镇居民。⁹³当城市衰落时,贵族仍在发展强大。⁹⁴在俄国,克柳切夫斯基会提起“在16世纪和17世纪俄国城镇和城镇工业的特别缓慢的、痛苦的发展”,⁹⁵但是至少它是在发展而不是下降。布卢姆持更积极的观点。他说:

城市作为工业与商业中心和俄国与外国土地上生产的农产品和其他物品的市场再度出现,显示了[在16世纪]经济生活中交换的新的的重要性。老的城镇复兴了,新的建立了,一些农村居民(如诺夫哥罗德土地登记所表明)开始放弃农业转向贸易和工业。⁹⁶

本国商业资产阶级的力量随着城镇的力量的发展而发展。当地的贵族不仅从当地商人手中夺过出口贸易,“把他们降为代理人”,⁹⁷而且与外国资产阶级分享进口贸易。⁹⁸一国的本国资产阶级是另一国的外国资产阶级。德意志商人在易北河东部地区的经济中找不到立脚之地,而在波兰则受到加倍欢迎,并在政治上受到适当的感谢。⁹⁹的确,人们也许会推测德意志资产阶级日后复原的力量会不会是由于他们在诸如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之类的地方生存了下来的缘故。相反,在俄国,尽管本国商人遇到大地主,包括修道院,特别重要的是沙皇本人的竞争,他们仍然生存下来了。¹⁰⁰一个起了帮助作用的因素称为客商(gosti)的大商人们被允许扮演沙皇的商业和财政的代理人 and 为自己已经商的商人的双重角色。¹⁰¹他们

终于能够摆脱与沙皇的联系,甚至成为后者的竞争者。最后,“私人企业实际上在俄国向太平洋的扩张中起了大作用,虽然他们很少得到国家的支持,反而是与之竞争。”¹⁰²

对于手工业来说,似乎到处都开始衰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关税壁垒,从而使得西欧工业甚多的廉价产品能够比本地产品更畅销。¹⁰³就本地保存下来的工业而言,比如像捷克的花边,它是作为农村茅舍手工业而为本地区以外的商行生产的。¹⁰⁴即使如此,它仍然是很重要的,如它鼓励了农业的多样化,并为以后波希米亚的工业发展作了准备。¹⁰⁵然而在俄国,由于这是它自己的世界经济体,一些积累起的资本投入了工业发展中。¹⁰⁶甚至拿欧洲的世界经济体中最重要的出口工业——纺织业来说,人们原以为俄国工业会在这种竞争之前就垮掉,然而本地工业还是保留了大宗商品市场的绝大部分,甚至优质商品市场的一部分。¹⁰⁷

我们能够以类似的分析说明为什么奥斯曼帝国不是欧洲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¹⁰⁸然而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葡萄牙在印度洋的贸易及其何以与西班牙的大西洋贸易不同可能更切题一些。

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消除土耳其人在葡萄牙人的印度洋贸易兴起中所起的作用的神话。现在有两点是被普遍接受的:葡萄牙海外探险先于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东部地中海的香料贸易的衰落先于葡萄牙人进入这一地区。而远非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导致东部地中海通向欧洲通道的阻塞,因此推动葡萄牙寻找通向亚洲的绕好望角之路。其实,A.H.利布耶尔准确地把地中海东部诸国的“衰落”归因于贸易的结构性的转换,和因此使其不包括在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的扩张之中,而不是由于文化上对现代技术的抵制。

[土耳其人]并不是蓄意阻塞通道行动的积极因素。如果从整体上讲,他们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出于他们的声名狼藉的消极和保守主义而增加向东方交通的困难。他们也没有把开辟新的路线看得很迫切。相反地,他们由于新的优越的路

线的发现而受到损失。如果没有绕非洲的路线，地中海东部国家自 1500 年以后的经历将会完全不同。首先，马木路克苏丹们将会从他们未受阻断的贸易中找到足够的财政支援来使他们成功地抵抗 1516 年土耳其人的进攻。但是如果土耳其人征服了埃及，而这时滔滔不绝的东方贸易仍要流经此地，他们必定要么比实际早得多地被剥夺对这些路线的控制，要么使自己适应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通过其属地所进行的贸易。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会被迫采用现代方法，并在他们极强的统一领土的能力之上再加上组织他们的贸易的类似的方案。……贸易路线的改变不是土耳其人造成的，而是不依他们的意志为转移，并对他们不利的。¹⁰⁹

我们在前面的一章里已经设法解释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内部力量的复杂情况导致了 15 世纪的探险和 16 世纪的海外贸易和殖民帝国。人们会对伊比利亚对外扩张的经济诱因为什么着重指向大西洋地区(西半球——尽管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有西非)而不是指向亚洲表示惊讶，尽管探险的意识着重在于寻找通向印度群岛的航路。比如，当维托利诺·马加尔哈依斯-高蒂诺列出一长串决定葡萄牙早期对外扩张的因素(从缺乏黄金到粮食不足，到为生产糖需要土地与奴隶，再到捕鱼区的需要)时，他没有提到胡椒或者香料或者药品，没有提到丝绸或者瓷器或者宝石。简而言之，没有提到葡萄牙在 16 世纪实际上要从亚洲进口的所有东西。¹¹⁰但是在 15 世纪的最后 25 年，葡萄牙人对香料贸易的兴趣浓厚了。¹¹¹寻找普雷斯特·约翰^[1]在约翰二世国王的头脑中变得与这一兴趣相联，“因为[普雷斯特·约翰的]王国可以成为他通向印度的中途站。葡萄牙船长们将从印度带回此前在威尼斯分配的财富。”¹¹²西非的黄金加上亚洲的胡椒和香料，实际上到 1506 年已构成葡萄牙国家收

[1] 即神父约翰，传说中 12 世纪的一位基督教君主，曾在亚洲(另一说是在非洲)某地建立一强大帝国。——译者

人的一半以上。此后,随着亚洲贸易的比重不断增长,它就组成了“帝国经济的基础。”¹¹³

瓦斯科·达·伽马到达的、见到的和征服的土地远比朱利叶斯·凯撒多得多且迅速得多。在很短的几年里,葡萄牙人的船只完全控制了印度洋的巨大贸易。这的确很不寻常。这一冒险性事业的结构如何呢?它又是怎样如此快地建立起来的呢?

对于后一个问题的回答较为容易:在以前的两个世纪中,在大西洋欧洲发展起来的装备有火炮的舰船技术的优势。在1501年取得一项关键性的技术革新——在实际的船体上而不是在船的上层开出一些炮眼。¹¹⁴这一技术优势足以解释葡萄牙人的优势吗?我们是否还必须在此之外加上如乔治·B·桑瑟姆坚信的葡萄牙人“怀着比亚细亚人的反抗决心更强的必胜精神到亚洲去”?¹¹⁵可能是这样的,虽然我倾向于认为文化特质,如集体心理精神,是非常特殊的社会结构上的结合的产物,并且不会比其基础存在的时间长多少。

不管怎样,大约从1509年起,当葡萄牙人在第乌战胜了埃及舰队时,葡萄牙海军就在印度洋具有“无可争议的霸权。”¹¹⁶此外,在16世纪(但是对马六甲海峡来说,则直到1570年)葡萄牙商人们不仅在这里出现,他们还出现在中国海、非洲的东西海岸、南大西洋、纽芬兰,当然也在欧洲。“这样,一种葡萄牙经济到处可见。”¹¹⁷

葡萄牙在亚洲的控制体系基本上是很简单的:一支由两支分舰队组成的舰队(一支封锁红海,另一支在印度西岸巡弋),一个驻在果阿的总督和在边缘的七个要塞。¹¹⁸出于商业目的,他们保持一系列贸易站(feitoria),并建立了三个大的中间市场:马六甲、加利卡特和霍尔木兹,和一个在亚丁的辅助站。¹¹⁹它们之中最重要的是马六甲,它成为一个巨大的仓库和货物集散地。它必须设在那里,因为季风迫使从东面来的航船在那里卸货。¹²⁰这一结构是当时葡萄牙的领袖人物阿方索·阿尔布克尔克使之逐渐形成的,用来解决这项冒险性事业面临的军事上的两难处境。¹²¹

大体上说,贸易是掌握在国家手中。¹²²当葡萄牙的作用在16世

纪后期开始衰落时，私人部分从减少的贸易中全部撤出，因为风险增加了。¹²³

在很少的几个小地区，葡萄牙人行使了直接的主权。有几个地区，比如科钦和锡兰，当地的统治者受到葡萄牙人的“保护”。但是在大多数地方，“葡萄牙人没有提出在政治上统治的要求，而是遵照在他们所到的国家的法律、风俗和习惯周游各处并进行贸易”。¹²⁴正如唐纳德·F·拉什所指出的，欧洲人那时“感兴趣的¹²⁵国家主要是那些有效的统一和中央权威能够有助于提供进行贸易的稳定环境和传播福音的有利的气氛。”¹²⁵

要弄懂为什么我们不把印度洋贸易地区看作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尽管它完全受到一个欧洲强国的统治，我们必须逐次地看这一统治对于受到影响的亚洲国家意味着什么，它对欧洲意味着什么，并看它与在伊比利亚人统治下的美洲地区比较又如何。

似乎毫无疑问，葡萄牙人先在印度洋，后在中国海所建立短暂的优势的主要因素是“海运贸易中的真空”，如特雷弗-罗珀所称，这时这种真空存在于两个地区：“亚洲的巨大贸易对捷足者是敞开的，而与欧洲的长途贸易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葡萄牙人来了，并得到了它；只要这个真空还存在——即直至欧洲赶上他们或者亚洲反抗他们之前——他们就独家垄断。¹²⁶这一真空不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因为这对理解葡萄牙人没有创造这一贸易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接过了当时已经存在的穆斯林商人（阿拉伯人和古吉拉特人）在印度洋和倭寇海盗在中国海的贸易网络。¹²⁷在时间上先发生的对穆斯林商人的驱逐是靠野蛮的力量而不是靠和平的竞争。”¹²⁸这基本是由于政治—海军的优势而造成的。¹²⁹

从亚洲到里斯本的最大宗进口货是胡椒或者胡椒和香料。还在15世纪末，当葡萄牙还没有出现在这里时，欧洲可能就消费着亚洲产量的1/4；¹³⁰为了满足欧洲增加的需求，亚洲的生产在这一世纪中增加了一倍。¹³¹反过来，亚洲从欧洲得到的基本是银块和金

块。¹³² 银块大部分来自美洲和日本。¹³³ 金块似乎大部分先来自西非，¹³⁴后又来自东南非、苏门答腊和中国。¹³⁵

既然欧洲热衷贮存贵金属块，这种形式上的支付不平衡会持续这么长久确实令人惊奇。但是如果欧洲想要亚洲的供货，似乎这是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显示一个基本观念，在这个意义上，亚洲这时还不是欧洲世界经济体的组成部分，因为从1500年到1800年欧洲与亚洲国家的关系通常是在亚洲诸国制定的框架中和条件下进行的。除了那些生活在少数殖民据点的欧洲人以外，欧洲人在那里都处于勉强忍受的情况下。¹³⁶ 这一点并不管欧洲的军事有什么优势，因为我们必须记住，这一军事优势只是海军优势。¹³⁷

从亚洲的角度看，葡萄牙从事贸易的人在一个基本的方面不同于那些历史上先于他们的商人。买方“不是商人——私人企业家——而是可怕的海军力量，他们以外国国家的名义，为其商人和自己而进行活动。”¹³⁸这意味着贸易关系——说到底价格是——是由国际法承认的协议确定的。然而国家必须与国家打交道。葡萄牙人花费了一些时间使自己习惯于他们所遇到的高度国家威严。¹³⁹最初葡萄牙人喜欢靠占领掠夺以获巨利，但是短短的十年以后，他们认识到这是一个非常短见的政策。¹⁴⁰他们转而变为亚洲内部贸易的仲裁者和中介。他们用所得利润来为绕好望角的贸易提供资金，把香料和贵金属块带回葡萄牙。如戈丁浩所说，这是一个“壮丽的梦，”一个“超越了其可能性的冒险性事业。”¹⁴¹他们为取得香料牺牲了贵金属块(和其他)，但是他们确实取得了一个“集中的亚洲内部贸易，”这“在亚洲是新鲜事。”¹⁴²把这些用欧洲世界经济体术语来说，就是葡萄牙人的中间商角色意味着“许多欧洲的进口得之于航运和商业服务等无形出口。”¹⁴³仅仅过了75年，在1578年，第一艘直达快船从里斯本驶往马六甲。¹⁴⁴这一事实表明了亚洲内部贸易在葡萄牙卷入亚洲经济中的重要程度。

对于亚洲而言，葡萄牙贸易者意味着两件事：亚洲商人不得不与一个作为商人代表的国家打交道；亚洲内部贸易被合理化。然而

J.C. 范·莱乌尔认为这些加起来也不足以断言表明社会发生变化：

葡萄牙人的殖民统治……没有把一点点新的经济因素引入到南亚商业中去。……葡萄牙人的统治只是在现存的航运和贸易结构上采用非集约搜刮。下个阶段[荷兰的时代]将组织一个新的对外贸易和对外航运的体系，它将产生有力的殖民关系，它将在欧洲创造新的经济形式——可能不是作为直接的结果，而是作为这个体系所支持的平等发展。……

亚洲贸易的国际特点保持下来，同时东方国家的政治独立实际上仍然没有受到欧洲的影响的侵犯。巨大的亚洲内部贸易路线保持着它的充分的重要性。¹⁴⁵

文献趋于支持范·莱乌尔的估计。¹⁴⁶葡萄牙人到达该地，并发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世界经济体。他们把它组织得稍好些，然后把一些商品带回国，作为他们工作的报酬。社会的经济组织以及政治上层建筑大部分没有被触动。在胡椒的生产中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唯一“导致大生产”的香料。¹⁴⁷但是胡椒在生产技术上非常简单，以至于它几乎不需要增加劳动而通过粗放生产的方法来扩大生产，因为胡椒具有一个重要的优点：“一旦种上，就不需要照管。”¹⁴⁸因此葡萄牙统治的世纪对于亚洲的大部分地区来说意味着主要是葡萄牙人而不是阿拉伯人获得了利润。印度历史学家 K.M. 潘尼迦总结这一观点说：

对于印度统治者来说，他们的商人把他们的货物卖给葡萄牙人或者阿拉伯人是一样的。事实上葡萄牙人在这里具有一个有利条件，他们能够把印度统治者所需要的武器和装备卖给他们。就印度商人而言，他们很快就订出一个许可证制度。这使他们得以在没有阿拉伯商人竞争的条件下进行贸易。在这个意义上，葡萄牙人的垄断可以说是帮助他们了。¹⁴⁹

这是为什么尽管有“葡萄牙国王的事业……把保护的垄断、运输的垄断和被运输的货物的垄断总合起来这一事实，”¹⁵⁰查尔斯·博克瑟还是能够把葡萄牙人海上的统治地位称为“天生的脆弱的上层建筑”。¹⁵¹亚洲，甚或印度洋的边缘地区，在16世纪没有成为欧洲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亚洲是欧洲与之进行贸易的外部领域，当然是在某种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贸易。这就是说，强制的垄断因素侵入了市场经营中。用肖尼的话来说，葡萄牙使用了“制海权征服。”¹⁵²但是亚洲的内部生活基本上没有由于这种接触而改变。要论证亚洲初级生产是这时的欧洲劳动分工的组成部分确实很困难。

如果我们观察葡萄牙人的亚洲贸易对欧洲的影响，还能发现更进一步的证据。欧洲没有在16世纪占领亚洲，因为它办不到。其军事优势只是在海上。¹⁵³在陆上它仍然在奥斯曼帝国的进攻面前退却。¹⁵⁴这一军事力量对比只是到工业革命时才改变。¹⁵⁵

亚洲在这段时间供给欧洲的是奢侈品。这时奢侈品是重要的和不应鄙视的。但是它们与食品(谷物、牛、鱼和糖)和生产它们所需要的人力相比是第二位的。它们和金块，不是贮藏的金块，而是作为货币的金块相比也是第二位的。(尽管金块可以用作货币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不可思议的原因，存在于它可能被用作商品之中，如果需要的话。)与食品甚至金块相比，一个世界经济体能够相对容易地根据奢侈品供应的转变而进行调整。

可能会有人认为，胡椒不能算是奢侈品，甚至香料也不是，因为它们是用来保存食物的必需品，就像药品。¹⁵⁶这又是一个程度问题。保存的食品基本上是肉，不能算是奢侈品，但是也不是供给那些只得到维持活命最低必需食品的人的。药品也是一样。¹⁵⁷当然。如肖尼所说，随着欧洲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胡椒变得不那么算奢侈品了。我认为，问题是不算奢侈品的程度。

[胡椒]何时在西方第一次出现呢？传统说法可以找出几个关键时刻。第一个是在十字军时代，12世纪和13世纪的地

中海地区东西方的接触,说实话,有两个因素必须考虑到。胡椒消费的兴起当然必须与 14 世纪和 15 世纪肉的消费量增加紧密相联。这是一个很清楚的现象。然而在我看来,对遥远和昂贵的产品的消费方式的持续更长的发展似乎与 12 世纪和 13 世纪开始的力量形势的改变分不开。在 13[世纪]的条件下取得的香料等于是奢侈品。要得到它们需要发展力量,这种力量将允许西方基督教社会缓慢发展其潜力 [le lent décollément de ses moyens]。这一力量使西方能够得到一个接一个的各种刺激味觉和神经系统的东西。这些东西拉丁基督教社会不如东方诸文明更善于生产。¹⁵⁸

总之,到了胡椒不是奢侈品,而是半必需品的程度,恰恰是西非的几内亚胡椒,而不是亚洲的产品,如果不是在价格上,就是在数量上起了最重要的作用。¹⁵⁹

当然,亚洲贸易对葡萄牙毫无疑问是有利可图的。这终究是要点所在。戈丁浩用了 25 页的篇幅来评价这一点。有一个例子,也许是引人注意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一点。阿尔布克尔克在 1512 年估计,运回来的商品用葡萄牙货币计值相当于被运出去的货物 8 倍的价值。¹⁶⁰因此很容易了解为什么胡椒是“[16 世纪和 17 世纪]最引人注目的投机商品,吸引着当时最大的商人和资本家的注意力。”¹⁶¹胡椒的多种用途和耐放性,以及其有利的赚头,“使它成为极佳的投机对象”。¹⁶²

这一投机不仅仅是作为个别企业家的资本家的投机。在弗雷德里克·莱恩的简洁陈述中,它显然是葡萄牙国家的投机,寻求“用军事力量增加国民财富。”¹⁶³我们要研究这一政策的代价所掩盖的东西。然而,在这里插入莱恩对于这一集体“投机”的评价较为恰当:

以 50 年或者 100 年的长期观点来看,如采取一种更为平

和的政策,促进东方贸易有更大的发展,也许会使国家更富。虽然对印度的占领在一段时期内使葡萄牙国民收入增加,但是随后便使国民劳动生产率下降。因此,它不成为一个成功地使用武装力量以促进国家繁荣的鲜明的例子。¹⁶⁴

但是葡萄牙人能否推行一个“更为和平的政策”呢?这是值得怀疑的。这部分地像莱恩自己所指出的,是由于在1500年存在于葡萄牙的资本和劳动的性质。¹⁶⁵

然而,关于赢利性的讨论还是清楚地表明在外部领域通过贸易获利的局限性。毕竟利润就是掠夺所得,经过一段时间掠夺就自我毁灭。而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体框架中的剥削却在自我加强。

如果我们现在设法系统地比较伊比利亚在亚洲和在美洲的情况,事情可能会更清楚。关于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间的关系要先说一点。教皇训谕(*Inter Coetera*)的1493年6月第二版画了一条有名的线,凭想象把非欧洲世界的不同部分划归葡萄牙和西班牙负责宣讲福音,以使它们信奉基督教。¹⁶⁶就大西洋地区而言,这等于意味着葡萄牙对巴西和大西洋非加勒比海岛屿的主权和西班牙对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的主权都被承认了。推而论之,亚洲“拨给”了葡萄牙。然而麦哲伦说服了查理五世重新解释这个地图。在16世纪估计经度是困难的。他代表西班牙国王于1520年声称菲律宾是属于西班牙的,¹⁶⁷而实际上,直到1564年菲律宾才被占领。的确只是在葡萄牙由于威尼斯的地位恢复而在作为胡椒供应的来源方面不稳定时,西班牙派遣了它的远征船队到菲律宾,之后到中国去寻找胡椒。¹⁶⁸

这样我们便看到在美洲主要是西班牙扮演主要角色,葡萄牙人只占了一角。而在亚洲主要是葡萄牙扮演主要角色,西班牙只占了一角。在这两个地区伊比利亚的政策惊人地大致相似,因为在16世纪,伊比利亚在美洲建立了殖民地,而在亚洲则建立了贸易站。¹⁶⁹

关于西班牙在美洲的政策和葡萄牙在亚洲的政策我们已经写过了。值得注意的是两国各自都寻求把其占统治地位的经验推广到其他地区,但是又都认识到其错误,并使自己适应于这一地区的要求。葡萄牙人在巴西涉及的事务限于在货物集散地的布局上,但是被迫于1530年作为先发制人的措施将其殖民地化。¹⁷⁰同样地西班牙在菲律宾寻求利用封地制度,但是国际商业不足以维持开支,他们又转向葡萄牙模式。“马尼拉贸易因此以从新西班牙来的白银与中国货物的直接交换而固定下来。”¹⁷¹

正如我们已经暗示的,这两种不同政策的原因似乎是一个事情的两方面。一方面,拓殖美洲的收益在某种意义上说较大。另一方面,在亚洲殖民的困难更大。这两者的结合说明美洲在16世纪就成为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边缘,而亚洲还是外部领域。

就收益而言,我们并不是指短期利润,尽管甚至在这方面美洲的收益似乎也比亚洲的高约50%,¹⁷²而是指关于机会成本的长期利润。亚洲贸易是进口贸易,特别是经过地中海东部诸国的那部分。¹⁷³的确,西班牙最终放弃马尼拉大帆船的原因之一恰恰是它意味着贵金属外流而在国内遭到反对。¹⁷⁴正如我们所指出的,这肯定不会没有例外。比如,印度柚木森林作为在果阿的造船厂建造船只的木材的供应者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被并入了欧洲世界经济体。¹⁷⁵

但是比起从新大陆收获的贵金属、木材、皮革和糖,这是次要的。在这个世纪中,这里从采集的技术演变到由欧洲监督管理的使用廉价劳动的生产的稳定方式,¹⁷⁶从而改变了有关地区的社会结构,使其并入欧洲世界经济体。¹⁷⁷

只是当欧洲没有办法,不能在其自己的世界经济体构架中找到一种产品时,它才到外部领域以更高的成本去得到它。以丝绸为例,伍德罗·博拉描述了16世纪末墨西哥生丝生产衰落的原因。¹⁷⁸正是在那时,如肖尼所说,我们看到“西班牙大帆船贸易达到最高峰。中国的丝绸突然地和短暂地大量出现在西印度群岛的市场上。”¹⁷⁹当然,当西班牙没有更多的美洲白银来供给中国人时,他们就不能买

到丝绸,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于 1640 年左右衰落。¹⁸⁰

一般而言,世界经济体的地理范围是一个均衡问题。中心力量的动力导致一种扩张压力(如前述欧洲在 15 世纪发生的情况)。这个体系向外扩展直至它达到损失大于所得。因素之一无疑是距离,即技术水平所起的作用。以前我们提到了 60 天行程的世界的概念。有许多方法可以估算时间。比较一下肖尼关于从伊比利亚到美洲的时间的描述和从伊比利亚到亚洲的时间的描述。对于前者他说:“出去的路程要用 1 个月,回来 6 个星期,包括装船、卸船的往返行程要一年一个循环,其中包括两个冬休期之间的任何事情。”¹⁸¹对于后者他说:

就最长距离而言——就说 1565 年的塞维利亚至马尼拉轴心——经过 15 世纪和 16 世纪长期改造后的世界是一个五年世界。这就是说五年是从西班牙到菲律宾往返行程所需的平均时间。¹⁸²

很明显,差异很大。

然而距离的阻力还要加上该地已确立的政权的反抗。美洲较易占领。甚至结构很完整的国家,如阿兹台克人和印加人都不能与欧洲的军队较量。亚洲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不论是葡萄牙人还是他们 17 世纪的后继者都不能召集足够的军力以占领可观的土地。由于这一点,他们不能建立起一个体系,像在美洲或者东欧那样,一点儿武力就可以把大量剩余据为己有。相反,这要求强大力量(葡萄牙人与他们的海上竞争者对立)才能取得较少量的剩余(因为当地统治者可以坚持得到大得多的份额)。观察这一问题的一个方法是计算选择其他力量的赢利性。弗雷德里克·莱恩把它归纳如下:

我斗胆提出一个假设:[殖民]冒险事业使用武力掠夺,

并防止贸易竞争者的出现 [比如在亚洲的葡萄牙人], 他们一般遭受所得递减的损失, 但是许多冒险性事业使用武力是为设立保护 [以免其资本被消灭或掠夺和其劳动力解体], 包括那些使用强制劳动的企业。[如在巴西的葡萄牙人], 他们享受着所得递增的好处。¹⁸³

在边缘和外部地区经营要有不同的手段。只是在边缘地区经济上较强大的集团才能也用文化上的优势来加强其地位。对这一点葡萄牙人远比西班牙人理解得更好。后者比葡萄牙人把基督教传教事业视为更优先考虑的事。葡萄牙人对于在 16 世纪亚洲的基督教—穆斯林的大遭遇战中他们力量的局限性更为敏感。肖尼指出了西班牙人投入很大力量以停止穆斯林对菲律宾的渗透。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但是他们付出了经济代价。“这种根基很深的对伊斯兰的敌意, 这种不能与马六甲的穆斯林王公交往的状况, 难道不是远比葡萄牙人的敌意这个理由能更真实地解释吗? 为什么西班牙人不能在菲律宾的香料贸易中取得成功呢?”¹⁸⁴把这一点与葡萄牙人在刚果的决策进行比较就会发现, 他们起初使用传教、开拓殖民地, 甚至经营商品性农作物等手段, 而以后认识到代价太高, 就退到一种货物集散地的关系, 在这里他们基本上是寻求奴隶与象牙。¹⁸⁵

在亚洲, 随着“延长的”16 世纪的继续, 葡萄牙人对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的控制遭到越来越多的挑战——这些挑战来自阿拉伯及威尼斯(旧的地中海东部的路线), 来自西北欧升起的新星(英格兰和荷兰), 来自复兴的亚洲本地力量。

在前面一章中我们已经谈到东部地中海国家在“第二个”16 世纪中的复兴。这样, 我们在这里就简单地回顾一下这个问题。切断地中海东部的商路要求代价很高的封锁。问题的核心是“葡萄牙没有富到足以保持这一巨大的交通网络及其要塞、昂贵的分舰队和人员的程度。”¹⁸⁶到 16 世纪 30 年代, 土耳其人再次能够在波斯

湾靠岸。从那时起,葡萄牙人的贸易份额下降。¹⁸⁷到1560年,亚历山大港向欧洲出口香料与15世纪末一样多,¹⁸⁸尽管按比例来说较小。而且葡萄牙人不愿或者不能降低其价格以对付威尼斯人的竞争。¹⁸⁹当然我们只是指胡椒贸易,因为药品贸易从来也没有被葡萄牙人垄断。¹⁹⁰实际上,葡萄牙人的衰落是由以下事实判断出来的:1580年以后,他们终于寻求在威尼斯贸易中分得一份。¹⁹¹因此,葡萄牙的衰落是非常真实的。戈丁浩警告我们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把威尼斯上升时期看成一幅瑰丽图画。¹⁹²这一点我们已经详细讨论过了。因为威尼斯不能捡起葡萄牙丢下的一切。

一个更为有力量的竞争对手是西北欧。我们不应该忘记当西班牙和法国国王双双于1557年宣布破产后,葡萄牙国王于1560年步其后尘。我们将不回顾荷兰和英格兰的崛起的原因。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香料贸易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即实际上存在两个香料贸易。它们被称作“亚洲合同”与“欧洲合同”。这就是说,存在从亚洲运香料到里斯本(或者威尼斯,或者以后的阿姆斯特丹)所获利润以及把同一批香料再卖给欧洲最终消费者所获得的利润。这些消费者主要在北欧。¹⁹³

葡萄牙在欧洲没有胡椒销售网,特别是当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的安特卫普衰落以后。关于1585年的葡萄牙肖尼说道:

由于与北面的联系被切断,从1580年开始一直统治里斯本的西班牙国王并没有成功地提供欧洲合同。意大利还不够强大。在西班牙无人对此梦寐以求。他必须以德意志资本主义,魏塞尔家族的和福格尔家族的全部力量来代替安特卫普。

怎样才能把它说得更清楚些呢?欧洲合同最终还是比亚洲合同更为重要。¹⁹⁴但是魏塞尔家族和福格尔家族,又没有强大到足以与英国和荷兰抗衡。¹⁹⁵荷兰的崛起事实上是对威尼斯的最后一击,因为阿姆斯特丹“比[里斯本]更有实力。它割断了旧地中海商业的

咽喉。¹⁹⁶

荷兰人(和英国人)不仅在欧洲占到好处。他们的海军在印度洋的优越地位带来额外的金融好处。他们不仅能从贸易中获利,而且还能从掠夺葡萄牙的船只获利。¹⁹⁷尽管如此,荷兰人(和英国人)还没有对亚洲舞台采取新的举措。他们继续扮演葡萄牙人中间商的角色。¹⁹⁸

这才使我们了解在亚洲发生了什么。随着葡萄牙人的垮台,亚洲的统治者恢复了一些对贸易的控制。比如在马六甲海峡,从1570年起,爪哇人掌握香料贸易,至少到1596年荷兰人入侵为止。¹⁹⁹在一段时期内葡萄牙人通过对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进行新的垄断而补偿了这点。²⁰⁰但是当日本人克服其内部混乱后,他们便不再需要葡萄牙人。由于对倭寇(Wako)海盗的气愤,明朝皇帝原来是禁止日本人进行贸易的。一俟倭寇受到控制,直接贸易就再一次成为可能。另外,此时荷兰人和英国人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对西班牙(和葡萄牙)毫不客气。日本人与耶稣会会士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好。这时日本有可能从世界中退出,特别是因为本国的制造商们正在减少对中国丝的需求。²⁰¹

正如C.R. 博克瑟断言的,可能日本的退出是由基督教会过于咄咄逼人地传播基督教所引起的。²⁰²必须认真地对待博克瑟的假设,他的广博的知识和对历史的判断值得尊重。但是他几乎没有拿出任何具体的实际论据来支持其判断。鉴于他们不断增加的内部力量和他们与任何世界经济体的微弱联系,他们也许从来没有退出过。

葡萄牙住在当地的居民吸取了货物集散中心繁荣衰退的教训。他们开始切断与祖国的联系,并适应在亚洲的生存。他们在经济方面大体上成为具有欧洲血统的亚洲人,尽管在政治方面较差,而在文化方面毫无疑问根本不变。J.B. 哈里森描述了16世纪葡属印度邦不断增长的军事的与政治的自治权,这一过程是与葡萄牙人亚洲内部贸易不断增加的重要性并行的。²⁰³随着国内的和印度

的葡萄牙人之间利益的不断冲突，

葡萄牙人给自己包上东方世界的外壳，把自己作为已婚的人(*cesados*) [按字面意义讲是那些供养一个家庭的人]到处安置，使自己适应于当地或者地区的利益，投身于当地或者地区间的经营。²⁰⁴

当 1580 年葡萄牙并入西班牙时，这就更进一步地加快了这一过程。当地的葡萄牙人不希望卡斯蒂利亚人介入他们的市场，而西班牙国王还没有力量去强迫他们。²⁰⁵但是这就意味着一个世纪的伊比利亚人的卷入把亚洲推得更远，而不是使它挤进边缘地区的行列。直到约一个世纪以后，欧洲才强大到可以开始把这些地区并入的程度。

注释

1 关于这一贸易的概述，见 H. 凯伦本茨，“Landverkehr, Fluss- und Seeschifffahrt im Europäischen Handel,” *Les grandes voies maritimes dans le monde, XVe - XIXe Siecles, V II Colloque,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Maritime* (Paris: S. E. V. P. E. N, 1965), pp. 132~137。

2 塞尔索·富尔塔多,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3 “如果历史学家们谈到 16~18 世纪西方的重新封建制度化，……类似现象也发生在土耳其。……布希-赞特纳(Busch-Zentner)在他的开创性著作中说，在他看来，这些庄园是作为产粮区农业改进过程的一部分而产生的。厄梅尔·卢特菲·巴坎(Omer Lutfi Barkan)和他的学生已经发现，这种现代财产的增长有利于那些卷入了粮食‘繁荣’的苏丹和帕夏们。……他们为自己保留了对西方买主的小麦销售，而禁止‘人民’这样做。我们能够推测上述转变的程度。在价格革命和农业革命(这类革命是作为一种结果而出现的)的年代里，土耳其和西欧一样经历着迅速的人口增长。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布罗代尔, *La Mediterranee I*, p. 537。

4 J. H. 埃里奥特指出了我们立场的本质。他认识到“存在于欧洲边缘地

区[即东欧]的几个特点在俄国的土地上重演。”这句话指的是,此时两地都发展起使用强制劳力为市场生产经济作物的大庄园。不过,埃里奥特指出,“莫斯科人的农奴制社会还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世界,由于其军事力量的不断增长而威胁其邻国,但在经济上仍与欧洲世界不相关联。另一方面,波兰、西里西亚、勃兰登堡和普鲁士则被无情地卷入了西欧生活的轨道。” *Europe Divided*, p. 47。另见乔治·韦尔纳茨基:“从地缘政治上讲,俄国的背景不是欧洲,而是欧亚大陆。中世纪的俄国与其说是属于东欧,不如说是属于欧亚大陆的西部。” “Feudalism in Russia” *Speculum*, XIV, p. 306。

5 V.O. 克柳切夫斯基 (V.O. Kluchevsky), *A History of Russia*, I, (London: Dent, 1911), p. 2。

6 杰罗姆·布卢姆 (Jerome Blum), *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 Press, 1961), p. 120。他补充说:“其最显著迹象是统治的地域和人口的增长。俄国像西欧的大西洋沿岸国家一样从 16 世纪开始实施野心勃勃的殖民扩张计划。蒙古人势力的衰落和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俄国的出现,提供了在莫斯科公国周边广袤无边的欧亚大陆上近乎无限地攫取领土的机会。”

7 “占领喀山是一个巨大的军事胜利和伟大的政治成就。从宗教观点看,这被理解为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胜利。” 乔治·韦尔纳茨基 *The Tsardom of Muscovy, 1547-1682*, Vol. V of *A History of Russia*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 Press, 1969), Part 1, p. 58。

“喀山的陷落突然消除了斯拉夫人向东扩展的障碍。” 罗杰·波特尔 (Roger Portal), *Les Slaves*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65), p. 110。

8 韦尔纳茨基 *Tsardom*, V. 1, p. 175。

9 布卢姆 *Lord and Peasant*, p. 128。见 M.V. 费克纳 (M.V. Fechner), *Torgovlya russkogo gosudarstva so stranami voztoka v XVI Vekse M.* 莫拉特等人引证他说的俄国与东方靠河流和商队进行的贸易比与西方的贸易 (“总是被过高估价”)要“重要得多。”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III*, p. 780。莫拉特等人因“缺乏数字”而在有关的卷册中对这一主张犹豫不决。

10 A.G. 曼科夫 (A.G. Manlov), *Le mouvement des prix dans l'état russe au XVIe Siècle* (Paris: S. E. V. P. E. N, 1957), p. 28。

11 布罗代尔和斯普纳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 398。

12 斯坦尼斯拉夫·豪斯佐沃斯基, “L'Europe centrale dans la révolution des

pri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Annales E. S. C.*, XVI, 3, mai - juin 1961, p. 466。

13 “在 1565 年著名的议会法令中，贵族的经济政策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该法令禁止波兰商人出口波兰产品和进口外国货物，并正式鼓励外商进入波兰。这一法令无疑不过是一纸空文。但这是当时波兰贵族，我们相信也是瑞典以外其它波罗的海诸国贵族在政治经济政策上的趋向的一个有力说明。我们可以认为，当时贵族对资产阶级贸易和工业的态度的特征是一种独特的反重商主义。”玛丽安·马洛维斯特，“Über die Frage des Handels - politik des Adels in den Ostseeländern im 15. und 16. Jahrhundert,” *Hansische Geschichtsblätter*, 75Jh, 1957, p. 39。

14 “波兰谷物的出口从此完全被禁止了。G. 阿道弗斯(G. Adolphus)完全理解这一行动对波兰贵族的重要性。‘Occupato hoc flumine [the Vistula]’, 他对贝特伦·加博尔 (Bathlen Gabor) 的特使说 ‘Præcluso etiam portu Dantiscano et omni maris Baltici aditu prohibito, ipse iam nervus rei gerenadae Poloniae incisus est’。他是对的。停止小麦出口导致国内价格下跌，这一点，波兰的主要纳税人贵族和农民都感觉到了。由于征兵要花钱，国家开支增加了，征税变得更为困难。只是由于国王及其陪臣的努力，波兰才能在整整三年中不顾财政困难打完这场需要如此努力的战争。”弗拉迪斯拉夫·查尔平斯基(Wladyslaw Czarpinski): “Le problème baltique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Stockholm, 1960. *Rapports IV: Histoire moderne* (Göteborg: Almqvist & Wiksell, 1960), p. 41。

15 杰齐·托波尔斯基 (Jerzy Topolski), “La régression économique en Pologne,” *Acta poloniae historica*, VII, 1962, p. 46。

16 见同上书, pp. 47~48。

17 波尔契涅夫“Les rapports politiques de l'Europe Occidentale et de l'Europe Orientale à l'époque des la Guerre des Trente Ans,” *X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Stockholm, 1960. *Rapports, IV: Histoire moderne* (Göteborg: Almqvist & Wiksell, 1960), p. 137。

18 见豪斯佐沃斯基 *Annales E. S. C.*, XVI, p. 446。

19 同上书, p. 453。

20 见帕斯丘 (S. Pascu), 马弗若丁 (V. V. Mavrodin). 波尔契涅夫和安特列瓦 (I. G. Antelewa), “Mouvements Paysans dans le centre et le Sud-est de L'Europe du XVe au XXe siècles,” *XII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Rapports, IV:*

Methodologie et histoire contemporaine (Wein: Verlag Ferdinand Berger & Söhne, 1965) pp. 21~35。

21 曼科夫 *Le mouvement des prix*, p. 28。

22 同上书, p. 38。又见 pp. 38~43 的讨论。

23 布卢姆 *Lord and Peasant*, p. 205。

24 同上书, p. 128。

25 见上引书, pp. 128~129。见 R.H. 希尔顿与 R.E.F. 斯密 (R.E.F. Smith): “应当附带地注意到 16 世纪与伊朗、土耳其、那海部落 (Nagai Horde) 和乌兹别克汗国进行的商品种类范围很广的地区贸易的发展特别重要。俄国有时被视为当时西方的半殖民地原料供应国, 同时它又是东方的制成品和原料供应者。”“Introduction”, 载斯密, *The Enserfment of the Russian Peasantry*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8), p. 27。

26 布卢姆, *Lord and Peasant* p. 129。

27 同上书, p. 122。

28 自 15 世纪末伊凡大帝时代起, 我们就能很容易地发现俄国与西欧间不断增长的往来……。在这一方面, 彼得大帝的统治并未引起突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即俄国在国外的——无疑还有俄国国内的——人们头脑中的印象从那时起便大不相同了。”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Oxford: Blackwell, 1957.), pp. 192~193。

29 布卢姆, *Lord and Peasant*, p. 128。

30 马洛维斯特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 p. 180。

31 T.S. 维兰 (T.S. Willan): “Trade between England and Russia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XIII, No. 247, July 1948, p. 320。

32 引自莫拉特等人: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e Scienze Storiche*, III, p. 782。

33 帕里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 167。

34 “事实上, [16 世纪的捷克封建主] 不仅使用‘劳役’, 而且使用雇佣劳动和强制雇佣劳动……。因而雇佣劳动是存在的。但这是一种在封建关系重压下的雇佣劳动; 在封建庄园中的雇佣劳动成为农奴的又一项义务。”约瑟夫·瓦尔加 (Josef Válka), “La Structure économique de la seigneurie tchèque au XVI^e Siècle,” *Deux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 Histoire Economique II: Middle Ages*

and Modern Times (Paris: Mouton, 1965) pp. 214~215。

“雇佣劳动与劳役结合在一起，但无论如何总是在封建统治下并受到限制。因而匈牙利农业在16世纪的趋向是庄园领地以牺牲农民所有权为代价的扩张，庄园主靠向市场提供的产品增加以及依赖雇佣劳动的形式。”
Zs. S. Pach, *Annales E. S. C.* XXI, p. 1229。

35 见瓦尔加, “*Deux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II, pp. 212~213。

36 约瑟夫·彼德兰, *Deux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Economique*, II, p. 222。

37 马洛维斯特,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 p. 180。

38 同上书, p. 188。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加。

39 如见马洛维斯特: “外国制造业非凡的重要性并未像在波罗的海诸国那样阻止俄国工业的发展, 这是因为俄国幅员广大。不过, 开始时俄国工业没有什么发展。”*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 p. 189。

40 雷诺兹, *Europe Emerges*, pp. 450, 453。

41 见马洛维斯特, *Past & Present*, No. 13, pp. 35~36。

42 马洛维斯特,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 p. 189。

43 熊彼特非常准确地抓住了君主专制的内在矛盾: “国王、宫廷、军队、教会和官僚日益依赖于资本主义过程所创造的收入, 尽管纯封建来源的收入也因同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而膨胀。内外政策和制度变化越来越是为了适应和推动这一发展。只要这一过程在持续, 所谓君主专制结构中的封建因素, 就只是在返祖现象的名义下出现。实际上返祖现象是人们一目了然就可做出的判断。”

“但是如果更仔细地观察, 我们将认识到那些因素意味着更多的东西。这个结构的“钢架”仍是由封建社会的人物组成的, 而且这些人还是按照前资本主义方式行事的。他们充斥国家机关, 指挥军队, 制定政策, 一一发挥着领导阶级的职能。尽管他们要照顾资产阶级的利益, 但还是设法与资产阶级保持距离。作为中央的国王是以上帝的名义存在的, 他的地位的根基是封建的……, 不管他从资本主义提供的经济方面的机会中受益有多大。所有这些都不仅仅是共生现象了, 这是两个社会阶层能动的共生现象。无疑, 其中之一给予另一个经济支持, 反过来又从另一个得到政治支持。”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Allen & Unwin, 1943), p. 136。

44 “[波兰]在16世纪所缺的不是活跃的精神, 而是强大而富有生命力的

货币经济。如果波兰国家是如此极度地脆弱，如果国王的存在仅仅是在进行镇压而不是在行使权力，其原因就在于‘共和国’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以及不能积累起巨大的以白银为形式的财力并建立一支现代军队。”布罗代尔，*La Méditerranée*, I, p. 184。

45 “宫廷的改革(原文如此)的要求，导致权贵们试图进一步削弱政府。逐步限制王室特权是与大贵族特权不断增长同步的，尤其是东部边境地区的贵族，他们拥有自己控制的武装力量、巨大的财富并在各地依附性的乡绅中有大量附庸。这样，一个贵族就拥有了在位君主得不到的一切：丰裕的财政资源、强大的军队和政党的支持。……到17世纪初，每个贵族家系都忙于相互间的私斗，国家惨遭蹂躏，资源被耗尽。”简那森·塔齐比尔(Janusz Tazbir), *History of Poland*, p. 209。

46 同上书, p. 224。

47 同上书, p. 225。

48 “与教会，特别是修道院地产形成鲜明对比，王室的财富在近代不断缩减。亚历山大王法令(The statute of King Alexander) (1504)限制了王室的授予、出售或抵押其地产权。但是长期缺钱迫使继位的西吉斯蒙德一世(1506—1548)延续他兄长的政策，尽管其规模略小。在西欧，王室庄园是城镇的主要担保品。钱多由商人、银行家贷出，债权人以占有王室收入——关税或税收为担保。但在波兰，贵族债权人和一些钱商利用一切机会将王室财产搞到手。”安东尼·马恰克(Antoni Maczak), “The Social Distribution of landed property in Poland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ies”,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Paris: Mouton, 1968), I, pp. 456~457。

49 地主家族经历了旧式庄园佃农的逐渐消失和大量小农的产生。赫莱纳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 26。

50 吕特格,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 p. 36。J. 谢缅斯基(J. Siemenski)在谈到波兰时使用了类似语言：“简而言之，[在16世纪]大地产变成由领主和骑士统治的小国家。由他们决定对农民的征税(以劳役和行使垄断权的形式)和农民自治的范围……。”“Constitutional conditions in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 History of Poland*, I: W.F. 雷德韦等主编；*From the Origins to Sobieski (to 1696)*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50), p. 427。

51 甚至没收教会地产也无济于事，除非这一地区经济基础强大到足以提

供一个充足的税源：“正如英国那样，修道院[在易北河东部地区]的解散并没有使统治者解除对庄园主的信任票的依赖性。诸侯们对货币不断增长的需求，加上迅速上涨的价格，迫使他们把许多修道院财产出卖或抵押给贵族……这样，与一种流传甚广的观点相反，王公们的势力并没有因宗教改革增强，而是在进一步衰落。”F.L. 卡斯滕(F.L. Carsten), *Origin of Prussia*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Clarendon], 1954), p. 166。

52 用土地，特别是领地来偿付债务，在价格革命时期对债权人来说显然是最有利的。通过抵押王室庄园和把经营权移交给债权人作担保来借债是当时流行的制度，它使借债和还债基于货币经济和自然经济的结合。从地主的观点看，对“公共”信贷的需求给资本提供了以无比的高速度繁殖的机会，这种机会是通过在土地上的投机性投资来实现的。借贷者所得现金通常要比抵押财产的实际资本价值低得多。由于土地和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的趋势，这一差额趋于扩大。因而，债权人从昂贵而又灵活的经济的租金得到保障，同时由于拥有抵押品，可以通过更有效的利用或更无情的剥削使租金进一步增加。只是由于城市和市民经济的衰落，并日益受到大地主和政府要员的影响，导致持续的严重财政失调和资本市场受到限制的特性，迫使霍亨索伦王朝一次次地求助于这一方法。”罗森伯格,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Part I, XLIX, p. 22。

与土地贵族相对照，王公势力的削弱同样可以在西班牙控制下的那不勒斯王国看到。这就给了我们进一步的证据表明新兴的经济角色与政治结构间的密切联系。在那里，特别在17世纪初，地主转向粮食生产，他们保持并增加了在议会的特权，有效地缩小了西班牙总督的权限，通过把自己的人安排在高位上并对职位较低的官员行贿而保持了他们对官僚机构的控制，并在国家军事组织中保持了绝对优势。见维拉里, *La rivolta antispagnola*, pp. 3~5, 14, 17, 24~25, 28。

53 泰勒,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 p. 23。

54 见斯普纳,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V, p. 97。

55 马洛维斯特, *Annals E. S. C.* XVIII, p. 926。

56 马洛维斯特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 p. 189。

57 “因此，北欧国家的情况似应视为一个特例：那里冬季的严寒，对粮食种植极为不利，连续几个恶劣的冬天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而在法国实际上是无害，甚或是有益的”。勒鲁瓦·拉杜里, *Histoire du climat*, p. 281。

58 克柳切夫斯基, *A History of Russia*, II, pp. 233, 241。

59 马克·斯捷夫特尔 (Marc Szeftel), "Aspects of Feudalism in Russian History, 载拉什顿·库尔班编, *Feudalism in Histor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 Press, 1956), p. 176。

60 亚历山大·格尔申克隆 (Alexander Gerschenkron): "Review article: 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IV, 1, Mar. 1964, p. 56。

61 "这种新现象在莫斯科从 15 世纪中叶以来对俄罗斯人的吸收中凸现出来。首先,当地社会要么主动地,要么根据他们的政府的主张,开始公开倒向莫斯科。这使莫斯科所进行的统一具备了不同特点,进展较快。这就是说,它已不再是一个占领或私下谈判的问题,而是一个民族的、宗教的运动了。"克柳切夫斯基, *A History of Russia II*, p. 8。

62 见同上书, II, p. 44。

63 "这一转变引发的不仅仅是剥夺可以自由继承的财产 (Votchina), 和依持有者为国家服务的表现而定的土地暂时占有制 (pomestye) 的出现。在这一过程中,大面积的原属农民的"黑地"(即自由土地)被国家重新分给官吏。这一突出的政治过程,除非被置于扩张着的国家机构及其不断增长的需要这一框架内,否则就不可能被理解。"格尔申克隆, "An Economic History of Russi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I, 2, Spring 1952, p. 131。关于这一制度在财政上的起源,参看阿丹特 *Impôt*, II, pp. 1089~1097。

64 "修道院占有的土地在 16 世纪后半叶的政治经济危机中达到了顶峰。许多世袭领主为防止由于经济灾难或王室的没收而失去其土地,便把他们的财产赠给修道院,以换取对其捐赠之全部或部分土地或修道院所有的其他土地的永佃权。这样,以前的所有者便可在修道院保护下平静地生活,享受其财产的收入并逃避在伊凡雷帝治下不断侵袭世袭领主阶级的危险。"。布卢姆 *Lord and Peasant*, pp. 191~192。

65 见同上书, pp. 247~268。希尔顿与斯密认为这是从 1460 年开始 (见 *Enserfment*, pp. 18~19, 42~46, 73~75), 但同意它结束于 1649 年 (见 pp. 25, 141~152)。

66 "修道院世袭领地问题和农民命运之间的关系是双重的。一方面修道院世袭领地是从财政公债、王室和采役土地上形成的。所有阻止土地流向修道院和重新使之成为税收或服役的来源的企图都被证实是徒劳的,迫使政府(通过增加征税)用农民的劳动来补偿其在修道院所有权方面的损失。另一方面,

从修道院租佃土地对财政来源和服役状况永远构成威胁（因为从前者租地的优惠条件吸引农民离开后者），迫使政府企图通过限制农民迁徙权来缓解不利形势”。克柳切夫斯基，*A History of Russia*, II, p. 197。关于农民的普遍困境，参见布卢姆，*Lord and Peasant*, pp. 219~246。

67 见同上书，pp. 142—143。斯密将“Kormlenie”一词译为“俸禄”。*The Enserfment of Russian Peasantry*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8), p. 156。

68 “在伊凡雷帝统治时，俄国首次建立了国家直接征税制度。”见 A. 米勒 (A. Miller), “Considérations sur Les institutions financières de l'état moscovite au XVIe et XVIIe siècles”,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sociologie*, XL, 7—8, juil—août 1932, pp. 374~378。米勒清楚地指出了它与采地废除的联系：“由于居民不再必须支付给有采地的贵族，代之而起的是从此实行的有利于中央政府的一系列税收。”(p. 378)。

69 见韦尔纳茨基，*Tsardom* II, pp. 84~85。

70 见同上书，pp. 85~86。

71 “为保证服役关系正常作用，必须引入标准化和官僚化。……追求一致性的活动在封给地主土地规模的标准化中尤为明显。”布卢姆，*Lord and Peasant* p. 179。

72 见韦尔纳茨基，*Tsardom* I, pp. 87~174。

73 “沙皇伊凡四世被外国人认为是欧洲最富有的封建主。……极为有利可图的皇家贸易垄断权实施于外贸领域，完全有赖于沙皇本人及其随从的庄园经济。”彼得·I. 利亚申科 (Peter. I. Lyashchenko),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of Russia to the 1917 Revolu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49), pp. 213~214。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伊凡四世最初似乎非常支持发展与英国的商业联系。的确，因纳·鲁比缅科 (Inna Lubimenko) 认为他远比伊丽莎白更热衷于此，而正是英国的订货引起了伊凡的强烈反应。”见 *Les relations commerciales et politiques de l' Angleterre avec la Russie avant Pierre le Grand* (Paris: Lib Ancienne Honoré Champion, 1933) pp. 40~53。

74 “因而，很清楚，海上贸易不仅有利于俄国资本积累，而且增强了那些与国家统一和政府强大有利益关系的力量。……[不断增多的富有的商人们]对国内自由贸易和国外政治与商业扩张均感兴趣，因为这种扩张将能使 [他们] 通过立陶宛和巴尔干与西方保持接触，打开西伯利亚或是中东、远东财富

的大门。”马洛维斯特, *Past & Present* No. 13, pp. 38~39。

75 布卢姆, *Lord and Peasant*, pp. 146~147。布卢姆还提到“16世纪70~80年代农业生产灾难性的下降”。布卢姆“Prices in Russi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VI, 2, June 1956, p. 196。见利亚申科:“从旧式大型封建自给经济向植根于最大限度剥削劳动者的动机上,新式的采用农奴劳动的领地转变,必然导致莫斯科公国16世纪整个国民经济长时间的总体性衰退。……”

“通过其豁免权,世袭领地拥有许多特权,使农民附着在他们的土地上,这样他们很容易聚集大量劳动力,使农民逐渐农奴化。……一般的领地经济不能由Kholp[“农奴”——见斯密 p. 162]劳动来维持,因为他们拥有的农奴不多,更别谈其效率之低下了,尤其在货币经济条件下更是如此。但这种生产也不能完全建立在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的农民的劳动之上,因为领地经济力量往往并不是很强。领地劳动的必要的组织只能通过超经济强制来实现,即通过劳动者奴隶化将劳动力束缚于领地上。奴隶化不仅是由于劳动者的负债、贷款、契约的期限,等等,还由于承认了地主占有农民的义务劳动的权利。

“农民的破产和来自地主方面经济压力的增加迫使农民减少其可耕地[‘16世纪中期曾达95%,’到16世纪80年代‘在中部省份降至31.6%,诺夫哥罗德省降至仅6.9%’]并通过从奴隶化的土地逃往自由土地以求得到解救。结果,不仅领地本身,而且与之相联的农民经济也在16世纪明显地衰落了。”*National Economy of Russia*, pp. 191~193。

76 见布卢姆, *Lord and Peasant*, pp. 158~159。

77 曼科夫, *Le Mouvement des prix*, p. 126。法文本注明1570—1580年,但通过阅读上下文发现这显系排版错误,特此改正。

78 “在以下年代[1580—1590],情况突变,这与当时发生的著名的经济危机有关。苏联历史文献认为这一危机起了基本的作用。其原因、本质和地理范围都被充分揭示了。在苦难的利沃尼亚战争中,国民经济的所有力量都高度紧张,其不幸后果是以前农业经济非常发达的整个地区被毁弃;此时沙皇直辖的禁卫军的创建夺走了大贵族和王公们的地产;强制性土地再分配和‘下层居民的四处逃散。’……农业衰败和保留地上的农民的破产,导致谷物市场萎缩,由于谷物的匮乏使总需求上升,物价飞涨。”曼科夫,同上书, p. 36。

曼科夫还认为俄国或多或少地是欧洲价格革命的一部分。布卢姆警告:“很可能[在俄国存在类似的价格上涨]但是[曼科夫的]资料并未证明这一点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VI, p. 185。

79 见韦尔纳茨基, *Tsardom*, I, pp. 94~95。

80 同上书 p. 166。他补充说:“这样利沃尼亚战争就结束了。战争持续了1/4世纪之久,使俄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艰难和牺牲,再加上后来出现的沙皇直辖禁卫军的影响,把俄国拖入了深重的社会经济危机。”

81 波尔契涅夫,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1960, IV, p. 140。

82 同上书, p. 142。

83 韦尔纳茨基, *Tsardom* I p. 291。

84 克柳切夫斯基 *A History of Russia*, III, p. 128。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85 “17世纪的权贵多为新人。在那个世纪中期沙皇手下最富的23人中只有9人为旧王公的后裔。其余都是与沙皇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其家系源于莫斯科的大贵族)和没有封号的侍从阶级的其他成员,包括出身较低微的乡绅。”布卢姆 *Lord and Peasant*, p. 212。马洛维斯特,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 p. 189; 鲁布林斯卡亚, *French Absolutism*, p. 60。

86 “但作为一个阶级,乡绅分享了专制主义的胜利。作为沙皇与大贵族斗争的忠实工具,作为大混乱时期[17世纪最初几年]民族复兴的领导者 and [沙皇]米哈依尔[1613年]的拥护者,他们得到的报酬是取代公爵的子嗣[主子们]和大贵族而成为统治阶级。那些设法保留部分权力的旧贵族,徒劳地阻止乡绅对政府要职的占据。他们通过抱守已完全过时的任官等级制度来阻止它,但这些家族的要求再也抵挡不住沙皇的意愿。任命和提升是根据君主的命令进行,依据是才能,也可能更经常是个人偏爱,但不是血缘。最后,在1682年,久已过时的任官等级制度被废除了。布卢姆 *Lord and Peasant*, p. 151。

87 “在17世纪大贵族和大领主变得几乎无法区分。二者的土地均可继承,无需与实际上承担的劳役相联系。”C.M福斯特(C.M. Foust), “Russian Expansion to the East through the 18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I, 4, Dec. 1961, p. 470。[在1731年]另一道沙皇敕令将领地改称世袭领地。”布卢姆, *Lord and Peasant*, p. 151。

88 见韦尔纳茨基, *Tsardom*, I pp. 394~411。

89 见韦尔纳茨基, *Speculum*, XIV, pp. 321~322。

90 布卢姆 *Lord and Peasant*, p. 151。注意布卢姆是如何无意地用“乡绅”这一术语作为“小贵族”的同义词。见泰兹伯尔关于波兰乡绅与国王关系的论述:

“乡绅们为了公开表示他们的不满在利沃夫 (Lwów) 附近集结起来准备武装进军,以迫使国王、王后博娜及其周围的权贵们向其妥协,从而引起了 1537 年的‘母鸡之战’ (Hen’s War)。乡绅经济地位的巩固也是建立在这次胜利基础上的。这是使用农奴劳动的地产不断发展的结果。这种经济的规模通过牺牲农民而扩大,农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被赶走,得到的是更小或生产量更低的小块土地。”*History of Poland*, p. 176。

91 如塔齐尔就在波兰问题上认为:“城镇的经济繁荣不会为议会 (Sejm) 的法律所阻挠,这些法律对乡绅购买的所有物品和在其庄园上制造货物免税。同样的法律在其他国家对城镇居民没有什么不利后果。在波兰也存在许多城镇自由民—乡绅合营公司,他们的经营情况相当好。1565 年法不许城镇自由民买卖粮食,禁止波兰商人出口波兰货、进口外国货,使大城镇处于相当有利的地位,他们因而成为该贸易的唯一中介。外商只被允许在那里展示其商品。此外,1565 年法从未生效。禁止城市自由民购买土地的法令被议会实施过几次,但它也未能阻止城镇的发展。相反它鼓励了把从贸易中赚取的资本投向制造行业。”*History of Poland*, p. 177~178。

但他也注意到:“在 16 世纪末,波兰城镇开始感觉到建立在农奴劳动基础上的庄园经济稳定发展的影响。……一种不同的城镇,即那些 16 世纪末在权贵们大领地上建起的城镇。……这些城镇是当地地主的产业,自然要承受他们不断加重的剥削。贵族的霸权也在其他城镇中心表现出来。……对波兰的城市和手工业者来说,乡绅的政治霸权和农奴制农场经济扩张的负面作用不久就明显表现出来,但早在 17 世纪前半叶,经济危机的最初迹象已是洞若观火了。”[pp. 226~227]。

92 “德意志东部、利沃尼亚、波兰及波希米亚贵族的反城市政策,大大加速了城市的衰落。……他们的首要目的是打破城市对国际与国内贸易的垄断。他们还决心制止城市接纳逃离土地的农民。……”布卢姆,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II, p. 834。

93 宗教改革[在易北河东部地区]还有另一个后果:“在普鲁士之外,统治者成为大领地的所有者,因而他们作为地主的利益与那些贵族一致,而与商业城镇对立。”卡斯滕 *The Origins of Prussia*, p. 166。

94 “最重要的是,东部城镇的长期衰落及征服消除了贵族崛起的一切阻力。”……

“城镇的征服和衰落,从根本上打破了中世纪社会的平衡,并为一个阶级

统治另一阶级开辟了道路。在普鲁士,通过 1466 年把[除柯尼斯堡外]所有重要城市割予波兰,产生了同样的后果。”同上,p.116, p.147。

95 克柳切夫斯基, *A History of Russia*, II, p.145。

96 布卢姆, *Lord and Peasant*, p.23。

97 马洛维斯特,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 p.186。见卡斯藤,“16 世纪以前,勃兰登堡谷物出口由城镇进行,其市民从中得益甚大。但当贵族们变得对市场生产谷物感兴趣时,他们就开始侵占城镇的地盘[p.170]。”

见费尔多·盖斯特林:“从一种相反意义上说,斯洛文尼亚资产阶级正在逐渐感到大势对自己变得越来越不利。他们同商业、特别是过境贸易联系比同非农业生产更紧密。而在这一领域他们又被来自农民和地主双方面的竞争所击败。这就是为什么在整个[16]世纪……尽管其处境偶有暂时改善,但他们从未停止过缓慢的衰落。”*Economie et société en Slovénie au XVI^e siècle*, *Annales E. S. C.*, XVII, p.687。

见豪斯佐沃斯基:“[波兰乡绅]不仅想从他们土地的生产活动中,而且想从其产品的贸易中赚到收入。因此他们设法通过适当的 Szym 法律来保障在维斯都拉河及其支流上航运的自由,保障从其领地向外出口农林产品免除关税、进口其领地和农场中使用的所有商品免纳关税。在实际过程中,封建阶级扩展了他们的免税特权,免税出口从农民那里或乡村集市上收购的粮、畜及其他农产品。他们还通过维斯都拉河把一些外国商品免税运入国内,卖给生活在他们领地上的人。就这样,乡绅们把农产品、木材和林产品的贸易掌握在自己手中,把城镇市民从这项贸易中挤走,大大减少了城市商人从进口商品中牟利的机会。”豪斯佐沃斯基 *Poland at the X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p.127。

98 “在波罗的海地区国家,贵族的经济政策也对城市衰落起了很大作用。这一政策包括加强食品和初级产品的出口,通过大力支持其领地上的对外贸易来鼓励制成品进口。这些做法试图保证外国商品充足而廉价。”马洛维斯特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II, p.188。马洛维斯特称这种政策为“反重商主义”。

“波兰出口贸易的基本特征是,在全国范围里都为乡绅所控制。……而进口则主要控制在外商手中。豪斯佐沃斯基 *Poland at the X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p.129。

“对商业资产阶级和城市繁荣来说,比在乡村地区的竞争更为可怕的,是[意大利和南德意志]外国资本的到来。”盖斯特林 *Annales E. S. C.*, XVII,

p. 680。

99 “格但斯克市民很清楚地认识到与波兰政治结盟的经济好处。因而尽管其贵族、贸易商和小商人多具有德意志血统，讲德语，该城市却有强烈的亲波兰倾向。……[格但斯克人民]渴望保持与波兰的联合，因为这是他们城市繁荣的源泉。”豪斯佐沃斯基, *Poland at the X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p. 141。

100 “不像在西欧，贸易主要是中产阶级的职业，俄国社会各阶层的人都从事商业活动。沙皇本人和他的远古的祖先基辅大公一样，是全帝国唯一最重要的商人。……沙皇们不止经营自己领地上的产品，还垄断了许多种商品……有时沙皇甚至通过其商业代理人和官员全部收购某种商品，提高其价格，然后强迫商人购买。”布卢姆, *Lord and Peasant*, p. 129。

101 “除了做自己的生意外，客商还充当沙皇的商业代理人，他们被从本领域最成功的商人中挑选出来担当这一职能，他们还被授权征收某几种税，要求按政府规定的数额上交。作为对这种义务的回报，他们被授予一种类似侍从贵族的特殊身份。在这些商人中，斯特罗加诺夫家族(Stroganovs)最为著名。他们出身农民，14世纪后半叶在食盐贸易中开始发达。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活动扩展到了其他工商业领域。在北方拓殖中成为大地主，并在开发西伯利亚财富中起了主要作用。同上书，pp. 130~131。

102 福斯特,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I, p. 475。

103 “荷兰以及其他西方国家与波罗的海各国间这些活跃的商业联系使我们附带地注意到：如果说波兰贵族的财富，比方说是与向荷兰出口小麦紧密相联；相反，物美价廉的西方商品(尤其是荷兰和英国的布匹)的自由进口则摧毁了民族工业。同样地，荷兰舰队的巨大垄断趋势逐渐使波罗的海城市，包括波兰主要港口格但斯克的船队遭到毁灭，……

“荷兰、英国和早期法国从他们在波罗的海的特殊经济地位中牟利甚巨，就日益对欧洲这一部分的事务具有了浓厚兴趣。首先，这些国家希望他们的贸易能免受战争拖累。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看到在冲突中(1617年、1629年、1635年)不断出现的新的调解努力。”查尔平斯基, *X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Rapports*, IV, p. 37。

104 “从16世纪下半叶起，以纽伦堡等城的德意志商团为一方，以捷克花边公司为另一方开始达成一些集体协议。协议使这些花边公司保证供应一定数量、质量和预定价格的花边”。

“在30年战争之后，似乎公司向商会集体发售的形式在当时新条件下已

不能保证供给足量的面向海外出口的商品。人们不得不开发新的产品和商业形式。这种制度就称为分包制(Verlagssystem),它始于16世纪,充分发展则到了17世纪下半叶和18世纪。”A.克利马(A.Klíma)与J.马丘雷克(J.Macurek),“La question de la transition du féodalisme au capitalisme en Europe Centrale(16e—18e siècles),”*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 Stockholm, 1960. Rapports, IV : Histoire moderne*”(Göteborg, Almqvist & Wiksell, 1960), p. 87。

105 “16世纪和17世纪捷克大庄园有一突出的特点：在那里也可以看到粮食生产和初级农业的发展，但他们同时也从事农产品加工，如用粮食造啤酒，以及其他工业生产的起步。特别是啤酒生产是其特色，使捷克大庄园有别于毗邻的德、波、北匈牙利[斯洛伐克地区]大庄园。……特别在16世纪，另一个使捷克农业生产有别于邻国的特征是，发展了池塘养鱼。……此外，捷克封建大庄园也试图向工业生产渗透。16—17世纪，他们特别卷入了金属矿产领域，从事开矿和冶铁”。同上，pp. 99~100。

106 “在俄国，本国商人阶级手中积累资本的条件，要比波兰好得多。其优势是空前的，因为俄国贵族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经历了非常严重的危机，很少从事大宗贸易。

“再者，本地积累的资本要比波兰在更大程度上用于生产性目的。其投资加快了俄国经济落后地区及其北部、东南部边境地区殖民地化的速度。这肯定有助于增加国内和外贸需要的重要产品的数量。此外，商人集中投资于某些工业，如乌拉尔的制盐和冶铁，证明了其对俄国军队装备的重要性。作为国民的必需品的产量总的来讲是增加了，甚至大量农民也被卷进了商业经济网。马洛维斯特，*Past & Present, No. 13, p. 39.*

107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在呢绒业中，亚麻与羊毛混纺布料和长袍子布料在16世纪最为常见；外国访问者巴贝里尼的证言更证实了这一点。他傲慢地强调，俄国人不会制造呢绒，他们要从国外从我们这里进口，‘同样，在俄国农村，他们为主要是农村人口中的下层阶级生产普通布匹，即亚麻羊毛混纺布。这种布又分质量较好、一般和较差的，并在农村集市上出售。’

“第二类，显然是次要的，包括高质量呢绒，供人口中的高层、沙皇和宫廷使用。这些基本是进口呢绒：佛兰德斯的(从布鲁日、伊普尔和布拉班特)及其后英国的呢绒。然而这一类中也包括俄国布，尤其是诺夫哥罗德的，该地以其优质呢绒而闻名。”曼科夫，*Le mouvement des prix, p. 102.*

108 两篇讨论奥斯曼帝国(16世纪)与欧洲关系的文章是：伯纳德·刘易

斯 (Bernard Lewis) "Some Reflections of the Decline of the Ottoman Empire," *Studia Islamica* XI, 1958, pp. 111~127; 以及厄梅尔·卢特菲·巴坎, "La Méditerranée de Fernand Braudel vue d' Istamboul", *Annales E. S. C.* IX, 2. avr. - juin, 1954, pp. 189~200。

见奥托·布吕纳 (Otto Brunner) 的评论: "在政治权力、远距离商业和奢侈品贸易紧密联系之中, 拜占庭, 无疑更接近俄国式的 [经济], 而不是西欧式经济。" "Europäisches und Russisches Bürgertum," 载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L, 1, 1953, p. 15。

109 A.H. 利布耶尔 (A.H. Lybyer), "The Ottoman Turks and the Routes of Oriental Trad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CXX, Oct, 1915, p. 588。

110 戈丁浩,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e*, pp. 40~41。有一点要注意, 欧洲似乎通过地中海东部诸国使香料得到充足供应 (见 p. 537), 而戈丁浩怀疑那时葡萄牙人对香料的兴趣不仅仅是短暂而不切实际的: "[亨利] 或他同时代的葡萄牙人的活动真的是面向这些 [东方] 神奇国家的吗? 这似乎很难是真的。为什么葡萄牙商业当时兴趣盎然地试图把香料之路转为其利润? [p. 548]。"

111 同上书, pp. 43, 550~551。

112 同上书, p. 551。

113 同上书, p. 831。并见 p. 830 表。

114 "[开炮孔] 是很重要的。它使较大船舰能大大加强其火力。在主甲板上安装火炮不仅可使安装数量更多, 而且使装更多的炮不降低舰船的稳定性。"

"当欧洲舰队从大西洋到达印度洋时, 它们几乎所向无敌。正如阿尔布科尔克 (Albuquerque) 1513 年致国王信件中自豪地写道: '由于我们的船要来的传言, 当地的船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连鸟儿也不敢再从水面掠过。' 这不是溢美之辞。在葡萄牙人首次到达印度洋水域后 15 年之内, 他们彻底摧毁了阿拉伯人的海军力量, 葡国王能恰如其分地自称 '埃塞俄比亚、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征服、航行与商业之王'。" 奇波拉 *Guns and Sail*, pp. 82, 137。

关于这一时代葡舰的详细描述, 见弗朗索瓦·毛罗, "Types de navires et constructions navales dans l'Atlantique portugais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VI, juil - aout, 1959, pp. 185~193。

115 C.R. 博克瑟提出了怀疑从技术方面解释是否充分的原因, 并赞许地转引道: "然而垄断并不像听起来那样囊括一切。除了葡萄牙人从未有足够的

战舰在每时每地执行它以外，腐败的殖民官员极易受贿，当地运输经常（或名义上）由葡萄牙人进行。”“The Portuguese in the East, 1500—1800”，载 H. V. 利弗莫尔编 *Portugal and Brazil,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Clarendon], 1953), p. 193。

116 戈丁浩, *L' économie de l' empire portugais*, p. 18。

117 同上书, p. 19。

118 同上书, p. 574。

119 同上书, pp. 591、595。

120 同上书, p. 594。

121 “当海军力量相当的欧洲敌对国向葡萄牙特权提出挑战时，为保卫已赢得的庞大贸易需要紧密的组织。要塞哨所需要能顶住欧洲人的进攻，在缺乏海军支持时能坚守驻地的部队。葡萄牙人的回答是由其总督阿方索·阿尔布克尔克在文章中作出的。他制定了一套计划，涉及一系列孤立的要塞，及如何沟通从马拉巴尔海岸的果阿这一货物集散地到在欧洲的唯一港口里斯本的贸易问题，他把防卫体系的重点置于易受攻击的波斯湾、亚丁湾地区，并建议通过培育混血人口来解决人力问题。”里奇,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p. 204~205。

122 “由国家进行的最广泛的海外贸易是葡萄牙与印度及非洲沿海中间港口进行的贸易，这一贸易开辟了全新的天地。从最初到 1577 年，这一殖民贸易一直都在进行，但被限制在合法形式所规定的范围内，完全由国王负责，由他本人承担风险，用他提供的船只，只在个别情况下才允许私商介入对印度的贸易，但在非洲贸易中则更经常发生。”赫克舍, *Mercantilism*, I, p. 341。

123 “但从 16 世纪末叶起，不幸降临于绕好望角的航路，贸易急剧下降。英、荷此时把大量胡椒、其他香料和药品运到了欧洲。这就是从 1597 年起贸易又回到国家手中的关键原因：私人企业已不再敢组织公司冒险以从往返商业中获利 ['La ferme de trazida'] ……荷兰人在其早期活动中的确是既从贸易也从夺取葡萄牙船只来赚钱的；他们的船只来来往往，不必担心任何攻击，但葡人不是这样。因而私人企业不愿投资，加上资本数额小，且大部分投资是由国家承担，不足以组建一个公司。”戈丁浩, *L' économie de l' empire portugais*, pp. 696~697。

124 同上书, p. 656。

125 唐纳德·F. 拉奇 (Donald F. Lach): *Asia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I* :

The Century of Discovery (Chicago, Illinois,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5) Book II, pp. 827~828。

126 H. R. 特雷弗-罗珀, *Historical Essays*, p. 120。

127 关于穆斯林如何从印度洋地区被驱逐, 见戈丁浩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p. 630, 博克瑟,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pp. 45~48。关于葡萄牙取代倭寇海盗, 见特雷弗-罗珀, *Historical Essays*, p. 120。此书又根据博克瑟,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和桑瑟姆, *A History of Japan*, II, p. 268。

128 博克瑟,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p. 46。

129 “对葡人来说, 幸运的是, 当他们出现在亚洲水域时, 埃及、波斯和维贾亚纳加尔诸帝国在印度洋上没有战舰, 即便这些国家拥有一些船只。另外按照中华帝国的规定, 中国人的船只被政府限制于沿中国的海岸航行。”博克瑟载利弗莫尔, *Portugal and Brazil*, pp. 189~190。

130 见戈丁浩,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p. 596。

131 同上书, pp. 581~582; 博克瑟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p. 59。

132 “胡椒是从东方进口的主要商品, 而出口到‘金色果阿’的主要是银块。……在 16 世纪下半叶大多数时间里, 马拉巴尔的胡椒商只收黄金。……”博克瑟,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pp. 52, 60。

必须注意到, 肖尼觉得这种贸易对欧洲有利极了: “120 至 150 000 吨的香料被买走了, 几乎没有商品作为回报, 因为所付的 150 吨黄金中多是从虚弱的非洲社会抢夺来的, 而不计其数的大量硬币则无法与不断被补充的 6 000 吨白银相比。” *Conquête et exploitation des nouveaux mondes* (XVI^e siècle), Collection Nouvelle Clio 26 bi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9) p. 323

133 “只是对美洲贸易使欧洲能发展起对亚洲贸易。因为若无新大陆的白银, 西方就不能得到香料、胡椒、丝、宝石及以后中国的瓷器这一切珍贵的奢侈品。”肖尼, *Séville*, I, pp. 13~14。

“在墨西哥-秘鲁银矿开发后的时间里与西方贸易达到一个转折点, 因为它们生产的白银很大一部分流入中国, 交换丝绸、瓷器和茶叶。”马克斯·韦伯, *Religion of China*, p. 5。韦伯指出, 此时中国白银对黄金比价不断下跌: 从 1368 年 4:1 到 1574 年 8:1, 到 1635 年 10:1, 再到 1737 年 20:1。

“日本是除中国外与葡萄牙进行贸易的最重要的国家。[16 世纪] 澳门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那个国家的黄金出口,” 张天泽, *Sino-Portuguese Trade*, p. 117。葡萄牙能够控制中日贸易才使它得到用来与印度和东南亚进

行贸易的一些贵金属。

“16世纪以后金块、尤其是白银产量的剧增，与对外贸易新的发展紧密相联。”

“由葡船进行的对日贸易的发展与随之而来利润的增加，实际上是用日本白银交换中国生丝等商品的中介贸易发展的结果。

“长崎的许可证贸易主要目的是确保从第三国得到中国商品，因为明朝的政策禁止外船尤其是日本船在大陆停泊。日本外贸经历了一个辉煌的发展时期，正是此时日本国内贵金属生产达到了其繁荣的最高峰。”科巴达(A. Kobata): “The Production and Uses of Gold and Silver in 16th and 17th Century Jap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VIII, 2, Oct., 1965, pp. 245—246.

134 见肖尼 *Conquête*, p. 316。

135 见博克瑟,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p. 60。

136 拉奇,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Book I, p. XII。见布罗代尔: “16世纪及其以后几个世纪中, 在生产香料、药品和丝的广大亚洲地域流通着 [在地中海区铸造的] 贵重的金银币, 尤其是银币。地理大发现可能使航线和价格都颠倒过来; 但他们丝毫不可能改变支付逆差的基本现实。 *La Méditerranée*, I, p. 422。

137 “尽管欧洲人似乎很容易地在亚洲的海路上航行, 但他们还是很少而且很艰难地深入到主要大陆国家中。在16世纪中他们从不能使印度或中华帝国的统治者屈从其意志; 亚洲大陆上的伟大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根本没有感到他们的军事威胁。”拉奇,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Book I, p. XII。

138 戈丁浩, *L' économie de l' empire portugais*, p. 619。

139 参见戈丁浩同上书所载瓦斯科·达·伽马首次很无礼地会见加利卡特国王的奇异的故事。pp. 588~590。

140 同上书, pp. 627~629。

141 同上书, pp. 630~631。

142 迈林克-罗洛夫兹, *Asian Trade*, p. 119。

143 奇波拉, *Guns, and Sails*, p. 136。

144 见戈丁浩, *L' économie de l' empire portugais*, p. 655。

145 J. C. 范·莱乌尔 (J. C. Van Leur), *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 (The Hague: Hoeve Ltd. 1955), pp. 118~119, 165。即使对范莱乌尔的观点总的来说持保留意见, 迈林克-罗洛夫兹还是注意到巨变仅发生在17世纪: “最新的研究

只是想表明，早在 17 世纪前半期……欧洲的崛起已始见端倪，尽管——这一点能很容易得到承认——它还不是在所有地方和所有方面都已如此。” *Asian Trade*, pp. 10~11。

146 “如果没有对千年来经验的吸收和发扬，没有能把已有成就光大，葡萄牙人决不可能在 15 年内成功地控制了印度洋贸易的半数。他们开辟了新的路线，改变了最重要的贸易走向。但他们基本上没有触动千年来的联系与交流。葡萄牙带来的革命是迅速的，因为它达到了其顶点。” 肖尼, *Conquête*, p. 177。

“除了少数地方的少数人外，葡萄牙人在印度的存在很少被察觉。……很可能，如果葡人在 16 世纪末放弃了他们在印度的帝国，他们留下的遗迹会比希腊人、西徐亚人和帕提亚人还少。——也许只是一些硬币、集市 (bazzars) 用语中某些残缺不全的词汇、一些在不断消亡的混血社群，以及一些外国武士和教士的逐渐消逝的传统。” 桑瑟姆, *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 (New York, Knopf, 1950), p. 87。

“马六甲作为极重要的贸易枢纽，甚至在它被葡萄牙占领后仍在继续奉行久远的商业习惯。” 拉奇,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II, p. 829。

“只是因其海军才使葡萄牙人能保护既得利益，甚至在那时他们的地位也岌岌可危。在陆战中，他们武器的优势几乎发挥不了作用，因为这些武器实际上不如当地的武器适于热带作战。而且欧洲人面对的是数量上远远超过他们的本地人，他们熟悉地形，习惯气候。因而在整个 16 世纪中，葡萄牙的影响仅限于其沿海定居点周围的狭小地区。” 麦林克-罗洛夫兹, *Asian Trade*, p. 124。

147 戈丁浩, *L' économie de l' empire portugais*, p. 577。

148 同上书, p. 578。

149 K. M. 潘尼迦,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p. 53。

150 弗雷德里克·C. 莱恩, *Venice and History*, pp. 426~427。

151 博克瑟,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p. 57。

152 肖尼, *Conquête*, p. 205。见 C. R. 博克瑟“旧的葡萄牙殖民帝国，基本是控制海洋、从事海上活动的商业帝国，不论它主要是与东方的香料、西非的奴隶，还是巴西的糖、烟草和黄金有关。然而，这一海上帝国具有军事的和基督教的特色。” *Race Relations in the Portuguese Colonial Empire, 1415-1825*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Clarendon], 1963), p. 2。

153 “欧洲人的相对优势表现在海上。在陆上，长期以来，他们仍然是很脆

弱的。……直到 17 世纪 40 年代欧洲才生产出可移动的野战炮。……

“欧洲人普遍感到，任何将其控制伸入亚洲内陆的企图都不可能成功。

……

“直到 1689 年，在印度，东印度公司在陆地上还是不堪一击。”奇波拉，*Guns, and Sails* pp. 138, 141, 145。

154 “当欧洲大胆地向海外扩张，咄咄逼人地建立起了对亚欧美大陆的优势之际，在其东部边界，在土耳其军队压力下它却在迅速退却。”同上书，p. 140。

155 “欧洲人有效地占领和控制广大内地是后来作为工业革命的一个副产品才出现的。”同上书，p. 146。

156 “今天我们很难想像在 16 世纪香料的重要性。……然而，当糖还不为人知；当冷冻和冬储食品都不存在，冬天只有添加了香料的咸肉时；当几乎没有蔬菜来增加维生素和食物种类时；当香料或其它东方药材成为主要的药品时，香料在欧洲商业中就占有了非常重要的地位。”罗伯逊，*South Africa Journal of Economics*, XVIII, p. 42。然而正如我们所知，说糖那时不为人知是不真实的。它(甘蔗)广泛种植于地中海和大西洋诸岛屿上。被引进巴西，稍后又被引进加勒比海地区。

157 但要记住差别的重要性。相对来说胡椒比香料更重要。肖尼认为：“在 16 世纪的贸易中，胡椒不被看作是香料。胡椒，这个宫廷中和肉类保存时都要大量使用的东西，当时没有狭义的香料和药材那么有名。”*Conquête*, p. 200。

158 同上书，pp. 316~317。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59 “非洲香料贸易对葡萄牙来说，其交易量明显高于胡椒和姜以外的任何亚洲香料，而且经常高于亚洲香料的总交易量。仅几内亚胡椒一项就几乎总是超过生姜。粮食的价格当然只是东方调味品价格的零头：1506 年 3 月粮食每英担卖 8 个克鲁塞多，胡椒卖 22 个，桂皮则卖到 32~33 个，姜是 18~19 个。几内亚胡椒尽管价格低，但其总值常等于以至高于其他任何一种调味品，当然胡椒和生姜除外。因为 200 英担粮食(按 1506 年 11 月)每英担值 8 个克鲁塞多，其总价值等于 32 个克鲁塞多—英担的 500 英担桂皮，或 19 个克鲁塞多—英担的 840 英担生姜。”^[1]戈丁浩，*L' économie de l' empire portugais*, p. 547。关

[1] 500 英担，840 英担，原书如此。疑为笔误。似应为 50、84 英担。——译者

于西非产品植物学方面的说明和地理分布方面的说明,见 pp. 539~542。

160 其评价见同上书, pp. 683~709, 例子在 p. 699。

161 格拉曼, *European Trade*, p. 52。

162 同上书, p. 53。

163 莱恩, “National Wealth and Protection Costs”, 载 *Venice and History*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Press, 1966), p. 376。

164 同上书, p. 381。

165 “当时葡萄牙显示出的优于他国的活动,不是精明的贸易,而是在航海和战争中大胆的冒险。由于葡萄牙人的军事和宗教传统及其阶级结构,他们在印度的远征政策所激发的能量,很可能取得了比通过较和平的政策所能取得的更多的财富。一个1500年的威尼斯人很可能会认为葡萄牙能通过较和平的政策得到更多的东西,因为情况也许是:1500年葡萄牙的统治阶级具有与威尼斯人相似的性格。那时,威尼斯贵族变得热衷于和平贸易或管理乡下的地产,他们不再像三四百年前称霸拜占庭时那样既是高明的商人,又是厉害的海盗。”同上, pp. 395~396。

166 由于外交上的计谋,事情变得很复杂。见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 (Samuel Eliot Morison) *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Boston, Little Brown, 1942), pp. 367—374; 肖尼, *Conquête*, pp. 251~254。

167 见肖尼, “Le galion de Manille”, *Annales E. S. C.* VI, 4, oct-déc, 1951, p. 449。

168 同上书, pp. 450~451。

169 西班牙原来企图在美洲建立贸易站而不是殖民地,只是由于不存在允许这种关系的那种政治经济环境才使西班牙走上了殖民之路。路易斯·阿兹那 (Luis Aznar) 描写这一演变说:“粗金矿砂、奴隶运输或人头税都没有……带来足够收入以支付哥伦布在15世纪进行前三次探险花去的费用以及首批定居者的工资。这一不幸消息很快就在西班牙传开了,并在宫廷里产生了疑虑。……

“[宫廷改变了其政策,于是]起初是封建的冒险活动,到16世纪初便由此成为政府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现代的最初两个世纪中殖民国家即将建立的一切的原型。”*Las etapas iniciales de la legislación sobre indios*”, 载 *Cuadernos americanos*, VII, 5, Sept-Oct, 1948, pp. 177~178。

170 “16世纪上半叶,葡萄牙人认为(1500年)发现巴西是次要的事情。实

际上,竭力巩固对大致在今巴西桑托斯和累西腓港之间的海岸控制,主要是为阻止英法建立竞争性沿岸飞地来出口巴西染料木,这些染料木是用于低地国家和英国的呢绒生产的。只是出于害怕竞争才导致了16世纪下半叶持续占领和种植园经济的建立。”斯坦利·J. 斯坦与芭芭拉·H. 斯坦, *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 p. 22; 肖尼 *Conquête*, p. 222。

另见对此时葡萄牙对巴西态度的分析:“缺乏可以轻易掠夺走的宝藏,在早期减轻了葡萄牙对巴西的兴趣,特别是当时它与东印度贸易正值高潮。为了吸引私人资本到其美洲殖民地,葡王把它分成12个享有许多王室给予的特权的世袭辖区(*donatários*)。除引入了甘蔗种植的地区外,由于缺乏任何经济基础,这种尝试彻底失败了。国王不得不亲自担负起保卫这些长期以来几乎没有任何经济价值的广大地区的费用。尽管形式上是按葡萄牙封建制度为模型建立的,但这一世袭辖区制度应视为吸引私人资本来完成国王指导的经济扩张的任务的努力。这类似于英荷16世纪下半叶建立的贸易公司。塞尔索·富尔塔多,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pp. 9~10, fn. 2。

171 哈里森,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p. 554。

172 “然而,我们有16世纪的重要性顺序:如果里斯本和远东值1,巴西值0.5~1之间,塞维利亚就值1.5。17世纪初塞维利亚大约值1个半里斯本。肖尼, *Conquête*, p. 269。

不过,这并不能告诉我们这一贸易在总体上对欧洲的重要性。“很难测量塞维利亚和里斯本所占的份额,这是垄断的份额,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的份额,因为垄断比其赖以存在的欧洲世界更易于测量。测量与估量塞维利亚统治的美洲贸易和里斯本统治的亚洲贸易的重要性在可行性上是有差别的,不是因为测量垄断这一做法本身的内在缺陷,更多的是由于我们现在还无力测量其余的部分[即非垄断的部分]。”同上书, p. 273。

173 “从海外进口的大多数产品是以出口金银块和硬币的形式支付的。——东印度贸易基本上是一种以满足欧洲需求为主要目的的进口贸易,它并不为欧洲产品寻找市场。——而通过地中海东部沿岸国家的进口则面貌迥异。阿拉伯世界和东印度群岛渴望从地中海国家得到几种商品。铜是一种需求量很大的金属,从中欧经威尼斯运往东方。珊瑚从突尼斯近海渔场出口东方,在16世纪下半叶其中一些是由设在马赛的法属珊瑚公司经营的。来自埃及的纺织品、水银和藏红花以及鸦片,也进入了在地中海国家、东地中海沿岸诸国和东印度群岛之间交换的商品之中。这一情况无疑也解释了为什么葡萄牙人

发现了通往东印度群岛的海路后商队贸易没有停止。”格拉曼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pp. 56~57。

174 “马尼拉大帆船的最大敌人无疑是西班牙政府本身。在其不满很容易上达国王委员会的塞维利亚商人眼里,在宫廷的正统的重金主义者眼里,大帆船贸易是对远东贸易中最差的,其逆差要由出口贵金属来弥补。”肖尼, *Annales E. S. C.* p. 458。

反对贵金属外流的另一原因是它越来越不经过甚至根本不经过里斯本和塞维利亚:“通过绕好望角的航程,[银]里亚尔流向整个东方。因此,中国贸易——瓷器、生丝和丝绸、黄金——胜过其他贸易,并使日本成为经常性的丝绸出口国和白银的源泉。一方面中国极欲得到白银,另一方面西属美洲的开发,导致了一条从阿卡普尔科到马尼拉直接路线的开辟,这引起了果阿和里斯本的敌视,从而使它们接近同样受到损害的塞维利亚。”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p. 833。

不过,西班牙的情况与英国形成鲜明对比。17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同样受到白银外流的打击。这一情况伴随着其贸易,并使许多人认为它应对当时的贸易萧条负责。“对这一点,通常的回答是:由于公司对大陆和中东的再出口在价值上超过输往东印度群岛的财富,整个问题是与国家总的收支平衡不可分的”。K.M. 肖德尤里 (K.M. Chaudhuri),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Export of Treasure in the Early 17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VI, 1, Aug. 1963, 25. 当然该公司是完全正确的。“欧洲”在失去贵金属,但不是英国。结果不同的原因在于西班牙未能像英国那样把自己置于欧洲地区间贸易的连接点上。

175 见博克瑟,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pp. 56~57; 并见戈丁浩,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p. 683。

176 见肖尼, *Conquête*, pp. 290~296, 300~311。

177 见博克瑟,关于糖对巴西社会结构的影响的描述。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pp. 84~105。关于矿业操作。见阿尔瓦罗·哈拉:“毫无疑问,在美洲许多地区采矿业的巨大影响力,它重组、甚至破坏了殖民以前人们就有的结构。采矿中心的创建导致的当地人口新集中——我们不只指波托西,还指许多其它的金、银和水银生产中心——可能是首次出现了流动的和被剥夺的大众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他们完全被连根拔起,没有未来,甚至第二天的生活都没有保障。他们群集在名不符实的都市地区,在那里都市的概念对他们本身毫无意义,至少都市生活应使他们的生活水平可比以前有所提高。”哈拉, *Tres ensayos*

sobre economía minera hispano - americana, p. 28。

178 伍德罗·博拉指出：养蚕业发展很早，因为“丝体积小，易于由人或骡子搬运，这就保证了低运输成本；并且它在殖民地及西班牙均有稳定的销路和丰厚的利润。*Silk - raising in Colonial Mexico, Ibero - Americana*: 20(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43), p. 15。博拉对衰退提出了三种解释：印第安人口由于受虐待而下降；税收过重和剥削使印第安人放弃并捣毁桑园；由于另有菲律宾向世界市场增加了丝的供应而使利润减少。见他在 85~101 页对这些原因的长篇论述。

179 肖尼, *Annales E. S. C.*, VI, p. 462 (fn. 1)。虽然博拉似乎在一处指出菲律宾贸易的增长是墨西哥生丝生产下降的一个原因，但他在另一处又认为情况相反，从而支持了肖尼：“相反，菲律宾贸易的发展与墨西哥丝业的衰败是同时发生的；大规模进口中国丝始于 1579 年，大约在此时国内养蚕业也开始衰落。博拉 *Silk - raising*, p. 90。

180 见肖尼 *Annales E. S. C.* VI, pp. 460~461。

181 肖尼, *Conquête*, p. 290。

182 同上书, p. 277。关于距离一时间的长篇讨论, 可见 pp. 277~290。

183 莱恩, *Venice and History*, p. 28。

184 肖尼, *Annales E. S. C.*, VI, p. 455(fn. 2)。

185 阿尔弗雷多·马格里多 (Alfredo Margarido) 指出：“异教的刚果拒绝接受天主教，抵制殖民经济的苛求。葡萄牙人被迫摧毁其王国，以便在当地取得在南美推行其殖民政策所不可缺少的剩余。”见“L'ancien royaume du Congo”，*Annales E. S. C.*, XXV, 6, nov - déc, 1970。1725。

博克瑟也说，他称之为“有前途的尝试”在 1543 年多姆·阿方索一世国王逝世后就烟消云散了，“部分是由于葡萄牙对亚洲和南美经营的增加，但主要是因为奴隶贸易的扩散和加强。”*Race Relations*, p. 20。并见博克瑟,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pp. 97~103；乔治·巴朗迪耶 (George Balandier), *Daily Life in the Kingdom of the Kongo* (New York, Panthen, 1968)。

186 布罗代尔, *La Méditerranée*, I, p. 496。这一高利润贸易中的另一因素是腐败：“1500 年以后的几十年内，葡萄牙人在红海贸易商道上设置了严重障碍，造成在亚历山大港的香料价格超过了 15 世纪的水平。以后在印度的葡萄牙军官变得如此无能，又如此腐化，致使他们不再在通过红海及波斯湾的贸易路线上设置代价高昂的障碍。莱恩, *Venice and History*, p. 33。

187 见利布耶尔,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XXX, p. 586。

188 莱恩, *Venice and History*, p. 31。

189 戈丁浩引用 16 世纪威尼斯商人切萨尔·德·费德里奇 (Cesare De Fedrici) 的话说:“运到里斯本去的胡椒不如通过麦加海峡 [估计是红海] 来的好; 许多年以前, 葡王的使节以葡萄牙国王的名义同科钦国王达成一项协议, 固定胡椒价格, 结果价格既不能升也不能降。这样价格非常低, 致使农民非常不愿出售, 卖出的胡椒也是不熟并且很脏。好的胡椒都特地卖给了出好价钱的阿拉伯人。”*L' economie de l' empire portugais*, pp. 638~639。

戈丁浩坚持认为, 绕好望角航线的损失不能说明葡萄牙衰退的原因: “总的讲; 在 136 年之中, 外出航行的损失合计不到 11%, 回程损失不足 15%。1558 年在一项香料贸易的决算中, 有一项是每年五只船中有一只 (20%) 损失, 这个计算是非常粗略的。意大利人萨塞蒂 (Sasseti) 熟悉地中海, 有过被迫返回前一年的始发港的经历, 他在科钦写道, 从里斯本到印度的危险比从巴塞罗那到热那亚要小。[p. 671]”

正如居伊·肖森诺-诺加雷特 (Guy Chaussineud-Nogaret) 在评论戈丁浩的书时那样, 有人可能会问, 此时葡萄牙人为什么没有像以后英、荷那样发展起大的私人公司, 这样做就能使之用更有效的商业方法战胜其欧洲竞争者。(1628 年建立这种公司的尝试失败了) “曾经似乎处于导致现代商业资本主义诞生的伟大运动最前列的西班牙, 为什么会在 17 世纪初发现自己不能采用 [当时已存在的] 北部 [欧洲] 模式? 难道部分答案不是在于被弗吉尼亚·劳称之为 ‘国际投机’ [ogiotage] 的里斯本在国际资本主义中所扮演的角色吗? 这把我们带回到谁是香料贸易巨大受益者的问题上。很明显不是拥有垄断的国家: ‘胡椒之王’ 看着其财政被必需的巨大投资所吞没。”“*L' or, Le Poivre, Le Portugal et L' economie mondiale*”, *Annales E. S. C.* XXV, 6, nov-déc, 1970, 1595。关于这一评论, 富尔塔多的观点已见注 170。

葡萄牙人建立这种私人公司的一次尝试, 实际上还只是处于事情的初始阶段。1628 年建立, 1633 年解散。见达·席尔瓦, *En Espagne*, pp. 140~141。

190 见戈丁浩, *L' economie de L' empire Portugais*, pp. 596~616。他说, 葡人在印度洋上的活动即使在其最兴盛之时, “也对药材的供应几乎没有影响 [p. 616]。”

191 见同上书, p. 771。由于土耳其人禁止西班牙国王的臣民 (包括 1580 年以后的葡萄牙人) 在其统治地区内做生意, 葡萄牙人便冒用法、英或威尼斯人

的名字”。

192 同上书, p. 714。戈丁浩也说到最初在 1502 年威尼斯的难题:“危机不是源自葡萄牙人的航行,因为它在此之前……这就是说建立东印度群岛航路和针对红海贸易的行动是用来对付一个已经伤痕累累不堪一击的对象。这伤痕比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更久远,使危机转变为长期的萧条。[p. 729]。”

193 见凯伦本茨, *Annales E. S. C.*, XI, p. 8。

194 肖尼, *Conquête*, p. 358。

195 “汉堡在国际香料贸易中起首要作用的时间很短。16 世纪 90 年代在扩大殖民贸易中极为重要。英国和荷兰成功地扩大了其对世界香料市场的参与。”凯伦本茨, *Annales E. S. C.* XI, p. 23。

荷兰在欧洲的商业网此时也把触角伸进了巴西的蔗糖贸易:“巴西是欧洲消费的糖的主要来源。巴西与葡萄牙或西非间的糖和奴隶贸易仍掌握在葡萄牙商人及其承包商手中,许多承包商都是犹太人。但从葡萄牙出口到欧洲其他地区的蔗糖贸易是由荷兰人经营的。荷兰船长们还从事与巴西港口的走私贸易。当地的葡萄牙人纵容这种贸易并抵制试图阻止它的西班牙^[1]官僚。在荷兰到伊比利亚港口的贸易被官方禁止的时期,葡商也向荷兰商业企业出租他们的名字来赚取佣金。帕瑞(Parry), *Age of Reconnaissance* p. 277。

196 肖尼, *Sevill* I, p. 13。

197 见戈丁浩,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pp. 696~697。但戈丁浩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否认该因素的重要性,至少是从葡人的观点来看是如此。p. 671。

此时英、荷也开始介入美洲。当西班牙于 1595 年封锁荷兰船只在伊比利亚半岛沿岸的航行时,荷兰人深受缺盐之苦,因为盐是伊比利亚的出口产品。凯伦本茨强调盐实际“对[荷兰]鲑鱼业是非常重要的。……”“Spanien, die nördlichen Niederlande und die Skandinavisch - baltische Raum in der Weltwirtschaft und Politik um 1600”。*Viertel jahrschrift für die Sozial -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LI, 4, 1954, p. 293。

荷兰人发现南美加勒比海沿岸的阿拉亚半岛上有盐。他们开始开发它,而返回的船只则从事走私、劫掠以牟取额外利润。后果对西班牙是严重的:“对西班牙本身来说,这首先意味着其限制欧洲食盐的政策[对北部荷兰‘反叛者’施

[1] 1580—1640 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合并。——译者

加的政治压力]被证明是遭到了惨败。它完全失去了对盐价的控制权和以前从向荷兰出售半岛的食盐征收的关税。现在荷兰从美洲免费免税得到食盐,估计每年值100万弗罗林。”恩格尔·斯柳特(Engel Sluiter):“Dutch-Spanish Rivalry in the Caribbean Area, 1594—1609。”*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XVIII, 2, May 1948, p. 181。

西班牙力图赶走荷兰人并暂时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但代价是装备一支庞大舰队,并依1609年停战协定对荷兰重新开放伊比利亚半岛。在某种意义上说,弥补损失的行动太迟了。“对西班牙来说,荷兰人大规模入侵的同时,加勒比地区在远东、西非、巴西、圭亚那和伊比利亚本土的海运和商业方面也带来了巨大压力。这是使伊比利亚人对热带殖民世界的防御复杂化的又一因素。……西班牙在加勒比,并且某种程度上也在其他地方,暂时修补了篱笆,但付出的代价多大啊!这一时期,它到处被荷兰置于彻底的防守地位,完全陷入对至关重要的热带殖民地的防御中,以致再也无力占领帝国边缘那些仍未被占领的地区。只有从这些历史背景中,才能理解像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英国能发现并维持弗吉尼亚这个它在美洲的第一个脆弱前哨而未受西班牙人的打扰。而当时,西班牙人还稳固地盘踞着加勒比和佛罗里达”。斯柳特,*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VIII, pp. 195~196。

198 见奇波拉,*Guns, and Sails*, p. 136。见肖德尤里“英国人和荷兰人都发现从事亚洲的乡村贸易极为合算,他们普遍的贸易形式是以其白银投资在印度购买布匹,用以交换东印度群岛的香料”。*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VI, p. 26。

199 见戈丁浩,*L' économie de l' empire portugais*, pp. 814~817。

200 见博克瑟,*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p. 63。

201 见特雷弗-罗珀,*Historical Essays*, pp. 120~123。

202 “如果不是由于16世纪和17世纪,富于好斗的基督教的传人、发展和遭受暴力镇压,德川时代的日本似乎不可能退缩进其孤立主义的外壳。这反过来暗示,当时日本的海外扩张本不应夭折。不管是以和平方式或以其他方式,日本人在进入17世纪时可能会在菲律宾、印度支那和印尼部分地确立其地位,很有可能比实际上早几十年就可分享欧洲工业革命的成果。”博克瑟,*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p. VII。但对待“如果……就会……”这样的分析总是很难的。但对我来说,一个人可以对后来一系列相关问题做出大不相同的解释。我们不能够认为,仅仅是由于当时日本非常有效地退回闭关锁国状态,才

使它在 19 世纪强大到足以逃脱成为世界体系的边缘角色,并自此迅速实现了工业化。

本竹 (Eijiro Honjo) 对锁国的动机表达了与博克瑟相似之观点:“在日本传播天主教的消极影响导致了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Facts and Ideas of Japan's Oversea Development Prior to the Meiji Restoration,” *Kyoto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XVII, 1, Jan. 1942, p. 1。

203 见哈里森,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pp. 538~543。戈丁浩在讲到 1570 年马六甲的总督时说“实际上是独立的”。*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p. 812。

204 戈丁浩,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p. 783。

205 “在澳门的葡萄牙居民 [1582 年得知 1580 年西葡合并时] 在恐慌之余第一个行动便是把殖民地置于西班牙总督管辖之外。因为,如果驻澳葡萄牙人被降低为普通西班牙臣民的身份,如果澳门港会如预期的那样向西班牙敞开大门,葡人对中国贸易的‘垄断’就会马上结束,他们的损失将无法弥补。”张天泽, *Sino - Portuguese Trade*, p. 100。

结果达成了一项妥协。给予驻澳门葡萄牙人半独立地位,宣誓效忠西班牙国王但仍悬挂葡萄牙国旗,并从中国方面得到二等中国人⁽¹⁾的身份。张天泽对西班牙接受妥协的动机讲得很清楚:“卡斯蒂利亚国王害怕干扰澳门内政会遭到抵制乃至公开反叛,于是默许了其名义上的效忠。”同上书, p. 101。

[1] 原文为“a second - class mandarin”。——译者

第七章 理论的反思

理论化并非是一种脱离经验资料分析的活动。分析只能依靠推理的逻辑格式及命题作出。另一方面，对各种事件或过程的分析，必须包括一个作为起点的一系列可靠的、具有特殊价值的变量。依据这些变量，人们才能说明最后的结果是如何得到的。为了清晰地表述这一历史的解释，人们往往必须用假设或者以循序渐进的方法说明各变量之间的种种形式上的相互关联。

因而，在本书结尾时我们对这个资料再作一次简明扼要的回顾，往往是有必要的。毫无疑问，这样做对读者是有益的，而对于作者来说甚至更为重要，因为要力求分析的缜密，如果作者不再作一次回顾，就很可能掠过一些复杂情节中未被注意到的东西。到目前为止，我们已论及的经验资料无疑已经是复杂的，事实上比我们可能描述的要更为复杂。因而，我决定回顾一下本书一直在论证的内容。

为了叙述一个世界体系的起源以及最初的运行方式，我已经论证了世界体系的确切概念。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世界体系的生命力由冲突的各种力量构成。这些冲突的力量由于压力的作用把世界体系结合在一起，而当每个集团不断地试图把它改造得有利于己时，又使这个世界体系分裂了。世界体系具有有机体的特征，因为它具有生命期。在它的生命期中，它的特征在某些方面发展变化，而在另一些方面则保持稳定。人们可以依据该世界体系运行的内在逻辑来判定处于不同时期的世界体系的结构强弱。

我认为，表现为一个社会体系的特征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这

个体系内的生活大体上是独立自足的，而且这个体系发展的原动力大体上是内在的。读者也许感到使用“大体上”这个词是一种学术上的含糊其词。我承认，我无法量化它，也许不会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因为这个定义是建立在以下这个反事实的假设基础上的：假如该体系因某种原因与所有的外部力量断绝关系（实际上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此定义就表明这个体系实质上仍会以同样的方式继续运行。而且，实质上当然很难转换成一种坚实的操作规范。不过这个论点是重要的，而且是本书大部分经验式分析的关键。也许，我们应把独立自足看作是某种理论上的绝对，是某种极少见的，甚至更令人难以置信的人为制造的社会真空状态。但即使如此，我们仍应该把它看成是社会中确实存在的渐近线，而与该渐近线的距离不管怎样总是可测度的。

运用这样一种准则，要在此强调的是，绝大部分通常被描述成各种社会体系的实体——“部族”、社会共同体、民族国家——实际上不是完整的体系。与之相反，实际上我们论证的只是各种实际的社会体系，即一方面是那些比较小的，高度自治的自给经济体，它们不是某种定期要求纳贡的体系的一部分；而另一方面是诸世界体系。后者肯定与前者有区别，因为它们比较大；这就是说，这些体系按一般说法是各种“世界”。然而，更精确地说这些世界体系是由下述事实确定的，即作为一个物质经济实体，它们的自足是以广泛的劳动分工为基础的，而且在体系之内包含多种文化。

我们进一步论证迄今为止只存在过两种不同的世界体系：一种是世界帝国，在这些世界帝国中，存在一个控制大片地域的单一政治体系，不论其有效控制程度减弱到什么程度；而在另一类体系中，在其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空间不存在这样的单一政治体系。为了方便也是由于没有更合适的术语，我们用“世界经济体”描述后者。

最后，我们已经论证了，在现代以前，各个世界经济体是极度不稳定的结构，不是转变成各种帝国就是解体了。有一个世界经济

体已经存在了 500 年而仍没有转变为一个世界帝国，这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就是其力量的秘密所在。

这种独特性就是被称作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的政治方面。资本主义能够一直兴旺，正是因为这个世界经济体范围之内存在的不是一个，而是多个政治体系。

在这里我不是要论证古典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法，即资本主义是一个以国家不干预经济事务为基础的制度。完全相反！资本主义是建立在政治实体使经济收益分配到“私人”手里的同时，又不断关注经济损失的基础之上的。我所论证的恰恰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模式建立在这样一种事实之上，即经济因素在比任何政治实体所能完全控制的范围更大的领域内发挥作用。这就给资本家提供了一种制度本身所具有的运筹帷幄的自由。它已使得世界体系的不断的经济扩张成为可能，虽然它的收益分配是很倾斜的。能保持一个高水平的生产率，并能改变分配制度的唯一可替代的世界体系，将引起政治和经济决策层的重新整合。这将构成世界体系的第三种可能形式，即一个社会主义世界政府。这不是一种现存的形式，甚至也不是 16 世纪时所能模模糊糊地想象得到的。

关于欧洲世界经济体产生于 16 世纪并抵制了把它转变为某个帝国的各种企图的历史原因，我们已经详细地说明了，这里不再重复。不过应该注意的是一个世界经济体的范围大小取决于技术状况，尤其是在这个世界经济体范围之内的交通运输和通讯的发展前途。由于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现象，而且并不总是能得到改善，所以一个世界经济体的范围常常处于变动之中。

我们已经为世界体系下的定义是具有广泛劳动分工的实体。这种分工不仅仅是功能上的——即业务上的——而且是地理上的。那就是说，各项经济任务的区域分布不是均匀地分布于整个世界体系。可以肯定，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生态学考虑的结果。但从最主要方面来看，它是社会劳动组合的一种作用，这种组合使这个体系中的某些集团剥削其他一些集团的劳动，即获取较大份额

的剩余的能力得到扩大并合法化。

在一个帝国中，政治结构趋向于通过占领把文化联系起来，而在世界经济体中的政治结构趋向于通过空间定位使文化联系起来。其原因就是在一个世界经济体中对于各个集团形成有效政治压力的主要是地区的、民族的国家结构。文化的趋同往往倾向于为各主要集团的利益服务，而压力的加强是为了创造文化—民族的同一性。

在世界经济体中占据优势的地区，即我们称之为中心区的国家，情况尤其如此。在这类国家中，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的创立，总是伴随着一种民族文化，这一现象一般被称为一体化，既可以作为保护在世界体系内已出现的差别情况的机制，又可以为维持这些悬殊的差别情况作一种观念形态上的掩饰和辩护。

这样，世界经济体就划分为中心国家与边缘地区。我不说边缘国家乃是因为边缘地区的一个特征就是本土国家很虚弱，这包括从根本不存在的国家（指处于殖民地状态）到自立程度很低的国家（即指处于新殖民地状态）。

根据一系列衡量标准，诸如各种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国家机器的实力以及文化的完整性等等，在中心和边缘之间还存在半边缘地区。这些区域中有些在某个世界经济体曾属于早期类型的中心区域。有些过去是边缘地区，后来上升为半边缘地区，可以说它们是不断扩张的世界经济体中地缘政治变化的结果。

然而，半边缘地区的存在既不是某种统计学上的划分手段，也不是一种残余类型。半边缘地区是一个世界经济体不可缺少的结构性要素。这些地区所起的作用同帝国中各中间贸易集团能起的作用相似（细节上已作过必要的修正）。半边缘区域是各种不可缺少的技能的集合点，但在政治上往往是不受欢迎的。这些中间地区（如同帝国中的各种中间集团）部分地使政治压力转移，否则那些主要是处于边缘地区的集团有可能直接反对中心国家和那些利用中心国家机器在国内操纵的集团。在另一方面，主要位于半边缘地

区的各利益集团,处于中心国家的政治舞台以外,它们发现寻求政治上联合的目的难以实现。如果他们和中心国家是处于同一个政治舞台上的话,那么政治上的联合本来是应对他们开放的。

世界经济体的分工包含有各种职能性任务的层级体系,其中,需要较高水平的技能和较大资本含量的各项任务由较高层次地区来承担。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本质上要使积累的资本包括人力资本(赢利率高于未经训练的劳动力)获得报偿,这些职能性技能在地理上的不均衡分布必然具有某种很强的自我维持之势。市场的力量更多地是强化而不是削弱这些不平衡。而且,在世界经济体中缺乏一个中央政治机构就很难给受益不均强行加进一些反作用力。

因此,世界经济体的发展进程趋向于在本身发展过程中扩大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和社会差距。这一事实很容易被一个因素所掩盖,即世界经济体的发展过程引发了技术进步,从而可能扩大世界经济体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的某些特定地区可能会朝有利的方向改变自身在这个世界经济体中的结构角色,尽管作为一个整体,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地区之间受益不均的情况可能会同时不断扩大。正是为了清楚地观察这一至关重要的现象,我们坚持把某一世界经济体的边缘地区与世界经济体的外部区域区分开。这个世纪的外部区域常会变成下一个世纪的边缘地区——或半边缘地区。另一方面中心国家也会变成半边缘国家,半边缘国家变成边缘国家。

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整个历史中,中心国家的各种优势一直在扩大,但特定国家试图留在中心部分内的能力并不是没有受到挑战的。猎狗总是追逐兔子以取得胜利者的地位。事实上,在这种体系内,在长远的历史时期中,从结构上看,优秀分子的循环出现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这意味着在一定时期中某个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往往迟早要被另外一个国家取而代之。

我们一直主张,现代世界经济体是而且只能是一个资本主义

世界经济体。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已经拒绝把在世界经济体中成长起来,建立在强迫劳动基础上的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农业冠以“封建主义”的称呼。而且,尽管这个问题在本卷中尚未讨论,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后面的几卷中,我们将周密而慎重地研究这样的说法,即20世纪中,在世界经济体框架内存在着各种社会主义的民族经济(相对于控制着世界经济体内某些国家机器的社会主义运动)。

如果世界体系是仅有的真实的社会体系(而不是事实上被隔离的自给经济体),那么,就必须把阶级和身份集团的出现、巩固和政治上所起作用必然被看作是世界体系的要素。由此可见,在分析一个阶级或者一种身份集团时,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不仅是它们的自我意识的状态,而且是它们自我限定的地理范围。

阶级总是潜在地存在着(an sich,自在之物),问题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些阶级会具有阶级意识(für sich,独自的),也就是作为一个集团,或者一定程度上作为一个文化实体在政治经济舞台上从事活动。这种自我意识是冲突环境的一种机能。但对于比较高的阶层,公开的冲突和明确的意识总是没有更好。只要不使阶级界线明确化,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可能维持着各种特权。

因为在冲突的形势下,众多的派别往往通过结盟减少到两个,根据定义不可能有三个或更多(有意识)的阶级。虽然,可能会存在众多的职业性利益集团,在社会结构中组织起来进行活动。但是,这些集团实际上是各种身份集团的变种,而且事实上经常与其他依据种族、语言或宗教的标准划分的身份集团大量地重迭在一起。

说不可能存在三个或更多的阶级并不是说总是存在两个阶级。也可能一个阶级也不存在,尽管这种情况是少有的和过渡性的。可能只存在一个阶级,这种情况是最普遍的。也可能存在两个阶级,而这种状况是最具爆炸性的。

我们说可能会只有一个阶级存在,尽管我们也说过阶级实际

上只存在于冲突环境中，而冲突意味着是双方的事情。这并不矛盾。冲突可能是发生在一个阶级和其他所有阶层之间的，这个阶级把自己看作是代表全民的阶级。事实上，这是现代世界体系中通常的状况。资本家阶级（中产阶级）宣称是这种代表全民的阶级，并试图组织政治生活以达到反对两个对手的目的。一方面，有些人要求维护传统的等级区分，尽管这些等级也许早已失去了它们原先的与经济功能的相互关联。这些分子倾向于把社会结构看成是没有阶级的结构。正是为了对抗这种意识形态，中产阶级才开始成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阶级而发挥作用。

然而，中产阶级还有另外一个对手，就是工人。一旦工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自己是一个阶级时（这种现象在16世纪并不常见），他们把这种局面说成是两个阶级两极分化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产阶级发现它自己深深地陷入策略上的两难境地。他们既然保持了自己的阶级意识，却又受工人的有阶级意识这一事实的推动，因而冒着削弱自己政治地位的风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资产阶级闭口不谈自己的阶级意识，不惜冒险削弱他们自己相对于传统的高层权贵的地位。

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成的过程，即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代表全民的阶级，从社会各个阶层接纳其成员的过程，我们在讨论都铎王朝时代的英格兰作为一个社会类型的乡绅的产生或荷兰北部市民的兴起时已经作了说明。中产阶级声称自己是一个代表全民的阶级，他们所采用的支持这一主张的方法之一就是靠发展民族感情，这为他们的主张披上了一层文化的外衣。

中产阶级既受到例如左派造反的威胁，同时又害怕两类对手之间采取地方主义主张的方式结盟，它的这种深陷进退两难的处境，我们在讨论“第二个”16世纪的法国时已经作了说明。那时，中产阶级采取暂时退却的策略。也许他们没有其他可行的办法。但是，这种退却也有其长期的后果，一是在以后法国大革命（尽管是短暂的）中产生社会激进主义，一是使法国的经济发展长期落后于

英国。

这里我们所举的几个例子是关于那些已具有阶级意识的中产阶级的,但这种意识局限于民族国家范围内。这显然不是他们的唯一选择。他们也有可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世界性的阶级。许多集团都竭力争取这样一种界说。一方面,存在各种各样的国际性商人—银行家集团。另一方面,在边缘地区存在众多的资本主义农场主阶层。

在查理五世的全盛时期,在低地国家,德意志南部,意大利北部以及其他的地方,有许多人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抱负之上(有一些人谨慎地把一只脚留在组成当时法国政府所在地的瓦卢阿的门内)。如果说这些集团仍然是一个社会阶层而尚未形成一个自觉的阶级,那他们也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走,看来这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但是由于帝国的失败,欧洲的中产阶级认识到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前途是与各中心国家联系在一起的。那些资产阶级由于种族和宗教的密切联系,能把民族国家变成他们的政治活动舞台的中产阶级就是这样做的。

至于边缘地区的资本主义农场主,他们很乐意把自己看做是国际乡绅阶级的一部分。为了参与“世界”文化,他们乐于牺牲本地的文化根基。但是要构成一个世界性阶级,他们需要各个中心国家的资本家阶层的合作,而这并非随时可以实现的。所以这些边缘地区的农场主日益变成过时的和势利的西属美洲种植园主,或是后来几个世纪的东欧贵族。他们从潜在的世界性阶级意识倒退到地方性休戚相关的身份集团,为西欧资产阶级的利益效劳。

各种特定经济活动在地缘上集中会对身份集团的形成不断产生压力。当地方统治阶层受到来自任何较低阶层初期的阶级意识的威胁时,强调地方文化就有利于转移当地的内部冲突,同时形成对抗外部世界的地方性团结一致。另外,假如这些地方统治阶层感到他们自己受到世界体系的更高阶层的压迫,就会加倍地激发他们去追求一种地方性认同。

显然,人们不会凭空形成某种认同。人们是从语言、宗教和独特的生活方式方面所发现的特点形成认同的。然而,很明显,语言和宗教上的同一性和感情(一种对各自的生活方式的偏好)是社会的产物,不应被看成是永恒传统的简单延续。它们是在艰苦工作的岁月里好不容易才形成的社会产物。

对于欧洲的大部分来说,16世纪正是这样一个艰苦时期。这正是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时代,是漫长的国内宗教战争的时代,也是国际上宗教的“多派别”时代。但最后尘埃落定之时,一切宗教动乱在国际性自由放任的构架中形成了一种各个政治实体在宗教上的相对同一性——教随国定。

在讨论各种具体的发展情况时,我们已经试图说明,为什么各种形式的新教最终成为各中心国家的宗教(法国除外,但这又是为什么),而天主教则成为边缘地区及半边缘地区的宗教。我们对各种神学的信条与这一事实有密切关系的说法持怀疑态度,尽管这些信条也许是促进了这种演变过程。倒不如说,由于神学信条在实践中演化得与它们本来的观念正相反,它们既反映了,也有助于维持不同地区在世界体系中担任的角色。

人们常说,查理五世由于企图做一位宗教分裂的仲裁人,而不是做一位领导者,所以他错失了缔造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新教国家的良机。然而,这样的评判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查理五世企图建立的是一个世界帝国,而不是世界经济体中的中心国家。帝国依靠反映多重角色的多种宗教而壮大,这些宗教很少只集中在特定的政治范围之内。处于国际不纯一性中的民族同一性乃是一个世界经济体的基本程式。

至少这是最初时期的程式。各中心国家因为复杂的内部劳动分工,开始在总体上反映这一体系的模式。16世纪,英格兰正朝着形成大不列颠的方向发展。就整个国家而言,大不列颠将会在整个国家的相对不纯一中存在着地区同一性。

宗教并不一定就是各个主要身份集团的文化特性的界定标

准；人们可以使用语言。语言在16世纪确实开始起着这样的作用，而且随着几个世纪过去，它的重要性在提高。然而在世界经济体中宗教增强作用专门化的方面比语言的增强作用具有优势。宗教较少妨碍在世界经济体内不断发展的各种信息传播过程。而且由于世界宗教所强调的普世主义教旨，它较少（仅是较少）使自己适应孤立主义的封闭状态。

16世纪的欧洲世界经济体总体上趋向于成为一种单一阶级体系。得益于经济扩张的生气勃勃的势力和资本主义体系，尤其是在中心国家中的这些势力倾向于成为具有阶级意识，即在政治舞台上，作为一个集团而起作用，这个集团主要是根据这些势力在经济中共同的作用而确定的。事实上，这一共同角色大体上是从20世纪的观点来界定的。这个集团包括的人有农场主、商人和工业家。一些个别企业家有时并不是固定从事某一行业的，经常变来变去，或同时从事几种业务。这些人之间的主要区别是，无论他们从事哪一行，有些人主要是从世界市场上赢利为取向，另外一些人没有这种取向。

“另外一些人”利用他们的身份特权进行抵抗，这些特权包括传统贵族的特权、小农场主从封建制度中继承过来的特权、来源于已经过时的各种行会垄断的特权。在文化相似的外衣下，人们常常会结成各种奇特的同盟。这些奇特的同盟会采取积极活动的方式迫使政治中心考虑他们的利益，在关于法国的讨论中，我们列举了这样的一些例子。或者，这些同盟在政治上会采取一种消极的方式，以符合世界体系中统治力量的需要。作为一种文化势力，波兰天主教的大成功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油画的各个细部画满了多种身份集团的盛装，以及他们特有的力量和特征。但描绘的大轮廓是表现阶级形成的过程。就这方面来说，16世纪不是决定性的。资本家阶层形成了一个阶级，生存了下来并获得了公民权，但尚未在政治舞台上取得胜利。

国家机器的演变正是反映了这种不确定性。强大的国家为某

些集团的利益服务而损害其他一些集团的利益。然而,从世界体系的整体观点看,如果会产生众多的政治实体(意即如果这个体系不是一个世界帝国),那么,所有这些实体就不可能是势均力敌的。因为,假如是势均力敌的,他们就会阻碍位于别国的跨国经济实体的有效运行。那样的话就会妨碍国际劳动分工,世界经济就会衰落,直至世界体系分崩瓦解。

国家机器也不会都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阶层就没有任何手段去保护他们的利益,保障他们的财产权,确保各种垄断,并把损失分摊给广大居民,等等。

由此可见,世界经济体形成一种格局,国家结构在各个中心地区比较强,而在边缘地区相对弱些。哪些地区起哪些作用,在很多方面是偶然的。某些地区的国家机器要比另一些地区的强大得多,这是必然的。

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我们指的是什么呢?我们所指的实力是相对于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其它国家,包括其他中心国家而言,所谓的强大是相对于该国家国内的各种地方政治单位而言。实际上,我们所指的统治权既是事实上的也是法律上的。我们说某个国家强大也是指相对于在该国家内的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集团而言的。显然,这些集团给国家带来的压力的大小是有区别的,而且显然这些集团的某种联合控制着这个国家。国家是一个保持中立的仲裁者。但是,因为只要是许多现存势力处于两个以上的国家中,或者它们是由与国家边界很少关联的标准界定的,那么,国家就不会是某些势力的简单的矢量。

一个强大的国家是一个具有部分自主性的实体,意即这个国家在其内部尚有反映多种利益妥协的行动余地,尽管这些行动余地的范围是由某些具有基本力量的集团的存在决定的。要成为一个部分自主的实体,就一定会有一批人,他们的直接利益来自于这个实体,这些人包括国家的管理者和国家官僚。

这些集团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框架内崛起的,因为对

于崭露头角的资本家阶层和古老的贵族统治集团这两个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最强大的集团来说，强大的国家是各种难以取舍的方案中的最佳选择。

对前者来说，“君主专制制度”式的强大国家是首要的买主，一个保护他们不受国内和国际掠夺的保卫者，一种社会正统模式，一种防止其他地方建立强大国家壁垒的先发制人的保护措施。对于后者来说，这个强大国家代表了对付这些资本家阶层的制动装置，各种身份规定的支持者，秩序的维护者和奢侈豪华生活的倡导者。

无疑，贵族和资产阶级都感到国家机器是个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爱管闲事的非生产性官僚机构。但是，他们有什么可选择的办法呢？无论如何，他们总是难驾驭的。世界体系中的政治是由推拉两种力量构成的，这两种力量来自于两个集团力求摆脱那些在他们看来是国家机器的负作用的努力。

国家机器包含有某种倾斜机制。在某一点上能使力量产生更大的力量。税收能使这个国家拥有一支比较庞大而有效的文职官僚和军队，而这反过来又能带来更多的赋税收入——一个螺旋式持续的过程。倾斜机制也向另一方向起作用——衰弱导致更衰弱。处于这两个倾斜点之间就产生了国家政治。各种特定的管理集团的本领正是在这个舞台上呈现出差别的。由于这种倾斜机制，世界体系中某一点上的细小差距会迅速地扩大。

在那些国家机器软弱的国家中，国家的管理者们没有起到协调复杂的工、商、农机制的作用。他们反而变成许多领主中的一批，并不要求拥有统治所有人的合法权力。

这些人通常被称作传统的统治者。政治斗争经常被表述为传统与变革之争。当然，这是一个极易使人误解的意识形态上的术语。事实上，这可以被看作一个一般的社会学原则：在任何特定时间，被认为是传统的事物是比人们的一般想象具有较近的起源，主要是代表了某个社会地位有日益下降危险的集团的保守本能。确

实,当出现需要时,似乎没有什么事物会像某个“传统”那样快地出现并发展得很快。

在一个单一阶级的体系中,“传统的”是“其他一些人”以其名义同有阶级意识的集团作斗争。要是他们通过广泛地给予他们的合法权力,甚至使他们进入立法机关更好,从而能把他们的价值包上一层外壳,那么他们就会把体系变得对他们有利。

传统主义者可能在某些国家中取胜,但是,假如世界经济体要存在下去的话,他们在另外一些国家中定会多少有所损失。进一步看,在某一地区中的所得相当于在另一地区中的所失。

这并非是一个出现和局的比赛,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中的全部成分使他们的价值同时朝某个特定的方向转变也是不可思议的。社会体系是建立在其内部存在众多价值体系基础上的,它们反映了各个集团和地区在国际分工中的特定功能。

在这里我们没有论述与世界经济体运行有关的所有理论问题。我们只是力图论述那些在世界经济体形成的早期阶段即16世纪的欧洲表现出来的问题。在以后的几卷中,我们将从经验上和理论上论述其他许多出现在以后各个阶段的问题。

16世纪,欧洲如同一匹腾起的野马。一些集团试图建立一个基于各自的劳动分工的世界经济体,在中心地区建立民族国家作为这个体系的政治经济的保证,并使工人不仅提供利润而且付出维持这个体系的费用,这谈何容易。人们所作出的努力确立了欧洲的名望,因为没有16世纪的突进,现代世界就不会诞生,而且,尽管它有残酷的一面,但这个世界诞生总要比没有诞生时好。

确立欧洲的名望也不是容易的,特别是由于那些付出直接代价的人们大声疾呼揭露其所有的不公正就更不易。波兰、英格兰、巴西和墨西哥的农民和工人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得很暴烈。R.H. 托尼在谈到16世纪英格兰农民暴动时说到:“这样的运动表明了气质和力量,表明了高尚与豪侠精神……祝一个其人民没有忘记怎样去造反的民族好运。”¹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1930—) 在西方学术界

常被称为“新左派”学者或“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现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的“杰出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自70年代起，担任该校“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和文明研究中心”主任，还担任国际社会学协会主席等数十项学术职务。他发表的一系列论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生和发展演变的专著，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当今西方学术界，把资本主义的历史作为一个世界体系的历史来研究，已经形成国际性学派。沃勒斯坦是这个国际性的“世界体系”学派的核心人物。



NO. 18